#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四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 目　录

#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

现在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压迫之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期；精神上物质上都日就衰弱的中国民族，正因这一个运动才有了新的转机。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的劳苦民众之代表，既觉到现时的中国，确是到了民族解放运动之重大时机，故必须将我们对于时局的根本观察及职任布告于全国民众之前。

自从北方的国民军败退之后，奉直两派军阀压迫人民比以前更加一天天的厉害起来。英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勾结这两派军阀，正在计划怎样在中央在各地方建立军阀专政，以帝国主义者为后盾，并且利用买办官僚及老民党中之卖国分子，以扑灭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各界人民，深受帝国主义者的经济侵略及本国军阀的虐政和连年战祸，尤其是最近两年，不但农民破产，就是中等商人，甚至于大商人、小官吏、自由职业者，也都不免破产困穷，流离失所，更用不着说最窘迫的工人了。

一般农民都备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的鱼肉和兵匪扰害的苦，无地的农民更苦于租重无以糊口，有地的农民又苦于预征钱粮，勒派公债以及各种名目按亩附加的捐税，以至一方面农民被迫失业，流为兵匪，一方面农业衰败，生产减少，不但农民无以自存，且影响到城乡一般平民，米荒问题日益剧烈。在工业方面，因为外人把持海关，对进口货、出口货都不能采用保护税制，国内制品不能与外货竞争，又加以国内战争，运输阻滞，新兴的工业资本家不但未能自由发展，且日在破产愁烦的生活中；工人所得工资不够维持生活，还要受中外厂主及职员之任意凌辱打骂，童工尤甚，虽女工亦不免。手工业工人及厂主，均因外资输入，日益失业破产。一般商人因为连年战争不能做买卖，军人扣火车不能运货；各种苛税杂捐不算事，还要强用军用票及滥发纸币，等于没收商人的财产；军阀直接或勾结商会领袖向商人摊派公债，强索报效军饷，强索不遂，甚至于拘捕恐吓，等于土匪绑票。学生则因为学校经费不足，或家庭无法供给费用，而时有中途辍业的恐慌。新闻界日在中外官厅控告、逮捕、罚金、监禁、枪毙、封禁报馆、干涉言论及记载的状况中生活。一切在国家行政机关教育机关靠月薪生活的下级职员教员，受欠薪及搭发公债、国库券、公益库券、军用票及纸币跌价的苦，至于不能养家活口。兵士不但得不着正饷，连给养衣服都不足，还要为官长去杀人抢劫，抢得太不好看了，枪毙抵罪的仍是兵士；巡警的困苦，和兵士差不多，还要加上军队的压迫。

解除这些痛苦乃是中国人民目前最急迫最低限度的要求，决不是什么赤化，或者可以说是国民自救的赤化，而不是共产主义的赤化。可是真正赤化的中国共产党之目前的职任，正是要团结全国受苦受难的民众，为免除这些痛苦向帝国主义及军阀争斗，照马克思主

义——共产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凡是被压迫国家和殖民地的共产党，都应该代表一切被压迫民众之利益，向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争斗，不单是代表工农利益向资产阶级及地主争斗。因为殖民地的工农群众，为自求解放计，必须力争整个的民族解放，推翻本国军阀及世界帝国主义，才有出路。

中国的工农及一切受苦受难的民众所以这样穷，这样苦，这样受压迫，不用说乃是军阀尤其是帝国主义之赐。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驻扎海陆军，把持中国的海关，强迫中国的关税要遵从他们的协定，阻碍中国工商业之发展，使他们的货物尽量输入，使中国的原料贱价输出，于是中国每年进口货价超过于进口货价总在三万万两银子左右；赔款和外债本息之偿还，单是在关盐两税项下拨付的，每年就有九千八百万元；至于他们在中国经营的矿山轮船各种工厂及银行纸币所吸收去大批款项，更不计其数；如此中国安得不穷！

帝国主义用经济侵略的手段，把整个的中国都弄穷了，复用政治的侵略手段，各自勾结中国一派军阀，使之对他派军阀战争，或对接近人民的军队战争，以巩固其在中国既得之权利，并继续增高其经济侵略，如是赣宁战争、洪宪战争、直皖战争、三次奉直战争，以至最近反国民军战争，遂充满了民国十五年之历史。被外国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而原有手工业农业经济日渐破坏之整个的穷中国，又加以十余年继续不断的战争，所有农民、工人、商人、学生、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兵士等一切民众的苦痛，都由此而来。

所以中国人民要解除切身的苦痛，追求苦痛的来源，则推翻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压迫，实是刻不容缓的事。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大资本家、小中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机关职员等，无一不受外国资本和军阀的双重压迫，大家起来建立“国民的联合战线”，推翻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这应该是人人所赞成的。解放中国也只有这条道路。

现时国民运动中的右倾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及附属于此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与帝国主义爪牙纯粹的买办阶级稍有不同，他们虽然也赞成“国民的联合战线”，可是他们以为大家既然要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军阀，工人农民便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即放弃阶级争斗，以免破坏“国民的联合战线”。其实这种见解非常之错。

第一、他们不明白工人群众组织工会以罢工争求自己生活改善，目前这种最低限度的阶级争斗，不但毫没有减少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战斗力，并且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战斗力，当随工人的阶级争斗的战斗力而增加；因为工人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已实际表现出来，他们主张工人放弃阶级争斗，便不啻主张削弱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战斗中的主要军力。第二、他们又不明白中国资产阶级只有参加国民的联合战线，推翻帝国主义及军阀，才有出路，抑制工人的阶级争斗，不是他们的出路。第三、他们更不明白革命的工人阶级，是不肯妥协的，是要为全民族利益奋斗，参加“国民的联合战线”到底的，香港工人牺牲职业，艰难困苦的支持一年余的罢工，便是一例；不象资产阶级只顾狭隘的自己阶级利益，他们只要于自己利益有损，便马上主张停止民族运动，如五卅运动中工部局一停止电力供给，中国厂家即时主张停止罢工，便是一例；他们只要敌人对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有点让步，便马上抛弃全民族利益的争斗而与敌人妥协，如帝国主义者对中国民族运动给资产阶级一点小小让步（关税会议、汉口上海租界增加华董、部分的交还上海会审公堂），一部分资产阶级便急急和帝国主义者妥协；修改工商学联合会的要求条

件，解决日厂英厂罢工，嗾使军阀封闭上海总工会，破坏五卅运动的联合战线，高唱“中外合作”、“中日亲善”，这也是一例；主张抑制工人阶级争斗的他们，这样只顾狭隘的自己阶级利益，这样不顾民族的利益，这样为自己阶级利益而出卖民族利益，试问他们能比卖国卖民的买办阶级高明多少？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罪人，军阀及买办阶级之次，就要算到这班一面反对阶级争斗一面向帝国主义妥协的资产阶级右派了。谁要“国民的联合战线”，谁便应当脱离这班破坏联合战线而妥协卖国的右派！现在的根本问题，正是资产阶级的右派是否因妥协卖国脱离“国民的联合战线”，——而不是工人农民的阶级争斗破坏联合战线。

农民反对军阀土豪大地主的争斗，也同样能够增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因为这样，中国大多数人民才能脱离少数特权阶级的压制束缚，自由团结起来，去和帝国主义者奋斗。广东农民以反抗地主土豪的力量，助国民政府讨平英国走狗陈炯明，便是一例。

谁说工人农民的团结和争自身的利益便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便是他们自己不要“国民的联合战线”，不要最不妥协的工人农民参加“国民的联合战线”。

我们的党认“国民的联合战线”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最紧要的职任，并不因阶级争斗而有所摇动。我们要揭开妥协卖国的右派借口“反阶级争斗”、“反赤”等口号，邦助帝国主义者离散中国民众之黑幕，我们更加要坚决的主张建立“国民的联合战线”。

在过去的经验，五卅运动的联合战线，即以上海总商会只顾自己阶级利益之故首先退却，加以英日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拿“过激”、“赤化”这类口号离散民众而失败了。这一联合战线失败，英日帝国主义者乃指挥奉系军阀，封禁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及总工会，压迫总罢工，摧残由奉天到上海的一切民众运动；五卅运动的高潮，遂至低落下去。

英日帝国主义者，不但离散了中国民众的联合战线，还进而团结了奉直两系军阀成一反赤的联合战线，向接近民众的国民军进攻，号为反赤战争。此次反赤战争的意义：是英日等帝国主义者以联合的力量，一面根本断绝中国民众运动得到武力援助的机会；一面强迫奉直两系军阀结合起来，以巩固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之地位。因为自从五卅运动爆发于上海、香港以及全中国，又加以北方国民军之发展，郭松龄之倒戈反奉，那时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之地位，实有些根本动摇。

反赤军在奉天在天津在大沽在北京在河南都由英日有力的援助，在北方得了胜利，杀人、纵火、奸淫、抢劫、勒捐、强用军票、搜查学校、封闭报馆、枪杀记者、严禁工会农会等反赤政纲，已遍行于北京及直鲁豫诸省，将来或更推行于南方。反赤军入北京后，其内部英日间吴张间都发生了利害冲突，冲突的焦点乃是内阁问题：一方面是英吴，一方面是日张，都想组织己派势力占优势的内阁，并想有一个在己派势力支配之下的国会以控制北方政局；因此相持不下，而一时又不易决裂，因为他们尚有一利害共同目的未曾达到：英日之共同目的是讨灭南北二赤（国民政府与国民军），吴张之共同目的是攫得关税二五增收及大借款，在这等共同目的之下，他们不得不暂时勉强合作。在他们合作之下的北京政府，无论是那一派稍占优势，无论是颜内阁、杜内阁、孙内阁，或陆内阁，他的大政方针，终不能抹杀现行的反赤政纲，并且还要加一条更重要的反赤政纲——卖国借款。帝国主义者始终需要这样的一个中国“中央政府”来替他们宰制中国人民，拥护他们在中国之特权与权利。

人民若不承认军阀的反赤政纲和这样的政府，把应该自己马上团结起来，恢复五卅运动的联合战线，并扩大这一联合战线到全国各城市各乡村，充实这一战线到一切民众中，自动的召集全国农民、工人、商人（实业家包含在内）、机关职员、教员、学生、新闻记者、兵士等民众的国民会议，发表人民自己的政纲，更进而推翻军阀政权，建立人民自己的政府。

民国11年奉直第一次战争后，本党第一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即已指出军阀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又指出“恢复国会以维法统”、“联省自治”、“依赖吴佩孚”这些办法都不能解决时局，尤其特别指出吴佩孚得势，“更要因此酿成和袁世凯成功后段祺瑞成功后同样更难解决的时局。”同时我们的提议是：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即改正协定关税制等十一条）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并说明“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人民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

民国12年黎元洪出走的北京政变时，本党第二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又指出“逐黎不过是历来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患，造成中国危局之一个必然的结果，而非时局危机之因，北洋军阀旧势力统治中国、抑制民权、勾结列强、断送利权，此乃是中国危机四伏之根本恶因，此恶因一日不除，其危机连续起伏之恶果将一日不止。”又指出“拥护黎元洪”、“拥护段祺瑞”、“国会南迁及制宪”、“团结西南联省自治”、“借助列强”这些办法都不能解决时局；同时我们的提议是：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来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

民国13年9月第二次奉直战争开始时，本党第三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指明“此次战争直接是直系与反直系的战争，间接是英美与日法帝国主义的战争。”主张：“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权利与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定期的惨杀与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久真正的和平。”

民国13年11月冯玉祥倒戈直系溃败后，本党第四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只有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并希望国民党努力使他们所主张的国民会议予备会急速在北京召集；我们更主张各阶级的民众及与各派帝国主义者尚无确定关系之武力，拥护此予备会，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为临时国民政府。

现在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因为国民会议及国民会议的运动无论在全国或在一地方都是民众联合战线之具体的表现；因为不但现在的国会已因贿选而死，即另行选举一新国会，也只能代表军阀官僚而不能代表民众。吴张对于国会之争执，并不真是因为护宪问题，乃是各自争得北京政权，以便进行卖国大借款；吴佩孚要叫直系的贿选议员占住国会，张作霖则想叫自己的政客另组国会，以便借“人民代表机关”的名义，实行自己和帝国主义的大买卖。在理在势，今后都必须以人民团体亲自直接选派代表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军阀官僚包办选举的国会制度。

有许多人对于国民会议，还有三种怀疑：一是以为各地方各职业的人民团体尚未普遍的成立；二是以为各人民团体选派代表仍然与国会选举一样免不了军阀及政党之支配；三

是以为国民会议之议决，无力令军阀政府执行。

其实这三种怀疑都似是而非，我们所主张的国民会议及国民会议的运动，并不似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也不限于一般人所希望的那样速成；我们固然要努力使国民会议这一制度迅速实现，我们更要努力使国民会议这一运动尽量扩大；国民会议的运动就是国民革命时代"国民的联合战线"之具体的表现，也就是国民革命时代自始至终一切运动的骨干。这一运动必须在空间上有普遍的发展，由通都大市努力扩大到穷乡僻壤，由商人工人学生努力扩大到农民兵士机关职员等一切民众；必须在时间上有长期的争斗，由各地方公团联合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努力进行到全国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更努力进行到接收政权的国民会议，如此才算完成国民会议这一运动的意义。

不但国民会议运动可以促进各地人民团体之组织，即现时已有的团体至少已经可以实现发表政纲的第一次国民会议；于此可见对国民会议第一种怀疑之错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派代表到国民会议，选举者和被选者的关系始终不断，不象国会议员由官绅包造选民册，包办初选复选，选举者和被选者始终没有关系，因此至少可以减少军阀支配大部分的可能；至于受政党之支配，如果能如此，那便更好，现在国会议员选举的大病，正因为没有有力的民众政党支配，才受军阀支配；于此可见第二种怀疑之错误。

由人民团体自已召集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或者还可以在军阀政权时代实现，接受政权的国民会议决无在军阀政府之下实现的道理；于此又可见第三种怀疑之错误。

由现在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到将来接受政权的国民会议，必须经过相当时期的困苦争斗。在这种困苦争斗时间，广州国民政府固然是这一争斗之拥护者，即对于一切比较接近民众的武力如国民军等，也应当要求其拥护这一争斗。但人民仅仅希图由这些拥护而达到成功，便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至于希望军阀政府采纳民意召集真正民众的国民会议，并执行国民会议之议决，那更是做梦。只有参加国民会议运动之各阶级的民众，首先在各地方集中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手工业者等各团体的力量于各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一面进行自动的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之实现，一面各自在当地立刻起来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斗，由反抗苛税苛捐力争民权自由，一直到推翻当地的军阀政权，建立地方的人民政府；如此方能汇合全国民众的力量，由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进行到接受全国政权的国民会议，由此会议建立全国的人民政府，解除人民自己的痛苦。

在这些困苦争斗期间，各阶级的民众，必须有一共同政纲，为这一联合战线之共同争斗的目标；这共同政纲最低限度者亦须如下：

一、废除辛丑条约及其他不平等条约；

二、收回海关，改协定税制为国定税制，收回会审公堂，废除领事裁判权；

三、各国撤退驻华海陆军；

四、收回租界及租借地（如旅顺、大连湾、威海卫等）；

五、解除直奉两系军阀的武装，并没收其财产分给老弱不能继续服务的兵士及失业游民；

六、改善军士生活及提高兵士教育；

七、禁止军警拉夫封船扣车及强住民房学校；

八、禁止非军人犯罪交军法裁判；

九、禁止军用票、滥发纸币及勒派公债军饷；

十、仃止予征钱粮征收陋规及一切苛税杂捐；

十一、由国库省库拨款救济水旱灾及抑平米价；

十二、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关于罢工刑律第二百二十四条，保护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

十三、废止督理督办制，实行省长民选县长民选，实行由省到乡村的地方自治平民政权，肃清贪官污吏；

十四、颁布工会法，修改现时便于买办劣绅操纵的农会法、商会法；

十五、制定工人最低工资及农民最高税租额之法律；

十六、承认农民有自卫之武装；

十七、禁止勒种鸦片；

十八、限制重利盘剥及免除欠租；

十九、颁布工厂条例，禁止中外厂主及职员虐待工人，并改良工厂有害卫生的设备，特别保护童工及女工；

二十、承认商业职工（店员）得有在商会之外的独立组织，并确定其最低工资；

二十一、确定中央及地方政府所属各学校经费，并免除学费；

二十二、确定并增加国家行政教育各机关下级职员的薪水，并承认其组织；

二十三、承认妇女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及一切法律上和男子同等的权利。

这一个政纲恰恰和张作霖张宗昌李景林吴佩孚王怀庆等此时在北京及直鲁豫各省所行的反赤政纲相反，他们或者要说这一个政纲是赤色的，可是这一个二十三条赤色政纲，确是各阶级民众目前最急迫需要的东西。此时勾结为患的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势力，还是很强大，除了全国各阶级民众联合战线的力量，不断的给他们以痛击巨创，使他们溃败，他们决不会因人民的要求而让步，给人民所需要的这些东西。

各阶级的民众联合战线，必须有一共同政纲才能成立；尤其要参加这一联合战线之各阶级的民众，都忠实于这共同政纲，为共同政纲而共同争斗，不只顾自己阶级的利益而牺牲共同政纲，而消极退却，如上海总商会在五卅运动中的态度，然后这一联合战线才能巩固持久，才能奋斗到底，才不至中敌人始而离间终而各个击破之计而获得最后胜利。

各阶级革命的民众呵！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所加于我们的痛苦，已经使我们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我们有没有推翻他们的力量呢？确是有了，所差的只是“国民的自信力”。此外涣散与孤立，也是我们的力量表现之障碍。现在据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报告，全国已有一百二十二万有组织的工人，有组织的农民也有八十多万；这二百万有组织的工农群众，乃是国民的联合战线中最耐苦战的基本军队。至于商人学生早已有了全国的及各地方的组织，他们大部分迫切的需要革命，而且已经有组织的参加革命运动。兵士是有组织的，只要我们能努力将他们从帝国主义及军阀手中抢夺过来，也是一种革命的力量。我们现在仍旧是涣散的吗？不是的。所需要的只是这些有组织的民众总团结起来的“国民的联合战线”。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也不是的。去年五卅运动，因为有了英、俄、法、德、美、捷克斯拉夫及日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之同情与援助，帝国主义者遂不敢把我们当做义和团看待，并不得不给点小小让步，如关税会议、司法调查、租界增加华董

等。五卅以来各国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如里夫及叙利亚之对法战争，如埃及之排英运动，如阿拉伯以政治的罢工表同情于叙利亚，如土耳其联结苏俄反抗英国侵夺其莫塞尔，以及最近朝鲜对日之大示威，这些运动都足以使帝国主义者手忙脚乱，阻碍其对于中国的进攻。至如苏俄援助一切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和英国工人之革命化及最近大罢工，更是促成世界革命之显著的进步，而为国际帝国主义者无法救治的隐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已成为世界革命的联合战线之一员，我们已经不是孤立的了！

各阶级革命的民众呵！我们已经不是涣散的了，也不是孤立的了，其速奋起毋馁！其速发挥“国民的自信力”，巩固“国民的联合战线”，以此推翻国内军阀，推翻世界帝国主义，如此中国民族才有出路呵！

中国共产党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

（原载《向导》163期，1926年7月14日出版）

# 中国国民党出师宣言

（十五年七月十四日）

中国人民之困苦至今日而极矣。以言农人，则血汗所获，尽供兵匪之掠夺，预征特捐，有加无已，终年辛苦，不得一饱，鬻田卖牛，浸成失业。此犹侥幸者也。至如直鲁豫京兆等省区之农民，则兵匪所过，村里为墟；老弱死于沟壑，壮年多被俘虏；男为牛马，女被奸淫；其或能逃出虎口，幸保余生，亦不过皇皇如丧家之狗，不操下贱之业，即作他乡之鬼而已。以言工人，则终日劳作所获，仅能苟延性命，既无余资，又鲜保障，平时日日有失工之虞，灾患一至，不免沦于流氓之列；此时，欲商无资，欲耕无地，不降为苦力以逐渐消耗其生命，则直成饿莩而已矣。以言商民，则外被洋商售卖洋货贩运土货之压迫，内受大小军阀土匪苛捐重税及明抢暗索之剥削，鲜能获什一之利，而频蒙亏本之灾；驯至小资生意，不堪损失，倾家荡产，比比皆是。以言智识界，则教者恒以薪金久欠，徒忧啜而不能传其智能；学者每以匪患兵灾，断绝资斧而无以进其学业；加以百业凋敝，虽属聪明才智之士，难免旁皇失业之忧；至于直鲁豫各省，年年烽火，学校关闭，小学教员，沦为苦力，青年学生，多成饿莩，更无论矣。其他如各省军阀部下之军人，则多数本系农人工人为求生计而投军者，然而投军之后，不但生计仍无所托，且为野心军阀，驱而置诸死地；大好热血，不用靖国难，救人民，乃徒以受军阀豢养之故，反用以屠杀人民，为军阀争功名求富贵，世间惨事，孰有过于此耶！至于经营工业之企业家，在从前固为社会上之富裕者，然至今日，则销场不佳，利益全无，工厂停闭，成本呆滞，即或勉强开工营业，而困于苛税勒捐，无法支持，则不投降于军阀，即乞怜于洋商，不但事业已非我有，资本且丧失大半矣。

总而言之，居今日之中国，除少数军阀官僚买办财阀之外，全国人民，入则有老弱待哺之忧，出则无立业谋生之地，行则逢掳身丧命之变，居则罹举家冻馁之祸，灾害深于水火，困苦甚于倒悬。凡此，皆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卖国军阀之窃权之所致也。帝国主义在经济上之侵略，其剥削之巨，岁辄万万，数十年来，未尝或息。迄今中国人民之膏血已尽，仅存皮骨，彼为债主，我为债户；彼不劳而坐获，我终日充牛马；彼为经济的主人而操命令指挥之全权，我为经济的奴隶而居被驱使之地位。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剥削中国之不足，更在政治上利用万恶之卖国军阀，造成笔难尽述之罪恶；帝国主义者既使军阀窃取政权，又使军阀盗卖国家；既使军阀永演阋墙之争，令吾民受尽兵刀之苦，更嗾使军阀压迫革命运动，欲吾民永无自决之日；既使军阀式的政治发生土匪，更使土匪变成军阀。军阀生生不已，人民困苦无穷；以军阀为刀俎，以吾民为鱼肉。如此，则无怪乎中国农民不能安于乡，工人不能安于市，商民不能安于行旅，智识家不能安于校舍，军阀下之军人恒辗转惨死于连年之内战，甚至经营工业之企业家，亦惴惴不能一日安其生也。

帝国主义侵略之程度日益加深，军阀之暴虐日益加甚，则中国全国人民之困苦，自为日益加重。近者北方军阀混战经年，北京政府，已不存在，我中国中部及北部人民，不但无好政府，而且亦无恶政府；不但无从减少既有之痛苦，亦且无法减轻新痛苦增加之速度。从此以往，指顾之间，不难使数千里土地变为荒墟，数万万人民，化为虫沙，岂但政治的及经济的奴隶而已。本党丁此时机，熟察前因后果，深知中国人民困苦之根本原因，在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卖国军阀；深知目前中国之唯一需要在建设统一政府。统一政府成立，则外足以抵抗帝国主义之恫吓压迫，内足以断绝军阀之祸国殃民；统一政府不成立，则外祸益烈，内乱益甚，中国人民之困苦，亦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中国人民，将无噍类矣。

本党从来主张用和平方法，建设统一政府，盖一则中华民国之政府应由中华人民自起而建设，一则以凋敝之民生不堪再经内乱之祸。故 总理北上之时，即谆谆以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号召全国。孰知段贼于国民会议阳诺而阴拒，而帝国主义者，复煽动军阀益肆凶焰。迄于今日，召集国民会议以谋和平统一之主张，未能实现，而且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帝国主义者之助，死灰复燃，竟欲效袁贼世凯之故智，大举外债，用以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帝国主义者复饵以关税增收之利益，与以金钱军械之接济，直接邦助吴贼，压迫中国国民革命，间接即所以谋永久掌握中国关税之权，而使中国经济生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吴贼又见国民革命之势力日益扩张，卖国借款之狡计势难得逞，乃一面更倾其全力攻击国民革命根据之地。既勾结匪徒，扰乱广东，又纠集党羽侵入湘省。本党至此，忍无可忍，乃不能不出于出师之一途矣。

本党敢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曰：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故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之势力不被推翻，则不但统一政府之建设永无希望，而中华民国唯一希望所系之革命根据地，且有被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联合进攻之虞。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本党惟知遵守总理所昭示之方略，尽本党应尽之天职；宗旨一定，死生以之。愿全国民众平日同情于本党之主义及政纲者，更移其平日同情之心，进而同情于本党之出师，赞助本党之出师，参加本党之作战，则军阀势力之推倒，将愈加迅速，统一政府之建设，将愈有保障，而国民革命之成功，亦愈将不远矣。

统一政府建设万岁！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中国人民自由解放万岁！

中国国民革命军万岁！

# 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全国的工友们！农民们！各界的同胞们！

广东国民政府已经出师北伐了。我们对于国民政府这次北伐，不要〈看〉作是普通的国内战争，成败与我们人民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也不要坐了等着国民革命军的到来，代我们人民解除一切的痛苦，忘记了自己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责任。

年来中国的纷乱，人民所感受战争、贫困、贪官、土匪、苛税、杀戮、蹂躏等一切的痛苦，都是由帝国主义勾结军阀侵略中国的结果。中国的人民如果要求得自己的生存，解除自己的痛苦，只有团结起来，参加国民革命，把军阀和帝国主义打倒之后，建设人民的统一的政府，才能达到目的。中国自国民军退出北京，英、日帝国主义的走狗吴、张在北京会面之后，早已决定了讨灭中国革命势力的计划，即分讨其所谓南北二赤。因为发展他们势力的方向分开，和缓他们之间的冲突，如是一方面攻打北方国民军进兵南口，一方面进兵湖南援助叶开鑫攻打唐生智，更进而联络邓如琢、周荫人、唐继尧等围打广东。同时勾结香港帝国主义者得着二千万元的大借款，并唆使陈炯明、林虎、魏邦平等反革命派，勾结土匪、贪官、劣绅、买办扰乱广东。全国的民众与广东国民政府，对于这个严重的局面，当然不能忽视，所以这次国民政府北伐，是不等敌人谋我的计划成熟出师攻打敌人。

广东是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广东的失败，中国革命要受极大的损失，就是中国民众的痛苦，还要延长；反之，广东国民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势力要得到很大的发展，要促短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的寿命，就是中国民众的痛苦，能得顺利的解除。所以这次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和失败，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与中国民众痛苦的解除有极大的关系。所以中国民众应该认识国民政府这次北伐的意义，一方面是防御帝国主义、军阀侵占中国革命根据地广东的防御战争，同时又是发展国民革命势力很重要的军事行动；他的成功和失败，与我们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的民众，应该即刻下定自己的决心，极力的赞助国民革命军，作国民革命军的后盾，使之得到胜利。

中国反赤军的首领张、吴两大军阀，他们在过去有很多的事实残杀压迫中国的人民："二七"京汉铁路的大惨杀，封闭全国的工会；京口抉堤淹死人民数万；"五卅"运动中惨杀南京、天津、青岛、唐山、九江、汉口、安源的民众，封闭上海总工会及全国各地工会与民众团体，都是张、吴两军阀干的。吴佩孚最近又在河南杞县洗村惨杀农民，死者至八百余人，死儿童二百余人。自反赤军队统治北方后，所有的工会都被封闭占驻了，很多的工人领袖都被惨杀，监押、开除或者逃亡失业了。"二七"、"五卅"各役死伤烈士的家属不能得到丝毫救济，工人一切的自由均被剥夺，以前奋斗所得来的胜利条件概被取消，而且增加了无限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反赤军队到处强迫使用没收人民财产的军用票，

予征钱粮，举行各种苛税杂捐，以增加人民负担，剥削人民，到处奸淫掳抢，蹂躏一切人民，强迫拉夫，占驻民房学校，妨害一切人民生活。种种残酷压迫人民的事实，罄竹难书。北方民众处在反赤军的统治之下，痛苦万状，气息尚存。所谓“反赤”即为反民众利益。他们若消灭了国民军，打进了广东，广东的人民在国民政府下所得到的自由，马上就要全被剥夺，一切的工会及民众的团体，马上要被封闭及占驻，工会职员及民众领袖，马上就要被杀戮、监禁、通缉和开除。反赤军在北方蹂躏人民及给与人民一切的痛苦，更要加倍的在广东实行（因为广东是革命根据地，为反赤军所最痛恨的地方）。同时北方人民现时所受到的痛苦，将更沦于万劫不复的地位，一切的奋斗和运动，将要被更残酷毒辣摧残。还有现在的省港罢工是支持“五卅”运动的唯一希望，反赤军若是侵入了广东，当以在北方惨杀工人的毒手，加倍的惨杀省港罢工工人，无条件恢复对英一切的关系，使全国的“五卅”运动完全消灭。因此广东的民众应一致努力援助国民革命军北伐，以防御帝国主义者反赤军的势力侵入广东，蹂躏各界民众。北方的民众尤应联合一致，集中各界民众的力量赞助国民革命军，努力奋斗，扰乱反赤军后防，使国民革命军得到胜利，拥护中国革命根据地广东，发展中国的革命势力，进行自己的解放运动。

同时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地，应该拥护人民一切的利益，赞助人民和各种的自由，并应邦助工农阶级的组织，扶助一切民众运动的发展。因为必须如此，才得到全国民众的邦助，才能发展中国的革命势力，巩固及扩大国民革命的基础，北伐才更有意义。若只为求得军事上的便利，不惜限制民众的自由，牺牲民众的利益，禁止民众争取自由和利益的运动，那北伐所得结果，恐仍不能达到予定的期望。国民革命军应宁为拥护民众利益和自由而败，不肯牺牲民众的利益自由而胜，因为这是国民政府北伐与一切国内战争不同之点，也是全国民众赞助国民革命军北伐所期望之点。国民革命军若牺牲了这一点，全国民众很难看清这次北伐与普通国内战争的分别，这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所以国民革命军要得到民众对于北伐的赞助，要巩固国民革命的基础，在北伐的时期尤其应该拥护人民一切的利益与自由，不能借口于北伐军事行动的便利，来牺牲民众的利益，禁止民众的自由，授反革命派以挑拨和煽动的机会。

全国各界的同胞们！国民革命是要全国民众自己实际来干的。现在是我们民众实际参加革命最紧急重要的时期，“坐待好音”，等国民革命军到来解除自己的痛苦，只是消极的赞助，无补于中国的革命，空想的失望，过去历史有很多事实足以警告我们，必得全国民众一致努力，实际参加，才能由这次北伐胜利，发展中国的革命势力，进而建筑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打倒军阀，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独立，解除全国人民的痛苦。全国各界的同胞们！时机已到，其速起参加国民革命的工作吧！

全国的工友们！国民革命军所胜利的地方，我们所有被反赤军封闭的工会，应该要求启封；坐在监牢间的领袖，应该得到释放；被通辑开除失业的工友，应该要求恢复工作；以前罢工胜利的条件，应该要求履行；被惨杀死伤的工友，应该要求抚恤和救济；太低的经济生活和恶劣的待迂，应该要求改良。同时我们在政治上应该要求颁布保护劳工的劳动法，发展工人运动的工会条例，召集以人数为比例选派代表的国民会议。工人应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绝对自由，我们为得要求这些利益与自由赶快的实现，我们应该努力参加国民革命，站在一切民众之前，引导一切民众援助国民革命军，使之得到胜利。

全国各界的革命势力集合起来！援助国民革命军北伐！
拥护中国革命根据地广东！发展中国的革命势力！
打倒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民众利益万岁！

（转自《中华工会历史文献》（1））

# 论国民政府之北伐

（一九二六年七月七日）

独　　秀

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在此时北伐声中，我们若不懂得这个意义，便会发生许多错误的观念及行动。

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是各阶级革命的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以自求解放：全民族经济解放，尤其是解除一般农工平民迫切的困苦。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还说不上是和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冲突。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方法，然亦仅仅是一种重要方法，而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在军阀统治之下的民众，若误认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人民之唯一无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自己不努力进行革命工作，这便是大错。这便和前代人民仰望吊民伐罪的王师是一样，完全失了近代革命的意义。再论到北伐军之本身，必须他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

现在广州国民政府之北伐是怎样呢？在第一点，他自然还不是直接的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在第二点，广东以外的各省人民，确有坐待北伐军到来之幻想。在第三点，我们敢肯定的说，现在国民政府之北伐还不是由于革命力量澎涨而向外发展，乃是因为吴佩孚进攻湖南，国民政府不得不出兵援湖南以自卫。在第四点，国民政府之北伐战费，应该发行军事公债，向绅富筹募，如果因北伐而予征钱粮和抽收赌捐，向农工平民搜刮，不但当年中山先生不曾因北伐搜刮平民，即现时唐生智在湘南，军费并不比广东宽裕，他只发行殷实公债，而未向农民诛求，国民政府对农民政策总不应该比唐生智不如。国民二军之溃败，对农民政策之失策乃是最重要的原因；近来国民政府对农民的态度，已经使农民怀疑，若再因北伐战费而予征钱粮和抽收赌捐，若更进而剥夺广东革命的民众从护法政府以来所获得的些少自由，反而给予反革命的买办土豪贪官奸商以充分的自由，则我们在野党应该向政府严重劝告，必须北伐与民众利益双方兼顾，如此才能巩固国民政府。

在上述情形之下，所谓革命军事行动的北伐，现在尚未成问题；因为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状况上，在整个的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所属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

右派响应反赤。

帝国主义者早已定下了吴张分途讨灭南北二赤的计划，如此英吴日张分据南北，才能和缓他们当中的冲突；现在英吴对日张在北方既不能不大大让步，则吴佩孚南下进攻广东，无论对国民军作战胜败，都必得张作霖之援助而实行。吴佩孚一回汉口，必以全力取湖南，再由湖南进攻广西，届时动摇不定的小军阀如赣邓闽周，都必然决定态度，奉吴令一致向广东进攻；不但如此，还有香港帝国主义者封锁于外，陈林魏邦平旧部，勾结土匪土豪官僚买办，扰乱于内；如果竟至如此，国民政府能否支持下去，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神经过敏，这样危险的局势，实已迫在目前，丝毫不容我们忽视。

所以现时国民政府的职任，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广东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响应北伐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

将陷于四面围攻的国民政府，他的领袖们，应该和衷共济，尤其要尊重人民的自由与权利（革命军正为此和军阀战争，也就是革命军和军阀不同之一点）。使人民心悦诚服的和国民政府合作，以战胜此困难，使此困难不但不能复灭国民政府，转而能够锻炼国民政府领袖及其军队和一切民众的革命意志与战斗力，然后再汇合全国民众革命的势力，进而北伐，才能够以革命的北伐力量完成国民革命。

（原载《向导》161期，1926年7月7日出版）

# 我们的北伐观

（一九二六年九月八日）

述　之

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现在已由宣传酝酿而见诸实际行动了，并且北伐军在事实上已经攻下岳阳，逼取武汉，因此"北伐"在中国目前政局上已成了一个中心问题，已成了各社会阶级和各方面的实际势力注意之焦点。从帝国主义反动军阀资产阶级研究系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以至于工农群众，对于北伐不管赞成与反对，差不多都有相当的表示。可是"北伐"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北伐的真正意义在那里，直到现在大家还不大了解，多是模糊误会。帝国主义反动军阀研究系国家主义派……等，固然不用说对于北伐，是信口雌黄，任意诬蔑，就是北伐的本身（国民党，北伐军）和赞助北伐的民众也多误会，他们不是过于夸张，便是过于轻视。这种过于夸张或轻视的态度，对于北伐前途的进行上，即对北伐的实际策略和实际行动上，都不免要陷于主观，这是很危险的。现在"北伐"虽然是浩浩荡荡的前进，虽然给了参加北伐和赞成的人们以无限的希望，可是北伐的前途还是很艰难的。北伐真正意义在那里，北伐前途究有多少希望，还是很值得我们详细研究的。

我们为了要答复一切反动派对于北伐的诬蔑，要解释一般民众对于北伐的误会，总之，要使北伐更顺利地进行，使北伐将来能得到更大限度的效果，那我们每个诚实的革命者，我们每个忠实地参加北伐和拥护北伐的人，对于北伐的真正意义，这回北伐在中国目前民族解放运动上的意义，都有更明确地来认识，更深切地来了解之必要，只有明确认识与深切了解之后，才可以免除我们主观上过分的夸张和轻视，那时我们的实际策略和行动才可以减少错误，才可以顺利进行。

## 北伐之历史根源

我们要了解此次北伐的真正意义，须首先明白它的历史根源。北伐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东西，有它的经济的政治的背影，这种经济和政治的背影，又为长远的历史所形成。

大家都知道，"北伐"这个口号不是什么新的花样，在近几十年的中国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好几次，太平天国之"北伐"，姑且不提，单就辛亥革命以来，便已经有了三次：（一）辛亥革命军的北伐；（二）民六南方护宪政府之北伐；（三）民国十三年江浙战争时孙中山先生之声言北伐（彼时在北伐的本身力量上虽然有点滑稽，但中山先生确曾发表过北伐宣言，并进兵韶关），此外如民四西南讨袁称帝之役，虽然没有北伐的口号，也可

以说带有北伐的性质。自然这几次的北伐都带有夸张的性质，不是“北伐”本身的力量到了真能讨伐敌人的程度，而多是因受敌人的压迫而起的一种防御战争（如护宪如讨袁，实际上只算是防御南伐）。不过这些次的北伐，在其性质上有一个共同的点，便是反抗或企图消灭北方的封建势力，即北伐的对象是北方的封建阶级——满洲政府及其后身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等，而北伐本身则皆为代表南方革命势力的军事力量（不管当时那些北伐的本身如何复杂，投机，有多少缺点，如护法军讨袁军等，但在当时客观上始终是代表南方革命势力反抗北方封建势力的一种军事力量）。总之，历次北伐，在其质上都带有一种南方革命势力企图向北发展，铲除北方封建势力或抵抗北方封建势力南侵的倾向——即中国革命势力的发展由南而北的倾向。但是这种倾向的原因何在呢？这里便到了经济的和政治的问题了。

原来中国近数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是由南而北，由海滨而陆地。在古代的中国经济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并且其发展的趋势是由北而南（指唐宋以前），因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完全建筑在自给的农村经济上。迄到西方帝国主义将它们的商品强行输入以后，长江和珠江流域的商业发展便一日千里，逐渐形成了初期的商业资本主义，并且还有少数近代的产业发生，使当时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而流于破产。在这种情形之下，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如华侨，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兵匪，以及少数工人，便成了革命种子了。而在北方如山西、陕西、河南等地直到现在大部分还是伫滞在纯粹的封建的农业经济状况之下，虽然沿海沿铁路的地方如山东、直隶、奉天商业亦颇发展，并且有不少的近代产业，可是比起长江和珠江流域来还是要幼稚得多，尤其在整个的经济制度上，无论如何，北方比南方要落后一步。

在政治上中国历代封建势力的根据地又都在北方（自满洲政府至现时之北洋军阀都在北方），也就正因为北方经济比较落后，而宜于此种封建势力之生存和发展。同时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为要在中国实现其经济侵略之目的，维持其特殊地位，便不能不利用中国旧统治阶级的势力，因此便必须维持北方此种封建势力——满洲政府直至现时之张吴，以为它们侵略之工具。因此，在政治方面，北方也较南方落后，南方的民众比较在北方要自由。

由以上经济和政治的原因，中国革命势力自然地容易产生于南方，并且容易发展，而在另一方面北方的封建势力，因落后的经济与帝国主义之维系，能延长其命运。因而形成近数十年来南方革命势力与北方封建势力互斗之形势。我们来看一看实际的情形。太平天国的革命势力不用说完全发生于两广，便是辛亥革命之先锋军的同盟会一班领袖差不多都是南产（尤以广东、湖南、江浙居多，如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廖仲凯、朱执信、黄兴、宋教仁、陈英士……等），至于参加辛亥革命之群众不用说是南方商业资产阶级的华侨会匪新军和新智识阶级等分子了。而在封建的势力恰好相反。满洲政府的皇族不待说，封建军阀如皖如直如奉无一不是北方的产品，所有军阀的领袖自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以至孙传芳，没有一个不是产生于北方，至他们的群众更无须说是北方之已破产和将破产农民群众了。自然南方也出了不少军阀，如唐继尧、赵恒惕、陈炯明、陆荣廷等，可是这些小军阀差不多曾经都多少参加过革命，他们都是从革命的队伍里反叛出来的，而他们的反叛又多因北方军阀之威胁和利诱，并且这些军阀虽然反动，

但表面上还时常要带什么联省自治一类假面具，借以欺骗民众，这也就证明它们与北方军阀不同之处。至于革命的势力自然在北方也有相当的发展，也曾经出过许多革命党人，尤其近来北方的铁路工人，唐山的矿工，河南、直隶的农民以及许多青年学生，都已经渐渐成为北方伟大的革命势力，不过这些都是最近发展起来的（在五四运动后），还没有成为一种坚强的有组织的群众力量，不能直接给北方封建军阀以致命的打击。

在南北根本上既然形成两种相反的政治势力，因而自然形成历年来的政治斗争。自辛亥以来北方的封建势力和南方的革命势力差不多在两相对峙的状态之下，不是南方革命势力企图讨伐北方封建势力，——所谓“北伐”，便是北方反动军阀势力征讨南方——可以谓之“南伐”，或利用南方革命叛徒捣乱，使自相残杀。民国十五年来的历史，除了北洋军阀因帝国主义的嗾使自相争斗以外，便是此种南北相反的政治势力互相斗争的历史。如果北方的封建军阀不消灭，或者北方的民众革命势力不形成起来，此种南北斗争的历史是要延长下去的。

由上面说来，我们可以知道，所谓“北伐”是有政治经济的背影，有历史的根源，有相当的革命意义。

至于说到这次国民政府的北伐，除了以上所说的历史根源外，其直接原因是由于吴佩孚的“南伐”，即吴佩孚侵占长沙，企图进攻广东。而吴佩孚的南伐又是五卅运动的结果。由反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而引起反对奉系军阀的战争，由反奉战争而引起奉吴联合的反国战争，以至于吴佩孚企图进攻广东侵入湖南的战争。总之，由中国民众和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之反帝国主义运动反奉战争而引起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反动军阀之反攻，即所谓“反赤”或“讨赤”。“反赤”是反国民革命，是现时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及一切反动势力之反对国民革命运动的总口头。因此，这次的北伐是反赤的直接影响，是反赤运动逼迫出来的。国民政府的北伐虽然早就在准备，但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反赤工具吴佩孚之压迫，还没有如此之快，故这次北伐是防御“反赤”的进攻，含有制止“反赤”的性质，含有继续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性质。但是现在北伐的发展已由防御而转为进攻的形势了。

## 前此北伐失败之原因

我们已经知道北伐在历史上不是一次，前此的北伐都是失败了的，但是失败的原因在那里呢？这是值得我们追究的。我们知道，北伐是一种革命的表现，但是革命是有一定的步骤的，革命的进行必按照革命步骤才有胜利之可能。第一步是宣传，宣传群众使其了解自身的痛苦和痛苦的来源以及解除痛苦的必要和方法；换言之，即须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地位和真正的敌人，了解革命的必要及怎样革命的方法。第二步是组织，革命是一种夺取政权的死活斗争，如果革命群众没有坚强的组织，只是乌合之众，那绝对不会成功。所以革命的第二个步骤必须将各种革命群众组织成为一种战斗的力量，并且还须有一个坚强的政党作一切群众组织的重心，担负最高的指挥责任。第三步则为武装暴动或军事行动，即武装群众，以群众的武装解除压迫阶级的武装，夺取政权，以建设群众所需要之新的政治和经济的社会。自然宣传与组织绝不是死板板地划分某一期只作宣传某一期专作组织，而是要同时并进的，即是武装暴动也是时常要准备的，可是这三个步骤，如果有一不备，革

命是很难成功的，革命没有军事行动固不能成功，但只有军事行动而无群众的宣传与组织，那也没有成功之可能，即或偶然军事胜利，结果只能算是几个军人的胜利，至多不过能成功一时的军事独裁，绝不能成功群众的革命。总之，凡是革命的军事行动，必须群众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到了一定程度，军事力量要由群众内部发展出来的，即是革命的武装须建筑在群众的基础上，而绝不是象军阀或资产阶级的雇佣军队，如此，才有成功群众革命之可能。可是自辛亥以来的革命，便只有军事行动而无群众的宣传与组织（自然也没有坚强的政党作领导），尤其对于北方民众差不多简直没有顾及，历次北伐便是单纯的军事行动之表现，这种单纯的军事行动便是历次北伐失败之根本原因，也就是中国近年来革命失败之根本原因。

自中山先生创办兴中会到辛亥革命之前夕，中间所有的革命准备工作差不多都集中在军事行动一点，如运动会匪和新军等，很少注意到当时群众的宣传和组织，如农民手工业者国内商人都是当时真正的广大的革命群众，可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很少注意到此，很少在这些群众作宣传与组织的工作，因此革命党自身的组织自然也不能扩大和强固（中山诚然是个伟大的革命者，革命的伟大领袖，但只专注意军事行动而忽略群众的宣传与组织，这不能不说是中山先生革命多次失败之重要原因）。因此辛亥虽然爆发了，但结果只凭一些新军和会匪形成的军事势力，去打当时几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阶级，民众尤其北方的民众又没有积极参加和拥护革命，所以辛亥革命就成了流产。南方虽然有几省的督军是革命党人，但不久那些督军因为没有民众的监督，都一个一个地不是脱离革命投降敌人，便是无形堕落而为新式军阀了。到了讨袁护宪等役，那更无容说，只是简单的军事行动。辛亥前虽然缺乏群众的宣传与组织，但始终还有民报民呼报……等一类的宣传机关和会匪华侨同盟会等一类的组织，但到辛亥以后连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所以讨袁护宪等的北伐其实不过南方几个革命军人和投机的新式军阀与北洋军阀的混战而已，离真正革命的军事行动真是一万八千里。所以在当时的民众看来自然以为与他们没有关系，如此焉有不败之理？自然以前北伐的失败在客观上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但是这个只单纯地作军事行动是一切失败原因之最主要原因。这一次的北伐，当然比以前大大的进步了，因为中国近两年来，尤其自五卅运动后，一般民众的革命认识与要求，都有猛烈的发展，在组织上也有巨大的进步，尤其是工人和一部分农民群众，他们不但了解他们的痛苦和痛苦的来源，了解革命的必要，并且还相当了解革命的方略，有了伟大的组织（如上海、广东工人和粤湘农民）。我们看这次北伐军入湖南以后，所到之处，都有广大的群众为之作种种关于军事上政治上的有利工作，各地的群众也很多是邦助北伐军之行动，反对北洋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等，便可知这次北伐军的环境与以前大不同了。然而由此我们便可以说此次北伐是群众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已到了一定的程度，北伐军已经是群众武装，北伐已经是革命群众的军事行动么？我们革命者不应欺骗自己，此次北伐虽然比以前进步了很多，可是还不能说是革命群众的军事行动，只能说是接近革命民众或为革命民众所赞成的军事行动，这是我们可以从北伐军的来源和内部的复杂可以看得出来的。北伐军大部分是由小军阀的军队投诚改名或改编的，如唐生智、彭汉章、王天培等，这些军队及其军事领袖投诚国民政府固然于革命有重大的影响，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他们昨天确还是军阀的军队，还是小军阀，他们跑到革命的门里来还没有几个钟头，不用说他们不是革命群众自己的武装，并且他们对于革

命群众还有多少的怀疑与忧虑，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革命的党——国民党比以前固然进步了不少，已能指挥相当的群众，但是党的力量还很薄弱，还说不上能指挥一切的政治和军事，实际上还是几个军事领袖的作用，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至于群众虽然有了相当的组织，对革命有相当的认识，但在全中国全部的观点上看，有组织的群众还只是很少一部分，占全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三万万余农民，有组织的不过是几百分之一而已。所以群众的力量还很幼稚。所有这些弱点都是此次北伐军身上无可讳言的。

## 各方面对北伐之认识

北伐究竟是什么？此次北伐的真意义在那里？我们现在应该简单来答复这个问题。我们根据上面的说明，这次“北伐”是：（一）代表南方革命势力向北方发展；（二）防御吴佩孚南伐，由防吴南伐而转为讨吴北伐。由第一点此次北伐仍然含有南方革命势力企图消灭北方封建势力的意义，含有继续辛亥革命工作的意义；由第二点则含有继续五卅运动的意义，含有抵御“反赤”派进攻的意义。但是同时北伐的本身还不是一种真正由革命民众内部发展起来的武装势力，它不过是一种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因此，这次北伐虽然是代表南方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虽然代表南方的革命民众讨阀反赤的吴佩孚，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上在防御反赤的运动上有极伟大的意义，但还不能说是真正民众的革命势力已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一种民众革命的军事行动，是推翻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指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之特殊势力）的国民革命之最后阶段，而只是“南方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独秀同志“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只是代表五卅以来南方的革命势力抵御北方“反赤”派进攻的一种军事行动。

现时各方面对于北伐的认识有几种错误倾向：（一）以为北伐是国民革命的全部工作，仿佛北伐军是真正民众势力已发展到一定程度之一种武装力量，换言之，北伐军是民众的武装，北伐是国民革命的全部工作。这种见解忘记了北伐军构成的原素，因而把北伐看得过高，过于奢望，这自然是一部分站在北伐本身上的人们——一部分北伐军的军事领袖和执政的国民党领袖及不了解实际的民众——纽于主观的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可以发生一种大的危险，站在北伐本身方面便是易于自视过高，而不能了解自身的弱点和群众的要求及北伐前途的真正可能性。在民众方面，则容易忘记自己的责任，轻视自己的地位，对北伐存过分之奢望，而不努力于自身的组织工作，取得部分政权的工作，及怎样以民众地位参加北伐的工作。（二）以为北伐不过是一种通常的军事战争，如上海一部分资产阶级及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根本上没有了解北伐军是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北伐的对象是摧残民众压迫爱国运动之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军阀。北伐根本虽是军事行动，但始终是革命的行动，是达到解放中国民族运动之一种斗争。（三）北伐是赤化运动，“南北战争为赤与非赤的战争，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战争。”（孙传芳致蒋介石书）这种论调是帝国主义（尤以英国帝国主义宣传为最甚）反动军阀买办阶级研究系国家主义派国民党的反动右派以及一切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章太炎等所捏造出来的。这些分子诬蔑北伐军为赤化军，北伐为赤化运动，本没有什么稀奇，因为它们本是革命的对象，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敌人，它们对于凡含有民族运动的一切运动都诬之为赤化，自然对于目前在民族解放运动

上占重要地位的北伐是要诬为赤化的。但是还号称为国民党党报的上海民国日报，天天只是为北伐军蒋介石向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及一切反动派作很笨的辩白，而不揭破这些反赤派的内幕，指出这些反动派所以反赤的阴谋，这是很可惜的。此外还有“独立青年”称：“‘赤与讨赤’之争，乃思想之争，乃封建思想与民主思想之争，而非甚么赤与非赤之争。有共产党在内固成为他们讨赤派的绝好的口实，但即无共产派在内而只是三民主义，亦是要受封建派的排斥的。我固然不敢相信蒋冯是民主主义者，象张作霖、吴佩孚那样的人，脑中绝没有民主主义四字，更不必说有此精神了。”（独立青年第一卷第七号“显微镜下的时局”）。独立青年是国家主义左派的刊物，本来是反赤的，现在因事实的教训也不能不改变论调，象这样的说法，总算是比较合乎事实的。至少可给他们的兄弟醒狮派一个巴掌。但这里我们要注意，“赤”的北伐军似乎是代表民主主义的思想，但是在实际上也还是很复杂，不用说昨天投诚的王彭唐方离民主主义很远，便是广东党军的许多领袖也很难说的，至于北方的吴张军阀，固然是封建专制的余孽，但要说到他们有什么专制主义的真正理想也不甚合事实。我以为这班人自身到现在已无所谓思想，不过简单的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无廉耻的强盗而已。

张宗昌之强盗性情与土匪行动，固不待说，张作霖完全是个红胡子，是日本帝国主义简单的走狗，也是大家知道的，即吴佩孚虽然读了含封建思想的关岳传古文观止三国演义，但他何尝有什么主义！因封建主义至少也须有相当的信义观念，而吴则今天联国反奉，明天便联奉反国，如此反复无常，纯系一无耻无信之强盗。我们由以上这些关于北伐的认识，便可以看得出目前中国各种社会阶级之对于北伐的态度了。

## 北伐前途——决定北伐胜利的条件

北伐前途将达到何种程度，我们还很难确定，但代表反动军阀的太平导报和代表买办士绅阶级的醒狮很肯定断定北伐必然失败（见太平导报第三十二号南北军事预测和醒狮第八九号“论蒋介石北伐不能成功之六大原因”），但是现在的事实已证明他们的观察只是主观的希望，事实上北伐已逼近武汉，据本日申报汉口电，并称汉阳已下，不管武汉现在是否已下，我们从各方面分析北伐军与吴军的实力及各方面的形势（见本报一六七和一六八两期），可以说北伐军取得武汉不过是时间问题。至北伐军取得武汉后，将来如何发展，当然要看那时的环境如何，但我们也可以大概推测有两种趋势。（一）至高限度以湖南、湖北为根据地，北则取得河南，或将河南置于中立派之手，成为奉系军阀与北伐军的缓冲地，南则取得江西或进而由邓如琢、陈调元、周凤岐起来驱逐孙传芳，在安徽、江苏、浙江等省成立北伐军与帝国主义间较缓冲的局面，经过相当休养时期后，北伐军再同北方国民军联合与奉张决最后之胜负。（二）取得武汉后对武汉胜关以北和东南暂时妥协，或只对奉妥协，对东南则仍取得江西和福建，以两湖为根据，经过相当期间再图发展。总之，北伐军的前途在军事上现在还不能根本铲除北方和东南及各地一切封建军阀，即下武汉后还不能直捣北京，武汉之下，须告一段落，以后的胜利不能专靠简单的军事行动，须视政治运用之如何而定。

可以决定北伐军前途命运的有两个根本条件：（一）能否真正得到群众的拥护，（二）

北伐军自身能否始终有一致的团结，（三）能否有明确的适合民众要求的政治主张。要想真正取得民众的拥护，绝不是空口宣传所能办到，必须使群众在北伐军已到的所在得到实际的利益，必须有正确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设施。如废除苛捐杂税，保护民众一切自由权——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抗租等，总之，绝不可只顾目前的小利益或因军事行动而妨害民众的利益，牺牲民众。要想保持北伐军内部的始终一致团结，这也不是空言所能办到。我们绝不能否认现时之北伐军内部是非常之复杂，从蒋介石、唐生智、李宗仁、李济深……到王天培、彭汉章、袁祖铭、方本仁，虽然同是站一个战线上，但实际上难免同床异梦。尤其到打下武汉，快至胜利关头之时，问题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要想解决将来的必然产生的困难，预防将来的危险，现时北伐的军事领袖们就须根本了解，根本觉悟。北伐军现时本身最重大的缺点是：(甲)北伐军号称党军，但实际上只有几个军事领袖的权威，只有某系某系的结合，而没有党的指挥。国民党自三月廿日后，在各方面的领导权威已成强弩之末，尤其在军队中，许多军事领袖差不多看国民党是达到个人某种目的之工具，而心目中并没有党的存在。没有党便无谓主义，便没有真正共同的较远的目标和趋向。如此而欲求始终一致团结，那是很困难的，简直可以说没有可能。所以北伐军想保持各军事领袖始终一致的团结，只有建立较坚强的党，只有将党的权威提高起来，党的权威应该在一切军事领袖之上，在任何军事领袖之上，以党来支配一切。然而作到这层是非常艰难的，问题不在党员群众，而全在军事领袖自身，军事领袖如果只顾个人目前利益，不肯向远的方面看，不肯牺牲，不肯以身作则，党始终只能作一班军事领袖之工具，党将完全牺牲在军事领袖之手，党如果牺牲了，军事领袖固然没有好处，那时便是革命的破产。（乙）北伐是国民政府的北伐，北伐军是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但是现在的国民政府是很软弱的，是有名无实的，实际上不过是军事领袖的一个特别机关，他不惟不能支配政府下的民政和财政，就连自身也要受束缚，这种现象，国民政府的势力只在广东一隅还可维持下去，但一到长江流域，那是不行的。虽然在军事时期政府不能不带一点军事的性质，不能不受军事的限制，但绝不可不注意国民政府的建设事业，建立民治主义政府的基础，因此便不可不建立政府的权威，要以整个的政府支配军事，不能以军事去支配整个的国民政府。如果北伐军下了武汉，现时的国民政府应该有相当的改变，应该逐渐离开军事的支配，而有独立的形式与权力，指挥北伐军已经攻下的地方之一切政治的建设，使国民政府确然有相当的民治政府的气象，在各方面有相当政治权威。因此，国民政府的政治领袖如汪精卫应使之赶快消假复职，使政治上有领导的重心。至于对适合民众要求的政治主张，也是攻下武汉后须特别注意的。现在一般人还不明了国民政府北伐的用意，甚至怀疑北伐军是赤化，就是一般赞成北伐的民众也还不甚了解，北伐军到武汉，国民政府便应公开的将它的政治主张宣布于一切民众之前，并还须筹所以切实履行其政治主张之法。我以为北伐军在政治主张上最须注意的是召集国民会议的问题，人民自由权的问题。

我们为了中国的国民革命的成功，为了北伐前途的胜利，我们不能不苦口的指出北伐军的缺点和所以救治之道。现在北伐军快到胜利之途，北伐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中国的革命由这次北伐的胜利，打倒吴佩孚，进而肃清破坏奉系军阀，破坏北洋封建军阀的统治，逐渐肃清全中国的军阀势力，统一中国，建立比较民治主义的政府，以对抗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或许有相当之可能。然而要看北伐军的军事领袖能否了解目前北伐

军的地位，能否真正站在革命的见地去牺牲一切，能否真正拥护民众的利益而定。不然北伐军即或得取武汉还未可乐观，还可以发巨大的危险。

至于民众此时对北伐的根本责任是：（一）尽力参加北伐，邦助北伐军在客观上达到尽可能的胜利，（二）在参加北伐中发展自身的力量，尽可能的建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取得应得的一切政治权利。

一切参加北伐和赞助北伐的人们，须在客观上来了解北伐的真正意义，脱去主观的偏见，很客观地运用革命的策略，很真诚地进行革命的工作，北伐前途的胜利当在眼前。

一九二六年九月八日脱稿

（原载《向导》170期，1926年9月出版）

#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

萨坡什尼柯夫

## 国民革命军北伐的第一阶段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月八日）

北伐战争始于1926年7月9日，当天国民革命军的主力部队从广东出发。参加北伐的总人数达5——6万人。

在国民革命军的各部队中都洋溢着和全国人民群众共有的、融洽无间的革命热情。当时，广州和广东省各城市的劳动人民都为即将开往前线去的北伐部队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

北伐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各系军阀在国内的统治，并以国民革命政权统一全国。

这项任务曾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散发的传单中作了表述。

民族解放战争的思想很快就传遍了广大的中国的每个角落。然而，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和代表中国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却是以两种极端不同的态度对待民族解放任务的解决的。

共产党人和某些国民党的进步代表人物一致认为，民族解放战争和满足劳动人民的迫切要求有不可分的关系；首先，是和满足组成国家人口的主要成员的农民的要求即土地革命问题是分不开的。

但那些国民党右派分子的看法却完全相反。他们在蒋介石发动的1926年3月20日反革命政变后，在广州政府中就霸占了各部门的领导地位。他们只想把革命向横广方面推展而不使革命深入进行。他们企图使北伐战争只解决一些纯军事问题。

共产党人充分地利用北伐来吸收群众参加政治活动，组织群众起来，并使他们的迫切要求得到满足。

说到这里，有必要指出下一事实。北伐出师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所散发的传单中有一条重要的增补是："人人有饭吃，耕者有其田。"（传单最初的原文中本来是并没有这一项重要的革命要求的。）当北伐时，便把这些传单散发给欢送北伐军的农民和城市居民。这些传单都是由政治工作人员（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亲手抄写的。在士兵、农民的一致赞同下，便将上边所提出的那一项重要的革命要求追补到传单的原文中去。这就不能不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强烈反对。

在拟定作战计划上，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人关于革命战争问题的观点也是不同的。

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都反对分散使用国民革命军的兵力。他们主张把全部兵力集

中，统一调配，把进攻和在敌后的人民游击战争结合起来。他们的计划是先解放长江流域武汉一带的工业区，然后联合冯玉祥的国民军再向上海、南京进攻，从而彻底消灭敌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坚决主张建立正规化部队，以便动员群众，组织工、农、兵在敌人后方起义；他们并要求委托工农自卫队担负守卫后方的工作，将所有的正规军全部投入前线作战；允许工人、苦力和农民志愿加入国民革命军，把他们作为积极的战士来加以教育和使用。

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所有这些建议全被否决了。蒋介石以各种阴谋手段篡夺了广州政府的军事领导权，强行通过他所拟定的计划。在这方面，机会主义者陈独秀给他邦了忙。陈独秀为了维护统一战线，竟“不顾一切”放弃了无产阶级在争取革命领导权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放弃了共产党在争取军队领导权上的斗争。

蒋介石的战略计划就是以分裂革命的武装力量为出发点的。按照这一计划将国民革命军的主要部分（“西路军”）派往岳州——武昌；将第二集团军（“东路军”）派往南昌；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派往福建省境，以便主力部队进入湖南及江西后掩护广东。为了保卫后方，在广东成立了特别司令部，并将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留在广东。蒋介石的这一套计划，是和人民战争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第八军军长唐生智被任命为“西路军”（经过湖南）的总指挥。蒋介石自己担任“东路军”（经过江西）的指挥，并有他的亲信将领何应钦所指挥的第一军做他的后备军。何应钦自然会跟他的主子保持密切联系。这时，凡是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人、同情革命的士兵和军官都被从第一军中排挤出去了。士兵和军官中间的任何政治工作一律都被禁止。第一军实际上已准备作蒋介石阴险的叛变计划的武装支柱了。

同样，蒋介石提出的关于建立“保卫后方”的专门机构这一问题也并不是偶然的。按照蒋介石的意图，这个专门性的机构将来应当起镇压广东省的、特别是广州市的革命工农的作用。从后来的事变演进看出，蒋介石所操纵的罪恶的战略计划也并未能得以不折不扣地被执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违背了他的意旨，以先斩后奏的方式，仍然执行了原定的、必须发展人民战争以反对反动派的战略计划。

当时，帝国主义分子以及帝国主义的走狗们，却把广州政府关于组织北伐的决议看作是不可能实现的空谈。在他们看来，组织北伐只不过是一种宣传，其目的是为了使某些立场动摇的军阀首领脱离反革命阵营加入己方。1926年7月2日反动报纸“京津时报”写道：“广州执政者们关于抗击吴佩孚和孙传芳的军事行动的决议，其目的在于使广东附近的邻人受惊和强迫他们合并到所谓国民政府中去。”中国人民国内外敌人的这些估计也是有某些根据的。当时北洋军阀的军队不论是在人数上或装备上，都远比国民革命军优越得多。国民党右派的暗中破坏活动，也削弱了革命阵营的力量，敌视革命的异己分子又居于广州政府的军事领导地位，这就大大地鼓午了帝国主义分子以及他们的走狗们。

例如，众所周知的一件事实是，直系军阀孙传芳也无法隐匿他由于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而感到喜悦的心情。他自己在某一次演说中曾把蒋介石称为“天才的军事统帅”。

然而，国内外的反革命敌人却估计错了。实际上，国民革命军表现的非但不比军阀们的军队弱，与此相反，而是比他们的任何一支军队都强。国民革命军的力量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他们是为正义而战，有全国人民大众的支持，并有共产党人在巩固军队方面进

行了重要的工作。

如上所述，国民革命军以两路军出师——“西路军”和“东路军”。“西路军”以武汉地区为自己的行动方向；“东路军”以江西省会南昌以及上海、南京地区为自己的行动方向。

“西路军”的主力部队包括第四军（军长张发奎）、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和第八军（军长唐生智）。“东路军”的主力部队包括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组成“东路军”成员之一的第一军，上边已提到过，另有自己的行动方向，他们是经过福建的，其最初时期的行动，只限于掩护广东省东北一带的任务①。当时在第二军、第三军、第四军和第六军中，政治工作的领导是由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朱德、叶挺、林彪、林祖涵（林伯渠）、李富春等人担任的。与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和“西路军”向长江进攻的同时，冯玉祥的国民军的主力部队也就有了向南方展开进攻的可能，以期协力歼灭北洋军阀的军队，统一全国。

国民革命军的主要敌人是据守湖南、湖北及河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

北伐初期阶段，吴佩孚武装力量的绝大部分在霸占着北方，在这里吴佩孚的大部分武装力量又在追击着往甘肃退却的冯玉祥的国民军，这种局势对北伐是有利的。

北伐开始前，为了确保早已占领的几处重要据点，武装的农民队伍曾协同唐生智将军的部队在湖南进行过数次战斗。

依照广州政府的决定，共产党员叶挺所指挥的独立团被派往湖南去援助湖南的革命起义者。独立团全团共有2000多人，其中85%是共产党员和对共产党有好感的革命青年。

7月1日叶挺的独立团取右翼由与衡阳——长沙相平行的路径向安仁挺进，并和唐生智将军的第八军部队在安仁会师。当时敌军共有4个团集中在攸县，他们是准备在黄砂铺、涤田、草市一带向第八军进攻的。侦察结果：敌人于7月2日拂晓将开始向国民革命军偷袭。当时第八军军部没有与叶挺取得一致的行动，下令将大部分部队从黄砂铺和涤田撤往衡阳，在安仁只留一小部分部队。叶挺决定以一个营的兵力在7月2日拂晓开始向草市进攻，以便给涤田和攸县的敌人以致命的打击；而以另一个营取守势并掩护黄砂铺。

从7月1日夜到7月2日，叶挺调一个营到涤田和黄砂铺。依靠居民点和当地居民的友谊支援，并从每个营调出两个连的兵力，在这些居民点的外围高地上布置好埋伏。如果敌军拂晓向这几处居民点围攻时，隐蔽在埋伏地的几个连可以立即向敌人冲击，打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就地把他们全部歼灭。在这次战役中，擒获了第一批俘虏，其中有敌军官4名、敌军士兵40名，其余残兵败将全部逃往攸县。独立团未跟踪追击。

7月2日拂晓，转入进攻的独立团的一个营占领了草市并固守该地。

从7月2日夜直打到7月3日，三面夹攻，攻下了攸县。在这次战役中，有十几支农民武装队伍参加了战斗。由当地农民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队伍，在带领独立团的进攻部队在夜间通过往攸县去的、难以通过的地带时，给独立团提供了难于估价的帮助。

叶挺独立团的首次胜利使得该团及全团的指挥官们在国民革命军中享有威名。叶挺的独立团从此被称为“铁军”②。

---

① 参看吴民、萧枫合编：“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951年北京版第60——61页。

② 后来“铁军”这个称号已转用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全军。

第四军第十师和第十二师奉第四军军长张发奎的命令，于1926年7月7日开始出发①。两师共有官兵18000人左右。第四军在武器方面，共有8500多支步枪，17——18挺重机枪、50多挺轻机枪和4门山炮②。

该军有两个进攻方向——醴陵和株州（两地都在浙赣铁路线上）。

国民革命军的主力部队沿这条铁路向湖南省的省会长沙进攻。位于国民革命军进攻道路上的醴陵，在军事战略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在这里驻守的敌军很容易从侧面对第七军和第八军的进攻部队进行偷袭。如果这样，就会使对长沙的进攻受到阻碍。

敌军以江西唐福山的两个团和谢文炳的两个旅（共有5000名步兵和骑兵、18门大炮和64挺机关枪)的兵力防守醴陵。

第四军军长选拔了第十师第二十九团和第三十团、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和叶挺的独立团执行这次作战任务，并命第十师师长指挥作战。

1926年7月4日傍晚，第四军第十师和第十二师的主力部队已逼近醴陵。第四军军部也与他们一起前进。

7月8日，第三十五团和第二十九团即开始进攻。第二十九团沿攸县——萍乡路线进攻，第三十五团则沿攸县——醴陵路线进攻。敌军随即退却，并在泗汾东北的高地上严阵固守。独立团于7月8日沿生田——朱亭路线开始进攻。敌军为了不使国民革命军的部队逼近粤汉铁路，曾采用了各种方法顽强地进行抵抗。

7月9日第二十九团的一个分队占领了万家洲。这时敌军便开始向萍乡撤退。

同一天第三十五团也占领了据点美田桥，但是敌军仍坚守醴陵不舍。独立团在朱亭一个桥的附近遭到敌军顽强的抵抗。团长随即决定在这里留下两个营，而带主力部队从东面绕过朱亭向株州进攻。企图坚守朱亭附近这座桥的敌军，不惜削弱在株州和湘潭一带的防卫力量，调来全部兵力开往湘江桥，与这两个营展开激烈的战斗。独立团的主力部队就利用这一情况乘势于7月10日夜猛袭中占领了株州。占领株州也就有了攻取醴陵、萍乡所有防卫阵地的可能了。同时这也是迫使敌军从株州一带溃败的原因。在株州一带取胜后，独立团团长便将自己的部队沿铁路线开往醴陵，从西面以急速袭击攻下该城。在攻取醴陵和株州这两次战役中，当地居民给予国民革命军进攻部队很大的邦助。例如，在向醴陵去的阻塞的道路上，做向导的农民曾指引独立团侦察部队通过渌水和南川水的浅滩，使得独立团的某营得以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到达城西和西南郊区一带。

此外，农民们还直接参加了攻占醴陵和株州的战役。如在泗汾（靠近醴陵附近）的敌军守卫部队，就是被从泗汾西北高地下来的由当地农民、手工业者及小商贩所组织起来的强大的游击队武装消灭的。

醴陵战役中生俘敌军官18人、士兵327人，缴获大炮1门、机枪3挺、步枪288支。由于叶挺的独立团进攻的猛烈和神速，所以国民革命军在这次战役中损失不大。占领了醴陵，也就保证了今后北上的胜利。

解放醴陵之后，“西路军”的主力部队（包括第七军、第八军和第六军）以第四军为

---

① 新编成的第四军第十三师（包括第三十七团、第三十八团和第三十九团）留在广州作国民政府的后备军。从第十二师中留下第三十一团守卫海南岛。

② 参看1927年8月28日“红星报”。

先锋开始向长沙进攻。

7月12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攻入湖南省的首府长沙。

进入长沙之后，第七军和第八军又迅速地向长沙以北的岳州（岳阳）推进。

为了保证国民革命军主力部队顺利地向前进攻，首先就必须消灭在平江、通城、咸宁各据点上威胁着国民革命军右翼部队通过铁路向前进攻的敌军。

然而敌军又特别扼守平江，企图利用该城来防卫汨罗江南岸以及平江东北和西北的高地。

约有6000名敌军官兵防守平江及该城一带。地主、富农的队伍“民团”协助军阀吴佩孚的军队在国民革命军前进部队的后方进行各种破坏和侦探活动。

8月19日国民革命军部队开始向平江进攻。第四军负责主攻该城。第四军第十师面临着应予攻克敌人防御最巩固的地区的任务，要强行渡过汨罗江后才能展开进攻。第十二师则沿金井——平江路线推进。

第十师的部队未能渡过汨罗江，因为他们遭到了敌人从防御好的兴华南村发出的炮火。该师的进攻部队就埋伏在河南岸。第十二师的部队未遭到敌军强烈的抵抗，随即开始向平江前进。第三十五团展开了队伍，在广阔的战线上朝北向平江进攻。敌军集中全部火力向进攻的第三十五团迎击。

第三十六团渡过汨罗江并从西面和西北面包围了平江之后，悄悄地向前靠近，进而突入该城。这一威胁转移了敌人的注意力，敌人便把自己的部分部队调往该城。第十师取西北方向在进行战斗的同时乘势渡过了汨罗江。农民武装队伍也加入了进攻部队。协助该师一起作战。

在城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第三十六团被迫撤退，而埋伏在汨罗江的北岸。这时第十师也慢慢地穿过了平江东北部难以通行的地带。然而，另一个威胁又产生了，敌人又象以前一样留下了后卫，把主力往通城撤退。根据独立团团长叶挺的提议，独立团同第三十五团从第十二师的右翼引进，从北面及东北面包围平江，先占领团山铺，这样即可切断敌军退往通城的后路。南面则由留下的第三十五团的一部分兵力进行掩护。

独立团和第三十五团的两个营给敌人的打击，对敌人来说，是很突然的。进攻部队迅速地继续向团山铺挺进，并为围攻敌军创造了有利的先决条件。第十师的先遣部队也向团山铺逼近，完成了包围敌军工作。敌军一个营向第十二师师部冲来，企图取南面方向突围，结果全被师部的守卫部队歼灭。自此以后，敌人认定自己是失败了。

在共产党党员叶挺指挥下的独立团，勇敢机智的作战行动保证了战争的伟大胜利。敌军在平江一带几被全歼①。

在这次战役中，生俘敌军官兵6000余人并缴获大批战利品。第四军没有遭到任何阻击，全军继续向北挺进，于8月22日进入湖北省南部的通城。在革命部队入城的前一天，当地所有的军阀当局全都逃跑了。

与第四军同时行动作战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和第八军也开始沿粤汉铁路向武昌进攻。一直把敌军逼近湖边。作为后备队的第六军部队跟在第四军、第七军和第八军之后也开始

① 隐藏在平江东南的山林里的大多数的农民武装队伍都在平江一带活动，他们曾在夺取平江的战役中给国民革命军部队邦很多忙。

行动了。8月21日，第七军和第八军部队占领了粤汉铁路的交通枢纽、湖南北部的重要交通线的中心点——岳州。

敌军在平江失败和通城失守后，军事局面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时已转为对国民革命军有利的局势。

这种局势不仅为国民革命军"西路军"创造了顺利进攻的有利条件，同时也为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这时"东路军"也有了顺利地向直系军阀孙传芳部队所据守的南昌、九江展开进攻的可能。

"西路军"则沿铁路向北挺进，向长江流域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由武昌、汉阳、汉口所构成的武汉三镇进攻。这时直系另一军阀首领吴佩孚急忙将驻扎在湖北的部队调来，并在国民革命军进攻部队前进路线上的许多地点都建立起坚固的防御阵地。

军阀吴佩孚在最便于防御的铁路据点汀泗桥一带布置了坚强的工事。稍偏汀泗桥南面，就是一片长满树林的高地。这块高地能够控制汀泗桥四周一带。汀泗桥北面就是几个经常泛滥的湖沼，这也给国民革命军进攻部队造成很大的困难。汀泗桥一带是由敌军万善政指挥的3个团和董政国指挥的军官团防卫着；这里还有从武昌调来的第十三混成旅、第二十五步兵师的一个团和从岳州被打败而退到此地来的敌军残部。以上这些就是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军。

第七军、第八军、第六军和第四军都参加了攻占汀泗桥地区铁路段的战役。

鉴于摆在作战行动面前的重重困难，第六军和独立团都被留作予备队。第四军在夺取汀泗桥这次战役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8月26日第四军部队开始向汀泗桥发动进攻。第十师的先遣部队还未到达柏墩就被泛滥的河水挡住了去路。敌军强大的火力从柏墩打出来。第十二师部队刚走到蒲圻河，就遭到了敌人的阻击，未能得以继续前进。先遣部队刚刚仃下来，敌人便从汀泗桥开始进攻，企图楔入第十师和第十二师的中间，切断两师之间的联系。敌人向第十师和第十二师的接合点冲去，结果两师的联系被隔绝了。为了扭转这一局势，叶挺的独立团的一个营马上投入战斗并扼住了敌军的去路。该营和敌军强大的优势兵力进行了将近18个小时的激战，才使得第十师和第十二师之间重新恢复了联系。在第十师、第十二师和独立团的一个营的共同奋战下，又将敌军逼退到汀泗桥。独立团的一个营就是这样地以自己勇敢机智的作战行动扭转了战争局面。

随后叶挺的独立团在夜间又以白刃战将敌军全部击退。第四军的主力部队本来应该从8月27日晨开始进攻的，后来这一部署也作了变动。第四军部队乘独立团胜利的机会重新进行了配备，把左翼调为右翼，由独立团、第三十五团和第二十八团组成了强大的部署继续向前进攻。第三十五团一面掩护独立团和第三十六团从铁路方面进攻，一面从左翼向前挺进。独立团在往汀泗桥突进的沿路上，给敌人很大的打击。第三十六团则取右翼往咸宁进攻。

8月27日几个团同时展开进攻。敌军腹背受敌，无力抵抗，随即开始狼狈逃窜。独立团冲向铁路，占领了汀泗桥并继续向前追击。独立团比第三十六团早两小时占领了咸宁。在汀泗桥战役中，叶挺的独立团生俘2000多名敌军，缴获4000多支步枪和许多战利品。后

来敌军又急忙由咸宁退往武昌。

按自己一定进攻方向实行作战行动的第七军、第八军和第六军也都先后到达了咸宁。

敌军在汀泗桥战役失败后，决定进入湖间地带时，在通往武昌的远距离要塞上（距武昌40——50公里），建立起巩固的防御阵地。吴佩孚第八师的一部（3个团）和第十三混成旅都被调来此地，第三混成旅也开来了。

敌军将配备有60门大炮和100多挺机枪的将近1万名的兵力集中到这里来。军阀首领吴佩孚亲自领导防卫粤汉铁路两侧的梁子湖和黄塘湖一带地区。

对这一带进攻是不方便的。被两个大湖从左右所挤成的通向武昌的狭窄道路足有2——3公里长，这就限制了军队作战机动的可能性。

加上当国民革命军部队进攻的时候两湖又正在泛滥，这样一来，就给进攻的部队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和不便。

8月30日开始向这一带进攻。进攻任务由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和第七军执行。第四军沿铁路进攻，第七军则在稍偏右的地方行动，它的任务是取东北方向向武昌冲击。为了加强第四军的战斗力量，便把原被调往岳州去的第一军第二师配属给第四军。

8月30日第四军第十二师以全部兵力开始进攻。又从后备队的第十师中抽调第二十八团协助第十二师。第二十八团和第十二师部队的任务是要在山坡（地名）附近最窄的地带突破敌人的防卫阵地。可是他们未能完成这项任务。这时，军长便下令叶挺的独立团参加战斗。8月30日10时30分独立团从第十二师的右翼引进，胜利地突破了敌人的防卫阵地并沿铁路继续向北猛袭。这时，军长乘独立团获胜的时机率领着已突破敌人防线的第十师经过第十二师的进攻线前进。随后第二师、第十师和第十二师一齐开始进攻，于8月30日傍晚，第十师部队跟随独立团之后冲入山坡车站。

第十二师在通往武昌的远距离进攻中共伤亡500多人。同样，敌人也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吴佩孚随同自己的司令部一道狼狈地逃往武昌。

在攻取梁子湖和黄塘湖一带的战役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第四军、特别是由于独立团作战的勇敢和顽强①。

第七军部队在第四军部队胜利地结束了山坡战役后20小时也到达了山坡一带。

1926年9月1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的部队到达了通往武昌最近的要冲。作为第四军后备队的第十二师的两个团当时都集中在南湖一带，其中一个团在湖间地区掩护第四军的后方。随后第一军第二师也从东面逼近了武昌。

武昌四周的高大石墙阻碍着对武昌的攻击。

第四军、第七军以及第一军第二师联合兵力于9月3日开始对武昌进行首次攻击，但是没有成功。第二次再举进攻，仍未攻下该城。国民革命军的部队遭到很大的损失。攻取武昌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国民革命军的进攻部队错过了攻城的时机。本应该在敌人尚未来得及好好地准备设防时，在国民革命军于通往武昌最近的要冲地区集中主力之后，就马上向武昌展开进攻。然而“西路军”的指挥部却让部队先休息了几天。而敌军就利用这

---

① 这时独立团的成员中只有10%是来自广东的老战士。虽然这样，但是独立团的战斗力并没有失却，因为共产党人每天细心地进行教育工作，给团又培养出一批其勇敢和坚强并不次于失却战斗力的战士的、新的补充力量。

个机会加强了城防工作并调配好了后备力量。敌军未受阻拦地把机枪都架设在城墙的炮台上，在通往城墙的各要道上也都布设了防御工事（挖掘了战壕和安置了移动障碍物等等）。

攻打武昌失败的另一原因，是对该城的地形侦察不够，而在地形侦察不详的地方发动了进攻；再加上对这次进攻组织得也不好。参加进攻的部队没有接到准确的战斗任务，同时对进攻的方式方法也考虑得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指挥只好暂时先放弃对武昌的进攻，开始转攻汉口和汉阳。为了保证作战的胜利，把武昌包围得水泄不通。围困武昌的任务是由增添了第八军一个师兵力的第四军执行的。9月7日第八军协同国民革命军的其他兄弟部队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攻下了汉口和汉阳。汉口、汉阳两地战役获胜后，军阀吴佩孚的许多官兵便开始纷纷向国民革命军方面自动投诚。

国民革命军部队解放了汉口和汉阳，也就促使被封锁的武昌必然要被早日攻克。

第四军部队正准备对武昌进行最后一次总攻。这时，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割据江西、安徽、福建、浙江和江苏各省的另一军阀孙传芳又起来进攻包围武昌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对于吴佩孚这个争夺华中统治权的对手，孙传芳本来暂时还不愿意援助。他所以援助吴佩孚，是由于他认为，国民革命军和吴佩孚的军队互相削弱正是他的可乘之机。

然而，国民革命军抵达长江并已占领汉口、汉阳，迫使吴佩孚濒于完全崩溃的形势，这一点孙传芳却是出乎予料的。他认为这是对他本身的统治的威胁，于是开始针对正在围攻吴佩孚军队的国民革命军采取了行动。

孙传芳拥有20多万装备得很好的军队。

孙传芳为了给武昌驻军解围，以总数5000——6000人的兵力，在帝国主义舰队的护送支援下，于9月底开始沿长江北岸向武昌挺进。

为了不使敌军突破对武昌的封锁，第四军第十师及第十二师奉命出击孙传芳的部队，结果，第十师及第十二师终于使局势平稳下来了。孙传芳对吴佩孚的援助，给驻武昌的敌军打了很大的气。10月1日警备队两个团开始向外冲，企图突破包围圈并和孙传芳的进攻部队取得联系。经过3小时的激战后，敌军几被全歼，残部遁逃回城。

正在进行围攻武昌的激烈战斗时，一个新编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在汉口出现了。该军的反动军长刘佐龙①在汉口和以武昌警备队名义出现的美国人进行关于退让武昌的幕后谈判。根据美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们的意图，没有邀请在共产党影响下的第四军军长出席这次谈判。当时，在汉口出版的各报刊上都刊登着武昌警备队投降的条件。报刊上谈到要保障士兵和军官的生命和自由，允许被围困的士兵和军官编入第十五军；保障不愿编入第十五军的士兵和军官有选择自己今后前途的自由。很显然，这些条件的目的就是企图保持反革命势力的，只不过是在别的名义下提出来的而已。当时的这种局面，要求对武昌进行刻不容缓的进攻。10月10日对武昌进行一次约计6个小时的猛攻。攻城任务是由独立团在第四军第三十五团的配合下进行的。在这次攻城战役中，独立团的战士们显现出无比坚强和忘我的不怕牺牲的精神。在这次战役中，生俘敌军官兵11000名，缴获机枪40挺、大炮20门。在城内和国民革命军交锋的敌军主要是敌军第八步兵师的一个旅。城内的其他敌军

① 刘佐龙原是吴佩孚军中的第七师师长，是在攻取汉口时投降到国民革命军来的湖北军阀，后来他的部队就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

部队，当遭到独立团战士们的第一次攻击和看到他们突然出现在街巷之后，都放下武器投降了。在这次攻城战役中，武昌的无产阶级对独立团有很大的邦助，他们和国民革命军战士们一道参加了肃清敌军工作。独立团的全体指战员们受到了武昌劳动人民的热烈欢迎。

武昌的解放，就使得美帝国主义以及潜藏在国民党中企图背着中国人民暗地进行保存反动势力的交涉的反革命分子的秘密勾结，都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国民革命军“西路军”占领了武汉工业区，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它激起了群众组织的蓬勃发展，激起了中国无产阶级特别是以其革命性著名的汉口、汉阳产业工人和铁路工人政治积极性的蓬勃发展。

在广州、汉口、汉阳、上海、南京及其他各大城市都相继举行了反帝反封建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示威游行。

要求增加工资、规定8小时工作日和施行劳动立法的工人罢工斗争在全国各地日益高涨。团结在工会周围的工人数字也迅速地增多了。

农民运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千百万农民都团结在多半是由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农民协会的周围。

农民不仅要求减租减息，并且已进一步开始为获得土地而斗争了。特别是湖南省的农民运动波澜非常壮阔。在湖南省的许多乡中，甚而在许多县分中，实际上一切权力已归属于农民协会了。农会也有自己的武装，他们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分配给了乡中的贫雇农。

在武昌、汉口、汉阳各地粉碎了军阀吴佩孚的部队和占领了武昌之后，“西路军”的一部分（唐生智军长的第八军和第十五独立师）①又继续向北挺进，以便在陇海铁路战线上和冯玉祥的部队取得联系。

唐生智军长的第八军部队和第十五独立师的部队（约有2万人）占领了河南省的武胜关，这就粉碎了吴佩孚协助孙传芳对抗在江西省的国民革命军的一切企图。10月初，第八军部队占领了重要的战略据点——信阳，并开始和河南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所领导的、这时已经占领了河南省的省会开封的游击队取得了战斗联系②。

这样一来，吴佩孚的实力就完全被击溃了。

国民革命军部队占领了武汉工业区，并发展到长江流域之后，就给广州的军队和冯玉祥军队的联合创造了实际可能的条件。帝国主义分子为了防止这一点，采取军阀势力联合的手段进攻冯玉祥，企图把他消灭掉。

美、英、日帝国主义采取这一手段的目的，在于不使国民革命军和冯玉祥的军队得以联合。

1926年8月2日“北洋联军司令部”在日本统帅部的直接援助下在太原正式成立。这里包括直系军阀吴佩孚、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山西军阀阎锡山的联合兵力。“北洋联军司令部”实际上就是英、美、日帝国主义用来反对中国革命势力的大本营。它的任务就是要实现包围和消灭在大同——包头战线上的国民军第一军的计划。计划中载明要从热河经过多

---

① “西路军”的主力部队被派往东线去解放南昌——九江一带。

② 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是由游击队改编的。后来开封又被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军队占领了。

伦诺尔向南口进攻，并从山西向冯玉祥军队的京绥线这一主要交通线进攻。

集中在太原东北部的吴佩孚部队正从南面袭击南口，另外一支部队又占领京汉铁路直隶省内的一段。阎锡山的一部分兵力占领了山西和陕西省境的一些重要据点。这样，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就没有从驻扎在陕西省西安一带的国民军第二军和第三军方面得到援助的可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将军决定于1926年8月14日率部从南口撤往绥远，整训军队并和国民军第二军及第三军取得联系，一同反攻陕西军阀，再进入河南、湖北，迎接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他们一道讨伐吴佩孚和孙传芳的军队。

冯玉祥将军部队的撤退和集中都是按一定计划进行的，所以比较迅速。于1926年9月初在绥远和陕西省境一带以及在甘肃省东部一带已集齐了10万大军。冯玉祥在这里把自己的部队重新进行了一次改编：共编为7个军（每军中有2——3个师），并成立了“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①。

为了通过陕西、湖北进攻并与国民革命军会师，冯玉祥在1926年9月份一个月内已将全部兵力配备完毕。3个军和石友三部②集聚在包头——归化一带掩护张家口。一个军撤往陕西边境的广昌和平凉一带。3个军和一个从甘肃兰州调来的骑兵旅向西安方面进击，并解除正和陕西军阀孔繁锦、吴新田进行战斗的第二军和第三军部队所受的封锁。作战行动在1926年10月初已准备好了。

当“西路军”顺利地展开进攻时，直接受蒋介石指挥的“东路军”（第二军及第三军）却屡遭失败。

起初他们是比较容易地占领了江西省不少地区。

于10月12日转入进攻的第一军和第十四军，在3天中向北挺进到100公里。他们并没有遭到孙传芳部队的强烈阻击，当时孙传芳武装力量的主力是集中在南浔铁路一带。第一军的先遣部队已到达余江地界并在许多地方强渡了这条河。

第二军及第三军战胜了敌人的轻微的阻击后，又向弋阳——新喻这条战线的浙赣路挺进。但是，在孙传芳的部队顽强抵抗国民革命军以后，局势就发生了变化。从南面和西南面向南昌推进的第二军和第三军未能攻下该城。

这两个军的部队曾冲入南昌城3次。每次孙传芳都集聚兵力并重新配备力量一次又一次地把他们从城里击退出来。战士们伤亡很多，并且也都感到很疲劳，他们已不能独立完成目前的任务。

南昌这次战役的失败，与其说在前线这一地区的国民革命军的人数少，倒不如说是由于直接指挥“东路军”作战的、罪该万死的蒋介石领导作战的行为所致。南昌战役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蒋介石千方百计地阻止“东路军”作战地区的工农运动的发展。这样，国民革命军也就失去了兵力的主要来源。其实蒋介石也知道，如果不攻下南昌和九江，要想准备和实现攻取上海和南京的计划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蒋介石只好仅将第八军

① 这时冯玉祥已被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批准为驻绥远、甘肃两省的“国民革命军北路军”及陕西省东南部地区的驻军（国民军第二军和第三军）的总司令。

② 由于某些原因，石友三的兵团被称为国民军第五军。

和第十五独立师①留在武汉，将“西路军”的其余各军部队全部调往江西，以便在南昌到九江（南浔铁路）一带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

到10月28日，一个军团（驻南昌的西北部）在第七军军长的指挥下编成了。司令部设在武宁。编入该军团的有第七军、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以及第一军第二师。

第十二师集中在白水街，第十师集中在范家铺，他们留作掩护部队，以防敌人从九江——瑞昌进攻。在涂家埠一带第七军第十二团和第二师给敌人以重大的打击。

这时第二军和第三军的部队都集中在临川。他们的任务是乘西北军团的胜利机会神速地攻占南昌。

敌军调动自己所有的一切兵力来防守南浔铁路这一带地区。敌军在南昌、涂家埠、永修、德安、马回岭、沙河和九江等据点都布置好了防御工事。在南浔铁路线上约有35000到4万名敌军守卫着。从西面通往这个要冲的都是些山地（铅山、九岭山等山脉），山上树木成林，这也妨碍了国民革命军部队的进攻。

第七军和第二师试图于1926年11月1日攻占涂家埠没有成功。只占领了安义和永修两地。当时第四军部队也参加了作战。11月3日他们开始进攻德安和马回岭。在这个地区，敌人以一个步兵团守卫在德安以西2——3公里的地方，并以两个旅的兵力守卫马回岭一带。这里驻防的还有其他守卫部队。

第四军的作战行动有从南面进攻德安——马回岭一带的第二师的援助。

第二军和第三军开始猛袭南昌的同时，第六军部队沿长江南岸进攻，而第七军则顺安义——德安——九江一线向德安——九江进攻。11月4日攻下九江，1926年11月8日占领南昌。

南昌、九江的敌军部队（约3——4万人）整个都被包围了，并全部被俘。孙传芳的最精锐的一个师在九江也投降到国民革命军这方面来了。后来，孙传芳的军队开始狼狈撤退。直到11月15日孙传芳的部队才集中在安徽省的安庆。国民革命军两个月来攻取江西省的战斗就此结束。在这次战斗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那些受共产党人影响的部队。

江西战役的胜利也就促成了在福建省驻扎的国民革命军部队（第一军和第十四军的5个师）占领建宁和建阳的可能。在这次作战行动中，活动在军阀周荫人后方的农民武装队伍对他们的邦助很大。同时，并进行了攻取该省的省会——福州的战斗。

到1926年11月，革命根据地扩大了。根据地包括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江西等全省及福建、河南两省的一部。这些地方共有人口15000万以上，面积达120万方公里。

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地区都被国民革命军占领了。革命的武装力量壮大了，并积累了一些斗争经验。这时国民革命军中已有18——20个军，拥有25万官兵。

## 国民革命军北伐的第二阶段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

在国民革命军的攻击下，吴佩孚和孙传芳的部队接二连三地遭到了失败，这种情况迫

① 这时第十五独立师是由共产党员的贺龙将军指挥的。

使各系军阀及其帝国主义主子不得不拼凑他们的兵力起来对抗。

1926年12月，在英国政府的策动下，在中国组成一支反革命联军即所谓“安国军”，由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奉系军阀张作霖统一率领。“安国军”包括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孙传芳和张宗昌等军阀的部队，总数达30万人。它是在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在美国和日本的援助下组织和武装起来的。特别是美国政府，曾“卖给”安国军100架飞机和价值1000万美元的军用品。

国民革命军虽然在数量上和装备上不及“安国军”，但在道义上及其作战能力上却远远超过了这支各系军阀的杂牌军队，而这个优点是能起决定性作用的，在日后的作战过程中就可以证实：尽管敌人的力量较前已有所加强，但国民革命军还是所向披靡。1926年11月中旬，国民革命军在解放江西全省和福建的一部分地区后，便进入安徽和浙江；11月底便解放了安徽的首府——安庆。

国民革命军要在这个反军阀的正义战争中获胜，就不能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从另方面看来，正如上文所述，革命军的胜利也能促使群众革命化。所以革命军不是单纯作战，而同时还组织广大群众去进行革命斗争。在革命军占领武汉和南昌后，工人运动便如风起云涌，在全国总工会领导下的工会的会员，一下子就增加了20万人，工会组织的数目同时也大大增加。工人们争取改善其境迁的斗争越来越有组织地进行，他们的胜利也就越来越大。为了回击反革命势力的进攻，工人纠察队也相继成立起来了。

1927年初，在汉口和九江，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获得了辉煌的胜利。汉口工人在中国共产党杰出的活动家刘少奇同志的领导下，为了抗议英军向游行示威的中国劳动人民开枪扫射的暴行，在1月4日冲破英租界的防栅，赶走了租界中的外国巡捕。1月6日至7日，武装起来的工人也收回了九江的英租界。

在工人阶级影响下，城市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广大群众也起来参加革命活动了。例如从1926年底到1927年初，就有过许多公务人员、手工业者以及商贩和工人一道参加罢工运动。

同样，农民运动也具有广大的规模。例如湖南一省到1926年11月底已成立了许多农民协会；会员计有1071000名，到1927年初参加农民协会的人数便增加到200万名。

1927年1月各省农民协会会员的数字是：广东100万，湖北27万，江西15万，广西5万，福建25000。农民协会在许多地方已经掌握了乡村的政权；至于没收地主和反动军官将领的土地并把它重新分配给农民的事例，已经是举不胜举了。

可是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它的右翼，看到中国工农革命斗争的规模日益发展，便惊惶失措起来，这样，他们就跑向背叛革命的道路。

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散布出恶毒的诬蔑，反对由他们自己捏造出来的所谓“革命过火”论。他们狂吠：“农民太残暴了！”“工人要求过分了！”

这是一个坚决限制革命发展的方针。但它反而获得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者的拥护。陈独秀等机会主义分子，由于害怕革命要“吓跑”民族资产阶级，自甘放弃争取国民政府所属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而暗藏在革命内部的敌人对这样一个好机会自然不会错过。于是乎蒋介石及其党羽便加紧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准备。

蒋介石把总司令部迁到南昌后，图谋绞杀革命的反动分子都在那里干起了反革命活

动。在这批反动分子当中有的是大买办（如上海的银行大老板、国民党中政会主席张静江），有的是潜入国民革命军的地主军阀①等等。

国民政府为了便于指挥战事，在这时已由广州迁来武汉。当时的武汉已成为中国革命力量的中心，它具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全国各地相联系。要是从革命利益着想，总司令部当然也是应该迁来武汉的。但蒋介石不顾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屡次提出的这个建议，仍和他的喽罗们——国民党右派分子——一起继续滞留在南昌。

蒋介石力图自圆其说，把他滞留在南昌的理由说成是为了“准备与沪宁地区的军阀决一死战”。

因此，在1927年初，武汉和南昌事实上已成为国民革命军解放区域内的两个中心——前者是民主革命的中心，后者是反革命中心。

下述的情况是有利于蒋介石实现其反革命计划的：在北伐战争中，最忠实于革命事业的优秀的部队受到巨大的损失，加入军中的是那些转到国民政府方面来的军阀部队，他们并未经过整编和政治上的改造。这样一来，国民革命军便不断变质，而分裂的危险也就日益变为现实了。

在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支持下，一些图谋不轨的将领和军官便开始在军中制造人为的困难。他们拖延发士兵的军饷，把伙食标准降低而使士兵挨饿。等到士兵们开始产生不满情绪时，这些反动分子就乘机唆使士兵们来反对革命。他们向士兵们造谣，把军中供应的困难说得好象是由于工农的“破坏行动”造成的。与此同时，他们在许多地方公然以恐怖行为来对付革命组织。留在广东以“保卫后方”为名的李福林，奉了蒋介石的意旨，开始迫害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党员，破坏中山、江门等县的农民协会和广州市的工会组织，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禁止工人罢工。

其他图谋不轨的将领们的所作所为也不亚于李福林，例如：从1926年12月到1927年1月，在反动派手下的军队——驻浙江的第十六军和第十七军，驻安徽的第二十七军和第三十七军，在湘东的第三十三军——都出动过许多兵力，向农民协会和工人武装组织袭击达百余次之多。

虽然反革命势力已经在国民政府控制的区域内这样横行无忌，但蒋介石估计到要举行反革命政变的时机还未成熟，所以在口头上还大谈其为国民党的革命纲领效忠的鬼话，在麻痹人民群众的警惕性。蒋介石的鬼计阴谋就是：利用革命军的力量攻下上海和南京，好使他在那里和国际帝国主义直接合作，然后再用他的心腹部队从背后打击革命。

蒋介石直接指挥的部队约有官兵12万人、炮60门、机关枪150挺，这支部队逐渐向京沪地区推进。

武汉国民政府所掌握的部队也积极参加攻占沪宁的战役；这支部队共有战士和指挥官10万名，其中一部分兵力同时还在河南抗击直奉联军，以便打通陇海路并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而国民军早在1926年11月中旬已从甘肃、绥远南下作战了。

1926年年底，国民革命军在进攻中遭到很大的困难。

---

① 在这方面值得指出的是：从1926年12月到1927年1月间归附到国民革命军方面来的有56个将领，其中有51个是拥有土地500亩以上的大地主。他们的军队驻扎的地区主要是在他们的田产所在地，即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省。

在鄂西，除湖北军阀已集结了5个步兵师（第五、第七、第八、第十八和第二十六师）外，吴佩孚的残部也都调来了。1926年12月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开始向这些敌军进攻，但因兵力不足（只4个师）而不能胜任攻击的任务。浙皖两省的军事形势的复杂性也不亚于此。本来在1926年11月孙传芳的部队在南昌——九江战役中失败后，其驻浙部队第三师和第一师已向国民革命军投诚，这两个师的师长宣布浙江归于国民政府。第一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第三师改编为第二十六军。国民革命军指挥部为了巩固浙江的阵地，于11月底还派第一军的一个步兵师（5个团）去增援。可是孙传芳得到英美帝国主义者在武器、粮食和金钱各方面的援助，又凑成4个师并于1926年12月6日向国民革命军的第十九、第二十六两军进攻。由于这两个军没有经过彻底的改编，并感军械不足，在头几次交战中便吃了败仗，向西南方——江西边境退却。

中国人民的国外敌人——帝国主义者开始感到单凭军阀的力量已扑灭不了革命运动，因而大规模地公开进行对中国武装干涉的种种准备，但同时对各系军阀的接济并不因此而中止。

英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活动表现得特别“积极”，它在1927年1月通过了关于派遣侵华军队的决议，1月24日大不列颠帝国军务大臣便发布关于成立“上海防卫军”的命令，该军由邓肯少将①指挥。

英国在上海的驻军到1927年1月20日就已拥有官兵2670名、炮8门、装甲汽车8辆、飞机8架、轻重机枪共40挺②。

英帝国主义者还在中国的其他地区驻兵：在北京、天津一带有官兵1324人；在香港——3067人、炮30门。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进行的武装干涉有加无已，过后它还陆续派遣新的兵员来补充。在中国领海和内河的英国海军也增至14000名左右。

美帝国主义者在进行武装干涉中国的准备方面，也没有放缓它的步伐：在上海——南京——天津三角地带就驻有美军6000余名。中国领海内的美国军舰约有24艘。日本和法国帝国主义者也都增加了他们驻华的兵力。

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并没有挫折了革命军的进攻勇气。国民革命军指挥部集中巨大兵力来攻占沪宁地区，以彻底消灭孙传芳的部队。1927年1——2月间，从福建调来了第十四军和第一军，沿沪杭甬铁路进攻上海；而第二军、第六军、第十一军和第一独立师也在2月21日以前都开到芜湖——广德一线，进逼南京。实际参加进攻南京上海的国民革命军总数达8万人。

由于得到山东军阀的援助，孙传芳的兵力也大大加强。鲁军第八军（毕庶澄部）调来上海；第六军盘踞南京。而第七、第十、第十一各军总共6万人也都调到这里来了。

1927年2月中旬，国民革命军占领杭州和嘉兴（距上海80公里）后，上海工人阶级为了支援国民革命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总工会的领导下便举行了总罢工，罢工人数达36万。

---

① 邓肯（J.Duncan）少将在1919年曾指挥过进犯苏俄南部的外国武装干涉军，在武装干涉方面得到了“经验”，不过大家都知道，这种经验对于干涉者是“惨不堪言”的。

② 到1927年4月1日，仅“上海防卫军”便有官兵18763人、炮40门、装甲汽车12辆、飞机8架、重机关枪238挺、轻机关枪442挺。

2月22日，有800名革命海员也参加了罢工运动，开炮援助罢工的工人，使斗争变成武装起义。

但上海工人阶级和革命海员的武装起义于2月24日就被孙传芳的部队（他们得到英美海军陆战队的邦助）镇压下去了。起义失败的原因很多：国民革命军的进攻没有和工人阶级的起义行动取得配合；对敌军进行分化瓦解的工作做得很差（敌军中本来有许多士兵是同情革命的）；起义的行动还不够有组织；加上帝国主义和孙传芳的武装联合行动，结果起义是失败了。

英军的参战行动和对上海工人的血腥屠杀，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27年2月28日，武汉三镇及长江沿岸的其他城市工人宣布总罢工。

1927年3月15日，国民革命军向上海和南京开始发动总进攻。进攻沿着铁路和公路干线上进行。与进攻沪宁的同时，国民革命军的其他部队集中在安徽省的龙口地区。这就是第二十七军、第三十九军、第十五军和第三十三军，兵员共达8万名。他们的任务是攻占津浦铁路上的蚌埠到凤阳一段地区，但作战行动非常不果敢。其中许多将领，尤其是新近归顺的那些，在执行国民政府的命令时表现得十分懈怠。结果直到4月初才拿下蚌埠。鲁军只需反击一下，国民革命军在那里的优势兵力就会被迫退却，而夺来的津浦路上的那一段地方也就会双手奉还敌人了！

虽然如此，国民革命军对沪宁的进攻还是势如破竹。

3月21日，当国民革命军进到龙华车站时，上海工人又举行了武装起义。当天工人们已夺下城内最重要的战略据点——电报局、火车站和大企业公司。单在上海市区，就有215000名武装工人、手工业者和苦力参加巷战，而参加罢工者便达80万人。小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起来支援工人的反军阀斗争。当时不费一枪一弹就争取了敌方的两个警卫团，他们转过来邦助工人们去夺取重要的军事目标。这次起义的组织者是共产党人周恩来、罗亦农和赵世炎（罗、赵两同志不久之后惨遭反动派杀害）。在火车站里，铁路工人不放一列火车出站；在港口上工人不放一艘船只出港。这样就使孙传芳军队的后方完全陷入瘫痪状态。全上海除租界外都为工人阶级所掌握。上海的军阀部队悉数被歼：鲁军第八军全部12000名官兵中能逃回青岛的只不过2000人。由此可见，解放上海完全是工人阶级的力量。而这次胜利是用重大的代价换来的：工人们在对敌的残酷斗争中，牺牲者200余人，负伤者千人以上。

国民革命军部队到3月22日才开入上海，受到市民们的欢迎。在这里必须指出，蒋介石是极力拖延对上海的进攻的，虽则他早已具有足够的进攻的兵力，但他决定等他的心腹部队——第一军从福建调来。从蒋介石的这个阴谋不难看出，他是先让上海工人单独地与北洋军阀面对面作战，等到工人们的实力在血战中受到损失之后，再乘机向他们进攻。这样他就可以安然在上海确立反革命的统治了。

与进攻上海的同时，革命军也向南京猛攻，消灭了张宗昌的部队，3月24日便将南京占领；攻克南京的部队是属于武汉政府领导的第六军和第二军。

上海和南京的攻克是北伐中最伟大的胜利。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已大受动摇了。

在这种形势下英美帝国主义强盗便决定亲自出马，公然向革命势力进攻。张宗昌残部

刚退出南京，英美军舰便向城内市区开炮轰击，使数千人民遭到死伤；英美强盗们的借口是什么呢？他们借口在南京敌军撤退时有几个外侨被杀害，所以开炮来“保护外侨的生命财产”。正如3月2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布的对全世界男女工人、全体劳动人民、劳动青年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宣言中指出的那样：“一向对民族运动假惺惺、向中国革命卖弄风情的美利坚合众国，转眼间扯下了它的玫瑰色的面罩，暴露出它是大规模屠杀中国人民、毁灭和掠夺中国城镇的罪魁。”帝国主义者横蛮已极，毫不餍足，英、美、法、日、意五国于1927年4月11日还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惩办“袭击南京外侨”的肇事者，并要中国担负南京事件的责任。

帝国主义列强一面公开地进行武装干涉，一面暗地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寻找内奸。它们千方百计驱使民族资产阶级去破坏革命统一战线。

蒋介石正是帝国主义者所物色的对象。这个受全国人民唾弃的敌人及其党羽老早就准备出卖革命，而与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军阀相勾结。蒋介石早已不止一次地在行动上表现了其出卖革命的决心。

蒋介石把他的总司令部迁到南昌之后，便马上与美帝国主义者进行秘密谈判。美帝授意蒋介石：国民革命军一拿下上海后便马上举行反革命政变。美帝当时便许给蒋介石巨额的财政援助①。此外蒋介石也不嫌弃日本帝国主义的残羹，1927年2月间，他派戴季陶代表他到日本去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贷款。

革命叛徒蒋介石还与北洋军阀相勾结。1927年3月他给张作霖拍去一封电报，请张作霖来攻打武汉政府；同时蒋答应给张以财政上的及其他的援助。过后不久张作霖便派代表到蒋介石的总部来，共同磋商夹攻武汉政府的具体问题。

炮击南京便是帝国主义者给蒋介石的行动的信号。4月11日，蒋介石在大资本家和大银行老板们的宴会上公然宣称：“暴行不仅在南京发生，哪个地方的工农要共产，那里也要发生同样的暴行。”这几句话正适合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大资产阶级的口味，他们因此而赏给蒋介石3000万元。这就是送给屠杀数十万爱国志士的血腥刽子手的一笔赏钱。于是蒋介石借口为了避免外国人的误会，便要总工会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②。

此外蒋介石还和上海青红邦头子张啸林等大流氓联系，并拨出60万元给他们在长江流域各地区组织邦会。

对于供给蒋介石用来屠杀工人和暗杀共产党员的金钱，帝国主义和上海大资本家们是毫不吝惜的③。蒋介石在其沪海道署内设立所谓“工界联合会”，用来与总工会对立。“工界联合会”的走狗们到处散布谣言，说什么工人纠察队准备要冲进租界等等；实则这批受蒋介石雇用的匪徒自己却暗中准备将工人纠察队缴械并向总工会进攻。

在开始血腥屠杀上海工人阶级的前一天，蒋介石组成了一支拥有500支枪的流氓队伍来袭击总工会④。这时总工会的工人纠察队员共有2700名，分驻闸北、吴淞、浦东、南市4处。不料开入上海的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却霸占了闸北，4月11日下午4时，第二十

① 参阅M·尤利也夫：“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中革命军队的作用”，第109页。

② 参阅“中国问题资料”第九卷，第47页。

③ 同上，第53页。

④ 同上，第453页。

六军第二师便将通往闸北的十字街口一齐封锁起来，包围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4月12日黎明时分，蒋介石雇来的流氓队伍便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事先知道要向纠察队袭击的第二十六军，邦助他们进行这个毫无人性的袭击，开始缴纠察队的枪械。迄4月12日上午8时，纠察队被强迫缴械者达2000人，计：宝山路60人，天通庵路400人，南市100人、吴淞500人，其余则分别在其他地区，缴了械还不满足，白崇禧和周凤岐变本加厉，宣布全市戒严，发布关于勒令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和禁止罢工的布告①。

这张布告激起上海全体正直爱国人士的公愤。工人们在群众大会上要求取消戒严和停止解除工人武装的命令。南市、北市、闸北各区市民纷纷举行群众大会，决定提出下列条件来请愿：发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将工贼和武装流氓逐出上海，保护各级工会，请国民政府严惩那些下令将工人纠察队缴械的长官，保护上海总工会，禁止反动团体活动等等。

4月13日上午，上海劳动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队伍前往蒋介石的司令部请愿。这次请愿有10万左右的工人、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大学生参加。沪北、沪南等地工人也要到闸北去参加游行，但被军警阻拦不得通过。当请愿大队走近宝山路的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时，该师部士兵便从各里弄涌出，用机关枪向游行群众扫射，请愿群众中当场牺牲者百余人，受伤者数百人。闸北工人纠察队队长顾顺章也被杀害，从南市往南站去游行的工人队伍，也在这一天被该处驻军枪击，当场死者十余人。

接着匪邦开始进行挨户搜查和逮捕。蒋介石匪徒马上占领了上海市临时政府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解散了上海学生联合会，封闭了“平民日报”。蒋介石的喽罗一碰到佩带上海总工会的符号者就横加逮捕，而稍为表示同情共产党的嫌疑“犯”便格杀勿论。蒋介石就这样完成其叛卖革命事业的勾当！大刽子手蒋介石从此就以血腥的恐怖手段来对付工农。各国帝国主义者对他的行为极感满意。日本的“朝日新闻”在4月14日便是这样赞扬他的：“蒋介石此次在上海的制裁可造成更稳定之空气，而中止上海之仇外骚扰。”

国内的政治危机到来了。国民革命军从此分裂为二：一部分仍忠于革命；另一部分为反动派所掌握，倒向反革命营垒去了。而以扼杀中国革命的刽子手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政府也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

所有这些事件都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已退出革命营垒，而跟着地主和买办阶级的尾巴跑了。

（原载《1924—1927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军事史略）》）

① 参阅“中国问题资料”第九卷，第453页

# 〔附〕国民革命军北伐战斗序列

## 国民革命军第一次北伐战斗序列

| 职务 | 姓名 | 备注 |
|---|---|---|
| 总司令 | 蒋中正 | |
| 总参谋长 | 李济深 | |
| 行营参谋长 | 白崇禧 | |
| 第一军军长 | 何应钦 | |
| 参谋长 | 蒋伯诚 | |
| 第一师师长 | 王柏龄 | 由付师长王俊指挥 |
| 第二师师长 | 刘　峙 | |
| 第三师师长 | 谭曙卿 | |
| 第二军军长 | 谭延闿 | 由付军长鲁涤平指挥 |
| 参谋长 | 岳　森 | |
| 第四师师长 | 张辉瓒 | |
| 第五师师长 | 谭道源 | |
| 第六师师长 | 戴　岳 | |
| 教导师师长 | 陈嘉祐 | |
| 第三军军长 | 朱培德 | |
| 参谋长 | 黄　实 | |
| 第七师师长 | 王　均 | |
| 第八师师长 | 朱世贵 | |
| 第九师师长 | 朱培德军长兼 | |
| 第四军军长 | 李济深 | 由付军长陈可钰指挥 |
| 参谋长 | 邓演存 | |
| 第十师师长 | 陈铭枢 | |
| 第十一师师长 | 陈济棠 | |
| 第十二师师长 | 张发奎 | |
| 第十三师师长 | 徐景唐 | |
| 第十四师师长 | 冯轶裴 | |
| 第五军军长 | 李福林 | |
| 参谋长 | 刘　敏 | |
| 第十五师师长 | 李　群 | |
| 第十六师师长 | □炳章 | |
| 第六军军长 | 程　潜 | |
| 参谋长 | 唐　蟒 | |

第十七师师长　欧阳驹

第十八师师长　胡　谦

第十九师师长　杨源浚

第二十师师长　钱大钧

第七军军长　李宗仁

参谋长　胡宗铎

第一旅旅长　夏　威

第二旅旅长　李明扬

第三旅旅长　刘日福

第四旅旅长　黄旭初

第五旅旅长　伍廷飏

第六旅旅长　韦云松

第七旅旅长　胡宗铎

第八旅旅长　（钟祖培）

第九旅旅长　吕焕文

第八军军长　唐生智

第　师师长　何　健

第　师师长　李品仙

第　师师长　刘　兴

第　师师长　夏斗寅

教导师师长　唐生智军长兼

# 国民革命军北伐战斗序列

十六年五月一日

总司令蒋中正

行营参谋长朱绍良

## 第一路军

总指挥何应钦

第十七军

第十四军

第一军第十四师

第二十军第二十一师

第六军第十九师

第五十八团

第二十六军

第一军第二十二师

特务团及宪兵营

## 第二路军

总指挥总司令兼参谋长白崇禧代

前敌总指挥陈调元

第四十军

第六军第十七师

第一军第十二师

第三十七军

## 第三路军

总指挥李宗仁

前敌总指挥王天培

第四十四军

第七军

第七军第二师

第十五军第二师

第十军

第三十三军

独立第五师

第二十七军

挺进队
第三十军之一部

兵站总监俞飞鹏

参谋长黄振兴

第一兵站监　　第二兵站监　　第三兵站监

# 军队区分

第一路军

总指挥何应钦

第一纵队指挥官曹万顺

第十七军（第一师第二师）

第二纵队指挥官赖世璜

第十四军（第一师第二师）

第三纵队指挥官刘峙

第一军（第二师）独立第十师　独立第十旅　先遣队

第四纵队指挥官何应钦

第一军（第十四师）第二十军（第二十一师）第六军（第十九师）第五十八团

东路军前敌指挥白崇禧

第二十六军（第一第二师）第一军（第二十二师）特务团宪兵营

第二路军

总指挥蒋中正（参谋长白崇禧代）

前敌总指挥陈调元

第一纵队指挥官贺耀祖
第四十军（第一、二、三师）
第二纵队指挥官杨杰
第六军（第十七师）第一军（第一、二师）
第三纵队指挥官陈调元
第三十七军（第一、二、三师）
第三路军
总指挥李宗仁
前敌总指挥王天培
第一纵队指挥官叶开鑫
第四十四军（第一、二师　第一、二独立旅　第一独立团）
第二纵队指挥官夏　威
第七军（第一、三师）
第三纵队指挥官胡宗铎
第七军（第二师）第十五军（第二师）
第四纵队指挥官王天培
第十军（第二十九、三十师　教导第三师）
第五纵队指挥官柏文蔚
第三十三军（第一、二师　独立第五师）
总予备队指挥官王天培
第二十七军（第一、二旅）
挺进队第三十军之一部

# 〔附〕北伐战争中的独立团

周　士　第

（上略）

## 创　造　铁　军

大家都知道，在北伐时代，革命军中有一支战斗力最强、建功最大的队伍——独立团。这支队伍的领导者，就是叶挺同志。

民国十四年冬，叶挺同志被任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独立团成立于肇庆，是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下，建立起来的。团中都是新兵，连以上干部多是共产党员。叶挺同志用他全部精力去练兵。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就练出了一支健儿。

人们只知道第一次北伐开始于民国十五年七月，但是，在五月间，叶挺同志这支队伍就已出发了。当时，反正过来的唐生智军，在湖南被北洋军阀进攻得很危急，独立团被派为北伐先遣队，出发后沿途接到唐生智告急的电报。叶挺同志亲率着独立团，冒着炎热的天气强行军，当时全团只有一匹白马，给害病人员骑着，他同战士一样的走路。

六月一日黄昏时，到达了安仁县城。抵达后，驻军唐生智部的张团长对叶挺同志说：敌人四个团今天已占领碌田镇，有进攻安仁企图。叶挺同志就要率部立即开到前线，但张团长说他的第二营（营长王东原）在前面警戒，敌人今夜决不会进攻，坚留叶挺同志和连以上干部会宴，叶挺同志为慎重起见，派第三营去协同王东原营警戒。深夜，饭还没有吃完，接到第三营长的报告："王东原营已垮了，职营已与敌接触。"叶挺同志沉思考虑了一下，就决定马上出发。他在地图上与大家研究了情况后，对我说："你率第一营及特别大队为左翼队，我率第二营及第三营为右翼队，明天拂晓攻击，中午十二时以前，你要打到这个村子与我会合。"他用手在地图上指着碌田北面这个村子。

接着他又说："我们是人民的武力，又是北伐的先遣队。我们不但代表了广东革命军，而且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们第一次打仗，我们一定要打胜！"他这个动员口号，给大家增加了无限的力量。

天还没有大亮，我们就开始攻击了。经过很激烈的战斗，敌人全部被打垮。十一时左右，我和他就在指定的村子里见面了。正在搬运敌人枪械、处理俘虏的时候，我们忽然接到一营一个排长万献廷的报告，说他率领全排已向北追击到攸县城南岸，敌人在城内很混乱，浮桥已被我控制。万排长没有命令而自动追击，叶挺同志极称赞万的机动性，立即率部队出发。占领攸县后，他带着干部去看地形道路，布置阵地，回团部后，他踱来踱去思考，就下令将浮桥撤掉，并通报全体：如敌来犯时，只能向前打，不能向后退。

敌人原来是想乘广东北伐军未出发前，派谢文炳等率四个团攻击唐生智侧背，并切断唐与广东之联络线以瓦解唐军的。但未料到叶挺的部队这样快就赶到了。这一次胜利战斗，解救了唐生智军之危，稳定了湖南战局，巩固了北伐基础。事后，唐生智打电报给叶挺同志，其中有"足令敌人胆寒……不仅巩固湘东，而且稳定了战局，此皆兄之功也……"之语。唐并要下令枪毙退却的王东原，以表他的军纪严明。叶挺同志电唐力保，王始免于死。

## 百战百胜的独立团

七月间广东北伐军正式出发，独立团拨归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指挥。接着就向泗汾战斗，独立团担任正面攻击，叶挺同志派第一营由豆田过河攻击敌之侧背。前进中，适与向我迂回之敌二千余遭迂，破之，拊敌背，敌溃，独立团追击，首先进占醴陵城。

八月，十二师进攻平江城。敌守将陆沄，是吴佩孚军中素称善战的将领，他的队伍，都是吴部的精锐。并在平江城南端之鲁肃山一带，构筑强固工事，遍埋地雷。陆沄曾自夸平江城为金汤。

我军进攻方法，是以三十五团在正面佯攻，三十六团迂回，独立团则从右翼去包围。因为有农民引路，当独立团及三十六团从山径绕到平江城下时，陆沄还在司令部打麻将。独立团乃从敌人后面进攻，经过无数次肉搏，将敌全部歼灭，陆沄自杀。

占领了平江城后，独立团又为先锋，继续进击，以强行军占领中伙铺车站，切断了粤汉路岳州方面敌之退路。接着就是向汀泗桥进攻。第四军六个团都向这天险的阵地攻击，攻了一天一夜，没有大进展。后来调独立团从右翼包围攻击，敌人遂全线溃退。

汀泗桥战役后，独立团在叶挺同志率领下单独向咸宁追击，到达咸宁南岸时为水所阻，仅有一条铁路桥可以通过，形势之险较汀泗桥实有过之。叶挺同志看到这里敌人虽多，但极混乱，遂在征求各营长意见后，决定派第二营从桥上冲过去，以两挺重机枪掩护。这几百个健儿，勇往直前，虽然死者伤者纷纷落下河中，但仍前仆后继的和敌人肉搏，结果终把守桥敌人打垮。这时，叶挺同志即亲率部冲过去，又将守城之敌击溃，占领了全城。

当叶挺同志进入敌人的司令部时，司令部的电话还在响，他拿起来听时，原来是贺胜桥打来的电话，说是吴佩孚已到了贺胜桥，向这里询问汀泗桥方面的情况。他们还不知道我军已经占领了咸宁城，足见在叶挺同志率领下的队伍进军之速。

由此也可看出：倘若叶挺同志在当时不机断专行，进行追击（张发奎曾来命令要独立团不得追击超过汀泗桥十五里）和进攻咸宁，待吴佩孚带援兵到咸宁后，利用天险固守，则战争形势又不知如何变化了。这是为当时第四军军长陈可钰所承认的。三天后第四军又向贺胜桥进攻，独立团担任铁路及其右侧的攻击。当独立团突破敌人阵地进入纵深已颇远时，后面的部队还没赶上来。由于向前攻击过猛，有些残余敌人掉在后面没有肃清，叶挺同志遂遭到四面敌人的射击。此时又接到第二营报告称：营长已受重伤，现在敌四面包围中苦战。第五连攻到吴佩孚指挥阵地附近，伤亡过半，请增援。此时，叶挺同志手中只有一个连了，情势十分危急。但叶挺同志在此时仍然镇定如常，经一番沉着的思考后，他对我说："你到前面去指挥第二营与第一营，坚决向吴佩孚指挥阵地攻击。现在我们只有向前找出路，左边右边后面都没有路。在我英勇的战士猛攻后，终把吴佩孚的指挥阵地占领了。于是，叶挺同志乃指挥着部队乘胜向贺胜桥攻击，在他英明的指挥下，数万敌人垮下，真是象山崩一样。吴佩孚退到贺胜桥镇上后，还斩了一个旅长的头挂在街上，但是也不能挽救他的失败。我们进入街上时，那个旅长头颅的血还在滴下。

九月五日，以叶挺率领的独立团为先锋，革命军打到了武昌城下。

开始攻城时，第四军各师及第一军第二师等，都挑选奋勇队爬城。独立团也指定了第一营为奋勇队，担任大东门及通湘门的爬城任务。在爬城战中，其他师的奋勇队很多没有进到城墙，就停止了，只有独立团第一营进到了城墙，并且树起了四个梯子。但是，因为敌人十分顽强，爬上城去的战士大都英勇牺牲，数次猛冲，都未攻入。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在六日四五点钟的光景，陈可钰突由洪山军部打电话给叶挺，说据第二师（师长刘峙）报告，他们部队在鸡叫前已进城了，叫叶挺同志赶快率全团进城。闻悉，叶挺立即率第二、第三两营及特别大队向大东门前进，但是，当走到城附近时，即隐约看见守在城上的还是敌军，不是第二师的队伍。正在怀疑中，这时又接到第一营长曹渊的报告，其中说："职全营现已牺牲殆尽，仅存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置请指示。"报告上

有曹渊署名，但渊字的最后一笔划得长长的。原来当他写完了这报告时，头上也中了一个子弹而牺牲了。这时叶挺同志才知道，第二师进了城是假的。他立即到军部查明事实真相：原来是第二师估计叶挺的独立团一定会攻入城，他们就先捏造说在鸡叫前他们已进城，以夺取先攻进城的功劳。叶挺同志对此事极为气愤，事后他向四军军长提出："从广东出发到现在，他们（指刘峙师）没有看见过敌人，敌人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他们这一行为不仅有假造军情之罪，而且有陷害同志之咎，必须严重处罚。"

爬城失败后，独立团开回南湖，担任围城任务。叶挺同志日夜都计划如何攻城，他想了一个办法：坑道进攻。他找到一列火车，在南湖附近用钢片沙包装甲起来，开到通湘门附近，掩护工人坑道作业。但这一计划很快就被敌人发现，立即集中火力在通湘门掩护一千多人冲出来破坏坑道。但敌人终未得逞，经过一场恶战后，在叶挺同志指挥下，敌人很狼狈的被击退了。十月十日总攻武昌城，独立团终于在通湘门附近首先用云梯爬城，并占领了蛇山。武昌城遂最后被攻陷。独立团进城后，肃清了敌人，就集结于蛇山。驻防后，部队从不进民房，从不"打搜索"，其纪律之严明，为人民所称道。因此，当革命占领了武汉以后，两湖人民给了独立团一个光荣的称号："铁军"。

这就是铁军之来源。

## 叶挺的队伍为什么会成为铁军

独立团为什么会获得了铁军的称号？为什么在北伐战争中建立了如此伟大的战功呢？民国十五年冬革命军占领武汉后，叶挺同志曾经在独立团的干部会上总结了北伐战斗经验。在会上，他讲了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能够建立这样的伟大战功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独立团是共产党的军队。因为有了共产党，我们才能成为铁军。如果我们团内没有这样坚强的共产党组织，没有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则不论那一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够胜利，是很成问题的。如果我们不是共产党的队伍，人家会不会叫我们作铁军呢？我想是不会的。

独立团之所以能够百战百胜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这支队伍有着一个英明的领导者——叶挺同志。但是对于这一点，叶挺同志却是极端谦逊的。他在每一次胜利后都把功劳归之于党、干部和士兵。他时常对大家这样说："战功是大家努力得来的。""我们的每次战斗都是得力于你们。我深深感觉到，每次战斗中，当我下了命令之后，我就跟着你们大家走了。比如，攸县的占领就是排长万献廷同志在指挥我，贺胜桥战斗最后阶段就是第二营指挥我，而不是我在指挥他们。"

独立团之所以成为铁军的第三个原因，是在整个北伐中间，它始终都保持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特点。从独立团成立起到改为七十三团，虽然在番号上是隶属于第四军，但是这个团干部的调动和任免，都是决定于共产党，而不是决定于军长师长，虽然在形式上还要经过师长军长的批准。这个独立自主的原则的坚持，必须归功于叶挺同志的坚强不移的斗争精神，这个在党的领导上的独立性，到后来差不多成为合法的了。

我们必须肯定的说，由于有这些独立性，独立团才能始终保持和发挥其战斗力，保持和发挥其为人民服务的立场，而始终得到人民的拥护，成为铁军。比如，从碌田战斗起到

占领武汉，团中共伤亡排级以上干部达六十余人，士兵达一千二百多人。如果不是由共产党调人来补充，是无法维持战斗力的。如果没有共产党员做骨干，是不可能有高度的战斗意志的。如果不是有人民的拥护，到处有人民来参加军队，和独立自主的成立新兵连、新兵营、特别大队等，则也是无法维持和进行这样激烈的战斗的。因此，有一次张发奎对叶挺同志说："你们这个独立团真是'独立'的。"叶挺同志就立刻回答他："是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独立，我们现在才能坐在武昌城内说话！"

的确，正是有了这些独立性，所以这支队伍才能一天天更加走向人民那方面去，成为以后红军第一军团的基础。

（摘自周士第：《回忆叶挺同志》，原载《中国共产党烈士传》，现题为编者所加）

# 湖南省工团联合会致北伐军的信

（一九二六年八月）

迳启者：北伐军兴，敝会领率所属工会工友参加讨吴工作，以尽工人阶级应尽之责任。值兹战事正烈，输送重要，特组织大批运送队，以备军需。兹有敝会运送队第×队，派遣为贵军运送军实。除已切嘱该队队长督率所属散夫慎勤服务外，特此缄达贵军，希赐指示，并望力予保护为荷。

再，敝会运送队带有宣传品，沿途散布，以唤起民众，赞助北伐军民合作之大成功。

此致

贵军长官

委员长　郭亮①

（转自《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

---

① 郭亮同志，湖南长沙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湖南早期的职工运动领导人之一。在1922年至1923年初的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中，他积极领导工人斗争，深得工人的爱戴。1922年11月1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毛泽东同志任总干事，他任付总干事；1923年4月毛泽东同志因赵恒惕的迫害离开湖南，他继任总干事；1926年9月，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改组为湖南全省总工会，12月在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湖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1928年3月27日为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于29日被害，时年二十八岁。

# 汉阳兵工厂工友罢工响应革命军通电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

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各工会、各社团、各报馆暨全国人民公鉴：

汉阳兵工厂是中国最大的制造枪炮厂，吴贼佩孚据为私有，榨取我们工人的血汗，供给他南征北讨杀人的利器。自去年七月再起以后，压迫我们工人做日夜班，不准我们休息，稍有怠忽，即加以贻误戎机的罪戾，从没有丝毫顾惜到我们工人的生命，只求遂他制造内乱争夺地盘的私欲和武力统一的梦想。湖北人民处在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所豢养之直系军阀专政之下，苛捐杂税百出，人民所感受的痛苦，实不堪言，更兼水旱频仍，流离失所，即中产阶级亦均濒于破产，皆吴贼有以致之。吴贼实湖北人民的公敌，尤其是杀戮我们工人的刽子手。忆自"二七"大屠杀以来，逮捕监禁和杀戮工人的领袖，解散我们的工会，剥削我们的自由，使武汉工人屈服于吴贼权威之下，含羞忍痛，敢怒而不敢言者，瞬将三年了。我国民政府鉴于北方政局之日益不可收拾和民众的日益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同时更因革命势力的澎涨和民众的要求，为革命的利益——民众的利益，乃兴师北伐，会师武汉，声讨吴佩孚，故沿途倍受民众欢迎和得到民众实力邦助，以保障北伐军的胜利。现在攻克武汉在即，武汉民众咸举手相庆北伐军的胜利和吴佩孚之将伏诛，但是吴贼佩孚雄心未死，犹冀死灰复燃，勒索军饷，直同土匪绑票；惨杀学生，指为通敌。溃兵归来，无法安置，更拟决武昌武泰闸背城借战，置湖北全省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惟吴贼之敢于为此，实有恃于汉阳兵工厂能替他制造防御的利器而无恐，我们兵工厂工人为自身的利益、为湖北民众的利益、为革命的利益，此时实有断绝供给吴贼枪械的必要。因自今日起，宣布总罢工，再不为吴贼造枪械攻打我们革命的战士。

我们的口号是：

一、武汉工人大联合！

二、保障北伐军胜利！

三、打倒吴佩孚！

四、打倒英帝国主义！

五、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转自《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

# 〔附〕湖南工农直接参加北伐战争之一些事实

协　　夫

所谓"武力与人民结合，武力变成人民的武力"，这自然是国民革命在军事上之一重要过程。但革命战争不由人民直接参与，人民不自己武装，不自己造武力，则所谓与人民结合的武力，变成人民武力的武力，仍是一种偏畸的非真正的人民武力，而由这种武力造成的革命，仍是辛亥式的军人包办的革命。

此次国民政府兴师北伐，姑无论其兵力是否足当北伐之任，能否扫清军阀势力；但如果这样重大的国民革命战争不让人民直接参与，或人民袖手不来过问，则我们可断言这次北伐决不能成功，或至少可说北伐的时机还未成熟。因人民尤其是大多数的工农群众如果不懂得北伐之意义而不愿意北伐，则这种北伐并不是国民革命的北伐，而是少数军人的北伐。

事实的表现，国民革命军此次由广东出湖南，克岳州，据武汉，一往直前，逢敌皆摧，这虽由全国政治环境所给之顺利和国民革命军战斗力优越所致；然人民，尤其是湖南的工农群众之直接拥护战争，参加战争，则确为北伐军此次伟大胜利中不可忽略之一事实。

下面的记载，便是这次北伐军出湖南时，湖南工农群众参加战争之几件比较显著的事实：

（一）泗汾之役。七月十一日拂晓北伐军开始分三路进攻，左翼由栗山坝出铁河口；右翼由美田桥出湘东老关，中路由泗汾直下醴陵城。我们有平民救国团（工人、学生共同组织）农民武装队三百余人分布于栗山坝、泗汾一带。当北伐军进攻时，敌人扼铁江而守，泗汾桥有机关枪对河拒射，河中船只尽被敌掳，北伐军殊无过河机会。此时我武装队将松树炮分置于敌人后方之高阜处，实施袭击。起初一两炮，敌不动，武装队乃更以鸟枪、梭标等直接进攻敌人阵线，复以革命军旗帜招摇四周以惶惑其军心。至此，敌军改变其注意力于武装队，北伐军遂得乘机分两处渡河。渡河时，敌军尚严阵不退，后一面北伐军向泗汾桥上冲锋，一面武装队两旁抄击，敌始大败逃走（渡河之军队由武装队领导从山径中突出敌人后方，敌全不知从何而来，乃溃散）。此次掳获敌团付一名，营长二名，连长四名，兵士三四百人，毙团长一名，营长二名，拾弃枪二三百枝。而北伐军方面（第四军独立团）只死连长二人，兵士十余人……

（二）长沙之役。七月八日北伐军开始总攻击后，长沙工人即准备在城内袭击叶开鑫军，响应北伐军，后以敌军众多，缺乏武装，未果。至九日叶开鑫逃走，长沙人心惶惶，湖南工团联合会乃组织一千人之工人保安队分守于八门及城内要道，与革命军游击队共维城内秩序。后敌军之自湘潭溃退入城者，多被保安队缴械遣散，工人因此受伤者且有数人，然长沙此次之未经北军蹂躏安全度过，则全赖长沙工人之力。

（三）献钟之役。七月十五日，蒋旅由前线北退时有溃兵数十到献钟筹款，当地国民党分部即率领本地农民与溃兵激战二小时，毙敌二名，夺枪八枝，生擒十余名，业于十六日枪决矣。……北乡（平江北乡），有农民数十以锄头攻打北兵，打死数名之后，因众寡

不敌，卒被北兵枪杀多名。又革命军进平江城时，平江西乡一带农民自动的组织运输队，鹄候革命军至两日之久，于此足见农民恨北兵之深与欢迎革命之热烈也。

（四）平江之役。革命军于八月十九日开始总攻击，此地农民得信即携各种旧式武器及锄锹等齐集于托莲。拂晓，革命军进攻白石岭，农民军即大举邦同围攻；冒弹冲锋，勇猛登山，敌军大乱，当获枪弹无算，毙敌甚多，并进至离白石岭三十余里之青水岭，敌军节节退却，死亡载道（农民所获之大炮枪弹等概交革命军收领），农民因攻击过猛，阵亡者至十三名之多。驻晋坑三都段之敌军由前线溃散，仓皇逃遁，农民曾某，见一荷枪之逃兵经过，即持扁担追击，该兵遂开枪洞穿曾某之腹，曾未知痛楚，犹以扁担猛击该兵，杀之并夺其枪。又思村余某，亦以当革命军向导被敌杀死。北乡及西乡浯口、梓江一带农民皆纷纷起来杀敌。计此次敌军被民众杀毙者，不下三百人，农民死者亦二十人，其参战之猛烈，已可概见。

此次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参战，均系予行组织：如冲锋队、交通队、暗探队、向导队、宣传队、慰问队等等，应有尽有。冲锋队冲锋杀敌，战争中收效甚著。交通队除报告敌情于革命军外，曾以门板、木材等件作船筏渡革命军于白湖口，致敌军不及退却而被缴械。暗探队在侦探敌方军情外，并捕杀敌兵十余人，队员李春生，工人也，探知敌旅长陆沄败后逃至城内下西街萧曹庙，当即报告革命军派兵围剿，至则陆已自杀。向导队之工作，其最著者，如由横槎引我军渡狮子岩，潜至县城北街，敌军尚不知道，因而全军被掳。运输队员为革命担运粮糈子弹等，均熙熙不稍露倦容。有输送至数日者，有至数十里者，有自请运输毫不索报酬者。宣传队除平日在本乡散传单，贴画报、标语外，战时并随革命军到前线宣传，鼓励军心，号召民众。慰劳队送茶送药送粥送饭，亦上前线安慰军士。疑兵队则于山谷间遍置松树炮、鸟枪、爆竹等不时燃放，有时并鸣号擂鼓以乱敌人军心。破坏队则在战时毁坏敌人军用电线，拆断桥梁，断敌交通。

（五）临湘之役。临湘民众久苦北兵盘据骚扰之虐，此次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大有乘机袭击北军后方之意。当汨罗收复时，北军兵队溃经临湘，民众即各持锄镭在忠桃两区、白荆桥、聂家市及县城沿江一带埋伏，遍树青天白日红旗，以为疑兵之计。其时北岸之北军方疑革命军已渡河，乃亦相率渡河，其时民众与县长所带之清乡营乃协同迎击，血肉相搏，炮声隆隆，四处民众更群起响应，敌军不知虚实，无心恋战，乃弃械而逃。计此役缴获步枪五百余枝，杀敌数十。（见九月六日“湖南民报”）

工农群众之直接参加战争，上面的记述，不过就我们所知道及最显著者而言。至于箪食壶浆，向导运输等等间接有助于战争之事，是这次北伐军经过湖南时农村城市中一般现象。

人民邦助战争，参加战争如此，所以国民革命军处处胜利。人民所以肯来邦助战争，参加战争，这自然因为国民革命军处处能与人民结合，能拥护人民利益，能站在人民一方面，实行与人民的公敌——军阀、帝国主义者决斗所致。所以国民革命军欲求最后的胜利，就在始终与人民结合，始终拥护人民利益，始终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决斗而取得人民的同情，使人民尤其是大多数的工农群众，也来拥护并参加这样的决斗。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四日。

# 〔附〕从广州所闻北伐军之胜利与民众

叔　坚

北伐军在一个短时间内，由醴陵而平江而岳州而汀泗桥，以至攻下两汉，这种胜利的呼声，已经普遍全国。四、七、八军的捷电，几于天天报纸上都有，而广州且已祝捷两次了。拿在主张军人革命论的人看来，必然更高兴地叫道“当今天下舍我其谁”，这是一些革命军人之合理的自负！不过据我来看，从广州到汉口，没有一次胜利没有民众的力量。而在广州所得的这种材料，特别比其他地方为多。所以这次人民援助北伐军的情形，实有公开于国人之前的必要。

大家知道从广州出发时，一切夫役，都由民众充当，而省港罢工工人还组织得有几千人的运输队。一入湖南，“农民特别欢迎——工学当然不在话下——同时我们得农民邦助，尤为不小。如此次进攻醴陵时，该地农民到处替我们报告消息，及在醴陵组织救国敢死团（此中成分为工农学，以农为多数）予备我军进攻时在敌人后方捣乱。……同时株萍铁道之工人，早已替我们准备一切。其时有赣军唐福山部傅应珩一混成旅由萍乡开至醴陵应战，该铁路工人待我们将攻醴陵的前几天，把此铁道湘赣交界地的湘东铁桥炸断，掘断铁道数处，以仃止敌人之运输，而扰乱其军心。故此次醴陵之役，我军之战斗能力固强，而能于数小时内把万余敌军冲散者，得株萍铁道工人之邦助，诚不小也。”（第三军萧文谔来信）。看民国日报九月十一日所云：“醴陵一役，得民众之援助甚多，故各军政治部及各级政治部甚注意于民众之联络”，便知此种说法，真实不虚。

平江之役，总司令部政治部前线宣传员电云：“平江县附近河流两岸，农民协会诸同志，早已组织敢死队数百人，乘我军进攻时，扰乱敌人，并为向导。”（民国日报九月三日）。又第十二师政治部报告云：“……当场击毙敌将陆军中将……及武汉警卫司令陆沄，所有东西两面狮子岩鲁肃山等处之敌，被我军……次第歼灭。是役计俘敌兵千余人，中下级官佐四十余人，毙敌旅长一，以下官兵无算，夺获大炮二尊，迫击炮二尊，水旱机关枪各数架，步枪千余枝，炸弹数十颗，其余弹药马匹军用品无算。在此役中，我军伤亡甚微，我师及独立团官兵，为党国奋斗精神，充分表现。我部平时工作，大收效益。尤其是人民组织长矛队，加入作战，更实现军民合作之旨。”（同上）以后广州民国日报在九月二十八日载出平江之役与人民参战的消息，非常详细。一则说：“此次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克复平江，得农民实际参战之力甚大。”再则说：“此次胜北伐利夺得平江，其力量全在农民。”在国民党湖南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中，平江县党部报告此中情形甚详。该报告不是说“农民大举邦助，……冒弹冲锋，勇敢登山，敌兵大乱”；即是说“农民因攻击太猛，阵亡者十三人”。不是说“北乡西乡浯口梓江一带农民亦纷纷杀敌”；即是说“此次敌军被民众杀死者，不下二百余人。”其“参战之猛烈，勇敢之精神，牺牲之重大，已可概见”了。

再看岳州之战。八月“二十日晚，有岳平一带农民协会土著农民，侦知岳州方面敌军惶急万分，军心涣散，特向李军长告密，请神速攻岳，并自愿领导，由平江北乡渡过微水黄芽山而扑岳州，敌军不知有此小道，故未设防御工作，比较容易得手。李军长从之，遂于二十一日黎明，即取小道由农民领导，抄攻岳州。沿途路虽难行，幸未设防，二十一日晚十时，李军长军部即抄至距岳城十里之某地，出其不意，猛力进攻。敌军惊为天降，纷向云溪、路口铺、五里牌、羊楼司一带溃退。叶逆开鑫所部不愿与北军同退，反戈投诚者二千余人。余逆荫森全部则被截断，全行缴械。中路之李何两部闻耗，亦猛向岳州前进，上下夹攻，二十二日早，即收复岳州。”（同上）

又“据最近长沙方面调查，粤汉铁路之工友，对于敌军，曾作种种妨害其军事行动之工作，如破坏路线，截断电信等。且于长沙未攻下之前，曾提议总罢工。虽因经费问题未能实现，然其拥护革命之热诚，已足以代表民众一般之意志了”。这是总政治部所发武汉总攻击以前之宣传大纲（见民国日报九月十三日）上说的。

至于湘民争先恐后，邦助运输，更是极普遍的事实。所以华侨日报说：“湘人皆乐为运输，可无在吾粤募夫矣”（九月三日）。“且沿途各地民众，均备茶粥供给。士兵均无饿渴之患，忘其疲劳，对于作战，益加奋发，故能一往无前，迅奏肤功。”（民国日报九月十一日）

汀泗桥一役“北伐军连下冲锋十二次，均为叶部之机关枪队射回。彼此只隔一桥，声问相通，卒无法越雷池一步。桥下积尸，不可数计。直至接战之第三日，已得咸宁之右翼军李品仙师，会同七军一部，借农民为间道，竟能从咸宁取道簰洲司，越岭以击叶军之背。初时叶部尚未知南军已袭其后，以为吴佩孚援兵开到，故不及防。迨李品仙大队驰至，逐渐迫近，殆如飞将军从天而下，于是腹背受敌，大惊失色。此时前后夹攻，叶军几于全军复没而叶氏几于成擒。”（香港华侨日报九月七日）。

同样，两汉民众也是对北伐军尽量援助的。“当北伐军于未克复汉阳之前，汉阳兵工厂全体工人，为制吴佩孚之死命以援助北伐军起见，经实行于前月一日起，全厂工人举行总罢工。及至现在北伐军克复汉阳，经蒋总司令正式委任邓演存为汉阳兵工厂正厂长，许有道为付厂长后，该厂全体工人除开会欢迎革命军及新厂长外，并已实行全体复工。”（广州民国日报九月二十日）“为革命军制造枪炮”（同前九月二十一日）。路透社汉口电亦云：“据汉口沿铁路一带传来消息，南军颇受民众欢迎。人民纷纷馈食，并愿为向导，追逐北军。”（同前九月十六日）

这样看来，获得胜利的人，祝颂胜利的人以及主张军人革命论的人，都不可忘记此次北伐军胜利中之民众的力量。假如能看重人民的革命和战斗力，实际把宣传组织的工作弄到更深刻时，我相信还不止于此，必然会各地自动的暴动起来，夺取政权呢！

（原载《向导》177期，1926年11月4日出版）

# 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文件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月二十四日）

去年二月中央局因下面两个顶严重的问题，在京召集特别会议，这两个顶严重的问题是：

一、独秀同志因病势沉重，已经月余与中央局隔绝消息；同时上海地面，反动形势日愈严重，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阶级，右派，醒狮派，工贼，各种反动势力，互相联合出全力以搜索我党中央机关，国际来电主张中央迁移，中央局处在这困难的情形之下，应赶急设法应付。

二、现时的政局，是中国革命发展中非常紧急的时期，是反动势力联合向民众势力进攻的时期，英日帝国主义者竭全力以资助直奉军阀向国民军，国民政府，人民进攻，如果吴张势力战胜，全国政局必定转到极反动□局面；那时仅广州政府孤军作战，处于四面反动势力包围之中，也许因此而失败。另一方面，如果国民军现时能支□得住北方现有的局面，广州政府在几个月的相当准备后，必然对于北伐更有胜利的把握，会师武汉与北方革命势力相联合，造成国民革命胜利的局面。所以现在这个时期，实是国民革命的生死关头，我们应迅速认定什么是我党目前在政治上第一的责任，以及如何支持北方的危局，如何巩固广州国民革命的根据，皆是急待总合南北同志的报告而速决定的问题。

到会同志十二人，计中央委员七人，C.Y.代表一人，北方区重要同志二人，粤区重要同志二人，开会四天，会议七次。自本月二十一号至二十四号，当会议初开，即接仲甫同志由泸来电，谓已经能扶病视事，此消息传来，对于这次会议之第一项问题，已减轻其严重分量。会议问题遂集中注意于“目前的政局与我党主要的职任”一案，会前中央及南北负重要责任同志已有数日的非正式讨论，正式开会时反复辩论又经二日，方始作最后的结论。

这个会议，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广东政府是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只有他的努力之发展，可以推动全国民众及接近民众的武力更加爆发革命的火焰，而且广东政府也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煽动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暴动，才能增强自己的声援，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动势力所包围而陷落。广东政府不幸而失败，则中国将经过一长期的反动，给中国国民革命以巨大的打击。北伐的号召，不是什么拥法护宪，而是真能解放农民的痛苦；中国的革命，工人固然站着领导的地位，然非更取得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参加，不会成功。全国农民现已走到一个准备暴动的时期，所需要的就是我们去组织，所以我们说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不仅是在广东做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处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

在关于现时的政局与C.P的主要职任决案内，特别指明广州政府是中国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广州政府北伐关系之重要，以及农民问题在现时之特别严重，这两点非常重要。不

维持住北方国民军的局面，以接应广州政府之北伐，则广州政府必陷于孤立；不努力取得农民，建立工农革命联合的基地，则工人亦将陷于孤立。然而各地同志在执行这决议案时，须注意勿生出下列之误解：一、只注意广州工作，农民运动工作，而放弃其他工作。二、以为有了国民党国民军的政权，而后可以发展工农运动。这个决议案的真意，是要使同志们对于广州政府农民运动国民党国民军政权之重要格外深切了解，在党分配他的力量时，轻重缓急，有所选择，但并不是叫我们只注意广州工作，农民运动工作。非有全国各地革命宣传之响应，则广东是孤立的；非有城市小资产阶级学生商人之参加革命，则工农联合战线亦是孤立的；国民党及国民军政权所在之地，固易发展工农运动，另一方面，也只有工农运动的发展，更能促进国民党国民军政权格外左倾，望各地同志于执行上之决议案时十分注意。

议事日程共有十一项：一、现时的政局与党的主要职任；二、中央地址问题；三、国民党问题；四、北方军事政治工作问题；五、广东问题；六、三特区工作；七、河南问题；八、铁总问题；九、五一节在广州召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劳动代表大会问题；十、设立长期党校问题；十一、反吴宣传问题。

## 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

五卅反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本是各阶级极大的联合战线，可是这一联合战线，不久便分裂了。中国的资产阶级，一方面被向来所没有的无产阶级群众运动所恐吓，另方面受帝国主义者假意的亲善所贿买，渐渐的脱离民众（“民众”下二字不清，似是“的国”。——编者注）民运动，以至于工人阶级单独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而流血。资产阶级分裂国民运动之后，虽然向来是趋向于革命的学生界，也就开始阶级分化，工人运动□群众化，不但没有□学生界更加团结，反而使他们也起分裂。——他们小资产阶级的矛盾性，到此便完全发露，学生界中现时从共产主义派到国家，主义派各自反映中国社会中各种阶级的思想，〔 〕〔 〕共产主义派代表工人阶级；国家主义派则代表买办阶级，徘徊二于民族利益与帝国主义之间。

中国无产阶级，却还并不因此而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及学生界中的一部分已经得到帝国主义的真正让步，其实资产阶级的分裂国民运动，离开国民革命先锋的无产阶级，——就是在资产阶级利益的观点来论，也是太早的。这种分裂的发生，仅仅因为资产阶级希望出卖群众运动，便可以得到帝国主义的让步，可是资产阶级完全是自己骗自己，实际上所得的不过是一九二九年关税自主空言应允，和法权会议的骗人把戏，这种客观状况之下，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真正妥协，暂时还没有可能，所以以后资产阶级的对抗帝国主义，还是不可免的。

然而事实上如果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要有真正的斗争起来，工人阶级立刻便要陷于孤立隔离的地位，如今已经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者方面，只要有小小一个真正的让步，中国民族运动的分裂起分化，一定要厉害起来。这种状况之下，如果我们的党不能对于自己和自己的阶级，正确的指出农民问题的意义，那这是我们的党不能尽自己的天职，——没有做工人阶级的有觉悟的先锋军和领导者的能力。因为农民是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最彻底一贯的联盟军，他们亦是需要国民革命有彻底的成□的，如今的政治总像和革命前途，已经使这一问题成为极严重的问题。五卅以后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的孤立隔离，更证明农□斗争的

奋起，是国民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根本便是对于农民工人无限制的剥削，农民和工人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最主要的目的，便就是避免这种剥削，所以只有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足以引导国民革命到最后的胜利。

我们的党在前次大会及最近的中央扩大会议上，已经讨论过农民问题，并且有了大致的决定。现在我们应当归纳事实和工作的结果，可以说：只有国民党或国民军有政权的地方，这种议决能以实行而有成效。从发展农民运动的观点上来论，国民军和国民党的□权，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中国共产党应当特别努力于各方面的工作，以求推广这种政权于各省，以此扩大农民运动的基础，而使工农联合战线有真正的可能。在现时政局之下，——工人阶级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差不多是孤立的，——本党最主要的职任，在于扩大农民运动的基础，所以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便成了第一等重要的问题。

五卅的民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虽然给反动军阀一个有力的打击，使他们内部崩败冲突，以致于在政治上军事上逐渐失败；可是不久英日帝国主义便建立吴佩孚张作霖的联合战线，向国民军反攻。北方国民军固然漫无中心，还决不是革命的人民的武力，可是他们确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并且确有破坏崩裂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作用，所以英日张吴反国民军的联合战线，当然压迫反对一切国民革命运动，如果英日张吴的联合战线居然战胜，帝国主义者于更进一步的分裂国民运动之后，必定能以造成非常反动的局面，而且更比以前要加增多倍的力量来维持他，——因此也就必定是很长期的。同时这种帝国主义反攻的胜利，必然继续进攻而要推翻中国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现在的时局，实在是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的关头。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反攻，然而根本的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才能使全国人民得着必需的保证——以开发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而取得最后的解放。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于五卅运动的过程中，他不但得着奋起斗争的南方几十万工人的助力，并且有几十万有组织的农民赞助他；他以工农阶级的革命斗争做柱石，而能扫清一切反革命的军阀，统一广东的民政财政军政，废除苛捐杂税等等，因而也就得一般人民的同情和赞助。可是如果广州的国民革命势力和潮流不能发展于全国，他必然陷于孤立地位，同时受香港英帝国主义经常的压迫，必致于不得不妥协而成为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府，况且他是现时唯一的革命中心和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只有从这个地方发展国民革命的运动而后有大规模的政治上的意义和成功。

现时中国北方国民军的反对张吴，各地农民自然的骚动，与工人阶级的组织及斗争的扩大和发展之中，广东国民政府——工农的革命联合——实在是最重要的主力军，而帝国主义方面也在竭力想法扑灭这些势力。我们的党在这些革命势力与英日张吴等帝国主义的联合的直接的斗争里，应当认明现在是历史上的重要时机，是革命胜利的出发点。我们的党虽在中央扩大会议之后，数量上有很大的增加，然而在这革命时机之中，党的政治上的势力，如果不能适应这种时机而发展，对于一般民众运动的政治指导，不能巩固扩大，那么仅仅是党的组织上的扩大，决不是保证我们能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种种，这次中央特别会议认为本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亦就是加紧的在农民之中工作，尤其是在北伐的过程上，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

（一九二六年九月）

## 中　央　政　治　报　告

### 一、去岁扩大会议至现时政治状况的变迁与我党在各时期的策略

自去岁十月扩大会议至现在九个月间的政治变动可分为三个时期，每时期我们均有不同的策略。这三个时期的分划是：自奉直战争至郭松龄反戈为第一时期；自郭松龄失败至国民军退出北京为第二时期；自国民军退出北京至张吴会面为第三时期。

第一时期是军阀政权动摇时期。在此时期中奉系军阀已经溃败，皖系军阀已经没有实力，直系军阀犹未再起，帝国主义者一时亦失去驭制各派军阀之能力，表现非常恐慌；段政府极力勾结国民军，吴佩孚亦向国民政府示好，仿佛南方国民政府与北方国民军可以会合起来，支配全国政权，成功一比较赤色的政府之形势。

在此期中，本党的策略是：自孙传芳反奉军事发动，即提出扩大此次战争性质之口号，说明反奉战争应该是"为民众争自由而战"，集合一切革命力量于反奉旗帜之下；这个宣传在民众中是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并深入军阀的队伍中去，于是有郭松龄之反戈。本党同时又提出反对直系护宪运动及防止奉直联合之口号，盖已予见直系得势必然护宪，奉系若败必力求与直系妥协，企图巩固军阀之统治权。

第二时期是帝国主义者想消灭此革命高潮，一方面努力促成英日吴张军事上的反赤联合战线，一方面在民间造起广大的反赤宣传，将此革命胜利打消下去。

在此期中，我们的策略是要分裂反赤的联合战线，所以主张在北京暂时成立一灰色的政府，可以容纳皖直两系参加，专门对奉。但此政策终未实行，而吴佩孚已在汉口实行联奉开始向国民军进攻，此时我们遂主张广东速出兵讨吴以救国民军之危。然结果此政策仍不能行，所以如此，是由于我们党在政治上的力量还不强大，故虽有好的政策，仍不能影响国民党国民军充分实现。

第三时期的重要现象是：一方面军阀政权重新稳定，一方面英日吴张暗潮极烈，同时广东国民政府实际出兵北伐。

英日吴张间的冲突虽很严重，但因国民军之实力仍然存在，奉直咸有戒心，所以只是

暗潮，而未进于明显的破裂。

在此期中，我们的政策，在北方是国民军和奉反直，在南方是国民政府援湘御吴。北方的反赤军（奉直晋三方），若能一致合作的进攻国民军，则国民军很难存在；但三方合作，均无十分诚意，各有私图，故国民军似不至于失败；然在奉直间无大变化时，国民军亦只能自保而难于冲出。南方国民政府之出兵，亦尚只能是防御反赤军攻入湘粤的防御战，而不是真正革命势力充实的澈底北伐。

总之目前军阀政权的稳定，只是在英日吴张勉强合作中，得到很短时间的稳定，这个稳定，是决不能持久的。

## 二、帝国主义对华的政策

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最有权威的是英日两国，现时它们共同的目的，是镇压中国的民族运动；其不同的意见是：日本偏重北方以扶助张作霖为唯一政策，对于南方之反对吴佩孚，不但不甚注意，且视为奉张统治中国北部之机会；英国则一意扶助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孙传芳），不但要他们镇压中部的民族运动，并且需要吴佩孚替他向南征服广东，向北和奉张争得一部分政权。

除英日帝国主义之外，在中国影响较重要的，要算美国帝国主义了。美国的政策和英日不同，它并且公然宣传中国人应该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之可怕的侵略，只有美国能以资本邦助中国的实业发展与和平，它的政策是撇开军阀，而抓住中国的资产阶级，用美国资本的道威士计划来代替英日统治中国。法国帝国主义方集其全力经营东欧及近东，又加以英国政治的压迫和美国经济的压迫，对于中国问题，它已无力顾及。

我们对付这些帝国主义的政策，目前是特别注重反对英国，其次日本，其次美国；因为英国在华的势力，根深蒂固，领域极广，日本尚只是一部分，美国更无固定地盘，它的最凶恶的道威士政策还在将来。英国每欲直接以武力干涉中国，只以未得列强一致合作而不得逞，所以利用其相互间的冲突，以分裂政策破坏其联合进攻，即所谓共同干涉，这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之必要的策略。

## 三、各种社会势力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

在民族革命运动过程中，我们应知道各种社会势力及其趋向。现时中国社会势力，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第一种是军阀、买办、官僚、新旧士绅之反赤运动，这都是中国的半封建势力，他们都公然站在帝国主义旗帜之下，号召反革命。军阀的势力已日就崩溃，皖系军阀已等于消灭，直系在表面上好像复兴起来，实际已成强弩之末，最有力的还是奉系军阀。军阀之致命伤要算是内部分化，最显著的如冯玉祥及郭松龄之倒戈，此外如方振武、唐生智均已归到革命旗帜之下，甚至于杨森、王天培等许许多多小军阀，都有离开军阀归到革命，离开帝国主义者接近苏俄之倾向，这种新发生的现象，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表现军阀势力之崩溃，一是表现民族资产阶级的武装之开始形成。买办阶级据有

全国商会及银行业，它的势力还很雄厚，然而它是中国资本主义之开创者，因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之结果，买办阶级中也起了分化，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已带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色彩。官僚完全是军阀之附庸。新的士绅是大学教授外国博士等，乃是买办阶级的爪牙，或直接是帝国主义之工具；旧的士绅如城市及乡村之劣绅地主土豪，专替军阀官僚剥削农民，他们乃是中国半封建势力之真正基础。

第二种是工农群众及急进的知识者之革命运动，这是新的革命势力，刚与第一种旧的半封建势力对抗。虽然他们在组织上尚需要普遍的发展，在思想上尚不脱封建宗法社会的束缚，而在生活的要求上不得不是革命的。

第三种是中小商人之反抗运动（如抗捐抗税等），犹豫怯懦的小资产阶级，固然不容易脱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之统治，而因为帝国主义及军阀之压迫，他们的政治思想终比大资产阶级浪漫一点，他们对于革命运动的态度，当站在大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之间。

第四种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资产阶级在现时尚多未脱尽买办阶级的思想，但它正随着产业之发展而日渐分化。它与买办阶级对帝国主义不同的态度是：一为无条件的合作，一为有条件的合作。换言之，即是资产阶级想用改良方法向帝国主义要点东西，如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领判权，收回租界等。他们要得到这些东西，方可与帝国主义妥协。他们对于军阀的苛税勒捐破坏铁路运输，尤其是战争，一致深恶痛绝。广东上海一部分急进的分子，渐表同情于革命，且想利用工农群众势力，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以得到他们的要求。可是他们对于帝国主义及军阀之要求，非经过革命实难得到，所以他们未得到这些要求以前，在客观上是有倾向革命之可能的。

在以上四种势力中，我们将用何种势力来革命呢？当然的只有第二种工农群众是革命的基本力量。第三种中小商人受帝国主义经济之压迫，苛捐杂税之剥削，只有感觉革命之必要，无反对革命之必要。工农阶级应该拉拢他们，才能免自己陷于孤立。第四种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的革命运动中，乃站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依现时世界政治环境，中国的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我们应该明白了解现时中国的革命，毫无疑义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因此在估计革命运动之社会的力量中，便非要不要资产阶级参加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是否参加及是否参加到底的问题。在事实上，自“五卅”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分，且有领导此运动之倾向，特别在上海，加之军阀内部分化之结果，新生的军事势力，在他们的思想上行动上，无一不表现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武装之形成，这是我们所万不应忽视之中国民族运动中新发生的现象。不过资产阶级的特性，一旦得到些小胜利，稍稍能够安慰其阶级的要求，便立刻发挥其妥协根性，离开民众，背叛革命而与敌人合作，他们不能革命到底，这也是毫无疑义的事。因此，我们此时对于资产阶级的态度，应该一方面努力拉住小资产阶级，使之接近工农群众，而不完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所统治，以与资产阶级争此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以防其将来之妥协；一方面极力巩固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促进资产阶级之革命化，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以共同打倒国外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国内的敌人（半封建势力）。我们若妄信资产阶级可以革命到底，不预防将来之危险，不能从资产阶级夺取小资产阶级，让他们完全受资产阶级之统治，这便是右倾的错误；同时，若现在即否认资产

阶级在民族运动中之作用，不能从帝国主义夺取中国的资产阶级，敌视他们过早，逼他们为帝国主义利用，这便是左倾的错误。

## 四、国民党内部之分化和我们的态度

国民党内部之分化正是反映上面四种社会势力。反动的右派（李福林、冯自由、马素、古应芬等）代表第一种；共产派代表第二种；左派（汪精卫、甘乃光等）代表第三种；新右派（即中派如戴季陶、蒋介石等）代表第四种。我们对于国民党的态度应该与对全国各种社会势力之政策是一致的，就是我们要联合左派并中派向反动的右派进攻；我们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只能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而不能希图消灭中派，犹之在社会势力中我们现在还不敌视资产阶级，有时还需要扶助中派。若幻想代表多阶级的国民党能够成为整个的，或希图国民党为单纯的左派所垄断，不与其余他派合作，这便和戴季陶左右并排的观念是同样的错误。

## 五、民族运动之前途

中国民族运动的前途，我们可以看出有两条道路：一是由工农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推动资产阶级，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一是由买办性的资产阶级拿住小资产阶级，并结合买办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扑灭革命运动，实现道威士的资本主义之侵略。我们的责任，就在努力扩大工农群众的力量，拿住小资产阶级，推动资产阶级，始终能够巩固民族运动的联合战线，则中国民族运动便有第一条道路之可能。如果我们不能从帝国主义夺取中国的资产阶级，使革命运动流产，或者我们不能从资产阶级夺取小资产阶级，工农阶级不能取得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使革命运动中道夭折，均不免要有第二条道路的运命。中国工农阶级要能实际领导这个革命，其最重要的条件，必须代表工农势力的本党成了群众的党，而且有很好的组织，才能够一面尽量扩大工农群众的组织，一面结合国民党左派以抓住小资产阶级，领导此革命到底。

说到我们党的现状，在全国一般的宣传上，固然有很大的影响，但我们的力量和实际行动，还在小团体与群众的党之过渡期间，要跑到领导革命的地位，还须更大的努力。

## 六、九个月中党的发展及工作

党的发展在九个月以来，从好的方面看：一、党员数量是增加了三倍；二、我们虽未能在组织上影响小资产阶级，但能够模糊的领导全国的民众运动，尤其是在京沪湘粤等地；三、在全国的政治鼓动是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对于每个重大的政治事变所发出的口号及政策均能影响民众；四、上海、天津、唐山、湖南的职工运动均较前有基础，特别是上海的职工运动，已渐充实起来，唐山天津虽在反动势力严重压迫之下，而根基尚未完全破坏；五、广东、湖南的农民均有了群众的组织。

从上面看固然我们的党是发展了，但在发展中也包含不少的缺点：

一是党员数量虽然增加而质量确是退化了，可从几方面看出：

（甲）同志都缺乏理论及确定的革命人生观，尤其是很少能将理论活用到实际工作上去。

（乙）负责的工作同志，有雇佣劳动倾向，缺少从前那样刻苦奋斗的精神和自发的革命情绪。因此纵然能守纪律也不免形式主义机关主义的流弊。

（丙）同志中之一部分，发生贪官污吏化（即有经济不清楚揩油等情弊）。

二是各级党部自中央以至支部，指导训练的力量均不充分。

三是支部只有名义而无工作。

四是理论的宣传非常缺乏，鼓动工作亦多不切实际，不能深入群众。

五是职工运动，多只是机关运动，没有群众充实这一机关。

六是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往往敌人尚未打着而自己已受很大的损失。

##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

一、广州三月二十日事变，国民党中央五月十五日会议，黄埔军校六月七日又提出的处置共产派问题——凡此一切，都是一贯的对共产党的进攻。广东方面，现时攫得政权者是武装的中派，而全国则有右派的反赤运动，他们都向共产党进攻。这种进攻之所以可能，固然是因为客观政治形势大有变动（国民军败退，北方帝国主义军阀反革命胜利，吴佩孚重登政治午台与英国勾结，日本又扶起张作霖，并借中东路事件反对苏联等等），然而我们的党，自身亦做了些错误。因此我们一方面从中央直到支部，应当宣传解释此次右派及一部分中派国民党对我们的进攻，是和帝国主义军阀反赤运动相呼应的，实质上确是反革命的行动；但是别一方面，我们还要研究右派中派之所以容易利用最近政治形势向我们进攻的原因，并且要设法消灭这些原因。

二、国民党右派，以至于中派之所以容易向我们进攻，提出要求我们退出国民党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我们前此指导国民党的方式错误，实际上简直使左派自己不参与党务及反对右派的斗争；我们自己造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的形势，而使实质上是左右派之争的性质隐蔽起来。同时我们既不使左派在政治上及组织上自己形成起来，当然国民党的发展便因此迁见妨碍，不能充分吸收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可是右派及中派却正利用机会而在这些分子之中发生影响。我们既没有实行去年十月中央扩大会议的决定，我们自己各地党部更加独立行动及结合左派与右派实行思想上组织上的斗争；我们因此也就没有能充分的在群众中建立巩固的基础（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等），更没有能在北方政治形势恶化之后，以民众革命化的势力，反对右派及武装的中派之进攻。

三、去年中央扩大会议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意见是：（一）我们留在国民党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邦助他们发展国民党并且反对右派，但是我们自己不可以代替左派；

（二）我们自己的党政治上更加独立起来。这种决议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看国民党的性质是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联盟（革命的知识分子，中等工商业的民族资产阶级，手工业及小商人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并且仍旧认为国民党的发展及我们参加国民党的指导，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前提之一。我们在国民革命中的策略应当更加明确规定：一方面我们的党应当更加加紧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独立，确立自己在工人及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取得革命化的一般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别方面组织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而集合之于国民党，以充实其左翼，更加以无产阶级及农民的群众革命力量影响国民党，——这样去和左派国民党结合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所以现时我们在国民党内的政策，应当是，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攻右派。

如果有些同志认为共产党应当与国民党完全脱离组织上的关系，现在就要消灭这一各阶级联盟的政党，以为共产党已经就能独自领着无产阶级，使其它被压迫民众跟着它，来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那么，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完全看错了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远景。主张现在就与国民党脱离组织关系而仅仅和他合作的理由，其实和国民党右派及新右派（中派）要求共产派退出国民党的理由是一样的。这种倾向是表现最近一年来日益形成的资产阶级，要想夺取国民运动的指导。

如果有些同志，仍旧认为共产派应当包办国民党机关，自己占领发展国民党组织及党部的工作；那么，这已经有广东的经验，证明这种观点亦是错误的。因为国民党现在的组织形式和它的社会基础本不适当，再加之以我们的占领，自然因过分的集权而实际上变成狭隘的小团体，反使大多数革命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因散乱游离而消失其力量。

这两种观点，虽然恰恰相反，然而却有同样的政策上的错误，对于中国解放运动有同样的危险；最终的结果，是使共产党及无产阶级与大多数城乡小资产阶级隔离，实际上是将这些群众的指导交给大资产阶级。

四、我们党里现时所以有这些错误的倾向，因为最近形成的客观形势，的确是非常之复杂。一年来无产阶级及资产阶级双方的“自我形成”，必然直接反映于国民党——这就是共产派与右派互争对于中派及左派的影响。我们的党所以现时应当格外对于国民革命发展的远景有明显的观察，对于国民党有确定的策略。必须使中央对于共产党与国民党相互关系的观点，真正能为党员群众所了解而造成相当的正确的观念。

本次（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央扩大会议，认为：解决我们和国民党组织关系的正当形式问题，虽然是下次大会的问题，但是现在已经必须有下列的决定：

（一）实行去年十月扩大会议的议决——我们各地及广东党部的独立行动。

（二）积极发展国民党左派，同时改正以前束缚左派，及实际上不使左派管理党务参与反对右派斗争之策略上的错误。

（三）积极发展左派的党外群众的组织，尤其在城市小资产阶级之中（政治的俱乐部等），以这些社会团体扩大国民党的基础。

（四）我们应当使国民党左派明瞭：国民党的组织不能是一阶级式的集权的政党，有太严格的纪律和章程。现在必须引进许多小资产阶级革命化的群众于国民党，所以党的组织形式可以通融而宽大些。例如国民党下级党部至少要有政治俱乐部的性质，使与群众接

近，不必太侧重于死板的章程而自己束缚自己。例如革命的社会团体未始不可整个的加入，这样可使国民党成为极大的群众的党。

（五）我们应当和左派共同进行更实际的反对右派的经常斗争，暴露他们的妥协及卖国卖民的罪恶，只有这样才能使中派与右派隔离。

五、我们对于现时的国民党的目前紧迫的职任，尤其以实行反右派斗争为最重要。我们在现在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反对广东内外的反革命势力之斗争里，虽然他们在中派指导之下，当然还要竭力赞助他们；我们同时应当有拥护劳动民众利益的自己的政策，而且以这一政策做赞助他们的根本条件。

# 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

扩大会议看了中央宣传部报告之后，认为今后宣传工作应当赶紧整顿，宜即采取下列的具体办法。

## 一、出版物问题

（甲）中央政治机关报——《向导》，应当更加加增鼓动的性质，使能反映中国革命民众的日常斗争而与以指导，不可太重于分析的论述。再则，一、应再多加宣传各地工农运动的意义；二、各地政治通信都须整顿，务使每一地方重大事件都不空放过。

（乙）中央理论机关报——《新青年》，务须按月出版，适应革命的思想斗争之急需——因此，党内理论力量既然很少，必须把他们暂时集中于《新青年》（如《向导》上过于偏重理论分析的论文，北京《政治生活》上的历史的理论的文章，都可以登载于《新青年》）。再则《新青年》上须设法增加中国经济的研究及工农运动之历史的理论的论述。《新青年》上还应增加C。Y·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使它成为C·P·及C·Y·中央的共同出版物。

（丙）中央通俗的机关报——《劳农》（或《工农》），亟须添设，先办月刊，以后设法改为周刊。这一机关报应当给工农群众读者以关政治的指导，须能搜集全国工农状况及其政治经济斗争的消息，登载各地方的工农通信。这种机关报的目的是使工农群众能明瞭全国革命斗争的状况及意义，并充分表现实际的工农生活及其斗争。

（丁）《党报》——还须改良整顿，使能集合中央各部及各地之党内生活和工作经验，以为训练同志之材料及指导。

（戊）为使中央各出版物能有定期的审查，为使我们所主持的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团体、青年团体的机关报能与党有密切的关系并能适当的运用策略，为使中央对于各地方的各种出版物能有周到的指导起见，必须设立一编辑委员会，由《向导》、《新青年》、《劳农》、《党报》、《中国青年》（C·Y·）、《中国工人》（全国总工会机关报）、《中国妇女》（妇女联合会机关报）等之主任编辑组织之，这委员会至少每月开会一次，报告中央及各地党的、工会的……机关报状况，加以审查。

## 二、部务问题

中央宣传部，在今年四月底以前，简直并未执行部务，现在应以现时所有力量积极整顿起来，务须实行下列的最小限度的工作。

（甲）设立消息课——将现有中外报纸杂志，每星期及每月编成言论及消息汇录，交给中央各部各机关报编辑处。

（乙）设立图书馆——将重要的中西书籍分类按期编成目录，并收集中央及各地一切刊物（党的、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妇女会的及其他机关报，以及北京、广州、汉口、上海之有力的重要的刊物与书籍）。这等图书目录办到相当时间并应分寄我们各级机关，规定借书办法。

（丙）日常部务——（一）随时根据中央局决议之宣传动员及时局解释，拟定政局宣传大纲；（二）时常发出关于各地宣传部部务的通告；（三）与各地宣传部通信，答复他们的报告和信件；（四）依据编辑委员会决议，每月对于各地一切刊物，加以总的批评（当然仍须随时写信指导各地地方的刊物）；（五）最近期间先调查各地思想言论界得一大概后，以后每月须调查一次：我们实行了几次全国的"宣传动员"，各界各派对于我们这种宣传的态度如何，对于各地地方的"宣传动员"亦是如此；（六）最近期间先调查一次各地经常的教育工作（支部中之理论及党务训练工作）之情形和方法及特别的教育工作（训练班等类的工作）之状况；以后每月须审查一次这种工作的成绩。

中央宣传部应将全国的A、鼓动，B、宣传，C、调查，D、中央地方各种刊物的期数及其对于重要事件的论解，E、编译成绩诸项，做一书面报告于中央局。

## 三、编译工作问题

中央宣传部急应开始编译工作——

（甲）理论的译著，应先定一最小限度的计划，大致应当编译可以继续共产主义ABC的书籍。

（乙）党校的教本及普遍的党员教育的大纲：

（a）《革命常识》——中国革命中最重要问题的通俗的解释。

（b）《党务常识》——党的、工会的、学生的、妇女的……各种工作的组织宣传等方法原理之解释和论述（如支部之意义及党团之运用等）。

（c）初级党校（训练班)教授方法（实际的课目表及参考材料汇录）。

（丙）鼓动的小册子——解释第五次时局主张的极通俗的各种小册子。

（丁）各种纪念日宣传大纲汇录（如列宁、李、卢、"二七"、"三八"、"三一八"、"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五卅"，济难日、少年日、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双十纪念、非基周、反帝周、职工追悼周、孙中山廖仲恺纪念等），并附参考材料。

## 四、地方报告问题

每月各区委及地委必须按期报告，并具备下列各项（如某项无工作，亦须说明理由，报告准备开始这种工作的计划）：

（甲）每月鼓动成绩（中央性质的和地方性质的宣传动员之结果及其传单——我们的、反对派的——虽然应当随时迅速零寄，但每月应作一总合的报告和结论）。

（乙）每月宣传成绩（俱乐部研究会等理论宣传工作——广州已经可以有，其他地方则至少应利用中央理论刊物为材料，使同志在党外吸引非同志对于我们的理论注意，使他们用通信和我们讨论，地方刊物上应注意与当地各派辩论。此等工作成绩均须每月报告）。

（丙）每月总合报告地方所出各种刊物期数及当时的中心口号。——地方政治刊物应当根本上注重当地的政治鼓动和地方问题（各地党的、工会的、学生会的、妇女的……各种刊物，应按期快邮递寄中央宣传部——其相应分寄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部、C·Y·……者，与宣传部无关，不可以为已寄数份，便不专函寄送宣传部）。

（丁）每月报告思想舆论的调查。

（戊）每月教育成绩（支部中每月一次理论上的讨论，以试验同志在主义上了解的结果；时局讨论上每月总论党员群众对于政治的了解程度；纪律上每月总论同志间的意见或组织问题中所发现的原则上的某种倾向）。

（己）每月党校成绩（如办理各种训练班及教材、办法、成效等）。

（庚）每月总合报告中央各种刊物在当地的影响（各地同志或非同志对于中央刊物的批评或思想政策上指导的需要。）

（辛）每月总合报告当地同志对中央刊物（《向导》、《新青年》、《劳农》上的）政治的、理论的、工农的通信共有几篇及其目录（不论是谁做的，各地宣传部都应当报告）。

## 五、工农通信问题

我们的党要能知道审查群众的情绪而与以指导，必须在宣传工作上亟亟实行工农通信的决议。组织工农通信员的方法，大约可以有四种：

（甲）宣传部在工人中挑选能够写普通信的人，使他们随意写自己的生活情形、工作条件以及家庭状况，说出自己的感想和对于政治问题的认识等等；

（乙）宣传部挑送几个学生同志派到工人区或农村中去，笔录工人农民的谈话；

（丙）宣传部委托工委农委在群众工农区域的负责人，请他们用种种方法找这种工农通信；

（丁）罢工抗租抗税等事件起来之后，宣传部特别派人到工农区域去，或委托工委农委负责人，用上述方法去找群众对于当时事件的意见感想及通信。各地宣传部应时时注意编制工农通信的问题单子，使工人农民通信员能按照这些问题答复。

× × ×

中央宣传部及各地宣传部为执行这些工作起见，必须自身先整顿起来；中央及各级委员会里对于宣传部的关系，也须格外严整慎重，如人才之分配，办事手续之完备等等。

扩大会议认为上届（去年十月）扩大会议的宣传问题的决议案，至今实行的不及百分之一二，中央及各地宣传部是不能不负责任的。同时，那一宣传问题议决案当然仍旧适当，此次扩大会议认为只须规定很具体的办法，以求实行；所以对于宣传部的工作有上列的具体规定，责成中央及各地宣传部切实执行。

# 组织问题议决案

## 党的发展经验和缺点

一、自从上次扩大会议以后，本党组织在数量上又发展了三倍。最近八个月来，虽在五卅运动潮流已经逐渐低落之后，而本党在全国各地的组织，仍能于各种形式之下，领导民众运动。从全国革命运动的实质看来，本党确成了一个政治核心，从各地群众运动的实质看来，在许多方面，本党确已渐渐的站在领导地位。

二、在过去的组织工作中，我们有了下列的经验：

（甲）经过各种的运动，我们得以接近于广大的民众，得到民众组织的发达和党自身的发展。

（乙）因为注重发展工作的结果，已使本党在几处革命潮流较高民众运动较发达的区域，取得了群众，并从群众中建筑了基础的组织。

（丙）因为开始注重支部工作的结果，已使本党有了较好的社会成分，吸收了进步的分子，深入在无产阶级群众里，于秘密工作形式下种下了初步的基础。

三、这些经验从实际工作得来，是几件好的结果。但是本党在组织上仍是非常幼稚，有许多大的缺点。这些缺点之最大者有四：第一是各级党部尚不认识组织工作的意义，多以为组织工作只是技术的，而不了解组织工作的政治意义；第二是支部工作尚未真正建立，过去的支部都仅有其形式，各级党部尚不明了支部的意义，亦尚不知支部工作的方法；第三是党团的工作太不好；第四是党的机关不健全。

## 组织工作的意义

四、组织工作的意义，绝不只是技术的，而是政治的。换言之便是：组织工作，即党指挥群众运动的枢纽。没有好的组织，便不能指挥广大的群众运动，运用党的政策；一个好的政策，是要有好的组织才能实现的。布尔塞维克党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组织之工作；一个幼稚的党要能做到布尔塞维克化，要能做到从小团体变为群众的党，要能做到从思想的团体变

为行动的团体，要能做到从支部基础的工作到大的群众行动，便要靠有好的组织工作。

五、本党在组织上，正当发展，但有一种危险，时时有发生之可能，这种危险便是指导力之薄弱，主观的力量不能适合客观的需要，以致失掉了许多活动之机会；尤其是群众的政治行动若遇指导力薄弱时，其损失甚大，这是组织上最严重的问题。客观的革命运动之进程，是逐日发展的。本党在组织上的最大责任，就是要愈更推进革命的运动，拿住运动的重心，在其最大可能的范围内挥指一切，这不仅是中央组织部的责任，亦是各级党部组织部的责任。因此扩大会议决定：以后中央对于各区，各区对于各地方，最好能常派遣特派员，考查并执行此种任务；在某地发生特殊事变时，此种派遣更不可少。

六、什么是组织工作的最大障碍呢？那就是对于发展组织的怀疑心理。在目前暂时的军事反动政局底下，革命运动仍进行不已。因反动政局而革命化之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在此时的问题，就是：这些群众若不接近于无产阶级党的势力，便会走入买办资产阶级的圈套。自"五卅"以迄现在，群众运动的问题，便是联合战线之最多数群众属于何种势力之问题。这个意义便是说，假使本党若不能扩大与领导群众，便会使资产阶级与反革命势力日益增加。因此扩大会议特别提起严重的注意，重新提出扩大本党的口号，务使本党更加发展，征集更多的革命工人、农人与知识分子。

七、对于无党群众及无组织的群众之工作，也是本党在组织上的责任之一。现在各种工作形式下造成许多同情于本党的组织和群众，是目前最需要的工作。如济难会工作已有相当的成效，惜各地党的机关未能加以充分注意。此后如济难会，游艺或体育之团体及教育文化性质之团体都应加以注意与活动。

## 支部的意义与工作方法

八、支部并不是分部，而是党在各工厂、矿山、学校及其区域的核心。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就是集合这许多的社会的核心，而成为一个党。支部的组织是按照社会的生活而精密分划的。但本党现有的支部大半失去这个意义，只是在各种社会组织或区域中，征集了革命的分子，而成立党的支部，给以党的训练，而并未做到支部自身在此社会组织或区域中的核心作用。党的支部若没有这样作用，决不能接近群众领导群众。这是一个最严重的缺点，应当要立刻改正。

九、改正此缺点以建立真正支部的方法有五：（一）现在我们党的基础仍是各地方而不是各支部，党的活动工作者也是各地方而不是各支部，今后要把党的真正基础建筑在各支部上面，要把党的基本工作责成各支部，建立每个支部的活动工作，在每一个支部中实行分配工作，使每一个同志都有活动，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使各支部里都有全党形式的各样工作（如职工会运动、农民运动、协作社、济难会、妇女运动、青年运动、推销书报、介绍同志、报告消息、交通传达等等……，按照各支部的情形及其人数与环境的需要而定）。大的支部，在秘密时代，因人数过多不便常开支部党员大会，又为收取党费传达命令等事物，支部内可按工作部门分编小组；但我们必须认清小组是在上述情形之下而存在，不是党的基本组织，党的基本组织，只是每个工厂、每个矿山、每个学校等整个的支部。（二）建立强有力的支部干事会，以领导本支部的工作。如大支部内又分

小组时，除支部干事会应扩大外，且需按期召集组长会议；支部干事会须有计划的、有秩序的、积极的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训令，分配每个同志的工作。（三）改造支部的性质，只许有两种性质之支部存在：（甲）工厂支部，农村支部，或学校支部；（乙）街道支部或区域支部（即按住居地址而分划）；这种确定支部性质的作用，一为必如此始能建立支部的工作，一为避免与党团的作用相混杂。（四）在大的工业区域中（如上海、香港、武汉、天津）及大的农村中，如组织发展，支部加多时，应于区委或地委下，添设部委，按区域分划几"部"，联合若干邻近之支部，组织"部委员会"，管理本区域内的各支部工作。（五）从中央至区委或地委，从区委或地委至部委，从部委至支部干事会，以至组长会议，是党的本身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关系要非常密切；在组织工作上，从群众的支部或小组起，要严格执行：（甲）政治行动，（乙）发展工作，（丙）推销书报，（丁）缴纳党费诸种工作。

十、党在发展状况中之时，组织工作的懈怠与不精密，便会使党没有行动。各种性质的会议，无论在怎样情形之下，务须要设法举行；只要各个分子在会前有予备，便是十分钟或二十分钟的会议亦是有益且有效的。支部或小组的会更不可间断。在开会前予备自己的报告和意见，是每个同志的责任，召集开会，综合各种报告作结论，执行决议和训令，是每个组长与支部书记或干事的责任。各区委各地委或部委下的"活动分子大会"或"负责工作同志大会"，应尽可能的多多召集。

## 党团工作

十一、党团的作用是为实现党的政策，加重党的影响于各种非党的组织，如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各种社会团体里，和党的支部组织及作用均不同。党团的组织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单位或自成一个系统，而是依随党的组织，在各级党的机关之下成立，并受其管理；从中央至支部干事会，有各级的各种性质的党团，党团的性质且多临时的，常为变动的，由各级党部规定其存在，人数过多时得指定其干事会。

十二、党团的工作，便是整个的代表党的意见，贯彻党的政策，其中没有各分子的单独意见。党的机关对党团有决议时，就必须执行，党团中的每个分子，就应为这个决议而动员。党团中大多数的决议，除必须通知受指挥的党机关外，每个分子就应为这个决议而动员。在一定范围以内，党团的工作是须由自己讨论的。党团的意见与党的机关（如某厂工会的党团与同厂的支部干事会）意见有不同时，便须立刻提出于上级党的机关去解决。

十三、过去党团工作之缺点至多，甚至未明了党团的意义，有成为党的第二组织之倾向。这些缺点是应竭力改正的，各级党的组织尤须不要忽视，党团中的同志，在党的基本组织（支部）是不能脱离的。

## 党的机关

十四、政党是不能没有机关的，共产党自然也须有其机关。我们的党的机关，便是列宁所说的"职业革命者"之组织。党的机关的作用，就在推进党的组织，执行党的政治的与技术

的职任。尤其是在发展状况中的我们的党，不能没有很好的机关——无产阶级科学的组织。

十五、党的机关之健全，其必须条件有二：（一）组织的完善与合乎需要；（二）工作人力之充分与负责。过去的组织，往往仅具有其形式，或甚至只有一个名称，而没有实际的工作。如各部的组织，各种委员会的组织，都有这种毛病。这些毛病之来源虽有由于人力之不足者，但亦有时是不合乎需要。欲求纠正这些毛病，一方面是要从组织构造上检查以求整顿，另一方面也须从人力的补充和适宜的分配上着手，使负责工作者增多并充实起来。据中央组织部此次的报告，统计全国工作人才，仅依目前的需要，至少应有区的工作人才三十五人，地委或部委工作人才百六十人，特支工作人才百六十人，共三百五十五人；而实际现在担任党的工作者，勉强只有百二十人上下。由此可见人力与实际需要相差之远，应竭力养成工作人才以为救济。

十六、上次扩大会议曾经决定：中央各部要有确定的组织，中央及区书记应当不兼部务，中央之下应有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委员会及军事部，经常的执行自己的工作——这些决议只有一部份已实行，大部份尚未做到，如中央组织部至今尚无专人负责，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同志时常派往他处临时工作，农民运动委员会至今尚未成立。自此次扩大会后都必须逐渐实行，力求改正过去在工作上的缺点，并应增设中央秘书处，以总揽中央各种技术工作。各级党的组织，同样的要整顿起来；必使党的组织都健全以后，才能推进群众的革命运动。自中央以至各支部，各级机关间，必须建立相互密切的关系；各上级机关对于下级机关，各下级机关对于上级机关，都须有定期报告。

# 职工运动议决案

一、五卅运动以来已经证明工人阶级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中是一个主要的势力，并且在这一个革命的怒潮中，工人阶级的阶级自觉和民族自觉及初步的组织能力，都有很广泛的增进。虽经帝国主义与军阀历次的屠杀和摧残，然工人阶级仍继续不断的反抗。同时在广东历次肃清反动军阀的争斗中和北方反奉战争中，工人阶级都能有组织的参加奋斗，也证明工人阶级已有进一步的觉悟。

最近因军阀搜括及战祸天灾和输出品之漫无限制，发生普遍全国的经济危机，如纸币跌价，强发军用票，米价奇涨，百物昂贵，欠薪等……。工人阶级在这危机中，实际工资日见降落而受巨大痛苦，因此经济罢工风潮遂普及于各处，虽尚无组织的丝厂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都不断的罢工；这种罢工风潮，且将随着经济危机而日益继长增高，工人阶级的境迁既然如此，只有日趋革命化。同时这种组织力薄弱的罢工，亦易于为帝国主义者军阀和中外资本家所压服，我们为抵抗敌人的压迫起见，应加紧努力，不要失掉一个指导的机会，务使经济罢工运动的结果足以强大中国工人阶级的势力。

二、中国职工运动自始迄今都是在本党指导之下，尤其是在“五卅”沪港工人罢工中表现最为明显。所以本党对于职工运动不是党与工会关系密切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使本党各级组织经过工会的形式去指导和训练广大的工人群众的问题。

（甲）本党指导工人运动不在于包办工会机关，而在于能够不断的提出切合工人阶级实际的经济的政治的要求，与党员之确能为工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乙）是经过本党的工厂支部去影响广大的工人群众，因为党的工厂支部是最接近群众的组织，所以无论工厂里面发生何项与工人利益有关的事件，本党各工厂支部都应该立即起来活动，为全体工人奋斗（但须经过工会这一形式），一面藉此组织和训练工人，一面善用这些具体的日常的争斗，促进工人群众阶级的觉悟，引导群众去参加工会的工作，工会就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所以我们更应该用工会的工作和日常的斗争去教育工人群众，如此方能将过去用党团包办工会机关的工作转而为党员群众影响工人群众的职工运动。

三、中国工人阶级目前的主要职任是领导全民族的解放斗争，工会与其他阶级民众团体建立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行动的联合战线，就是实现这一职任的唯一策略。所以工会须时常发布有关各阶级民众共同利益的主张，并且要领导工人群众实际参加这种行动。我们运用这一个政策往往易于发生毛病，不是因恐怕联合战线的分裂，易于忽视工人阶级的利益，就是阶级斗争口号与要求过高，易于妨碍各阶级的联合战线。我们要知道，必须工人阶级团结愈固，然后联合战线的势力才更充足。工人阶级的团结力又必须在阶级斗争中渐次发展，所以轻视阶级的利益，不但是有使工人阶级离开我们的危险，而且足以根本动摇联合战线的势力。同时阶级斗争的口号与要求过高，易使资产阶级利用这种要求与口号，为隔离工人阶级之宣传而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还有第三个毛病，就是应用这一个策略时，只是发表一些空洞抽象的全国的总的政治口号与要求，而不能运用到实际的日常的斗争上去，这个毛病差不多是很普遍的，这就是除“五卅”时的上海及现在的广东外，完全不能把这一个策略发生实际的行动的总原因。要使这一个策略能够实现，必须从群众的日常的切身的问题做起，就是许多地方的政治经济问题，如苛捐杂税问题、米价问题、纸票问题、参加城市选举问题及军队的骚扰问题等。实行这一策略不但是由工会发表几篇宣言就够了，并且要以工人阶级做中心，起来号召各阶级的民众作实际反抗的行动，然后这个联合战线才能深入群众，渐次巩固起来。

四、本党中央的或地方的出版品，必须确实登载关于职工运动的消息和论文（此事虽屡经决定，但未切实执行）；过去本党的定期刊物，都不免犯了一个共同的毛病，不是文字太艰深，就是凭空发议论，不切事实，很少登载工人的投稿，最近虽然有些进步，但是还未能普遍的群众化。根据过去经验，只有画报最能影响工人群众。各级党部以后应注意发刊工人画报的工作，而各种刊物亦须注意插画一栏。

五、自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后，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此一年之内，全总在广东工会中建立了很好的信用，尤其是在省港罢工工人中间。可是在全国各地工人中，全总尚无何等影响。今年“五一”举行的第三次劳动大会，虽然没有在全国工人群众中发生重大的影响，可是有点教育和宣传的意义。最好的现象是全国所有有群众的工会（除广州少数工会外）都加入了全总，而全总的领导机关还算健全，因此在最近期内，应注意全总上海办事处的工作：第一，要在组织上与全国各地工会发生密切关系；第二，要在上海发行一个领导全国职工运动的定期刊物；第三，建立巡行员的制度，实地指挥各地工人的争斗。党的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应注意指导和运用全总这一机关。

六、我们有了许多工会的高级统一机关，固然是很好的，同时我们的职工运动却发生

了一机关化的危机；此时我们要注意工会组织的群众化，就是要注意工会的低级组织。在过去我们对于工会组织问题有两点错误：一偏重机关组织的形式，二虽曾注意工会基本组织，但未能正确的运用这一基本组织。在工会组织不能公开的地方，不必拘于工会的名称和形式上的组织，要想出种种形式的组织和名称来组织工人（如学校、俱乐部、饭堂、医院、音乐会、体育会、合作店、技击会均可）；这种组织只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有群众的，虽少亦可；二、是要阶级的。关于工会基本组织（工厂内的各部门的支部或小组）的运用，过去的缺点，不是太偏于形式，就太偏于严格或近于机关，其实基本组织的主要意义，是工人群众活动的单位，基本组织不在于形式上的一律，而在这个基本组织真能以群众的核心，渐次吸收工人群众和构成工会的一个活动单位，如果过于严格，成为死板机械的东西，也就失掉了工会支部或小组的作用和意义（例如一个工厂里某个工作部门共有一百个工人，其中加入工会的有二十个工人，无论厂主或监工虐待这一百个工人中任何一个，这二十人的工会会员所组织的基本组织，应立即召集这全间一百工人开会讨论和解决一种适当的行动，反对这件虐待的事实。就是在不能开会的地方，亦须在厂内或厂外分头进行宣传和煽动的工作，务使这工作部门的全体工人都同情于工会组织而加入工会，并使工人群众学习日常争斗的方法，这就是工会基本组织的主要意义）。同时我们要注意下级工会委员会和工厂工人代表会的教育训练工作，这些委员和代表多半是工厂中的中坚分子，必须他们受了相当的训练，才能适当的运用工会支部或小组这一组织。这是建立工会组织比较切实的办法。

七、因为中国政治情形的纷乱和经济情形的复杂，全国工人的要求很难得到一致。除广东外，工人的自由权利的获得，可真是全国工人一致的要求；至于改良待迂等，当按各地各种工人的实际境迂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就是一时不能达到目的，也要开始宣传；关于工作时间，我们应立即宣传至多不得过十小时，及每星期休息一日的制度。中央及地方都应提出全国的及地方的工人要求的大纲，向工人群众及一般社会广为宣传。

八、在轻工业工厂中，如纱厂、烟厂、丝厂等，青年工人和女工数量上都占很重要的成分，因此青年工人和女工参加工会运动、罢工运动以及一切群众运动均能积极行动，为提倡他们更加努力的参加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及训练工人阶级战斗的人材起见，我们应当注意引导他们奋斗，施与他们以必要的教育和训练，在各种经济罢工中，应注意提出他们的特殊条件，在有青年工人和女工的工会内，必须选择他们的能干分子，当选为工会委员会的委员。在各工会党团中亦必须有C·Y·的代表参加，以便C·Y·组织在工人群众中能为一致之活动。

九、按照各地职工运动实际运动状况和各地工人的最低限度要求，各地区委和地委，都应拟定目前职工运动的实际计划，报告中央批准，并督促党的工厂支部和工会的党团切实执行。全国职工运动中最重要的产业如铁路、海员、矿山等，最重要的地方如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等处，这些地方的交通及搬运尤为重要。

（甲）北方铁路工会除京绥路工会外，都被压迫而不能公开的或半公开的存在，过去铁路工会尚未能获得群众基础，党在铁路上的支部也不发达。加之铁路工人中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的差别甚大，客观的组织上也有许多困难之点。今后应该用不拘形式、不拘名称的、公开的或半公开的方式以及秘密的方法，注意下层群众，组织各大站铁路工人，自

司机、升火以至道栅工人、搬运夫等铁路工人，一面应用方法反对卖国军阀，一面应以日常最感痛苦的事实，团结自身，并与沿铁路的他种工人和农民发生密切关系。为达到上项目的起见，应将这些工作责任，由铁总特派员手中移交到本党各路的党团，各站的支部手中，以免从前铁总遥制之弊。各路各站工作，由各当地的党部就近负责进行，不但各当地的党部比铁总就近易于督促，而且工作由党部负责，比从前专责成铁总遥制之特派员个人，实际上是增加了铁路工作的人力。这个计划实施之后，各级党部必须认定铁路工会的工作是该地党部职工运动中第一重要的工作。今后铁总除派遣巡行员指导和考察各地铁路工作外，并不派遣驻在各路各站之经常特派员，而发展各路各站铁路工会的工作，当完全由当地党部负担，铁总只与各路各站工会发生正式关系；而经由各地党部发展之各路各站铁路工会，亦须注意与铁总关系之密切，以巩固铁路工会之统一，并须注意将工作情形由各路各站工会正式报告铁总，以便铁总发行定期刊物，指导各铁路工人运动。

（乙）过去海员工会，除在一部分航海轮船上有相当基础外，内河轮船上的海员加入工会者尚少；粤港罢工后，一部分最革命的海员又离开了他们的工作，因此海员运动在最近的将来应在航海轮船上进行密秘工作，并设法使内河轮船的海员加入工会，海员工会的组织亦应推广到各大口岸，自然党的组织亦应随着工会的发展而努力发展，以后各当地党部对于海员运动更应十分注意。

（丙）过去矿工运动，除安源已被摧毁，一时无法恢复外，只有开滦、淄川、博山、焦作、大冶、水口山、锡矿山等处有过相当的组织，以后一面应继续行进这些地方的矿工运动，一面又应派人进行抚顺、井陉、临城、自流井等地矿工运动。

（丁）上海总工会虽为上海全体工人所拥护，然其基础尚在一部分纱厂和印刷工人上面，以后组织铁路、海员、邮电、码头、街道、交通工人等工作最为重要。上海工人因生活痛苦或阶级自觉心较甚之故，最易发生无组织的罢工与暴动，须本党工厂支部和低级工会强大起来，方能使上海工人的动作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动作，同时应极力争得上海工会的公开存在，并普遍宣传上海工人的总要求。上海党部犹须指导上海工人参加上海的地方政治和经济的改良运动，上海工人方能积集他们革命经验，和夺得他们的社会地位。

（戊）广东职工运动有两个缺点：（一）一部分产业工人尚在少数反动领袖影响之下，（二）工会中旧行会的积习甚深。本党的广东职工运动在最近的将来，一面应注重运用联合战线的政策获得兵工厂、铁路、邮电、自来水等工人群众，一面要注重建立摆脱旧行会积习的少数模范工会，不能专注重所谓工会统一运动。省港罢工的急谋解决，尤以今后香港职工运动的恢复，为粤区主要工作之一。本党工厂支部的发展，应注重吸收工人群众，对于工会职员之加入本党者，须严加选择。

（己）天津、汉口、青岛、大连等处，都在严重压迫之下，多数工人尚无组织，今后应极力发展这些地方的工人组织，同时须避免机械式的和太严格的应用工会支部或小组这一毛病。须注意应用日常争斗事实，以各种公开的或秘密的方式组织工人团体和工会基本组织，尤其要注重党的工厂支部的发展，目的在于获得工人群众中的中坚分子以为发展各种争斗的准备。

（庚）在内地很少近世产业各城市中，各小工厂工人、商店店员和手工业工人，亦须特别注意，因为他们是这些地方大产业工人的代理者，即是国民运动中有力的群众。这些

职工的组织虽然不能十分严紧，可是第一步须使这些职工团体成为阶级组织，不使资产阶级分子参杂其中，这是最要注意的。

十、过去一年中，全国工人阶级都在热烈斗争的状况中，因此本党即忙于指挥这些热烈争斗，因此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负责人员常被调遣，而未能经常的担负责任，因此对于全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未能为有计划的进行。以后中央须指定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经常负责人，根据上项决定计划的实际方法，由中央随时指导各地党部切实执行。

十一、现在职工运动的人材极为缺乏，尤其是下级干部人材。在最近期内，应于上海、汉口、天津、广州等处，设立职工运动训练班，训练下级干部人材。并须设立一高级训练班——在上海或广州——养成全国高级指导人材。

# 农民运动议决案

## 一、农民运动的趋势

自近年来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军阀加紧剥削和压迫以及军阀战争的频繁和扩大，以致形成现时弥漫全国的农民暴动，如新近河南、山东的红枪会暴动，四川、陕西、直隶的减租抗捐运动，广东、湖南的农民协会运动；并且在这些运动中表现一些共同的倾向：反对苛捐杂税，反对预征钱粮，反对贪官污吏，反对民团之压迫，反对战争之扰害；同时且表现积极的要求，要求自己的组织，要求武装自卫，要求有一个不苛取、不扰民的政府，在农民运动较进步的广东，更要求取得一部分地方政权（县长民选等）。总之，现在的农民已经感觉到自身的痛苦，而不能再忍耐了，已经自动的（不管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原始的或有组织的）起来反抗剥削和压迫他们的阶级（地主土豪劣绅买办阶级帝国主义）了。换言之，便是农民已经起来参加国民革命的战线了，并且在实际政治上现已发生很大的作用（如广东国民政府之胜利，河南国民军之失败）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占着重要的地位。

照这种趋势看去，我们可以说，农民的政治觉悟及其在政治生活上的地位，必是一天一天地发展，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之主要势力。我们的党要想领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顺利的进行，就在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因此扩大会有以下的决定。

## 二、经济的与政治的要求

广东的农民运动，已需要一个最低限度的政纲；从全国来说，或尚早一点，尚不能即订出一有组织的政纲。在这个决议案不是要有系统的说明农民之要求，而只是找出全国最急切需要的那几项是马上就要行动的。至于整个的农民政纲之提出，须待至第五次大会时方能议及。

属于经济的：

（甲）限定最高租额，农民所得至少要占收获百分之五十；

（乙）限制高利盘剥，每月利息最高不能过二分五厘；
（丙）反对预征钱粮及苛捐杂税；
（丁）要求免除陋规，一切征收按市价计算；
（戊）统一度量衡；
（己）禁止囤积居奇，提倡农村消费合作运动。
属于政治的：
（甲）农民集会结社自由；
（乙）县长民选；
（丙）乡村自治机关及一切公益机关，均由乡民开大会选举；
（丁）地方财政公开；
（戊）反对民团执行逮捕、审判等司法职权；
（己）剔除诉讼积弊，禁止差役需索。

## 三、组 织 问 题

（甲）农民的组织不能太严格，太拘泥于农民协会之形式，如果各乡镇已有联庄会，守望社……等真正农民群众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而又不易变更，则不必一定强之改为农民协会形式，且容许其加入县农民协会；惟全县农民的组织，仍统一于一个县农民协会。

（乙）我们此时农民运动的口号是："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因此，现在农民协会的组织，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如单提出雇农组织或佃农的组织），不能明确的指出有若干亩田地者不能加入（因为不易定出一个适当标准），只能比较概括的指出以下之两种人，不准加入农民协会：

一、不耕种而拥有多数田地者；

二、重利盘剥者。

（丙）对旧农会政策，农民协会会员，一面须尽可能取得旧农会，以免劣绅土豪利用旧农会——所谓合法机关——压迫农民。当地主与贫农有冲突时，应设法使旧农会居调仃地位。

## 四、宣 传 问 题

（甲）一切鼓动和宣传，当以农民实际生活痛苦为出发点，切忌广泛的宣传及机械式、讲义式的训话。

（乙）乡村中的迷信及宗教伦理道德关系，不可积极的反对，应该有方法的、有步骤的去提高乡村文化程度，有时为使自己生活农民化，冀求容易接近农民，且有暂时附和群众迷信形式之必要，以取得新的工作发展。

（丙）农村中阶级关系极复杂故，不必提出"农民阶级"字样，此时只宣传"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这一口号。

（丁）宣传方法，当注意利用画报、标语、歌谣、幻灯、小说式的文字等项，最好能改变乡村传说神话而把我们的宣传附会上去，不要作毫无兴趣的机械式的、讲义式的灌输。

## 五、对地主民团及地方政府政策

（甲）对地主政策，我们的策略是用全体农民联合的口号，团结佃农、雇农、自耕农与中小地主，使不积极作恶的大地主中立，只攻击极反动的大地主，如成为劣绅土豪者。不可简单的提出打倒地主口号，以打倒劣绅土豪的口号，事实上打倒大地主。

（乙）对民团政策，民团固然是地主土豪劣绅利用以压榨平民，拥护他们自身利益的一架机器，但现时就望要根本消灭这种组织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政策是一面对团丁宣传，使不助土豪作恶，一面对团总人选主张由乡民大会选举，或用其他适当政策，以正绅代替劣绅为团总，使民团的权力第一步移到开明的小资产阶级手上，而不为农民动运之障碍。

（丙）对地方政府问题，应分别来说：

一、对军阀统治下的政府，应不断的反抗，或分裂削弱其统治以达到要求；

二、对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地方及国民政府影响下的地方，应以民众要求的形式取得权利。

## 六、农村联合战线

此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是急需各地农民大规模的暴动，始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各地农民自身为生活所迫，亦有急起暴动取得一部分政权而不可遏抑之势，尤其是广东。这种暴动也会使农民受很大的打击，我们的工作，不在遏抑此暴动，而在农民暴动中善于运用农村联合战线的策略；就是联合农村中其他群众，如小商人、手工业者、知识者共同行动，以免农民孤立。即在平时的政治活动，亦应采用农村联合战线，如下列几种形式：

（甲）在平时可取工农商学联合大会形式或各界代表大会形式；

（乙）在国民会议高潮时可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各城乡分会；

（丙）在地方有事时可组织人民保安委员会。

至关于农民运动对各方面所取的政策与态度，已包含于本议决案各条之内。

## 七　对教会所取的态度

在口头宣传上应引证许多具体事实，说明教会为外国帝国主义蹂躏中国人民之先锋，他们一方面替帝国主义作侦探，察中国内地情形——政治经济民情风俗，究竟是个什么的状况，另一方面，他们又用着和平博爱等说着好听的名词，甚至用一些金钱出来收民众对于他们的信仰，他们想把所有被压榨的民众一齐都欺骗下去，他们想引导一般被压榨的民众，都忘掉他们自身生活实际的痛苦，以保证帝国主义压榨民众基础之巩固与恒久。但在目前我们不要故意造出一个与他们发生实际的冲突的机会，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他们与军阀勾结处处藉口条约保护）使我们只能取如此一个态度，如果迁着教会明显的为恶（如霸占田庄、强买民房、包揽词讼等）的时候，我们便须鼓动公愤，群起反对，我们在此时努力参加。

## 八　对土匪政策

对于压迫农民的土匪，当然要尽力反对，就是不压迫农民的土匪亦不可让他加入农会，发生组织上的关系，只可使他在农民与土豪劣绅斗争时，站在中立地位，不为土豪劣绅所利用，因为若让土匪混入农会，是易使农民组织腐化，而且给外间攻击的口实。

## 九　武装自卫

（甲）农民现时要求武装自卫是必要的，但须注意两点：

一、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如干涉行政、收缴民团枪械等），是防御的自卫而不是进攻的自卫。

二、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因为有了常备的组织，便免不了因权力关系而时引起与各方面的冲突（如地主民团驻防军……等）。

（乙）自卫军名目可易为自卫团或其他名目，以免引起误会和嫉视。

（丙）自卫团之组织，不要过于复杂，务取其简单容易行动。

（丁）自卫团之政治训练，尤重于军事训练，否则素无组织训练的农民，在有了武装之后，很易发生超出于客观限度以外的行动，甚至于为军阀或首领所利用。

## 十　农民运动与国民党关系

各种农民组织不必带政党色彩，不必用政党名义去做（工会名义可以用），如果已有国民党农民运动工作的地方，我们当与国民党合作，惟农民协会对国民党关系，在组织上应是独立的，不可成为党的附属品。

## 十一　农村中我们党的发展

（甲）我们的党，在一切农民运动中，应努力取得指导的地位，应在每个最低级的农会内，均有本党支部的组织，为这个农会行动指导的核心。

（乙）农民加入我们的党，应以否忠实而勇敢的为农民利益斗争为标准，不必问其有无宗法社会思想及迷信。

## 十二　工作方法

我们的农民运动，工作时期还不很长，除广东外，差不多方才开始，虽然做了不少的错误，却学会了不少的经验，在以后工作方法上，特指出以下几个可注意之点。

一、一般的注意

（甲）做农民运动工作的人，必须注意先使他自己的言语、行动、生活、服饰农民

化，而后始能接近农民，使农民接受宣传。

（乙）要深知民间疾苦，才能说出农民的要求，要懂得客观可能行动的限度，才能引导农民去斗争，要会应用联合战线的策略，才能使农民不陷于孤立而失败。

二、在未有工作的地方

（甲）应利用乡村小学教师或本乡同志，城市中的本乡工人，假期回里的学生等，去发起组织，尤其是乡村小学教师是农村中天然的指导者，当努力取得这部分人。

（乙）利用各种重要事件下乡宣传时（如“五卅”宣传、北伐宣传等），乘机组织农民协会或类似的组织。

（丙）设法办农村补习学校、农村俱乐部，或组织游行讲演团、消费合作社……等，以深入农村发起组织。

（丁）应详细调查该地农民生活状况、风俗、习惯，找到可以接近他们组织他们的方法。

（戊）须注意从许多无组织农民暴动中，去使他从暴动中发生组织。

三、在已有工作的地方

（甲）应特别注意下层工作及秘密工作。村或乡农民协会是农民组织的基础，村或乡农民代表大会要做到能定期开会，会前须有充分的准备，开会时须尽量引起农民发表意见，避免机械式的、讲义式的宣传。

（乙）时时调查农民疾苦及与农民有关的各种方面的现象，能够不断的找出农民要求，而引导其有方法的行动与取得农民利益，才能维系农民对于组织之信仰与拥护。

（丙）对农民要求，当设法知道，设法提出，有时客观环境不能提出时，亦当详为解释，并慰勉他不要丧气，切忌简单的将其压下。

（丁）必须使党在农民中的发展，能成为一切农民运动发展的核心，才能巩固农民运动的基础。

（戊）不可贪图工作便利，倚靠政治势力，应处处注意使农民相信自己组织的力量。

# 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

（一）红枪会是军阀政治下的产物，是一般中小农民不堪贪官污吏之搜括，苛捐苛税之剥削，军阀战争之破坏，土匪溃兵之骚扰，以及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破产，土豪劣绅之鱼肉，才发生这种农民原始自卫的组织。虽然这种组织在发展以后，混入了一些游民分子参加在内，或是有些地方它的指导权落在土豪劣绅手上，然而绝不能说它纯是土匪的组织。过去及现在直隶、山东、河南一带的红枪会运动，它的要求和行动，都是直接间接反抗军阀政治的，它是真正民众的武装，它已成为民族革命中破坏军阀的一个重要力量，我们必须努力引导这个力量，并要努力使这个力量不为军阀土豪所利用。

（二）红枪会不仅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力量，并且是发展农民协会必须注意的工作。在红枪会最发达的河南、山东、直隶数省，农民运动与红枪会运动，尚不能十分划清楚，惟应注意使农会成为整个的农民组织，红枪会成为农民武装组织。在眼前须利用红枪

会去发展农民协会，待农民协会的发展普遍充实后，当使红枪会成为农民协会之武装力量。

（三）红枪会是民众反对军阀政治的一种力量，但这种力量必须与别的革命力量联合，且受别的革命力量之影响，始能减轻其失败成分与反动性质（因其组织散漫与迷信，故不耐战斗，且富破坏性而少建设性）。

（四）我们应该给他们一点组织的方法和行动的政纲，这个组织方法和行动政纲，应该是极简单明瞭十分易懂的。

关于组织方法，第一步我们先宣传他们联合各地方红枪会，组织一秘密交通机关，为各方面互通声气接洽互助之所。这个通信处由我们红枪会同志负责来做，最初只是一通讯调查机关，渐渐的使它有力的造成一指导机关。

交通机关设立后，第二步便想设法召集各地方红枪会、黑枪会等领袖，开一代表会议，形成一简单的组织，议定一共同行动的政纲，这个共同行动的政纲，不外下列几项：

一、抵抗土匪；

二、抵抗无纪律军队之骚扰；

三、抵抗苛捐杂税；

四、抵抗拉伕拉差；

五、拒绝行使军用票，或要求以政府所出纸币纳税；

六、保护地方秩序（即参加地方自治工作）；

七、监督地方财政公开；

八、反抗贪官污吏。

这些口号，必须换成当地民众所最易懂得的话句。

红枪会现时的行动，只能在上列口号范围以内，只是自卫的组织，可以要求参加地方自治，万不可纯以这部分势力企图拿住整个的地方政权。

（五）不必积极去反对红枪会的迷信教条，因为这正是它们所能团结奋斗的要素。这本是落后农民不可免的现象，只要求它实际行动有利于革命之发展。

（六）在河南、山东现时的特殊情形，真正农民的红枪会，与土匪性质的红枪会，土豪利用的红枪会，均是反对张宗昌和吴佩孚的。我们自然要使它结成反对当地军阀政府的联合战线，同时须巩固农民真正的组织。

（七）红枪会的指挥权，是常常容易落在土豪手中，变成土豪利用的工具。土匪性质的红枪会，又常常成为土豪最得力的基本群众，战斗力亦以它们为最强，我们对它们的政策是：如不能把它们结合在反对当地军阀政府的旗帜下时，须先取得其群众，第一步使真正农民的红枪会，不受其虚声恐吓，能够壮胆的独立存在，第二步努力使土匪性质的红枪会不为土豪所利用，反而站在农民方面去攻击土豪。

## 商人运动议决案

中国商人在民族运动中有三个倾向：最反动的是洋行买办、银行、钱业、大的百货公

司等洋货商，这是纯粹买办阶级，他们差不多已经没有民族观念了。其次就是由大商买办进步到新兴的企业家，纱业、丝业、航业等，他们因为企业扩张，需要政治的扶助，有了点政治觉悟，也有了一点民族观念；然而他们未尽脱离买办阶级的意识，希望以改良手段向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得到一点利益，尚不敢公然与民众接近。中小商人则多倾向革命，至少不反对革命；他们和帝国主义者无直接经济的关系，他们受军阀的苛杂捐税和大商排挤两重压迫，而时有破产的恐惧，他们又没有工厂，不怕工人罢工，因此他们能够和革命的工人学生群众接近，并且他们自身就是很广大的群众。

我们商人运动之对象，正是中小商人的群众，他们是民族运动的联合战线中一重要成分，城市运动中有了他们，才免得工人学生孤立，乡村运动中有了他们，才免得农民孤立。

我们商人运动之方法，乃是用商民协会等类形式，组织中小商人群众，以图改造现有的商会，而不是仅仅联络现有的商会；因为现有的商会这种机关，尤其是大都市的商会，不但为大商买办所盘据，不能代表中小商人，并且空洞没有群众。

我们商人运动之重要目的，是组织中小商人，尤其是宣传中小商人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妥协卖国行动，同时也要反对中小商人出资给保护大商买办阶级的商团保商队，中小商人应该提议组织一般市民的保卫团。

商民协会，应该是个纯粹中小商人的组织。不加入大商，同时在资本化的大都市，不宜加入下级店员，因为这些地方的下级店员应该归到商业职工的组织，他们和其他商人有特殊地位及利害冲突。

在政党的关系上，革命的中小商人，应该是国民党左派的群众，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应该尽量集合这些群众于国民党，以充实其左派的力量。如果该地国民党左派在商人群众中已有势力，则可经过国民党指导商人的组织及行动。商民协会中如果有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党团工作，亦不可放弃，以图实现我们的政治主张。

## 学生运动议决案

在民族革命运动中，革命的学生算是一种重要的成分，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都可以看出。因为他们在客观上大部分是濒于破产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在主观上学校生活中有易于接受革命宣传的知识与机关。今后“国民的联合战线”工人农民之次，便算学生是重要成分。不过学生要在国民的联合战线中有力量，必须自身要有学生的联合战线，以集中学生群众的势力。

过去，我们在学生运动中，也曾注意到学生的联合战线政策，即统一学生联合会，在北京、在上海，都收了相当的效果，在他处或未采用此项政策，或表面上采用此政策，而无适当的方法应用此政策收得效果。

今后当依左列原则，决定适合各地实际情形之策略，以巩固并扩大学生的联合战线：

一、在各校学生群众中努力宣传“学生运动统一”的口号，不分主义、党派、宗教的组织统一、主张统一、行动统一。

二、所谓学生的联合战线，所谓学生运动统一，决不是说要各派学生都联合统一在我们的主义、主张、口号之下，而是由我们向学生群众提出各派学生之大多数都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革命口号与主张，以统一学生运动。

三、所谓主张统一，乃是行动上的主张之统一，而不是想思上的主张之统一。因此在一切实际运动中，我们固然只能提出大多数学生能够接受的口号与主张，以扩大学生的联合战线，以统一学生运动。而在日常的政治思想宣传上，仍应尽可能的列举各种具体事实，宣传我们的革命理论与策略之必要，在思想上影响学生群众，以取得我们在政治上的导地位。领

四、我们固然要与国民党左派学生亲密的合作，在一切对外的政治争斗和学生自身利益的争斗，都必须十分恳切的邀请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及基督教派的学生合作，以暴露其领袖之反动或无能，使其群众左倾。

五、我们的力量应在各校学生群众中，学生联合会职员，我们只须联合左派占过半数已足，切不可取包办形式。

六、在日常的政治思想宣传上，我们对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及基督教派，丝毫不能让步；惟所谓不让步，乃指事实分析与理论辩驳而言，不可轻以反革命反动派等恶声相加。在私人关系上，尤不可失了友谊的态度，致惹起无党派的学生不快之感。

七、我们对教会学校的态度，只能攻击教会教育，不必攻击教会学校，更决不能攻击整个的教会学校的学生。

八、我们在各校的同志，宜努力学校功课及注意学生生活（如学生俱乐部、讲演会等），尽可能的不脱离本校学生群众，然后才能够建立我们学生群众中的领导地位。

## 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议决案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一年的奋斗中，组织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且渐能接近青年工人群众，吸收了一部份革命的青年工人。工作上颇能尽领导学生工人及一般青年群众，参加党所领导的政治运动。这是扩大会认为满意的。

但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一领导青年作本身利益斗争和一般文化运动、及在党指导下作政治斗争的青年革命组织。过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仍是没有尽到本身的使命，未能青年群众化，这是以后应当注意改正的。

自去年五卅运动后，中国工农和一般国民革命运动均有极大的发展，因阶级分化所发生的反动思想和组织，日渐扩大，甚影响于青年群众。这时团的任务，就是要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和青年本身利益上，去获得更广大的青年工人、农人和学生群众，领导他们在党的指挥下去参加目前的革命斗争。为此，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独要继续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多吸收革命的工人、农人、学生和其他被压迫的青年分子，使团的组织深入下层青年群众，而且要力求工作青年化，因为没有关于青年切身的工作，团的组织是不会深入青年群众的，但是不能因此而放松应有的政治活动。

中国学生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革命作用仍将继续扩大，学生运动若能在我们指导下而

发展，这对于党以后的农民组织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组织，必有很大的邦助，今后党应与团切实指导，但团切不可因学生运动的政治指导转交于党而减少其积极活动的成分，反而影响于学生运动的发展。

党与团虽然经过一次年龄的分化，但仍有许多地方没有党的组织，另有许多新的地方宜于先发生团的组织。在这许多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团应负责邦助党发生党的组织，在党没有组织之前且须执行党的各种决议。同时在有党而无团组织的地方，党应邦助团发生团的组织。

团既应注意组织与工作青年群众化，在这工作进行中，党应更加多量的指导与邦助，党在工人运动中，应注意青年、童工特殊经济利益的拥护。党对团的指导与邦助，须注意保持团的独立精神，不可处处干涉团的行动，反而阻碍其工作的发展。各地须注意整顿下层党与团的组织关系，不宜任意调用团内负责同志，凡是兼团员的党员，应积极参加团的工作，以尽领导团员积极活动的责任。同时团应注意从工作中培养积极活动分子，以充实下层指导力量。

总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后的工作，应注意求其青年群众化；同时党应视团的工作即党指导下的一部份工作，而加以切实的指导与邦助。

# 军 事 运 动 议 决 案

一、中国目前是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与反动军阀武装冲突的剧烈时期。在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中，客观上至少可以进行相当政治宣传。同时反动的军阀又因彼此敌视，和军队中的内部冲突，与雇佣兵之因过分虐待而离异，使我们易于在反动军队内部进行工作。

乡间有许多贫苦农民的秘密武装组织，且已开始爆发有政治意义的武装暴动，如河南、山东红枪会之种种行动，就是一例。

城市工人阶级的争斗中，亦常常发生与工贼武装冲突的事件。南北铁路工人都渐能于内战中，表现他们的作用。

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同时，此项工作就是使本党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

从前我们同志不注意军事运动，表示研究性质团体的色彩。最近本党同志虽然注意军事运动，却又袭用国民党军事运动的老方法，专门运动高级军官和用金钱联络土匪头目，表示未能了解本党目前军事工作的责任，如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的意义。

二、过去半年的工作，只形成了中央及各地工作机关及其相互之关系，对于收集材料和工人自卫团的进行，获得相当成绩。除在进步的军队中做了相当的政治宣传工作外，对于反动军队中的工作，多半注意上级军官间的冲突，未能与下级官佐和兵士群众发生关系，对于武装农民团体（如红枪会等）尚未开始有计划的工作。

三、此后应设法在反动军阀的军队中，组织能受我们指挥的兵士支部，并与士兵群众

发生关系，利用军队中日常事故，口头的或文字的宣传兵士群众。同时应用全力在兵工厂、军械局等处活动，并组织支部，务使反动军阀不能利用这些武器。对于农民武装团体，应首先注重训练他们的下级领袖，特别是政治训练。至于工人自卫团的进行，不在人数的扩充，而在从政治上和军事上训练工人自卫团的中坚分子。

四、对于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如果我们派人去做政治工作，便须取"少而好"的主义，如果有人去当军官，其责任必须是使这个军队愈渐团结和愈渐革命化，极力避免革命军队的过早分化。他们的行动须完全依照当地党部的指示。

五、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份，各地军事工作负责同志，应与当地党的书记发生密切关系，向书记报告工作情形，并和书记商量自己工作。

## 妇女运动议决案（委员会通过）

看了中央妇女部的报告，妇女运动在各地都有相当的成绩，妇女运动已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表现了相当的作用；不过同时又发现出许多缺点，如只有机关活动而少深入群众（广东、北京），不注意党的发展，出版物太单调、太政治化等。因此今后我们的妇女运动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注意群众　过去在许多地方，我们都是拿国民党的妇女部、妇女协会、各界妇女联合会等机关去活动，去号召群众，但结果多忘记了群众，没有打入群众，而只占据这些机关；迂到某种运动发生时便借这些机关的名义去发宣言传单打电报等，因此愈使群众怀疑而畏惧，而我们便愈离开了群众，我们便愈加孤立，这是我们很大的错误。今后我们的工作，固然不能不利用民校、妇女部、妇女协会……等机关去号召群众，但我们根本的责任是在"号召群众"，取得群众，决不是占据机关，形成一种机关运动。因此我们要根本注意群众的工作。

二、联合战线　现时在妇女群众中也因阶级分化的影响发生了派别，尤其是在广东。因此在妇女运动中对于各种派别的妇女间之联合战线问题，成了很重要的问题。在过去我们对于这点未免太主观了，我们往往只顾自己行动，只提出自己的口号，而很少注意到各阶级妇女群众的利益和各派妇女团体的主张，结果我们成了很单调的孤立的活动，而丧失多数群众的同情，这也是过去的错误之一。因此我们今后应该特别注意各阶级妇女及各妇女团体间的联合战线。要建立这条联合战线，我们便须注意：（一）多注意妇女本身的利益；（二）迂各种运动时须相当的尊重其他妇女团体的主张；（三）避免包办的形式及各种不必要的冲突。

三、劳动妇女和女学生　应该怎样注意劳动妇女和女学生，我们在第四次大会及去年的扩大会议的决议案上曾经说过。可是各地至今还很少有成绩，有些地方甚至还很少注意（如北京、广东、湖北等），这是很坏的现象。我们须知劳动妇女运动固然是我们妇女运动中的骨干，同时女学生运动亦极重要，因为女学生在现时一方面是女工运动之一种工具，另一方面在一般妇女运动上，又是打破宗法社会的思想习惯之唯一动力。

四、农妇运动　农妇运动现时还只是开始，但当农民运动正在各地蓬蓬勃勃地往前发

展的时候，将来的农妇运动在中国妇女运动上一定要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我们此时虽不能有怎样具体的计划，但我们至少要开始严重注意这个问题，开始准备作农妇运动的人材，尤其是广东和湖南须特别注意。

五、妇女出版物的妇女群众化 最近在各地妇女出版物一天一天的加多，这不能不说是种进步的现象。可是这些出版物内容，不是千篇一律，便是太政治化或太笼统的理论化，而很少能真正代表妇女本身说话，表现妇女的真正痛苦和实际要求。因此以后各地我们自己的及我们指导之下的妇女刊物均须力谋改良，切戒空洞的政论和其他空洞的理论，多描写妇女的切身痛苦和实际要求，务使每个妇女看到都感觉为她自己说话，只有这样，才能收到对于一般麻木妇女宣传和鼓动的效果。

六、整理各地妇女部及妇女运动委员会 各地现时虽有妇女部和妇女运动员委会，但多很不健全，故都不能指挥各种的妇女运动。我们今后要想加紧进行妇女运动的工作，整顿各级妇女部和妇女运动委员会是一个先决问题，各级党部须特别注意此点。

七、发展党员和养成妇女运动人材 自上次扩大会议后，女党员虽增了不少，但是比较起男党员的数量来，还是差得多。并且只限于上海、湖南一二区域，其他如广东、湖北、北京等地女党员的数量简直发展非常之慢，这是很不对的，以后各地须特别注意女党员的发展。至于妇女运动的工作人材更是缺乏，以致各地妇女运动的工作都感觉进行困难。因此养成妇女运动的人材（尤其关于女工、农妇运动的人材）也是目前各地党部最重要的责任。各地党部在可能范围可开办妇女运动训练班或妇女运动特别讨论会，或召集负责及可造就之女同志与以经常的训练等。

## 关于济难运动的议决案（委员会通过）

济难运动为实现联合战线的一种工具，此种运动直接可以联合各阶级各党派反抗军阀与帝国主义之暴行，间接可以引起大群民众参加或同情于革命运动，各级党部应重视此项工作，并切实执行以下数事：

一、各级党部应在各方面邦助济难会之组织，使各该所在地方成立正式分会，其分会已经成立应设法促进其发展。

二、督促全体党员积极参加济难会为会员，并在可能范围内担任济难会的各种工作。

三、凡在本党指挥下之团体，应引导之使加入济难会为团体会员，并使其分子完全加入济难会为个人会员。

四、各级党部须在委员会中（或党员中）指定济难运动委员会（或特派员）担任各该区域内之济难运动。

五、各支部须在各学校、各工厂、各机关及各市区中指定相当同志（至少一人）为负责人，担任各该学校、机关、工厂或市区内济难会会务。

六、在各大城市及各大工业区域中须在济难运动委员会或特派员之下，设各种群众组织委员会以分担各种群众中之济难会之组织（如工、学、农、商、妇女、儿童等）。此项委员会，应使之与党的各种运动发生密切关系，其负责者迂必要时应当参加各该种运动负

责同志之会议。

七、各级党部应会同济难运动委员会或特派员，制定各该地方济难运动详细计划并经济予算，呈报中央核准。此项计划之制定及负责人之指派，须于今年八月间寄到，至迟不得过八月底。

八、济难运动委员会或特派员在政策上须完全受党的指挥。中央济难运动特派员对于各地担任济难运动工作同志的指导，应经过各地区委或地委，如果是没有党部的地方，则暂由中央济难运动特派员直接指导（济难会全国总会对于各地方分会公开的指导，当然不经过党部）。

九、党部应定期召集济难运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使之了解党的活动之全部，以为济难运动之参考。一切济难运动政策之规定，重大问题之解决，以及用人之指派，党部须交济难运动特派员或委员会拟议而决定之。

十、党员担任济难会工作时，均须用公开名义并受公开机关之委任，最好为大会当选之职员。

十一、同志应在各公开的济难会中，担任实际工作之职务，而不必取过高的位置。此项较高位置，应以非党员之左倾分子充任之。

十二、济难会各地公开机关之职员，同志及左倾分子须占大多数，但同志不得过三分之一。

十三、同志之在济难会工作者，应切实与非党员分子合作，不得包办一切，在可能的范围内，应将工作情形公开报告。

十四、济难运动责负同志，应将其活动情形，按月报告党部转呈中央。

十五、各地济难运动负责同志，关于济难会之宣传，其态度应灰色，文字应通俗，更应注意地方问题。

十六、各地如有反动的压迫发生时，应用济难会的名义，召集各界各团体作坚决的反抗，同时应将该项事件发生之真象连同照片报告济难会全国总会，以便作广大的宣传。

十七、济难会全国之总宣传机关（“光明半月刊”及“济难画报”），各地济难运动负责同志应设法为之征集材料，济难会总会之临时的新闻、宣言、通电等应设法在当地报纸发表。

十八、各地之被难者，不论其党派、阶级、宗教之别，同志皆应详细调查，报告济难会及其上级机关，请求适当的救济。

十九、各地工作同志，应绝对遵守公开济难会之章程规定，不得任意变更以引起反对者之藉口。

二十、各级党部应该视济难会为一种社会团体，不得视为党的附属机关，任意以命令支配之；更不得不顾济难会之章程规定，任意要求救济经费。

# 湖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宣言*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

本大会代表湖南全省有组织之工人十八万余，集合于长沙举行破天荒之代表大会，今当开幕之日，特郑重作下列之宣言。

我湖南工人阶级，觉悟最早，在过去数年间即已走上革命的程途。自一九二〇年以来，虽处军阀赵恒惕淫威之下，而活动未尝仃止，从秘密工作之中，组织日益发展，团结日益巩固。因工人阶级革命的力量最大，革命的情绪特高，与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相周旋，遂首蒙悲惨之牺牲。黄爱、庞人铨横被惨杀，黄静源等继受戕害！至于挨打坐牢或被驱逐的领袖及工友，已经是指不胜出了。我们由这些惨痛的事实，知道工人阶级唯一的出路乃是向前奋斗，不是退让可以了事的；忍苦奋斗数年，今日才得推翻军阀统治的局面，集合举行第一次大规模的会议，我们不能不谨以无上的哀忱，纪念我死难诸工人领袖及工友们的牺牲精神，并致敬意。同时本大会誓愿继续诸烈士，以为我工人阶级努力，为诸烈士复仇！

本大会今日开幕于长沙，其意义简括地述之可得两点：一、检查过去奋斗的成绩、力量及所得的经验；二、决定将来进行的方针。换句话说，即是当革命空气紧张之今日，我工人阶级要根据过去的经验来定下计划，继续推动革命工作的进行。也就是说：要从今日开始，使湖南的工人运动及整个的革命运动都有长足的发展，满意的收获。

以湖南而论，我们看出几个大的军阀如赵恒惕、叶开鑫……虽已打倒，而军阀制度所托命的社会基础还根深蒂固，未曾颠覆，军阀的羽翼如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工贼……一切反动分子依然到处潜伏，随时活动，可以使军阀很容易的复活或新生起来。富有革命经验和大的革命力量的我工人阶级，必当拥护革命政府和革命的民权，以使反动势力永久消灭。这里我们认定唯一的方式是省民会议、县民会议、乡民会议。从这些革命民众的会议，自然可使反动分子匿迹潜踪，彷徨歧路者赶快会加入革命战线来。

我们又看出反动势力过去联合压迫力量之大，而在革命的进程上不能不采取联合战线，我工人阶级对此一策略仍然努力拥护。这是很明显的理论，而且在事实上给了我们以孤军深陷的许多教训。我们当然无庸迟疑地以与各革命民众尤其农民阶级继续联合下去。我们如何运用这一个联合战线呢？本大会即当从容讨论，并且是希望革命的各阶级不吝赐教的。

最后，我们本身过去所受的痛苦，虽不少的人们能予我们以同情，而我们知道要谋解

---

* 湖南全省总工会系由原来的“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改组而成，它正式成立于1926年9月1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于1926年12月1日在长沙开幕，28日闭幕。

放还是靠着自己。本大会深以湖南过去兵灾、匪祸、天灾，及其帝国主义者之经济侵略，使全省工友失业或所业不能自给的痛苦，已经无以复加，亟须共同提出我们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这个是本大会当然的任务而无庸讳言的。

总括以上所述，我们的口号是：

打倒帝国主义暨其工具——军阀！

拥护革命政府！

拥护革命的民权！

速开省民会议！

建立廉洁政府！

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铲除工贼！

统一工会组织！发展实业，救济失业工人！

改良工人待迂——制定劳工保护法！

工、农、商、学、兵大联合！

黄、庞、黄、汪精神不死！

中华全国总工会万岁！

湖南全省总工会万岁！

湖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万岁！

（转自《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

## 〔附〕近数月来湖南的工人运动

霍　　然

湖南的工人是老早就有了觉悟的，过去数年间，在赵恒惕强力压迫之下，迭演了许多抵抗军阀，自谋解放的痛史。自从北伐军克复湖南，迄今数月，工人运动更有长足的发展。这个，我们应明白，工人并不是只全靠好的政治环境才起来的，实在是他们有了国民革命的觉悟，所以在目下特别努力，积极的团结以参加革命工作。只看北伐军事进行中，铁路工人运输工人……是如何的卖力，就可知工人们的革命力量了。现在将最近几个月来所有工人运动的情形，分类总叙一下如后。

### 一　组织的现状

湖南的工人组织，近来比较有了一个好的系统，就是自国民政府治湘以后，保护工会

的发展，工人自知应该密切的团结，打出统一工会组织的口号，使工贼，反动派，以及土豪劣绅，流氓等，皆不能乘机活动，而得一致的立于全省总工会旗帜之下。以地域论，已经成立总工会的，有如下的十八处：

长沙、岳阳、浏阳，衡山、宜章、醴陵、武岗、宝庆、衡阳、常德、湘阴、茶陵、宁乡、桂东、安化、永明、沅江、株州。

至于产业的组织则有下列数处：

锡矿山、水口山、炭塘子、第一纱厂、安源（原为俱乐部已筹备改组）、粤汉路、株萍路、汽车路、轮船海员。

已成立筹备处者则有如下的二十六处：

永兴、新田、常宁、澧县、安仁、石门、零陵、新化、攸县、成步、汉寿、道县、汝城、耒阳、宁远、溆浦、南县、郴县、益阳、湘乡、安乡、资兴、祁阳、桂阳、湘潭、平江。

尚未着手组织或已着手而为我们不曾知道者则为下列的三十二处：

临湘、酃县、临武、东安、江华、蓝山、嘉禾、靖县、通道、绥宁、新宁、沅陵、辰溪、麻阳、芷江、晃县、黔阳、会同、保靖、大庸、桑植、龙山、永顺、古丈、泸溪、乾城、凤凰、永绥、桃源、慈利、临澧、华容。

从上面看来，只有很少的县分（如桃源等）未有组织是一种落后的现象，而大部分则本是工人不多的地方，一时不能成立一个工会的（如西路上游各县，现在还完全是闭塞的，工、农的界限绝对分不出来）。而临武虽无总工会的组织，所属香花岭矿区，有二千多工人，却正在进行着设立工会了。

## 二　北伐进行中表现出的力量

工人们对革命的需要特别迫切，所以在革命过程中表现的力量也特别伟大。现在的国民革命，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中国所有被压迫民众都是应该一致起来的。湖南的工人阶级在这上面不仅不曾偷懒一点，并且常常是主力军和推进机。数月来报纸揭载着，有下列的事实：

### 一　工人组织大批运送队

劳动界为实行民众与武力合作，以便北伐军早日会师武汉起见，昨日由工团联合会，召集各工团，拟组织大批运送队，以供北伐军之差遣。今日出发者已有五队：第一队队长朱桂和（车工会），第二、第三、第四各队，总队长朱玉和（粪码头工会），第五队队长易开标（车工会），并闻工团联合会印有画报十余万张随交各运送队沿路散发，以促进人民与武力团结云。又讯，本日长沙县署又有公缄致工团联合会云：

“径启者：顷奉总指挥部电令，‘我军大获胜利，现由广东运来大批子弹及军用品，急须运送前方，限即募短夫千余名，以备输送’等因，奉此。又各军催募运夫络绎不绝，约计须一千余名，合并总指挥部所须短夫，共二千余名。而敝署前虽招募运夫不下万余人，均已出发前方，现又奉令募雇，困难已达极点。窃维革命事业，全赖民众共同

合作，以期早日成功。顷面商贵委员长，请联合工团组织运送队，当承赞许。具见热心爱国、急公好义，曷胜钦佩。惟事关输送，刻不容缓。应请台端特别赞助，将工团运送队克日组织成立。每队一百二十名，暂组织二十队，以济急需。军用紧急，迫切万分，务祈提前赶办，以重戎务，是为至盼。此致湖南工团联合会委员长郭”

工团联合会来日将召集各工团继续组织。

### 二　工团运送队继续出发

工团联合会组织大批运送队出发者已有五队，今日又遣派三队，队长为朱桂和、李福生、王长春，各队均持有工联会致各军长官公缄。缄云：

“径启者北伐军兴，敝会领率所属工会工友参加讨吴工作，以尽工人阶级应尽之责任。值兹战事正烈，输送重要，特组织大批运送队，以备军需。兹有敝会运送队第□队，派遣为贵军运送军实。除已切嘱该队队长督率所属散夫慎勤服务外，特此缄达贵军，希赐指示，并望力予保护为荷。再，敝会运送队带有宣传品，沿途散布，以唤起民众，赞助北伐军民合作之大成功。此致

贵军长官

委员长　郭　亮”

### 三　铁路工人援助北伐军

新河车站传出消息，昨北伐军进驻五里牌，敌军正退却之际，五里牌车站分工会铁路工人拆毁铁轨三节，并将往湖北之电线同时割断，敌军消息不灵，为革命军所围，截获敌军宋大霈部火车三列，子弹器械无算。

### 四　安源铁矿工人大举援助北伐

为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而一致团结在俱乐部下之安源路矿工人，去年为军阀枪杀解散。可是其留着的二千余人，并没有终止他们的奋斗。而且在北伐军进攻萍乡时，特别表现他们的力量。在萍乡、泸溪、袁州间将电话、电报概行破坏，并派人在萍乡镇署后施放炸弹。镇署火起，唐福山仓皇出走，非独市面未遭搜扰，即所存子弹军需亦完全未动。这次截得子弹数百箱，地雷二个，军需无算，已由工人刘启云等缴交第二军查收。

### 五　铁路工人援助北伐之详情

北伐军兴，各种工人组织破坏队、侦探队、运送队、救护队、慰劳队等实行助战，功绩甚著，而尤以铁路工人之破坏队，侦探队为最。据铁路总工会报告，自革命军由湘乡进攻，至恢复武汉止，约可分为三时期：自湘乡进攻至占领老关时止为第一时期，此时破坏队分四队出发，第一队在姚家坝、板杉铺之漆家坳附近，第二队在姚家坝至板杉铺之东冲铺附近，第三队在阳三石至老关之殷家冲附近，第四队在株州、渌口之间，节节破坏敌人境内之铁轨电线，侦探队亦随时分队为递步哨之组织，侦察敌情。第二时期，则自汨罗进攻到恢复武汉时为止，八月九日在麻塘至岳州间施行破坏，为哨兵追击，未能成功。二十一日晚在路口铺、五里牌间，拆毁铁轨，敌人军需军械为我七军围缴者无算。二十三日在

中伙铺、汀泗桥之间，二十四日在土地堂，纸坊之间，均阻碍陈嘉谟援兵之进行。武汉恢复后，我革命军进攻萍乡时，是为第三时期，此次破坏队分峡山口至萍乡为一队，萍乡至安源为二队，安源至泸溪为三队，又至莲花庵为四队，泸溪至袁州为五队。一、二队炸毁萍乡镇守使署，夺获子弹、地雷均点交十二团查收。其余各队则在前方与侦探队联络，破坏交通事业，报告敌方情形。

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工人革命的勇气与能力了。我们可以说一句一点不夸情的话：只有工人肯干革命，只有工人能领导革命！

## 三 经济的斗争

工人为什么肯进行革命呢？他们受帝国主义与军阀直接间接的压迫，求生不得，痛苦非常，舍了革命，实在没有出路。他们为什么能领导革命呢？他们团结一致，猛勇进攻，其力至大，不是帝国主义者、军阀、资本家们的枪弹炮舰所能抵抗得住的！年来全国的事实早就证明了，而我湖南近几月的工人运动更是眼前好例。

我说他们求生不得，痛苦非常，大概稍一注意工人阶级的生活情况的，当然首肯。惟其如此，他们不能不努力革命；同时，他们更忘不了自身生活的改善来作经济的斗争。从近几月中工人们的加薪运动看来，可以知其蜷伏呻吟不能再忍的痛苦之万一了。

水口山矿工会恢复了以前俱乐部的十八条，锡矿山矿工会获得了新的十二条，炭塘子的工银比较原来差不多增高了四分之一，这是产业工人从组织上得的经济利益。可是安源工人和纱厂工人，都因什工失业，两个工会努力作开工运动，现无具体结果，是这几千工人本身，也就是湖南乃至中国目前产业界的大问题呢！

手工业工人每日所得的工资，其数目有时小得令人吃惊！例如织袜工人——尤其是女工，每日做了十四、五小时的苦工，甚至还得不到一、二百文！以目下的铜元折合银洋，简直只值得五、六分钱！又如人力车工，一日所入，付了租金伙食，剩的也就只有一角多钱了！这种情形，工人本身固然是一刻难安，就是稍有人心的旁观者也会要看不过去罢。各地各行工人纷纷起来要求加薪，也就无怪其然了！现在就见于报纸及调查所及之曾作加薪运动的工人，表列如下：

| 工会名称 | 要求的要点 | 获得的经过 |
|---|---|---|
| 长沙人力车工会 | 日租二角四分减为二角 | 总政治部负责解决的，未罢工 |
| 平江纸业工会 | 块纸八百文增为五角 | 罢工 |
| 长沙靴鞋工会 | 改正行规 | 罢工 |
| 湘雅工会 | 增加工资 | 由长沙总工会调处解决 |
| 甲工工厂工会 | 寒暑假三分之一津贴 | 罢工 |
| 铅印活版工会 | 要求加资减时 | 罢工 |
| 贫民工厂工会 | 改良待迂 | 未决 |
| 长沙染工会 | 修改行规，增加工资 | 总工会调处解决 |
| 织袜工会 | 改良待迂，增加工资 | 罢工 |
| 茶陵总工会 | 加资 | |

| | | |
|---|---|---|
| 宝庆印书工会 | 加资 | 罢工（未决） |
| 宝庆泥木工会 | 加资 | 罢工 |
| 长沙石印工会 | 加资减时，整顿行规 | 市党部总工会等调仃解决 |
| 烟作工人 | 加资 | 罢工 |
| 常德泥木工会 | 加资 | 罢工 |
| 常德烟业工会 | 加资 | 罢工 |

上面所列是很不完备的，然据此可见工人生活压迫之非自救不可了。

## 四　反动派之捣乱工运

工贼等破坏工会组织，分散革命力量，以结欢于帝国主义者军阀，由来已久。自湖南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而反动派之捣乱行为亦无所不用其极。但工人既迫切需要革命，对于反革命之行为当然是认识得很清楚的，何至受其欺骗？不过他们假名活动，总是大不利于工人，自然不能听其公然为祟！可是工贼之外，有土豪劣绅，有无耻政客，以及流氓痞子，都是很想利用工人来为恶的，这也就是工人运动前途之暗礁了。如长沙的劳工会，以黄、庞当日之牺牲精神，诚为工人福星；但工贼王光辉、谌小岑利用此一块金字招牌，积恶已多，居然还想在光天化日之下继续作恶！他们显然反革命，不仅工人不能容忍，各公法团皆认为是革命前途的大害，所以联合起来打倒了。再如常德的杨彝□，本是地方上的流氓，也居然吃工人的血，幸而政府明了，业已执行封闭。可是湘潭的、桂阳的、祁阳的纠纷，都还未得解决。他们或是土豪劣绅，或是小政客，凭其社鼠城狐的本事，希图把持工会来便一己之私，却还够不上是反革命，不过他们根本就是压迫工人的，如何能容许其混迹于工人群众中呢！？

湖南全省总工会，以其前年工团联合会在过去数年之奋斗，于国民政府治湘之日，依法改组，已为全省工人之领袖。由他的地位和能力，应该负责解决这一切纠纷，不可使工贼、土豪劣绅、无耻政客、流氓……有乘机破坏之余地。为国民革命着想，为工人解放着想，湖南全省总工会是要肩担起这些责任的。同时，我们希望各阶级被压迫民众，能继续的联合起来，一致向反动派进攻，也就不怕一切妖魔鬼怪之妄逞其伎俩了。

我们上面的粗枝大叶的叙述，既无系统，又不完备，实在不足以表明湖南工人运动近数月来发展的情形，惟见到工人阶级觉悟的程度，蒸蒸日上，喜在心头，不得不勉强概括写出来，以表示我对工友们之热望。我诚心地祈祝工友们积极奋斗，勇往直前，预卜胜利。工友们！努力罢！将来的世界，是我们的！

（原载湖南《战士》周报24期，1926年11月4日出版）

# 湖北全省总工会
# 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

## 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

湖北全省总工会成立之经过与目的，以及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之职任，已详去年（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本会成立大会宣言。今代表三十万工人之湖北全省总工会，又于本年一月一日，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适于此时，发生英兵任意枪杀同胞之一三惨案，全体工人因而震愤，幸赖我全体民众忠勇奋斗之结果，自动收回英租界之壮举，即于一月五日实现。同胞之被惨杀，与租界之自动收回，竟同时发生，使我全省工人代表大会亦遂增加无穷之意义。中国工人阶级自有其争斗之历史以来，如一九二二年之海员罢工，一九二三年之二七事变，以至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粤港罢工，广东工人之参加统一广东战争，北方工人之参加反奉战争，及此次工人之参加北伐战争等等，或系予帝国主义以重大之打击，或系与军阀及反动势力一拚生死。总之，工人阶级之奋斗，无一不是直接间接为民众争自由和为民族争独立。此次武汉工人奋勇参加自动收回租界之运动，更足证明工人阶级势力之壮大，与民族解放运动有极大之关系。自总工会成立以来，罢工运动澎湃一时，曾因罢工之故，颇引起少数厂主、店东之不安，更予帝国主义者及反革命派以挑拨离间之机会。其实罢工之目的，均系工人要求减轻不可忍耐之痛苦，少数厂主、店东之不安，则由于轻视工人之固有观念所误，而帝国主义者与反革命派之挑拨阴谋，欲引起社会对于工人运动之厌恶，其目的不只破坏工人运动，尤在于分离革命势力，使工人无由置身国民革命，而促进国民革命之发展。所幸事实之真相日见显露，罢工之发生，不但不是出于工人领袖之故意鼓动而成，更无人能强迫其仃止罢工；因工人之要求，实关系工人之生存而迫不及待者。工人奋起自相组织，即有所要求，因有相同之要求，而更促进其组织。因此为时不及三月，湖北工人之有组织者，遂由十万增至三十万，更能进于自动收回租界。如是工人为民族争独立之功绩，遂亦大白于天下。我全国工人阶级开始组织之初，即系为同一目的而奋斗，最近且在统一组织之下，担负工人阶级的责任。据去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统计，全国工人之有组织者，不下一百二十万，今则更有增加矣。从历史上看来，工人运动的发展，没有不是加厚革命势力，巩固革命势力的。工人阶级自知为最革命之重要成分，因而难免帝国主义者、军阀及反动势力之嫉视，企图由打击工人运动而打击整个革命运动。因此我工人阶级敢正告国人曰：凡打击工人运动者，不但妨碍革命势力之发展，且不啻为帝国主义者、军阀及反动势力服务。湖北工人阶级自“二七”起，即已有其奋斗之光荣历史，最近之迅速进步，更使工人阶级对于整个革命之责任日见重要，工人阶级自身亦更明了其责任与地位。工人阶级深知在目前对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动势力的紧迫争斗中，客

观上自身痛苦之减轻，只能达到最低限度。而工人阶级欲达到较多之解放亦必须工人阶级组织日见巩固，而组织之巩固，又须获得充分之自由；自由尤须有保障，故须先打倒摧残自由之敌人，而摧残自由之敌人，即为帝国主义者、军阀及一切反动势力，亦即是全体民众之公敌。在此打倒全体民众公敌之奋斗中，工人阶级准备与农民、中小商人、革命军人、知识分子等共同进行；因奋斗而即牺牲生命，亦所不惜。湖北工人阶级为全国工人阶级之一部分，同隶于中华全国总工会之下，中国工人阶级又为全世界工人之一部分，同隶于赤色职工国际之下。湖北工人奋斗之正当道路，只有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指挥之下，一面与全世界革命工人站在一条战线上，一面与全国各阶级革命势力共同奋斗，方能达到从根本上打倒帝国主义者、军阀及一切反动势力而获得较多之自由与利益。至于各阶级革命民众凡有关于民族解放、民权扩充、民众经济生活改善之运动，我湖北工人均认为与自身利益有关，必挺身参与，决不落后，谨此宣言。望全国工人阶级与革命民众共鉴察之是幸。

一九二七年一月

## 组织问题决议案

大会听了刘少奇同志关于组织报告之后，特议决如下：

一、自国民革命军到汉，军阀政治崩溃之后，武汉工人阶级得到了集会、结社的自由，工人群众很自然的勃起组织工会。全省总工会在此群众自然勃起组织之中，是尽了相当的指导的责任，使武汉各工会的组织，没有陷入十分纷乱的状态中。大会认为总工会前此对于各工会关于组织上之指导，是不错的。

二、武汉工人群众，虽已大部分集中在工会里面并已经过一次经济的争斗，但就一般的现象上观察，各工会的组织，还没有在群众中建筑稳固的基础。大会认为武汉各工会及总工会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使工会在群众中建立稳固的基础。进行这种工作的方法有下列两项：

甲、每一个工会要有一个真正工人经常的代表会；

乙、很严密的组织支部——基本组织。

三、武汉工会的组织，还未十分统一，并有一种零乱的状态。今后应进行下列各项工作，使武汉工会的组织完全统一起来：

甲、赶快组织各产业总工会（如纺织总工会、五金业总工会、烟厂总工会、车工总工会、市政总工会、饮食业总工会、印刷总工会、邮电总工会等）；

乙、在产业上及职业上性质相近之工会，合并组织；并应使每个工会都要加入其性质相近之总工会。且须限制人数过少之工会（人数在三百人以内者）的成立；

丙、改组各不合组织法之工会（如现在之金属业工会、机电工会联合会等）；

丁、集中工会的经济，各支部及分会不可单独支配工会经济。

四、工会的经济问题，及一切技术工作，关系十分重要，有时足以阻碍工会前途发展，甚至危害工会的存在，各工会应该特别慎重支配工会的经济，并即速改善经济管理法及其他一切的技术工作。

五、现时在工人中正在发生争夺工作及斗殴等情事，大会认为是很严重的问题；并特

别提出“反对工人打工人”、“一切工作范围尽可能照旧”的口号。

六、武汉工人运动的勃发，一般流氓讼棍及反动分子，常欲混迹其中，或把持工会，或借名敲诈，或煽起斗殴，武汉工人群众受其蹂躏者实有其人，工人群众应一致起来，铲除流氓讼棍！拒绝一切反动分子！

七、工厂职员因其所处地位不同，其革命性自不及工人之丰富，且易动摇退缩，总工会以前关于工厂职员加入工会作名誉会员之规定，大会认为适当，既济水电公司职员仍应加入工会为名誉会员，大会同时并规定工会名誉会员只有发言权。工头不能当选为工会执行委员。其有特别情形，经总工会之特准者，不在此限；但各工会之执行委员内，不得有五分之一以上之工头。

八、湖北各县之工会，正在发展组织，全省总工会以后应改进对于各县工会之关系，并须通告各县工人组织工会，须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所颁布之“各县或独立市工会组织法大纲”组织之。总工会并应加派特派员到各县指导工作，尤应注意大冶、宜昌、沙市、武穴、广水、咸宁、应城、蒲圻等县之工作。

九、其他有特别情形之工会，议决如下：

甲、各店家之手工业工人与店员及厨工，应尽可能的组织在一个工会之内。尤以店家之厨工应加入店员工会。各机关学校公馆住宅之厨工、雇工单独组织工会。

乙、泥木、鞋艺、缝艺、酒饭面馆等以邦口分成之支部，可以暂时存在，但应即改为分部，再依照店家街道组织支部。

丙、开利、安利英、美最时、瑞和等洋行之各部分工人分开组织工会，争斗时实感不便，以后应组织一洋行的工会联合会。

丁、凡船舶工友，应加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组织系统之内。

（附条）下级职员中有特别努力为工人利益奋斗者，由该会代表会三分之二通过，经总工会查核特准后，与工头同。但发现其不尽忠于工会者，由该工会代表过半数之通过及总工会之查核，得撤销其职务。

## 工会经济问题决议案

强固的工会是由两个基础造成的：一、是工会的组织统一；二、是工会的经济集中。为了工会的组织统一，大会已经决定了统一组织的决议案；为了完成湖北工人阶级团结的经济基础，大会对于工会经济问题，特为下列之决议：

（一）各工会抽收会员的会费，按每个工友，以一日所得的工资，一律每月抽收半工，除额定会费外，未经该工会代表之决定，报告全省总工会核准，不得抽收任何特捐或向外募捐。

（二）为得工会的收入统一，只能由每一工会或该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收纳会员的会费，工会下的分会、支部或小组只能受工会或该业总工会的委托征集，而不能单独自行征集。

（三）工会经济的支出，必须按各该工会代表会所通过的予算开支，工会或该业总工会下之分会、支部等予算，必须经该业工会或总工会之制定，分会或支部不得单独自定予

算开支。

（四）各工会所收会费之支配：以十分之一缴全省总工会会费，十分之一缴各该业总工会会费，十分之一作会员救济金，十分之二缴存总工会作基金，十分之五为该工会的经常用费，并规定百分之一作纠察队用费，但该工会有特别情形时，报告总工会另行核办。

（五）各工会按月缴所收入十分之二的基金，缴存全省总工会保管之；组织基金保管委员会管理，聘请会计师，按月清算一次。基金保管委员会由大会每一代表团、全省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各公推二人组织之。

（六）各业工会及总工会之每月预算、决算，除按每月必须报告工会代表会审查外，必须造具统计表一份交全省总工会存查。

（七）工会的经济绝对不能借贷于个人。

## 宣传及教育问题决议案

工会是工人群众的组织，是代表工人群众利益的组织，必须使群众了解此种意义，工会乃能得群众的拥护。工会又是领导工人群众作改善自身生活及参加政治运动的斗争机关，必须要群众知道斗争的意义和方法，工会乃能领导群众的行动。工会又是教育工人的学校，必须注意这一个问题，工会乃能从日常生活及一切行动中训练工人斗争的知识和能力。同时工会是与社会各方面有密切关系，不能单独存在，孤军奋斗的，故又须使社会了解工会的真相，对工会同情及信任。因此种种，工会对内对外的宣传教育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了。

湖北在军阀压迫时期，工会秘密组织，很难有公开作教育宣传的机会。自工会公开以后，在此短促时间又忙于组织及经济斗争和参加政治运动，宣传教育工作，似尚无暇及此，且亦非常缺乏担任此项之人材。因此，虽工会的组织非常发展，但群众尚不了解工会的意义，有的甚至将工会看作政府或党部机关，这种工会的基础是很空虚的。许多工会虽曾有经济的斗争，然很少能运用此种斗争去训练工人的。至于知道以工会作教育工人的学校的更是少见。同时因生活困苦之故，改良生活的运动猛起，而且不断的发生，尤其是手工业及店员的罢工，使一般中小商人感受不快，加以反动派之造谣中伤，使一般社会对工会发生种种怀疑恐惧，工会方面又很少敏捷的向外宣传工作，致使工会在社会不能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和邦助，这是一个重大的危险，由此可知湖北各工会缺乏宣传教育所发生的恶果。

目前湖北的工会除了统一组织、巩固基础之外，宣传教育是最紧要的工作！而且要统一组织及巩固基础，也非加紧教育宣传的工作不可。大会议决此后湖北各工会关于宣传教育应切实进行下列各项工作：

一、湖北工人群众久已参加了政治斗争，然对于政治观念还是幼稚，故此时对于工人群众应加紧政治的教育宣传工作，要使工人了解工会对于政治的关系，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和责任，尤其是工、农同盟及农、工、商、学的革命联合战线的意义要使其充分的了解。如此，才能巩固工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强大革命的势力。

二、要极力宣传工会是工人群众自己的组织，是代表工人自己利益的机关，要每个工

人都加入工会，参加工会的组织及工作，拥护工会，使工会成为群众的团体，统一的组织，并强固其下层基础。

三、在经济斗争方面，应宣传在现社会制度之下，工人想得到经济上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工价增加，同时物价涨了，生活并不能改良。经济斗争固然是工会的重要任务，然一切经济的斗争结果，必须要引上政治斗争的道路。工会应充分注意利用这种机会向工人宣传工人与政治的关系，引导工人群众切实参加政治的斗争，从社会制度的革命上，以求得最后的解放。

四、工会要真正成为教育工人的学校。在工会组织上，设备上，经济斗争上，以及一切实际行动中，日常生活中，都要注意到运用这些机会做教育工人的工作。如在各种会议中，尤其在罢工时及罢工以后，应特别注意此种工作。而且只有在这些机会中，才能切实训练工人成为真正的战士。

五、工会要注意对社会的宣传。要解释一般社会，尤其是中小商人对工会的怀疑恐惧，要说明组织工会是工人应有的权利，经济要求及罢工是由于生活困苦必然发生的现象，并没有过分的举动。工人是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国民革命的主要力量，这个国民革命是全中国人民所需要的，工人愿与农、商、学、兵各界结成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以求全国人民的解放。要用这种宣传使社会认识工会的真相，提高工会在社会上的信仰。

六、湖北全省总工会此后要加强宣传部的力量，随时注意指导督促各工会教育宣传工作。定期出版物如《工人导报》及《工人画报》应设法按期出版，改进其内容。《工人导报》，须多搜集工会消息及工人之投稿，使能适合工人群众的需要及爱好。并要整顿发行工作，使其敏捷普遍。各种纪念节日及临时问题发生，应酌量情形召集群众大会及示威游行，并应尽速印发各种传单标语及宣言通电等。应搜集各种材料，编印各种适合工人需要的小册子，及工人学校的教材。宣传队应有专人负指导之责。各工会的工人学校应归湖北全省总工会直辖管理；名称、组织及教学方针应规划统一，总工会并应注意继续开办工人运动讲习所，训练工会工作人材。此外关于游艺事项如俱乐部、体育会、新剧及化装表演等，总工会应酌量实际情形，由总工会或督促各工会办理。

七、各工会在总工会指导之下，切实进行各种教育宣传工作。如照章组织宣传队，酌量情形办理工人学校，工人书报室，及体育游艺的机关，印发宣传品及编辑壁报等，并指定专人负发行之责。

## 经济斗争决议案

大会听了许白昊同志的经济斗争的报告之后，对于湖北工人今后的经济斗争决议如下：

一、全国劳动大会，对于经济斗争的决议案说："经济斗争，是工会的日常生活。""经济斗争，同时就是政治斗争，必须政治斗争获得胜利，才能保障经济的胜利。"湖北工人最近经过一度普遍的经济斗争，在各种事实上证明了全国大会决议案的绝对正确。同时在工人经济斗争还未仃止，社会上的物价即刻增涨起来，更足证明在现时社会制度之下，不能以单纯的经济斗争来改良工人的生活。各工会为得真是尽了保护工友的责任，必

须在工友的日常生活上，代表工友的利益作种种经济的要求，并须在政治权利上求得经济条件的保障。

二、每一个工会经过了一次经济斗争的胜利，绝不是那一工会为工友取得了经济条件胜利。工会对于经过的经济条件，必须在工友的日常生活上，拥护改良生活的条件，完全实现和继续改善。

三、经济斗争是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底下要求工人阶级得一切解放之起点。在各种斗争行动上，必须研究两阶级斗争的战术，过去的经济斗争战术是非常之不完善的，事前无充分的准备，临场失掉统一群众的指挥，在经济斗争时又未注意促进和巩固工会的组织，及宣传斗争的意义，使群众在斗争中了解战术的运用，这样如遇着长期奋斗时，是不能持久而取得胜利的。所以工会对于工友的经济要求，不仅是在日常生活中保障工友，须日常的准备新的斗争，训练群众对于取得斗争胜利的战术。

四、在工资与工时的条件上，应利用各种机会，争得每一个工人应得最低工资，每月十三元，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过十小时，特别工作时间最高不得过十二小时，每星期有二十四小时休息。

五、在改良待迂的条件上，工会应争得按程度轻重的疾病伤害死亡等抚恤确数保障，及危险卫生工作的切实保护，为得适合于工人工作情况的改良，工会应得要求随时参加工厂工作管理技术上的意见。

六、目前红利奖金，应以普遍的劳动成绩为分配的标准。但红利奖金只不过是坚固工钱奴隶制度之设施，并非工人真实的利益。今后应由红利奖金，求得按工作程序的劳动保险。

七、工作辞就问题，在最近所有的经济争斗条件中，都是在这类问题，争执最利害，可见此问题之关系重要了。今后要求此问题之解决，是要普遍的适用团体契约权。一方面各业工友必须团结在工会内；一方面各工会在全省总工会系统之下，组织统一的职业介绍所，使所有的工友都在工会内受团体契约之保障，同时厂店在工会外不易找得失业工人。则此工作辞就问题，才能得相当的解决。

八、失业问题，是工人本身的大问题，同时也是社会上的大问题。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造成工人的失业，同时又利用工人失业更加操纵剥削工人。我们今后对于工友失业，必须严厉的斗争！认为某工友的失业问题，就是那一工会全体工友的失业问题；某一工会的失业问题，就是全湖北工人的失业问题，以与造成工人失业之现社会奋斗。

## 女工童工问题决议案

### （一）女工及童工的生活苦况

工人的生活，本来就很痛苦的，我们湖北工人久处在军阀压迫之下，其所受之痛苦尤深，而女工、童工的痛苦，更是加倍厉害。因为女工、童工的身体比较柔弱，易于受人欺侮，又因其工钱低贱，故资本家尤乐于雇用。武汉纺织，烟草等轻便制造业及手工业较为发达，在此等工厂作坊中工作之女工、童工约以十万计。这些女工、童工，每日工作时间都是十二小时以上，而且大都是站立着工作，中间无休息时间，甚至连吃饭的时间也没

有。他们的工钱是不够生活的，到现在低的工钱还不够一角。至于待迂更是恶劣：工厂的卫生设备完全没有，工作场所非常污秽，空气恶浊，温度、光线之不良，机器运行之震动，使柔弱的女工，童工不能忍受，疲倦之余稍一不谨慎，即有伤身体或断送性命之虞。工作稍有疏忽，即受管厂者之辱骂，殴打及克扣工钱，星期日无休息，病假无医药费并扣工钱，而且时间稍长即被开除。女工产前、产后无休息时间，请假无工钱。除此一般痛苦之外，湖北女工至今尚完全缠足，即青年女工甚至女童工亦包小脚，步行艰难。他们除了在工厂受种种痛苦之外，在家里还要劳苦服役，童工常受厂主，老板、师付、工头的打骂，还要为他们私人做奴隶。这些女工、童工的痛苦，真是难以尽述。

## （二）女工童工和工会的关系

女工、童工是我们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痛苦的一部分。因为成年工人工资不够养家，其子弟妻女亦不得不去做工钱的奴隶，所以女工，童工大都为成年工人之家属，关系极其亲切。工会是代表全体工人的利益的，是解除全体工人的痛苦的，对于这一大部分最受痛苦的童工、女工，当然应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不但为女工、童工利益的关系，为全体工人利益的关系，即为成年男工利益也非如此不可，因为保护女工、童工的利益，限制童工年龄和女工、童工的工作时间，提高其工钱，足以减少成年男工失业的危险，且使其工资易于增加，至如何保护母性，保护后代，更是人类社会的天职。而且女工、童工同是生产者，同是被压迫者，就历年来中国工人之运动和革命看来，女工、童工的革命性和在革命运动之地位，是不可忽视的。要使工会能成为代表全体工人利益之机关，得到工人群众之拥护，工会对于女工、童工问题是应该充分注意的。

## （三）过去工会对于女工童工之缺点及此后应注意事项

湖北全省总工会及所属之工会，过去虽曾相当注意到此项问题，然尚少专人负担此项工作，且亦缺乏组织、教育及领导去实际争斗之经验。因此女工、童工或尚未完全参加工会工作，或不免与工会发生冲突，如有些女工不加入工会，或另组织工会不与男工一致，劳动童子团与工会冲突等，此种不应有之现象，以后应极力纠正。凡女工、童工应一律加入工会，取得平等待迂，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代表会及执行委员会中应有女工及青年工人。有女工半数以上的工会应有女工当选为委员长或付委员长。劳动童子团是教育和训练童工的组织，应由工会主持管理。有女工及童工之工会应经常的召集女工大会及青年工人大会。工会执行委员会之下应设立女工委员会及童工委员会等。一切学校、娱乐、体育及经济之设备，女工、童工均应平等享其权利，凡工会向外提出要求及主张，均应注意加入女工、童工利益的条件。

## （四）女工和童工的经济要求

大会参酌目前湖北女工、童工的生活状况及需要，除了一般工人的要求之外，规定其最低要求条件如下：

一、工作时间女工和童工每周不得过四十八小时，星期及一切纪念日例假，照给工资。

二、女工、童工与成年男工作同样工作者，应得同样工资。

三、禁止使用十二岁以下之童工，增加成年工人之工钱，使能保养其家属，贫苦儿童由厂主及政府设免费学校教养之。

四、不得使用女工、童工作夜工及危险有害身体的工作。

五、女工每月有连续三日之休假，照给工资。

六、女工产前产后休息八星期，照给工资。

七、工厂应设哺儿室，每隔三小时应哺儿一次，每次至少二十分钟。

八、不得调戏女工，打骂童工。

九、学徒期间不得过二年，在学徒期间应得相当工资。学徒不得与私人服务。

十、厂主及政府应开办童工、女工之免费学校。

十一、政府应制定保护童工及女工的法律。

## 对于纠察队决议案

一、听了湖北全省总工会纠察队报告以后，过去纠察队的努力，大会认为是满意的。惟组织、纪律、训练三方面亟应整顿，并应以上列三事，为此后工人纠察队的中心工作。

二、工人纠察队的组织．调遣、命令，应完全统一在湖北全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部之下。有不服从者，总部得解散或改组之。

三、组织上应即按照产业或职业总工会之范围改组。

四、工人纠察队为纠察工贼，及防制反革命分子之组织。不可用纠察队去征收会费，以致引起工人对工会或工人纠察队之怀疑。

五、纠察总部应扩大训育处之组织，主持训育事项，及继续开办工人纠察队训练班。

六、总部应专设干部纠察队，人数由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决定之。

七、各工会应在经常收入中，拨一部分经费作工人纠察队经费，交纠察队总部支配。

八、极力整顿和执行工人纠察队总部所颁布之纪律，使工人纠察队有严密的、铁的纪律。

九、纠察队总部，应特别注意各县纠察队之组织训练，并须在各县组织分部，或派特派员。

## 为停业及辞歇工人问题决议案

凡经过一次工人的经济争斗，必有资本家之反攻，在政治较开明的地方，资本家之反攻方式大半为故意仃业或裁减工人，因此危害一部分工人之生活。湖北工人为防备资本家之反攻及保障工人之生计，特为下列之决议：

一、凡有重大影响于生产之工业或市面之商业，不许无故歇业。

二、无故仃业者，须给工人六个月工资之救济费。

三、因折本不能支持仃业者，手工业商店须给以两月工资以上之救济金，工厂须给三个月工资以上之救济金。

四、辞歇业或裁减工人，须照下列比例给工人救济费：

工作一年以内者一月；

工作三年以内者二月；

工作五年以内者三月；

工作十年以内者四月；

工作十年以外者六月。

## 工农联合决议案

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与湖北省农民协会代表在开工农联欢大会以后，认为我们工人、农人双方同处于帝国主义、军阀和一切反动派压迫之下，只有我们工人、农人亲密的联合起来，才可打倒我们一切共同的敌人；另一方面我们工人、农人在现在社会的经济上都是被剥削的群众，尤其只有亲密的联合起来，才能得经济的解放，最后的解放。所以我们工人、农人是最亲密、共生死、共患难的朋友，我们应该联合一致向我们的敌人进攻！为国民革命的利益奋斗，为我们自己的解放奋斗！

工农联合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打倒一切反革命派！

打倒一切压迫阶级！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工农联合万岁！

工农解放万岁！

## 关于省民会议决议案

为实现民主政治，稳固革命基础起见，本代表大会特别向政府建议：速即召集湖北省民会议。省民会议成立以后，省政府应遵守实行省民会议之一切决议。湖北工人团体将来应在湖北全省总工会领导之下参加省民会议。

（原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

# 中国共产党
# 为汉口英水兵枪杀和平民众宣言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

全国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

英国水兵受长官命令一月三日在汉口英租界枪杀和平讲演的中国市民一事已经引起很重大的事变了。愤怒的民众对英国帝国主义这种进攻和屠杀已经决定相当办法对待，务使其永不会再发生了。武汉工商学群众大会通过一些要求，请国民政府向英国提出。这些要求，根本是在永久取消英国人屠杀并高压中国市民的那种侮辱中国人民之特权，这些要求无疑地是全中国广大民众的要求。这些要求表示中国工人及一切劳动民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斗争已进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亦即表示从一九二五年五卅英国人屠杀上海工人市民开始的中国民族运动进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英国帝国主义者在汉口企图于一月三日以挑拨手段惹起革命群众的骚动借以为向国民政府进攻的张本，因此，假意退步并迫国民政府来保护他们抵御群众的愤怒。国民政府很了解英国人挑拨手段的凶辣，因此，即刻采取各种办法，防止中国民众和英人及其机关的冲突。国民政府赞助武汉民众的这种举动，即担负维持英租界治安责任并建议英人撤退其武力，是唯一正确的。在英租界的英国武力本负屠杀中国民众责任的，此种武力之驻在不能保证再不会有挑拨手段发生。

英国帝国主义者对此是怎么一种见解呢？他们在愤怒的革命民众前面迫得接受国民政府的建议，但他们以为这种状况是暂时的。他们在中国和伦敦，经过政府官吏和报纸，公开宣称，他们所以接受国民政府以中国警察维持租界治安的建议，是因为他们此时在汉口没有充分的武力，故与国民政府妥协俾得从容派遣兵舰入扬子江来。英国帝国主义者，不管由兰浦生口中怎样说出愿意开始对华的"新"政策，但事实上没有一分钟放弃其干涉中国的阴谋。差不多与兰浦生赴汉口与国民政府谈判同时，英国帝国主义者却在天津与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一起准备进攻南方的大计划。谁也知道，英国帝国主义者是准备这计划的重要脚色，并继续站在北洋军阀背后，从政治上和物质上邦助他们。

现在，英国帝国主义者，在其本国和全世界正在造成干涉中国的舆论。他们在汉口的挑拨手段，就成为他们对于中国解放运动疯狂的攻击之发端，并以此证明邦助北洋军阀武装进攻革命军和国民政府，是对的。

在中国的一切英国报纸，一切英国代表以及一切大资产阶级报纸和半政府机关报纸的通信员，都制造无数虚伪的消息，仿佛以为：

（一）英国人及一切外国人，现在正处生命危险的情况底下，并举出他们所伪造的杀

人越货等无稽事实来证明；

（二）汉口一月三、四日的骚乱是少数极左派的煽动家主持的，大多数民众甚至国民党都反对此种骚乱；

（三）在中国，人们准备向一切白种人作战，如拳匪之乱一样。

英国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是十分明显的。为在政治上准备干涉，他们必须在其本国建立联合战线，如有可能，又须立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间建立联合战线。为着这个，必须把中国形容得象上面所说的一样。

全国民众们！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干涉中国的危险，是没有一刻不恐吓我们的。现在这个危险扩大了，特别是在与最近联合一致的北洋军阀作战的前面。英国帝国主义者任何挑拨手段都做得出来，以邦助中国的反革命，如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并不惜以任何战争的恐怖恢复其在全东方首先在中国所失去的威权。

他们现在正由阿马利与国民政府开“和平的”谈判，这种谈判乃是他延宕时间的阴谋，企图于此时期内在中国集合大势力，如有可能，并与其他帝国主义者建立联合战线。

唯一能够打破英國帝国主义者这种狡猾计划的，只有中国民众本身在本党和国民党领导下的反抗，全国民众对国民政府的拥护，以及中俄的联合。

本党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在目前帝国主义者以英国为首直接危害中国革命这一危险的顷刻，赶紧站立起来，拥护国民政府，在群众会议中，在舆论中，在议决案中，公开表明对于国民政府的赞助并要求英国人承认汉口一月五日群众大会所提出的条件。为取得保证一月三日的挑拨手段不至重演和英国帝国主义者不邦助北方进攻南方起见。我们起来要求撤退英国驻华海军，取消治外法权，收回英国租界，撤退一切帝国主义之驻华的军队。

全国民众们！中国革命已经开始，并继续下去了！革命的胜利应该是帝国主义的失败。胜利是靠民众邦助国民政府并自己努力的，而依靠在被压迫民众上面的国民政府也要坚持到底不对英国帝国主义让步。

前进向帝国主义和反革命作战！

本党同时并向西方无产阶级提议在各国举行抗议英国帝国主义者这种挑拨手段及其干涉中国的准备。

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革命万岁！

中国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联合万岁！

中俄联合万岁！

打倒英国及其他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原载《向导》183期，1927年1月17日出版）

# 〔附〕工人及革命群众收回汉口九江租界的经过

（一九二七年一月）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汉口工人阶级在刘少奇同志指导之下，举行了英勇示威，驱逐英帝国主义在租界的巡捕，把英租界收回。这是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第一次的大成果。现在根据当时报纸所记载的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经过的情形集录于后：

## 一二·二六的反英大示威

汉口各界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午前十时在济生三马路开反英市民大会，到会群众二十万余人，全省总工会、汉口学联会、妇女协会、汉口总商会、汉口商民协会、各团体联合会为主席团，李立三为总指挥。开会秩序：一、奏乐。二、唱国民革命歌。三、总主席报告开会理由，略谓此次反英市民大会，系因英政府用种种凶猛手段，毒害我国，现在愈加厉害，我国民实忍无可忍，不得不群起反抗，如英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不取消，我国民决一致反英到底。四、天津市党部来汉代表安辛生报告天津英租界封闭市党部，并违法引渡党员十七人于张作霖，现已枪毙七人，种种实事。五、演说的有工会代表、全省商联会代表、中国共产党湖北区代表、全省学生联合会代表、总商会代表、妇女协会代表、全国总工会代表李立三。通过决议案：一、通电全国、全世界，一致反对扰乱世界和平、干涉中国独立的英帝国主义。二、要求政府再向英政府提出严重抗议，限其立即启封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交出被捕党员，赔偿损失。三、如英帝国主义不启封天津党部，不交出被捕党员，要求政府立即照例逮捕在华作反动宣传的英帝国主义者作抵偿。四、通电全国实行对英经济绝交。五、警告安格联，反对借款奉张与中国革命势力为敌。六、苏浙皖三省全省民众一致联合驱逐孙传芳，拒绝奉、鲁军南下，完成三省真正的民治。七、通过宣言如下：“全国各团体公鉴：英帝国主义者，利用不平等条约在华取得之特殊势力，妨害中国独立运动。最近在上海擅封‘民国日报’、在天津擅封国民党部，逮捕国民党员，尤为勾结反动军阀，干涉中国内政之明证。本日汉口农工商学全体市民，一致议决，实行对英经济绝交，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妨害革命工作的租界。务希全国一致奋起，共争我民族之生存，临电惶惶，无任翘企。汉口市民反英运动大会三十万人同叩。”

（原载1927年1月10日广州《民国日报》）

## 一·三群众示威时发生惨案

汉口于（一月）一、二两日开庆祝北伐胜利大会，三日开反英反奉示威大会，各界民众到会者十余万人，当场通过决议案：一、反对奉、鲁军南下，一致赞助苏、皖、浙三省自治；二、反抗英政府秘密借债与奉天军阀，助长中国内乱；三、实行对英经济绝交，轴

民众团体自动检查入口英货；四、反对汉口英租界无故派水兵登陆，扰乱武汉国民政府首都秩序。高呼口号，散会后，出发巡行。各团体演讲队亦分途出发讲演。至下午二时，总政治部之宣传队，正在英界江汉关附近向民众演讲。不料英使馆忽派大队英水兵及武装铁甲车突袭我听讲群众，向人群中开枪四十余响，死伤枕借，实数不详。同时我巡行群众到英堤税厂时，亦被英水兵突袭，均用枪尾刺刀向我群众乱刺，群众激昂，不顾生死，用手持纸旗自与英兵格斗，卒不敌退散。当晚党政府联会（即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七时开紧急会议，外交部已即晚提出抗议书，向英使严重抗议。

（原载1927年1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

## 对英交涉之经过与各民众团体提出之条件

惨案发生后外交部部长陈友仁即口头向英抗议，须于二十四小时内撤退水兵，由中国政府派队进驻英租界，否则再有其他事件，即不负责。英领答无权答复，俟请示英使后再说。

至四日晨，英水兵始完全撤退。外交部复与英领交涉，即派军队入驻英租界。一面由国民政府令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派兵前往，旋于四日午派兵三连驻捕房堆栈，尚拟五日加派一连，合为一营，由营长统率，中央党部亦派党代表，驻英捕房办公，军队听该代表指挥，该代表听外交部指挥。四日英人见如此情形，已将水兵及义勇队武装一律解除，各巡捕亦均撤退，由卫戍兵及纠察队（总工会所派）轮流梭巡。外交部长并曾照会英领，谓此肇事兵舰，在本案未解决以前不得离开汉口，否则在他处迁有事变，国民政府不负责任。故四日英侨之避居兵舰时，临时多改乘商轮赴沪。

四日下午六时召开党政府联席会议，专议该案达两小时。是日下午七时，各团体代表五百余人，至新市场守候政府表示主张，并提出八条①要求政府执行。条件如下：

一、立即向英领事提出严重抗议；

二、英政府须负责赔偿此次同胞之损失；

三、英政府须立将肇祸凶手交中国政府依法惩办；

四、英政府须立即撤退驻汉英舰，及英界之沙包电网等作战物；

五、英政府须向中国政府道歉；

六、英租界内华人，须有集会、结社、游行、演讲的绝对自由；

七、英租界巡捕及义勇队，须一律解除武装；

八、英租界须由中国政府派军警管理。

当推定十四团体代表，即向政府请愿，由政府代表出见，表示各团体对联席会所提条件，政府完全接受，党政府联席会议即将开会，自有适当办法，俟晚间亲到新市场向群众宣布。代表等认为满意，仍回商会报告，继续讨论，决定如英领对于所提八条，七十二小时内尚无圆满答复，应要求政府自动实行下列四条：

一、立即收回英租界；

二、立即收回海关；

---

①四日午武汉农、工、商、学各界在汉口商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汉口一·三惨案，议决八条，彼时由代表提出。——编者

三、立即取消英轮内河航行权；

四、立即撤销英人领事裁判权。

并议决民众方面工作五项。议毕，即偕赴新市场，等候政府委员宣布办法。

晚八时，国民政府委员到场，宣布政府对于各团体联席会议交到之八条完全接受，中间有政府已经实行者，有正在进行者。同时宣读八条条文，谓政府决依议作到，以为人民报仇雪耻，并已令卫戍司令部派军队一营入驻英捕房。最后由各团体联席会主席报告联席会议决各案之概要。旋由某代表提议，并通过：如英领答复不完满，英界内华人即总罢业总罢工；五日举行示威运动时全镇罢市半日。九点十五分散会。十四团体代表即与政府再开联席会。

## 武汉国民政府接管英租界

英租界自发生惨案后，国民政府鉴于租界当局无力维持秩序，于五日党政府临时联席会议，议决组织"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派定委员五人①，于五日由委员会将英租界实行管理。仍由委员驻英捕房办事。计在英租界维持秩序军警，先后派有公安局及两特别区并模范区各拨警士二十名，就原有岗位，轮班服务。又令公安局拨派保安队四十名，总工会纠察队三百名，卫戍司令部二十九团兵士一团，分段巡查，刻因英租界秩序业已完全恢复，故三百名工人纠察队，已于七日完全撤退。詎英侨犹自疑心，未敢照常安居，外交部长特于六日晚六时，造访英领，声称我国民众运动，是反对英水兵暴行，屠杀我民众，对英国侨民，绝无仇视之意，不必自相惊扰。至总工会前虽有对英总罢工之警告，但总工会现在一切行动，确已具有决定，不至任便实行罢工。现在英租界既由国民政府接管，关于惨案交涉，政府已根据人民之请求，正在进行。在本案未得圆满解决以前，英侨之生命财产，由国民政府负完全保护安全之责。

五日下午二时市民在汉口济生三马路对一·三案开反英示威运动大会，正午十二时，各市民即整队分途经过英租界向会场出发，届时到四十万人，由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主席，总工会代表李立三为会场指挥，场中民众悲愤，故走时虽大雨如注，尚能演说，并通过议案八项，并致全国通电，至三时始散会，分队游行。是日英租界秩序如常，全市工商各界均休业半日。重要英人均仍在江心之商轮小住，其应于四日离汉各商轮，因海关无人负责验放，迄未能飞越雷池一步。现前英捕房均高悬党旗国旗。

（原载1927年1月17日广州《民国日报》）

## 九江英租界收回之经过

汉口事件未发生前，九江码头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及其他条件发生罢工。凡英、日各国往来上海、九江之轮船，悉受影响，以至停止运货，在罢工期内，竟有工贼私运粮食接济英舰。六日纠察队在租界旁拘获工贼一人，英水兵即上前干涉，以大棒殴打纠察队，至

①包括外交、财政、交通三部各一人，武汉卫戍司令部汉口办事处长，及临时联席会议党代表。——编者

于重伤。时围观者甚众，均为纠察抱不平，但秩序尚未乱也。不意英水兵竟奔回舰，向岸发炮两响，是时岸上群众突受炮声惊吓，秩序为之大乱，各商店均纷纷闭门，事后调查我华人死一人，伤者无数。事件发生后，我当局即提出严重交涉，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即日由汉来浔，亲自调查办理。九江租界亦于八日由革命军独立第二师派队接管。所有往浔英人，悉数登英舰，予备离浔，租界内各商店则由工人纠察队保护一切，秩序均好。

（原载1927年1月20日广州《民国日报》）

英兵自在九江施行屠杀后，即经革命军入租界维持秩序，并组织英租界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现设在英工务局内，至英领事则已逃上英舰。至租界秩序现已完全恢复，日、美、法各国在租界之人士，均由管理委员会发给护照，在租界自由出入。如租界内之各处公共牌示地方，均贴满各种革命口号标语，平素阴森有鬼气之英租界，一时充满革命空气。管理委员会并已在租界内贴出中英文布告，知照外侨及各色人等，照常居住，毋自惊扰，其文如下：“一、案奉国民政府外交部命令，组织委员会，管理九江英租界，所有界内治安及外人生命财产，均由本委员会会同负责军警，切实保护，合行布告界内各外侨，一体知悉，此布。二、案奉国民政府外交部命令保获外人生命财产等因，合行布告旅居牯岭外侨，一体知悉。务各安居乐业，毋自掠疑，切切此布。”又独立第二师师长已将派兵维持英租界秩序经过情形，呈报总司令部，并录如下：“窃职师自收复九江后，即行遣派本部宪兵，于租界四周日夜梭巡，以资防范，值此大敌当前之时，诚恐发生意外外交，致使军事受其影响，嗣见英租界内堆积沙袋铁网，有英兵持枪守护道口，并在界内来往梭巡，如临大敌，当派职部秘书往英领事馆，与该领事交涉，劝其将沙袋铁网等物撤去，并将英兵撤退，以免民众误会，发生反抗。当据该领事声称：须与英兵舰长磋商，再行答复。又谓闻租界内工人将有罢工之举，上年租界被毁，往事可鉴，不得不予为防范等语。未几太古、、怡和、日清三公司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实现。并闻汉口租界内水兵均已撤退，职一面饬令政治部会同工会，参予工人代表与太古、怡和、日清三公司代表谈判，从中调仃；一面致书英领事，劝其援照汉口之例，速将水兵撤退，免致激成事端。旋据该领事函称：汉口英界驻有常备兵，加以巡捕及义勇队设备较浔地为严密，九江租界内巡捕过少，不能不借水兵以为补助，现界内发现工人之纠察甚多，又不许食物送入界内，且近日浔地发现激烈排英标语，本领事虽欲遵命撤退一切守备，此时尚不甚妥等语。继而怡和、太古与工人代表会议仃顿，大有决裂之象，在此时期中，又传来汉口租界收回之信。英领事来函要求请派代表磋商办法，当派秘书前往，提出援照汉口办法，将水兵巡捕一律撤去，由我师派兵维持界内秩序之提议。当由该领事面称，现尚安谧，俟有必要时，再请贵师派兵云云。磋商尚无结果，突于六日午后四时，闻江边炮声两响，旋据宪兵报告，江边被殴伤工人纠察员吴直山一名，炮系英舰所放等语。闻信后，除即派队往赴江岸警备外，后派秘书前往调查，旋又亲赴租界察看真相，并至医院亲视被伤工人。据云英兵亦曾加入，以枪底击其背部等语。确查得英舰发炮原因，系由一外人雇华工将行李由租界搬上轮船，为罢工之纠察队吴直山所阻，遂致互相殴击，殴伤吴直山一名。当即昏去，受伤甚重，比即抬赴医院医治。当时情形，财政部部长之所目击也。职旋赴该领事馆，严加质

问，私人斗殴，亦属细故，何得任意施行舰炮，致犯众怒。该领事回称：所放之炮系属信炮，因见群众聚集攻击租界，因以告警，并非有意开衅，再英兵并未加入殴击等语。职因问该领事能否维持界内治安，倘不能维持，请将水兵、巡捕一律撤去，由我师派兵入界维持，以免再生意外之事。当据该领事复称：俟必要再为讨论，职因两国并未断绝邦交，不便相强，因无结果而散。翌日午前十一时，英领事忽派人来部，请求派兵入界维持，除一面允其请求，派兵入界维持外，一面复派秘书前往，与该领事严重交涉，非将水兵一律撤尽退回兵舰，及正式请求我师入界维持秩序，我师绝不能负此重大之责任。该领事初仅肯以口头之语，作为暂时请求，经再四交涉，始得其正式请求之公函一件，由该秘书携回，内开：'敬启者，兹因风潮日形紧张，大有不可收拾之势，本领事业经定意携外侨退上兵舰，再行将本埠情形报告本国政府。至本租界之屋宇产业，则请贵师长负完全责任，以后如有何项损失，只得以贵师长是问。用特函恳贵师长，请即饬人前来，将各项屋宇封锁，是所祷盼'等语，旋即复该领事函云：'此次为劳工问题，发生今日事端，殊属缺憾，贵领事既将率侨民退上兵舰，函请敝师派兵入界，维持秩序，治安所系，义岂容辞，惟屋宇内之器具什物，应请贵领事转饬各该屋宇主，派人看守，倘有人擅自闯入，可报告当地指挥长官，以便惩办，至在敝师未行使维持租界内治安职权以前，所有一切不能负责，理合声明'等语。复由秘书将复信带赴英舰，当面交涉，遂于是日下午四时半正式接收租界，并派职部第三团团长驻扎界内，担任警卫职务。次日即与总政治部邓主任，九江关监督，各友军长官、地方各团体，在职部开联席会议，讨论善后办法，共同议决，由该监督向英领事提出抗议，并函催税务司回署供职，一面又组织九江市民对英行动委员会，处理租界一切事务。现在该监督业将抗议提出，嗣后交涉情形，当由该监督呈报，惟职师开拔在即，所有租界警卫职务，应请钧座另行委员接替。兹将此次职师接收九江租界各缘由，备文呈报，伏乞鉴核备案。"

（原载1927年1月24日广州《民国日报》）

# 全国工人阶级目前行动总纲

（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扩大会通过）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编者按：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927年2月由广州迁到武汉以后，在2月下旬召开了执委扩大会，会议开了一个星期，通过了三十多个决议案。这些决议案，现在绝大部分还没有找到。

这个《全国工人阶级目前行动总纲》，一载在李立三同志的《中国职工概论》一文中，另载在湖北全省总工会宣传部于1927年5月8日出版的李昌莱编的《全国工人阶级目前行动总纲浅释》小册子中。但是二者的文字在个别地方有些差异。现在根据的是李立三同志一文中所载的。）

一、反对一切资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武装进攻，尤其是最近英国帝国主义对华出兵。

二、要求彻底完成国民革命；反对一切与帝国主义及军阀等妥协之倾向。

三、拥护一切民主革命势力之争斗，反对代表封建势力之个人专政及军事独裁等。

四、拥护国民政府继续北伐，肃清一切军阀。

五、拥护农民一切反封建势力及获得土地权之争斗。

六、要求政府颁布劳动保护法。

七、要求八小时为最高限度工作时间，反对直接或间接延长工作时间；要求礼拜日休息，照给工资。

八、要求随时增加以物价为比例之真正工资，反对降低工资。

九、要求男女作同等工作者，应得同等工资。

十、要求禁止雇用不满十三岁之童工工作。

十一、要求减少女工、童工之工作时间，并全力拥护改良女工、童工劳动条件的争斗。

十二、拥护手工业工人一切反封建争斗，打破前次之主奴关系。

十三、要求工会组织之完全自由，无论平时、战时，不受任何法律命令之束缚。

十四、要求各省、各县、市组织统一的总工会，反对一切分裂工会的企图。

十五、各省总工会、各产业总工会均统一在全国总工会之下。

十六、要求赤色、黄色两职工国际，共同发起组织统一全世界之职工国际；要求建立东方各国工会间的亲密关系；反对各国政府、资本家把持的国际劳工局。

十七、要求罢工之完全自由，无论平时、战时，不受任何命令之限制。

十八、反对交通系、总商会等及其他代表官僚资本阶级势力侵入工会，反对劳资联合会等及其他一切阶级调协企图。

十九、反对有强迫性质的劳资仲裁机关。

二十、反对资本家提倡改良主义欺骗工人，如分给工人红利等；反对资本家向工人进攻的新形势，如加重工人工作等。

二十一、要求团体契约权，各企业不得雇用非会员工人及工人解雇前必须将正当理由通知工会。

二十二、反对包头制。

二十三、要求国立的失业保险，救济失业工人。

二十四、要求国有产业应有工人代表参加管理。

二十五、要求各级总工会得派代表出席国民政府及其以下各级政府会议。

二十六、要求国家税捐负担应归富有阶级。

（转自《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

# 上海总工会报告[1]（节录）

（一九二七年六月）

## 一年来的斗争

一年来，本会领导上海八十余万工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继续坚持了斗争。虽然遭受了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和反动势力的无数压迫和打击，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是到现在本会却依然存在；群众团结的力量和斗争的意志却愈益增强；活动的方法和运用的策略却愈加正确。无论反动势力怎样猖獗，只要我们很好的坚持斗争，敌人必将日趋崩溃。现将本会一年来的工作过程和情况，分八个时期详细报告如下。

### 第一个时期　第三次劳动大会以后——劳动争议勃兴时期

自1926年第三次劳动大会以后（即“五卅”事件一周年纪念以后），到八月日商工厂罢工，这是上海工人劳动争议的勃兴时期。兹将劳动争议的原因、经过概述如下：

一、劳动争议勃兴的原因

“五卅”事件一周年纪念后，帝国主义的威势在一般工人中已经一落千丈。工人在“五卅”事件以前受着残酷的压迫，当纪念“五卅”时，群众情绪高昂，异常激愤，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而此时值上海米价暴涨（十七元五角一石），其他日用品亦日趋涨价，工人的生活更加困难。然而，资本家方面目睹工人纪念“五卅”的热烈行动，心惊胆寒，极力向工人反攻；中国官署亦惧怕工人的团结日益扩大和巩固，企图加以压迫。因此，许多劳动争议事件相继而起，激成了劳动争议的勃兴时期。

二、本会领导的斗争和经过

这个时期，本会最重要的问题是：第一，如何健全组织，以便于领导斗争；第二，如何取得工会在社会上的公开地位；第三，如何在新的斗争中发展并巩固工会组织。

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首先改变了工会的组织，把原来六个地区组织改为“杨树浦、引翔港”、“小沙渡、曹家渡”、“南市、浦东”等三个区组织，并派一名得力人员到各区，做为上海总工会的常驻代表，指导一切活动。本会在执行委员会下，以委员长、组织

---

① 这一报告系译自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所编之《时局与上海之劳动风潮》第二册。原编者在正文前有如下之说明：“共产派的上海总工会在本年六月汉口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提出了一个报告书，该报告书记录了自去年‘五卅’运动纪念日起至本年‘五卅’运动纪念日止这一年来工作的经过。该报告虽有某些夸大自吹之嫌疑，但我们摘录它如下的主要部分，这在上海总工会的研究参考资料中，仍是很好的材料。”

与宣传两部主任及三个区的常驻代表组成常务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处理全部工作。各区组织了“工人代表会”，选出代表三人为主席团，主持全区的活动。

为解决第二个问题，对这期间的一百零六次罢工，本会一方面进行宣传指导，获取群众的信任；另一方面在调解罢工纠纷时，争取社会上的同情。这些措施在六十二家缫丝厂罢工中显示的最有力。因此，本会的社会地位遽然提高。

为了解决第三个问题，我们在每次罢工中都特别注意了组织工作。如丝厂第一次罢工，光余七厂的劳动争议曾一度消沉，本会立即进行了组织工作。手工业的洋服工会亦是在罢工中建立了组织。其他如杨树浦、小沙渡、南市等三个地区的“工人代表会”，亦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

三、劳动争议的结果及影响

仅在两个月内，罢工次数即达二百六十九次，参加罢工有一百零七个行业。由于本会的领导得当和群众奋勇坚持，大部分罢工的结果都是工人方面胜利。罢工的胜利，使群众对本会的信任更加巩固，本会的社会地位也遽然提高；而资本家方面则受了很大的损失和打击，六十二家丝厂尤甚。帝国主义和军阀对本会更加嫉恨；他们为使本会不能在社会上公开活动，遂于6月12日指使孙传芳的走狗严春阳，封闭了本会的会所①。本会被封闭后，当即采取了五项对策：

（一）要求和平解决；

（二）积极宣传发生劳动争议的原因与工人的痛苦，并号召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

（三）在原来没有组织的、又不属本会领导的工人群众中积极进行活动，使劳动争议继续不断，以证明官署封闭和消灭本会的企图无济于事；

（四）努力保持本会在社会活动中的地位；

（五）严密各区工会的活动，并采取半公开的形式活动，以免工人因本会被封而引起惊惶。

## 第二个时期　日商工厂劳动争议的始末

一、酝酿时期

在“五卅”事件一周年纪念前，小沙渡的工人因受着资本家的残酷压迫，随时随地采取罢工的手段反抗。六月间的劳动争议，仅小沙渡区已达十五次之多，除内外棉三、四两厂外，都获得了胜利。由于厂方在这些劳动争议中受了很大损失，并且各厂经常有些工人流露敌对的情绪，所以厂主更加迫害工人。当时适值纱价下跌，销路仃滞，资本家遂趁机采取了“关厂”政策，每当工人提出要求或将罢工时，他们即自动“关厂”，使工人受到经济上的威胁。从日本资本家采取这种政策后，内外棉三、四、九厂的劳动争议相继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领袖深感一个工厂孤立的罢工，绝难对抗日本人的“关厂”政策。因此，在7月23日的小沙渡“工人代表大会”上订立了同盟公约，准备共同行动。这就是反日同盟罢工的起端。

① 据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6月28日载，上海总工会系6月27日被封；此外“向导”第160期“上海总工会第二次被封”一文谈到被封日期也为6月27日。

二、总罢工的决定

当时，本会分析了经济斗争的条件非常不利，认为厂方绝不会畏惧这次罢工，遂即召开了各种会议，向工人详细解释，工人始暂平静。到7月间，厂方的态度更加顽强，并传来了各厂大批开除工人的消息。对此，工人更加愤怒，自动来总工会要求下令罢工；但本会仍感时机不利，仍劝告工人忍耐。到了7月27日，本会常务委员会由于形势所迫，为了满足各厂工人的恳切要求和巩固本会在工人群众中的组织和威信，乃决定举行准备已久的反日同盟罢工。

三、劳动争议的结果

到8月20日，上海纱厂总工会下令首先在内外棉东西五、七、八、十二等五个厂举行同盟罢工，参加罢工者万余人，提出了五项条件：

（一）解决陈阿堂案，引渡凶手交中国法庭审理；抚恤被难家属；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日本领事向中国道歉。

（二）改良工人待迂，不得雇用武装巡捕、流氓入厂殴打工人。不得滥罚工资。取消侮辱工人人格的制度（如打手印等事）等。

（三）增加工资十分之二。

（四）释放各厂被捕工人；恢复被开除工人的工作；以后不得任意开除工人。

（五）赔偿关厂期内工人的损失；——三、四、九厂关厂期内工人的损失及此次罢工期内的工资，须一律照发。

以后陆续参加罢工的，有内外棉十三、十四、十五厂及同兴纱厂等共四个厂。只有内外棉九厂罢工一夜即复工。参加罢工的人数共约两万人，罢工二十八天，但结果是失败了。工厂方面开除了二百六十七名工人，所得到的条件是：（一）复工后每人每日增加米贴大洋三分；（二）复工后每人向厂方借洋四元。

四、本会在劳动争议中采取的政策

甲、罢工的范围及其结果仅限内外棉、同兴纱厂，其他如曹家渡的丰田厂、喜和厂，引翔港的东华厂、裕丰厂等，都因为实力不足，未能举行罢工。

乙、为唤起社会上对这次罢工的同情及注意，本会发表了宣言，并由日商工厂的工人派代表向各团体请愿，同时与学生共同组织讲演队。8月末在南京路等地举行了大规模的讲演会，并在各马路及游艺场所散发罢工宣言及传单。当时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曾拟出面调仃，但因形势不利，未敢出头。

丙、调解。当时对罢工工人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有很大的缺陷。罢工已有四、五日，而工人尚不了解罢工的意义。领导人员的活动亦未深入群众。工人有些消极表现。本会鉴于这种情况，遂不得不退让，由商界人士出面调解，最后把条件降为：

（一）每人每日增加米贴大洋三分；（二）改良待迂，不得雇用巡捕入厂殴打工人；（三）复工后三日内，贷给工人每人大洋四元，分期偿还。

丁、增加工资、照发罢工期间的工资及不得开除工人等三项条件，暂时保留，待日本纱厂联合会总裁船津来沪后，再行谈判解决。调解人虞洽卿向日本领事馆及厂主方面奔走的结果，厂方仅承认自动履行三项条件中的前两项。这时本会遂命纱厂总工会通知罢工工人复工。

## 第三个时期　反英、反孙

一、反英

自日商工厂的劳动争议忍痛复工后，北伐军节节胜利，攻克武汉，进军江西。英帝国主义在长江一带的政治、经济势力彻底动摇了。帝国主义为了镇压高涨着的革命怒潮，又使用了“炮舰政策”，以图延续其统治，炮轰万县全城，死伤数百人；在汉口、九江肆无忌惮的枪杀中国人。当时幸赖全国人民，尤其是武汉政府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及小商人等全力为政府的后盾，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国租界。汉口事件发生时，本会联合上海商、学各界，扩大反英宣传。当时虽遭孙传芳的残酷压迫，但本会仍与学生合作，公开的或秘密的随时进行宣传，在上海煽起了浓厚的反英气势。除了对内宣传外，并致电英国人民和工党，呼吁认清时代潮流，同心协力打倒帝国主义；并组织上海各界对英经济绝交委员会，推进反英斗争的胜利；但由于当时环境不利，该会难以起更大的作用。英帝国主义操纵世界舆论，大肆诬蔑汉口事件是第二次“拳匪”事件；借口保护侨民，向中国派遣军舰，妄图用武力镇压中国人民；在上海越过租界架设铁丝网，阻塞交通，破坏商业交易。凡稍有血气的人，无不看清英帝国主义的野心，从而更激起了强烈的反抗。南京事件发生后，本会又领导上海市民坚决抗议。这种反英气氛，自“五卅”事件以来继续高涨，从未仃息。北伐军进驻上海后，长期被蹂躏的上海市民以满腔的热忱欢迎北伐军，要求在革命高潮中获得彻底解放。不料竟出现了背叛党国的蒋介石，甘心附逆，代替帝国主义屠杀上海革命工人，干出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犹未干过的罪行。但是，革命的上海工人与市民的反英情绪，反而更加坚强和高涨。

二、反孙

当北伐军战胜吴佩孚时，孙传芳提出妥协。本会即利用孙传芳的所谓“保境安民”的假面目，充分鼓动上海商、学各界，阻止孙传芳进兵江西。至国民政府收复武汉，开始向东南进军与孙传芳短兵相接时，本会的反孙策略从消极的保守转为积极的进攻。进攻时期与策略，可分为三个阶段：

（1）江西混战时期

因蒋介石猜忌专横，江西久攻未克，所以本会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江苏、安徽、浙江三省自治”，鼓动三省人民扰乱后方，仃止纳税，反对军用票等，在经济上给孙传芳以重大打击。

（2）江西战败时期

当孙传芳在江西垂败之际，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本会组织的工人纠察队亦于11月24日举行第一次无产阶级暴动，以期占领上海、杭州，彻底切断孙传动亦未有所成就。然芳的后路，消灭其在东南一带的残余势力。其后夏超的独立被扑灭，本会领导的第一次暴而，上海的暴动对于江西的军事胜利，却实有重大的意义，迫使孙传芳不得不怆惶的逃往天津。本会根据暴动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为第二次及第三次暴动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孙传芳逃津后，投靠奉天的张作霖，他们勾结鲁军共同南下，于是更加引起东南人民的愤怒。本会当时的行动口号是：（1）反对奉鲁军南下；（2）打倒孙传芳；（3）拒用军用票；（4）上海市民实行自治；（5）响应北伐军。活动的方法是：（1）联合上海商、学界及三省知名人士组织市民代表会，促进自治运动；（2）各工会组织了经常性的宣传

队，出外讲演，散发传单；（3）举行总同盟罢工与武装暴动。

（3）自治运动

上海市民的自治运动由来已久，因屡遭军阀压迫，未得实现。但自治运动是上海市民（包括大资产阶级在内）的强烈要求，也是对付帝国主义大本营——上海的最适当的政策。自孙传芳在江西战败以后，上海市民如狂似醉，无不认为即是彻底实现上海自治的良好机会。当时的大资产阶级如邬志豪、王晓籁及官僚如蔡元培、褚辅成等，都积极致力于自治运动。本会在市民代表会中的地位与威信日益提高。当时上海虽在严春阳、李宝章与帝国主义的共同蹂躏之下，但上海市民尤其是工人、学生仍不断努力进行斗争，终于在今年2月建立了市民代表会议的政权。在这个会议上，工人代表占二分之一以上。会议通过决议，接受上海市民的总要求；颁布了上海市的施政纲领；产生了革命的临时政府。本会的汪寿华、李泊之、王景云等三人被选为市政府委员。会议还决定把上海市划分为八个区，设有区代表会议与执行委员。这种民治的基础，以后虽遭蒋介石的破坏，但上海市民的革命意识却因此增强。自孙传芳卷土重来以后，奉鲁军亦随之南下；本会领导的自治运动更趋高涨，其具体表现是三次暴动与总同盟罢工。关于罢工的情况，将在"上海工人的斗争"部分详细说明，这里只简单叙述三次暴动的经过。

## 第四个时期　三次暴动

一、第一次暴动

（一）当时的客观环境：（1）孙传芳在江西全军惨败；（2）夏超在浙江宣布独立；（3）上海在严春阳、丁文江的统治之下；（4）孙传芳残余势力中的精锐孟照月部，自南京经上海去杭州。

（二）本会予定的策略。待夏超的军队向松江进军时开始发动，以本会的工人纠察队为基础，与国民党的钮永建合作，袭击高昌庙，占龙华后再占领上海。

（三）暴动的经过。11月24日，夏超的军队未能前进，但上海的局势已处于矢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工人纠察队的领导人奚佐尧与陶静轩乃率领队员援助群众，按予定计划自南市、浦东开始进攻；但因准备不充分，时机不利，沿途频遭狙击。我们的领袖奚佐尧、陶静轩因而牺牲。

（四）这次失败的原因。（1）暴动的时机迟缓，未能与夏超的军队取得联系；（2）大资本家虞洽卿及投机分子钮永建临阵脱逃，出卖同盟者；（3）准备不周密，枪械不良，军事技术幼稚；（4）因未全面考虑全国的政治局势，陷于孤立无援，以致失败。

二、第二次暴动

（一）当时的客观环境。（1）北伐军与鲁军在松江对峙；（2）直鲁军企图作最后抵抗；（3）上海在李宝章的统治之下；（4）蒋介石为压制工人的革命高潮，把进军重点由上海转为苏州、常州；（5）自第一次暴动后，由于长期的宣传，上海市民大多数已认识了暴动的意义，但是除工人外，其他市民只是消极的参加；（6）2月21日，全上海八十万人举行了六小时的总同盟罢工①。

---

① 据"向导"第189期施英"上海总罢工的记录"一文所说，上海总工会是在2月19日发出罢工命令的，当天工人即开始罢工，共罢了四天，至2月24日下午一时复

（二）予定的策略。本会的工人纠察队与海军及商团配合，予定2月21日下午六时以海军开炮为信号，进攻高昌庙，同时缴除败兵及警察的武装；占领龙华后，成立上海市政府，响应北伐军。

（三）暴动的经过。2月21日下午二时起，各处的纠察队及罢工工人陆续到达指定地点集合。到下午六时，海军并未开炮，当时的指挥亦不够机敏，群众以为方针改变而陆续散去。至下午七时海军开炮，但因敌人防范周密，商团及钮永建率领的便衣队未起作用，本会的纠察队亦因人数过少，终于失败。翌日，工人、学生仍继续散发传单、讲演，遭到李宝章的大屠杀，死亡数十人，被捕者达五百人以上。

（四）这次失败的原因。（1）予定时间过早，未能与海军号炮配合一致；（2）未能与松江前线的战斗采取一致行动；（3）投机分子未起作用；（4）准备不充分，军事技术幼稚；（5）未能充分利用群众的力量。

三、第三次暴动

（一）当时的客观环境。（1）北伐军自闵行迂回，进军上海，将抵龙华；（2）毕庶澄的军队已无斗志；（3）上海市民的革命热情已达顶点；（4）本会与各方面都作了长期的准备；（5）帝国主义者除用铁丝网封锁租界以外，再无其他办法。

（二）予定的计划。罢工后立即暴动，夺取警察局；以纠察队维持治安，解除直鲁军败兵的武装；占领各公共机关，成立市政府，欢迎北伐军。

（三）暴动的经过。3月21日正午下令罢工，三小时内全市一致举行了罢工。下午一时，群众在闸北、浦东、吴淞的各指定地点集合；下午二时开始行动，工人纠察队在前线，群众在后方，仅在一小时内，各警察局相继被群众占领。至下午四时，南市、浦东全部被群众占领，仅在闸北与直鲁军巷战两昼夜，始完全攻克；吴淞的敌人亦相继被肃清。

由于军事行动的成功，其他予定计划都逐步的实现。

（四）结果。这次暴动的成功，是东方革命运动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赤手空拳的工人不惜牺牲，解除敌人武装，成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北伐军一弹未发，收复了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上海，使二百五十万上海市民平安的归于青天白日旗下；同时确立了本会的地位与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

## 第五个时期　本会公开后的活动

3月21日的暴动成功以后，本会在闸北会文街湖州会馆设立会所，公开办公。自3月22日至“四、一二”事件，共二十日。这期间本会的会务非常繁忙，各方面都表现出蓬蓬勃勃的气象。然而由于“四、一二”事件，本会的文件全部被毁，无法作详细具体的报告，深感遗憾。兹将当时的情况，就记忆所及，逐项概述如下：

一、政治方面

上海工人很快的驱逐了军阀，促成革命军的胜利。换句话说，上海市民在短时期内未受任何重大的灾难，就消灭了直鲁军阀。不用说，这是上海各阶级的力量与功劳。本会鉴

---

工；罢工人数在三十六万以上。又据上海“申报”1927年2月27日“一周间本埠重大事件之经过”一文载，此次罢工人数约五十余万人。

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重要性，自公开活动以后，即为建设民主的政权而努力斗争，以正确的革命政策，结成上海各革命民众的联合战线，发展群众的力量，巩固革命的基础。根据这一原则，体现在实际的工作中有以下各项：

甲、在政治上：由市民代表会议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产生的方法完全运用了民主的原则，由工商学联合会选出全部委员。本会执行委员被选为市政府委员者共三名，约占全数的三分之一（市政府委员共十一名）①。

乙、在军事上：积极的加强工人与军队的联系，鼓励革命军队与工人亲密合作；如募捐慰劳北伐士兵，举行工兵联欢会等。

二、组织方面

本会公开以后，几乎一切的内部活动都集中于组织部，但当时组织部的工作人员非常薄弱，主观力量赶不上客观形势的发展。兹将当时的组织工作，按时间先后，概述如下：

甲、改选委员。本会公开后，即于28日改选，并成立新的执行委员会，当场选出汪寿华等四十一人为执行委员，并在执行委员中选出汪寿华、张之甫、李泊之、顾顺章、龙大道等五人为常务委员；并组织了交际、宣传、经济斗争和纠察队等各部。

乙、整顿各产业总工会、工会联合会（简称“产总”、“工联”）。改组之后，各产总、各工联继续进行活动。上海工会组织分为十七个产业，八个地区。以前已成立的产总、工联，重新召开成立大会，认真整顿内部工作；尚未成立者，由本会派专人着手组织。以前及新成立的产总共十五个，另外，食品、建筑两个产业亦在进行筹备。新成立工联的有虹口、法租界、闸北等地。

丙、登记工会。以前及新加入本会的工会，都未免有些紊乱的现象，所以本会决定各工会在一周内，向各区工会提出详细的报告，重新进行登记，以便于划分工联、产总的范围及进行各厂工会的整顿和领导。当时已登记的工会有五百零二个。

丁、印发工会章程及组织办法纲要。为避免新加入的工会在领导上混乱，特印刷工会章程、工会组织办法纲要、及加入本会的条件等各十万份。对来信请示或派人来本会洽谈的工会组织，均分发若干份以供参考。

三、经济斗争

上海工人在军阀统治时期，尚且为争取本身的经济利益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何况本会已经公开，已不再受政治上的压迫，所以当时劳动争议相继而起。本会早在暴动前已提出上海工人的总要求，公开后又向各厂普遍分发，指示各厂工会参考“总要求”，结合各厂特殊情况，向厂方提出经济条件，要求厂方承认。的确，当时各厂主鉴于工人力量的强大及政治环境的趋势，除少数极顽固的厂主外，大多数都给了工人以满意的答复。可以说仅在七日内，上海工人得到的经济利益，比以往任何劳动争议的成果都大得多。

四、整顿纠察队

① 据上海“申报”1927年3月23日载，3月22日第二次市民代表会议通过临时市政府委员之名单为白崇禧、钮永建、杨杏佛、王晓籁、虞洽卿、陈光甫、罗亦农、汪寿华、林钧、何洛、丁晓先、侯绍裘、王汉良、陆文韶、郑毓秀、谢福生、李泊之、王景云、顾顺章等十九人；其中共产党员和工人代表占五人：罗亦农、汪寿华、李泊之、王景云、顾顺章。顾顺章后来叛变。

甲、集中领导。暴动后本会的纠察队散在各区，缴获奉鲁军的武器也分散在各区。消灭奉鲁军的翌日，纠察队指挥者下令集中人员与武器加以检点之后，编成大、中、小队，分驻各区；同时在商务俱乐部内，成立了纠察队总指挥部。

乙、授与队旗及整顿服装。纠察队都是工人组成的，服装很不整齐，外观及精神上都有不好的影响，且又易混入流氓及捣乱分子，因此本会认真审查了工人纠察队的成员，制定纠察队制服。在换穿新制服的当日，在闸北青云路举行了本会纠察队的授旗仪式。

丙、设立纠察队训育部。为使纠察队愈益革命化，设立了纠察队训育部，使队员提高政治、提高军事知识，正确认识工人纠察队的意义，以充分负起职责。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二十天的公开活动期间获得如此成绩，确属非常难能可贵。例如这个期间的工作是顺利的，各阶级的革命联合战线是稳固的。当时亦曾顾虑帝国主义与新军阀是否将策谋屠杀，实行“苦迭打”，镇压革命；果然帝国主义与新军阀的阴谋终于实现了。这种局面固然是新军阀甘心出卖革命，进行野蛮残暴的屠杀所造成的，但我们本身工作也不好，未警惕新军阀的反动阴谋，反而过于相信戴着革命假面具的军队，对此阴谋疏于防范，以致才有4月12日的惨痛事件突然发生。

（转自《中国历次劳动大会文献》）

#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
# 告上海市民书

（一九二七月二月二十日）

全上海革命的市民们！

上海是全世界大都市之一，是全中国第一个大都市，是全中国工商业和文化发达的大都市，全市居民在二百万以上，超过了欧洲小国的人口，超过了十三州独立战争时的美国人口，我们的上海市民是应该如何自负的。可是各国帝国主义者，视上海为他们共管的殖民地，压追剥削，肆无忌惮；国内各系军阀则视上海为他们的筹饷地，为他们的私产，此争彼夺，兵祸连年；这岂非我全上海市民之奇耻大辱！

近者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为国家主权人民政权而战，奄有鄂、赣以及浙江，帝国主义的英国及直系军阀余孽孙传芳，犹复狼狈为奸，厚集兵力于上海以为彼等最后之抗斗。

自“五卅”以来，我上海市民不断的和帝国主义与军阀血战苦斗将及两年了；兹当帝国主义与军阀伙同向中国人民最后抗斗之际，我上海市民更应加紧奋斗，革命的上海市民更应和革命的国民政府军队结合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及军阀的统治势力，建立民众政权的市政府，解放各界市民多年的苦痛，创造独立自由的新上海，一洗八十年来上海市民之奇耻大辱！

上海的工人，已开始政治的总同盟罢工，向统治上海的帝国主义与军阀奋斗了，各界革命的市民，起来！一致起来协同工人奋斗！以打倒统治上海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与军阀为奋斗之最终目的。

战斗已经开始了，本党以为全上海各界市民应联合在一共同政纲之下共同前进。兹提出一目前最低限度的共同政纲如下，本党即依此政纲而参加奋斗。

一、由上海市临时革命政府召集市民代表大会，成立正式上海市民政府，直辖于国民政府。

市民代表大会由工、商、学、兵、自由职业者（教职员、医生、新闻记者、律师、会计师等）以各职业机关（如各职工会，各马路商会，各学校学生会等）为单位，按人数比例，选举代表若干人，各政党各派代表若干人，组织之。每年召集常会四次，每年末次常会改选其执行委员会；其执行委员会中之主席团即为市民政府。

二、市内一切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皆绝对自由，非经市民代表大会的执行委员会之紧急法令，不受任何限制。

三、撤退各国海陆军，收回租界，统一市政。

四、不分国籍的征收市内一切居民财产（土地在内）累进税及所得累进税，免除纸烟、染缸、菜场、保卫团等一切苛税杂捐。

五、确定发展市政（尤其是贫民住所马路与自来水）及教育之经费。

六、颁布劳动保护法，中外工厂商店均须一律强制执行。

劳动保护法须规定八小时工作制，规定依物价而增高的必需工资，限制童工年龄，女工产前后之优待，改良工厂卫生，改良童工女工工作条件，规定死伤疾病的抚恤及保险办法，承认雇人解雇之团体契约权等。

七、成立失业救济机关。

八、限制自由加增房租。

九、现有的保卫团改归市民政府直接管辖，并扩大到市内各区，分区组织武装人民的保卫团，保卫全市治安。

十、改善本市警察及驻沪军队的兵士生活，按月发饷。

十一、由市民政府设立粮食管理局，严格管理粮食之输出入及其价格，以裕民食。

十二、由市民政府募集交通公债以发展邻市间的交通事业，如汽车、小轮、航船等，以充分供给商业及军事运输。禁止军队自由拿船扣车妨害商业及交通。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

（原载《向导》189期，1927年2月28日出版）

# 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同盟罢工告上海全体工友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上海全体工友们！你们这次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残暴工具孙传芳而总同盟罢工，为了铲除孙传芳的暴政响应北伐军而总同盟罢工，为了争全上海市民的自由与政权而总同盟罢工，罢工动员至三十万之众，罢工日期至五日之久，像这样伟大的政治总同盟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直接反抗封建军阀的第一次伟大的政治斗争，与五卅反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有同样的意义。现在你们虽然宣告暂时仃止罢工，但决不是对孙传芳和李宝章让步，而是准备更进一步的新斗争，上海总工会说得非常之对："非因退让而复工，乃为准备更大的斗争而复工"。

在这次罢工中，虽然没有根本打破孙传芳的恶势力，虽然没有争到上海工人及市民应得的权利，但始终已表现出上海工人阶级的伟大势力，伟大的团结力量，已经使得你们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发抖而手忙脚乱，已经证明上海工人阶级有伟大的威权，上海工人是真正反抗恶势力为一切民众争自由的先锋队。可惜上海的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民众太软弱没有决心，不能跟你们一同奋斗，致你们孤军深入。

在这次罢工中，虽然有许多牺牲，流了许多工人烈士的热血，但由此更证明了工人阶级的伟大，证明了孙传芳、李宝章的残暴，证明上海市民要得到自由，非以暴力根本铲除残暴的孙传芳的政权，建立上海市民民主政权不可。

但上海的工友们应该记着，在这次罢工中主要的缺点是没有武装准备，没有准备武装暴动的决心，因为这次总同盟罢工的倾向是推翻暴政，随着总罢工的结果自然要到武装冲突，自然要到解除敌人的武装，夺取武装。其次工人的组织与团结还没有作到充分的程度。

现在革命潮流已到了极高涨的时候，我们的敌人孙传芳的残喘已到了最后的五分钟了，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也快到沪了，上海全体工人们，应该加紧继续奋斗，踏入更广大坚决崭新的斗争形式上去，应该加紧你们的团结力，扩大你们的组织，集中你们的战斗力于上海总工会指导之下，充分准备武装，只有如此才能达到胜利，只有如此才能领导其他一切市民坚决地奋斗，本党愿以全力赞助你们，根本消灭孙传芳的暴政，争得全上海工友及全上海市民应得的权利。

全上海的工友们！你们是为全上海市民争自由的先锋军，并且是为全中国民族争自由的先锋军，你们有过五卅反帝国主义伟大运动的光荣历史，有过斗争的经验，这次总罢工更证明了你们的伟大，更丰富了你们的经验，你们努力向新的斗争中去。

根本铲除孙传芳的暴政！

**反抗直鲁军南下！**
**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
**扩大工人组织！**
**拥护领导全上海工人奋斗的总工会！**
**组织工人武装！**
**成立工人代表会议，参加市政府，建立民主政权！**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原载《向导》189期，1927年2月28日出版）

# 中国共产党为此次上海巷战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全中国工人同志们：

三月二十一日从今成了中国革命史上最有价值的一个纪念日。此次上海八十万工人就在这一日举行总同盟罢工并暴动起来反对直、鲁军阀的统治。整整经过二日一夜的巷战，工人终于解除直、鲁军的武装并自己武装起来了。正因工人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始不经战斗完全占领全上海，而上海各界民众亦得避免数千直、鲁军抢劫之惨剧。

上海工人阶级此次英勇的胜利的斗争，真可为全国工人阶级之模范。上海本来是全国产业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工人阶级本来是全国工人阶级中数量最多、组织最好、奋斗历史最长久的一部分。

轰动全世界的五卅运动，就是由上海工人首先发难的。自从五卅运动以后，上海工人时时刻刻都站在最急进的地位，为全国工人阶级之先驱，因此更为全国革命运动之先驱。

此次武装暴动起来并胜利以后，上海工人就以自己的血和肉从事实上证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

可是，上海工人此次的奋斗及其胜利，却惹起敌人——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官僚、土豪、劣绅及其他反动分子——大大的恐慌。他们在中国无产阶级面前发抖，他们认识了工人阶级是他们的劲敌，尤其是数量最多、组织最好、行动最革命的上海工人阶级，尤其是现在暴动胜利并自己武装起来的上海工人阶级。所以他们尽力注定目标向上海工人进攻。他们除直接的公开的用尽种种方法进攻工人之外，又用挑拨离间之诡计，诱惑国民革命中右倾的势力，他们以此诡计使本在同一战线上的革命武装势力之一部分怀疑，更进而敌视工人阶级。革命战线之分裂正是反革命的利益啊！所以上海工人现在虽然驱逐了直、鲁军阀，虽然一部分武装起来，虽然联合各被压迫阶级建立了革命民主的上海市政权之基础；然而这些革命的胜利品时时刻刻都在危险状态，时时刻刻都有被内部妥协分子葬送即被敌人夺回之可能。而上海革命势力失败，上海工人牺牲白费，即足以摇动全中国的革命潮流，全国工人的势力自然因之受重大的打击。所以全中国工人同志应该崛起，视上海工人暴动的胜利即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胜利；应该自信工人阶级的力量能够解除军阀的武装，并建立新的政权，上海工人的武装就是国民革命胜利之保证。起来！

学习上海工人暴动巷战的教训！

拥护上海工人的武装——总工会纠察队！

拥护上海革命民主的新政权——上海市民代表政府！

拥护武汉国民政府，继续并扩大革命的争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原载《向导》193期，1927年4月6日出版）

# 〔附〕上海工人第一次起义

瞿 景 白

上海的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的狂澜中，更广泛的团聚了自己的队伍，运用他们的力量，激动着中国的革命向前发展。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之中，上海工人所领导的五卅运动，实在是这个过程的第一步。五卅运动的动力，在中国的南方广东和香港燃着了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火线。在这个革命的过程之中，中国劳动群众的运动，经历着很多的曲折和困难，上海工人却始终是这个千万群众的先锋队。当着广东政府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攻下武汉之后，老朽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很快的就崩溃下来。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的工人便企图用自己的力量来推翻统治阶级——北洋军阀的政权。十月十日北伐军攻下武昌，吴佩孚失了最后的地盘，北伐军把自己的主力开赴江西去进攻孙传芳的军队，孙军大部调到前线去抵抗南方的国民革命军。浙江省长夏超与国民政府驻沪代表钮永建订立条约，决定实行政变反对孙传芳。条约订妥后，钮永建便开始在上海发动破坏孙传芳后方的工作。组织所谓"暴动"，以邦助夏超"投诚"国民政府的政变。当时上海的工人取如何的态度呢？他们要求得到自由和切身的利益，发展革命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当时的策略，是予备在孙传芳败退的时候，上海无产阶级起来暴动以邦助北伐军占领上海。当时在钮永建之下团结的有一部分资产阶级（虞洽卿等）、小资产阶级及一部分流氓，他们所有的力量，是三千六百人的流氓队伍、五百人的武装商团。上海工人也开始组织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已经有一百三十人武装的和二千人没有武装的战斗队伍（工人纠察队）。当时统治阶级孙传芳的力量有步兵一千、警察二千、内河小军舰二只（一只站在钮永建方面），此外则有李宝章率领的第七十六旅，分布于上海附近之长江两岸，这一部分军队，对孙传芳的关系是不密切的。国民党人钮永建等是没有计划的。共产党的计划，是如果要起义，就要有海员、五金工人、市政工人（自来水、电气工人）、纺织工人的动员。这是起义前的各方面的情形。十月十六日夏超在杭州正式传布投诚国民政府。十七日晨进兵上海，当日下午兵抵上海附近，离上海三十里地。孙传芳已于

事先调动军队（第七十六旅）到沪布防，夏军乃不能直逼上海。这时上海工人的情形，在工潮低落的状态中，共产党并没有在群众中鼓动工人的情绪，而只认为军事上的准备不充分、没有启发起义。至十月二十日，共产党已准备发动，国民党人也予备动了，可是夏超与孙传芳作战的形势上，夏军已处于不利的情势中。十月二十三日，钮永建根据不正确的传闻——孙军已为夏军击败，下令于二十三日半夜至二十四日早晨发动，实则夏军已为孙军击败。当下令发动时，原约定以军舰炮声为信号，而号炮却因别种原因未能举行，准备的暴动也就无形的消灭。有几处地方如闸北等，那里群众准备暴动的小队，仿佛听到了炮声，于是就攻打警察分局，结果失败，丧失了一部分枪枝。共产党于二十四日清晨下令立刻仃止起义，延缓日期，准备将来举行。

（原载瞿景白著《中国职工运动材料汇编》，1931年3月出版）

# 〔附〕上海工人第二次起义①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施　英（赵世炎）

从二月十九日起，上海工人阶级开始了历史的斗争，掀起了城市群众革命的怒潮，发动了民众政权的夺取。从这一日起，中国的革命历史翻了一个新的篇幅；同时亦是世界的工人阶级历史，添了一页伟大壮烈的记录。

一九二三年的“二七”运动，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各有其特质，各有其历史的与社会的根源。悲壮的“二七”事变，表明中国工人阶级最初的奋斗，便已是在封建军阀统治下争政治自由的奋斗。伟大激昂“五卅”运动，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血潮中，工人阶级又表现其革命的毅力。由这两次运动发展到消灭军阀的“北伐”战争。中国工人阶级之织组同盟，便是政治的同盟；其行动的纲领，便是为革命而夺取民众政权的纲领。“北伐”的战争开始自胜利以后，革命的波纹震动于全国的城市与乡村。上海是全国最重要的城市，上海的工人群众是全国工人阶级之领导者。历史的革命的斗争，赋与上海工人阶级以天然的责任，因此而爆发出自二月十九日起的总同盟罢工。

这一总同盟罢工，不只于是罢工，而即是革命。总同盟罢工的初期，仅仅有五日的记录；然而革命的行动继续高涨起来，尤其是在罢工五日复工后更高涨起来。我们现在作总同盟罢工的记录，即在于记录这一革命的初期的各种事实。

① 原题为“上海总同盟罢工的记录”。——编者

# 罢 工 以 前

二月十九日之前夕"北伐"战争的胜利，获得了上海邻省的浙江。军事的胜利距离尚远，但上海的军阀统治已经动摇起来；军阀统治的动摇，产生出民众革命行动的时机，于是立刻爆发了上海的罢工。这一罢工是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这一罢工的目的，即在推翻军阀孙传芳李宝章的统治，建立上海革命民众（工人须参加的）政权，响应北伐军，促进国民革命战争的迅速胜利。因此，上海工人群众奋臂而起，领导一切被压迫民众，开始革命的斗争，总同盟罢工遂以实现。十九日之前夕，全上海工人群众之领导者——上海总工会，经代表大会议决之后，发布出下列的命令：

**总同盟罢工令**

全上海工友们！民众革命势力日强，北伐军战争胜利，军阀孙传芳抵抗失败，惟有由民众起而行动，以推翻军阀势力。本总工会特宣告全上海总同盟罢工，以完全消灭军阀残余，表现革命民众势力。令到之时，即刻行动，全体工友总罢工。罢工之后，须有组织的有秩序的，听候总工会指挥：无复工命令，不得复工！切切此令！

罢工响应北伐军！

罢工打倒孙传芳！

民众政权万岁！

工人自由万岁！

工人团结万岁！

上海总工会　二月十九日

## 罢工宣言与总要求

罢工开始，总工会发布宣言与政治经济总要求十七条，其文如下：

**总罢工宣言**

国民革命的运动，自五卅运动以来，愈益高涨，统治东南的军阀孙传芳，现在已至于失败，这是革命军健儿奋勇战斗之力，尤其是我们革命民众不断的反抗之力。上海是上海市民的上海，我上海市民受军阀压迫之痛苦，历数十年，帝国主义列强，以上海为侵略中国的根据地，今更欲以武力，威吓我国民运动。我上海市民人人欲推翻军阀的黑暗统治，抵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我全上海工人自五卅以来，即勇往前驱，为国民之自由与解放而奋斗，现当军阀孙传芳势力溃败之时，又正是帝国主义者以枪炮威吓我屈服之时，黑暗与反动的势力若不推倒，我人民永无自由解放之日，欲推倒此黑暗与反动势力，惟有人民起而罢工、罢市、罢课以抗议，我工人阶级今为此抗议之前驱，革命民众必须表现其行

动，以行动迫促军阀势力的消灭，邦助北伐军的胜利。本总工会特号召全上海工人，以有组织的有秩序的手段，即日宣告总同盟罢工，以为革命民众权力的抗议之开始。下列十七条，为全上海工人政治与经济的最低限度总要求。

一、继续反对帝国主义运动。

二、消灭军阀黑暗势力政治。

三、肃清一切反动势力。

四、建立真正保护人民利益的政府。

五、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

六、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权。

七、增加工人工资，规定最低工资额。

八、限制物价高涨，保障工人生活。

九、要求八小时工作制。

十、星期日、节日休息，工资照给，不休息工资加倍。

十一、恢复失业工人工作，雇主不得借罢工关厂，抵制工人。

十二、不准打骂工人，滥罚工资。

十三、不得任意开除工人，开除工人须得工会同意。

十四、规定因工作而死伤的抚恤金。

十五、工人在疾病时，厂主须负责医治，并须发给半数以上之工资。

十六、男女工人，同工同酬，改良女工和童工之待迂，女工在生产前后休息六星期，工资照给，童工不得做过重的工作。

十七、改良工厂之设备，如增设门窗、天窗、厕所等。

以上各条，为我全上海工人目前行动之目标。在消灭军阀残余势力之共同作战中，愿与社会各阶级民众协同奋斗，愿新政府容纳我工人之要求，谨此宣言。

上海总工会　二月十九日

## 广大的罢工群众

十九日晨六时起，奉到总工会命令而罢工者：在杨树浦方面有瑞熔、锦熔铁厂，黄浦码头及制盒厂，东方、老怡和、纬通、恒丰等纱厂，及电车公司车务、机务两部，南洋烟草公司等全体工人。引翔港方面有电汽新厂，兰格木厂，及新申、振华、承安、厚生等纱厂全体工人。曹家渡方面有公益、申新等厂及电车机务、车务两部全体工人。南市有华商电车，求新、远大铁厂等全体工人。小沙渡方面有同兴，内外棉东五、西五、七、八、九、十二厂及福新内外厂，日华、喜和等十四厂。浦东方面有日华，祥生，南洋烟草公司等全体工人。英界各邮政局，公共电车，及南京路四大公司全体工人。法界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全体工人。以各产业计，罢工者纱厂工人全体。市政工人有邮电工人全体。店员方面有商务职工会，及先施、永安、新新、丽华等。手工业方面有金银业、茶

箱、洋服、蓬业、香业、制茶、线毯、猪鬃等全体工人。金属业与机器工人，罢工者有十余家。各轮船方面有太古公司之广西、山西、顺天、甘州、宁波五只，日清公司卢山丸、太吉丸、尚阳丸等四只，宁绍公司开兴一只，舟山公司舟山一只。印刷工人方面有商务、彩印、美华、华商、黑色、石印等全体工人。以上总计罢工人数约，在十五万人以上。

罢工之第二日——二十日——罢工人数激增至二十七万五千余人，其中多因受资本家之压制，或因未奉到罢工命令者，计如：闸北丝厂六万人，水木作四万人，南货业、酱园、米业、估衣业、药业、洋布业共计十万余人。公共汽车全体五百余人。小沙渡纱厂增至二十五家，共增一万五千余人。黄浦及十六铺等码头合计一万人①。

罢工之第三日——二十一日——罢工人数复增至三十五万，其增加者，计如：（一）码头工人，招商局中栈、北栈，日本邮船会社，黄浦码头大坂码头、太古码头、汇山码头，均已罢工，共计有三万余人；（二）水作工人增加一万五千余人；（三）徐家汇百代公司全体；（四）印刷工人有中华书局全体工人；（五）手工业方面各小厂业都加入，增加六、七千人；（六）纱厂方面原来参加者外，昨又增加二十六厂；（七）金属业工人，增加二千人；（八）杨树浦又加天章纸厂，中华宝兴锡箔厂，亨司达及英美烟厂，共三千余人；（九）海员新北京一百人。

罢工之第四日——二十二日——罢工人数复增万余人。其中计：（一）江西路自来水人全体；（二）虹口铁厂工人增加一千六百二十人；（三）张罗铁厂一百五十人；（四）工机器铁厂公所所属工友全体参加；（五）手工业各工会增加一万二千人；（六）店员增加一千人；（七）菜馆工会增加六百人；（八）公共汽车一部分罢工。

总计以上四日罢工人数，在三十六万以上，不仅是上海历来未有的大罢工，亦是全国历来未有的大罢工。上海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之进步，与组织发展的迅速，从这一次行动里表现了出来。然而上海租界帝国主义的报纸（如“大陆报”、“字林西报”、“泰晤士报”等）偏偏记载说：上海罢工第一日六万五千人，第二日五万五千人，他们很大胆的将实际数目缩小到六倍以上。租界里的强盗这种计算的伎俩，与他们报告最近到上海武装威吓的外国水兵数目，是同样的伎俩，故意以多报少。罢工之第二日，帝国主义者的报纸即宣传工人已复工，而实际上罢工人数反增加起来。第三日确有一部分被迫复工之行动（例如电车开车工人被捕者七人，由巡捕武装威迫，开车七辆，专门驶行南京路一段，以示工人复工）。但第四日仍有增加者。第五日总工会既下复工令，帝国主义者的报纸，亦却不得不一致记载说：“因为总工会正式颁布复工令，果然所有罢工工人一律复工了。”

## 白 色 的 恐 怖

罢工开始之第一日，孙传芳的走狗——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在垂死的状况中，犹肆其淫威，立刻联合租界帝国主义的工部局，开始施行白色恐怖。罢工实现后，仅仅在六小时以内，繁华富丽的上海，顿变为死气沉沉的区域。全市电车停驶，轮船不开，邮局闭门，繁盛的百货公司停止贸易，一切大的制造厂停止工作，工场与作坊的汽笛回声唤不进一个工人入厂，只令马路上的巡捕与军警打起寒噤来。统治阶级由恐怖而愤怒了，于是屠杀的政策开始。

① 此处各数总和连前超过二十七万五千人，其中数字恐有误，但无从查对改正，故仍保留原状。——编者

受屠杀之第一线的战士，即散发传单的工人，与表同情于工人持传单阅读于道旁的市民。第一日第一次牺牲者，乃南市金属业机器工人蔡建勋、史阿荣，因发传单而被捕立遭斩决。罢工第二日，电车卖票十九号工人，因发传单被枪毙于西门。学生在曹家渡讲演被捕，立被斩决者二人。老西门有市民持传单阅读，被大刀队斩决，悬首于电杆者一人，暴尸于地者二人。浦东祥生铁厂及英美烟厂工人二人，路行过军警之前，触其怒，立执而枪毙。南货业工人王同文被枪毙，闸北被捕学生二人被枪毙。闸北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工人方憩息于俱乐部，突被围而遭逮捕，开枪伤二人，捕去十四人。公共租界铁厂工人被捕者十二人；虹口煤业工人被捕者五人；浦东工人被捕者九人；吴淞纱厂女工被捕者三人；引翔港工人被捕者十七人；杨树浦工人被捕者六人；南市工人 被 捕 者 七人；上海大学留校学生五十余人，全体被捕。此外或失踪，或遭惨杀，或受逮捕不可查考者甚多。总计死伤遭捕者在百人以上。

白色的恐怖越更激动上海的革命工人、学生与市民。因此而发生二十一、二十二等日群众夺取武装的争斗。当罢工之第一日，李宝章即公然布告"格杀勿论"。华界、租界军警密布，任意搜查行人，尤以华界为更甚，随处均可见小排军队，背负大刀，手捧大令，沿街梭巡，全市顿现恐怖气象，南市、闸北及法租界之一部，均因之而仃市。李宝章的兵士开始抢劫，任意挑怒市民，立捕而杀。南市与浦东居民，过兵士前，不敢正目而视。浦东小贩口呼"卖饼"，而兵士诬之为呼"打败兵"，即执而痛殴，以刺刀乱刺，行人不敢侧目。入夜七时，华界即断绝交通，此时外国兵可布防于租界以外，中国兵可自由入租界，逮捕工会人员、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党员。帝国主义者与军阀的反动势力，完全合作，以实现此白色的恐怖。

## 军阀屠杀与右派国民党

但是谁是这次屠杀的主使者？谁是白色恐怖的策划者？那便是：西山会议派的右派国民党。

上海法租界中环龙路四十四号的机关，便是那些右派的巢穴。现在初出版在上海狂吠的"江南晚报"，便是那般右派的机关报。主持那般右派的领袖人物，即是被孙中山斥责，被国民党开除的张继、邹鲁、谢持等。居正等在上海总同盟罢工开始之后，向李宝章（"江南晚报"二千元的股东）说："你此刻的唯一办法，便是前面拒党军，后面杀工人！"因此残暴且无知的军阀李宝章有了民党保镖，有了应付罢工的恐怖策略。

右派国民党是这次屠杀的罪魁，这并不是我们的诬陷，而是人人皆知的事实。"江南晚报"每日的言论便是证据：罢工之前，该报予言民众将有牺牲；屠杀实现后，该报即故意大呼，说是共产党牺牲民众；因屠杀而引起市民愤怒后，该报公然劝李宝章改变"格杀勿论"策略，同时此项新闻即已发现于当日报纸。右派国民党毫无疑义的是此次屠杀的指使者。右派国民党即是反动派，即是反革命派，即是民众的敌人。

## 夺取武装的斗争

白色恐怖的屠杀，只有激起红色恐怖的革命。以恐怖答复恐怖，这便是革命的状态。

这一状态在上海工人与市民群众中，自二十一日（罢工第三日）开始起来。

当革命时机成熟时，总同盟罢工可以直接渡到群众的暴动。时机未成熟时，群众便会有不断的夺取武装的斗争。武装在军阀手里便是白色恐怖；夺取武装到群众自己手来时，即革命的武装斗争之爆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门功课。上海工人阶级须练习这一课！

上海工人自己没有武装，有之，惟有从敌人手中夺取过来。罢工第一日既开始白色恐怖，因此引起工人群众夺取武装的决心。二十一日晚起，各工人区域即开始与军警的局部战斗。二十二号，海军士兵因反对军阀屠杀，同情于工人运动，未得长官命令而开炮，轰击高昌庙兵工厂。在二十二之夕，南市与闸北，俱有工人与市民对军警之激战，试行夺取武装。因为无全部动员，而敌人势力尚在挣扎之时，故二十二夕未得全部胜利。但海军的炮击已使敌人军官士卒，纷向租界逃避。二十二日各区域大队工人群众屡向军警防线与步哨袭击，亦曾夺过最少枪械，且回击警察巡长致死。这已开始用徒手夺取武装的伟壮行动。直至二十三日晚，闸北与南市，犹有数处工人袭击警署，互斗至数小时，相持不下，警察不敢追击，群众亦得安然而退。这可以表明武装的革命斗争在上海已开始了。

复工令下以后，夺取武装的斗争表面虽似仃止，但“夺取武装”这一口号的观念与决心，已普遍于多数工人与市民。这一行动的继续，即是总同盟罢工行动的继续，这一行动的关键，亦是使革命成功的关键。

## 为政权而战

但是上海工人的总罢工与武装斗争，究竟为了什么？不明了革命情势，且畏惧工人势力的右倾分子，很易于疑惑上海工人要组织工人政府。这是错误的。上海工人现在的目的，并不是工人政府，而是市民政府——民主主义的市民政府，属于国民政府的市民政府。但是上海的工人，很确实的此次是为政权而战。

在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中的革命，在被帝国主义与军阀统治下的上海市民革命，没有工人的战斗，即没有市民的战斗；没有工人的革命，即没有市民的革命；没有工人的政权，即没有市民的政权。因此而上海工人的口号是“建立市民代表政府”。因此而上海工人同盟罢工与武装斗争之目的，是直接为夺取政权，领导一切被压迫的市民，建立市民的民主主义政权。

当罢工之第四日，武装斗争已开始，突有海军炮击高昌庙的行动，这已表示革命的兵士与工人之联合，这都证明兵士与工人之必须且可能夺取政权。恰在同日，上海各社会阶级（商人、工人、学生）与各革命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代表已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这更足证明市民政权之可能且必须建立。二十二日夕，临时革命委员会已发布海陆军动员令，决解除军阀的武装。这一动员令至今犹在行动的时期里。这一革命委员会是过渡到“市民代表政府”之革命的参谋部。这一革命委员会的历史的与革命的价值，由这次总同盟罢工与群众的革命行动中产生出来，将永垂于不朽！

上海工人阶级已走到为政权而战的战场上。敌人在前，光荣亦在前，上海工人的奋斗是全上海被压迫市民的奋斗，亦即是全中国被压迫民众的奋斗。

## 群众的革命裁判

从五日总罢工的战斗里，武装斗争与政权奋斗的开始，固是最可纪念的历史记录。而在群众行动中，还有值得纪念的，便是群众的革命裁判。

二十二日，上海杨树浦区的工人群众示威集合，全区群众到者近万人。适有走狗绰号“小滑头”者，素昔勾结包探巡捕，逮捕工人领袖，竟到场意欲侦查工人领袖行动。群众见“小滑头”到场，用众力执捕，交主席台前，付诸大众裁判。大多数人高呼“打死”，主席顺众意以付表决，全体举手通过，遂当场将“小滑头”处死。

这便是群众的革命裁判。这亦正是以恐怖答复恐怖，以革命答复反革命。处死一个工贼走狗的判决，经过群众的判决，这便是革命的法律。反动派，反革命派一定反对这种裁判，认为是群众的残忍行为，但这正是极有理的革命行为。即以此事本身而论，敌人杀死了我们数十人，我们现在才裁判敌人一人。在革命群众的权力之下，此次屠杀工人的主使者李宝章，便应受同一的裁判。

## 为扩大斗争而复工

总同盟罢工的群众行动，已走入两个正确的路线了：第一路线是夺取武装以斗争，第二路线是为市民政权而战。

但是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革命的军事势力相距太远；浩大的群众，时受牺牲与损失；群众的政治力量尚在，群众的组织力量尚在；罢工之第五日，为准备更大的斗争很急遽的遂由全上海工人之领导者——上海总工会宣告于翌日（二十四日）下午一时，一律复工。

二十四日晨发出复工命令：

**复工命令**

全上海工友们！

自本会命令总同盟罢工后，依命而行动者乃我四十万有组织之工人，不数小时，行动一致，军阀统治，立现动摇。繁华富丽之上海，立变为革命风云弥漫之区域。此次斗争，实我全上海工人，自“五卅”以来第一次光荣伟大的斗争。罢工五日，市民暴动迭起；革命的海军，开炮对敌人轰击，表示革命的工人与兵士联合的伟大征兆。我工人力量，已为敌人所认识。本会鉴于奋斗之时方长，不宜孤立作战，致损失过甚，特命令全体工友，于本月二十四日午后一时，一律复工，养精蓄锐，准备更大奋斗！

此令！

上海工人伟大的罢工万岁！

准备更大的势力奋斗！

上海总工会万岁！

上海总工会　二月二十四日

## 上海总工会复工宣言

全上海市民们！

我们工人阶级此次因反抗暴政，因响应北伐军，而总同盟罢工。罢工坚持至五日，工人与市民均牺牲甚大。今因种种原因，而不能不暂时宣告复工。然罢工虽然暂时停止，而为反抗军阀暴政，为力争市民政权，为工人生活改善的奋斗，仍然继续进行。我们此次在罢工中，受了市民们诚恳的同情，兹因接受商界劝告，而忍痛宣告上工，对于表同情的市民，十分感慰。并希望全上海革命的市民，今后大家仍要携着手向恶势力奋斗，以达到彻底推翻暴政为止。现在的复工，非因退让而复工，是为准备更大的争斗而复工！

上海总工会　二月二十四日

## 在继续斗争中

复工令既下，在二十四日午前，亦有已复工者，自午后至翌晨，三十余万人一律俱复工。但五日的总同盟罢工，并未终结，亦不是作任何的结束。

全上海的工人，与全上海的被压迫市民，现在继续斗争中，亦即在胜利之前的不断的奋斗中。五日的总同盟罢工绝不是失败，更不是毫无结果。这五日的总罢工的经验与教训，特别是五日来奋斗所得的出路，超过了自"五卅"以来所有经验与教训之总和。现在正是紧要的时期，正是上海工人阶级的历史的严重的时期。上海工人阶级必须完成这一责任。

下列的口号，是上海工人目前的紧急政治口号，亦即群众行动之大纲：

一、打倒李宝章！

二、驱逐直鲁军！

三、响应北伐军！

四、拥护国民政府！

五、群众暴动，夺取武装！

六、杀反动派！

七、为死者报仇！

八、建立市民代表政府！

九、撤退外国兵，收回租界！

这以上是上海总同盟罢工之革命初期的记录。

1927年2月27日晨6时

（原载《向导》189期，1927年2月28日出版）

# 〔附〕 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①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

施 英（赵世炎）

夺取武装消灭军阀的暴动，上海工人阶级在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两日的巷战中完成。自俄国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绩，添入了上海工人三月暴动的一段新的历史记录，在中国的革命史中，工人阶级的血战功绩，更因上海工人的三月暴动，确定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之地位，三月暴动在世界革命史中的价值，是写在十月革命后的一页。三月暴动在中国革命史中的位置，是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保障中国革命的胜利，划分中国革命历史的一页新篇幅。

全中国与全世界——现在都震动于上海的陷落。

但是上海为何而陷落？陷落于上海工人的两日一夜的暴动与巷战。

三月二十夕，国民革命军占领逼近上海之龙华，但国民革命军予奉有令，令避免与上海租界帝国主义武装之冲突，占领龙华后革命军的策略，尚欲纳降拥有雄厚兵力的毕庶澄率领下之直鲁联军。但毕庶澄欲保有上海而降，降而求为革命军长之一，属于军阀之一的毕庶澄，降与不降皆民众之敌。国民革命军予奉有令不攻上海，但上海的工人则有准备，夺取军阀的武装，为革命军占领上海。

自孙传芳失败于九江，狼狈逃归金陵，上海工人即有十月二十四日第一次的暴动，暴动未起而失败，上海工人阶级的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十余人，为李宝章所杀。自革命军占领上海邻省的浙江，二月十九日起上海工人三十六万人总同盟罢工，二月二十二日第二次暴动。暴动亦未成，工人被屠杀者数十人，引起海军士兵的革命同情，开炮轰击兵工厂，嗣以扩大斗争而复工，为继续暴动而准备。自此以后，上海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走入最正确的路线，既决然夺取武装以斗争，复决然为民众之政权而战。三月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时，第二次总同盟罢工令由上海总工会颁布，依令而罢工者达八十万人。同日同时，上海工人最后胜利的第三次暴动开始。

暴动，是民众革命的最高技术。无产阶级的暴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训中最严重的一课。上海工人阶级第三次的暴动，尽量的使用了革命的技术，勇敢真诚的遵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训，练习出两日一夜巷战的经验。

三月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时，各工厂、各作坊、各机关、各大商店、各手工业场、车站、轮埠、码头全体工人罢工，到了街市的中心来，纷纷向予定的集合处集合。最少数的武装纠察队，立刻按照目的地，对各警署、各兵营与军队驻在所开始行动。所有租界中的工人群众，一时内齐到了中国城市。最少数的武装在前，广大的群众在后。巷战开始了，

① 原题为："上海工人三月暴动纪实"。——编者

陆续不断的枪炮声，与群众口呼的口号声，立刻震动于遍城市中各地。铁路截断了，电话局被占领，电报局亦被占领，电灯线断，自来水断，完全肃静的空气笼罩了全城市，只有断续不已的枪声与群众的革命呼声。徒手无武装的群众，逐渐夺得武装到手中来。革命的武装力量增加了。敌人在包围中，或在逃散中。从敌人的队伍蛇动蠕行中发现以竹杆系手巾的白旗，这是敌人投降了。素习凶恶压迫人民的警察，自剥其黑色的制服而逃散。大小警署的门前推出了枪械，并悬白旗，这是警察投降了。在顽强抵抗的敌人营垒之四围街市中，住户市民，借出木板、砖头、布袋，建筑起障碍物。小饭店与小饼店的店伙紧急工作起来，赶做馒首食物等，由袖带红巾的输送队，往来输送于前线的战士充饥作战。袖带红十字的男女济难队员，往来于战线后方；死者与伤者，扛抬过市巷。历时不久，各取得指挥的中心地，各区域自己的作战指挥集中起来。至此状况，城市暴动巷战的局势，完全成立。

但因为敌人所在地的势力，强弱不尽同。广大的淞、沪区域，有帝国主义的租界横贯于中央。暴动突起，在当时的作战划分于下列七个区域：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与闸北。七个区域中的行动，前后开始于一小时以内。惟解决与成功之迟速不同，尤以闸北一区，自二十一日正午起，至翌日午后六时止，前后两日一夜始解决，统计激战至三十小时。

南市是包括上海县城的沪南区域。暴动未发前，南市全城的群众，法租界及公共租界中区的群众，陆续齐集于街市中。一时半武装动作开始，先进攻警厅，二时即占领警厅，同时，占领电话局，警察的一署三所，及一署三所第一分所，次第占领。从警察厅与各分署中，徒手的群众夺得了枪械。沿途的游巡队，在最短时间中，经群众缴械降伏。大队由警厅进攻兵工厂，无激战而降伏，四时完全占领兵工厂。南火车站是时已无敌踪，被群众占领；铁路工人夺得车头往来运输，五时到华商电车公司集合。广大的南市区域，在四小时内便全部解决。

虹口在租界区域夹间之中，三面接壤于租界，一面近市郊，无驻兵，只有警署。在时间上说，虹口是首先被占领的，虹口电力、丝织与金属业的工人群众，当暴动开始时，最先发难，夺得警署，夺得枪械。逃散的警察，利用地方的流氓与工人为敌，时来袭击工会，袭击已占领之警署，因此而工人纠察队既战胜警察，复抵抗流氓之扰乱，以武装镇压，维持区域内的秩序，替代警察的岗位。直到全部的胜利完成之后，虹口的工人纠察队，以武装管理全区域，扑灭反动派。

浦东在黄浦江东岸，黄浦江西之暴动起，浦东所有各厂的工人群众，均起而响应。全体工人罢工，先扑攻烂泥渡第三区警察署，围降警察百五十人，全体缴械。素来压迫民众，残害工人的第三区警察署，首先被群众占领。群众夺得武装后，即进而扫除孙传芳时代所设置的游巡队，沿途缴械。群众复继续占领三区一分所，及三区二分所。当时有由前线溃败的鲁军，包围保卫团，被群众围攻而缴械。保卫团对工人纠察队树白旗，纠察队队长遂召集纠察队与全体保卫团，暨参加战斗之数万群众，合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临时保安局，武装布防。自此以后，工会纠察队与商人保卫团，合同管理浦东全区，浦东区各业人民代表大会，立时成立。暴动前后经四小时，而区民政权成立。右派与反动派之投机分子，携带武装，伪造旗帜徽章委任状来接收公共机关者，尽被纠察队拒绝扑灭。

吴淞是炮台防守地，原有驻军。自前线溃败后，毕庶澄的军队之一部复乘车逃吴淞，欲经水路，夺得轮船，逃离淞沪。但吴淞的工人，与上海的工人已在同一时间内，起而罢工暴动。铁路工人、铁工厂工人、纱厂工人，立时围攻驻军，夺取其枪械。一部分的兵士，急乘车欲回上海，往沪宁线逃脱，至闸北、江湾路附近，铁轨已断，遂据守天通庵车站作战。吴淞工人胜利后，保卫团亦出而与工人合作。经过群众大会后，吴淞的区民代表会立时成立。吴淞各工会联合会领导近十万的工人群众，实际管理临时区政权。

沪东是包括租界与华界的广大工人区域。罢工开始后，群众即围攻虹镇警察署，缴警察枪械而占领。一时许，杨树浦与引翔港两地工人群众，分头在韬朋路底之马玉山路，召集群众大会，各起到会者逾五万人，会后整队出租界，齐赴闸北。武装纠察队至胡家木桥及虹镇两处，打碎警察岗亭，占领五区三分所警局，完全解除警察枪械，夺得武装。香烟桥警署纵火向群众围攻，群众扑灭火势而解决之。总计前后击毙巡官一人、警察三人，余则仅解除其武装。大队群众与武装纠察队向江湾路进发，欲至闸北。达天通庵路车站附近时，适由吴淞开来兵车一列，群众拆断路轨，兵车出轨倒地，以排枪及机关枪向群众扫射，死伤甚重。纠察队猛勇抵抗，群众高呼革命口号助威。自此以后，即与闸北纠察队夹击倒车之溃兵，直至翌日始解决。

沪西亦是包括租界与华界的广大工人区域。华界即浜北，接连于闸北，群众罢工行动后，先围攻曹家渡第六区警署，缴警察械，并占领之。武装纠察队护卫群众渡河往闸北，并与小沙渡纠察队会合，围攻四区警署，经激战后而占领。率领纠察队冲锋之总指挥死难，警察亦有伤亡。同时，两处纠察队分队围攻警署第二分所及游巡队署，俱获占领。各警署占领后，随即查封。武装纠察队集合围攻北火车站，直至翌日。

以上各区域的行动，都比较的顺利。最后的激战，乃集中于闸北境域内。工人武装会聚于闸北者，乃沪东、沪西两部及闸北境内的一部，其余以租界隔绝，均不能来援。各区域均在二十一日次第解决，而闸北独相持激战至两日一夜。当各处行动开始后，总工会代表乘汽车至龙华请兵，国民革命军东路前敌军白崇禧总指挥方迟疑间，又接驻沪军事特务委员钮永建报告，请缓一日进兵，以待毕庶澄投降。总工会代表涕泣力请，最后第一师师长薛岳始率全师进攻。

二十二日下午六时薛师至麦根路，适值北站鲁军溃败而退，最后的军阀残余，始告肃清。前后两日一夜中，闸北境内激战经过如下：

在闸北境内，除警岗不计外，敌人盘据的势力，多至二十余处。行动以后，群众的主要目标在下列六处：（一）北火车站；（二）湖州会馆；（三）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四）五区总署；（五）广东街分署；（六）中华新路警署分所。嗣后自吴淞开回兵车，在天通庵车站虽被沪东群众邀击，但因敌方人数甚多，武装极强，于是六个主要目标之外，又增加一处劲敌。闸北的巷战，遂遍于全境。自十二时起，罢工工人群众到街市中者，逾十余万。枪声突然四起，北站鲁军的大炮，对向市镇轰击。鲁军中白俄兵，且以铁甲车开炮射击；在炮声密集中，北浙江路口，英国帝国主义的铁甲汽车，亦乘机开炮射击，助鲁军对民众作战（以上两事，为察纠队指挥者所亲见，但事后帝国主义者默不敢承认，上海各报纸，亦不敢以此项消息登载）。至下午四时，群众已夺得各警署与湖州会馆，全境内各处警岗，悉被驱散。居民纷纷悬青天白日旗，不及备者或以手巾被单作白旗悬挂。自此以

后，群众的武装，除布防保居民，免溃兵抢劫外，进攻目标，乃集中于（一）北火车站；（二）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三）天通庵火车站。三处在一直线上，工人纠察队夹于三处之间，对北站取防守势，对俱乐部取包围势，对天通庵车站取进攻势。

巷战逐渐激烈了，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敌人虽系少数，但拥有机关枪与多量炸弹，不断的向群众轰击，十分顽强。二十一日午后四时，纠察队以纸作书，口呼仃战。投书入，劝降并负责保护其生命。鲁军亦就纸之背面回书，请求仃止攻击，但不肯降。嗣后纠察队即取包围战略，防守终宵。天通庵车站敌人，因铁路轨断车倒而惊慌不已，伏两旁沟中，防守终宵，以军械力弱，纠察队进攻未得手。北站方面，敌人于晚间纵火围攻，火势渐炽，烧民房数百间。难民纷纷向工人纠察队防线中逃来，纠察队分队护送往青云路空地。火势盛时，纠察队乃弃防线前进，以水龙皮管，开自来水管猛勇扑救，卒至扑灭火势。附近居民，义愤填膺，对工人纠察队感激至于流涕。居民壮丁，以义愤所激，自愿加入作战。老者少者，自屋中取出木板、砖石、布袋，为工人纠察队布置防线，建筑障碍物。火势熄后，敌人不敢进攻，惟时以排枪射击；白俄人的铁甲车，则时以大炮轰击；英帝国主义的铁甲汽车亦时时偷袭，向我们射击。此时的工人纠察队，为保护居民，对军阀之残余作战，亦对帝国主义者防御作战。

通宵的激战轰动于淞、沪全境，各处皆知闸北的战争，称赞感叹工人纠察队的丰功伟绩。翌日（二十一日）天明以后，敌人已至于困乏，纠察队仍从各方猛勇进攻。当时居民咸传说革命军已至，实则革命军尚未自龙华起程。至正午，天通庵车站敌兵解决称降，俘虏三百余人，余人逃散广东街者，被纠察队缴械，至北四川路者则被日本水兵缴械。下午四时半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中敌人易便衣欲逃，被生擒，余人愿降，苦战一昼夜之地最后解决。纠察总指挥处遂由五处总署移至俱乐部中。自此以后，全部武装攻北站。但自上午起，北站敌人复用第二次火攻，延烧房屋无数；是时自来水管已断，无从施救。纠察队防线退至五次，但敌人亦不敢前进。最后各方队伍集中后，猛攻一小时余，白俄兵逃入租界，北站鲁兵亦溃退，六时北站遂得克复占领。因避免与租界帝国主义武装冲突之故，纠察队乃退至车站之后布防。溃兵大队逃散时，适国民革命军第一师薛师长亲率猛队赶到，完全将溃兵俘虏。是时车站地雷爆发，但已无敌踪，最后薛师进驻北站。铁路工会下命令修复沪淞与沪宁铁路，铁路工人首先复工，依工会令组织交通队三百人修路，恢复交通。宝山路、宝通路、中兴路一带，居民燃鞭炮庆祝。暴动之功，至是完成。

（原载《向导》193期，1927年4月6日出版）

# 土 地 与 农 民

（一九二六年二月）

李 大 钊

## 一 中国历史上平均地权运动

在中国历史上，自古迄今，不断的发生平均地权的运动。关于井田制度，虽尚有人抱是否曾经实行的怀疑，然自周秦以来，为谈政者一种理想的土地制度，则确为事实；而原始经济的状态，有一个土地共有的阶段，亦确是人类生活的普遍现象。井田制的根本要旨，乃在收天下土地为公有，而均分之于各家，使他们收益使用，是一种比较完满的土地国有，平均的授与农民耕种使用的制度。中国古代，似亦经过此阶段，直至春秋战国时土地私有制才渐次确定。

汉时，土地兼并的风潮盛，贫富日趋悬绝，故武帝时，有一种行限田制的建议，而迄未能实行。至王莽时，依据周礼名天下的田地为王田，作为公有，而禁止买卖，规定一家占有额不得过一井九百亩，有余田者，分与九族乡党，犯法者处死刑。不久反动起，故当时的土地问题终于未能解决。

晋代的占地制度，乃在应人民的男女年龄，课以一定额的土地，使他们耕作。无主的土地，亦使人们工作，同时且限制王公官吏的占有额，此其目的，乃在增加税源，故豪强兼并土地的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后魏孝文帝容纳李安世的建议，设均田法，要把天下的田地，均分给人民。均田法的大要，是把田地分为露田与桑田二类。民达十五岁，男子给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女子给露田二十亩，奴婢准于良丁。牛，给露田三十亩。露田，即种谷的田。民年及七十，或身死，则归还于官府。桑田，是种桑榆的田，身死不必归还于官，许为其家的世业。土地的还受，在每年正月调查人时举行。此等土地政策，皆因大乱以后，人民离散，土地荒芜，豪强跋扈，税制紊乱，乃谋所以安插游民，奖励稼穑，以荒闲的土地给与贫民，以图增加税源的方策，而非根本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

唐武德七年，立租庸调税法。依此法则，男子达十八岁，每人给田百亩，其中以八十亩为口分田，以二十亩为永业田；六十岁以上以迄老死，给口分田的一半，即四十亩；笃疾废疾者，给四十亩。女子在原则上不给土地；但寡妻妾，给三十亩。其为一户者，更增给二十亩；皆以其中的二十亩为永业田，余为口分田，奴婢与牛不给田。口分田同于露田，种谷。永业田同于桑田，植桑、榆、枣等树。田地的授受在每岁十月农闲的时候举行，是为班田法，班田法又谓集晋以来田制的大成，但其目的，并不在没收富者的田地以给贫民，而

在整理租税，故许民迁徙。所分田均得买卖，而其给与亲王郡王以下的永业田，乃至百顷六十顷五十顷之多，形成一种阶级制度，故农民仍多失产流亡者。豪强乘之，乃行兼并，至安禄山乱，班田制遂废。此种土地阶级制的根萌，后来流衍而为庄田制，形成一种封建的大地主阶级，用种种手段，兼并贫民土地，既夺其土地，复以重大负担，加于贫民。

宋代谋行限田制，以图稍加制止而终未著效果。金元崛起，挟侵入民族的威力，夺田甚多，致启民族的重大的恶感。明代庄田滥设，引起豪强兼并土地的事实。至武宗时，皇庄达三百余处，勋戚庄田，尚不在此数，一庄有达二万顷者。富农多献地于王公，借庄田之名，以避赋役，管庄官及庄头，假威以雪民，清代因之。除将一部还于故主外，悉以之分给于满蒙汉军各八旗兵，更用跑马行圈的方法，圈地甚多，是皆谓之旗地。雍正年间，又于京兆固安县行八旗井田制，将官有地均分给八旗贫民。此不过为一部分征服民族，立一种保障特权的土地制度，而非解决全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

太平革命运动兴，实含有农民革命的意义，观于首事诸人，多为烧山种田的农夫，农村中落第的士子，并其攻下南京后（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即宣布一种含有均分共有性质的土地政策，足以证明。此种土地政策，自然亦随着太平天国的灭亡归于消灭了。

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其中心亦在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惜其所拟的平均地权办法，未能及身而见其实行。

## 二　中国今日农民破产的趋势

中国今日的土地问题，实远承累代历史上农民革命运动的轨辙，近循太平、辛亥诸革命进行未已的途程，而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工农阶级依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

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

中国的农业经营是小农的经济，故以自耕农、佃户及自耕兼佃为最多（看第一、二、三表），此等小农因受外货侵入、军阀横行的影响，生活日感苦痛，农村虽显出不安的现象，壮丁相率弃去其田里而流为兵匪，故农户日渐减少，耕田日渐荒芜。据农商部第九、第十次农商统计，因有兵乱省分未报不能得有完全的统计比较。但就京兆、直隶、吉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十省区合计农家户数耕田多寡之别。由六年至九年间的统计比较以观，则知十亩未满，及十亩以上，三十亩以下的户数，著见增加，三十亩以上五十亩以下的户数，略见增加，而五十亩以上，百亩以下，及百亩以上的户数，则著见减少。由此现象，可以看出中农破产的趋势。盖五十亩以上百亩以下，及百亩以上的户数减少，即其间有些破产而流为小农者，而小农户数的增加以此。由此趋势以推，则由小农完全丧失或弃去其土地，而或流于都市，投身于工厂，投身于人力车夫，或流为兵匪者，更不知凡几了。但五十亩以上百亩以下，及百亩以上的户数减少，一方面是中农破产而为小农的验证。在另一方面，亦有豪强兼并土地集中的意义。因为百亩以上者，可以自含至千亩万亩乃至百万亩，而此百亩以上的各级户数，在统计上并未分别等差为之表出，此其中必有连阡连陌新兴的大地主阶级，吸收多数中农而集中其土地者等户数不

必加多，而土地之量可以增至甚巨，此不可不注意者（看第四、甲乙二表）。且此统计完全的十省区，尚为秩序未大破坏的省分，其趋势犹且如此，其他西南各省，兵战连年的地方，农民困苦流离，其度更不知倍益几许啊！我们再把九、十两年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六省区合计起身的农家户数及农田亩数统计表比较以观，可以看出十年的自耕农、佃农，以及自耕农兼佃农户数，并自耕田租种田亩数，逐渐减少。此殆由于十年以来，内战区域已扩至北方各省，故北方农民亦骤受与南方农民同样的影响。由此更可证明水潮似的全国农民破产的潮流，正在那里滔滔滚滚的向前涌进而未已。（看第二、三表）

附统计表

一、民国七年农商部统计中国全国农家户数表

| | |
|---|---|
| 农户总数 | 43,935,478 |
| 自耕户数 | 23,381,200 |
| 佃农户数 | 11,307,432 |
| 自种兼佃 | 9,246,843 |

依此统计，自耕农民之数多过佃农一倍。其中相差最甚者，为江苏、安徽、湖北等省。江西、福建、浙江等省，则所差极微。此统计表不包涵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

二、民国九、十年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六省区合计农家户数统计比较表：

| | | |
|---|---|---|
| 农户总数 | 九年 | 43,966,632 |
| | 十年 | 16,887,751 |
| 自耕户数 | 九年 | 25,178,773 |
| | 十年 | 3,050,603 |
| 佃农户数 | 九年 | 10,514,915 |
| | 十年 | 4,538,798 |
| 自种兼佃 | 九年 | 8,272,944 |
| | 十年 | 3,298,350 |

因九年、十年农商统计只此六省可以完全比较，故只就此六省区统计比较而概观其倾向。

三、民国九、十年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六省区合计农田亩数统计比较表：

| | | |
|---|---|---|
| 农田总数 | 九　年 | 138,639,358亩 |
| | 十　年 | 566,625,293 |
| 自耕田数 | 九　年 | 929,255,093 |
| | 十　年 | 380,256,864 |
| 租种田亩 | 九　年 | 457,124,265 |
| | 十　年 | 186,368,429 |

园圃亩数不在此内，兼涵水旱两种田地。

四、京兆、直隶、吉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各省区合计农家户数耕田多寡（别）累年比较表：

| | | | | | |
|---|---|---|---|---|---|
| 六　年 | 十亩未满 | 10,014,232 | 八　年 | 十亩未满 | 10,689,877 |
| | 十亩以上 | 2,507,719 | | 十亩以上 | 7,610,145 |
| | 三十亩以上 | 4,978,728 | | 三十亩以上 | 4,673,203 |
| | 五十亩以上 | 3,052,774 | | 五十亩以上 | 7,373,276 |
| | 百亩以上 | 1,855,960 | | 百亩以上 | 1,375,054 |
| | 计 | 22,409,413 | | 计 | 31,721,555 |
| 七　年 | 十亩未满 | 9,829,771 | 九　年 | 十亩未满 | 10,387,275 |
| | 十亩以上 | 7,088,663 | | 十亩以上 | 7,758,652 |
| | 三十亩以上 | 4,506,783 | | 三十亩以上 | 4,716,276 |
| | 五十亩以上 | 2,770,266 | | 五十亩以上 | 2,951,564 |
| | 百亩以上 | 1,514,617 | | 百亩以上 | 1,402,048 |
| | 计 | 25,710,100 | | 计 | 27,215,815 |

## 三　农民中最多数最困苦的阶级——自耕农与佃农

在小农中，以自耕农为最多。据金陵大学"农业丛刊"第八号芜湖一百另二农家之社会的及经济的调查，按农场面积而分组如次表：

| 农场面积分组 | 十亩以下 | 十一亩以上 | 廿一亩以上 | 卅一亩以上 | 总数或平均 |
|---|---|---|---|---|---|
| 各组在全数中所占之百分率 | 13.7% | 50.0% | 16.7% | 19.6% | 100% |
| 农场数目 | 14.0 | 51.0 | 17.0 | 20.0 | 102 |
| 平均面积 | 7.9 | 15.9 | 25.1 | 59.8 | 24.9 |

（佃户十三家）　　　　（农场甚小）

据上表则知此一百另二家中以十一亩以上者为最多的户数，几占户数的一半。又据某机关在河南荥阳等县的调查，八个农村中的农民，亦以小自耕农占多数（看第五表）。由芜湖一百另二农家生活调查，可以看出农场大小与场主的利益有密切的关系。有十亩或十亩以下之场主中能得五十元以上的工作进款者，仅居百分之七，而那些有三十一亩以上的场主中，能得五十元以上的工作进款者，竟占百分之五十。就田产权方面说，田主的农场平均每家二十亩，半田主平均每家三十八亩，佃户的农场平均每家十五亩，此三者中以半田主一类的农民为最有利。盖因他们除自有的田地以外，尚租种他人的田地，故其农场面积较其他二类农人为大。而其工作进款的数目，在此三类农人中，居于最高，平均为每人一百五十六元，故其生活状况亦较自耕农佃户为享乐，其原因则由于农场面积的大小，对于使用人工、畜工、农具等的效率，亦有一种确定联带的关系。在面积较大的农场，其工具设备的效率皆较高，其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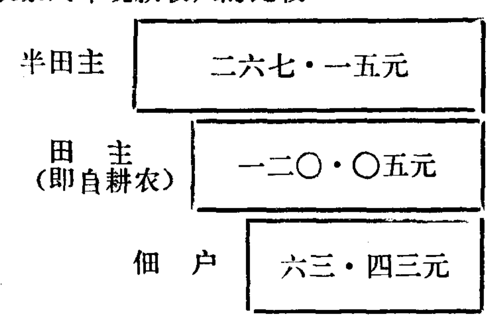
大农场男工的效率，等于小农场男工效率的二倍，在十亩以下的农场中，每人仅能做五亩，而在三十一亩以上的农场中，则每人能做十亩。大农场畜工的效率，几等于小农场者的三倍，在十亩以下的农场，每畜仅做一〇·六亩，而在三十一亩以上的农场，则每畜可做二八·八亩，其他农具设备之用于大农场者，其效率等于用于小农场者的二倍，准此则知此组农民之需要土地，需要较大的农场，为最迫切，因为农具设备效率增大的结果，可以增大场主的利益，可以稍舒此级农民的痛苦。（看第六表）

**五、河南荥阳五村、密县二村、汲县一村农民生活要项调查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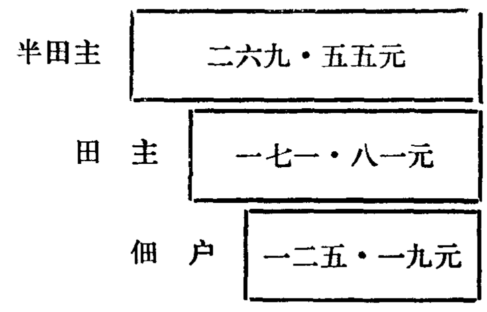
| 所在地 | 户数 | 亩地 | 人口 | 农民种类 | | | | 税额 | 地主与佃户 | 雇工工银 | | |
|---|---|---|---|---|---|---|---|---|---|---|---|---|
| | | | | 富农 | 中农 | 小自耕农 | 佃农 | | | 每日平均 | 每年平均 | 备考 |
| 河南荥阳周沟村 | 35 | 600亩（大略） | 150 男：80 女：70 壮丁：50 | 105亩（一户） | 70亩以上（三户）50亩以上（二户） | 10亩以上（十户） | 二户共租地十亩，无地者二户 | 正税每亩五百文杂税八百文 | 佃户须向地主纳每亩夏二斗秋二斗 | | | 河南每串核银三毛八分三 |
| 河南荥阳王庄 | 20 | 250亩 | 170 男：90 女：80 壮丁：40 | 100亩（一户）家口廿人 | 50亩以上（二户）20亩以下（五户） | 20亩以上（四户） | 四户无地者五户 | 正税每亩五百文杂税约六百文 | 每亩须纳一斗半有减让 | 约三百文 | 约二十八串 | |
| 河南荥阳鹿村 | 110 | 1600亩 | 800 壮丁：200 | 100亩以上（一户） | 50亩以上（五户） | 50亩以下（六十户左右） | 三十余户无地者十余户 | 正税每亩五百文杂税本年二千文 | 佃租每亩须纳二斗 | | | |
| 河南荥阳水磨村 | 200（又一调查为250户） | 2000亩 | 80 男：45 女：35 壮丁：200 | 100亩以上（四户或云五户） | 70亩以上（十二户）50亩以上（八户） | 10亩以上百余户 | 佃农四户无地者二十五户雇工卅人 | 同上 | 与周沟村同 | 约四百文 | 平均工资二十串 | |
| 河南荥阳贾峪镇 | 200 | 2000亩 | 1600 | 100亩以上（四户） | 70亩以上（三户）50亩以上（二户） | 50亩以下约百户以上 | 佃农八户雇工约五十人租地百余亩 | 正税占全收获百分之三（每亩）杂税占百分之十一合计占百分之十四 | 未详 | | 七十串左右 | |
| 河南密县柳沟村 | 100 | 1300亩 | 500 | 上富百亩数未详 | 中富五、七十亩间户数未详 | 下富三、五十亩共八户 | 佃农三户雇工六人租地约十余亩 | 纳税约需岁收百分之十二 | 未详 | | | |
| 河南密县赵庄 | 65 | 830亩 | 330 男：161 女：169 壮丁：50 | 无 | 90亩者二户六十一亩者一户 | 自耕农三十五户亩数未详 | 佃农十七户约五百十余人 | 正税每亩二百五十文杂税今年每亩五千 | 佃户每亩三斗不减让佃户多赔不敢抗租放债利息三分 | | | |
| 河南汲县塔岗村 | 80 | 700亩 | 1200 | 占全人口十分之一（120） | 占全人口十分之三（360） | 同前（360） | 同前（360） | 每粮三亩纳税六百文近则附加捐征约每亩即出税一串四百文 | 村中土地多与佃户分种秋收后地主与佃户各分一半 | 三五百文或一串左右 | 七十串左右 | |

六、佃户自耕农兼佃周年进款比较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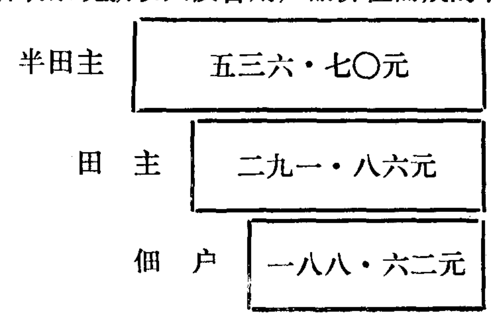
（甲）农家周年现款收入的比较




（乙）农家自用农产品价值的比较




（丙）合农家现款收入及自用产品价值而成的农家周年进款




## 四　耕地农有

在这种情形之下，“耕地农有”便成了广众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怎样能耕地农有致之实行呢，每一农夫或含有一定人口的农户应有多少耕地，倒是一个极需讨论的问题。据前清乾、嘉、道、同诸朝的官家册簿，中国本部的耕地，大体以由七百四十万顷至八百万顷计，而欧人中推定中国耕地地积者有说是四十亿亩的，有说是二十四亿亩的。日本酒匂农学博士曾推定中国本部的耕地地积是一亿四千万町步。此等推算皆不能认为精确足信。夫全国总耕地地积及人口总数并其分布既不得正确的统计，则欲知农耕地对全国版图总面积的比例，与对一农民耕地亩数的比例，无从推算而得有确准。一九一一年日人所出的“支那调查报告书”曾就长江沿岸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五个比较明了之省分试为考核，其结果如次：江苏对农民一人的耕作亩数为三亩强，安徽为二亩余，江西及湖北为三亩欠，

湖南亦为三亩强。长江流域地沃人众，此比率虽未见足为全中国的准则，然大体固可以供我们的参考。又从距今八、九十年前清廷钦定的户部则例所载，十八省的耕作地积，分配于按民国十一年邮政总局所调查十八省的农民（按全人口百分之七十计），每人平均只得耕地二亩四分四厘有奇。若分省计算，则除甘肃每人仅得耕地八分，贵州每人仅得耕地三分，福建每人仅得耕地四分外，余则由一亩至四亩不等（看第七第八表）。至于多少亩足供若干人口的农户生活，则又因地质的良否而异。兹就一九二三年十月至一九二四年三月间华洋义赈会调查概算起来，较沃的田地每五口之家需十五亩至二十亩始能生活，较劣者则需三十亩乃至四十亩。这样算来，平均每一人口所必需的耕地应为四亩至五亩。若以上述长江沿岸五个较为明了省分的调查为标准，则耕地实觉不足，而对每一农民的耕地为量亦不为多。可是现今的中国农业不但没有进步，而且却有退步，实在有复振或改进的余地。如果水利稍加整理，则农民生活必较今宽裕数倍，而且沿边省分待垦的田地以及内地各省为豪强所兼并或为兵匪所蹂躏而荒芜废弃的土地尚多。国民革命政府成立后，苟能按耕地农有的方针，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使小农场渐相联结而为大农场，使经营方法渐由粗放的以向集约的，则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增，历史上久久待决的农民问题，当能谋一解决。

## 五　农民的要求及我们怎样在农村工作

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已日趋于难境，重以兵祸连年，流离失所。入民国来，苛捐杂税，负担日重，各省田赋，有预征至数年后者。佃农及雇工所受的压迫，比自耕农更甚。凡有大地方的佃农，处境尤其苦痛而艰窘。有些地方的雇工工银极低，几乎决不能维持其生活，尤其在小自耕农众多的地方，更不易寻觅工作，只有流为兵匪，或流于都市去作苦力。试一考河南之农民生活调查，及华洋义赈会在直隶、山东、安徽、江、浙等省之调查，均可看出农民当有移徙，生活变动日益转下，遇有婚嫁，即须负责之不安现象。乡村中旧有的农民团体，多为乡村资产阶级的贵族政治，全为一乡绅董所操纵，仅为乡村资产阶级所依为保障其阶级的利益的工具，不惟于贫农的疾苦漠不关心，甚且专以剥削贫农为事。在此等组织中，贫农几无容喙的余地。若想提高贫农的地位，非由贫农、佃农及雇工自己组织农民协会不可。只有农民自己组织的农民协会才能保障其阶级的利益。在乡村中作农民运动的人们，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

随着帝国主义所造成军阀土匪扰乱范围之扩大，一般农民感有组织农民自卫军的必要。例如直隶、热河等处的保卫团及民团运动，均甚普遍。虽是等地域，前曾在奉天军阀支配之下，民间枪械多为奉军所搜去，而是等事实愈足引起一般农民组织民团之兴趣与希望。奉系军阀崩溃以后，各处民团运动一时呈出极盛的现象。此外如哥老会、红枪会等皆为旧时农民的自卫的组织，革命的青年同志们，应该结合起来，到乡村去邦助这一般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随着乡间的组织工作，当注意到乡间文化提高问题。到乡间去的同志们，应知利用农闲时间，尤其是旧历新年一个月的时间，作种种普通常织及国民革命之教育的宣传。为使此项工作多生效果，图画及其他浅近歌辞读物，均须预备；并须要联合乡村中的蒙学教师，利用乡间学校，开办农民补习班。年来广东的农民运动，已著有成绩。陈、洪、杨、刘之败灭，以及国民政府之巩固，得农民之助力不少。最

近河南的农民运动亦颇著成效。直鲁一带农民自卫运动亦方在萌发中。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附统计表

七、中国本部十八省地亩及人口表：

| 省名 | 地亩 | 人口 |
| --- | --- | --- |
| 直隶 | 六八八·四一〇顷六四亩 | 三四·一八六·七一一 |
| 山西 | 五三二·八四五顷〇一 | 一一·一七四·九五一 |
| 山东 | 九八四·七二九顷四六 | 三〇·八〇三·二四五 |
| 河南 | 七一八·二〇八顷六四 | 三〇·八三一·九〇九 |
| 江苏 | 六四七·五四七顷二七 | 三三·七八六·〇六四 |
| 安徽 | 三四〇·七八六顷三三 | 一九·八三二·六六五 |
| 江西 | 四六二·一八七顷二七 | 二四·四六六·八〇〇 |
| 福建 | 一二八·六二六顷六四 | 一三·一五七·七九一 |
| 浙江 | 四六四·一二〇顷二六 | 二二·〇四三·三〇〇 |
| 湖北 | 五九四·四三九顷四四 | 二七·一六七·二四四 |
| 湖南 | 三一三·〇四二顷七三 | 二八·四四三·二七九 |
| 甘肃 | 三三五·三六六顷二一 | 五·九二七·九九七 |
| 陕西 | 二五八·四二〇顷一二 | 九·四六五·五五八 |
| 四川 | 四六三·八一九顷三九 | 四九·七八二·八一〇 |
| 广东 | 三四三·九三九顷〇九 | 三七·一六七·七〇一 |
| 广西 | 八九·六〇一顷七九 | 一二·二五八·三三五 |
| 云南 | 九三·一七七顷〇九 | 九·八三九·一八〇 |
| 贵州 | 二六·八五四顷〇〇 | 一一·二一六·四〇〇 |
| 共计 | 七·四八六·一二一顷三八亩 | 四二一·五五一·九四〇 |

全国农民数目（以全国人口十分之七计算）二九五·〇八六·三五八人，每人平均能耕之田二亩五分五厘，此表共计本部十八省之数目

八、各省对于每一农民耕作地积表：

（以农民占人口总额百分之七十计）

| | | | |
| --- | --- | --- | --- |
| 直隶 | 每人平均二亩八分有余 | 江苏 | 每人平均二亩七分… |
| 湖北 | 三亩一分…… | 广东 | 一亩三分…… |
| 山西 | 一亩四分六… | 安徽 | 二亩四分…… |
| 湖南 | 一亩五分七… | 广西 | 一亩〇分八… |
| 甘肃 | 八分…… | 云南 | 一亩三分…… |
| 山东 | 四亩五分…… | 江西 | 二亩六分…… |
| 陕西 | 三亩八分…… | 贵州 | 〇亩三分三… |
| 河南 | 三亩三分…… | 福建 | 〇亩四分一… |
| 四川 | 一亩〇分四… | 浙江 | 三亩………… |

（原载《政治生活》，转自《守常文集》）

#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 ——农民问题丛刊序——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

毛　泽　东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他们不明白经济落后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土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实行其压榨。所以经济落后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轻重本末。明显的例摆在广东：那一个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比较敛迹的县分，必定是农民运动已经做起来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参加了农民协会的县分。换句话说，即是那一个陈炯明势力削减的县分，必是农民运动起来的县分。我们无庸讳言：一年以前的广东是陈炯明的天下，革命政府就可以说并没有广东；一年以来到现在是革命政府与陈炯明平分广东天下。虽然陈炯明自己不在广东境内，往后须得农民从广东各县逐渐的起来，才可以确实证明陈炯明的势力从广东各县逐渐的减削下去。陈炯明的故乡历来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猬集的海丰县，自从有了五万户二十五万人之县农民协会，便比广东任何县都要清明——县知事不敢为恶，征收官吏不敢额外刮钱，全县没有土匪，土豪劣绅鱼肉人民的事几乎绝迹。因此，乃知中国革命的形式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么样都算不得。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确实起了动摇，不然也算不得。因此，乃知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因此乃知凡属不重视甚至厌恶农民运动之人，他实际上即是同情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际上即是不要打倒军阀，不要反对帝国主义。

有人以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都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并论。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

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即封建军阀利用城市的买办阶级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实际上都是以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刮得来，买办阶级如银行工会等对北京政府有条件的借债，究竟比较甚少。故我总觉得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基此理由，我们的同志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我们预计：全国三万万以上农民群众当中，以十分之一加入农民协会计算，可以得到三千万以上有组织的农民。尤其是南方的湘粤赣，北方的直鲁豫，中部的鄂皖，几个政治上特别重要的省分，应该下大力从事组织，有了这几个重要省分的农民起来，其余省分的农民便都容易跟着起来。必须到这时候，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才能确实动摇，国民革命才能得着确实的胜利。

说到研究农民问题，便感觉太缺乏材料。这种材料的搜集自然要随农民运动的发展，才能日趋于丰富。目前除广东外，各地农运都方在开始，所以材料是异常贫乏。这回尽可能搜集了这一点，印成这一部丛刊，作为各地农运同志的参考。其中各省农村状况调查一部分，乃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生三百余人所做，在学生们分别组织的各该省农民问题研究会内提出讨论，又经过相当的审查才付印的。他们以前多没有农民状况的详细的调查，故所述只属大略。然以前连大略都没有，今有了一点，便也觉得可贵。我们应该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关于农业生产问题的材料，本书只收得五种（第二十二种至二十六种），关于此问题的材料并不是很缺乏，为了出版仓卒，搜集不及，他日尚当另外编印。农民问题本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等人为的压迫问题与水旱天灾、病害虫害、技术拙劣、生产减缩等天然的压迫问题。前一问题固然是目前的紧急问题，同志们的注意力自然都集中在这里。但后一问题也是非常之严重，我们不能不积极的注意。要解决后一个问题，需要有着全国的革命的政权与科学的方法，不是即刻能办到之事，但时期也就快要到来了，我们应得预先准备。这部书内关于广东的材料，占了八种，乃本书最精粹部分，他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许多人不懂得农民运动怎样去做，就请过细看这一部分。他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使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

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我们从五年来各地的农民运动的经过看来，我们读了这部书的广东农民大会决议案，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及广宁、普宁两个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不由得不有此感觉。本书对于外国的材料也搜集了一点（第十五种到第十八种），但是太少。各国尤其是俄国的农民运动农业经济的材料很多，可惜没有人详细的翻过来。本书内惟俄国农民与革命一篇，算得比较的详细。我们亦很可以拿来与中国的情况比较一番。

# 在湖南省第一次农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毛　泽　东

我去湘仅一年，而今年和去年的情形大不相同。在去年是不会有这种大会的。在去年是军阀赵恒惕的政府，今年是较能与人民合作的政府。去年农民运动仅是萌芽，今年已有一百二十万有组织的农民了。这是各同志努力的结果。我今日的题目是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国民革命中工人的要求，要原料充足，生产品丰富。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只有农民。国民革命的商人问题两种，一种是工业家，一种是商业家。工业品的市场，是在乡村，购买工业品的是农民。商人货物的原料，是从农村中运来的。商人货物的销场，也在农村中。商人若想货物畅销，就要农民问题解决，有余钱可以购用品。国民革命中的学生，现在学生有做农工运动的。他们有学工业的，有学商业的，为什么不去从事于工业商业，就是农民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各国学生都反革命，而中国学生犹多从事于革命运动的。中国的学生多半是很苦的，并且毕了业出来无处可用，故不得不革命。中国的学生是很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重要的，比如是一座三层的洋楼，上层是帝国主义者、军阀、土豪劣绅，下层是工农阶级，中层是学生。有上去与军阀帝国主义接头，有下去与工农接头的，还有些上不得下不得的。中国学生的现象，革命的是少数，反革命的也是少数，不革命的最多。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这都是属于农民问题的。将农民问题解决了，其余工人商人学生教职员一一的问题都解决了。

（原载《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21期，1926年12月22日。见《湖南现代革命史料汇集》）

#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农民在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压迫之下，生活一天一天地坏下去，许多人弄得“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真是无“居”可“安”，无“业”可“乐”了。

自从帝国主义的势力向东方侵略，打破了我们的“锁国政策”，冲开了我们的农业经济，我中国的农民便做了外国资本家的奴隶。我们每天辛辛苦苦，做出许多粮食、棉、麻、丝、茶……等类的东西，他们只稍微拿几个钱出来买了去；他们用机器制造各种新奇的货物，运过来，不知卖了我们好多的钱去了。什么洋油、洋布、洋钉、洋碱、洋瓷、洋铁……说不尽的洋货，已经充满了我们的城市，渐渐的打入我们的乡村了。我们不用机器做的土货无人买，我们作田也挣不到几个钱，他们洋资本家就一天天发财了。

帝国主义者剥削我们的方法，是霸占海关，自由输入货物，廉价发卖，刮去我们的银钱，破坏我们的手工业；是霸占矿山、铁路、航路，开设工厂、银行，——利用我们的贱价劳力，替他产生红利，利用我们的贱价原料，替他生产商品，夺取煤铁，操纵运输。而且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勾结，以厘金和盐税间接剥削农民，以亩捐附加等类之捐税直接剥削农民。帝国主义者更借了许多款项给军阀，军阀又加重剥削农民以还债。军阀更利用失业的农民，组织雇佣的军队，帝国主义供给了枪械，乃造成武力，为压迫农民之工具。

帝国主义既挟了他的金钱武力，又勾结国内军阀、买办，所以在中国横行一时，农民辛辛苦苦做工的结果，都转几个弯子跑到他们荷包里去了。

国内军阀和土豪劣绅之剥削农民，是一种封建的剥削制度。他们不像资本家之剥削雇佣劳力，却是将农民的生产结果，分割一大部分去，即是租税制度。地主是如此地直接或间接（如包佃制）取之于农民。军阀也是如此地直接（如对自耕农）或间接（如对佃农）取之于农民。他们每年从农民身上刮起去的，大约要占农民收获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

他们互相结托，又与帝国主义与买办阶级联络一致，共同榨取农民的血汗，而且共同镇压农民的反抗。到了饥荒年岁，农民忍无可忍，自然地暴动起来，时常有推倒封建阶级及帝国主义的形势。太平天国之役，是中国南部农民的大暴动。义和团之役，是中国北部农民的大暴动。可是都给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反动势力压下去了。

然而潜伏在农村中的革命运动，绝不因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的镇压而消沉。遍布南方各省的三合会、三点会、大刀会、哥老会，以及北方的捻子、白狼、红枪会等团体，先后发生，不谋而合地相继与封建的统治阶级争斗，与帝国主义争斗。因此各地的仇杀教士案、饥民骚动案（近年之大事如宣统年间饥民焚烧湘省巡抚衙门，如临城劫车案，都是这些人干的），时有发生。他们这些革命的团体，是没有广大的联合战线的，是不明白政治的策略的，所以决不能成其大事。

现在全世界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有策略的革命已给了我们农民一个好榜样了。孙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在二十年前，就已和农村中自然发生的革命团体联络，并且引导到真正的政党路上去，领导我们农民革命。在政治上定了“建设民主”，经济上定了“平均地权”作解放农民之标准；随时随地，给我们农民以适当之策略，向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作战，以求达到目的。

湖南农民在数年以前于衡山岳北已开始有组织的萌芽。前年上半年湘潭农民又有一部分起来，结果是被赵军阀摧残，不能顺利发展。去年二月株州汪先宗先生为农民利益殉难，军阀土豪之凶横已极，而农民情绪之激昂也增进，物极必反，于是酿成驱逐赵恒惕之猛烈运动。驱赵一事，农民是有很大的力量的。吴、叶反攻的时候，农民替北伐军当间谍，运输，带路，破坏敌人后防，甚至拿着梭镖鸟枪担任游击或加入作战，如醴陵、株州、平江、华容各地，不下十余战，都有农民加人，因此竟阵亡农民多人。试看湖南农民之参加北伐战事是何等地勇敢肯牺牲呢！

乃至北伐军到了鄂赣以及浙豫前方去了，湖南农民则竭力巩固后防，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这种运动是非常广大的。差不多各处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都受了莫大的影响。他们平日作威作福，胡作乱为，不把农民当人，到了今日，真不敢再拿出从前的排调来了。因为我们农民是不晓得讲斯文讲面子的，我们硬干起来，听他什么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要受我们一打，不怕他们倚着残余的势力还要反攻，还要大规模的残杀农民，如嘉禾、临湘、攸县、益阳、安化、宜章等地、惨案迭出，我们直认他是回光返照，我们毫不恐惧退缩。这一点子革命工作，我们敢说也比得上打开武昌城。因为乡村中土豪劣绅的势力是军阀的真正基础，打破这种势力，非农民起来，实在难以办到。

当今的革命政府，其主要工作，我们觉得应当是继续铲尽军阀政治的基础，发展民众的组织；在这个工作进行之中，我们农民是要舍死忘生地拥护其成功。

但是，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各被压迫的民众，不止是解放农民，我们岂可以只顾到农民的解放吗？是的。不过农民解放是一个枢纽。农民的解放如果实现，其实也就是各阶级的利益。现在工商业的不发展，其中一大原因，即是三万万农民无购买力；而农业的不发展，即是农民无生产力。如果农民解放，农民在经济上能减少地主的剥削，必能使农业改进，而因为他们之购买肥料、农具、布草等类，工商业必同时发达。从前法国革命，也因为农民得着一部分解放，法国富力大进；近来俄国农民根本去了地主的剥削，生产力一年年增进，都是明白的证据。工商百业既因农民解放而繁荣，至于教育文化，种种建设，更何待言呢！

然而目前政府的财政困难，市面的金融仃滞，社会上呈现异常的恐慌，许多的传言，都怪了我们农民，认为是农民革命产生的结果，冤哉枉也！目前的恐慌，是有实际的原因的。一层是战争封锁，米不能出长江，盐不能进岳州，这里就损失米捐盐税两宗大的收入。一层是湘西财政没有统一，黔军及各种新色部队截留税收，这样又损失了全湘三分之一的财源了。一层是反动派从中操纵，例如耒阳打杂税局事，虽然有一半是杂税局本身有弊病该打，还有一半却是反动派利用时机，想在党部、政府、民众团体的当中挑拨恶感。反动派在各处造谣煽动，诸如此类，是很多的，有此数个原因，所以弄的社会不安，何能归罪于农民呢？！

农民在乡村中打击土豪劣绅，虽所取手段出于法律之外，其实这是革命争斗中所必取的手段。这时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怎能不严厉一点？若是骇怕“纠纷”，采怀疑或反对的态度，这不算是革命党。免除纠纷之旧的政策已不适用了；我们只有大家建设新的政策，即是使农民在乡村中建立民主的自治，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

本大会仅代表湖南二千七百万农民，精细考虑，决定今后革命争斗自求解放的策略。凡我湖南诸农友们！要集中于省农民协会旗帜之下，依照本大会的策略努力奋斗呀！

我们的口号是：

全中国的农友们联合起来！

拥护革命政府！

铲除贪官污吏！

打倒土豪劣绅！

肃清农贼！

整理财政，剔除中饱！

打倒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农民国际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转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
195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 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决议案

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也就是军阀政治的基础。国民革命势力在湖南表面上虽已把军阀政治打倒了，然其社会基础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还有很多存在，不过因民众势力之兴起，这个基础业已开始动摇罢了。在此动摇期中，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为要保持他们最后在政治上社会上之地位，更出死力互相勾结，用种种挑拨离间、倾陷压迫手段，甚或混入国民党及农民协会，图谋消灭革命势力，恢复军阀的统治。反动现象显而易见。故国民解放运动，与此种反动势力是绝对不能并存的。必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根本铲除，然后国民革命胜利才有保障，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才算根本消灭。这是目前最迫切的工作。凡属革命民众所应当深切注意的。

自农民运动发展，各县土豪劣绅即群起压迫破坏。最显著之事实：如赵恒惕、廖运元、李鸣九、赵桂生等之岳北屠杀，焚毁农屋二十余所，枪杀三人，拘囚数十，被逐被逼者不可计数。湘潭晏容秋指挥十八罗汉，左右县政，把持三堂四所，吞蚀军饷捐款，以饱私囊。该县西区团防局长成胥生，凭借赵逆势力，勾结驻防军队，把持乡村政权，残杀良民，破坏农协，诬陷协会会员，谋害农民领袖毛泽东等三十余人，更勾结西山会议派，谋反抗革命运动。该县株州汪孝逵、汪绳武等，利用团防，勾结叶逆军队，诬杀农民领袖汪先宗。宁乡陶浚川、廖季梅、刘佑卿等，暗助叶逆军饷，蚕食公款，联合团防，响应赵、叶，破坏北伐；杨致泽、刘昭等，利用团防，残杀良民至数百人，枪伤农民领袖梅冶成。桂阳雷征、彭仁寿、李容巨、黎庚樛等，统率团防，占据县城，解散党部，枪杀工人，图殴农民领袖何汉。耒阳伍易卿、李子如、刘友三、邓元勋等，收买痞徒，假冒农协名义，焚烧政府机关，企图嫁祸；土豪邓寅宾，私印愿书，组织乡农民协会，以图破坏农运；北乡土豪李某，收买农贼，擅改乡农民协会为区农民协会，并擅刻钤记，更私发大批乡农民协会筹备员委任状。衡阳劣绅张杞生，勾结团防局长何镇楚，围捕农民及农民领袖；土豪杨竹轩，集合暴徒数百，捉去区执行委员，勾结驻防军捣毁各公法团；团防局长罗凤逸，恃强摧残农民，纠合打手，捆打农民领袖。华容付道南、罗昌、张荫元、孙锐义、傅治焕等，勾通土匪，勒索人民，瓜分公款，八长联盟，把持县政，包揽词讼，诬害农民。湘阴之赵子成、赵荪堂、赵迪予、赵崇正等，借赵逆势力把持团防，高租高利，剥削农民，农民实已变为农奴；任炳奎，指使任觉桥，勾结痞徒，破坏农协，殴打特派员；劣绅鄢孟秋，强迫解散农协，驱逐努力农运的人员。益阳黄剑农、龚海帆、龚金榜、刘中藩、陈毫

卿，组织伪党部，指挥暗杀队，把持县政，破坏革命；鲸吞公款，鱼肉人民；团防局长刘梦龙、曹应春，倚团防势力，擅杀乡民，操纵地方行政，盘踞旧农会房屋，捣毁农舍，压迫农民。郴县著名之土豪劣绅曹游龙等，借党敛财，惨杀党员；李冰如捣毁农协，毁坏党部，买活反动派杀区农协委员长李固。湘乡程希洛、彭世箴、朱太初、贺石渠等，私通赵叶，破坏革命，捣乱后方；组织三K党、保产党、城镇乡联合会、暗杀队；勾结团防局，捣毁永丰党部；焚烧农舍，破坏农民运动，谋害农民协会执委会人员；把持县政，侵吞公款，包揽词讼。下里团防局长萧介藩，勾结土豪劣绅，摧残农运，包庇土豪熊祥元，强运谷米，逮捕农协会员，私行拷打，滥用刑罚，残杀良民达百数十人，把持团防局，侵吞地方公款，操纵乡权，武断乡曲。嘉禾团防局长王泽民等，统率团兵，惨杀农民，包庇赌博。道县之杨锐等，扶植党羽，把持国民党县党部，暗杀省党部特派员陈清河，压迫农运。汉寿梅石、赵勋华等，欺压良儒。常宁土豪欧阳玉琪、高租高利，大秤小斗；劣绅李溪成、谭封桐，破坏农民协会组织。沅江袁熙甫、袁致祥等，宣传“三爱主义”，利用团防，贿买镖手，悬赏八百元，谋杀农运专员。平江县议员、长寿商会会长李灌畦，为长寿土豪劣绅领袖，在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日，指挥流氓游街示威，高呼“打倒农工阶级”、“反对三民主义”等口号；北伐军与敌军在平江开仗时，受敌方委任，组织递步哨队及保卫团，运动地方，希图破坏北伐；并组织暗杀党，图杀国民党员及农运领袖。该县汪信哉乃仙坛坛主，惯性压迫民众，把持县有财产及政治，并于去年正月，组织讨赤委员会，禁止加入国民党；沈寅卿、姚叙哉，真正地痞劣绅，包揽词讼，武断乡曲，压迫民众，破坏农协。临武李镜先，利用团局，垄断乡政，毒毁农工委员宁教仁，迫散区党部，勾结募债专员刘艺候，浮收舞弊，纵兵苛索。新宁陈升安，侵吞公款，摧残学务；雷腾蛟、华维翰，勾结县委，私用刑讯，指良为匪，勒罚巨款。安乡徐德保等，勾结县长，倚仗团防势力，压迫农民，出团卖谷，每亩至四斗八升，敛谷八百余石，农民请求减轻，不独不准，反惨杀农民许正卿等二十余人。浏阳邹逆尧仁之参谋长及筹饷委员王益生，鲁觉丞等，盘踞县团防局，要挟官厅，把持县政，压迫民众，破坏革命团体，又为〔邹〕尧仁规划一切，提取军饷；劣绅黄昭著、黄达五，把持乡政，勾结地痞；刘任生，组织假农民协会，利用农民，破坏农协；刘生实，勾结谢文炳，敲诈商人，侵吞军饷捐款。枨西团防局长娄邵德，欺压民众，破坏农协，捕殴国民党员刘解人，当街痛笞三百，枪杀良民，拐逃团防枪枝；土豪王远万，高利盘剥，压迫农民，逼死农妇。长沙清泰乡都总林巨卿，平日专横乡曲，近因募集公债，从中舞弊，更侵吞水灾赈款，扣留地方学款，自命为土豪劣绅，禁止当地农民加入农协，与彭逆祖植等串通一气，鱼肉贫民；郑澍人，勾结吴逆，宣传反革命，侮辱革命领袖孙总理及黄克强先生；罗倚陶，侵占田地，骗取佃户批价，压迫佃农；河西镇团防分局长丁琼芝，绰号丁四土匪，把持局务六年，借团敛款，迄今财政不曾公开，伊家致富业已逾万，平时擅逮良民，滥用刑法，诬农协会员为土匪，肆行压迫。永明王鹏，现充团保，武断乡政，破坏农运，借团捐为名，任意苛索；王筠，现充团总，破坏农运，垄断一乡，包庇赌博，近更混入国民党，当选非法的县党部执行委员。衡山唐经畬，把持县政，垄断乡曲，侵蚀公款，鱼肉良民，反对民族革命运动，印刷书籍，谋破坏革命，现更勾结西山会议派，潜来省城图谋扰乱北伐后方；劣绅罗如琴，于北伐开始时蓄谋破坏，我军退守衡州之时，更诬告农民夏观桃、彭黄枚等，谓为匪徒，且谓农民协会为匪

党。

以上所举各县土豪劣绅，特其尤者，至于细小，一概未录。必须全部铲除，方举肃清封建余孽之实。至于贪官污吏，调查未周，姓名从略；必须农民运动与市民运动联合，方能打倒贪官污吏，建设廉洁政府。

## 乡村自治问题决议案

（一）现在乡村自治区域，普通有三级：如长沙之都、团、牌甲；衡阳之都、区、甲；宝庆之区、保、庙；常德之镇、保、甲；慈利之都、团、甲；郴县之区、团、小团；湘潭之都、甲、团皆是。亦有分为二级或四级的。旧有各级自治机关之组织，原是一种封建性质的东西，近则完全成为地主阶级结托军阀、统治乡民之工具。现在省县政治，虽有改变，而他们把持乡政，鱼肉乡民如故。各级自治组织中，尤以高级组织（即接近县之一级）为此辈把持垄断之中心，利用团防，武装拥护其压迫良儒，刑杀无辜，侵蚀公款，勒派税捐之种种特权。其下各级组织，亦多为若辈之爪牙，使境内乡民——尤其是农民，全部受其钳制。农民视此种机关，谓为“头张衙门”，或谓之为“铁门坎”，此种封建阶级之组织，实帝国主义、军阀之真实的基础。现在的农民运动，就是民主革命势力，向这种封建势力攻击之一种运动，必须此种民主运动，汇合起来，推翻城乡特殊阶级，然后中国之国民革命，才算有相当的成功。

（二）现在乡村中农民的民主运动，已经普遍的起来，封建的特殊阶级基础，因此开始动摇；然这种特殊阶级，犹据其封建的阵线，作最后之挣扎。在这种形势之下，发生所谓“农村纠纷”问题，其实这是由封建秩序到民主秩序之必然的过程。若不经过目前的争斗，则决不能破坏旧的封建秩序，而达到建设新的民主秩序之目的；同时农村经济，亦将长期陷于封建经济状态，而不能达到一个新的发展。

（三）为保障民主运动的胜利，必须发展革命的民权，建设民主的自治。此种民主自治，属于乡村一般民众，封建余孽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当然不许其参与。而实现此种民主自治的方式，首在举行乡民会议，建立完备的乡村自治机关。

（四）乡民会议是乡村自治之最高权力机关，其使命在集合乡村各种民众势力，树立民主革命的真实基础，实现乡民之要求，发展农村之经济。乡民会议之组织，在最低级自治区域，当为乡民全体大会，在高级自治区域，当由低级自治区域之乡民全体大会选举之代表组织之。

（五）乡村自治机关，当由乡民会议产生，采委员制。高级机关应举办民食、财政、教育、农事、交通、水利、森林、自卫、救济、公断、调查等事业。以上各种事业，须按照地方情况，酌设专人主任。并在自治委员会下，设立各种事业之委员会，以为讨论之机关。低级机关，则斟酌地方情形，制定其组织。

（六）为实现新自治制，目前应由农民协会，邀集其他革命的民众团体，组织乡村自治筹备机关。

（七）旧有之各级自治机关人员，在新自治制实行以前，应由乡民开会改选，不得仍

由劣绅包办。

## 乡村自卫问题决议案

（一）湖南各县的团防局或保卫团，在事实上，多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武力。在军阀时代，则直接勾结军阀，妨碍革命进行；即在现时革命高潮中，仍敢多方抗拒革命势力，破坏农民运动。此种扰民耗财的反动武力，竟是一种乡村军阀，完全失去了卫乡防匪的意义。假使不急行改造，则摇动革命基础，酿成农村纠纷，危险实大。为实现真正人民之自卫组织起见，所有团防局或保卫团应一律取消，另外成立挨户团。

（二）乡挨户团受乡民自治委员会的指挥监督，执行保卫民主地方秩序之职务。县城团防总局，改为挨户团总局，受县政府之指挥监督。

（三）挨户团之团丁，每家或数家出一人，团丁总数视地方的需要而定。

（四）县挨户团总局，设主任付主任各一人，乡挨户团，设主任一人，队长、班长若干人。县挨户团总局主任由县民会议推选，交县政府任命之，县民会议未召集以前，则由县农民协会邀同县之革命的民众团体选举；乡挨户团主任，由乡民自治委员会选举，队长、班长由主任提出，得乡民自治委员会同意委任之。

（五）挨户团须定期操练，并施行政治训练。

（六）挨户团依地方的需要得设常备团丁，但不得多设冗员，致靡费用。

（七）挨户团的经费，如练操器械、常备办公等项，就原有团防经费撙节开支。如以前无团防局而现在必需设立挨户团的地方，其经费由乡民自治委员会得乡民会议的同意筹措之。

（八）在团防局或保卫团未改组为挨户团以前，应执行下列过渡办法：

一、团防局局长或保卫团团长，由乡民会议改选；县团防局局长或县保卫团团长，由县农民协会邀同县之各种革命的民众团体选举，由县长加委。

二、团防局或保卫团的职员、团丁，均须施行政治训练。

三、团防局或保卫团的惟一职务，在于防御盗匪，除与盗匪临阵交战外，不得对任何人杀戮或拷打。

四、团防局或保卫团不能受理民刑诉讼。

五、团防局或保卫团的经费，须有预算、决算并公开之。

六、政府须解散并惩戒摧残农民的团防局或保卫团。

## 地租问题决议案

大会听到各地关于地租报告，列述于下：长沙租额，最高十分之七，普通十分之五。衡阳，每亩田可得谷三石五斗，纳租一石六斗至二石，每石租规银五元到七元。衡山，每亩可得谷一石五，纳租一石三斗零，每石租规银从三、四元到八、九元。岳阳，四六

租，田主得六成，佃户得四成，每亩规银四元。湘潭，佃农所得占收获十分之三，田主所得占十分之七，每亩押规银五两至八两。宁乡，每百石谷地位只能收乾谷六十石至九十石，须纳租五十石至六十石，每百石谷地位至少要规银一百元至两百元。株萍路，每亩收谷三石多至四石，纳租一石八斗至二石二斗，现在每亩押规普通是五、六元，一班田主见谷价日高，又变一办法，其佃规多少以每斗该田所收谷价为准，如所收谷作抵百元，则须佃规一百元。临湘，每石田分四亩，收得乾谷十六七石，纳租十石至十一石（东六佃四），普通每石租押规五元至六元。邵阳，有一种铁租“请耕字”，里面载明“丰歉不得加减”（如“请耕字”载明是十石，秋收只有八石，佃户须赔租二石）。南县，每亩田押规少则二三元，多则五六元，最多有达十元者。郴县，除缴押金外，还要批礼鸡鸭肉、果饼等礼物。湘乡，荒年东七佃三，丰年东九佃一，每石租信银二元至三元五元不等。（此外还有如下规定）：一、要和东主做义务工；二、每石租要送稻草一只；三、要送东主三节的礼物，对引进人也是一样，不然引进人就向田主声明不负责任，使之退佃。永明，每亩田收谷一石至二石不等，佃户只能得到十分之二；种豆的田，佃户所得更少；种姜的田，照十分之六缴租。溆浦，上中两种田，均东六佃四，但遇天灾，田主占八九成，佃户只得一二成，所以有借谷还租的。宜章，未耕田以前，就要交钱或交银的。

从上面这些材料看来，农民一年到头的牛马生活所得，皆因重租重押陋规种种剥削，大部分被地主掠夺去了。必赖妻儿子女，不分晴雨昼夜，捡柴拾粪，看牛纺绩的辛苦，才能维持其受冻馁，仅免于死亡的艰难生活；因之农业生产不能进步，土地荒废一天天增多，农民一天天流于失业，他们的出路，只有当兵当匪，因此更造成了军阀政治。同时因农村购买力之减少，又影响到国内工业难于发展。地主从剥削农民得来的大量地租，不用于农村生产事业，以致农村经济有逐渐衰落的趋势。

因上述情形，大会为救济农民的痛苦，增进农业的生产，增高农民的购买力，特拥护中国国民党减轻佃农地租的决议，并规定改善地租及东佃关系的详细办法如左：

（一）东佃契约，本应由双方协定。乃因农民久在地主积威之下，不得不承认地主一方面的条约。农协是代表农民的机关，所以东佃契约，应由各县农协斟酌当地情形拟定；经省协之批准，请政府备案。东佃双方，均须遵用，如需另增附项，须得当地农协的许可。

（二）租额应该减轻。减租的标准，应该根据田亩的性质、大小、肥瘠，付业的多寡，押金的轻重和佃金利息的有无多少等情形，减少租额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

（三）农民多为当地土著，并无缴纳押金之必要，如桂阳、零陵、邵阳、溆浦、麻阳等县，都没有押金办法。而采押金办法的地方，贫农每因无押金，佃田不到，成为农村中无法救济的失业问题。故各地如非十分必要情形，自得废除押金制度。即在押金制未能废除以前，亦应一律按照当地利率计息，不得有无息押金。押金最高限制，可由各县协会斟酌当地情形规定，经省协批准，请政府备案。

（四）农民除佃约上规定应纳的正额地租外，无论何种陋规，一律免除。

（五）地主不得无故或借故退佃，尤不得因农民团体的行动，而对个人提出退佃。农民设因退佃而受损失，所受的损失，应由地主赔偿。

# 取缔高利贷决议案

在现在社会制度下，借了人家的钱米，当然应付一种利息；可是乡下的土豪劣绅、奸商、不法地主等惯于乘贫民需钱急迫的时候，实行高利盘剥。贫民因高利贷的逼迫，有至于卖妻鬻子，或自杀的。即幸而能够还债，不久的功夫，就要弄到赤贫的地位。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在革命政府之下，是绝对不应该存在的。

据各地代表报告：月息百分之十，差不多是全省七十五县普通的现象，谓之"大加一"，又有借银九元，月息一元，名为"九去十归一"。南县、安化、华容等县，有月息百分之二十的，慈利、永明、城步等县，都是月息百分之三十。耒阳有"九出十归外加三"之利息，即借本九元，一月后还十元三角。常德乡间通行的利息，为借洋七角，一月还洋一元。桃源有"孤老钱"，每月一对本，如借洋一元，过月还洋二元，过两月还四元，以次类推。慈利谷息，每串钱年息一斗。岳阳之"押乾租"，借洋四元，年还息谷一石。益阳等县，有五月间借出谷一石，八月间收谷两石的。郴县有水谷，即每借洋一元，年还息谷三斗。新宁有借钱十千，年出息谷一石的。衡阳有标谷利，即于上年四五月间借出谷一石，以最高价算为现钱，下年七八月间，以最低价算谷收入，除谷价之两次剥削外，仍算月息百分之六七。此种利息，可说是在三个月之间，即可加三倍以上。临湘有每元每日利息一角，每满十天，即算复利，如此计算，借洋一元，满一个月须还本利共八元。城步有"八斗九年三十石"的俗话，即借谷八斗，九年还谷三十石。

至于最低利息，在沅江、南县、常德、岳阳、芷江、慈利、安化等县，每月利息百分之五。华容、桃源等县，为月息百分之四。湘乡、道县、新宁、临湘等县为月息百分之三。这些都是借贷利息的起码数。在以上各县中，要借比此更低的利息，是决借不到手的。

大会认此种高利盘剥，极为不当，各县协得依据各地情形，规定适当利率，经省协批准，政府备案，通令执行。最厉害的高利贷应请政府一律明令禁止，并于最短期间，实现国民党新政纲之规定利率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

# 田赋问题决议案

（一）田赋正供虽不很重，附加则重极了。据各地代表报告，茶陵附加超过正供一倍以上。宁乡每两正供，附加学捐、团防、路股、农林保管共四元，又各都自治经费一元至二元不等。武岗附加超出正供二倍。湘阴每两正供仍一两连附加共完九元。新宁每两附加十二千余文。衡山附加虽由农协决议减轻，但每亩有二角八分七厘之多。长沙每两附加三元六角。常德每两附加四元八角。临湘每正额三元七角五分，附加团防、学捐、警捐等项共五元。零陵每粮一石，附加团防二元五角。永明每两附加六元余。新田每两附加八元。澧县每两附加六元至九元。衡阳每两附加十元内外。祁阳每两附加十八元。篮山每两附加小洋二

十六元。宁远每两附加一百余串。宜章每两附加近城团十五六元，白沙团二十四元，黄沙团三十六元。

以上各县均属超过正供远甚，从超过正供一倍至每两三十六元，駭人听闻至于此极。此外新化每两附加团防费二元五角，桃源、永兴每两均附加二元四角。郴县每两均附加二元。湘乡每两附加一元八角。郴县每两附加一元六角，犹为附加较轻的县份。补救之法，应由各县农民协会，邀同各县革命民众团体，清厘田赋附加数目及其用途，凡非地方公益正当开支，应一律免除，属于正当开支的也应该尽可能的减少。至于以前附加甚轻，而在地方公益事业上有必要时，必须经县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民众团体的认可始得加征。

（二）贫苦农民欠征田赋，各地都有，有倒在粮柜上的，有倒在地方团保手中的，有倒在家族族长手中的。此种粮柜、团保、族长等借欠完钱粮之名，以重利盘剥欠户，苛索不遂，往往继以差役威逼。欠户常因此受重大的损失与侮辱。本大会决定，在国民政府统治湖南前贫民历年欠缴田赋，无论多少，应请政府一律豁免。

（三）地亩经界不清，以致许多人田多粮少，或田少粮多，甚至有粮无田，或有田无粮，狡猾的得重利，驯良的被剥削。又有因田亩经界不确，于田地易主时，旧主随意将其田亩以少算多，无形中新主照亩计租，一转移间增加佃农几倍租额。亟应督促政府，清丈地亩，确定赋率，取消无地钱粮，禁止飞粮，为受害农民减轻痛苦。

（四）关于征收田赋的一切陋规，如钱水重利、抹尾数等均属无理剥削，应该一律废止。

（五）近来水旱天灾，极为重大，受灾区域，农民困苦非常，无力缴纳田赋，此等区域，应斟酌灾情轻重，免征或减征田赋。

（六）用累进方法，征收田赋。

## 农村合作社问题决议案

“合作社”是互相扶助、互相救济、以排除互相的不利，而增进互相的利益的组织。贫苦的农民，为免除高利的盘剥，应组织“信用合作社”，用集合的资本，集合的信用，以谋储蓄及借贷的便利。为免除辛苦收获的农产品卖出时受奸商压抑价格过低之弊起见，应组织“贩卖合作社”，使农产品能直接输往较远之市场，获得较好之价币。农民日常消耗品，如油、盐、布匹、杂货等类，历受商人居间剥削：常时出了高价买了劣货。急应组织“消费合作社”，公共集资，从较大市场或物品产地运来廉价货品，供给农民需用。目前农民以抵制高利贷、免除农产品价格过低、免除日用货价格过高。这三件事最为急务。因此上述三种合作社之组织，最为迫切。此三种合作社，在初经管时，亦可在一个合作社中分为三部经营。此外为谋农田水利之改进，农业生产力之增加，亦可组织“生产合作社”。为谋农具、种子、肥料之廉价，并迅速获得，亦可组织“购买合作社”。为谋对农产品之加工（如将谷子加工做成米，将木头加工锯成木板），及其他使用之便利（如共同使用水车），亦可组织“利用合作社”。

各地农协，应注意宣传各种合作社之效用。且农协应注意合作社技术人才之养成，并

编印关于如何经营合作社之小册子。在政府方面，应依据国民党新政纲"政府应邦助农民组织各种合作社"之条文，在政治上经济上予以有力之援助，如补助信用合作社之资本，免除或减轻消费合作社、购买合作社运入日用品及农具种子等税捐，以谋合作事业之发展。各地开办合作社时，对于经济之管理，须取严密方法，防止流弊之发生，以免丧失信用，阻碍进行。

## 青年农民运动决议案

青年农民是勇敢活泼而有进取心和反抗性的，他们除受到一般农民所受的痛苦以外，更因处于家长制度之下，由习俗之束制，感受待迂的不平等。且以农民受剥削过甚，青年农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年来水旱为灾，战祸频仍，其痛苦影响及于青年农民，至深且巨！因之其需要革命，最为迫切。广东各地的青年农民已表示他们在革命运动中有很大的力量：如为农民本身利益的斗争，肃清反革命势力等工作，他们无不很热烈的参加。湖南的青年农民运动，目前尚在萌芽，农民斗争亦在开始，青年农民的力量尚未能充分的表现出来，然而此次北伐，平江等地的农民参加战事而牺牲者，其中的青年农民不在少数。

青年农民包括青年雇农、牧童及农家子弟等，这些分子在农村中最多，而他们因为富于革命性，能促进整个的农民运动发展起来，农民协会得他们的努力而日趋巩固。他们是农民政治的及经济的斗争的先锋，将革命的势力，使其更形扩大而有力量，所以青年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对于青年农民伟大的革命力量，应如何的珍视，发展湖南的青年农民运动，是我们的重要工作之一。目前湖南青年农民运动的工作，除领导并结合广大的青年农民群众参加一般的政治经济斗争外，应特别注重文化的宣传，训练青年农民革命能力，养成斗争中之主要战士。至于他们的经济生活，虽与成年农民有密切的利害关系，然以提高青年农民之革命意识计，须尽可能的予以改善。

因为青年农民的地位和生活与一般农民相异，所以他们除一般的要求外有他们特殊的需要，在目前须达到下列最低限度的要求：

（一）应规定青年农民最低限度的工资，与成年农民作同样工作者，应得同等工资。

（二）每回工作时间超过其能力所能担负，每月应有例假，在假期内（纪念节日停工在内）应照给工资。

（三）青年农民不作危险及有害身体的工作，禁止雇主虐待打骂。

（四）青年农民因工作伤亡者，东家应给予医药费或抚恤费。

（五）以祠堂庙宇的财产及他项财产开办青年农民的免费学校，规定青年农民受补习教育的时间，在此时间内，雇主或家长不得课以工作，农民子弟均应受免费的义务教育。

（六）农民协会组织儿童团，以训练农村儿童成为革命的后备军。

（七）青年农民一致加入农民协会。

欲求实现此青年农民本身利益的要求，各级农民协会实负有领导的负任，青年农民工作是农民协会工作中之一部分，青年农民问题得着相当解决，即整个的农运获到助力不浅，所以农民协会应有办理青年农民工作的专人及组织。在省农民协会和各县农民协会须

于执行委员之下设置青年部，区及乡农民协会得设青年委员一职，他的责任是计划并指导青年农民方面之一切工作，我们在实际行动中，须注意不妨害全般农民运动，尤应注意联合会战线策略之应用。

## 对于农民运动报告决议案

大会听到易礼容同志湖南农民运动报告以后，全体一致决议如下：

（一）湖南的农民组织已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在短时期中即有这种的成绩，我们认为是满意的；但就全省局面来观察，为担负国民革命的工作，这点数量还是太少。今后当更以十二分的努力，从事发展，以贯彻“全省被压迫农民在湖南省农民协会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的口号。

（二）在北伐军事行动中，浏阳、醴陵、平江、临湘、华容等处农民实行参战，因此使北伐军垂手而得武汉，湖南农民参战与五卅运动、省港罢工，同足证明“工农为国民革命的主要力量”的理论不为虚言。然此次参战农民牺牲很多，本大会敢代表全省农民深致敬意并接受其革命精神。

（三）一年来从湖南农民的斗争中知道目前湖南农民急迫的要求为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解决民食问题，而其革命的最大对象则在打破封建制度，建设民主政治。这种要求表现于反团防，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要求武装的行动中更形明显。今后的工作应领导农民一方面继续作上面的争斗，以根本扫清封建余孽；一方面更努力民主制度的建设，即实现乡民会议、县民会议、省民会议以至于国民会议，而以多数贫苦农民为领导之乡民会议与乡村新自治制之建设为基础。

（四）土豪劣绅为农民的直接统治者，同时又是军阀政策的基础，因农民的奋起，各地土豪劣绅为继续保障其剥削计，乃实行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于是农民乃不得不加以反攻，目前乡村中纠纷事实乃因此形成。打倒土豪劣绅是铲除封建制度最有力的革命行动，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行动是很好的，今后更当加倍努力。

（五）湖南农民运动中各地工作的同志，在微薄的薪资和过度的劳苦中，处处表现刻苦、努力、廉洁、一切为革命的美德，这是值得我们景仰的。但是有些同志行动不免流于幼稚及不注意外交的错误，这是应该努力改变的。

（六）从全部工作的成绩看来，我们认为满意，然而今后值得我们努力改变的亦有下列几点：

一、组织不严密，不开会缴费，不免有土豪劣绅混入；

二、缺乏训练：因此农民能力不能增加，政治观念不能进步，或不信自己力量，或陷于骄傲；

三、宣传不切实、不普遍；

四、口号过高或过低；

五、不能领导农民从斗争中得到训练；

六、调查工作没有注意。

## 禁烟问题决议案

鸦片流毒深入农村，许多生产谷米的田地，变而生产鸦片，成为民食缺乏的原因。吸食鸦片的人，尤其是劳动者，废时失业，有害健康，在社会上更发生许多恶影响。湖南已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赵、叶军阀勒种包销，饮鸩止渴的政策。应该根本铲除，现在湘西各县，受害最烈，政府应有彻底办法，以资救济。目前急务，应请省政府通令全省首先禁种禁吃 限期禁绝，再在全国规模之内，严禁邻省鸦片通过本省。

## 湘西问题决议案

湘西连年大旱，又加上几次的兵灾，人民不知死去多少，失业的更是成群结队，更加土匪如毛，遍地抢劫。即使免于死亡失业，然而家居外出，假使不蒙土匪的庇护，也要遭不测之灾，吊羊勒赎，竟是寻常的事情。近更军队复杂，川军黔军各达数万，此来彼去，勒索供给，动辄巨万。而且各自扩充势力，乱发委任，到处招安土匪。一到了冲突时，这里解散，那里聚集，这里剿灭，那里安抚。各据一方，放出许多如狼似虎的官吏，任意添设税关捐募，勒种烟苗，苛派军差，极尽压迫剥削的能事。湘西人民，尤其是农民，在这种黑暗政治之下，担负重大的税捐，受着兵匪的骚扰，简直是有田不能耕，生机完全断绝。占全省三分之一的湘西，陷于这种紊乱状态，乃使整个的湖南政治经济，也不能统一。农民为解除自身痛苦拥护湖南政治经济的巩固与统一起见，竭全力从事扩大革命民众的组织，增加民众自身力量，以反对军阀政治的工作，同时督促政府于最短时间，肃清不法军队，解决土匪问题，开辟交通，禁绝鸦片。

## 解放苗傜决议案

苗傜是一种古代民族，因汉族西来，避至湘、粤、川、滇、黔、桂深山间，人口有一天天减少的趋势，生活已到了极痛苦而绝无希望的地位。但是这些民族，可以说全体都是爱和平的农民，历朝外受汉族封建君主的大屠杀，内受土司酋长的严重剥削。致使此等爱和平的农民，长处暗无天日的世界。而汉族人士习于传说，以为苗傜为极野蛮的民族，即灭亡亦不足惜。解放弱小民族为革命农民的志旨，农民协会尚有不问国别均得为会员的规定，我们对于同国异族的农民同胞，实有竭力提携的必要，湖南南部旧衡阳道属土著多傜民，西部旧辰沅道属土著多苗民，本大会为解放苗傜起见，决议如下：

（一）设法使苗傜等民族加入当地农民协会，或助其组织单独的苗傜农民协会。

（二）严禁汉族侵占苗傜土地。

（三）开办苗傜简易学校。

（四）汉族不得故意诬造侮辱苗傜的言论。

（五）请政府严厉剿灭苗峒土匪。

（六）请政府颁布解放苗傜的明令，使其与汉人政治经济一律平等。

（七）援助苗傜解除土司酋长的残酷〔压迫〕。

## 没收逆产问题决议案

过去的湖南军阀及其封建余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无不剥削人民，侵蚀公款，以饱其私囊。现在革命势力虽已及于湖南，然而这些民贼，仍保存其由剥削侵蚀得来的丰富的财产，建筑雄厚的经济势力，以为他们图谋死灰复燃之基础。欲求反动势力之肃清，必首先没收其财产，毁坏其经济基础，使他们失其依附。他们的财产，既然是由剥削侵蚀而来，当然仍应还诸民众。所以我们对于没收逆产的主张是：

（一）督促清查逆产委员会，从速没收一切军阀及其党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财产。

（二）各级农民协会负责调查当地逆产，报告清查逆产委员会。

（三）规定逆产为抚恤老弱残废兵士及赈灾之用。

（转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195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 江西第一次全省
# 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选）

（一九二七年三月）

## 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宣言

几千〔年〕来被压迫被剥削被轻视的我们，此次因组织了农民协会，才能在江西政治中心地点——南昌，开我们庄严伟大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满脚尿粪臭被人视为一文不值的江西农民挺起身来向社会表现自己力量的第一次。我们农民在数量上，虽然占了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但这样多数的农民，却只是人间最可怜的奴隶；我们虽然种了许多稻子麦子，但是我们不能吃一顿好饭，且有终岁不得一饱的；我们虽然种了许多棉花苎麻，但是我们没有穿过一件好衣服，且有许多因没衣服穿而寒冷欲死的；我们虽然出了许多捐税，但这些捐税并不用在农民身上，我们的兄弟儿女，都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变成了“文盲”；我们对社会虽然尽了很重大的义务——社会是我们用锄头掘出来的，用犁头耕出来的，但我们得到社会的待迂，只是不可忍受的欺压，剥削，轻蔑，在政治上我们没有发言权，在社会上我们没有地位，一个小小官吏——就说是一个警察所的巡官罢，一个衙门里的差役罢，都可以任意斥骂我们，鞭打我们，受了打骂，我们还不敢声诉一句。对于地主财翁之重租剥削。重利盘剥，土豪劣绅的寻事敲诈，贪官污吏之借端苛索，其痛苦更难可胜数！我们两个肩头上负担人间一切苦痛，所有幸福与快乐我们都没有享受过。现在我们觉悟了。我们知道了痛苦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军阀、大地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具体的事实，就是重租重息重税及其他敲索。我们也知道了解决痛苦的方法，是在自己组织起来，用自己的力量，求自己的解放，这就是要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协会是我们农民的炮台，是我们农民利益的保障。只有我们自己的农民协会发展并巩固起来，才能使我们从千万斤重的盘石底下翻一个转身！

江西农民久受军阀压迫，一旦闻革命军到来，即出死力邦助，如做侦探，引路，输送军需，供给饮食各种工作。尤以永修农友，不畏危险，出来掘铁轨，以致牺牲两个农友。农民为什么要邦助革命军？是晓得革命军来了，一切痛苦，得逐渐解除。现在帝国主义与军阀，还没有打倒。农民要求的利益，自然不能完全得到。还要继续邦助革命军去作第二次北伐铲除奉系军阀。不过我们本身的要求，仍然要提出来，并促其实规〔现〕，如减租减息减税等。因为肚子饿了，是无力是〔量〕去革命的，要革命至少要身上有件衣服穿，口里有碗糙米饭吃。

中国国民党是孙总理手创的党。孙总理手定的工农政策，乃代表工农利益，领导农工去革命的政策。我们农民要想得到解放，只有竭诚拥护国民党，使国民革命早日成功。但要求党始终站在农民利益上去进行工作，实行总理的农工政策，当拥护农民的利益，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

对于革命政府，我们农民是怀着很大的希望的。过去省政府虽然做了一些于我农民有利益的事情，如明令禁止重利盘剥，替省协筹款，但对于各地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之处置，未免过于姑息。如星子县长何翼剑摧残农民协会，殴打省协特派员，叛迹昭著，经星子各界请严办，然政府始终置之度外，而不采取严厉的处置，致酿成杀人惨案。我们希望政府能极严求厉地惩办一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因为他们是我们农民的仇敌，同时也是革命途上的障碍物。我们也很明白国民革命，光是农民□干，是难得成功的，必定□各阶级的民众都来参加，才有胜利的把握。所以我们要与我们的兄弟——工人联合，并要和我们的朋友——商学兵各界联合。我们这多被压迫的民众紧密的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及一切反革命派进攻，并将他们打倒。

我们今日站起身来，向社会要求恢复我们人的地位，取回我们失去了的权利。同时，我们准备牺牲一切，参加革命斗争，以求民族的和本身的解放。

在庄严的大会闭幕之后，我们一致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打倒压迫农民的大地主！

江西农民解放万岁！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 会务总报告决议案

大会听了方志敏同志会务总报告之后，经过郑重的考虑，决议于左：

大会对于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在三个月内，指挥各处工作，使协会组织由六县发展到五十四县，会员人数，由五万发展到三十余万，并随时纠正工作的错误，这层，大会认为相当的满意。但现在各县协会尚属初步组织，错误幼稚的地方，还是很多。此等错误幼稚的地方，若不急行改正过来，将影响全省协会健全的发展，甚属危险。为求各级协会本身健全的发展起见，各级协会应即执行下列各事：

一、省农民协会为全省协会之总机关，内部组织，应该完备，方能指挥裕如。过去筹备处的内部组织，太不完备了，以致对于各地协会工作，只有零碎的指导与纠正，而没有整个的指导与全部计划。尤其关于宣传工作，做得太不充分，出版书报太少了。以后省农民协会的内部组织，应该充实起来，应该定好全盘的计划。对于各级协会工作，应该予以整个的详尽的指导，同时要予算许多浅显的书报，充分的供给全省农友阅读。

二、各县农民协会，或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在组织协会之先，未有充分的宣传，致有许多会员入了会，反不明白协会是甚么一回事，反有些怀疑协会。以后县区协会负责人，组织乡协会先得做一番充分的宣传工作，务使每个会员，都明白协会之意旨，及加入协会后应有之工作和任务。如此，一个会员加入就有一个会员作用，而不致有名无实。

三、过去，各县发生一种普遍的错误，就是专注重数量之发展，而不注重质量之炼锻。有许多县协，在以前不过数百人，现在就有了数千人。这种过速的数量发展，要是我们力量一下招呼不来，就可使大部分农民发落于土豪劣绅或反动分子手里；整个的农会，因之分裂，这是再危险不过的。九江、丰城、临川等县，就发现了这种危险现象。以后应逐渐地有步骤地发展，如力量不够时，尽可先组织附郭区域协会，再及其余区域，不可一时妄图全部的发展。

四、过于依赖政治，一方可以使协会会员，不认识自己的力量，而丧失协会重大的作用；一方政治势力，不见得可靠，容易失败。在过去，各地发生事件，协会不晓得设法使全体会员自己起来解决，而只晓得用公函或呈文，要官厅去解决，这是很不好的。以后协会，应用会员自身的力量，去解决一切困难问题，除非不得已时，我们不要妄想借用政治的势力。

五、各县协会，太缺乏调查工作了，这样可使该处协会之行动无所标准。同时，省协因得不到各地的调查报告，亦无以决定某时期中应采取的策略，及提出适当的口号，这很可妨害工作的进行。此后各级协会，应多做调查工作，根据调查结果，而定进行方针，才能免掉错误。

六、在从前，有一种毛病，使各级协会奄奄无生气，且日趋死僵，这就是各级协会，太没有留意协会的经常工作。经常工作，是些什么？就是会员要求协会替他们做的许多琐碎麻烦的事情——如每个乡区要办学校设俱乐部解决纠纷等等事项。这一些事情做好了，可以使会员与协会，发生一种很密切的关系，也可以使会外农友，看到协会能给与许多实际的利益，而来要求加入。以后协会应注意总共〔结〕经常工作，如果对这种工作忽略了，这个协会，就可以断定其没有希望。同时省协考查各级协会的成绩，首先要问一问这个协会，到底替农衣〔民〕做了几多事情。

七、因为各级协会不注意非常工作，弄成会员与协会的关系，毫不密切，这样下去，将使协会成为一个无群众的空架壳。以后各级协会务须与会员联成极密切的关系，使会员感觉一刻脱离协会，就不能有兴趣的生活。

八、同时各县协会与省协会之关系，亦不密切。这就是没有经常的详细报告到省协会，使省协会无从指导工作。有许多地方，竟自成立协会以来，没有一次报告——如萍乡等县。其有报告的县分，亦多简而不详，详且不确实。各县报告，多胪陈其优点，讳言其缺点。以后各县协会每〔十〕天应将该会工作情形详细地确实地报告省协会一次，省协会据报告，迅速地予以正确的指导。

九、要想一个团体的发展与健全，必须有一种森严的纪律，以为维系。伟大的农民团体之存在，尤赖于纪律之森严，纪律愈森严，组织愈严密，便愈有力量。过去各协会，还说不上纪律两个字。以后应整饬我们的纪律。凡违反章程规定者，应毫不犹豫地，执行纪律，以制裁之。铁的纪律，可以使我们的协会强壮，使全体农友，早日得到解放。

十、农民协会，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才能强壮。不经过斗争的协会，是不会有力量的。以后省县协会，应努力领导各级协会斗争，无论为经济的、或政治的，大的或小的。在斗争中，可以使会员认识组识的意义与重要，并从此□做斗争的方法。但必须注意遵用农村的联合战线、客观环境，而提出适当的口号与策略，以期取得胜利。

十一、过去很少有会员，照章缴纳会费，这样会员将忘却协会，疏离协会。以后应设法使会员照章缴纳会费，数目虽可减至二三个铜板，但必按月缴纳，一方维持会内费用；一方提起会员对协会之关心。

十二、统计全省会员占极少数抛弃占农村人数一半的妇女不使他们参加协会，共同革命，这是我们协会的一个大失。且妇女不加入，证以过去的事实，处处都可以妨害协会之发展。以后应注意农妇运动。同时本会会员，都要介绍自己的母亲妻姊妹入会。

十三、我们的协会还有些被土豪劣绅把持，我们应从速做肃清土豪劣绅运动。向农友打破土豪劣绅的假面具，宣传他们的罪恶，叫他们泼开，以保持会之庄严神圣。

上列十三项，大会认为应赶快执行，以减少协会之危险性，而谋新的进展。

## 惩办土豪劣绅决议

土豪劣绅是与农民利益处于绝对相反的地位，是农民唯一的敌人，其有害于农协工作之进行固不待言。因此大会对于惩戒土豪劣绅，特决议下列二种办法：

第一、各县农民协会应与县政府县党部及各民众团体共同组织审判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

第二、对于省党部现在所组织之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省农民协会应联合其他团体，要求多推派代表参加。

## 采用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决议

为巩卫农民协会、保护农民利益，防御反动派破坏起见，大会认为广东农民协会所制定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适于实用，本省农民协会采用之，特此决议。

## 合作社决议案

农民散居在各乡村间，他们购买日常用物及卖售农产品，必须到城市中去，不特受商人之垄断盘剥，而且耗费时日，又因缺乏资本，必须向地主富翁告贷，受他们的高利榨取。合作社是一种经济组织，对于上说各种弊害，均可使之免除。如组织贩卖合作社及消费合作社，确能收集零售农产品，直接运往市场上贩卖，免去奸商垄断物价之损失，直接由市场上购回货物，到乡间去廉价卖给于农民，不被商人赚去钱。又如信用合作社，农民

确能用微小的利息借得资本，不致被地主富翁高利之盘剥。本大会为使农民减少受经济压迫之痛苦，议决：对于各种合作社，应极力对各农友宣传，使每个农友都能明白合作社的利益，热心去提倡实行；一方将地方积谷及公款，请求政府拨给农民协会，作各种合作社之基金。

## 减轻田租决议案

现在各地租率，虽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但被地主剥削夺去的，至少在一半以上，农友一年牛马般的工作，连租衣淡饭也不得温饱。本大会为提高农友生活及减少农友痛苦，议决：

一、自民国十六年起，依赖中国国民党联席会议决议案，一律减轻佃农佃租百分之二十五。

二、水旱虫灾等荒年，概行免付田租。

三、佃农除依规定租额还租外，对于地主一切陋规，如押租、预租，及供给酒肉等苛柯，一概废除。

四、地主不得任意收回佃农田土，如有特别原因，亦必须得农民协会的同意。

## 废除苛捐杂〔税〕决议案

现在革命尚在用兵时期，帝国主义者、军阀未曾打倒。政府为使革命基础巩固，统一中国，自非有大宗财款应用不可。本大会为拥护政府在继续革命战争的时期中，当然不能废除一切捐税，但是

一、政府所征收捐税，必须完全用于正当用途，绝对禁止滥费，贪官污吏之中饱，及例外征收。

二、要求省政府于短期间，设法废除盐斤加价，以顾全农民生计。

三、禁止户宰家酿征税。

## 自卫军组织决议案

江西近年以来，因军阀穷兵黩武，各县如临川、德安、宁冈等县，时有溃军逃兵，及失业的农民，相率为匪，为害于地方。农民常受土匪之骚扰，不能安居耕种。本大会为使农民得到生活安全起见，议决：凡有匪患及其他有危害农民之各地方，除请政府派兵剿办外，同时各级协会即应组织农民自卫军及义勇队，请求政府无偿或廉价拨给枪支，以保护地方，并谋革命后方之巩固。

（原载江西省农民协会印《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

# 平江县农民协会布告

（一九二七年四月）

为布告事案奉

湖南省农民协会省字第六四二号训令开为令行事。查各县洗会运动的报告，竟是纷至沓来，甚至有借政府的势力来打击失业农民的，这真是想要革命，却开倒车，并且不知不觉的中了反动派的圈套了。查湖南的失业农民起来，在湖南的农运中，实在是最勇敢的先锋队，他们猛烈的向压迫阶级进攻，如戴高帽子、游团、罚钱、罚酒饭、殴打、清算账目等事，这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在这些行动中间，的确把乡村的封建阶级动摇了。我们从经验中可以知道，若是没有这些行动，乡村的封建势力，是不会推翻的，乡村的民主政治，就没有方法实现了。所以农运和平的地方，封建阶级必鼓其最后的余威，向农民猛烈的进攻，如益阳、湘阴等处皆是。农民向封建阶级进攻猛烈的地方，农民的组织愈好，农协中建设的工作，也就愈多，如浏阳、湘潭等处皆是。凡此种种，便可以证明失业农民是农运中最勇敢的，不可少的先锋队。因为他们的生活，过于困苦，在社会上已到了落伍的地位，早已有革命的需要，就是在没有农运的时候，也间有反抗封建阶级的行动，所以农运起来，自然反抗封建阶级，不遗余力了。现在封建阶级已起了极大的恐怖，四处宣传，说湖南农运，是"惰农运动"，是一些"流氓地痞"参加，真正的农民并没有起来，种种的"暴动和纠纷"都是一些"流氓地痞"干的，并且以农运足以减少税收，来挑拨政府，以农运足以阻滞军饷，来挑拨军队，以农运非国民革命，来挑拨国民党，希图政府、军队和国民党，对农运发生恶感，把一般失业农民镇压下去。他们好有反抗和破坏的（余）地。前左社所拟的农运计划，便是个很好的例子。他们所说"暴动纠纷"自然是指农民进攻封建阶级的一切行动了，他们所说"流氓地痞"，自然是指最革命的一般失业农民了。失业农民既居落伍的地位，自然有流于堕落的行动，封建阶级，便加以"流氓地痞"的名词，所以"流氓地痞"四字，纯粹是封建阶级骂人的口吻，我们根本不承认有此等名词存在，但是失业农民在过去农运中，也有不免左稚行动的毛病，这不过是关于农协纪律和训练的问题，若我们竟行使洗会运动，那末，不是中了他们的圈套吗？现在本会特规定关于农协办法七条于左：

（一）不得以政治势力，打击失业农民；（二）区乡协会，失业农民可当选执委；（三）要注意农民的政治和教育训练，使他们了解现在的环境，及对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仃止他们对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进攻；（四）严整"会的纪律"免除群众自由行动和左稚行动；（五）罚款游团等事，如豪劣罪有应得，不能强抑农民对封建阶级的革命行动；（六）各地土豪劣绅如向农民进攻，须决绝地对他们施以打击；（七）土豪劣绅还没有推翻的地方，农民仍须起来，作推翻封建势力的斗争。

以上七条，仰该会迅即遵照办理，并即更正省字第二十六号训令中不适当之各点，所有办理情形，仍着随时具报为要。此令等因奉此除分会外合行布告此布

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佘本健

徐礼钧

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　日

（转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 〔附〕　湖南农民运动真实情形

——湖南民众团体请愿代表团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六月）

## 一　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

（甲）发展的情形：湖南农运为时不久，然据一九二七年四月份报告：全省有组织的有六十三县，会员达五百余万人，农民起来者近千万人；其分布区域以湘江流域为中心，滨湖各县及资江流域次之，因此等地带在军事上政治上都重要，湖南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为准备北伐工作计，也不能不首先着眼此处。至于湘西一带因交通不便，又长时期在军阀——袁祖铭等统治之下，所以至今还在开始的时期。

（乙）发展的原因：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完全是封建军阀统治的结果，军阀政治建筑在剥削农民上面，其赖以维持政权的最大饷项即出于田赋、盐税、杂税、厘金，这四项完全直接间接是农民负担的。湖南农民在张敬尧、傅良佐、赵恒惕、叶开鑫等军阀统治之下惨受提征田赋，加设厘金，增加杂税等一切层出不穷的剥削，差不多十有九家弄到家空业尽。军阀为贯彻其剥削起见，复勾结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以为爪牙，厘金局、榷运局为官吏竞取的美差，六个月知事可得数万元，如此等类的事实归结为农民的加倍痛苦。至于土豪劣绅为军阀政治的下层基础，政治上垄断乡村政权，利用团防武装实行屠杀，经济上重租重批高利借贷，农民生活乃更堕于万劫不复的地位。整个的封建势力，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层层剥削决定了农民只有两条出路：革命或死亡（饿死冻死为匪而死等）。在北伐过程中，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对于农民的利益——组织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废除苛捐杂税，禁止重租重利等曾有广大的宣传，于是湖南农民在饥饿困顿

中便蹶然兴起了。

（丙）农民革命中的主要力量：贫农是农民中最受痛苦数量最大的群众，他们没有土地，生活毫无保障，简直早上不知道晚间的生活怎样，在封建政治下面他们的地位又最卑贱，饿与死是他们不可逃的两个命运，因此他们天然富于革命性。富农中农对于革命开始是不生兴趣的；只有贫农才一开始便十分相信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对于农民的宣传，毫不犹豫的赞成革命，毫不犹豫的加入农民协会，因此贫农实在是农民协会的发起人，是参加北伐的战士，换言之，贫农是湖南农民的领导者，也就是湖南农民运动中的主要力量！

## 二 湖南农民运动的功绩

（甲）参加北伐：湖南农民运动在革命中第一个贡献，即是领导农民参加北伐，湖南农民参加北伐与省港罢工有同样的意义，省港罢工封锁香港，革命政府才有"闭门捉贼"将陈炯明、邓本殷、杨希闵、刘震寰等根本肃清进而举行北伐的机会。湖南农民参加北伐则使北伐军在极短时间通过湖南，能养精蓄锐而克复武汉，要是说省港罢工创造了北伐，那末湖南农民运动即促成了北伐。当北伐军从衡阳下来的时候，醴陵、浏阳、平江、临湘、华容等地的农民曾以锄头梭镖实际参加战争，组织侦探队、慰劳队、冲锋队援助北伐，因之农民阵亡者极多，至于送茶送粥慰劳兵士更普遍全省。

（乙）反抗土豪劣绅：军阀政治的下层势力建筑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把持乡村政权及团防武装以从事封建式剥削的上面，因此不求打倒封建军阀政治则已，否则除努力为打倒军阀本身外，必须进一步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专就农民解放而言，也必先从直接统治者——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压迫之下解放。

湖南农民对于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比任何口号都容易接受，因土豪劣绅为农民直接的统治者，湖南农民指土豪劣绅为"长牙齿"、"坐长板凳的"，这都是形容土豪劣绅剥削农民血汗，垄断乡村政权的事实。尤其是农民对于此等"长牙齿"、"坐长板凳的"所把持的乡村自治机关，比贪官污吏所盘据的县政府及一切征收机关，更属畏惧，更属痛恨，所以就有"打头张衙门"，"铁门坎"的称呼。

湖南农民革命目前的对象仅为土豪劣绅，因主观的力量还不能与整个的封建势力作战，因此贪官污吏在湖南有些地方竟可以存在，他们队伍中间也没有打倒几个。至于土豪劣绅被农民打倒的，在数量上，可以比其他封建势力为多了，但是实际说来，湖南农民打倒土豪劣绅也没有象一般人所想象的"闹得太凶"。统计全省农民打倒的土豪劣绅也不过几十人，倒是土豪劣绅两年未满的时间惨杀农民实有可惊的数目。所以湖南农民目前只在反抗土豪劣绅，还不算是打倒土豪劣绅。可是这种反土豪劣绅运动也就给湖南封建势力以不少的打击。如宁乡之刘昭、杨致泽，湘潭之晏容秋，华容之梅实，长沙之俞勅华等，均为土豪劣绅队伍中坐头一把交椅的，从这几个巨魁明正典刑后，湖南的封建势力可算是挫折了锐气。这一点，湖南农民在国民革命中实在建了伟大的功绩。

（丙）建设了太平盛世的乡村：任你把湖南农村的骚扰现象说得何等动人，但即算是一个土豪劣绅的巨魁，在心里头或者竟至于口头上也不能不承认目前的湖南农村比他们这

些“老爷”（湖南农民对地主的称号）当权的时候倒有太平气象。

满清末年起，政府即三令五申的禁鸦片；但事实上，在军阀统治之下，禁烟局本来即是卖烟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怕你拿着烟枪躺在十字街头，也没有人问。被查处罚的却尽属一些小烟鬼和没有势力的，请看武汉市上的“特别雅室”，广州的“谈话处”之多，便可想见禁烟的滑稽。然而禁之二十年，不但不曾禁绝，反而有长足发展的鸦片，湖南农民已起来的地方，以最短的时间，却一点一滴都禁绝了。

土豪劣绅的烟枪给农民劈尽了：区乡农民协会议决，发现秘密吸食的罚款游乡。果然有许多颇有面子的绅士先生唱了几出戴高帽子的戏。从此湖南农村谁也不敢在虎头上捉虱，再干那吞云吐雾的勾当了。

至于赌博，则有农村童子团挨家搜索麻雀牌及其他赌具，当场付之一炬。新年乡村旧习照例大开赌具，呼卢喝雉闹个不休；可是现在的新年娱乐，旧有的仅留下龙灯狮子，新增的却有演讲会、提灯会、群众大巡行等类，著名赌痞们也只好跟大家丢手。

三寸金莲在北方以至于九省通衢的武汉还不算稀奇的事，湖南的穷乡僻壤，过去本也不少。可是现在农民协会的女会员，已经穿起草鞋，跟着大众背起梭镖进城游街了。还不止此，湖南农村女子公然有些自办小工场、下田耕种的了。

乡间还有几件事连最凶的土豪劣绅也背着在啧啧称赞的，即是修塘坝、筑道路、垦荒地，任何人（包括地主）的塘坝，要是壅塞，农民协会即下令开挖，工程完后，即与地主交涉，照实数给工钱。乡村道路素来不注意的，可是现在差不多每一处都给修好了，羊肠小径已变成丈多宽的通衢，真算是行旅称便。地主们惯于把持荒山荒地任其荒芜，农民协会便出名租借，交会员开垦。

从事这三件工程：修塘坝、筑道路、垦荒地的尽属贫农，这是区乡农民协会议决安插贫农的方法。乡间，因没有过分失业的危险，偷盗案件也就绝迹了，人们所梦想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湖南农民是一步紧一步的向这个现象走了。

此外办教育（捐钱设夜校）、破除迷信（观音殿、财神庙变了会场，神象抬开，换了孙先生遗象），已成为农民极踊跃的工作，高贵的士大夫一味空提倡，却不如平凡的农民马上见诸实行。

总而言之，农民运动已给湖南农村一个新的气象：民主主义的新气象。振兴农业生产，改良风俗习惯，救济失业，这都是湖南农民已有成绩和不曾稍懈的工作呵！

## 三　湖南农民运动的趋势——土地问题的解决

一切农民急迫要求的是：“土地国有”，根本推翻封建势力的经济基础，完成国民革命中的经济革命。农民是竭诚参加革命的，可是他在革命中不会忘记他的目标，倒是因革命使他对这个目标增加了渴望。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跨过了先进的广东，因此他比其他各省更早更明白的告诉我们前列的战旗：即是“土地国有”，根本铲除封建势力。过去几个月农村中即流行一种口号：“平均佃权”，这纯粹是贫农阶级喊出来的，这个口号的意义，即是反对垄断土地，农民协会会员中占多数的贫农分子多主张按当地农民人数平均佃种，这个办法当然是行不通的，于是发生了“禁佃”的纠纷，这个现象完全是贫农丧失土

地所致。还有个流行更为普遍的口号，在一般知识分子看来，简直是笑话，即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平等”，农民口中所说的不平等条约不是什么南京条约、辛丑条约，而是关于苛刻征取地租的“佃约”，如最流行所谓“东七佃三”及“无息押金”、“田鸡”、“田鸭”、“田蛋”、“田草”，逢时逢节送“人情”（即礼物）给地主，遇地主婚丧，有作工不受工资的义务等苛例陋规。这些在农民尤其是贫农以为便是革命政府所宣传要废除的不平等条约，看来真是好笑——可是这其中却含有贫农要求土地的意义。因所谓不平等条约的“佃约”、苛例、陋规，富农固受害不浅，尤其是使贫农永不能有佃田的机会。贫农丧失土地，生活陷于极困苦的地位，即其能踊跃参加革命，胜过其他农民的唯一原因。农民自定之“平均地权”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即万一能够见诸实行，也完全是治标的办法，而不能将土地问题，根本解决。因土地仍为大地主所垄断，农村经济仍伫滞于封建状态中，因此农民乃进一步发出所谓“平等”的呼声；即孙总理所谓“耕者有其田”，孙总理可说是预先看到湖南农民运动的趋势了！

湖南农民对于土地的需要已经十二分的急迫，在“平粜”、“阻禁”两件事情上更表现得显明。西欧农民的希望是农产物价格增高，然而在市场上，时常是农产物远不及工业品的高贵，而发生所谓“剪刀”问题。在湖南却是相反的现象，农民协会普遍的抑平谷价，阻止谷米出境，实在说来这不算稀奇，不过是一个土地的关系。西欧之农民都是有土地的小农（在机械生产的农场耕种的，只能算是少数，自当别论），所以他总希望谷价增高。湖南农民（也可以说中国农民）可就不然了，农民中贫农占百分之九十，这种贫农都是丧失土地或者有土地而不足的，他们的食谷是要从地主富农手里用重价购买，因此对于农产物价格的态度恰与西欧农民取一种相反的形势，就是希望谷价更贱更好，根本原因是高租重利的关系。“平粜”、“阻禁”的确能给其他有土地的农民以不利，对于农产物流通、政府财政的妨碍也无庸讳言。

然而这完全是一个土地问题，要解决也只有土地问题解决以后才有可能。只有每一个农民都能够有够耕种的土地，那时农民站在小农的利益，只会希望谷价增涨，决不会发生“平粜”、“阻禁”，否则任你如何救济，总是徒然。湖南农民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对于“平粜”、“阻禁”曾有“按照当地所需食谷存仓外，一概放行”的决议。省农民协会更三令五申实行禁止，但结果依然，因贫农嗷嗷待哺，饿肚皮使他在没有更好的方法、而存仓又事实上做不通的时候，便以群众的力量继续维持“平粜”、“阻禁”的老法子。不能给与土地，要禁止这种农民式的方法，谁也不能够的呵！中国农民在中国全人口中占大多数，所以孙总理说：“国民革命之成功，在农夫工人之参加。”但是怎样使农民参加革命？给农民以所需要。农民的向背是国民革命成功与否的标准，湖南农民运动已显示给我们，土地问题实在是国民革命议事日程中最先待解决的项目。

## 四　湖南农民运动的障碍——土豪劣绅之进攻

我们始终相信湖南农民目前还够不上说打倒土豪劣绅，而只能说是反抗土豪劣绅。许多人，尤其是不明湖南真相的外省人，惯于一口咬定农民闹得太凶，杀土豪劣绅太多了。事实告诉我们却是相反的，湖南被杀之土豪劣绅不过几十人，而农民被土豪劣绅残杀的却有

可惊的数目。赵恒惕时代以土匪为名共杀了一万以上。除开我们有意抹杀事实。人人知道湖南农民的革命，可是很少人知道湖南土豪劣绅的残酷狡猾，比任何省区都厉害。湖南农工运动当前的最大障碍即是整千整万的土豪劣绅，湖南农民与此等土豪劣绅的中间，只有一个你死我活的关系，整个的土豪劣绅的阵线是拚命的在向湖南农民进攻呵！

他们进攻的方法是最阴狠最残酷的，分析起来，一共有六个：

（一）利用团防实行屠杀。团防局、保卫团、民团、警察所在湖南本来露骨的是地主镇压农民的武装，在赵恒惕时代更为军阀政治的真实基础，如宁乡大地主童氏为赵氏岳家，童氏在宁乡可以任意调遣全县团防，这种地主的武装，在军阀时代是实际的乡村政府，是统治农民的直接机关。逮捕屠杀农民简直变成这些“局长老爷”的家常便饭，只要土豪劣绅鼻子里哼一声，农民便有“进局”的危险。宁乡杨致泽办团防数年杀四百余人，并没有宣布过“罪状”。刘昭办团防的时候，有一次两个乡村竞玩龙灯，刘昭唆使所住乡村的乡人与其他乡人斗争；一铁匠骂刘昭的娘，过了许久，刘昭带团兵去外查案，路遇铁匠上山进香，刘昭即喝令团兵捆缚，挖眼截舌，大骂：“你还骂娘吗？”牵走五里，始行枪毙。各县团防私用非刑更属普遍，农民稍不如命，即加以“土匪”名，实行“挂半边猪”、“踩扛子”、“坐快活凳”、“断脚筋”、“辣椒熏鼻”、“倒挂”等使人战栗的刑法，因此农民不；进局”则已，否则不死也成残废。

北伐军经过湖南时，宁乡、湘乡、安化团防预备齐集雪峰山为赵氏作最后挣扎，以后湖南团防在土豪劣绅指挥之下则纯为反农民运动的工具。益阳泉交镇团防局不参加区党部成立典礼，大队巡行之农民，经过团局质问局长不参加理由，团局毫不答话，即开排枪，当地立毙农民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嘉禾团防局长王泽民在团局大开赌局，被农民禁止，即枪毙农民王老四，并抄掠农民财产多家。茶陵团防局秘密将假期回乡宣传农运学生一人以洋油、柴薪活活烧死，尸首粉碎，丢弃灭迹。此外团防勾结土豪劣绅以武力企图消灭农民协会的事实，差不多月有数起。

（二）勾结土匪。农民运动的兴起，土豪劣绅所把持之乡村政权已大半倾颓，因之其所有之武装、团防也渐次失其统治的效力，许多团防局已自行解散，存者又为正绅所管理。土豪劣绅为继续进攻农民协会计，便不得不舍弃团防而寻找新的武器——土匪了。安化土豪劣绅勾结土匪杀农民二百余，差不多在省农协的卷宗十件中有九件报告着土豪劣绅聚合匪类，饮雄鸡血酒，指天发誓“打倒农协，杀尽特派员”的消息。湖南农民在土豪劣绅勾结土匪这一进攻之下，的确牺牲了不少。

（三）组织反动团体。利用团防勾结土匪还是一时的行动，土豪劣绅进一步企图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动，便组织反动团体以团结势力，并以为指挥反革命的中枢。湘乡有镇乡维持会；衡阳有白化党；醴陵、浏阳有三爱党；醴陵更有打狗会，所谓狗者即指农民；保产党更为湘中普遍的组织。这些团体专在对付农民，凡各县惨杀农民，捣毁农协等举动，都是出自这些反革命反农民运动的参谋部的计划，有些地方这种计划虽为民众破获，但其组织，并不曾解散，千方百计进攻农民。

（四）混入农协。这是一个更阴毒的进攻，在许多指导者力量薄弱的地方，狡猾的土豪劣绅便戴着一付假面具混进了农协，从中捣乱，侦察虚实。尤其是故意提出过高的口号，做出越轨的行动，以破坏省农协一贯的政策，或专害革命的农民，农民运动失却革命民众的同情，十分之九是出于这班土豪劣绅的奸细所为。

（五）组织御用农民协会。土豪劣绅知道农民运动万难用武力阻止，如以团防土匪反动团体明目张胆的进攻，也只是以卵击石，惹火上身，“聪明”的土豪劣绅决不做这样“猪头三”的勾当，于是转而满口赞成农民运动。有一个时期，差不多每天都有几批肠肥脑满、尖口利嘴的人物到省农民协会来索取简章，要求组织农民协会。他们是打着两面大旗“家族主义”、“地方主义”以号召。于是家族农民协会在各县曾不断的发现，团结一姓，反抗外人。此外土豪劣绅多声称，入其所号召之农协，可吃便宜食谷，或可得金钱，以号召同姓或佃户。并千方百计愚哄上级机关承认其为特别区乡农协，以遂其利用窃取的阴谋，而从容置农民运动于死亡之地。

（六）造谣中伤。湖南土豪劣绅第一等逃往上海，第二等逃往汉口，第三等逃往长沙，第四等逃往县城，这是湖南土豪劣绅在农民反抗以后的普遍行迹。他们是犯了滔天大祸、幸逃法网的罪犯，可是在逃亡中，他们还是不曾放弃他们反农民运动反革命的工作，最大最厉害的方法即是到处拚命的造谣。这个阴谋实在比上面这些方法更来得严重，什么农运是共产共妻，兵士六个月不回家，妻子便由农协公去，某军长师长家财被充公、父亲被杀等无稽之谈，以挑拨革命军人与农民的感情。并使农民在革命民众面前失却深厚的同情，而陷于孤立的地位。目前在汉口，这种反宣传就极其猖狂。

## 五　湖南农民运动的缺点及今后的方针

革命者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他只有从不断的进行中，了解他的错误，以求补救。湖南农民运动决不会有象土豪劣绅在各地反宣传那些奇怪的事实，如“共妻共产”之类。错误就是革命的联合战线，问题就是从反抗土豪劣绅大地主中间稍忽略了小地主小商人的利益。但是这个错误的原因，革命的政党尤不能辞其咎。几千年压迫下面的农民一旦起来，自不免带有种种幼稚的行动，要是革命的政党能够领导农民，使农民在革命的政策下面作战，定不会有这样的错误的。可是现在农民运动如飞的发展，党在事实上落了后。以湖南言，几百个农民中没有一个农民党员，因此革命的政策不能深入农村而为农民作战的目标。今后我们唯一的方法，只有在农村竭力的发展国民党，努力的取得农民的领导，继续实行下面六个政策：

（一）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的财产。

（二）保护革命军人的土地及财产。

（三）保护中小地主小商人的利益。

（四）从速实现中央关于农民运动的政策。

（五）建设革命民主的乡村政权。

（六）武装农民。

（原载《向导》199期，1927年6月22日出版。转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1953年出版）

# 〔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

李　　锐

（上略）

## 北伐战争前夜的湖南形势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惨案爆发后，湖南掀起了革命群众新的反帝、反军阀运动的高潮，进一步为迎接北伐铺平了道路。

当时以共产党领导的“雪耻会”为中心，团结各界群众，进行各种斗争。长沙与各地都先后开展了罢工、罢市、罢课，游行示威，对英日经济绝交，提倡国货，收回大金码头（被日本强租的长沙码头）等群众运动。中心是在长沙，但各县的群众爱国斗争也是很多的。例如平江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至第二年二月，发生了有名的拒绝英国煤油起岸的群众爱国运动。赵恒惕对群众革命运动采取了高压手段，“宣传过激者斩”的告示布满长沙。于是共产党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即省委）积极发动群众，把所有反赵的力量都团结起来，开展驱赵运动。

因此，在北伐战争的前夜，湖南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在湘南（衡阳）和湘西（常德）已经建立了两个地方委员会，在工人、农民和学生中，有了相当强大的组织基础。全省有组织的农民已达四十多万人，受共产党直接影响的农民群众在百万以上；“全省工团联合会”领导下的有组织的工人达十一万人；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有组织的，他们已经历过许多革命斗争。在共产党的直接参加和协助下，全省已有十七个县市有了国民党的组织，其中包括省党部在内，绝大部分是由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当时国民党中的左派领导的，右派分子处于劣势（在湖南是先有共产党，后有国民党组织）。共产党湖南省委并在一九二六年初，派人到当时倾向革命的赵恒惕的部属中，进行统一战线工作，说服他们起来驱赵，参加北伐。

在一九二五年末至一九二六年初，有两件流血事件对于全省群众革命运动影响最大。

第一件是安源工人俱乐部付主任黄静源被杀事件。安源煤矿自一九二二年九月罢工胜利，成立了全国闻名的工人俱乐部后，矿局主权缩小，一直处心积虑要解散工人组织。一九二五年九月，矿方勾结赣西方本仁部队，派来一团兵，以“反对赤化”为名，开除了一千多工人，武装解散了工人俱乐部，捕去工人俱乐部付主任黄静源（共产党员，原来是长沙第一女师的教员）等七十多人。兵士并与工人发生几次冲突，打死打伤工人十余名。最后并将煤矿停工，使一万一千多工人完全失业，安源顿时变成恐怖世界。长沙和各地工人团体和各界群众，发起很大规模的援救安源工人的运动。十月十六日，黄静源终被枪决。当时的报纸这样记载着：“临刑时，黄面不改色，问‘何罪？’监刑军官答谓，‘你还要

打倒帝国主义吗？’黄乃大呼：‘打倒帝国主义！’‘恢复俱乐部！’‘黄静源死不要紧！’等语。”黄的尸首随即由工人抢出，经醴陵运到长沙，长沙一千多群众抬棺游行，将灵柩佇在教育会坪。十月二十六日，又举行了几千人的追悼大会。

第二件是株州农民领袖汪先宗被杀事件。汪先宗是株州的一个机匠，一九二五年参加了共产党，在本地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运动。这年收成不好，因此地主豪绅和奸商囤积居奇，引起谷价飞涨，农民无法生活。于是共产党号召各地群众开展救灾运动。汪先宗领导株州农民群众，向地主进行平粜等斗争。因此地主豪绅汪孝逵等恨之入骨，诬告他是匪首，由团防局逮捕下狱，将他百般拷打，但问不出口供。后来汪孝逵等贿通驻军叶开鑫部炮兵营，于十一月下旬，在三门市将汪先宗杀害了。汪就义时，向农民慷慨讲话，高呼"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各地农民、工人、学生群众得讯，纷纷开追悼会，抗议赵恒惕政府，扩大宣传发展农民运动。

连续发生的黄静源、汪先宗事件，给了湖南群众以深刻的教育；群众更加认识军阀的残暴，进一步发展了迎接北伐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随即准备领导群众驱逐赵恒惕的实际行动。赵恒惕也加紧压迫群众的革命活动。一九二六年二、三月间，由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领导人夏曦、郭亮等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首，联络长沙各群众团体，酝酿成立一个人民的带临时政权性的组织。三月九日在教育会坪召开上万人的市民大会，满街贴着"打倒赵恒惕"、"反对联省自治"等标语。在大会上一致通过了省党部提出的"对付此后湘局主张二十四条"，成立了"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推出工、商、教育各界九人为委员。二十四条主张的第一条即"打倒赵恒惕"，其他还有"请国民政府北伐"、"组织代表民意的政府"、"督促湖南军队讨伐吴佩孚"、"取消苛捐杂税"、"启封赵恒惕封闭之一切团体"、"改良工农待遇"等项。游行群众在赵政府门前大示威，高喊"打倒赵恒惕"的口号。

在这样强大的群众压力面前，赵恒惕于三月十三日自长沙逃走了。

赵恒惕逃走之后，到五月间，赵部叶开鑫受吴佩孚援助反攻长沙，唐生智部被迫退守衡阳。湘中各地农民协会于是展开驱逐叶开鑫的运动。长沙虽处在叶军暴力压迫之下，以工人为主的革命群众仍在积极准备直接武装自己、迎接北伐军的工作。

## 轰轰烈烈的农村革命运动

湖南群众等待北伐军的到来，真有如大旱之望云霓。北伐军一进入湖南，中国共产党即通过各地国民党党部、农民协会和工人、学生团体，动员广大工人、农民和学生直接参战和给以各种支援。北伐军是一九二六年七月五月自衡阳出发的，各路同时进攻，八日克湘乡，九日克醴陵，十日克湘潭，十二日克长沙、宁乡，十六日克益阳……真是秋风扫叶，势如破竹。当时北伐军本身进步的政治与军事因素，以及北洋军阀部队的腐朽等都是北伐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但更基本的原因，还在广大农民和工人的援助。在湖南境内不多的几次战役，如醴陵之役，长沙之役，平江之役，临湘之役，岳州之役等，都是由于农民和工人的参战，以极小的伤亡而取得很大的胜利。农民和工人除了直接作战，阻击溃兵外，其他带路、送信、运输、担架、扫雷、送饭、慰劳、以及战场鼓动、散传单

等，无不踊跃参加。

如叶挺同志领导的最有名的第四军独立团，进攻醴陵泗汾之役的情形："七月十一日北伐军开始分三路进攻，我们有平民救国团（工人、学生共同组成）和农民武装队三百余人分布于栗山坝、泗汾一带。当北伐军进攻时，敌人扼铁江而守，泗汾桥有机关枪对河扫射，河中船只尽被敌掳，北伐军殊无过河机会。此时我武装队将松树炮分置于敌人后方之高阜处，实施袭击，起初一两炮，敌不动，武装队乃更以鸟枪、梭镖等直接进进攻敌人阵线，复以革命军旗帜招摇四周以惶惑其军心。至此，敌军改变其注意力于武装队，北伐军遂得乘机分两处渡河。渡河时，敌军尚严阵不退，后来一面北伐军大队从泗汾桥上冲锋，一面武装队两旁抄击，敌始大败逃走。此次掳获敌团付一名，营长二名，连长四名，兵士三四百人，毙团长一名，营长二名，拾弃枪二三百枝。而第四军独立团只死连长二人，兵士十余人。"（"战士"第十九期，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九日）

又如平江之役："我军于八月十九日拂晓开始攻击，农民即携各种旧式武器及锄锹等大举邦助围攻白石岭，冒弹冲锋，挺勇登山。敌兵大乱。当夺枪械无算，毙敌甚多，并进至离白石岭三十余里之青水岭。敌兵节节退却，死亡载道（所获大炮枪弹无数，概交我军收领）。农民因攻击太猛，阵亡者至十三名。驻晋坑三都段之敌军，因前线溃败，仓皇逃遁。农民曾某见一荷枪之逃兵，即持扁担追击。该兵开枪射穿曾某之腹部，曾犹未知痛楚，仍以扁担猛击，卒夺其枪，将该兵击毙。曾因用力太猛，亦倒地而毙。此次敌军被民众杀死者不下二百余人，民众参战之猛烈，精神之勇敢，牺牲之重大，已可概见。农民所组之交通队，除报告敌军消息与通信外，又以门片、木材等件作船划渡我军于白湖口，致敌军不及退却而缴械。暗探队侦探敌情，被杀被掳十余人。队员李春生，工人也，探知逆旅长陆沄（吴佩孚手下战将），逃至下西街萧曹庙，即报告我军围剿，陆以自杀。向导队之工作，其最著者，由横槎引我军渡狮子岩，至县城北街，敌尚不知，致全军尽被俘虏无逃者。运输队员有运输数十里者，有自请运送不索报酬者。宣传队除平日积极宣传散发传单、画报、标语外，并随我军到前线宣传，鼓励军心，号召民众。慰劳队送茶送水送饭送粥，上火线安慰士兵。疑兵队则遍处山谷，设置松树炮及鸟枪炮竹，不时燃放，有时鸣号擂鼓，扰乱敌军。破坏队毁坏敌军电线，拆断桥梁，断敌归路。"（"湖南民报"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长沙的迅速攻占，与全城秩序的维持，完全得力于工人的直接参战。七月八日北伐军开始总攻击以后，长沙工人群众在"工团联合会"领导下，即准备在城内起义响应北伐军。后以敌军众多，自己缺乏武器，没有成功。七月九日，叶开鑫逃走，长沙人心皇皇，"工团联合会"组织了一千多人的工人保安队，分别把守城内外各要道，维持城内秩序。后来从湘潭溃退到长沙的叶开鑫残部，大多数都被工人保安队缴了械，有几个工人因此受了伤。实际上，长沙的工人阶级这时已掌握了部分武装。工人曾向北伐军第八军请求保持这些武装，或者全部编到第八军去，但是都被拒绝了，武器被第八军收缴去了。有一少部分枪没有交出，后来便成为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基础。

在援助北伐军进军当中，湖南各地工人组织了大批输送队，邦助各种后勤运输，单长沙就由工团联合会组织了三四千人的输送队。安源煤矿和株萍路工人组织的输送队，也在千人以上。

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都有巨大发展。农民由自觉地推动并参与北伐战争，迅速转到发展他们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进而自动提出本身迫切的政治经济的要求，再进而要求参与并管理政权。据各县十一月分的报告，全省已成立县农民协会的有长沙、湘乡、浏阳、湘潭、衡阳、宁乡、益阳、茶陵、南县、澧县、汉寿、衡山、祁县、篮山、慈利、平江、醴陵、宝庆、临湘、耒阳、郴县、宜章、岳阳、常德、新宁、华容、绥宁、临武等二十九个县。成立县农民协会筹备处的有武冈、沅江、新化、永兴、汝城、嘉禾、溆浦、泸溪、临澧、桃源、芷江、麻阳、安乡、城步、攸县、新田、常宁、安化、酃县等十九县；特别区有长沙近郊及株萍路二处，通讯处有零陵、道县、安仁、桂东、资兴、东安、宁远七处。共计区农民协会有四百六十二个，乡农民协会六千八百六十七个，会员人数共计一百三十六万七千余人。

当时湖南农村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情况，在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极详尽、极生动、极热情的叙述。请看，毛泽东同志是这样生动地叙述了当时农民的革命专政："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当时农民对土豪劣绅的斗争是很坚决而猛烈的，同时也做了不少改良风俗和经济文化建设的工作。总括起来，伟大的农民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做了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经济的斗争：一、减租；二、减息；三、减押；四、换租约；五、平粜、阻禁；六、取消"东家"一切超经济勒索，如田信鸡、送工等；七、没收土豪劣绅财产，办农民银行等。

（二）政治的斗争：一、打倒土豪劣绅：算账，罚款，戴高帽子游乡，组织审判，把个别大土豪劣绅大张旗鼓地处以死刑（如长沙枪毙俞敕华大会到二三万人）；二、打倒旧团保制，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三、反对苛捐杂税；四、参与县政权，农民协会力量大的县分，县政府差不多唯农民协会命令是从；五、解散团防局，夺取枪枝；六、反抗不法军队；七、清剿土匪等。

（三）其他反对封建等斗争：禁赌禁烟、剪发放足等改良习俗的工作；办学校，修路，筑塘坝等工作。

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一百多万在贫农、雇农领导下的农民协会会员，推动上千万农民群众，把乡村兜底翻过来了。在农民力量强大的地方，一切封建统治被打得粉碎，真是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社会上各阶层的人，都被卷入到这个变动中，逼得各色各样的人在农

村革命的面前，赤裸裸地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为了进一步“铲除封建余孽，推倒军阀政治，巩固北伐后方，保障革命权力，实现本身需要”，并总结经验，交换各地情况，制定以后的工作方针步骤，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与工人代表大会同时在长沙举行。这是当时轰动全省的一件大事，各地凡有工农革命组织的地方，都为这事开了庆祝会。农民代表大会共到五十二县、二特别区的代表一百七十人，代表有统计的会员一百三十多万人。工人代表大会共到各地区工会及产业工会五十二处，代表一百七十五人，代表会员三十二万六千多人。

大会共开了二十六天，起先几天两个代表大会联合开会听报告，随后分别开会，讨论议案。农民代表大会共议决了三十三个议案，有关农民利益与农村革命工作的问题都一一包括了。其中提案最多的是东佃问题、团防问题、土豪劣绅问题与农民武装自卫问题等。大会完全支持农民用革命手段作政治、经济的斗争。议决了减租、减押（或废押），禁止高利贷，取消团防，组织农民自卫武装等重要提案；并特别强调农民力量统一集中的重要，建议成立全国农民协会（全国农民协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成立，毛泽东同志任主席）。两个大会正式产生了全省农民和工人的领导机关，选出的负责人大都是共产党员。

在大会过程中，各地代表纷纷提出对当地土豪劣绅和工贼的控诉，要求政府法办。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随即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正式成立。各地特别法庭也同时正式成立，一般由农会、工会委员长、党部常委和县长负责组织。

大会进行中最有意义的事件是毛泽东同志出席和作了两次重要讲话。由于毛泽东同志和湖南革命运动的长期深厚关系，他在全省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因此当两个代表大会开幕时，听说毛泽东同志要到两湖一带来考察农民运动，大会就发了电报，请他亲来领导。十二月中旬，毛泽东同志回到长沙的消息传出，代表们高兴极了，于是正式开了一个欢迎毛泽东同志的大会。当时的欢迎通告上说：“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重。去岁回湘，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①外，实以此为最早。后为赵恒惕所知，谋置先生于死地，先生闻讯，间道入粤。此次革命军势力北展，先生为发展全国农运，奠定革命基础起见，遂于前月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大会开幕时，曾电请先生回湘指导一切。……”

十二月二十日午后，两个代表大会联合在教育会幻灯场欢迎毛泽东同志，前来旁听的人很多，楼上都挤满了。据“大会日刊”的摘记，毛泽东同志那天主要讲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或者是要发展工商业，都必须依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十二月二十八日全省农工代表大会联合举行闭幕典礼，再请毛泽东同志作了革命联合战线问题的讲演。据第二天“湖南民报”的记载，毛泽东同志在讲演中指出：反革命方面已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组织，革命方面也应该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他们。毛泽东同志严厉斥责了“惰农运动”之类对农民的诬蔑，和“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

---

① 一九二三年秋冬，水口山工人中的衡山籍共产党员回到衡山白果地方，组织岳北农工会，发动向土豪劣绅的经济斗争。岳北是赵恒惕的家乡，赵当时用武力镇压了农民的斗争，逮捕了许多人，并烧了许多农民的房子。

们内部不要闹事”的反动理论。他说，过去军阀政府时代只准地主向农民作加租加息的斗争，现在农民向地主要求减点租、减点息就是“闹事”了吗？毛泽东同志还特别讲到当时的湖南虽然由“国民政府”所统治，但是实际上还是“国民政府”与赵恒惕共同的统治，因为赵恒惕虽不在湖南了，然而赵的余孽——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在湖南还有很大的势力。

出席大会的代表们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后，必须与反革命作坚决斗争的观念和立场就更加明确了，大家觉得在工作方法和策略上有了更多的把握。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在全省农民、工人大会所作的两次讲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一步广泛和深入发展是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的。

## 在农民问题上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

“农民的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地主豪绅们、国民党右派分子们、北伐军的反动军官们以及一切不满农民翻身的先生们，向农民进行反革命的宣传攻势，造出了各种各样诬蔑农民运动的“理论”和谣言。

最初出现的“理论”是“农民快乐”论。湖南有位知名之士曾在长沙演说过，说他从欧洲走回中国，看见住在破茅屋中的农民，还是表现得很愉快，才知我们中国和西洋的精神根本不同，因而主张“以农立国”，大家回到农村去，“内乱自然平息”。这番“理论”这时就被许多人推而广之，说什么“农民耕田而食，自食其力，怡然自乐”；说什么“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唯农民之心最安乐”……还有人写信给“湖南通俗报”，说农民不苦，劝该报不要做宣传农民苦的文章。其他还有“农民无知”论，说农民只晓得“盲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随后出现的影响最大的反动宣传，便是诬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说农民的减租减息运动是农民“惰性表现”，是“提倡惰农主义”，“因而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时没有人敢公开说农民协会不能办，于是有些人似乎退一步：“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实际上，当时的农会一般都掌握在贫雇农手中，是农民自己起来当家作主。而在地主、土豪劣绅眼中，敢于起来造反的农民，当然都是“痞子”。

另外一种很毒辣的“理论”便是“妨碍税收”、“影响北伐”论。国民党右派分子彭国钧等叫得最厉害，彭当时任岳州关监督。他们说，湖南税收减少是由于农民运动“过火”了；“有钱人都逃到城里，逃到汉口、上海去了，赋税收不到”；“税收不旺，军饷无着，不能为了农民断送北伐”。这是想把一顶妨碍北伐的大帽子压在农民的头上。当时湖南财政困难、税收不旺，确是事实（从赵恒惕时代起从来如此）。但财政困难的实际原因，一是征收人员舞弊中饱，承包“公债”、“借款”的商绅，勒索摊派，贪污很大；二是财政不统一，如“客军”任意“借款”；三是战争影响，商业衰落。当时农民进行经济斗争的一个办法是“阻禁、平粜”，为的是保障民食，阻止地主富农的谷米出境，禁止他们

囤积居奇、任意抬高谷价。后来省农民代表大会作了决议，也就废除阻禁了。反动派借此大肆宣传，说农民“破坏了社会秩序”，“扰乱了北伐后方”。

另外就是各种各样的造谣了。如一九二六年广东盛行一种谣言，说国民政府订了一个“共产章程”，叫做“三三三一制”，又是一种“四四二制”。即田里收获的谷子，三成归田主、三成归佃农、三成归党部、一成归农民协会，叫“三三三一制”；田主佃农各得四成、党部得两成，叫“四四二制”。现在这种“共产章程”——“三三三一制”、“四四二制”，也跑到湖南来了。还有谣言说，办农民协会是为了抽丁，“进了农会的都要当北伐军”。此外就是“共产共妻”、“裸体运动”之类，连上海、天津都传去了，“湖南已经共产了”。

反动派的这种宣传攻势是颇起作用的，很能获得中间阶层的同情。比如当时一般国民党“中派”分子就更加动摇起来，跟在反动派后面做应声虫，说农民只应参加革命工作（就是只应出力），不应有本身的经济和政治的要求，不应在农村中实行阶级斗争；说农民运动可以发展，但不应有“越轨”的行动，不应“胡闹”；说农民“无知识”，农民运动是受人利用；甚至有的人跟着喊农民运动是“土匪行动”，要“取缔农民运动”，“至少要限制农民运动”了。

中国共产党湖南各地的组织当时和这些反动宣传做了许多斗争。在宣传工作方面，除开在“湖南民报”、“湖南通俗报”等大量刊登农运情况、土豪劣绅残杀农民的通讯等外，差不多每一期的“战士”（省委机关刊）上都登有驳斥这些谬论、揭露国民党右派和反革命各种活动的文章。一九二七年三月初并出版了“湖南农民运动问题论文集”的小册子。三月五日出版的“战士”开始连续刊登了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反动派的各种反革命宣传作了最彻底的清算。

除开在城市中集中进行反动宣传外，地主反动派在农村和小城镇中，到处对农民进行各种各样凶残的进攻和屠杀。

一九二六年七月至九月间，北伐军胜利进军的时候，在农村中还没有什么大的斗争，反动派的破坏活动还不很厉害。对于农民的踊跃参战，北伐军的高级军官们还“传令嘉奖”，社会上也是一片好评。可是到十月间，农民的火力集中向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进攻以后，农村中所有的反动势力便迅速猬集起来，向农民进行疯狂的残暴的反攻；在农民协会力量薄弱的地方，反动派更进行先发制人的进攻。

各地反动派最普遍的进攻手段，就是利用旧团防力量，公开残杀农民。农村的团防局都是地主武装，在“枪还没有换肩”的地方，团防无不直接或间接与农民处于敌对地位。北伐军到后，团防枪杀农民事件，较早的有一九二六年八月中旬，宁乡同文镇卸任的团防局长，唆使团丁枪杀乡农民协会委员长梅次成及其他几个农民。九月以后，这类事件便一天天增加了。下面是从当时的“湖南民报”和“战士”等报刊摘下来的一些例子，以见地主疯狂进攻之一斑：

“桂阳土豪雷某勾结团防付局长彭仁寿、工贼李容巨、刘东圃等，派遣团兵，殴打省党部特派员何汉、农民协会秘书刘基岳及其他党员工人数十人，密捕党员二十余人，捣毁县党部，农民协会、县工会，另组非法党部、农民协会、工会。”（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日“湖南民报”）

“攸县东区农民协会会员王日德，因该区团防局长王泽民借戏卖赌，与许多农友向王理诘。王泽民因未遂欲，遂统率武装局兵数十名，将县党部农工委员主任围住劫杀，所有家物摧毁净尽，王日德惨遭枪毙。”（十二月三十一日“湖南民报”载嘉禾农会呈文）

“岳阳团防局长姜子林焚毁农村，拆毁房屋六七栋，惨杀农民多人。”（十二月二十八日“湖南民报”农民代表请愿文）

“澧县北一区团防局捣毁乡农协，捕逮农民，枪杀农民数人。东三区团防局长勾结土匪杀农民一人，捕农民二十余，罚款四百余元。”

“益阳泉交镇一区农协各农友，于十二月二十日参加第八区党部成立大会；该区团防局，平时对于革命分子，特加仇视，适于是日各农友党员群众，经过该区门首时，竟指农协为匪，唆使团兵开枪，击毙农友刘少秋，重伤袁耀仁、胡景福等数名，并捣毁装饰之花轿及供设之总理遗象。”（十二月三十日“湖南民报”）

“湘阴土豪陈伯纯，勾结团防，武装解散农会；安化发现土匪杀戮农民至三百余人；湘东保安司令罗定，无故枪毙攸县东区农协委员长罗震，事实上证明都是土豪劣绅的阴谋。”（“战士”，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

“茶陵二十二都睦乡于三月十六日开会改组农会，劣绅黄卓甫、范冠绥、范桂山等，买动数十流氓，勾结团防局长罗兆鸿，将主席范桂荣包围殴击，范受伤数十刀而毙，他们又将其尸用洋油焚化。”（同上）

当时引起国民党右派“愤愤不平”的彭伯垓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九二七年二月间，宁乡同文镇农民群众，押送有名的土豪劣绅彭伯垓到县惩办。彭事先贿买九十个痞徒用刀棍在中途拦劫，农民出于自卫与痞徒格斗，于是将彭杀了。

在较偏远的城镇中，反动分子还组织各式各样的公开判乱，以至武装暴动。如宜章反动分子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乘庆祝全省农工代表大会开幕，私造农民协会会章，煽惑痞徒与部分落后农民游街，又由团防局领头捣毁第一区农民协会，拷打农会干部。汝城保商队长、团防队长于十二月三日率武装大队，围攻县党部，查封邮电，满城戒严。耒阳反动分子于一九二六年十月革命纪念日，买动痞徒假冒群众名义，捣毁杂税局与榷运局。安化蓝田更发生反动派武装暴动的惨案。当地奸商因店员组织工会，设立消费合作社，感觉对自己不利，于是联络农村土豪劣绅，贿通商团局长，在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日，派武装士兵阻止群众游行示威，在洪水岭地方向群众射击，打死三个农民，打伤几十人。随后又将镇上所有的革命团体、机关尽行捣毁。

除开各种残暴的进攻以外，地主反动分子对农民还施行各种各样的阴谋破坏，如组织假农会、假进步团体；贿买痞徒混入农会组织，挑拨农民内部纠纷；打入和控制国民党下级党部；勾结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利用一切残存旧政权机构。当时差不多所有的地方，地主阶级都有名称不一的反动组织：如衡阳的“白化党”（范石生派恶霸刘魔僧来衡阳招募新兵时组织的，后刘被衡阳群众开大会枪决），湘乡、湘潭、宁乡、益阳的“保产党”、祁阳的“保产会”，醴陵除发现“三爱党”外，更有极端侮辱农民的所谓“打狗会”。有许多地方的县长，当反动势力抬头的时候，就公然站在反动派一边。例如华容安济垸最反动的劣绅陈作梅，被农民群众打死后，县长王彬派团兵、警备队捣毁农民协会，打伤好些农民，后来还请来驻扎岳阳的防军一营对农民示威，许多农民房宅被捣毁了。郴县县长熊

世凤受贿，释放被捕的土豪劣绅。在北伐军中，这时已开始有反动军官公开站在地主豪绅一边，压迫农民。

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湖南农民在打倒土豪劣绅的运动中，不过是杀了少数有名的大恶霸头子，被农民直接处死的全省统计也不过几十人。然而从上述片段材料可以看到，当时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屠杀农民，何止十倍此数！

当时湖南城乡反动派——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奸商工贼、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赵恒惕残余势力、国民党右派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的神经中枢，是以刘岳峙（即刘梅斋，衡山大恶霸地主，一九五〇年四月被人民政府枪毙）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刘是当时国民党省党部的农民部长，有权有势，行事方便。

国民党自一九二四年改组以后，过去许多借党营私、升官发财的分子，仍然大批留在党内。因此当时的国民党曾形成所谓左、中、右三派。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事变之后，右派反动分子又大大抬头了，以蒋介石、戴季陶为首的"孙文主义学会"新右派集团（旧右派集团是西山会议派）到处蔓延开来。一九二六年初，国民党在湖南刚进入公开活动的时候，"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等右派分子，与赵恒惕勾结并受赵指使，对当时革命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进行各种攻击、破坏以至变乱。他们在报纸上刊登诬蔑性的"否认"启事；常德二师曾发生"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与左派学生大械斗、并逮捕省党部特派员的事件。北伐军进入湖南之后，工农群众运动高涨，国民党革命派大规模发展，右派暂时不敢进行公开的反革命活动。蒋介石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到了长沙，看到群众革命威势太高，湖南境内的北伐军还不能掌握，省党部又是共产党员和左派当权，于是表面上尽量讲恭维共产党、拥护湖南省党部的好话；不久就悄悄地率领纪律最坏的他的嫡系第一军，从株州到江西去了。

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间，一方面，湖南农民运动已进入如火如荼的阶段；另一方面，蒋介石正酝酿反革命叛变，组织全国的反革命阵线。迁都南昌问题，解散广州市党部问题，改组湘鄂省党部问题，以及国民党内"稳健派"联日联张问题等，这时一连串发生。"消灭国民党内急进势力"的论调，已在各处传播。这些就促使湖南国民党右派集团，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革命进攻，发生所谓"左社"事件。

国民党右派和地主"保产党"的头子是刘岳峙，其他重要分子有当时省、市党部的重要人员王凤喈、李毓尧、毛懋勋、陈嘉任、王璟等，刘岳峙利用职权，扣留了省党部主张迁都武汉的电报，主张改组湖南省党部，对宁乡农民杀了恶霸彭伯垓，表示"悲愤已极"。刘岳峙"左社"最中心的活动，自然就是破坏直接损害到他们自身权利、地位的农民运动。这班国民党员，过去自称为"改良派"、"稳健派"，但看到革命火焰烧起来了，就狡猾地想用个"美人计"，取个"左社"的名字，以图"鱼目混珠"。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地主兼"农民部长"刘岳峙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保护地主阶级的农民运动纲领——"农运计划"，公然反对农村中的阶级斗争，称农民协会人员为"地痞流氓"，要农民和地主"联络感情"，"注全力于农产物之增加，农业改良之进步"；主张由国民党管辖各级农民协会，如不"服从纪律"，则"分别改组处究"。刘岳峙的这些"计划"获得了所有反革命分子的喝采和中间分子的拥护。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的机关刊"战士"三十五期，发表"何物左社"一文，彻底揭穿

了刘岳峙这一阴谋。同期“一封未发的信致刘梅斋先生”指着刘的鼻子道：“你是收租吃饭的，你本来有‘在朝不为官，在野便是绅’的资格，你的亲戚故旧多是中小地主，你来革命，不过是被赵恒惕驱迫不得已而来。你现在环境比从前好了，所虑的只是家里三百多石租之维持和发展尚成问题，你自然是要用你的手腕，来维持你自己及亲戚故旧的特权的。”

刘岳峙反动派公开发动进攻了。这一反革命活动如果不坚决镇压下来，对于当时高涨的革命形势自然是很不利的。所以以共产党员和左派为主体的国民党省、市党部决定查办“左社”，由市公安局查搜刘岳峙、王凤喈等八人住宅，永远开除刘等八人党籍，封闭他们的活动地盘三湘、纯德、晨光三校（但当时并没有将刘等逮捕起来，加以审判法办）。国民党省党部组织部于二月二十七日，发出“查究党内组党之通告”，号召各级党部、全体同志提高警惕，严密侦察，随时举发，彻底肃清“左社”各种反革命活动。

刘岳峙虽然倒了，但是刘岳峙的“理论”——以和平建设免除农村的“纠纷”，以国民党限制农民的行动，在相当一部分人包括国民党中间分子中，还是很有影响的。“左社”的活动在外县也没有能完全仃止下来，南县、华容等县国民党的许多下级党部，还是为劣绅地主所把持。由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右倾的发展，在“马日事变”以前，湖南打击国民党右派的工作，和农民打倒土豪劣绅的工作是一直并行发展着的。后来到五月上旬，革命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又召集了全省整理党务、清除左社分子的会议。

##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湖南农民运动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文献，是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党内布尔什维克路线思想的结晶。毛泽东同志根据湖南农民在革命大风暴中直接的生动的斗争和生活，加以马克思主义的概括，得出科学的结论，再来指导整个革命的前进。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农民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当时的正确意见虽然被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集团所完全拒绝，因而使大革命遭受了失败，但是对于当时高涨中的湖南农村革命运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湖南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完全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违背了陈独秀的叛徒意志，将湖南农村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组织武装，深入斗争，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

到一九二七年四月为止，湖南全省农民协会会员已发展到五百一十八万人了。据当时各地报告，农会组织的概况如下：

会员满六十万者：衡阳一县。

会员满三十万以上的有湘潭、湘乡、浏阳、平江等四县。

会员二十万以上者：长沙、醴陵、宁乡、衡山、益阳等五县。

会员十万以上者：汉寿、湘阴、岳阳、耒阳、常德、安化、郴县、攸县、华容、宜章、南县等十一县。

会员在五万以上者：茶陵、宝庆、新化、澧县等四县。

会员在一万以上者：安仁、绥宁、泸溪、嘉禾、沅江、桃源、临武、慈利、常宁、新

田、桂东、资兴、酃县、新宁、桂阳、汝城、临湘、长沙近郊区等十九处。

会员在一万以下者：芷江、麻阳、零陵、城步、宁远、道县、溆浦、安乡、兰山等九县。

其中已成立县农民协会的三十五县，成立县农民协会筹备处的十六县，完全统一于省农民协会的领导之下。

这时农民已将土地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的第一项，雇农等提出了“均佃”的口号，广大贫农迫切要求分配土地，有的地方已经自动丈量土地，开始分配土地的行动。农民已普遍有了梭镖，无不热切要向团防抢枪，湘潭、平江、衡阳、益阳、浏阳、宁乡等地，团防反动武装大都被农民群众抢夺过来了，农民自卫军中成立了“常备队”。同时乡村政权已实际归农民协会掌握，农民并进一步要求管理县政权。由于有了前一时期的革命的经验，农民对地主阶级反动派普遍提高了警惕。可是群众运动发展得太快，党的领导远远跟不上去，特别是干部准备不够，因此群众运动的基础这时是不够巩固的。

四月十日，在共产党员、真正左派分子领导下的国民党省党部，发表了“告全省农民书”。这个文告正式明确提出了农民运动的目的是：一、不仅在打倒土豪劣绅、地主，尤在打倒土豪劣绅、地主所赖以生存的封建制度。二、不在减租减息，而在解决土地问题。三、必须使农民取得乡村中的政权，并组织农民自卫军，以镇压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五月初，共产党的长沙、常德、衡阳三个地方委员会，已准备各成立一个武装的工农师，但是并没有能迅速抓紧组织起来。在“马日事变”以前，各地农民武装还是处在零碎散漫状态中；许多地方，旧团防的力量也没有完全解决。

## “马日事变”及其教训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反动派即以他所直接指挥和影响下的北伐军及国民党右派为骨干，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布置对革命的大屠杀；各地反动派无不受到他的鼓舞，加紧血腥的阴谋活动。在湖南，四五月间反动派即积极作宣传准备，大肆散布谣言，说乡里什么都共产了，那天那天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要被共产党杀光……在北伐军中谣言传得特别厉害说，兵士们寄回家去的月薪，都被农民协会没收分配了；军官的家庭都被抄了家（其实当时打倒土豪劣绅只是个别地影响到北伐军军官的家庭，如何键也只是岳丈家被斗了一下）。五月中旬，何键率领的部队，就在湖南各地先后开始屠杀了。五月中旬临湘农民协会委员长李中和被惨杀；十八日常德近郊农民协会委员长被凌迟处死。十九日夜，何键部将益阳县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机关、团体占领，农民自卫军及工人纠察队都被缴械。五月二十一日晨，何部熊震旅的军队，将常德所有的革命团体都包围起来，工会纠察队等起而抵抗，遭机枪扫射，当天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被杀害的约八十多人。

五月二十一日夜十时，驻扎在长沙的何键部三十五军的团长许克祥，突然围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国民党省党部、省党校等一切革命机关，整整屠杀了一夜，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仓促应战，没有能够击退反动派的进攻。当夜被杀害人数无法统计。

“马日”反革命事变发生以后，立即激怒了广大的革命群众。英勇的共产党员组织了长沙附近各县上十万的农民军，拿着各色各样的武器（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枪械），从四面

八方向长沙进军。在长沙外围易家湾等地消灭了一部分敌军后，五月三十日包围了长沙。根据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许克祥团只有千把枝枪），这个进军是可能获得胜利的。但是在最后几分钟，陈独秀因为恐怕"引起整个政局的纠纷"，可耻地取消了进攻长沙的计划。大多数农军因此退却；只有两个大队偶然没有接到命令，冲城攻打，经过英勇的战斗，众寡不敌而败退。这一总退却的结果，瓦解了革命群众的队伍，助长了反革命的毒焰。几天之后，反动派接着进行了全省规模的大屠杀。

这是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的重大历史关节之一。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英勇斗争是可歌可泣的。湖南等地排山倒海的革命风暴，敌人是难以抗拒的。然而中国共产党当时还在幼年时期，历史没有来得及使毛泽东同志正确的革命路线——和中国实际结合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党取得决定性的领导地位；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使得革命人民在这紧急时期不能组织对反革命的有力的反击，因而革命陷入了失败。

毛泽东同志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原因道：

"……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共产党人'发刊词"）

（原载《学习》4卷9期，1951年8月16日出版）

# 〔附〕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的湖北农民运动

田中忠夫

## 第一节 绪　　言

湖北底农民运动，当湖北在军阀底统治之下的时候，不能公开活动，因而尚只萌芽，没有大的成绩。但当时已作农民解放的宣传，捉住一切机会，团结农民，成立农民协会等的组织，当一九二六年八、九月间北伐军克复湖北的时候，便得了能大事活动的效果，这是不能否定的。例如在湖南底平江，农民对北伐军给予极大的援助，这不仅当时的宣传，予先在该处施行农民运动，收了极大的效果。

国民党在国民革命底进行上，努力于占全人口底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底解放运动，

其目的在于农民生活底改善向上，先是唤起农民，使参加国民革命，以取得其政治的地位为第一目的，其次以农民自身底政治的力量改善农民生活为最终的目的。作为运动底阶梯，取下列的三种方法：

一、唤起农民底反帝国主义，谋中国民族底自由平等。

二、指导农民破坏土豪劣绅底势力，组织民主的社会。

三、联合全农民，使努力于自身底生活改善。

其次，来看现在的农民底要求条件：

（一）经济方面的：

一、减低田租；二、减低利息；三、撤废苛捐杂税；四、废止押金及确保租佃权；五、免除凶年时的田租。

（二）政治方面的：

一、改造团防局；二、组织农民自卫军；三、树立廉洁的省、县政府。

国民党为图运动力底集中统一，根据孙中山手定的农民协会章程，使各县组织农民协会，以这为统一单位，县内设区会、乡会，一省设省农民协会，统辖下级农民协会；另外，由国民党底各级党部指导。

## 第二节　农民运动机关底整备

一九二六年九月，革命军克复武汉，九月六日，在汉口设立湖北省党部，农民运动费月额八千四百元，各县党部相继成立，农民运动费占月经费底三分之一。在省党部，指导农民运动的为农民部，指挥中央农民部在武昌设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农民协会。此外，有农民运动委员会，协议农民运动底原则及方法，并定期刊行“湖北农民”，湖北“农民画报”，当各种的农民运动及纪念日，常散布对于农民的宣言，努力于唤起农民。

## 第三节　农民运动人材底养成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央农民部以为有养成从事农民运动的人材的必要，在武昌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收容湖南、江西籍各一百五十名、湖北籍二百名共五百名为第一期讲习生，自三月九日起四个月间，教授三民主义、国民党史、国民党宣传决议案、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进化史、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各国革命史略、中国及世界经济政治状况、中国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底理论及策略、乡村自治、农村教育、农民组织及宣传、军事教练等科学。

## 第四节　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底召集

湖北省党部农民部，指挥湖北全省农民部，召集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于三月初旬举行，其重要决议案凡三十件，内有铲除封建势力、建设农民协会自身底联合战线等八件。这大会开过以后，湖北底农民运动，急剧进展，阵容也整饬了。

## 第五节　农民协会底发展

湖北当在军阀铁蹄下的时候，农民协会底组织，寥若晨星，因而会员也少，一九二六年七月末只七万二千人。但到九月，武汉入于革命军之手，军阀底压迫一扫而光，各地底农民在祝贺占领武汉声中，积极地组织协会，同年十二月末，正式成立了的计二十县，在准备中的计十二县，其他二县，合计三十四县，会员数激增到二十八万七千人。三月初旬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终了，各代表归乡后，更有长足的进展，到四月十日，正式成立了的计二十二县，在准备中的二十县，合计四十二县，区会三百五十，乡会三千一百六十，会员达一百万。其后到五月末，全省六十九县中，组织农民协会的凡五十四县，其中已正式成立的二十二县，会员总数为二百五十万二千六百余人（报告尚未送达的十县不在内）。会员底增加率，每日平均约二万五千人。

各县中会员最多的为黄冈、阳新等县；咸丰、竹溪、光化等县，省农民协会尚未派遣委员，在各自组织中。农民协会会员，自耕农最多，占百分之三十四，小地主最少，只约百分之十二。至于农民协会底内容，在黄冈等，富农与贫农渐次分离，历年是富农站在指挥贫农的地位的，现在正相反，贫农占了指导的地位。

## 第六节　农村底斗争

次于军阀，压迫农民的，是贪官污吏与土豪劣绅。其中后者，在农民解放上，也是必须排除的。国民党与农民一同排除土豪劣绅的理由如次：

（一）土豪劣绅原本是封建制度底遗物，与国民党底“民主政治”根本不相容。

（二）土豪劣绅是军阀底爪牙乃至基础，省议会是大土豪劣绅底集合所，县议会是小土豪劣绅底集合所，各县底团防为土豪劣绅底武装的工具，备有多数的武器，形成乡村军阀，掌握生杀予夺之权。

（三）土豪劣绅，向农民强制地征收不正当的田租、押金及其他附属的负担，榨取农民底膏血。

在湖北，农民协会底组织一进展，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到处轰动，反对土豪劣绅底苛索最为激烈，农民等先以清账（各种公款底清算等）之名做打倒土豪劣绅的题目，其次以麻绳捆缚，使戴了写着“土豪劣绅”字样的帽子，在村中游街，在黄冈等使戴地主收租米时的斗（比普通的大一成）。有时课以罚金，后来且行没收财产、监禁、枪毙等处分了。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底代表者归乡，各县底农民很多了解革命底意义，农民底斗争渐渐激烈；尤其是打土豪劣绅，最积极地进行，各县底土豪劣绅等相继被捕，其中被杀戮的也不少（二、三月份）。

同时，土豪劣绅对于农民的进攻，也猛烈了。土豪劣绅，使其子弟加入农民协会及国民党部，竭力讲求分化政策。乡区底农民协会中农民没有参加的也很多，在圻水等底县党部中，拒绝农民加入；也有利用家族的观念与关系，以族长底权威组织农民协会的。光蛋会、大刀会、拳头队、暗杀队等，都是他们底武器。如此，土豪劣绅不但破坏了农民运

动，而且在阳新县，直接逮捕运动员，甚至浇灌火油烧死了好几个人，直至军队出发讨伐。农民大多未曾武装，缺乏自卫底能力，省执行委员会及省农民协会底指导也欠敏捷周密，常常发生血腥的惨事，阳新、沔阳、天门、监利等县特甚。

将打倒土豪劣绅委诸农民，自不能不有多大的牺牲，所以在湖北，自三月二日起，施行“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了。据该条例第一条，所谓土豪劣绅，是凭借政治、经济、门阀身分及一切封建势力或其他特殊势力（如勾结团防军匪），在地方上有下列行为的人：

（一）反抗革命，或阻挠革命，或作反革命的宣传者；

（二）反抗或阻挠国民党所领导的民众运动者；

（三）勾结兵匪而蹂躏地方党部或党部人员者；

（四）通匪而坐地分脏者；

（五）借端压迫平民而致死伤或损害者；

（六）包揽农村政权，侵蚀公款，劣迹昭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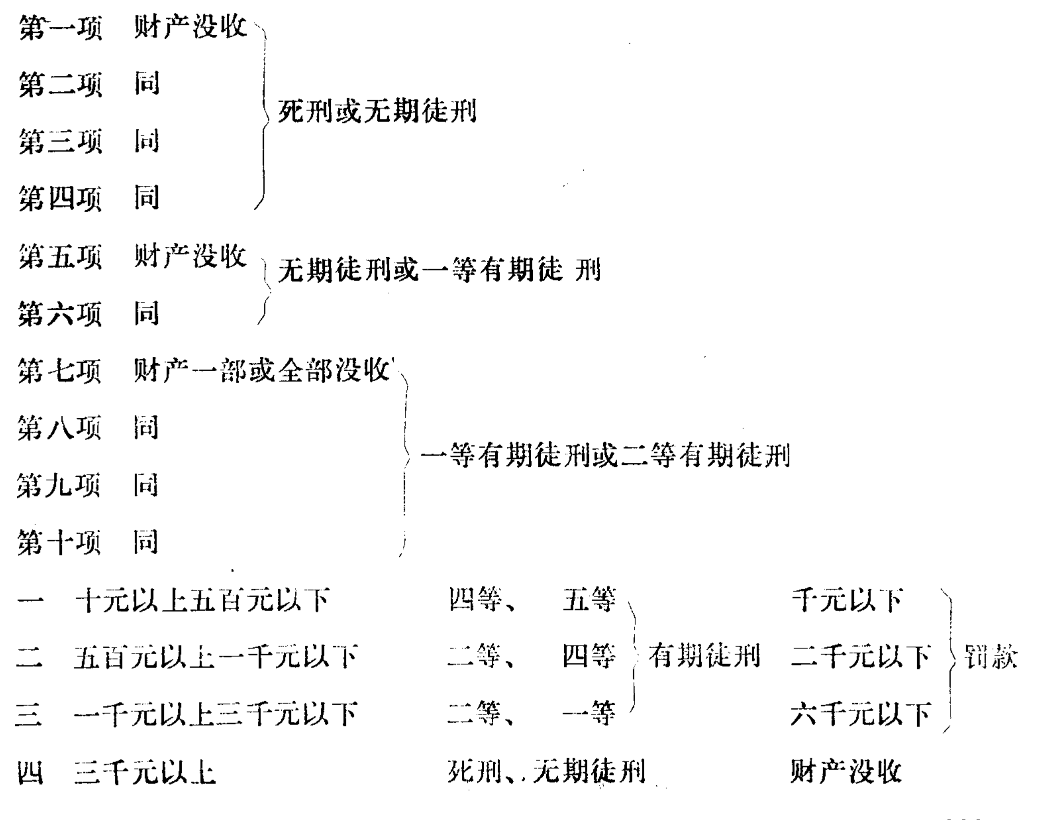
（七）欺凌孤弱，强迫婚姻，或唆嫁孀妇，聚众掳抢者；

（八）挑拨民刑诉讼从中包揽骗诉者；

（九）破坏或阻挠地方公益者；

（一〇）侵蚀公款或假借名义敛财肥己者。

犯上列的罪的，由湖北省土豪劣绅审判委员会审判（第八条），农民无直接的审判行判权，如此的土豪劣绅，于终身剥夺其公权（第六条）之外，根据罪底轻重，照下面那么处罚：



| 项 | 财产 | 刑罚 |
|---|---|---|
| 第一项 | 财产没收 | 死刑或无期徒刑 |
| 第二项 | 同 | 死刑或无期徒刑 |
| 第三项 | 同 | 死刑或无期徒刑 |
| 第四项 | 同 | 死刑或无期徒刑 |
| 第五项 | 财产没收 | 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 刑 |
| 第六项 | 同 | 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 刑 |
| 第七项 | 财产一部或全部没收 | 一等有期徒刑或二等有期徒刑 |
| 第八项 | 同 | 一等有期徒刑或二等有期徒刑 |
| 第九项 | 同 | 一等有期徒刑或二等有期徒刑 |
| 第十项 | 同 | 一等有期徒刑或二等有期徒刑 |

| | 数额 | 有期徒刑 | 罚款 |
|---|---|---|---|
| 一 | 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 | 四等、 五等 | 千元以下 |
| 二 | 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 | 二等、 四等 | 二千元以下 |
| 三 | 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 | 二等、 一等 | 六千元以下 |
| 四 | 三千元以上 | 死刑、无期徒刑 | 财产没收 |

本条例发布后，其实施权在农民协会等底掌握中，如此，农村底斗争，已由政治的而为经济的了；由于土豪劣绅底打倒，没收其财产，由于财产底没收，打倒大地主。

## 第七节　农村政权底形式

农民协会对于政权底获得很是急剧，如保卫团底收回也自动地解决了。各种纠纷底解决，从前是由乡绅办的，现在这种政权也移到农民协会底手中了。一部分的农民协会，在乡村中，有相当的权力；尤其是下层农民协会，至于接受夫妇争吵底仲裁了，如农民运动稍发达的阳新县，民事案件也少，司法委员颇为闲散。官厅多年不能解决的悬案，由农民协会解决了的也不少。

作为乡村底政治组织，成立了财产保管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等；其经费，由没收土豪劣绅底财产，或向富者募集款项充当。

## 第八节　农民武装问题

有武器的农村，在省底西北部稍多；但其大半，在土豪劣绅底手中，不但不能充作农民底自卫，反而来压迫农民。

在国民党，为了农民底自卫及后方底防备，有附属于农民协会，编成农民自卫军的方针，省农民协会以为如每县底农民有四百枝手枪，后方的防备便更能巩固，主张散处于各乡区的枪械（约三千枝内外）底集中；同时，以为农民协会会员，有各自携带手枪及其他武器的必要，各县派人到武汉，交涉枪械底购买，政府不许。

别一方面，湖北省党部，向湖北政务委员会，请求设置农民自卫军，其理由，在于地方自卫底统一及革命基础底巩固。其实行方法，试约举于下：

（一）目的——统一地方底自卫，减轻国防军底任务，巩固革命底基础；

（二）性质——以自卫军为完全保护地方的常备军事组织；

（三）组织——系全省的，对于组织有关系的人民团体及政府，组织一委员会，作为这组织底最高机关。本委员会，对省政府负责。每县设常备军三百名，分驻于全县各要地，每县设总队长一名、分队长若干，受总指挥部底指挥。必要时，得设办事处，在总部底指挥之下，图谋与各地机关联络。

（四）经费——使用各县警备队及保卫团底经费，不足额由省补足；

（五）地域——照江汉道、荆夏道、襄阳道、施鹤道的顺序建设；

（六）干部训练——设立养成所，先由江汉道二十九县，每县派遣党员及农民协会会员十名至十五名，训练期间为三个月。

在如此的计划之下，农民自卫军养成所，于四月一日，在武昌开设了。

## 第九节　农村经济状况

农民运动发展的县份，大多在恐慌状态中。其原因很复杂：卖出底困难，米谷类底价

格被限制，甚至禁止米谷类出境，停止富有者底借贷等，怕是主要的原因。因而设立农民银行，使它成为组合组织，实是当务之急；现在，已组织这种组合，以没收的财产为基金，发行并流通兑换券的地方。但没有运用这种组合的人材，这是缺点。

减低田租及减低利息，虽则还不成为问题，但在因水旱灾等无力纳付田租的地方，农民底经济的努力，已发展到要求解决土地问题了，这是到一、二月为止所予想不到的。地主底多数，不愿奉还土地，但有的因为太恐怖了，奉还土地全部，乞保全生命，有的奉还一部分，保持一部分。但在各乡区农民协会，对于这些奉还的土地，没有适当的处理方法，又省农民协会也没有具体的方针。

## 第十节　农民运动发展中的农村文化

农村文化，原本比诸都市，是很落后的；在都市中，自革命军到来以后，以日增月盛之势，放足、剪发、寡妇再婚、尼姑还俗、自由结婚等运动，很是猛烈。

如在阳新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中，农民提出妇女买卖问题讨论时，会员等因为有抚老养幼的关系，主张可酌量要求抚养费，也有关于抚养底条件，主张应代替金钱买卖的陋习的，这个问题照后者底主张那么解决了。

在一部分的地方，各种迷信被打破，偶象底尊严失坠，人们比诸四书五经更要求政治报告，想知道天下国家底大事。同时，历来的文神武将等门神，以几多的革命的标语代替了；鸦片、赌博，由于农民协会底监视，不禁自绝了。总之，精神的方面，旧社会底基础已渐次粉碎，新政治也开始显现运用底效果了。

## 第十一节　结　　论

以上，略述湖北归于革命军之手以来的，武汉派农民运动底梗概。对于这个运动的批评，由各自的观点，自有极大的差异；但由此，可以想象这次的革命，如何地将中国底农村来现代化了。

（原载田中忠夫编《中国农业经济资料》，1934年3月出版）

# 〔附〕一九二七年五六月份湖北各县农民协会会员统计*

据一九二七年五六两月的报告，湖北全省农民协会的会员共有二百八十四万二千余人。其详细的分布、及农民同志的数量、农运工作同志的数量，据五月份之统计，列表如下：

---

*编者按：

一九二七年五月份湖北各县农民协会会员统计表内数字不符，无从查对更正。

| 地　　名 | 县农协 | 区农协 | 乡农协 | 农会会员 | 党　员 | 农民运动工作负责人数（特派员） | |
|---|---|---|---|---|---|---|---|
| | | | | | | （三月份） | （五月份） |
| 武　　昌 | 正　式 | | | （二月）100,000 | 41 | 18 | 13 |
| 汉　　口 | 正　式 | | | （三月）40,000 | 110 | 28 | 8 |
| 汉　　阳 | 正　式 | 8 | 215 | 113,000 | 43 | 14 | 11 |
| 汉　　川 | 正　式 | | | 70,000 | 318 | 17 | 6 |
| 嘉　　鱼 | 筹　备 | | | 18,000 | | 2 | 2 |
| 蒲　　圻 | 正　式 | 9 | 72 | 40,000 | 145 | 8 | 6 |
| 同　　浜 | 正　式 | 10 | 300 | 120,000 | 81 | 15 | 5 |
| 通　　山 | 正　式 | | | 20,000 | 117 | 28 | 2 |
| 崇　　阳 | 筹　备 | | | 20,000 | 3 | 5 | 1 |
| 通　　城 | 筹　备 | | | 20,000 | | 1 | |
| 黄　　陂 | 正　式 | 7 | 101 | 80,000 | 4 | 6 | 3 |
| 沔　　阳 | 正　式 | 38 | 618 | 194,308 | 58 | 12 | 3 |
| 鄂　　城 | 筹　备 | | | 701,000 | 3 | 5 | 3 |
| 大　　冶 | 筹　备 | 10 | 331 | 64,000 | 20 | 11 | 1 |
| 阳　　新 | 正　式 | 11 | 1,258 | 291,400 | 17 | 7 | 1 |
| 黄　　冈 | 正　式 | 16 | 300 | 240,000 | 643 | 72 | 9 |
| 黄　　安 | 正　式 | 10 | 210 | 56,000 | 67 | 1 | 4 |
| 麻　　城 | 筹　备 | 13 | 340 | 124,000 | 25 | 2 | 2 |
| 圻　　水 | 筹　备 | | | 80,000 | 6 | 2 | 1 |
| 蕲　　春 | 正　式 | 9 | 200 | 20,000 | 6 | 2 | 2 |
| 广　　济 | 正　式 | | | 20,000 | | | 1 |
| 罗　　田 | | 12 | 90 | 35,000 | 220 | 35 | 3 |
| 黄　　梅 | 正　式 | 10 | 253 | 34,032 | 389 | 27 | 7 |
| 孝　　感 | 正　式 | 10 | 30 | 94,498 | 8 | 7 | 3 |
| 云　　梦 | 正　式 | 7 | 30 | 14,916 | | 1 | |
| 应　　城 | 正　式 | 31 | 300 | 35,000 | 8 | 10 | 1 |

| | | | | | | | |
|---|---|---|---|---|---|---|---|
| 安　　陆 | 筹　备 | 10 | 145 | 43,500 | 5 | 21 | |
| 应　　山 | 筹　备 | 8 | 142 | 67,000 | 12 | 9 | 3 |
| 随　　县 | 正　式 | | | 20,000 | 1 | 2 | |
| 京　　山 | 筹　备 | 7 | 600 | 64,000 | 2 | 3 | 2 |
| 天　　门 | 正　式 | | | 57,500 | 67 | 13 | 4 |
| 潜　　江 | 筹　备 | | | | | | |
| 荆　　门 | 筹　备 | | | 30,000 | 2 | 2 | 1 |
| 钟　　祥 | 筹　备 | 29 | 181 | 25,000 | 5 | 1 | 1 |
| 当　　阳 | 筹　备 | 11 | 210 | 70,000 | | 3 | |
| 远　　安 | 筹　备 | | | | | | |
| 石　　首 | 筹　备 | 7 | 105 | 80,000 | | 1 | 2 |
| 公　　安 | 筹　备 | 4 | 72 | 21,000 | | | |
| 监　　利 | 筹　备 | 6 | 61 | 20,000 | | 1 | 2 |
| 枝　　江 | 筹　备 | | | | | | 1 |
| 松　　滋 | 筹　备 | 10 | 37 | 1,700 | | | |
| 宜　　都 | 筹　备 | 1 | | 10,000 | | | 1 |
| 宜　　昌 | 筹　备 | | | 23,000 | 4 | 8 | 4 |
| 巴　　东 | | | | | | | |
| 兴　　山 | | | | | | | |
| 长　　阳 | | | | | | | |
| 五　　峰 | | | | | | | |
| 江　　陵 | 筹　备 | 7 | 267 | 80,000 | 7 | 14 | 5 |
| 襄　　阳 | 正　式 | | | 120,000 | 14 | 13 | 3 |
| 枣　　阳 | 筹　备 | | | 18,000 | 64 | | 4 |
| 光　　化 | 筹　备 | | | 5,000 | 1 | 1 | |
| 谷　　城 | | | | | | | |
| 南　　强 | | | | 20,000 | | | 1 |

| 宜　城 | 筹　备 | 10 | 80 | 10,000 | | | 1 |
|---|---|---|---|---|---|---|---|
| 均　县 | 筹　备 | | | | | | 1 |
| 郧　县 | 筹　备 | | | 1,500 | 9 | 5 | |
| 郧　西 | | | | | | | |
| 房　县 | | | | | | | |
| 保　康 | 筹　备 | 1 | 3 | 1 | | | |
| 秭　归 | | | | | | | |
| 竹　山 | 筹　备 | 3 | 37 | 7,000 | 2 | 2 | |
| 竹　溪 | 筹　备 | 9 | 42 | 5,240 | | | |
| 恩　施 | | | | | | | |
| 利　川 | | | | | | | |
| 鹤　峰 | | | | | | | |
| 建　始 | | | | | | | |
| 宣　恩 | | | | | | | |
| 来　凤 | | | | | | | |
| 咸　丰 | | | | | | | |
| 总　计 | 正式：21<br>筹备：31 | | | 2,692,117 | | 2,106 | 1,806 |

再据六月份之报告则：

（甲）县农协数：县农协二二县，县农协筹备处三二县。

（乙）区农协数：三八〇个（已知的）。

（丙）乡农协数：三、八五二个（已知的）。

（丁）会员总数：二、八四二、二三九人。

党员方面：全省共一万四千余人，散布各县者约七八千人，每县多者百余人，少者亦有数人，均在半公开半政权的状况之下。武装方面各县农民之快枪，多者达二三百枝，少者亦有二三十枝。全省武装的县份，共有枪约二千枝。

摘自"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的报告"，

1927年11月

（转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

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 〔附〕北伐军占领后的江西农民运动

田中忠夫

## 第一节　省农民协会底成立及其活动

江西省一到归于革命军，农民运动立即公然开始了；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九日，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在南昌底省农会内设立了。其内部组织如次：

（一）组织部：设审查股、报告股。

（二）宣传部：设出版股、编辑股、画报股、游艺股。

（三）秘书处：设助理秘书一名、文书三名、庶务会计一名。

又为企图会底发展，及指挥底便利与迅速，作为外部组织，在三个地方设置办事处：

（一）赣东办事处——设于临川，管辖临川、金溪、东乡、资溪、南城、黎川、南丰、宜黄、崇仁、乐安等县。

（二）赣西办事处——设于吉安，管辖吉安、吉水、泰和、万安、遂川、宁岗、永新、安福、莲花、宜春、萍乡、分宜、新喻、新淦、峡江、永丰等县。

（三）赣南办事处——设于赣州，管辖赣县、南康、雩都、崇仁、大庾、信丰、龙南、虔南、安远、寻邬、会昌、瑞金、石城、宁都、兴国、广昌等县。

省农民协会筹备处一设立，即开始盛大的对农民的宣传，发行画报三期，小册子五种，血潮社画报三期，标语二十种各一万份，同时努力于农民底组织，在三个月间，会员从五万增加到三十余万，协会组织从六县扩大到五十四县。但因系急激的发展底开始，所以多下述的组织上的错误及幼稚点，这是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所承认的。

（一）筹备处底内部组织不完全，对于各地协会只仅少的指导与纠正，没有全体的指导与全部的计划。其中，宣传工作不充分，出版物很少。

（二）各县农民协会，或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在组织协会之前，宣传不足，因而入会者少，并且不了解协会底性质，对于协会增加怀疑的人。

（三）各县概偏重于数量底发展，而忘却了质量底训练。

（四）太依赖政治，而轻视会员自身底势力。

（五）各县协会概缺乏调查工作，因而没有行动底标准；省协会也因没有各地底调查报告，不能决定适当的策略及提出适当的口号。

（六）各级协会概不从事经常工作，因而气息奄奄。

（七）各级协会概不注意非常工作，会员与协会底关系很不密切。

（八）因为没有由各县协会向省协会的详细的经常报告，因而省协会没有指导的方法，两者的关系很不密切。

（九）各协会概无纪律，因而团体不能健全并不能发展，组织不严密，力量微薄。

（一〇）不经历斗争，力量微薄。
（一一）缴纳会费的成绩不良，会员离开了协会。
（一二）不注意于农村妇女底入会。
（一三）协会中，有土豪劣绅在操纵。

## 第二节　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底召集及其重要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在南昌召集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有一百四十一人、代表四十五县到会，正式成立省农民协会。

在这大会中，通过了许多决议案，明示以后江西农民运动底目标。现在，为便利计，分为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部分，来考察重要决议案底要点。

甲、关于政治的

（一）拥护国民党农民政纲决议案。
（二）工农大联合决议案。
（三）农民问题与国民革命决议案。
（四）农民协会与各方面关系决议案。
（五）肃清土匪问题决议案。
（六）扩大对英经济绝交决议案。
（七）统一农民协会组织决议案。
（八）统一度量衡决议案。
（九）严禁烟赌决议案：
一、许可各农民协会直接逮捕烟赌犯，送当地行政机关处罚；
二、督促政府从速制定处罚烟赌犯条例，颁布施行；
三、限期禁绝全省底烟赌，违期课以重罚。
（十）摊派军饷决议案：
请愿政府：禁止对十亩以下的农民课赋军饷。
（十一）惩办土豪劣绅决议案：
一、各县农民协会，应与县政府县党部及各民众团体，共同组织审判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
二、对于省党部现在所组织的土豪劣绅审判法庭，省农民协会应联合其他团体派多数的代表参加。
（十二）采用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决议案。
（十三）自卫军组织决议案：
在有土匪底祸害及其他对农民有祸害的地方，除向政府请求派兵讨伐之外，各级协会应组织农民自卫军及义勇队，向政府请求供给武器或请求以廉价供给武器，保护地方，巩固革命底后方。
（十四）清除县政积弊决议案：
一、农民协会有代会员诉讼的权利，凡传票应由该地底农民协会送达；

二、向政府请求立法令，以严禁地租征收局额外征收；

三、规定官厅底法警人数，各县概不得超过三十名，其俸给从正式经费中支出，不得向农民要求酒肴、草鞋钱、传票钱等；

四、征收地租，由钱粮局在传票上明记应该征收的数额号数，不得故意加征。

（十五）促成省民会议决议案：

一、在最短时间，由省农民协会召集各民众团体，发起省民会议筹备处，促成省民会议底迅速召集，建立国民会议底基础；

二、训令各级农会，进行县民会议、乡民会议促成运动，由革命民众掌握一切的政权，使反动派底政治的活动及破坏革命成为不可能。

（十六）确定农民协会经费决议案：

一、省农民协会底经费，由省政府补助之；

二、各县农民协会底经费，从县政府底正税中给予：

| | | |
|---|---|---|
| 一等县 | 每月 | 四百元 |
| 二等县 | 每月 | 三百二十元 |
| 三等县 | 每月 | 二百八十元 |

县等级底规定，由省农民协会颁行之，由省政府使县政府给予；

三、各区乡农民协会底经费，除由县农民协会适当补助之外，以地方底庵产及其他公款补充之。

乙、关于经济的

（一）取缔高利贷草案：

一、根据国民党最近联席会议底决议案，实行减低利息，取消典租；

二、根据江西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底决议案，废止父债子偿制度。

（二）农村妇女问题决议案：

一、竭力向农村妇女宣传，使她们加入农民协会；

二、各级农民协会，设立妇女部，领导她们参加乡村中的政治的经济的各种斗争，使她们引起解放自己的要求；

三、在农民协会经营的学校中，应收容妇女；

四、在女工与男工做同样的工作时，应受同等的工资；

五、严禁童养媳、虐待媳妇，严禁溺杀女儿、穿耳、缠足等；

六、婚姻须女子底同意，反对买卖制度，取消聘金制度；

七、再婚妇在社会上应受同一的待遇，不得蔑视她；

八、凡属会员，不得虐待其妻子；

九、不得虐待私生子；

十、女子有继承财产权。

（三）保护森林决议案：

一、各地既存的森林，农民协会应竭力保护之，不论谁概不得自由盗伐伤害之；

二、凡本会会员，应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旧历二月二十日），各植树十株。

（四）改良雇农生活决议案：

一、雇农一天底劳动时间，不得超越十小时以上（现在有十四五小时的）；
二、雇农底工资，依照各地方底情况，适当地增加；
三、凡定期假日及各种纪念日，给与休息并支付工资；
四、雇农疾病时，主人负担药钱，并支付工资；
五、主人不得无故对雇农解雇，有特别原因时，须得农民协会底同意。

（五）整顿水利决议案：
一、农民协会应积极地在堤防上造成森林；
二、请求政府命全省水利局速行浚渫河道，修理堤防，开设水沟，防御水灾。

（六）合作社决议案：
一、对于各种合作社，向各农民尽力宣传，使农民了解合作社底利益，热心奖励实行；
二、请求政府以各地方底贮米及公款给与农民协会，作各种合作社底基金。

（七）减轻田租决议案：
一、自一九二七年，照国民党最近联席会议底决议案，一律将佃户底田租减少百分之二十五；
二、在水旱虫灾等的凶年，一律免除田租；
三、佃户于纳付规定的田租之外，将一切陋规——如押金、予金、酒肴等——全行废除；
四、地主不得任意收回租地，如有特别原因时，须得农民协会底同意。

（八）开垦荒地荒山决议案：
一、各地的官荒、荒山、荒洲、野塘、荒地，由农民协会接受，分配给没有土地的贫农使开垦之；
二、属于地主管理的，于半年内不开垦时，由农民协会接受开垦。

（九）废止苛捐杂税决议案：
一、政府底征收捐税，应完全用在正当的用途上，绝对禁止滥费、贪官污吏底中饱、额外征收；
二、请求省政府，于最短期间废止盐税附加税，顾及农民底生计；
三、禁止对于自家屠宰、酿造的征税。

丙、对于社会的

农村娱乐决议案：

各级农民协会，设法附设图书馆，置备美丽的图书、画报、农产品各种标本图、一切娱乐器具——如足球、棋、琴、笛等——，供农民观赏使用。

从上列各种决议案，可以看到江西农民是如何被压迫，及他们向如何的方向求解放了。

## 第三节　农民组织底发展

当向一九二六年十月国民党联席会议报告时，只区农会一百二十八所，会员六千二百

七十六人；同年十一月，已到了五万人。更如上所述，省农民协会成立，召集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决定运动目标，江西底农民组织急剧地发展，在一九二七年五月的现在，有：

| | |
|---|---|
| 县农会 | 10 |
| 区农会 | 171 |
| 乡农会 | 2,009 |
| 会　员 | 82,617 |

我们惊异这急剧的发展，同时，未组织的农民还有多数，将来随伴江西农民运动底发展，更能期待可惊的发展。

（原载田中忠夫《中国农业经济资料》，1934年3月出版）

# 〔附〕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全国农民协会会员的两个统计

## 一九二六年全国农民协会会员统计*

（一九二六年六月三日截止）

| 类别 数目 省名 | 已否成立省农民协会 | 各级农民协会数目 | | | | 协会会员人数 | 备考 |
|---|---|---|---|---|---|---|---|
| | | 县 | 区 | 乡 | 合计 | | |
| 广东 | 已成立 | 23 | 177 | 4527 | 4727 | 647766 | |
| 广西 | 已成立 | 2 | | 34 | 36 | 8144 | |
| 河南 | 已成立 | 4 | 32 | 238 | 274 | 270000 | |
| 四川 | | 1 | 16 | 63 | 80 | 6683 | |
| 湖南 | | | 44 | 43 | 87 | 38150 | |
| 湖北 | 已成立 | | 13 | 25 | 38 | 4120 | |
| 山东 | | | | 12 | 12 | 284 | |
| 直隶 | | | 6 | 21 | 27 | 1342 | |
| 江西 | | | 6 | 30 | 36 | 1153 | |
| 热河 | | 5 | | | 5 | 2200 | |
| 察哈尔 | | 1 | | | 1 | 600 | |
| 陕西 | | | | 30 | 30 | 1000 | |
| 总数 | 4 | 36 | 294 | 5023 | 5353 | 981442 | |

* 表内所列数目，系根据各省最近报告，或调查所得。但因各省报告多未详晰，而调查亦因限于时间，未能详尽，故其中错漏之处尚多。

（原载《农民运动》，1926年8月1日出版）

# 一九二七年全国农民协会会员统计

（武汉政府农民部，一九二七年六月的调查）

| 数目类别 省名 | 已否成立省农民协会 | 各级农民协会数目 | | | | 会员数 |
|---|---|---|---|---|---|---|
| | | 县 | 区 | 乡 | 村 | |
| 湖南 | 已成立 | 41 | 638 | 13207 | — | 4517140 |
| 湖北 | 已成立 | 21 | — | — | — | 2502600 |
| 陕西 | — | 20 | 141 | — | 3894 | 705160 |
| 广东 | 已成立 | 73 | — | — | — | 700000 |
| 江西 | 已成立 | 10 | 171 | 2009 | — | 382617 |
| 河南 | 已成立 | 4 | 30 | 238 | — | 245500 |
| 四川 | — | 6 | 59 | 334 | — | 33200 |
| 福建 | — | 2 | 16 | 147 | — | 28415 |
| 山西 | — | 7 | — | — | — | 17050 |
| 广西 | — | 2 | — | 34 | — | 8144 |
| 安徽 | 准备成立 | 2 | 30 | 130 | — | 6600 |
| 热河 | — | 9 | 13 | 31 | 35 | 5423 |
| 察哈尔 | — | 1 | — | — | — | 600 |
| 直隶 | — | 1 | 4 | — | 82 | 360 |
| 山东 | — | — | — | 14 | — | 284 |
| 云南 | — | 2 | — | — | — | — |
| 总计 | 5 | 201 | 1102 | 16144 | 4011 | 9153093 |

江苏　无调查，约有会员二三十万。

# 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

周　恩　来

近来有人颇怀疑目前许多民众运动违反了国民革命的方式，颇误会许多革命分子在做非国民革命的工作；这个问题极其严重。我们为国民革命利益与其前途计，有以下的话要说。

不错，某个时代的革命，必须"应时代的需要合环境的要求"；否则，便是"反革命"。所以我们很久就肯定国民革命是中国惟一的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任何被压迫阶级的要求都超不出打倒他们共同的敌人，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以图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解放。质言之，就是要求一个民主政纲的实现。

理论上既无冲突了，我们且看实际上目前民众运动有无超过国民革命的要求，违反了国民革命的方式。

首先说到工人。现时工人运动最易引起非难的，大半是：工会擅自捕人，封闭工厂商店，工人持械游行，强取商店什物。这几件事，我们须研究事实真象。广东职工运动要没有行东厂主、工贼流氓做分裂工会运动，实际上早已团结坚固，很坦平的向前发展了。怎奈要求工会统一，行东厂主却设立行东工会从事破坏。工人因生活痛苦举行罢工，行东厂主却收买工贼从事捣乱。等到破坏捣乱还不足，便雇用流氓殴杀工人，威迫利诱，拆散群众。工人受着这种客观的痛苦，于无可如何之中，乃不得不组织纠察队自卫队以图自卫，逮捕流氓免遭毒打，防守工厂商店门口以免工贼破坏罢工。这些问题久已成为劳资间工人间的纠纷，国民政府只要设法处理，使工人得到生活保障，他们本无须取这种形式。强取商店什物，果是属诸事实，可以窃盗论罪。罢工事件，原是工人受经济压迫过甚，出于不得已之举。条件太高，行动太骤，都有磋商改善的余地；最好就事论事，不必牵动工人运动全体。至于因梧州、潮州惨案而引起的工人同情运动，其责任原在几个不法军人，工人的要求仍不出生命保障。

在乡村，土匪劣绅贪官污吏实是应该肃清的。只要看到近来农民运动人员被害事件之多，便知乡村反动势力之大。实际上农民目前的要求，不过是减租以维持生活，剿匪以保护生命而已。

总之，工农运动并未超过国民革命的要求，而只是国民革命的初步要求：工农的集会自由，工人罢工权，工农生活改善，生命保障等等。至其行动，外间流言说工人要打倒国民政府，打倒某某，实行劳工专政，完全为反动派离间工农与政府之休戚关系。革命的工农知识虽低，但他们需要国民革命之成功，比任何人都感觉急切，决不至如此荒谬以违反

国民革命的方式。且工农群众对于国民政府自始即竭诚拥护，在去岁风雨飘摇之中，更会出其死力，他们岂有不要这种给民众以政治自由的政府，而要压迫民众的陈炯明或张作霖的政府么？不过这类流言，自有工农运动以来便有。但因政府与工农群众的团结一致，故流言亦无伤于我们毫末。

学生运动原也有些纠纷，但始终未出国民革命范围。拿一年来的现象比较，现在总算进步了。若还有不完善处，可从教育机关方面图整顿，从青年运动方面谋改善，这种整顿改善，应从革命的利益方面着想。

商人方面，如除暴安良，保护河道等要求，更显而易见是民主政治的初步利益。

讲到整个民众运动，不管依据孙中山先生的训政方案，或是依据最近政纲关于人民团体的解释，目前广东的民众组织，大家都承认有集议权和建议权了。在党政府方面，须指导这些民众团体的集议和建议，在民众方面，亦因晓得国民党的最近政纲为各阶级民众目前最急迫的需要，故决不会有什么超出国民革命的要求。民众团体除掉接受这个政纲，拥护执行这个政纲的国民政府，并无第二条出路。故民众团体应邦助党政府积极宣传这个政纲及次第施行这个政纲。

第一点说过了，我们再进而问实际上有无许多革命分子在做非国民革命的工作。

在解释国民革命的性质上，人人都承认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为如此，闭关的国家主义派所以为反革命，国际性的中国共产派所以加入国民党，实行国民革命而成为革命分子。目前的中国政治状况，不但帝国主义的锁链——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丝毫没有动摇，军阀尚占有全国三分之二的领土，便是在国民政府领域中半封建势力——贪官污吏、买办、大地主、土豪劣绅、土匪等还遍地皆是。这时候除掉团结各派民主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农阶级，以集中于国民党领导之下向共同的敌人进攻，再没有其他的争斗。在这争斗中，我们可以公然说，共产分子不管在反帝国主义的上海省港罢工中，在东征北伐反抗军阀的血战中，在北中各部为办国民党而遭迁的囚杀中，在工农运动的牺牲中，他们总是最忠实站在前线。他们所流的血，总是洒向国民革命，无一点迟疑，无一点吝惜。一切工作，我们尚找不出非国民革命的证据。我们更很坚确的认定，现时方是国民革命的起首，离成功的途程还很辽远。所以这时候我们希望民主政纲之实现，比任何人都感觉急切。或正因望之急而言之切，遂惹起许多人的误会，也是意中之事。惟当此北向军阀，外向帝国主义，内向半封建势力作决死战的时候，所有革命分子都应团结起来，何况站在革命前线的共产分子，自应与国民党密切地合作，才有打倒我们共同敌人的可能，才能引导工农上解放之路。否则，除帝国主义及国民革命的敌人得到利益外，一切革命分子以至国民革命只有归于失败。

我们高呼：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 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周 恩 来

## 一

我们既肯定而且坚信目前的政治争斗是应为打倒半封建势力而争斗，为实现民主政治而争斗，于是就有人怀疑到目前的革命工作既无差别，何以于国民党之外还有共产党的存在和活动；既有了共产党的存在和活动，便定会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和分裂。

本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三年来已经写得说得很多了。只是我们为目前政治争斗做得更有意义，革命分子团结得愈加了解起见，仍须有以下的回答：

（一）国民革命原是中国各被压迫阶级共同的出路。不过在这革命过程中，各阶级却有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尤其是在民主政治的实施期中，他们更有各自所欲获得的利益。阶级的利益既不同了，被压迫最苦的工农阶级自然需要有专门为他们阶级谋利益的共产党为之奋斗，为其前驱。共产党为工农阶级奋斗并引导其参加国民革命，决无碍于国民党领导各阶级努力国民革命，转而在实际工作上更可收相成相助之益。

（二）各被压迫阶级的共同目的虽在国民革命，但在革命的长期争斗中，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它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实现。所以为工农阶级奋斗的共产党的活动，当然不外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推进国民革命，以防止其它阶级的妥协性在革命中发生不良影响。这种活动，只有于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有利，使它革命成分更加充实，决无与它有冲突和分裂的危险。因为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国民党是革命的，是站在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的，自无须怕这种冲突和分裂。而且证之事实：五卅运动以来，革命的工农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坚持其反帝精神，罢工策略，时时与想和英帝国主义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廖案发生以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派，曾联合一致地与廖案有关的以至反共、反俄、反农工运动的分子奋斗，更分裂出许多不革命分子。结果不但于国民革命以至国民党无损，而革命势力转因是而愈加团结，国民革命才得有今日的发展。

## 二

我们的解释既完，而我们的态度亦更有较具体的表明之必要。

（一）我们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其目的是在打倒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其要求不能超过民主政治的范围。但当着资本家压迫工人谋生活改善的正当要求，或是地主联合一切旧势力摧残农民谋解放的运动，共产党必须站在工农群众方面，为解放他们的痛苦奋斗到底。为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站在工农方面，其争斗、其要求亦自较他人为急迫。这并非超过国民革命，而实是推进国民革命。

（二）我们知道，国民革命是解放目前中国的唯一目的，同时中国国民革命又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承认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分子必须加入国民党共同奋斗。但这不是说中国共产党便失其独立性质而不应再有何种独立主张。国民党的联共政策和共产分子加入国民党，事实上是表示了两党的密切关系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在这个原则之下，共产党除赞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之外，它还应为工农阶级在民主政治范围内提出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并督促国民党政府次第实施。

（三）我们很希望国民党能成功一个无左右之分的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但事实上不能尽如我们所想。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不同的阶级性反映到国民党内自也形成了各派。过去，右派很显然地做了许多反共、反俄、反工农以及勾结旧势力的工作，而左派很坚决地努力于国民革命和民主政治之实现，实行联俄、联共和拥护工农利益的三大革命政策。在这种不同的倾向上，共产派是时时刻刻邦助左派与右派为理论上和事实上的奋斗，从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直到现在。同时共产派还希望右派能彻底了解民主政治，日趋左倾，忠实的国民党党员都成左派。我们态度如此，既不是要分裂国民党，更不是不愿造成整个的革命的国民党。

（四）我们为了上述三种原故——为工农阶级的利益，为共产党在政治争斗中的主张，为对于国民党的希望，均不能不有公开的意见发表。马克思说："共产党最鄙薄隐蔽自己的主义和政见"，所以我们除宣传主义外，还时时有将政见宣布的必要。不过现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我们的政见和批评，是属于善意的，希望党政府能予以容纳，这与对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半封建势力的敌意攻击和破坏宣传根本相反。若国民党同志竟以此善意的批评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造谣离间等量齐观，或竟以批评一些不法官吏军人的谬误设施和批评国民党政府中有些不合宜的处置，便将事实置之不论，而硬说这是污蔑整个国民党，破坏国民政府，均未免近于武断，故陷人罪。譬如近几月来有几件压迫工人摧残农民运动的案件，工农群众的要求，我们的批评，都是希望党政府能惩办这些不法官吏军人，以拥护国民党农工政策。就是左派同志的"国民周刊"上从前亦曾说过："在党政府下，是不应该有这种不助进农工运动，不能利用政治力量去运动的官吏，在本党内是绝对不容那些摧残农工运动或轻视农工运动的党员。党政府应要有铁的纪律去受理。""我们日夕希望民众接近本党，拥护本党，不料这种党员执政权者的一切设施，已使民众退避三舍，这是何等痛恨的事！""……我们正为着本党民众基础着想，我们更是为一般所谓护党派日夕忧虑亡党的着想，在已逐渐觉悟的民众不是能够以革命帽子戴了去盲目的冲动，

在已有组织的民众我们更不能用什么口惠而实不至的假面具去骗他，何况我们在有组织的民众，我们现在急须民众认识本党。发生这种摧残，不特民众不为我有，那时为你们所认为该死的程度，一定不绝起来收拾民众，我们党只有损失，你们杀也杀不尽，杀也杀不来。那是事实，那是十分可虑的。”这些严厉的批评持与我们的批评较，我们的岂得谓过？至若摭拾市上的流言，莫须有的事实，以至绝无关系的各种风潮，都硬指为共产党在挑拨，在捣乱，则三年来我们已受尽如此之骂，左派同志亦曾为此受了许多冤枉，我们又何必置辩！只要国民党革命的同志能了解我们批评的立场，继续努力，国民革命将终归胜利。

我们最后高呼：

一切革命分子团结起来！

一切被压迫阶级团结起来！

# 毛润之同志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报告

（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

弟二月十三日由长沙到武昌兹将各事报告于次。

1．弟十二月十七日由汉口到长沙，参与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大会议案的起草委员会中商量起草各种决议案，此项决议案大体还算切实。十二月三十日大会闭幕，与区委决定将大会代表各同志开一短期训练班，弟做了三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

2．一月四日起往乡下去考察，至二月五日止，共考察三十二天，经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在乡下在县城邀集有经验的农民及农运同志开调查会，所得材料颇不少。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现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在湘潭湘乡衡山三县调查后回到区委向负责同志作了一次详细的报告，在党校团校各作了一次报告，在醴陵长沙二县调查后又在区委作了一些报告。党从前对农运的错误，已经有所改正，其重要点：（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联合战线的议论；今后问题，不在责备谁人破坏联合战线而在共同负责建设一个联合战线。（四）农运分三时期，第一组织时期，第二革命时期，第三建设联合战线时期，无论何地必须经过第二时期，始能度到第三时期，万万不可由第一时期跳到第三时期而不经过一个猛烈打倒封建地主威风的第二时期。（五）湘中湘南各县多数经过了一个烈风暴雨的农村革命时期（第二时期）乡村陷于无政府状态应立即实现民主的乡村自治制度，变无政府为有政府，具体地建立农村联合战线，以免去农民孤立的危险，农村中武装、民食、教育、建设，仲裁等问题也才有最后的着落；目前的湖南政治问题，莫急于完成乡村自治这一点，省民会议，县民会议非在完成村自治之后决无可言。（六）第二时期（农村革命暴动时期）内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因为不过分不用大力决不能推翻封建阶级几千年积累的权力，决不能迅速完成民主革命。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因此农协万万不可请求政府或团防去拘捕所谓“痞子”，只能提出“农协整顿纪律”的口号，自己去整顿那下级农协的“少数不良分子”，否则没有不减损农民的志气增长地主的威风的。（七）阻谷问题是各界的怨府，其实乃多数贫农要阻，只少数富农要放，农协只能处于劝告地位，劝告贫农向富农让步，不能专代富农打击贫农。阻谷所以厉害，全因乡村无政府，不能保障民食，这是政府的责任，不全是农协的责任，要谷米流通只有从速建立新的乡村自治机关负责保障民食。（八）农村间各种冲突，如农工冲突、农商冲突、农学冲突、农党冲突、贫农与富农冲突、农民与政府冲突等，均必须抬出KMT去解决，万不可马上抬出CP的招牌去解决。因此农民中必须普遍的发展K.

M.T让K.M.T去调和敷衍这些极难敷衍的事情。以前K.M.T发展的程度，与农运发展的程度相差的太远，必须大大的在农民尤其在贫农中发展K.M.T组织。（九）农民问题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十）在湖南的许多县农民在乡村中已经完成了民主革命，农民的革命情绪依然非常之高，依现在形势他们简直很迫切的要进行到另一个革命了。这样千万贫农大群众（根据长沙调查：贫农占十分之七，中农占十分之二，富农占十分之一）要进到别一个革命，依我的考察是无论如何抑制也不能长久抑制得下的。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K.M.T更不消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十一）因此无论（A）为应付目前的环境或（B）准备不久要来的革命，我们党都需要一个大大的发展，至小数目湖南党在六月内要发展到两万人（现才六千）有农协会员两万以上的县均须成立地方，这样才有办法。（十二）洪会是一种势力，必须拉拢这种势力，而不可采取打击的方法。（十三）妇女与儿童在乡村起来的形势极佳，妇女尤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不可不加注意。上列十三项，举其要目，详细情形当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处察核并登导报。

# “何 物 左 社”？

（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

林　蔚

“何物左社”！曾见于《左社阴谋之披露》一小匿名传单中，其意并不是说“甚么是左社？”而是痛斥“左社不成甚么”。但到底“何物左社”？是否“CP做的”？是否“CP的准备党”？是否“国民党的干部”？是否“国民党的左派”？是否“真正的国民党”？这在二月二十六日长沙市党部“霹雳一声之清党决议案”中已经解答了：是“少数不良同志勾结无聊政客、失意官僚在党内的秘密组织，是湖南的西山会议派，是湖南的孙文主义学会”。

劈头论定了左社，但左社是怎样发生的？闻国民党左派曾在广东确有一致的要求，这在革命理论上，客观环境上均是必然的趋势；不过此种左倾的空气一到湖南，遂被在湖南吸收的人——中派——变换了。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原因是全国政治的右倾。北伐军猛锐的进展之中，内外反动派均发生恐怖而另求新的压迫民众势力的方法，遂由蛮横镇压的手段，转到分裂贿买的阴谋，不由外面进攻，而从内部破坏，因此所谓国民党稳健派之联日联张，消灭党内急进势力的声浪甚嚣尘上；他如迁都南昌问题，擅改省党部代表大会选举法问题，调兵压迫广东汽车工会问题，调兵解散广州市党部问题，改组湘鄂省党部问题等，都是表明反赤的心迹，以便与奉张日本妥协。这种种现象，反映到湖南的国民党，于是促成了湖南新右派的结合即是左社。第二原因是湖南革命的怒潮。现时的湖南革命浪潮，正在涨着，民主主义的新政治正在建设着，封建政治与军阀政治的基础，即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已根本动摇，而他们却有一剂垂死时的回生汤，就是左社。左社便是各县保产党、巩富党的大同盟，刘岳峙的农运计划提案，就是他们的政治宣言；扣留迎唐回湘与主张迁都武昌之电，就是他们的政策；赞成迁都南昌，主张改组湖南省党部，就是他们的要求；破坏湖南新政纲、破坏国民党纪律，就是他们的行动；“惰农运动”与“精神的统一”，就是他们的理论。

在任何革命斗争的原则上，相反势力断无调和可言，但偏有第三者好来说话，此即俗称之“和事佬”；其实他仍根本立足在反势力一边，毫不顾及正势力方面的利害问题。今者贫困〔农〕民与土豪劣绅的冲突，就是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的斗争，在此中间亦有了“真德谟克拉西与假德谟克拉西”的矛盾。所谓“假德谟克拉西”，就是改头换面的封建势力，美其名曰“改良派”，曰“稳健派”；或不知羞，自命为左派，为革命派。他们很聪明、很巧妙，知道革命已不能消灭，而徒事压迫又不中用，故改用这个美人计，一方保全了自己的权利地位，一方博得“左派”“革命”的美名，可谓投机狡猾已极。刘岳峙就

是这派人的全权代表，故其农运计划之提出决非偶然的，十足代表士绅阶级、地主阶级的思想。盖目前的农民问题是一政治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革命不革命或左右派之测验，可即以赞否农民运动为尺度，（邓演达先生说：农民问题是我们的量尺）。而刘公然反对农村中的阶级争斗，要农民挨饥挨饿注全力于农业生产，专为地主增加剩余价值，并由国民党管辖各级农协，以供刘农民部长的御用。刘之所谓"地痞流氓"，自然是指最革命的贫农阶级；刘之所谓"冲突""纠纷"，当然是指农民最急进的革命行动；而刘则轻描淡写的将其一笔抹杀，把革命的民主的农民运动，变为和平的改良的农业运动。

现在省市党部彻办左社，永远开除刘等八人；省政府亦正在查缉拿办，并已封闭三湘、纯德、晨光三校。这种彻底的清党运动，完全是社会的政治的背景，第一次分化了湖南国民党，并不足惜，亦不足奇。但"什么是左社"的真正答案是什么呢？是孙文主义学会，是戴季陶主义在湖南的小产。

（原载《战士》周报35、36期合刊）

# 《湖南农民革命》序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

瞿 秋 白

“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湖南的乡村里许多土豪劣绅讼棍等类的封建政权，都被这些“匪徒”打得落花流水。真正是这些“匪徒”现在在那里创造平民的民权政治，正是全国的“匪徒”才能真正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有“人”说他们是过分了，但是这是不是人话呢？——至少都是反革命派的话，中国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谁是寇呢？都是失业贫困而暴动的农民。谁是王呢？都是利用暴动农民而得胜的“土匪头儿”。中国的真正老牌国货，便是土匪和官僚。土匪是革命党，官僚便是地主土豪的代表。当然，这些官僚士大夫原本是土匪头儿的奴才。土匪头儿没有得志的时候，总是和失业破产的平民称兄道弟，等到他得志了，他便雇用收买许多士大夫官僚来压迫平民，他便成了地主阶级的代表。如今的世界可大不相同了。西洋外国的世界革命起来了，是把俄国的“土豪头儿”，“巨腹贾”的代表——所谓“察尔”（Tsar）也者，和大资本家，一箍脑儿推翻了。这是谁做成功的事？是工人，所谓无产阶级率领的革命呵，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就起来，他在城市中的斗争足以率领三万万九千万的中国农民。中国农民从今以后渐渐的要脱离土匪头儿的利用，他们现在有了新的领袖——工人，这个新的领袖的利益是和他们相同的，是能率领他们革命到底的，不像土匪头儿似的，事成了自己便去做皇帝。请看湖南的农民已经事实上能将力争自己的政权。他们打倒军阀、省长、知县大老爷、都团团总、土豪劣绅的政治机关。他们打倒玉皇大帝、元始天尊、天下都城隍、城隍老爷、土地公、五圣神、大狐仙的神权。他们打倒宗祠、族长、宗长、房长们、叔、舅、爷的族权。她们打倒父夫舅姑的男权。他们自己的力量解脱自己的桎梏，要将压迫者剥削者，个个正典型。这些龌龊万分的东西，都要他们自己起来，才能扫除。难道这些做过分么？当然，湖南农民的解放是得着国民革命军的邦助。但是战场拚命的国民革命军的兵士是谁？也都是贫困的农民呵！

农民打倒官权，神权，族权，男权是为着甚么？是为着创造自己的民权。他们农民协会的民众参加县政，主持乡民会议的运动；民众而且已经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甚么打官司交钱粮减租阻谷办学堂兴水利……都要自己来管。他们自己来管便怎样？要的是自己经营自己的生活。农民的生活便是土地。农民没有土地，便是如鱼失水。农民要一个国家，他们对于自己的国家，当然愿意纳税。但是，第一，他们必须自己来创造这个国家，第二，他们的国家不许有土豪劣绅私有田地。他们只知道自己耕田所得，分出一部分给自

己的国家，其他一概不能管。他们耕田纳税之外，难道还能承认地主劣绅的“不平等条约”。“率土之滨莫非农土”！中国境内，不要有一个农民纳甚么地主的租；农民只能租国家的田，不能承认“不自耕作坐收田租”的人。这就叫做土地国有。农民自己耕三亩田，享用三亩，耕五亩享用五亩，——这些田地是只属于国家所有，但是耕种的人自耕自享，不能承认地主——这就叫做转地农有！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

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为肃清军阀势力及团结革命势力问题——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三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鉴：

中国国民革命之主要目的，自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之统治及其在中国的基本势力，即实际上垄断全中国一切财政工业及交通机关。而肃清帝国主义所用以统治中国之工具——军阀官僚势力，以间接打击帝国主义，亦为达到此主要目的所必需的手段。

贵党自改组以来，与本党密切合作，共同领导全国革命民众向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及一切反动派作战，经过“五卅”运动，尤其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以来，实行武力与民众结合，全国革命高潮，已摇动了帝国主义及军阀官僚之统治中国的地位。

帝国主义鉴于中国革命高潮中，革命的武力与革命的民众已结成不可侮之势力，彼等对于统治中国之全部优越权利虽尚未根本放弃，而对关税及租界之特权，已不得不表示相当让步。军阀方面，直系之吴孙相继破灭，孤立之奉鲁军阀亦已在苏皖豫晋一大弧线包围之危险的环境中，首尾不相顾，旦夕即有溃败之势，榆关以内，肃清军阀势力，以成革命的统一之盛业，已非理想而近于事实了。

在这样情况之下，帝国主义已经懂得其利用本地军阀做破坏中国国民革命的工具之传统方法，现已不完全实际适合了。于是帝国主义者尤其是帝国主义的日本，指挥其工具奉天军阀，以“南北妥协”“南北合作”“驱除赤化分子”“压迫共产派”“驱逐左派”“共同反赤”等口号勾引其所谓南方稳健分子，这分明是欲用“以赤制赤”之妙计，以离散南方革命势力之团结，以破坏革命，以重新巩固其濒于崩溃之地位。倘使此类流言仅属于帝国主义及军阀的片面宣传，吾人固可一笑置之；奈一月以来，“南北妥协共同反赤”之声浪喧腾于中外报章（详细另纸抄录奉阅），最近日本帝国主义的顺天时报，且有“蒋介石……现正与国民党旧人及中立各派密商反赤，即以反赤名义与北方携手……蒋之联北计划现甚积极，已倩人提出条件”之说，介石同志对于此等流言，不但不曾有一语声辩，而且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纪念周演讲中，竟谩骂武汉的左派为败类，要制裁左派，要制裁共产党，预言共产党将要失败，自称有干涉和制裁共产党的责任及其权力，这似乎是表示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奉天军阀的提议，因此英日帝国主义的报纸，都一致极口称赞他这篇演讲。

在北方将领纷纷脱离讨赤的安国军归附国民政府之时，而国民政府之最高军事领袖反有“以反赤名义与北方携手”之流言，则不独使革命的民众，对于国民政府怀疑，即新附之北方将领亦觉进退失据。此事若系介石同志个人行动，一经贵党最高权力机关明白制

裁，则介石同志当未便一意孤行，将见君子之过如日月之失；倘系贵党多数之意思，则事态便十分严重了，本党为革命前途成败计，不得不具函请教于贵党者一也。

复次，本党自与贵党合作以来，在政治宣传上，在前敌作战上，无时不严责同志为国民革命努力工作，其结果在北京天津保定大连青岛济南开封郑州武昌九江南昌上海南京蚌埠杭州等处，牢狱中无不有共派的囚徒，刑场上无不有共派之血迹，武昌南昌富阳决战中，无不有共派之惨壮的牺牲，自问于国民革命虽无殊勋，亦无大过。在党务工作上，湖南一省，纯粹国民党发展到七万人以上，共派不及其半，他省亦称是，而右派却有“亡党”之谰言。并且我们认识三民主义的革命的国民党，非他国纯资产阶级的落后的国民党可比，尤其是带社会主义性的民生主义，实有与本党长久合作之可能，不图贵党右倾分子时有两党分离之运动。

此次介石同志在第十四次纪念周演讲中，一则曰纠正共产党，再则曰制裁共产党；本党乃代表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匪独不受他党之纠正与制裁，并不愿受他党之扶助，亦不曾受他党之扶助。介石同志所称纠正与制裁之理由，谓共产党党员对待国民党党员加以排挤压迫。使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党中果有排挤，压迫国民党党员之事实，不独国民党得据党纪加以纠正与制裁，即本党最高机关亦应加以处分，然而事实恰正相反。试问本党对于贵党的党务整理案有过异议没有？事实上有违反过此案的决定没有？不但事实上未曾违反过此案所决定，而且为避免纠纷有超过此案所决定以上的退让。中央委员，共派本来不及全数三分之一，新近广东及江西省党部之改选，经贵党中央之圈定，广东十五委员中共派只三人，江西九委员中共派只一人，这是谁排挤谁，谁压迫谁？介石同志自己也说：“譬如中央有一个决议，有一个命令，或委一个干事，有许多同志来问这个决议，这个命令，这个干事，究竟是那一个执行委员提出的？这个执行委员究竟是跨党分子不是？”这又是谁排挤谁，谁压迫谁呢？

在本党的立场，只知随事随时努力工作，对于一切职务分配，一向不愿争持：而在贵党的立场，在革命工作的立场，一切职务之分配，似应以工作能力为标准，不应以跨党与否为前提，倘不以革命工作为前提，而专以防闲跨党分子任职是务，是则只愿共派分子在国民党为挂名党员，还有何合作意义？介石同志为贵党负责领袖之一，对于腐败官僚投机分子方尽量容纳，而于他自己也承认是革命分子的共产党员，却防闲之，排挤之，且一再声言制裁之，这究竟是出于何项动机？贵党最高机关若听任此种状况继续下去，是否有碍合作之精神？本党为两党共同进行革命工作计，不得不具函请教于贵党者又一也。

以上二事，一则关于肃清军阀势力问题，一则关于团结革命势力问题，对于革命前途均有重大意义，故敢于坦率直陈，希即一一赐教是幸。专此，谨祝革命致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 〔附〕南北妥协消息一束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电通社一月二十七日东京电："中国南北妥协之机运渐呈浓厚之状，双方尝有代表往来，结局或将以稳健之孙文主义实现大同团结。"

东方社二月五日汉口电："蒋介石及其干部已取缔过激运动。"

东方社二月十一日北京电述杨宇霆意见："奉军决入豫以牵制南军而图武汉，而驱逐靳云鹗及彰明通赤者；蒋介石若对于共产派加以彻底的压迫，则南北之妥协非不可能之事。"

东方社北京二月十二日电："关于南北妥协问题，现在政客之往来渐形频繁。安国军欲以平定豫局为妥协之紧要政策，目下正在汲汲进行……。"

路透社二月十四日北京电："杨宇霆与梁士詒现谋奉天与国民党间之和解。"同日电通社北京电："张作霖为促进南北妥协机运起见，将于数日中归奉。"

时事新报北京二月十五日电："赵欣伯语人，南北妥协说渐趋有力……。"

二月十六日上海新闻报北京通迅述杨宇霆意见："将来南方如有悔祸之意，能对于赤化分子驱除，奉方亦不愿过为已甚。"

上海申报二月十八日北京电："南北协调某顾问斡旋最力，该顾问日前曾游匡庐，十六日返京，携去条件七，带回条件四。"

东方社二月十八日北京电："李石曾现正代表南方政府与奉天代表折冲。"

申报二月十九日载赵欣伯对电通社记者的谈话："杨宇霆所主张之南北妥协说现已渐趋有力，倘使南方能排除共产主义，则南北之妥协亦非不可能。"

路透社二月二十一日北京电："路透电社及各报访员今日谒见杨宇霆，据称非俟南军排除俄国赤党，决无议和之望。"

东方社二月二十四日北京电：梁士詒关于时局谈话："所谓讨赤，所谓国民革命，要皆不过急进保守两派实现其理想之表面文章而已……中国之事有外人不能想象微妙之作用，外表虽以主义相争，而其内幕仍通声气，均不旋踵即相结合而臻于和平统一实现之时期，余想其时期已不远，当努力俾使实现也。"东方同日又电："梁士詒在其私宅中开会议，讨论南北妥协具体的进行方法，本日依据日前受梁密旨南下探询南方当局及各有力者意见已回京之郑洪年之报告，更进一步讨论具体的方策云。"

三月一日上海商报北京通讯述赵欣伯谈话："现在，南北两方并无感情之冲突，除共产主义而外，政见相同之处甚多，如欲合作，确有可能之性质。即在蒋中正方面，亦尝间接示意北方，极力辩明南方确非赤化；并谓近来对于共产运动抑制甚力，决不令其蔓延，察其语气，似亦愿与北方合作。"

东方社三月二日北京电："孙宝琦通知梁士詒关于南北妥协问题，俟与梁士詒派接洽

后，不日将由天津赴沪，在京之李石曾予言所事告一段落后即赴汉口。”

东方社三月四日北京电：“近因南北妥协问题来京奔走与安国军接洽之李石曾氏，以南北之主张非绝对不能一致，且现下之形势，各方面之意向确有趋于南北妥协之势。故李于昨日出京，继由天津上海转赴汉口，与南方当局进行南北妥协之交涉。”

上海时事新报三月五日杭州通信：“何应钦白崇禧，因前敌均已换防（以鲁军换孙军），特密电南昌方面请示机宜，非奉蒋介石复电，不能贸然开火。直鲁联军系奉军之分系，同隶于安国军，现南北妥协说甚嚣尘上，或将南北分界，划江而守，亦未可知。”

时事新报七日北京电：“张作霖与人谈时局，谓南征在防赤，南方必有自觉之一日，收回主权不用暴力，党军苟驱逐左派，予将抒诚与图统一。”

三月七日北京顺天时报：“据某机关消息，蒋介石因共产党之专横，久已蓄意排斥，前因各方军事正急，对于武汉九江各处战事，俱利用共产派以取胜，蒋之目的本欲占领长江以南为止，因自己之实力骤然不能发展至长江以北，现正与国民党旧人及中立各派，密商反赤，即以反赤名义与北方携手。……蒋之联北计划现甚积极，已倩人提出条件，惟其内容现不能宣布。”

东方社三月九日北京电：“今日报知新闻论蒋介石与共产党之轹轧，谓于蒋氏北伐之动机及思想的倾向观之，氏与共产党不相容，殆无疑义。蒋氏最近优待黄郛王正廷等，渐渐听从于中国实际政治有经验者之言……。”

中国电通社十日北京电：“近日北方南北妥协之声调甚高，据接近杨宇霆氏某要人传出消息，现南昌蒋介石确已派褚某携条件来京，经过李石曾杨度与杨氏（宇霆）协商，惟其条件与协商结果均异常秘密云。”

东方社十三日北京电：“南北妥协运动依然由北方极力提倡，至少将仃止军事行动，实现协定，使者往来于南方各区者继续不绝，人数亦颇不少，传闻最近蒋介石对于北方军事当局所表示之妥协希望及条件已达将表示何等之意志之机运。”

（原载《向导》192期，1927年3月18日出版）

# 〔附〕北伐出师后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进一步干涉的有关资料

## 一、支持北洋军阀，叫嚣国际干涉

### 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疯狂叫嚣要联合各国实行干涉。

（1926年9月）

1日（电），英国每日新闻，鉴于中国近来“仇外”之发展，主张列国采用坚强政

策，谓所谓温和者，实无异屈服，徒使时局日恶耳。又谓英国乃能联合美、日等行使一种共同干涉政策之一国。英国应派专员如李定侯爵其人者前往中国，其人可表明英国“办事认真”云。（3日申报）

9日（电），《泰晤士报》社论称，中国内乱蔓延或将促成列强之共同政策，英国定将加倍出力，以“保卫”其在华人民之“权力与安全”。（10日申报）

9日（电），英国每日邮报社论，谓“在此紊乱时局中，如以压力施诸北京之无助政府，殆无实效可言，惟中国军阀与共产党，对外人与友邦之行动，亦须有一定限制，若逾此限制，则非可容许……，单独的干涉苟能避免，则以避免为是，但东西文明国在扶助中国以拔出之于‘暴乱’之中一举，有共同关系者未尝不可协定一种共同政策也”。（10日申报）

10日（电），《每日电报》社论，谓：“英政府对于中国，急当施积极的政策；共第一步显在觅求愿予助力者，及共利益与英国密切相合者，俾相合作。日本在华之利益与英国在华之利益重要适同，华南共产党排斥英、日，较排斥其他外国为甚，而日政府视莫斯科之主义与政策，厌恶一如吾英，如条约国目下不能结合为一，则英国至少须与日本共同行事，又意国对华政策近今趋势，已表明反对交还上海会审公廨，故意国或能加入挽救时局以利在华外人之企图”。（11日申报）

11日（电），英国《晨邮报》论中国之乱局，谓“……蒋介石为英国商务强顽之敌，且为控制扬子江军队之敌。此种军队若听令自谋，其力能否拒之，实为须加考虑之问题。今日局势有共同行动之可能，在华列强或将‘被迫’出头。英国在华之势力当属海军，此层亦有重作考虑之必要，吾人若能善用驻广州之海军，则或阻止粤军‘侵入’扬子江，然广州或仍将操时局之关键”。（12日民国日报）

11日（电），英国拟至“万不得已”时，将与列强引北伐军注意长江方面，然后一举而冲广东。目下尚须视北伐军之态度如何，再行决定。（12日申报）

12日（电），伦敦星期观察报载称：“中国今日之时局需要外国之共同‘防御’。又谓欲此举之有效的成功，必须举出一国际安全委员会。末谓惜美国与日本均不准备合作，是可叹也”。（15日民国日报）

（1926年10月）

7日，英相鲍尔温，言及中国事件，谓政府不改变共“温和忍耐”之政策，但准备采行任何必要方法，以保护国人之生命财产。（9日民国日报）

（1926年11月）

10日（电），英外相贝尔福在上院回答前工党政府之上院议长巴摩尔爵士之对中国应尽力避免干涉之主张。称：“……中国不能自己整理其家……。”（12日申报）

**大量供应军火与贷款，支持北洋军阀，抵抗北伐军。**

（1926年9月）

15日（电），《顺天时报》社论：今后奉派责任：（一）有名无实之政府，应代以巩固者，树立奉系势力，亦不得已，但人选须取人材。（二）东三省以外新获得三特区及直鲁二省为势力范围，与晋阎相提携，极力维持六省三特区内之和平与秩序，以为北京政府实

力之根底，故奉军支配保定、大名，应堂堂正正公开行之。（三）改造北京，须对外声明负对外条约一切责任，使新政府早得列国承认。（四）对吴、孙稍助，虽为不得已，然为北方政府计，务须以六省三特区门罗主义为要旨。（五）改除中央政府为筹饷机关之谬误，应作为最高政治之大本营，即东三省亦不可再如从前之立于独立地方，并谓黎、段均过去人物，只可尊为老宿，不可使之再上舞台。（16日申报）

（1926年11月）

12日，驻津日军高田司令赴济南，考察鲁军状况。（14日申报）

28日，驻华英使对张作霖表示希望中国有强力之政府以防“赤化”，列国当以援助。（12月1日申报）

（1926年12月）

14日（电）京津报载，使团承认安国军已有决议，荷使谓尚未接到政府通知，故亦并未讨论，使团盼望北方十五省区果能一致听张氏命令，服从“中央政府”，履行条约义务，则列国当然对张有好感。（15日申报）

18日，奉张前派外交处长吴晋赴京访各使团，今回津复命，使团对张个人均表示钦佩，深盼中国早成有力政府。（20日申报）30日，张作霖访荷、英、日、法、美五公使，吴晋随行，外部派靳志陪往。张作霖向外团表示希望各国援助遏止“赤化”，并望谅解安国军之地位。（31日申报）

（1926年8月）

28日（电），岳州国民军首领，经城陵矶海关长通告汉口各国领事，谓：“因恐北军冒用外国军舰旗，故各国军舰通过岳州之际，停止以便检查”。日本高尾总领事拟提抗议。（29日申报）

（1926年9月）

3日，吴军之军舰五艘悬挂英国旗，欲突破金口，卒被北伐军击退。（7日申报）

10日（电），有大批英国钢盔运往中国，以供华兵之用，以三万具运交张作霖。（11日申报）

（1926年12月）

4日（电），张宗昌购德械到青，枪五千、弹四百万、手枪三百、弹十五万、无烟药三万斤。（5日申报）

15日（报），外交界消息，孙传芳向日本（一说系英商洋行）及比利时订购大批军火，计步枪两万支，首批周内送达上海。（民国日报）

23日（电），张宗昌向德定购作战飞机六架，二架已装运来华。（25日申报）

伦敦独立工党发表可靠消息：

劳义（Lioyds）公司已签定合同，输运价值二百万金镑之军械于吴淞青岛方面。此项军用品显系运给北方军阀者。（《向导周报》第五集第187期第2004页）

（1926年11月）

3日，上海国民党市党部为反对日本借款宣言：“……北京当局以军费无着，拟向日本借款五百万元，如果成为事实，则军阀政治又可延长若干时日，而人民所受之苦痛，亦将因之加深。……愿我国民速图之”。（3日申报）

21日，苏浙皖三省联合致电英国公使，港沪英商会，反对英商人以五百万镑借给北京政府充军费，助军阀作战。声明对此项借款之任何担保概不承认。（25日申报）26日，上海总工会及各工会宣言，反对英商贷款军阀作战。声明"在此时间，任何军阀，向任何国家举行借款，以延长内乱者，我全上海工人誓死否认"。（26日民国日报，25、26日申报）

**邦助北洋军阀，逮捕革命党人，镇压革命运动。**

（1926年11月）

26日（电），天津英捕房将党人（中国国民党）江镇寰等十三人引渡于警察厅。（27日申报）同日，英使麻克到天津。（28日申报）27日（电），英使麻克赴蔡园访张作霖。（28日申报）同日，天津警厅长丁振之审讯被引渡之党人十五名，被讯者否认为党员，张宗昌电丁"尽法惩办"。丁决移京军法课核办。（28日申报）同日，京津中外各报大载此事。国民党机关报表示抗议。（28日申报）

28日，英租界搜索党人甚严，且租界添募手枪巡捕二十名维持"治安"。（29日申报）

（1927年4月）

1日，北京使团会议，除日使"不用武力调查南京事件"之意见已得多数承认外，又讨论北方治安问题，决定对天津租界警备，在现状下仍请中国官厅协助维持，至必要时取相当手段。天津英领事布告住英界之中国人民均应受中国管辖，中国当局如有请求，均可引渡。（《东方杂志》第24卷第11号时事日志）

10日，英军用飞机在江阴上海飞行，上海租界英兵越界搜查大厦大学，上海交涉员郭泰祺向英领事提出抗议。（《东方杂志》第24卷第11号时事日志）

6日，北京警厅武装警察会同奉军宪兵，得使团允许，入使馆界包围俄大使馆搜查附属之远东银行及中东铁路办公室，结果拘获中俄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六十余人。……（《东方杂志》第24卷第11号时事日志）

7日（路透社北京电），辛丑和约国开会决定准华兵搜查俄使署，当时与议者，闻一致同意，美使马慕瑞亦无异言。允许状系荷兰公使以领袖资格签字，此事各使署当时皆知之，是以当华兵入界搜查时，各使署卫兵皆退让于旁。俄代使今晨以抗议文送登各报。俄代使本拟昨日午后向外部提出此抗议文，但昨系中国休假日，外部闭门不办事，故俄代使与头等参赞皆折回。抗议文谓华兵所搜查者，为使署之一部，不应侵犯，军警对于被捕诸人，举动极为野蛮，且苛待署中妇女，此事已报莫斯科听候办理云。（9日申报）

## 二、大增侵华兵力，连续制造惨案

**公开炮击北伐军，阴谋在长江流域组织巡逻队。**

（1926年8月）

12日，《民国日报》9日，京函云：各国借口于中国内乱尚未平靖，有增加驻华兵力之主张。对于北京至山海关一带地域"安全"，尤为注意。日、美、英、法、意五国司

令，曾开一度会议，讨论此项问题。兹将议决各国在华驻兵额数及区域，与日本决定增加兵数列之下：

| 国名 | 定额 | 警备区域 |
|---|---|---|
| 日本 | 八百名 | 由山海关至滦州 |
| 英国 | 九百八十名 | 由杨村至北京 |
| 美国 | 一千四百名 | 由滦州至芦台 |
| 法国 | 一千六百名 | 由大沽至杨村 |
| 意国 | 三百八十名 | 由芦台至大沽 |

又日本为“保护”山海关至北京之交通与侨民之“安全”起见，决定增兵如下，并拟增加经费。

一、步兵约两中队二百五十名；

二、步兵炮、平射炮、山射炮；

三、扩充兵舍；

四、经费一百一十万元，临时经常两费皆包括在内。（12日民国日报）

15日（报），美国亚洲舰队各军舰原定九月内始返沪，但据本日美海军人员发表，近日内将有美舰多艘至沪。（15日申报）

19日，留华日本第一舰队之旗舰利根号，本日晨由青岛开抵上海，予定留沪约一星期后，开往汉口。（21日民国日报）

20日，由汉口开往长沙之日本军舰“隅田”号，于本日上午九时在岳州上游三十九哩地点被南军哨兵用枪射击。永野司令官向唐生智严重抗议。（23日申报）

27日，长沙电云：“北伐军命长沙交涉员，通告各国领事，汉口长沙间之水路，已敷设多数之机械水雷，请于作战期内，各国军舰及商船，停止驶行，否则对于一切之危险，不负责任”。各国领事对此，拟提出抗议。（30日申报）

28日，怡和公司之江和（译音）太古公司之沙市轮船由英舰“斯加拉白”号护送开往长沙闻：“如再遭轰击，则英舰拟发炮回击”。（9月2日申报）

（1926年9月）

1日起，英国炮舰用武力强制湘鄂江轮通行。（4日申报）2日，英舰斯克拉勃号在汉口上游五十英里许之堵清宫（译音）附近与江两岸之北伐军开火，互相射击，该舰所有各炮悉行开放，历时两小时以上。（5日民国日报）

14日，美炮舰及法炮舰驶至城陵矶，将通过，被岸上北伐军炮击，该两舰立即应战，发炮还击。（18日申报）

（1927年4月）

8日，英舰在镇江下游十五哩处与守军冲突，开炮八十余响，陆上炮台营房均被毁，该舰亦中陆上所发之枪弹。（《东方杂志》第24卷第11号时事日志）

（1926年11月）

4日，陈铭枢军在德安北袭击联军，迫近九江，日英美各国军舰陆战队一齐登岸，租界已闭门。（6日申报）

9日（电），北伐军第四军政治部向租界当局提出质问三项：（一）租界何故安设大

炮；（二）租界何故断绝交通；（三）租界何故藏纳敌人。并通知：（1）各国商船须受革命军检查；（2）租界是否藏有敌人，须受革命军检查。（13日申报）

7日（文汇报）称：各国于扬子江内组织国际巡逻舰队之议近又复活。此议本系1921年驻京英公使所发起，其舰队行驶范围，包括上海、汉口、宜昌在内。倘见实行，大约将推日本或英国海军司令为最高司令。统率各国舰队云。（7日申报）

**英舰占领广州西堤，破坏省港罢工委员会，威胁革命政府。**

（1926年9月）

4日晨，有英舰两艘，自白鹅潭驶进广州西堤，占省港码头，派兵登岸驱逐行人，拘捕纠察队，将设在码头之纠察饭堂两座拆毁。码头附近船艇斩缆离开，并在河面干涉行驶船只，又架机关枪向市街作准备射击状，罢工会派员劝纠察持镇静，勿乱动，下午，又有英舰一艘驶来下碇。（7日申报《向导》周报第4集第171期1743页）

6日，英舰仍泊西濠口码头舰兵拿去纠察队二名，经交涉后即日放回。工商检验处照常办公，但纠察队不再出勤，以避冲突。（9日申报）

7日，“顺利”英舰武装夺取为纠察队所扣留之专为香港运输之亚细亚船，捆绑值日纠察，抢去船中纠察队之枪械子弹。（《向导》周报第4集第175期1808页）

8日，英舰“梅娜利”号在汕头派水兵到招商局轮船码头，拘去山西号电船，殴打水手及司机，抗不放还。（《向导》周报第4集第171期第1743页）

同日下午，“顺利”舰又对一华艇放枪十余响“示威”并将其扣留。

9日，第一码头之英舰，于舰尾加设机关炮两尊，指向西濠口方面。（《向导》周报第4集第175期1808页）

11日（电），省港总督已发令东方舰队取临机处置。又命驻澳洲及印度之英军准备动员。（12日申报）

12日，驶入省河之英舰完全撤退，各炮穿回炮衣，表示撤销戒严。省港澳码头之水兵，一律回舰。（14日申报）

14日（电），使团悉，英已遵伦敦政府训令，对粤中止压迫，将粤江英舰撤退。（15日申报）

**对万县人民实行了空前大屠杀，造成惨案。**

（1926年8月）

29日，英舰万龙号欲以武力出口，川军第四师派兵四十五名，乘划船往阻，被撞沉没，万龙号在万县入口后，杨森派兵前往质问，英舰当时开机关枪。并勒使船中军士，一律离船。万龙号旋溯江而去，杨森于河岸密布军队并备火炮四门，将万流万通（29日由上流进口）两船扣留。并传令阻止万龙号于上流各地行驶。英舰以炮对准街市，准备开战。（9月4日民国日报）

（1926年9月）

1日，英舰长关于英船万龙事件，对杨森发最后通牒，要求于24小时内，将其全部军队撤去。闻万龙号已在涪州被川军扣留。（4日国民日报）

5日，万县案重庆英领事与杨森间之交涉无结果，英商太古公司之万流、万通两轮驶过万县，杨森欲将其扣留，该两轮快驶，又撞沉小划十余只，死官兵五十余人，惟两轮卒被扣留。英舰由宜昌重庆开来，即以机关炮轰城，约开六十响，因所用为硫磺弹，着物发火，万县城大半焚毁，损失达数千万元，死伤人民数千余人。杨军还炮抵抗，亦死英兵五人，伤二人。（《东方杂志》：国内外大事志）

12日（电），英公使对于外交部关于万县事件之抗议业已驳复。且声称："中国政府若无制止中国军队暴行之能力，英国只可取自由行动。"态度极为强硬。（13日申报）

14日，第二次谋攻万县之英海军，除已开往上游之炮船外，前星期抄炮船克里基特号驶离汉口，"蜜蜂"号于今日由汉口启碇。尚有海军士兵约七十名，今夜乘商船赴宜昌，均拟加入。（16日申报）

17日（电），伦敦《日日新闻》谓杨森与英水师提督间举行谈判之接洽，可以欣慰，盖以为由此可见华人"已悟英人之生命财产必须保护"也。该报谓英国对于万县事件，并无谓中国以责任之意，因知中国正在经过一"仿佛无政府之时代"，但英政府必须赞助极强硬之方法，以"保护英人之生命财产"。（19日民国日报）

20日（电），英海军反提条件三：（一）释放万流、万通两轮。（二）保证英轮航驶，免再干涉。（三）赔偿损失。（21日申报）同日晨，英使署称，英海军当局与杨森之代表在宜昌谈判，已商妥释放被拘之二船，惟此事在外交观点上不能认为了结。（21日申报）同日，英使亦将万县案"抗议"提交北京外交部。认为杨森军及民众排英，并谓杨森扣留万流、万通两轮损失，须按扣留日期"赔偿"，并附英舰死伤人名一单。（23日申报）

（1926年10月）

6日（特约路透电）杨森在扬子江上游所扣留之英船两艘，既无条件交还英员后，英领事与杨森已讨论关于扬子江情形之其他事件。该处与英人利益有关之事态，现已显有"进步"，此为双方谈话之结果。此后杨森管辖区域内当不致再有"干涉"英人航业事，从此兵士不许擅登英商船只。（8日申报）

8日，四川监督季宗孟电外部，谓在宜与英付提督，英领事会商议定办法三条，乃系进行交涉步骤，并未完全解决。一、英付提督暨领事保证于杨总司令交出万流、万通两轮与非英国人之居间人后，迅速处理未了之一切浪沉木船事件。二、英国兵轮如再上驶，英方保证决无对敌意思之行动。三、所有关于万案应有赔偿要求事件，双方均声明保留，以候将来另案交涉。（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一辑第十三册）

15日（电），英领电杨森，请速将抵制事抵止，中有恐引起重大结果语。（22日申报）

**制造汉浔事件，增兵恐吓。要求把上海划为"自由城市"和"中立地带"。**

（1926年11月）

29日（路透社伦敦电）

《泰晤士报》的社论说：

"中国南军深进，此为甚严重紧要事件，外人利益大受危险，英人尤甚。以英政府言，目前国际问题未有甚于此者，英国必须立即设法以保护刻在长江受危险之英人。吾人不可不明白预计者，激起英人将来冲突之机会更多，英之最恶仇敌，现方窥伺时机而作，

若观望犹豫，最属危险。若依赖华人来反动以拒亦化，则亦极无利，盖在华人反动之时，恐英国已未有可保全之物……。”（《向导》周报第五集第180期第1882页。）

（1926年12月）

2日（合众社伦敦电），英政府认汉口形势严重，宜由各国在华海军司令互商同意，举行国际海军示威运动，借以防杜更严重之发展，而保护在汉英侨；并称各国司令宜有权便宜行事，不必再请训令等语。（4日申报）

（1927年1月）

3日，汉口各工团举行新年庆祝，在英租界附近讲演，与上陆戒备之英水兵冲突。英水兵施用武器，死伤民众数人，激动全市公愤，群众集英租界。经党军当局声明负责与领事交涉，群众始散。（《东方杂志》第24卷第5号时事日志）

6日，九江亦有群众与英租界兵巡因细故冲突，英舰及岸上英兵于发空炮及实弹枪后，鉴于事势严重，即将租界交中国宪兵，警权亦暂交出，英侨多退居舰中，惟地方秩序稍乱，中国兵及纠察队入租界维持。（《东方杂志》第24卷第3号时事日志）

上海《字林西报》发表社论，以之恐吓国民政府，谓：“今汉口事件，实为试验国民政府有没有能力，配不配的一个非常机会，中国之将来命运，全视今日国民政府之能否保护秩序，保护外人商业与生命以为决定”。“大英是能忍耐的，但若群众汹汹不休，而国民政府袖手旁观，则英人的忍耐，将至终”。末谓：“今日中国最需要之事，莫如维持秩序，负责任有决断等等，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应当出来给全世界看，证明他们是有权力的，有决断的。如此，他们的许多国际问题就容易解决了”。（民国以年大事年表）

10日，北京使团会议讨论汉口九江租地问题，各使以此案关系各国对华政策，均未发表意见，决分电各本国政府请示办理。……惟英美日等国大增驻中国海军，英驻威海卫第二舰队兵舰鱼雷共27艘已奉调开往上海，并溯长江上驶。（《东方杂志》第24卷第5号时事日志）

《顺天时报》说：“苟排外热增大时，列国间之协调又将坚固，而且将为武力的协调。”

11日《大陆报》云：“英美法日四国政府陆海态度，渐趋重要。据昨日（10日）所闻：（一）美国亚细亚联队海军司令威廉，已奉令自马尼剌来沪，率同战舰几艘，尚不知确数；（二）美国亚细亚舰队全部（自苏彝士至檀香山止）均已奉到十二小时内准备动员的训令；（三）传闻美海军司令威廉将率同驻菲列〔律〕宾美海陆军一旅团来沪，但此说未能证实；（四）美政府已训令海军司令威廉，保护美国利益，如中国境内不拘何处事态有重要发展危及美国人生命财产时，得用武力；（五）英国亚细亚联队海军司令蒂里特昨日到沪，亲自用无线电与各海军官吏通话，商议军事，蒂氏拟赴南京一行，又闻不久将有印度兵一千七百人自南方各处调拨来沪，且盛传将以静安寺路跑马场为驻扎地点；（六）据联合通信所得巴黎消息，法政府已训令驻华各处法领事，竭力保持法租界，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七）日政府尚在严密观察时局之发展，唯决定如日人利益受侵犯时，准备执机宜之应付云。”（《向导》周报第5集第183期第1932页）

同日，上海租界当局亦开始紧急处置，布告在租界内禁止集会游行及宣传并施行大检查，拘捕百余人，更在华租交界处架设铁网障碍物，并声言将尽其可用之方法防护上海租界。（《东方杂志》第24卷第5号时事日志）

18日，（路透社伦敦电）：

“英公司船芳斯号与基杜南号两艘，泊于桑浦顿已有数月，现从事布置，以便早日运兵往中国，闻基杜南号定于本月26日开行，基芳号29日出发。”（《向导》周刊第185期第1960页）同日，（路透社玛尔太电）：

“第一巡洋舰队，除无畏号外，将由波益尔少将统带驶往上海。”（向导第185期第1960页）同日，（路透社伦敦电）：

“英国查桑濮莱茅及扑资茅之水兵一千人，已奉训令准备开往远东，大约一星期内可出发。19日由玛尔太出发赴华之巡舰，为佛罗比摄号、德里号、丹尼号、龙号四艘，其任务亦在保护英人在长江之权利。”（《向导》周报第5集第185期第1960页）

19日，（路透社玛尔太电）：

“第一巡洋舰队，除无畏号外，今晨开往上海，港内英舰均向欢送，舰中兵士欢呼不已。”（向导第185期第1960页）同日（伦敦电）：“英政府派遣海陆战兵一千名，乘舰名徐伦特，于一星期内开往中国。”（《向导》周报第5集第185期第1960页）

20日，（路透社伦敦电）：

“英船梅根狄克号现泊于利物浦，从事布置，以便改作装运水兵前往中国之运兵船。”（《向导》周报第185期第1960页）同日，（路透社玛尔太电）：

“医院船梅恩号，20日左右偕炮船阿菲斯号莱台葆特号赴华，将由驱逐舰华特勒号华尔夫林号护送。”（《向导》周报第5集第185期第1960页）《大陆报》云：

“据联合社北京电称，伦敦已命参谋及管理人赴华，组织警备队，而为之领袖，并有兵一旅，将于星期五日离加尔格打云。”（《向导》周报第5集第186期第1980页）

24日，（路透社伦敦电）：

“陆军部公报称，上海防军将以下述军队组织之：（一）第十三步队，内为米德尔塞斯联队之第一大队，波德联队之第一大队与格林霍华资之第一大队；（二）第二十四步旅，内为余河卫之第二大队，贝福夏与赫福夏之第一大队，波德联队之第二大队与夏文台之第一大队；（三）第二十印度兵旅，总司令为陆军少将邓堪，定明日乘轮赴沪，各队将乘运兵船陆续出发。”（《向导》周报第5集第186期第1980页）

同日，路透社伦敦电：

“飞行将军三十人已抵波资茅，随水兵赴华。……据闻斯加波罗之第五装甲车队已奉命准备，于必要时赴中国。”（《向导》周报第5集第186期第1980页）（1927年1月）

同日，（路透社玛尔太电）：

“贝福夏与赫福夏联队之第一大队及波德联队之第二大队，定星期一日乘美甘狄克号出发，此两大队共约一千七百人，军官连医官看护妇人等，皆随队同行。”（《向导》周报第5集第186期第1980页）

25日，（路透社喀尔喀大电）：“闻英兵一大队将于星期四日登太克里华运船赴华，印兵两大队定星期日续发。”（《向导》周报第5集第186期第1980页）同日，法国增防上海之安南兵二百人已登陆，英国由香港调来之印度兵第一批四百余人亦到，第二批三百人亦已在途，英报载称将有英兵一万六千附以航空队，武装汽车，坦克炮车，医院船即东来。日本将佐世保二十四舰队编入第一外遣舰队，开驶中国，有四艘已抵上海，惟在沪日

侨民意见未一致：有主张租界被侵即与英人一致者；有主张束手旁观，即生命财产受碍亦所不计。（《东方杂志》第24卷第6号时事日志）

27日，（伦敦电）：

“英政府派赴中国之兵，全力在一万九千至二万一千人之间，已开一千，本星期内续开一万一千，均步兵。英海部宣布泊在中国之英舰有巡洋舰六，驱逐舰八，炮舰十五，潜艇十二，灭鱼雷一，其他小舰不计，尚待添派二十舰，大小不等。”（《向导》周报第5集第185期第1981页）

（1927年2月）

4日（泰晤士报），英国海军大臣说：“我们必须保卫我们在上海的利益，要这样做，就只有派遣陆海空军……。在防御问题上，派遣军队越多越好。我们不欲重复哈尔图姆的经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几件事实”第37页）

13日，英兵已到上海之賨溪联队第二大队及格鲁赛斯得希尔第二大队约共二千人，并印度兵五百人正式上陆驻扎。（《东方杂志》第24卷第7号时事日志）

16日，英国第三次派赴中国之兵两船，其第一船二千人已到上海。英要人宣称：上海英兵将以四千为限，名为上海防护军。余军将在香港及他远东英属地登岸，非有急变，不赴上海。（《东方杂志》第24卷第8号时事日志）

27日，英政府所派统率上海防护军之司令官邓肯少将乘舰抵上海，在礼查饭店内设临时司令部。（《东方杂志》第24卷第8号时事日志）

3日，英国向日内瓦联盟大会提议以上海为自由市，置于国际联盟管理之下。（《东方杂志》第24卷第7号时事日志）

5日，北京美公使汉口美领事奉美政府训令，分别向顾维钧陈友仁提出将上海公共租界圈出于战争区域以外之说帖。同日，美政府又向我国南北当道提议，以上海市外五里昼作中立地带。（《东方杂志》第24卷第7号时事日志）

**借口保护侨民，炮轰南京，企图阻挠革命军继续前进。**

（1927年3月）

24日，共产党员（以林伯渠为主要代表）参加领导的第六军与第二军，击溃麕集在南京的十数万直鲁联军，收复南京。当日夜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领事，借口侨民及领事馆受暴民侵害，下令各国军舰开炮向南京城内轰击，毁房屋财产甚多，军民死伤二千余人。（《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第70页）

26日，北京外交团对南京事件之空气甚为紧张，英使有联合各国取猛烈行动之运动，日使因日舰未参与炮击，主张沉静。（《东方志杂》第24卷第10号时事日志）

28日，日本增调驱逐舰8艘，美国增派水兵一千五百名将到上海。（《东方杂志》第24卷第10号时事日志）

26日，日本外交部发表中国时局宣言，为免除日侨恐慌计，派驱逐舰8艘赴上海。同日，美国水兵一千五名奉命开往中国。（《东方杂志》第24卷第10号时事日志）

（1927年4月）

8日，美国政府又决议除昨日所遣水兵外，又续派一千五百人至华。（《东方杂志》

第24卷第11号时事日志）

11日，美、英、法、意、日五国代表向陈友仁蒋介石提出之条件及声明书。全文如下：

下记署名诸人奉驻华各本国外交代表之命，遵照美、英、法、日政府训令，向阁下提出下列条件，此项条件，同时送到于民军总司令蒋介石将军，以期迅速解决3月24日民军在南京对各本国国民暴行所造成之局面。

（一）对于杀戮伤害侮辱及物质上之损害负责任之军队指挥官及关系者全部之适当处罚；

（二）民军总司令应以书面道歉，书中应含有将来对于外人生命财产，无论以任何形式均不为侵害骚扰之明白约定；

（三）杀伤及损害之完全赔偿。

民党当局，应速表示对于前项条件之允诺之意，非使关系国政府满足，则前记各国政府，将至不得不执取认为适当之手段。

附：声明书

3月24日民军入南京城，同日午前午后，均有正式服装之民军组织的军队，对于外国之领事并侨民之身体财产为组织的暴动。因此，美、英、法、意、日五国人民，或有杀戮或伤害者，或有受残虐之暴行生命濒于危险者，亦不在少。其所有物被掠抢夺，且受极端侮辱之待遇，妇女受不可说明之暴行。美、英、日三国领事馆被侵害，其国旗被侮辱，侨居南京之外国人家宅及营造物受组织的掠夺，多有被烧者。

美、英、法、意、日五国政府，对于其代表官及平稳合法从事于职业之本国人民所受此等暴行，出于明白予定计划之下；因此，不得不要求负有责任之民党官厅与以满足之匡正。于此，关系国以一致要求之条项竭力容让矣。无论何等政府，苟于国际团体之中，自觉其对于友邦人民有自己本身之威信与责任者，对于以上三项之处理，其为正当之匡正。盖所有条件，不过包含最少限度之当然措置，此等要求，并非为毁损中国国民之主权或威信而提出者。中国国民之友谊，为关系国政府所确信，同时继续和衷协同之睦谊，且更增尊敬，乃关系国政府所切望者也。此等条件，毋宁为对于中外之一种势力而发，而此种势力，为对宁案应负责任。盖此种势力之活动，使现有中外友谊破坏，而煽动中国国民对于友邦人民不信及嫌恶之暴行者也。（《东方杂志》第24卷第7号）

同日，英国威尔斯团第二大队，米德尔团第一大队，洛桑浦顿文第二大队，苏格兰卫兵第二大队，及第一野战救护队，均于本日开发来华。（《东方杂志》第24卷第11号时事日志）

17日，上海租界由各国开到军队益多，计英兵一万五千余名，尚有四千名即到；美兵已到及将到者六千名，法兵三千名，日兵五千名，有二千名上陆驻防，并即有大队继到，共计连意、葡、西、荷水兵在内将达四万名，法兵之最新式坦克炮五轮亦运到。（《东方杂志》第24卷第12号时事日志）

18日，北京五国公使得本国政府训令，又集议陈友仁南京炮击案复牒事件，英美态度激烈，有封锁扬子江之主张，日本较为和缓。各国对二次通牒有未能一致之势。（《东方

杂志》第24卷第12号时事日志）

29日，北京宁案关系五国公使会议，美使因美政府训令，有脱离五国协调之趋势。日政府虽反对强硬政策。但日使则为英法两使向美使疏通，二次通牒将删去拟定文字中强硬字句，俟各国政府训令提出。（《东方杂志》第24卷第12号时事日志）

（1927年5月）

（10日伦敦电）英外相张伯伦在众院发表关于南京事件之宣言，说：

“处罚南京残杀之问题，遂亦另开新局面，负南京残杀责任之汉口政府，今日已不能统辖南京，至残杀之凶犯，即共产党煽动者已受中国国民政府之重罚，比任何外国势力所做者为尤甚，在上海广州及其他城池激烈派机关已被解散，其领袖亦遭杀戮，汉口之国民政府已失其优势，而只剩一空名而已（？）”（《向导》周报第5集第195期第2129页）

## 列强驻华兵力配置详表

育　干

自从国民革命军占有长江流域，英国对华纷纷增兵；现在国民革命军势力快要到黄河流域了，日本又公然无忌的向山东出兵，同时列强联合进兵华北的声浪，又纷纷传入吾人的耳鼓中，据外人调查，截至五月底间，列强对华兵力之配置约如下表：

华北方面（北京山海关间）

| 国别 | 人员 | 机枪 | 步兵炮 | 炮兵 |
|---|---|---|---|---|
| 日本 | 612（？） | 22 | 6 | 2 |
| 英国 | 1,000 | 25 | 6 | 4 |
| 美国 | 1,340 | 62 | 27 | 4 |
| 法国 | 1,418 | 24 | 4 | 6 |
| 意国 | 457 | 43 | 4 | 2 |

日本在华北（京津）方面兵数绝不止此，5月30日日本于青岛又增兵二千名，以后尚拟续调，予定兵数为一师团，又拟伪满州再出兵一旅。

意国在华北尚有2架飞机备用，彼于华北，本无多大利益关系，不过见奴于英，以谋在地中海活动而得英少许协助耳。

长江流域方面

（一）以上海为中心，列强海陆军势力详数如下：

| 国名 | 陆上兵力 | 军舰 |
|---|---|---|
| 日本 | 2,023 | 14 |
| 英国 | 16,700 | 24 |
| 美国 | 3,500 | 28 |

| | | |
|---|---|---|
| 法　国 | 2,700 | 10 |
| 意大利 | 200 | 3 |
| 荷　兰 | 120 | 1 |

（二）长江一带配置之军舰数：

| | |
|---|---|
| 日　本 | 20 |
| 英　国 | 10 |
| 法　国 | 6 |

（三）汉口之兵力及军舰数：

| | 陆战队 | 军舰 |
|---|---|---|
| 日　本 | 350 | 5 |
| 英　国 | | 5 |
| 美　国 | | 6 |
| 法　国 | | 2 |
| 意　国 | | 1 |

华南方面

日本　华南各地共配置军舰10艘。

英国　在香港有步兵二大队，炮兵七中队，工兵一中队；又广东沙面驻有步兵一中队。

法国　广州湾驻有步兵一中队，炮舰一只。

目下输送中

英国　步兵四大队，炮兵二中队，辎重兵三中队，野战病船一只，飞机一中队(12架)。

美国　陆军一千五百人，飞机12架。

法国　步兵二大队。

（附注）华北驻兵问题发生后，英美军队纷纷调驻京津，上表数目已有变更。

（《东方杂志》第24卷第12号）

## 三、分化革命阵营，另找侵华工具

### 采取软化政策，分化革命阵营。

（1926年12月）

7日（电），英使兰浦生电英要人，谓英政府训令，对内战仍守中立，不许援助任何方面，倘英商不经使领之同意，借款于任何方面，英政府不能担保偿还，请饬英商注意。观此，可知兰氏政策较前任麻克类稍显明。（8日申报）

18日，英对华觉书说：

“英国政府恒持其避免与交战各党派对峙的各政府之间加以何种干涉之态度，且虽见

国内战争所发生之紊乱，中外洪大商务所受之巨损，未与任何党派携手，及以何法干涉民众之喧叹。”（《向导》周报第5集第190期第2050页）

22日，兰浦生抵津，谒奉张略谈片刻，即转车入京，兰浦生谒张时，谓极望中国和平解决，因北伐南征皆足构成大乱，国民党中有左右两派，不能一概抹煞。张谓中国历史向主统一，不能分立，右派余赞成，对左派誓反对。兰谓此系随便谈谈，遂辞出。（23、24日申报）同日，英使过津对外侨称：英人只知做生意，故不愿见恶南方。……（24日申报）

同日（电）英方要人消息，英政府对南方要求分润关税已提议部分容纳，但须将特别新税概行取消，将关税附加二点五，所有原来本税仍交存外国银行缴付中央。此二点五附税作为各省政费，俾南北两方无偏枯。此事闻由兰浦生吐露于陈友仁之前，陈谓南方立脚点重主权，不重利益，苟自定关税，即收入不到二五，亦所欣慰。兰氏以南方口号与维持条约权利之列国见解，无论如何似不能相容，故在汉未得谈判结果。（23日申报）

（1927年1月）

5日英国领事送外交部的对华宣言说：

“英国以前的对华政策，已经到了应行改变的时期，北京政府已失去代表全部中国的资格，中国内部已有一能代表民众强有力的政府，并且说如果中国能从紊乱状况中，建设统一政府，列强亦定变更其前次对华的政策，在中国未能建设强有力政府以前，列强亦应与中国以谅解与同情。”（《向导》周报第5集第190期第2050页）

7日，上海《字林西报》的社论说：

“虽吾人不愿在未得详细报告之前有所评论，然目前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之政治色彩亦不可不加注意。暴动或许偶发的不能前知的，一粒火星可使群众发狂，然而此等暴动能创造历史，并且常常是建立一个新政府的机会。国民党内有温和派（他们主张维持秩序）与极端派（他们主张扰乱破坏），是公开的事。极端派甚憾温和派掌握政府大权。他们对于英公使与国民政府间谅解之可能，极为怨恨。他们深怕他们的活动将因兰浦生陈友仁间之谈判而缩短，他们尤其恐怕的，是英国对华的友谊的提案已博得华人之好感，因而使他们的反英宣传失效。极端派因将利用一切机会再煽起反英的火焰；此非因彼等深恨英国，实彼以为政治活动之手段。国民党中究将何派占胜利，关系于外人对于国民政府之态度，实不在小。

今汉口事件实为试验国民政府有没有能力，配不配的一个非常的机会。一个政府而能保护生命财产商业，则为正当之政府。现在国民政府担任保护汉口英租界生命财产之责任，直到事态能使英国自行负责之时为止。中国之将来命运，今全视国民政府之能否保护秩序，保护外人商业与生命，以为决定，因在华及在本国之愿与国民政府为好友之英人，皆乐观国民政府之能维持秩序与法律，而引以为荣，若国民政府不克负此责任，则吾人甚觉惭愧，即反对国民政府者，见国民政府之能维持秩序与法律，亦将得而与国民政府为友，非然者，彼等反对国民政府之意见将愈坚决。承认国民政府问题之最后决定将于此后数日内国民政府处理汉口事件之态度而觇见之。如果群众是压静了，如果没有罢工与抵制，如果货物能为应付市场之需要而自由进出，如果外人无生命之忧，则国民政府是证明了有权力。非然者，国民政府的前途就可悲观。

今全世界注目于汉口事件。大英是能忍耐的，华人至终将认识究竟谁是他们的朋友。

大英能静待公平之解决。但若群众汹汹不休，而国民政府袖手旁观，则英人的忍耐将至终点。似乎国民政府已担任了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责任了，吾人将观其究竟办到如何样的圆满。当一群极端的暴徒发狂的时候，政府办事是极辣手的，可是亦惟有此等事件方能试验政府是否有价值。中国今日最需要之事，莫如武力维持秩序，负责任，有决断等等。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应该能够做出来给全世界看，证明他们（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是有权力的，有决断的，如此则他们的许多国际问题就容易解决了。换言之，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则保护生命财产与商业的方法一定可以找得。现在是无可躲闪的时机，不论是英人方面或国民政府方面。”（《向导》周报第5集第183期第1931页）

伦敦泰晤士报说：

“英国政府在汉口所取极和婉之态度，当可使粤政府表示其是否果真代表中国人士之思想，抑或别有他种势力为主动。”

又说：

“目下仍切望中国国家主义之代表能善用其智慧，乘机表示其政才，其选择全在彼等之手。”（《向导》周报第5集第185期第1961页）

29日，英外长张伯伦在伯敏汉演说：

“英国对华方针，自去岁关会开幕以前，即以改变当时英国惟一之愿望，……并已准备抛弃其特权，……吾人早经感觉有修约之必要，并希望中国统一政府早日成立，俾能开始修约交涉。……中国对于修约要求之原因有三端：（一）因外人领事裁判权；（二）关税束缚；（三）租界制度，英国对于上举三端，均愿予以变更。……但上述提议，不能使其立生效力，因中国尚在内乱之中。……吾人准备援助陈友仁及任何派之政治家，以政治家妥协之态度，解决一切悬案。”（《向导》周报第5集第157期第1993页）

（1926年11月）

24日（电），对中国局势，美总统柯立芝不赞同武装干涉，除非美领署或美国人民受重大危害则将变计云。（25日申报）

（1926年12月）

3日，华盛顿正式宣称：美政府对粤军在长江条约口岸收回海关事件，决不采取任何方略以阻止之。因此纯系中国长江方面之国内行政，与美政府无关，至在中国各港内之美海军，只用以为保护在华美人生命财产之用矣。（5日民国日报）

19日（电），美政府训令新任汉口、广州、天津总领事巴烈特等，对华仍持亲善人民，对南北派不作左右袒。（20日申报）

（1927年1月）

28日，美国国务卿开洛发表对华政策宣言谓：美国准备以放宽大的精神与中国谈判新条件，如属必要当离他国而单独行事。但在新约未签字及未经参院批准前，美国不能废除现有条约。（《东方杂志》第24卷第6号时事日志）

（1926年11月）

20日（东方社东京电），日本上院议员藤村义朗池田长康两男爵于旅行中国回东京之后，亦发表其中国问题意见说：“今后日本不应仅目北京政府为中心，当以平等之友谊以对待南北两方面及各势力者为要。”（《向导》周报第5集第180期第1882页）

最近清浦子爵之赴武汉，佐分利之来上海（闻亦将赴武汉），便是对南方国民政府态度根本改变的表示。

清浦甚至公开的说："我国对华政策，从来……事实上以北方军阀组织之北京政府为对手，有轻视南方势力之风，正觉遗憾。今主张对华不干涉，自当励行不偏不倚，是对于南方势力应予相当之考虑，本此意义，对华政策须大革新。"（《向导》周报第5集第180期第1882页）

1936年章乃器在世界知识上发表研究现阶段中日问题的任务一文，追述日本破坏中国大革命的一段事实称："前月北京京津日日新闻刊载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永见俊德对日记者发表的'生平最大难意事件'一篇谈话大体是说：'1927年2月，北伐军到达武汉，有席卷长江下游及西北各省的形势，此时，国共如不分家则全国革命的成功，指日可待，一切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将遭复灭，而日本尤甚。因此，当时的日本陆相板垣焦急万状，就派永见和松室孝良两大佐，作破坏中国革命的企图。后永见不幸被捕，几处死，以津日当局交涉，营救得释'"。（民国以来大事年表第93页）

**勾结蒋介石叛变，促成南北妥协。**

（1926年11月）

23日（路透电），蒋介石在南昌总司令部接见外人访员，蒋对美国表示友谊，但谓美国不许菲律宾独立，亦属帝国主义，并谓南军与耶教并无龃龉，不欲干涉教会事业。

（24日申报）

24日（报），美国基督科学指导报："……或指蒋为'赤化'，实则未必然。……倘革命军得最后之成功，中华民国与外人在中华民国之利益，决无不利之可虑……蒋氏不但不与赤俄联盟，且并不为莫斯科所控制。……"（24日民国日报）

（1927年1月）

27日，电通社东京电说：

"中国南北妥协的机运，渐呈浓厚之状，双方常有代表往来，结局或将以稳健的孙文主义，实现大同团结。"（《向导》周报第5集第186期第1985页）

（1927年2月）

18日（北京电）《申报》报道：

"南北妥协，某顾问斡旋甚力，该顾问目前曾游匡庐，16日返京，携去条件七，带回条件四，详情无所悉。闻蒋对主义有所剖解，不承认南方共产，又对俄顾问谓系客卿，且英美日法均有人充南北顾问云。"（《向导》周报第5集第191期第2056页）

（1927年3月）

7日，《顺天时报》载：

"蒋介石进行南北妥协，换人提条件。据某机关消息，蒋介石因共产党之专横，久已蓄意排斥。前因军事正急，对武汉九江各处战事俱利用共产派取胜。蒋之目的本欲占领长江以南为止，因自己之实力现时不能骤然发展至长江以北，现正与国民党旧人及中立各派客商反赤，即以反赤名义与北方携手。……蒋之联北计划现正积极，已责人提出条件，惟其内容不能宣布言。"（《向导》周报第5集第191期第2056页）

21日

（路透社伦敦电）：

“各报皆评论上海之陷落，每日电闻谓今一切多恃蒋介石之态度与彼所能操之势力。”（《向导》周报第5集第193期第2093页）

23日（路透社伦敦电）：

“孟却斯德导报论上海之前途谓：……目前时机尤为相宜，因蒋介石所统率之稳健派，或准备协定，视汉口办法更优惠于外人权利之条件也。”（《向导》周报第5集第93期第2092页）

28日（报）：

当蒋介石到上海的第二天，帝国主义者对他一面指使一面督促的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倘若蒋介石愿意拯救中国人民出于共产党之手，那末他必须迅速而决断地进行起来。”（《字林西报》1927年3月28日）31日（报），上海买办资产阶级组成的法西斯组织“上海工界联合会”，派出虞洽卿、王一亭等去向蒋介石说明保卫上海“和平”、维持上海“秩序”的重要性。蒋介石向他的帝国主义主子们答复说：“国民革命军（按即蒋介石的反革命军队）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尽管目前的阻碍使我们不能互相了解来共同澄清局面，但是我希望可以扫除这些阻碍，使中外的关系更为密切而良好。”（《北华捷报》1927年3月31日）

（1927年4月）

4日，维廉致海军部的函件中曾透露：

“今日必须向蒋介石及广东政府提出要求与最后通牒，否则将采取特殊军事措置，即刻行动”。（1927年美国外交文件卷二）

1927年4月初

美帝国主义的国务卿凯洛格在4月初指示美国驻华公使说：“告诉蒋介石，除非他能表示可以满足我们要求的行动，列强各国将采取认为适当的措施。”（《美国外交文件》1927年第二卷177页）日本帝国主义的外相币原表示，要蒋介石来“维持秩序（按即反革命秩序），压平暴乱（按即中国人民的革命行动）。”并且说：“我们（日本）的意见，是诱使蒋介石独有创举，决定方案，由蒋介石及其健康分子(按即反革命分子)来安排。”（《美国外交文件》1927年第二卷164页）

根据鲍惠尔的记述，上海大屠杀是由于法国租界警察当局，公共租界美国董事费森登和蒋介石的流氓代表杜月笙在法国租界一间密室中阴谋策划的结果。费森登亲口告诉鲍惠尔说：“杜大约化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才完成了他的任务，这时已经有足够的外国军队开到外国租界维持秩序，同时蒋介石也赶来控制本国地区。他立刻宣布国民党军队决不攻击外国人，一如在南京所表现过的那样。他还宣布制造南京暴行（？）的罪犯必将受到惩处。”（国际关系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

# 读了蒋介石二月二十一日的讲演以后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述　之

蒋介石总司令二月二十一日在南昌总部第十四纪念周的讲演，这是一篇很严重的讲演，在目前政治上甚至全部的革命上都有极严重的意义。自蒋介石这篇讲演发表以后，京沪帝国主义的通信社和报纸如东方社通电社路透社顺天时报字林西报等都大吹而特吹，语句之间都表现一种极兴奋的样子，差不多异口同声说："蒋介石已起来反对左派，抑制共产派了。"同时孙传芳张宗昌的上海新申报和西山会议派的上海江南晚报也都大作其社论，对于蒋介石的演说大字登出，大加赞扬，说是："到底蒋介石不错，还能起来抑制共产分子。"为什么帝国主义和反动的报纸通信社见到蒋介石的演说如此起劲，如此得意呢？原来近两月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报纸通信社等不断地发出一种"稳健派蒋介石限制工农反对左派制裁共产派"之流言，希图破坏革命的联合战线，可是在蒋介石本人方面始终还没有公开的表示。迄到二月二十一日的演说一来，于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所发的流言，却得到一个证据，仿佛证明他们不是完全造谣的，这样怎令它们不起劲不得意洋洋呢?!的确，在蒋介石总司令这篇洋洋数千言的演说里，对于武汉的徐谦派大加以申斥外，特别是看重共产派，差不多演说中十分之六七是对共产派说话的，说共产党党员如何强横，他要如何制裁共产党，如说："现在共产党党员，有许多对国民党党员压迫，表示强横态度，如此，我何能不加纠正""共产党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制裁的权力。"这样，与顺天时报所载："蒋介石因共产党之专横，久已蓄意排斥，……现正与国民党旧人密商反赤，即以反赤名义与北方携手！"，和张作霖的军师赵欣伯所传出："蒋介石方面亦尝间接示意北方，极力辩明南方确非赤化，并谓近来对共产主义抑制甚力，决不令其蔓延……"这些流言不是若合符节吗？这在政治的意义是多么严重啊。

我们现在且丢开蒋介石总司令这篇演说的政治意义，来看共产党党员是否真正压迫国民党党员，是否真有强横的行动一层。如果共产党党员真正压迫国民党党员，真正有强横的行动，我以为共产党的高级机关自己便应该加以纠正，加以制裁，完成革命的联合战线。但是事实究竟是怎样呢？果真如介石先生所说："事实上共产党员对国民党员压迫，有强横的行动"吗？介石先生只说"事实上"，而却始终没有举出任何的"事实"，我以为这是不能含糊的，现在应该请"事实"先生出来证实"共产党党员对国民党党员的压迫和强横行动"。在介石先生未举出事实之先，我现在姑就我所知道的"事实"略举出几件：（一）广东国民党省党部选举执行委员会时，张静江禁止各地代表自己选举，而用圈定的方法硬排除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不惜拉进一些陈炯明党羽和国家主义者，违反自己所定的整

理党务案。这是谁“压迫”谁，谁“强横”?!（二）江西国民党省党部的执行委员会之选举，也同样用圈定法排除了共产分子，这又是谁“压迫”谁，谁“强横”呢?!（三）福建的所谓纯粹国民党党员林寿昌等最近也公然在福建政务委员会提出，强迫政务委员会解散福建国民党省党部，理由则谓省党部系共产党把持（其实福建省党部里面只有一个共产党党员），这又是谁“压迫”谁，谁“强横”呢?!（四）我们再追想去年三月二十号的事件，当时孙文主义学会派欧阳格惠东生缪斌王柏龄等，假造蒋校长的命令，骗李之龙开中山舰至黄埔，另一方面则报告介石先生，谓李之龙要请蒋校长赴俄国，结果，造成了三月二十号的冤案，逮捕了在广州第一军中和黄埔的全体党代表共产分子，并牵连及国民党左派罢工委员会以至俄顾问，随后又撤退了在潮汕的金佛庄郭俊等一般CP分子的军官及军事政治工作者，几酿成大惨案，这事是介石先生自己亲身经过的，难道还不明白么?这样的事件，难道外人不知道，真要死后才发露么?这又是谁“压迫”谁，谁“强横”呢?够了，够了，我们很不愿多举，说来实令人悲愤?!我们且专就介石先生演说中自己所吐露出来的话来看。“譬如中央有一个决议，有一个命令，或委一个干事，有许多同志来问这个决议，这个命令，这个干事，究竟是那一个执行委员提出的，这个执行委员究竟是跨党分子不是，这个决议，这个干事，是否真正为本党的。”这是什么意思?这还不明显吗?一个决议，一个命令，委一个干事，都要怀疑到跨党与否，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这里要问国民党用人行政以什么为标准?以革命的利益革命的工作为标准，还是以跨党与否为标准呢?象介石先生所说完全是以跨党的标准来定国民党的命令决议和用人了，我不知道中山先生要CP加入国民党究竟为的什么!唉，对跨党分子是如此，还要说共产党党员压迫国民党，强横，真正有趣哩!

现在一班从西山会议派“悔转过来”的，一班新进来的国家主义者和研究系，或投机分子如段锡明如龚德柏等，都自称为“纯粹的三民主义信徒”或“真正国民党员”，而谓共产党员则为跨党分子，有时甚至认国民党左派亦是跨党者，仿佛一切党权，一切政权都应归此辈所谓纯粹三民主义信徒或真正国民党员掌握；但此辈却完全不知道或忘却了国民党改组以来的发展史，却一点也不明白国民党改组以前是什么一个景象，改组以来几年的工作是何人在那里奋斗，我们可以不客气地说，国民党改组几年的工作差不多是CP和几个左派支持，这是大家应该知道的。现在湖南湖北上海江苏的国民党是谁发展起来的?北伐军未到江西以前的江西国民党是何人作工作?为江西国民党而死的赵醒农是不是跨党分子?在方本仁邓如琢的严重压迫底下奋斗而被监禁的是些什么人，是否是现时操纵江西国民党省党部自称纯粹三民主义信徒的段锡明一班先生们?在广东省党部一向奋斗的又是否系陈炯明的党羽吴倚仑和国家主义者曾显浩等先生们?现在奉系军阀严重压迫下的天津北京是那些人在那儿支持国民党工作;除了几个跨党分子和左派奋斗外，有没有所谓纯粹的三民主义信徒在那儿工作?有许多所谓纯粹的三民主义信徒或老党员在被压迫的时代，被压迫地方，在困苦的奋斗中，我们都没有看见，到了革命快要胜利了，大家都昂起头来，说：“你是跨党分子，你是CP，我才是真正国民党党员，纯粹三民主义信徒。”碰到中央发一个命令，一个决议，委一个干事，都要查问这是否跨党分子所提出，仿佛跨党分子等于被剥夺一切公权的囚犯，这样，怎令人不悲愤!

本来我们对于革命是只顾奋斗，不愿计功的，我们以为革命党人的荣幸便是在革命主

义的旗帜下去奋斗，去牺牲，革命党人应该为被压迫民众的利益而牺牲一切。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完全为了中国工农阶级的解放，为了全中国被压迫民众的解放，中国共产党党员每个人都准备为这伟大的解放工作而牺牲，认为以前共产党党员在各种运动中，在东江北伐以及各种军事斗争中，枪毙杀头监禁阵亡都是预备牺牲的，都是革命的光荣，原无表白之必要；可是有许多人一向反对革命，或对革命持旁观态度，或讥诮革命党的人，一旦看见革命要胜利了，便昂起头来充好汉，自称什么纯粹信徒，什么真正党员，企图排除一切，那我们就不能不检一检查革命历史，计较计较历史上的革命功绩了。介石先生自称是革命领袖，这几年来总算在革命中工作，应该知道谁是革命中勇往奋斗的，谁是临阵退后的，工农运动且不提，单在军事一方面说，自黄埔开办以来，经过二次东征，经过刘杨之役，经过廖案以及这次北伐，跨党分子究竟如何？金佛庄郭俊（最近在富阳战死）章炎曹渊等跨党分子是怎样？惠东生王柏龄缪斌等许多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纯粹三民主义信徒，在攻武昌攻南昌之役是如何？好了，让将来的历史家去评判罢。

复次，蒋介石说到他是中国革命的领袖，他有纠正及制裁共产党的责任，这也是应该说明几句的。第一，我们要认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独立的政党，除共产第三国际外，绝不受任何人的纠正或制裁；在中国国民革命的战线上，自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要密切地诚恳地协商合作，但只是协商合作，而决不是受其什么纠正或制裁。某国民党个人或领袖觉到跨党党员有所谓压迫国民党党员或强横的地方，则只有用合法的手续，即按国民党党纪，把他当一国民党党员加以处分；或由国民党高级机关转告共产党高级机关自己惩治。至于某个人或某领袖要纠正或制裁中国共产党或其党员都是笑话。第二，我们对于介石以前诚然认为是国民党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领袖；但须明白中国革命的领袖不止一个，有工人的领袖，农民的领袖，军事的领袖等，在党的方面则有国民党的领袖，有共产党的领袖；介石先生不过许许多多领袖中之一个。一个领袖不能随便说要纠正一切，制裁一切，这样，只有专制时代的皇帝可以办得到。总之，革命领袖的权利与负任是有一定限度的，每个革命领袖应该明白自己的权利与负任，并且还须明白革命领袖是要领导革命，要时时顾到革命群众的利益，反此，则立刻可以失其领袖的地位。

至于武汉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问题与汪精卫先生回职问题，我们也有点意见。介石先生说汉口联席会议是无根据的，非法的，等于西山会议；这句话很有妨碍于革命所已经得到的胜利。因为大家知道汉口联席会议在国民政府离开广州至这次国民政府正式成立的中间，事实上确在武汉代表国民政府的职权，最明显的如“一三”案是汉口联席会议办的，汉口和九江的租界是汉口联席会议收回来的，如果否认汉口联席会议，便等于否认“一三”案之交涉，等于否认收回汉口和九江的租界，这样，倒是英国帝国主义非常之欢迎的。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本来是国民党中央联席会议所决定的，是合法的，当政府和中央党部人员尚未完全至武汉之时，一部分政府与中央委员自然可以从权组织临时联席委员会执行政府职权，无所谓无根据或非法，因为政府决不能象那时几个月在旅行中过流浪生活。只有后来南昌随便变更联席会议决定改迁南昌才是非法哩。

汪精卫先生的复职，在近来中国革命局面的发展上，是非常必要的，谁也不能反对。尤其一切革命民众和真正革命分子都很热烈地盼望汪先生回来，即介石先生亦确曾发表电报请汪复职，这是对的。但是汪先生至今还没有复职，这是什么原故呢？据介石先生说：

“就是现在有许多人故意造出一种空气使他不能够出来销假……”！究竟介石先生所谓“许多人”是谁，我们无从知道；而介石先生自己已申言：“我们相信汪精卫同志定可以团结到底，合作到底的，我们两个人感情道义，无论为公为私，决没有什么阻碍。……希望他赶紧回来，共维大局。”介石先生这个态度很好，大概所谓使精卫不能销假的“许多人”中，自然介石先生不在其内了。因此我们向革命的民众和革命党人提议，如果大家认为在革命的观点上需要汪精卫先生复职，便应起来铲除使精卫所以不能复职的阻碍，这是必要的。不过我们于请汪复职之时，也不要忘记了使汪去职之故，大家或者还记得汪精卫先生是去年三月二十号事件发生后去的，这是特别应该了解的。

蒋介石先生说：“我们革命环境一天一天好似一天，军阀和帝国主义只会天天崩溃下去……如果我们的内部团结起来的时候，革命成功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我们的敌人已经自己在崩溃，……”这种观察是很对的。不过我们还得说明的，我们的敌人虽然自己在崩溃，可是革命的战线也正在分离，革命战线内有人正企图和敌人妥协，接收敌人的口号向自己的朋友进攻。现在江西广东福建许多省分都不是高唱限制工农运动吗？不是大倡反对共产派吗？不是革命战线里边“反共产派”，“反工农”，“反俄”，总言之，所谓“反赤”的口号都与帝国主义和军阀及买办官僚土豪劣绅等异口同声吗？象这样里应外合的反赤，革命的内部怎么能团结起来呵！现在革命诚然是到了胜利的关头，同时也是在极危险的关头，要渡过这关头只有团结革命势力；但是须团结真正的革命势力，跟着帝国主义和军阀买办官僚劣绅反赤的人，我们是应该反对的，我们是要与之奋斗的。现在事实教训我们，对于谁是真正的革命者，谁是假革命者，我们已经不仅只听他的口头禅，我们要看事实了。西山会议派现在还在嚷“继续总理革命”，可是事实上已变成军阀和帝国主义“反赤”“反共产”之工具，口里尽管嚷着革命，究有什么用呢。

现在中国是两个绝对不能调和的营垒！一方是反革命的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官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他方是革命的工人农民和被剥削的小资产阶级。共产党是坚决地站在工农方面的。中国将来的斗争便是这种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决死战，但是我们相信工农和被压迫的小资产阶级一定要取最后的胜利，谁反对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谁便会到最后的失败。中国革命前途的路线已非常之明显，何去何从，是在人们自己去认识。

（原载《向导》192期，1927年3月18日出版）

# 〔附〕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纪念周演讲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蒋　介　石

林春华速记　曾广勋整理

谭主席，各位同志：刚才郭付主任关于政治和军事的报告，这几个星期以来，我们革命的环境，一天好似一天，国内军阀和帝国主义只会天天崩溃下去，我们革命成功的希望一天一天的近起来了。刚才郭付主任所讲，如果我们的内部能够团结起来，努力奋斗的时候，革命成功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我们的敌人已经自己在崩溃，所以我们成功就在目前了。

现在武汉的本党一部分同志，有一种运动，有一种宣传，所谓要提高党权，集中党权，党权本来是最高的，党权本来是集中的，哪一个要剥削党权，使党不能自由行使他有党权的，就是叛党的叛徒！党权无所谓提高，本来是最高的，党权也无所谓集中，本来是集中的，今日提出这集中党权，提高党权的口号，不过拿这一个口号，来排除异己的同志，做他们真正要想把持党权的武器就是了，中正是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的主席，而且是政治会议的主席，就是最高的政治机关主席，对于拥护党权，拥护我们国民政府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我敢说决不使得党权分散，和旁落，为一人或一派来操纵或利用；这是我们党员无论谁也有监督的责任，现在有人主张集中党权和提高党权，究不知党权分散在那里？是那一个人来剥削我们的党权？现在有人说本党颇有独裁制的倾向，恐怕会发生拿破仑的复辙；还有人说，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的，不能有同中央执行委员并立的机关；这一句话，不晓得是指那一个机关说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是最高，谁也不能增多一点，谁也不能减少一点的，无论谁也不能动摇的！现在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限有冲突的，我以为没有第二个机关，如果有就是现在汉口的联席会议！联席会议是没有根据的，若要提高党权，就要取消汉口的联席会议！不然是没有党，也没有政府了，而他反要来命令党，和命令政府！这样还有党的纪律吗？还能说提高党权，集中党权吗？政治会议是最高的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治会议，明令取消汉口的联席会议，要他在武汉组织一个政治会议分会，而该联席会议却不遵照命令，置之不理，还是继续开会，党权还能够集中么？如果随便设立机关，他自说是一最高权的机关，这样不照党章，不守纪律，那和西山会议有什么分别？这样下去党的权威，自然会一天一天消失的，一般的党员，对于党的信仰和权威，也自然会渐渐失掉的，

现在还有人说我们党里有独裁制的倾向，这句话不晓得是指那一个，如果是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呢，那末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不是他自己产生出来的，也不是他自己创造出来

的，他的权限，的确是很大，可是他的权限是中央党部和政府授予他的，他是受党的命令，就是服从党纪，今日所谓独裁制，不知是究指什么东西？如果是指总司令的话，那就要问他，总司令的权限，是不是党授予他的，是不是党命令他的？我以为只有徐谦是实行独裁制的！他以没根据的汉口联席会议，自居主席，不受党的命令，这才是独裁制！至于旁的，无论那一个军长，或无论那一个机关，决不会成独裁制的！中正是政治会议的主席，凡是政治会议所议决的事情，可以请问一问政治会议的各委员，还是大家公决的？还是中正独裁的？中正还是有独裁制的倾向，成了独裁制的时候，那就是失去了民主政治的精神，就是违背了我们党的纪律，中正就不算是总理的信徒，而是本党的叛逆，既是本党的叛逆，任何人都可以惩办我的！任何人可以枪毙我的！

本党有本党的历史，如果硬要抹杀本党的历史，这个是不行的！本党是有本党的精神，有本党的目的，也有本党的主义的！假使不管本党的历史，随便谩骂，对于年纪大些的同志，总理最诚实的信徒，偏要破口骂他反革命，或者骂他是昏庸老朽，我想这样，无异于拆散我们的党，排斥我们最忠实的同志，而使革命难以成功，我讲这种话我自信不是出发于封建思想，我完全是站在历史观点上来说的，中国国民党的光荣历史，如中正生存一天，一定要保持一天，不能把总理所相信所敬重的，最忠实的同志，一概抹煞，随便加以罪名，使他们不能够革命，没有革命的余地，这样不是中国国民党同志应取的态度，应有的行为！凡是本党的同志，应该互相监督，互相规劝，不好的地方，老实不客气，尽可铁面无私的责备；但是责备要有理性，是根据本党的历史和环境，以及革命的事实，方能使本党同志团结起来，亲爱起来，这样才是忠实的党员同志所应该的，如果无意的怀恨的，以个人的感情作用排斥其余的同志，那就不算是真正的党员，乃是本党的败类了！我们要保存国民党的光荣历史，实行总理遗下的政策，至于总理平生所最尊重，最亲爱的同志，我们要同总理一样的尊重他敬爱他，对于任何同志，不能随便意气或感情用事，以致败坏本党，妨碍国民革命之完成！

我在本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时说的，汪精卫同志，谭组安同志，张静江，这三位主席，乃为本党和国民政府及一般同志，以及总理在生时所最信任，最亲爱的！如果这三位主席批评中正有不好的地方，如说中正违背党纪，或有反革命的行动的时候，只要他们一位主席签名，随便以什么罪罚我，我必毫无迟疑，完全承受，倘有人来破坏革命，捏造是非，毁坏本党的时候，那便要问一问本党全体同志，及本党最公正高尚的监察委员会，中正对于党是否违反总理的政纲和政策？有无违反总理所遗交下来的遗嘱？是否有独裁制的倾向？至于说汪精卫同志和中正合作的事，那更不要旁人来说话，汪精卫同志和中正的关系，我们两个人是如手如足的，可以说我们是最亲爱的同志！如果有人硬使我们两个不能合作，故意做出一种空气出来，名义上要汪精卫同志出来，而事实上不愿意他出来，阻碍他出来，使他不能销假，使我们两人不能合作，这种决不是真实同志要使本党团结的行为，真正的同志要顾到我们党的历史，要顾到我们党的领袖的关系，以及党的领袖的人格，如我中正想一个人把持党，不要汪精卫同志出来，中正便是没有人格，谁都可以来杀我的！我相信汪精卫同志一定可以团结到底，合作到底的，我们两个人的感情道义，无论为公为私，并没有什么阻碍，唯一的阻碍就是现在有许多人故意造出一种空气来，使得他不能够出来销假，凡是东方人总是有感情作用的，无论怎么样，如果以汪精卫同志为口实

而要来排斥我中正，或借此以为推倒我中正的武器，这样子决不是好意要汪同志出来，这样子决不是真正要汪精卫同志复职，不过利用我们二人的弱点，使得我们国民党领袖不能团结就是了！前一回中正打电报给精卫同志，那原电稿在报上已经发表了，各位一定看见的，我那样恳摯的言词，我对旁人是不肯讲这话的，因为汪精卫同志同我的历史，不是泛泛浮浮的关系，我才肯讲这种最恳切的最诚实的最哀痛的话，希望他赶紧回来，共维大局，如果我同汪同志没有特别深切的关系，而说这种话，如果不是为党为革命而说这卑屈的话，那无异于投降！如果要我这样该〔说〕投降的话来，就是杀了我的头颅，也办不到的！

怎样能使党的权威提高起来的问题，不是在人的问题，而是在我们党员对于党能否坚决的信仰的问题，现在党对党员没有威权，即因党员对于党没有坚确的信仰，这没有信仰的原因，并不是组织不良，并不是纪律不严，亦不是领袖不能团结，实在是党里的分子复杂之故，究竟那个是真正的党员，那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那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那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得不明白了，如此所以弄得大家没有一个坚确的信仰，就是不能够互信，譬如中央有一个决议，有一个命令，或委一个干事，有许多同志来问这个决议，这个命令，这个干事，究竟是那一个执行委员提出的？这个执行委员究竟是跨党分子不是？这个决议，这个干事，是否是真正为本党的？这种怀疑之点，不明白地解决，怎能使党的权威确定，提高呢？这话，中正并不是讲我们不能同共产党合作，如果我不想同共产党合作，那我去年就不会提出整理党务案来了，去年提出整理党务案，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使两党可以切实合作，使本党同志对我们的党有坚确的信仰，使大家开诚布公，放心大胆的可以通力合作，这就是提高本党威权，集中党权的根本问题，现在这有一种谣言，说中正现在对于共产党的同志有不信用疏远，并且有反对他们的倾向，其实并不能这样说的，中正并不会反对共产党，中正是向来扶助共产党的！各位同志看看我前年在黄埔的讲演词，就可以明白，前年黄埔第二期学生党部成立的时候，当时一般学生对我有一种非议，说校长是偏袒共产党的；我当时有一句话对他们说，我并不是偏袒共产党，我是扶助中国弱小的革命团体，来和我本党共同革命，增加国民革命的力量，因为这时候，共产党同志为数很少，他们对本党对学校都很忠实诚恳，共产党既是一个革命的团体，我们要扶助他们，所以不许大多数的国民党党员压迫他们，但是我亦曾附带的有一句话，就是说将来共产党强大起来了，如其党员有跋扈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的，也要以今日对待本党同志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现在共产党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于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这样我便不能够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员了，如果还同从前一样的态度，那我就不是立在国民党员的地位，我就不能做国民党党员，我既立国民党党员的地位，我便当有国民党党员的态度！并且我是一个国民革命的领袖，我要团结国民革命的势力和精神，我的态度就要持正公平；在他人看，以为我或左或右，态度和主张没有一定的，其实革命领袖谁也信仰他是革命的，只要他是革命的，对于主义是不变的，那他的态度和行动，就无所谓左右，如果今日左派压制右派，那我就要制裁左派，倘使一旦右派跋扈的时候，我也是要一样的制裁，各位同志，假使要想国民革命成功，革命的势力就要团结集中起来！但不是一句话，随便就可以团结的，同志中如果是三心两意，阳奉阴违的，那革命势力便要分散，革

命事业就要失败！革命事业的失败，不仅是国民党党员的失败，共产党亦要连带失败！共产党员对待国民党党员如同近来这样排挤，压迫，我以为决非共产党之幸。如果共产党员不幸错误而至于失败，这失败并不是共产党一党失败，乃是中国革命势力的失败！我是中国革命领袖之一，所以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在革命的地位上说起来，共产党的成败是要我负一分责任的！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所以我立在革命的领袖地位上说话，对于一般的党员，对于革命的势力，随时随处都要顾到的！如今说我对于共产党的态度不好，甚至说我反对共产党，这样就看差了！我并不反对共产党！我对于共产党并不是不好！我对于扶助共产党的心思与前无异！因为我要纠正他们，就是要使得他们不来压迫国民党党员，并要希望共产党不使国民党党员一种太难堪，生出冲突破裂出来，而希望他们真正能同国民党党员奋斗合作到底！如果还同从前一个样子，不单是使得中国革命的势力不能团结，而且一定要使得革命势力一天天在给敌人消灭那一方面走去！这样就是增加敌人的力量来消灭自己革命势力！凡是中国国民党员都要明了我的意思！中正不是排斥共产党，中正不是反对共产党，不要以中正对共产党的态度还来做各同志的态度。中正自有中正的地位，中正自有中正的态度！在这个革命期间，两党一定要奋斗合作到底的！只要共产党党员对国民党党员不加一种压迫，国民党党员对于共产党党员的态度还要同从前一样的亲爱！这一点，国民党同志同共产党同志必须要明白的，现在革命的环境一天好是一天，敌人天天崩溃下去，只要革命的势力能够集中团结起来，革命成功就在目前！如果象现在这个样子，同床异梦，兄弟阋墙下去，就是没敌人来打我们，我们自己也便会失败，今天纪念周中间，中正有所感怀，我们对于总理要负责任，对于本党要负责任，所以对于各位有这个贡献。

还有一点，各位要晓得，独裁制的倾向，如果是指我总司令而言，那完全是不明白事实的人说，自私自利，来乱干的。我总司令是在最前方指挥陷阵，拚命牺牲的！我总司令没有一时不是以一个死字悬在心里的！各位同志！党为什么要交这种大权给总司令？党为什么相信我中正委任为总司令？总理为什么要以军事责任完全交托中正？因为革命时期，军权不集中必要为他人来牵制，并且易招人来妒忌，诬蔑，陷害，如同近来发现的毛病一个样子，使得革命受许多障碍，不能成功。所以不能不授他的特权，因为要他负这个重大责任，因为要他不惜牺牲，所以不能没有一种特权，而且不能不信托他，亦不能不监督他。如果一方面要他负责任，要他去牺牲，而一方面却要怀恨他，忌妒他，反对他，来讲他的坏话。这样，对中正个人是没有什么要紧，就是许多人说中正将要成功一个军阀，我果真成了军阀的时候，那是本党要怎样处罚中正，就可以怎样处罚的！这不是一个党员的关系，是全党全国的关系！至于中正个人的地位，无论何时可以下野的，在主席的地位，无论何时也可以辞退的，并且在今年主席和总司令职务已经向党部与政府坚辞了几回，这是谭主席所晓得的。如果我愿意做总司令，那末我就不是蒋中正！做总司令比做奴隶还要痛苦，平常说做官是公仆，我以为做总司令才是做别人真正的奴隶！同志们不明白这点，反加以诬蔑，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对于中正个人的关系小，对于全党的关系才大！如果中正能将总司令的职务早一天交卸下来，便早一天得到自由！如果本党允许我交下来，我是决不恋栈的。如果中正有一点违反命令的态度，中正便是总理的叛徒，随便那个党员都

可以惩罚我，枪杀我的！我说这一番话，是中华民国十六年二月廿一日在南昌行营总理纪念周讲的。如果中正以后有反革命的行为，各位同志不仅不必信仰我，随便哪一个也可不当作我是一个有人格的人，不是总理的信徒！

今天所讲的话，就是这一点，如果各位有什么意见，或有以为不对的，请各位批评，可以随便讲话。完了。

（原载《蒋胡最近言论集》，1927年9月出版）

# 评蒋介石三月七日之演讲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独　秀

我们对于蒋介石总司令三月七日在南昌总部之演讲，有佩服的地方，也有怀疑的地方。

佩服的地方是：他毅然承认“现在我们国民政府同中央党部已经迁到了武汉。”从此政权统一，民众不至感觉于武汉国民政府之外还另有一国民政府而莫名其妙；军阀亦无法利用革命政权不统一而企图操纵；从此党权统一，所有国民党党员不至于感觉得有武昌南昌两个中央党部而无所适从了。这两件事，都于国民革命之进行，非常有益。

怀疑的地方是：他此次讲演，虽然对于放弃联俄政策和南北妥协这两个流言有所声辩；可惜他声辩的内容反证明了这些流言至少一半是事实。

“凡是以平等待我的国家，我们都可以和他们联合”，这只是我们一般的外交原则；中山先生的联俄政策，却根本不是这样。中山先生联俄政策之根本精神有二：（一）是要效法俄国式的革命，这句话中山先生不但在公开的演讲中说过，给蒋介石私人的信中也说过；（二）是相信“自欧战以后，俄国人自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的国家，变成新社会主义的国家，……把从前用武力的旧政策，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这种新政府，不但是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并且抑强扶弱，主持公道。……俄国革命以后，斯拉夫民族出生了甚么思想呢？他们主张抑强扶弱，压富济贫，是专为世界上伸张公道打不平的。土耳其在欧战之前，最贫最弱……各国更想把他瓜分，土耳其几乎不能自存，后来俄国出来，打不平，助他赶走希腊，修正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到了现在，土耳其虽然不能成世界上的头等强国，但是已经成了欧洲的二三等国，这是靠甚么力量呢？是全靠俄国人的邦助。由此推论出来，将来的趋势，一定是无论那一个民族或那一个国家，只要被压迫的或委曲的，必联合一致去抵抗强权。”（见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第一讲。）中山先生毫无疑义的肯定了俄国已经不是有侵略各国野心的帝国主义者，并且肯定了俄国能够抑强扶助〔弱〕，弱者自强起来也全靠俄国人的邦助。实际上中国革命军得到俄国人的实力邦助，决非一般国际关系上什么平等待遇所能有之事，这件事蒋介石应该比国民党任何军事领袖都知道清楚。中山先生的联俄政策是建筑在上列两个根本精神上面，是以革命同志的精神而联俄，是以革命民族联合的精神而联俄，决不单是建筑在一般国际关系上什么平等待遇上面。

可是蒋介石现在说：“为什么要联合苏俄，就是苏俄能以平等待我中国，……不仅日本，无论那一国，如其放弃帝国主义政策，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那末，我们对他们，如同对苏俄一个样子，未始不可以联合的。……我们联合苏俄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完全立在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意义上头，所以就要联合苏俄；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象别个帝国主义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象反对帝国主义一样的反对他们。”这些说话，若出诸普通商民之口，不但不算说错，而且很公道；国民党军事领袖说出这样的话，在革命政策的立场看来，分明是把中山先生的联俄精神根本放弃了！因为他这些说话之根本态度是把苏俄看做其他强大国家一样，不曾肯定的把他看做是革命同志，不曾坚决的把他看做是革命民族。

西山会议派之反对联俄，人所共知；然而他们也不是明言放弃中山先生的联俄政策，也是说："吾人尝以'平等待我'为民族间之量尺矣，凡言行一致，合乎此量尺者皆吾友，否则不惟非友，甚至为仇。”又说："吾人于此绝不贸然将苏俄列诸其他帝国主义之林，一反联俄政策；亦绝非盲目的以苏俄之言动皆善，而违反联俄政策之本义。”（均见西山会议派上海大会宣言）蒋介石的说话，与他们的见解何异？他们同样不认识苏俄是革命同志是革命民族，把他和别的强大国家一样看待，今天说："只要苏俄以平等待我，我们对总理联俄政策无论如何不能更动的。”明天便会附会一二不平等待我之口实而更动了！所以东方社十六日九江电称蒋介石最近在南昌演说，曾明言“俄国如以不平等对付吾人，则我等自有对之之道也。”报载蒋之演讲词中虽未明见此语，而奔走撮合南北妥协之日本帝国主义者自然能够察知其弦外之音。

蒋说："我们联合苏俄，并不是联合苏俄一个代表，我们是联合苏俄全体的人民。”可是张作霖逼走加拉罕，又何尝不是说只是反对加拉罕个人而不是反对苏俄全体的人民。

所谓“全体人民”只是一个抽象名词，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表现，所以人们往往欺负他不能够具体的站出来说话，可以任意利用他。国家主义派主张全民革命，便等于不革命。英帝国主义派兵到中国，也是说合乎中国全体人民的愿望。苏俄全体人民不能通同来到中国邦助中国革命，除了政府的代表或党的代表，更有何种形式可以表现实际的联合呢？

如果苏俄代表真有压迫国民党领袖或侮辱国民党的行动，不但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会起来反对，（何以最近党中央全体会议并未曾提及此事，只有蒋一个人感觉着？）即中国共产党亦应该向代表严重警告，甚至于请求苏俄另换代表。若仅仅是因为苏俄代表主张汪精卫复职，若仅仅是因为苏俄代表在国民党的宴席上劝告勿抑制工农运动便以为是压迫国民党领袖和侮辱国民党，则压迫国民党领袖侮辱国民党者还有百数十万国民党党员和广大的民众，不只是苏俄代表。

北方的张总司令方宣称因苏俄代表辅助国民党而逮捕其家属，南方的蒋总司令则宣称苏俄代表侮辱国民党而欲加以驱逐，所持理由虽不同，而反对苏俄之事实则同，此或即佐分利所谓“发见南北妥协点”，赵欣伯所谓“南北政策相同”之一！

复次，南北妥协共同反赤之说，自正月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各报一致喧传，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通信社——东方社与电通社，几乎每日都有此类消息，东京北京的日本报纸更是言之凿凿，难道蒋总司令都一向不曾知道，何以对于自身关系之事截至本月十二中山先生纪念日告黄埔学校同志书中，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通信社及报纸之宣传都无一字声辩？一则曰："在武汉的党员还要造出这种谣言”，再则曰："他们在武汉的却天天制造谣言”，其于告黄埔同志书中亦说是“造谣煽惑”“后方捣乱”，并谓："若中正坚持革命不肯放弃一日，则中伤者之作用亦将一日不止。”又谓："彼挑拨是非之徒，意在破坏

国民革命军。”其实，如果是谣言，如果是中伤，则造谣煽惑中伤捣乱以图破坏国民革命者，不是在武汉的党员，而正是蒋介石现方表示亲近的奔走牯岭南昌北京鼓吹南北妥协之日本政党及东京北京的日本通信社及报馆。最近日本人的上海日报非常得意的大字登载十七日九江电："南昌派高唱亲日政策，否认全体会议之议决，决定解雇鲍罗庭。”不向日本帝国主义的通信社及报馆声辩，而只痛骂自己的同志，这是绝对无益的事。

奉鲁军不是整个的，儿等于奉直军不是整个的，这是人所尽知，鲁军即尽失其地盘，亦非奉张所深惜。北伐军东下击破鲁军，自是革命势力更进一步之发展，尤为东南人民所欢迎；然而执此以为东报喧传对奉妥协南北携手对赤之反证，则殊嫌未足。

有人以为李宝章、毕庶澄等时有与南军谈判之事，靳云鹗陈调元显已归附南方，所谓南北妥协，不过如此。此言亦太滑稽了。北方将领归附国民政府，吾人自可尽量容纳；而国民政府的军事领袖提出政治上的让步条件如东报所传者，向北方军阀首恶谋妥协，这是与北方将领归附国民政府为同样的革命胜利之荣誉吗？

奉天军阀在人心上，在军纪上，在财政上，已到了旦夕溃败的运命，不但北方革命的民众，即一般商民甚至于官僚，都发出“盼望赤军速至”的呼声；而赤军领袖若忽然为日本帝国主义所诱惑，与垂危的奉天军阀谋妥协，以延其残喘，使肃清军阀的大业功败垂成，这岂非革命史上一大错误，并且是一大污点！所以我们的责任，不是盲目的掩饰此时没有南北妥协的运动，而是诚恳的要求国民革命军的领袖蒋介石总司令，立刻在言论上在行动上，证明所谓南北妥协共同反赤，的确是日本帝国主义之造谣煽惑挑拨是非中伤捣乱以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

（原载《向导》192期，1927年3月18日出版）

# 〔附〕在南昌总部之演讲

（一九二七年三月七日）

蒋 介 石

各位同志：现在我们国民政府同中央党部，已经迁到了武汉，迁到了武汉之后，我们希望国民政府的权威和中央党部的权威，能够天天巩固，并且要使汉口同志，没有不合法的举动，使得我们中国以后的革命势力真正能够在党的统一指导之下。所以我们的党和政府迁到武汉去后，我们希望他完全立在我们国民党全体党员之上，不为一二个人所操纵，完全由大多数的意思来做我们党的意见，也不为一二个人所束缚，使得我们全体党员不能自由，不能明白我们党的真相，亦不可受了少数人的操纵，以宣传敌人的方法，来毁坏我们本党，违反我们党员的意思，抹煞我们本党的精神。如果我们的党和政府迁到武汉去后，

我们总理受尽辛苦艰难所创造出来的党，受人束缚压迫，完全得不到一个自由，并且破坏了我们的国民革命，则中正同各位同志对于本党，对于总理，就要做一个罪人；尤是我们在场的全体同志要明白现在革命的环境，和本党的情形，不要为少数人所挑拨离间，或宣传作用，使给人家蒙蔽盲从。盲从者，使我们党员真正的意志不能够表现出来。现在武汉方面，有几种对于我们本党领袖的宣传：第一，说是联合日本，放弃联俄政策，拿违反总理遗嘱的罪名加到我身上，想来损害我人格。第二说我勾结奉鲁军，硬要拿通敌的罪加到我身上，想来破坏我信用。第三说我们军费没有报销，拿军饷不清的罪名，加到我身上，想来诬蔑我革命的历史。捏造这种谣言的在使一般的党员，全体的同志，对我的信仰，完全消失，要知道中正在革命的历史上，在本党的地位上，无论那一个党员都知道的，尽管他们造什么谣言，我深信绝对不能动摇我的人格及信用于万一；当民国元年的时候，本党的败类和袁世凯的走狗，想要诬蔑我们总理的人格和历史，竟造出一种谣言，说总理受了袁世凯的三百万贿赂，来让了总统，各位同志：你们相信不相信呢？但是当时尚有一般人怀疑，信以为真有其事的样子，现在有人要想毁坏本党，就要先推倒中正，所以不管道义，不顾党国，拿昔日袁世凯走狗来诬蔑总理的惯技，来诬蔑我中正了。古人云“千虚虽逃一实”，这些毁谤，原无损于我个人，但曾母尚要怀疑，曾参杀人的谣言，可知众口可以铄金，所以我对外虽然可以不提，但对内部的同事及学生们，不能不将我中正今日所处的环境之困难，与宵小所设诬害之毒计，明白告诉各位。说到放弃联俄政策，来与日本联合，这种话有没有，各位同志相信不相信，更不待我言，我们总理为什么要联合苏俄，就是要求中国自由平等，要求中国自由平等，为什么要联合苏俄，就是苏俄能以平等待我中国，苏俄既不放弃以平等之精神待我，我们那有放弃联俄政策，日本如果对我中国，一天不放弃他的政策，那我们就没有一天能和他妥协的，不仅日本，无论那一国，如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那末，我们对他们，如同对苏俄一个样子，未始不可以联合的。至于我们外交政策的立足点，就是求我们中国自由平等，无论那国以平等待我的时候，那末，我们随便那一国都可以联合的，我们对于联俄，也是抱定这个态度，苏俄一天不放弃以平等待我的政策，我们联合苏俄的政策，是无论如何不能动摇一下的；去年我在黄埔已经讲得很明白，当时苏俄的同志也是在场，就是黄埔宴会第二次全国代表的时候说，我们联合苏俄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完全立在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意义上头，所以就要联合苏俄，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反对他们，这一句话我早已讲过的，我们要交结一个始终如一的良友，我们什么东西都要讲明在先，一点也不客气的，现在苏俄是绝对不会拿压迫手段对待我们，我们和他们联合的政策决不放弃的，至于他们的代表，拿一种压迫的手段对待本党的领袖，或有侮辱我们本党的行动，那末是他个人的行动，我敢信决不是苏俄整个的行动，我们就可说，这种个人行动是与他苏俄完全无关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他们代表个人的行动，牵涉到苏俄整个的交谊我们中国的政策上来，如其因代表个人行动而牵及到苏俄政策，这是不行的。我们看明白，苏俄整个的策略，始终以平等待我，到如今没有变的；所以我们对苏俄整个的政府和苏俄全体的人民，仍旧要照总理所定下的政策同他们来联合，共同奋斗，总之我们联合苏俄，并不是联合苏俄一个代表，我们是联合苏俄全体人民，如有一二个人压迫我们中国的行动，我们决不牵及到苏俄全体人民身上来，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只要苏俄以平等待我，我们对总理联俄政策无论如何不能更动的，

这种理论，各位同志要明白，不要来给谣言蛊惑了，至于我们党里整个外交政策，在广东联席会议和本党政治会议早有决定的，现在我们的外交政策，是要使得各国谅解我们的国民革命，使得他们不同本党冲突，所以广东联席会议同政治会议就决定，如果没有来压迫我们妨害我们革命的时候，我们应该取一种和平的态度。所以我们现在只有依照我们联席会议同政治会议，所决定的外交方针做下去，各位同志要明白我们现在外交的方针同本党的政策，是这个样子的。

第二点：说我们联合奉鲁军的话，拿这通敌的名目来做我的罪状，各位同志一定看得很明白，不要我来再讲，我们前敌的将士现在同奉鲁军作战，我天天在阵上决死战，而在武汉方面的党员还要造出这种谣言，这对于我个人不要紧，对于前敌的将士怎么对得起，说是我要联奉鲁，为什么还要同奉鲁军作战，他们造出种种谣言，要破坏我们国民革命军，使得我们国民革命失败殆尽，这样我们还能承认他是一个同志吗！这不仅是反对我个人的革命，简直是反对国民革命，那还不是反动派吗！这不要中正说明，现在前方的将士天天同奉鲁军作战，而他们在武汉的却天天制造谣言，反转来说，是同奉鲁军妥协，丧心病狂，至于此极；这样有没有良心？是不是我们的同志所应该讲的？这种行为是不是本党的党员所应该做的？各位同志一定明白中国的历史；从前岳飞在前方同金兵作战，打了胜仗，秦桧在后方妒忌岳飞成功，而他自己纳贿通敌，偏偏反说岳飞勾通敌人，不给他的饷，不济他的械，弄到后来使得岳飞精忠报国的至诚，冤枉不白，还要禁死牢中，现在差不多就是这种情形了。这样还有天理，还有良心吗？所以捣乱造谣的人，是没有什么天理，亦没有什么良心，并且没什么国家，没有什么革命，只要能给这国民革命的事业倒下来，只要给国民革命的领袖推倒了，只要自己个人有权势，有利益可享的时候，无论你国家亡了，无论你种族灭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的；这样子，和秦桧的行动并没有两样，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形，我们总理常到了没有希望的时候，总要我们党员同志，对于本党，对于中国，对于主义，做一个文天祥；做一个岳武穆；我在他旁边的时候，他常常说要我做一个陆秀夫；做一个史可法；我现在老实讲：我就要继续总理的精神，尽忠革命的事业，直至死而后已；就是我不做总司令了的时候，只要我有一个人，有一枝枪，我一定奋斗到底，希望我们国民革命成功，实现我们总理手创的三民主义。还有说我们军饷不清楚的一句话，这我可以坦白的说：中正对于金钱一项，统统是公开的，尽管什么时候可以来清查账目，前次军务善后会议的时候，已经把军费收支数目报告过了；自去年七月起，到十一月底为止，经常费临时费，及一切战费都算起来，总共不到四千三百万元。从前在广东我们没有出来的时候，每月规定经常费四百万，后来不足，补添了五十万，这四千三百万的中间，每月四百多万经常费还是在内的，从七月份起到十一月份止，这五个月中间，在后方广东支出的有二千五百余万；除了经常费之外，而在前方所支的战费总不到一千八百万，这一千八百万中间，要供给广东出征的十一师，在广西的每月还须补助他三十万，在这五个月内的草鞋费，米津费，病限费，站费，交通费，一切都在里面，各位看看，我们转战五个月，占领五六省，只用了一千八百万的军费，我敢问一句话，无论中外各种战争，带领了这许多队，占领了这许多省份，死伤了这官兵三万余人，费时五个月之久，仅用了一千八百万的战费你看做得到做不到呢？现在我们在前方的将士，这样刻苦艰难，忍饥耐冷，而他们在后方还要造出这种谣言，并且限三天之内，要我们报销，大家知道军队报

销不是简单的事情，一定要战事告一段落，各军各师报销上来，核算清楚，才能得到一个总报销，现在各军各师在前敌拚命的时候，他们不知军队痛苦，讲一句话限三天内要作一个总报告，这样不是不懂事情，就是故意捣乱，他们的翻云复雨。原来要诬蔑我的人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现是要反对革命领袖，破坏国民革命无所不用其极，竟到了这个程度了。中正同各位老实说，国民革命一天不完成，中国是一天得不到平等自由的，我的革命责任是一天不肯放手的，就是只留我一个人还是要干下去的，中正予备着做岳飞，予备着做史可法，予备着做文天祥，如果真是为国为民，做历史上有人格的人，他绝对不希望他本身生前成功，我要表现自己的人格，给千万后世的人来批评，一切诋毁成败，概置不理，请各位同志跟着我来做陆秀夫，来做我们总理忠实的信徒，总之：无论后方如何捣乱，我们对待敌人是一样的拚命，决不肯与彼妥协，无论苏俄代表对我们如何压迫，或苏俄辅助我们革命与否，而我们对于国际不平等，始终是反抗到底；无论军饷如何支绌困难，我们前方战线，还一样奋斗，决不使敌人乘隙蹈虚，对于党国，死而后已，这是我们的决心，今天兄弟所讲的话，只有这一点，没有旁的话说了，如果有反宣传，阻碍我们的革命，那我们就要当他是反动派，当作他是我们的敌人看待，现在我们只希望中国的自由平等能够实现，只希望中国国民革命能够成功，谁来反对我们革命的，就要当作他是反革命看待，请各位留心明白我们现在的环境。完了。

（原载《蒋胡最近言论集》，1927年9月出版）

# 〔附〕致中央并答长沙市党部之要电

（一九二七年三月）

蒋　介　石

谭主席转中央执行委员会钧鉴：顷接长沙市党部电云：南昌蒋总司令钧鉴：欢迎汪公复职，并请迁都武汉，曾经本党一致决定，乃汪主席迟迟不来，谭主席亦尚羁留南昌，缘何因循，伫盼我公解释，报载戴天仇吴铁城奉使命赴日，且闻奉张拟任公以付总统及九省经略使，传言纷起，未审虚实，究竟我公意见如何，切望说明，张静江窃据党权，肆行非义，各地群起而为救党运动，共请驱逐，黄郛王正延向系北洋军阀驱使，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人员，所有行动，早与本党政纲相违，迹近联张，尚逗留党内，黄王亦将引以置之于政府，此中以何因缘，祈我公详如声述。凡此种种，关系党国至为重大，我公继续总理精神，领导北伐。更进而为行动之表示，党国幸甚，中国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叩虞等语。中正接读之下，至深欣慰，盖此种直谅之诘询，远胜于背后之猜疑。历念党内纠纷起来，初每因少数同志之积疑不吐，真相莫明；终则为外间谣言所狎弄，竟成水火，若同志中态度尽

如长沙同志之对中正者，则何疑不破，何谣不息耶，查汪精卫同志之复职，中正为主张最力之一人；披肝沥胆，垒电促归：今幸回国有期，群情可慰；最近中正对党务宣传大纲宣言中，关于此事言之尤切；至其迟迟未归之原因，汪同志归后，必有报告，中正未敢悬猜。谭组安同志暨中央各委员，现已抵鄂，无待赘答，闻武汉市所扬标语，有恭喜蒋总司令将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交回我们，一若中央两机关中正据为已有，阻使不行者，此种离间本党之谰言，不料竟成曾参杀人之爰据，请就近详询组安诸同志，如中正果有其事，愿束身归罪，谨受裁判，否则中央一白中正之平生，免中离间之诡计，戴季陶同志赴日，为中央在粤时政治会议所决定，吴铁城自行赴日，中正绝未与闻，长沙同志因爱党之深，不觉杞忧之切，见有人亲日疏俄击中正者，遂直询有无，俾中正得罄拳拳，外交政策之须统一，为中正所懿守深知，在党的指挥之下，更不容参与私意，无论何国放弃帝国主义者皆党友，沿袭其帝国主义者皆为党仇，中正何人，敢擅增损，当民二革命失败时，袁世凯之机关报，有诬总理受日本册封，陈英士先生戴季陶同志亦各得子男之爵者，至今思之，不堪一笑，乃重劳外间由亲日谣诼，演绎而成对奉妥协为付总统九省经略使之奇谈，中正有血在腔，有舌在口，同志如并此而疑及中正，夫复可辩。最近江浙间正与奉鲁军生死相搏，战士之血，岂容抹煞，若必欲以通奉谰言，横加攻奉之司令，则军心一动，革命之败，如前方无法指挥之日，自有后方负责之人。务望同志为党为国，稍加审察。张静江同志之代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主席，为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所决定，不得谓为窃据党权。此在张同志一人事小，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威权事大。张同志即不代主席，亦为中央监察委员，有何法据，有何理由，而可以一片打倒之呼声，取消其行使职权之资格。此在张同志一人之事小，中央执行委员会威权之事大。逗留党内一语，中正不能不认为长沙同志之失辞；至于王正廷就绝未相谋，实无容置答。对于黄郛之关系，已详告于黄埔同学书中，故不赘述。以上所陈，不特答长沙同志，甚愿中央考察中正生平与以公平裁答，并恳转知长沙市党部诸同志。恕不另复，蒋中正叩。

（原载《蒋胡最近言论集》，1927年8月出版）

## 〔附〕告黄埔同学书

——指出怀疑及中伤蜚语之要点——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蒋　介　石

只知有党与革命，不知其他……使我不能努力于革命者无所不用其极……

指出怀疑各点及中伤蜚语……对于党务之主张……

述三月二十日之事……设主席制之经过情形……

张静江同志为　总理唯一之尊重之人……与王正廷并无丝毫关系……

与黄膺白之关系……用人标准……

敦促汪同志销假之函电……领袖团结唯一之障碍……

党权高于一切……指挥应须统一……

诬为独裁……破坏国民革命者唯一之军略……

军需出纳之数……外交方针……

与奉鲁军妥协之蜚语……无论武装如何捣乱，决不稍改铲除军阀之初心……

非至仃止吾最后呼吸之时，决不中止革命之奋斗……

中正自追随　总理服务革命以来，先后已二十余年，只知有党，不知其他，只知革命，不知其他，凡有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而施以箴规，无不服善改过，从未文饰因循，愚直之性，当为一般同志所共见，最近本党因干部睽处于两地，致挑拨离间之纷乘，种种诋毁，无端而集于中正，凡以隳我信用，沮我素志，使我不能努力于革命者，无所不用其极，驯至以相从有年之黄埔同学，亦复为此种空气所浸润，目前读驻鄂同学会忠告之书，一则以慰，一则以惧，所引以为慰者，即我同学以直谅公忠之气概，拥护本党，督过责善，不以师生关系而稍有瞻徇，此为本党最可宝贵之精神，亦无负予多年教诲之宗旨，所引以为惧者，则书中所陈各节，颇多摭拾影响以谈，轻信中伤之语，我同学既服务革命，若不以明确之理解，别事实之真讹，则在诸同学为发于爱党爱友之真诚，结果终不免为阴谋操纵者所利用，余为此惧，不得不就诸同学所督责怀疑之各点，及外间中伤之蜚语，指出事实真相，为我全体同学道之。其一，关于党国威权，中正素所尊重，所有对于党务之感想与希望，已具见于二月二十七日对党务宣传大纲之宣言。其二，去年三月二十日之变，为中正所最痛心之事，曾于十五年五月十七日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自请处分，蒙全体会议信任之笃，议决毋庸议处，是引咎之举，早已不俟诸同学忠告而为之。其三，常务委员会设主席制，系迫于当时事势上之要求，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所通过，中正之担任常委主席及政治会议主席，亦系出于中央各同志之公意，中正唯知革命未成，义务不容推诿，中央委员具在，不难为我证明。其四，张静江陈果夫两同志，以中央监察委员之资格，一则代理主席，一则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皆由中正率师北伐，负责无人，经常务委员会通过，勉令担任，彼时中央人员，留粤甚少，权宜之计，只有加重义务，绝不能视为权利，至张同志忠贞亮直，为　先总理所再尊敬之一人，自非别具肺肠之徒，断不忍加以诋毁，诸同学何可漠视本党历史，而效挑拨者之所为。其五，外交财政，应绝对统一于中央，此为中正向来之主张，王正廷在上海如何活动，及自命代表何方，均非中正所知，中正对于王氏，虽同邑里，而自巴黎相会以来，即认为旨趣不能相合，至今绝未与之有丝毫之往来。其六，黄膺白先生，自同盟会成立之时迄至民国元二年间与中正为共同革命之同志，才猷肝胆，素为同志所钦崇，即　先总理在日，尚论本党最初革命时之人才，亦谓膺白学识过人，深加器重，中间虽途径异稍，对于政治大节，维持正义，旅大租借期满，黄君在北京主持助〔收〕回，竟敢提交期满收回谍文于日使，故日本帝国主义者，至今尚恨之不置，决非如徐谦投机取巧，争权夺利，以公报私者，所以同日而语。至此次见访总部，以

私交关系，来相存问，中正亦以故人之礼相接待，如此而谓紧随总部，有所图谋，则中正非尽废私人交际不可矣。其七，所谓肃清左右反侧分子，亦为外间攻击伤之一种武器，唯中正用人标准，只问其今日能革命不能革命，能革命者即引与为伍，不欲多所吹求，诚以本党今日，宜设法感化不革命者使皆能革命，亦宜尽量吸收能革命肯革命者使共同参加于革命，总理改组本党，党员扩至百万，即持此光明博大之精神，故能使万派汇归而同集于革命之旗下，若以訑訑之态，拒人千里，将何以扩大队伍，促革命之成功。其八，汪精卫同志复职一事，中正函电敦促，何止再三，最近且电告汪同志，如其再不归国共负艰难，唯有辞职以谢同志，中正认为汪同志销假，于党国有绝对之必要，其唯一障碍即在抹却事实造谣挑拨妄思离间吾二人感情之徒，故排除障碍，首先应认清真相，上述各项，中正敢负责宣述，对吾同学无一字之欺罔，中正唯欲革命，故认党国威权，高于一切，凡中央全体同志有所驱使，虽一身数役，任何劳苦所不敢辞，而挑拨者即斥为怙权，中正唯欲革命，故认革命指挥，应使统一。凡中央赋与之责任，不肯随便放弃，而挑拨者即诬为独裁，中正唯欲革命，故用人标准，唯以能革命或不革命为取舍，更无成见于其间。而挑拨者即谓为任用非人，中正唯欲如驻鄂同学会书中所言，"秉承　总理遗志，领导国民革命"，故始终确守　总理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之策略及一切遗教，且以全力拥护　总理一切之遗教。彼挑拨是非之徒，意在破坏国民革命军，而又以　总理遗教昭若日星，无可移动，乃不得不对拥护　总理遗教最力之人百端诬蔑，使之蒙诟丛戾，灰心丧志，放弃革命责职而后始快彼辈之心。且诸同学亦知彼辈计谋之层出不穷乎？彼辈既以种种挑拨离间之手段欲夺中正革命之志而不可得，于是乃为更进一层之中伤。最近造作三种蜚语，用意尤毒，一谓中正军需出纳，用途不明，二谓中正变更外交，疏俄亲日，三谓中正对奉鲁军进行妥协，此三种谣言，实为打倒革命领袖最凶狠之武器。盖自来领袖信用之失坠，无不以金钱问题而起，苟廉洁之人格一丧，即精神之生命全失，同志鄙夷，不打自倒，此为第一种谣言之用意，次则外交问题，全国注目，卖国嫌疑，可使任何伟大之人格归于墟墓，此为第二种谣言之用意。至于前方将士，正在肉博作战，而统率全军者，已变奋斗之初心，影响所及，可使全军解体，此为第三种谣言之用意。凡此三者，中正若有一于此，岂但不配为总理之信徒，不配为革命之党员，亦不配为天地间之一人，事实所在，不得不明白宣告于诸同志之前。（一）关于军需款项，第一期战费，业已列具概算，造册宣布于军务善后会议，计自去年七月截至十一月份止，共支军费四千二百余万元，未出发以前在粤经常费军费每月实需四百余万元，出发以后，转战五月之久，占领五六省之广，死伤将士有三万余人之多，而临时军费之支出只一千八百万元，凡米津，行军，兵站，病院，运输等各种费用皆在其中，试问此数是否浮滥，可请全党同志全国民众下一批评。中正自献身革命，生死早置度外，何暇为私襄之谋，生平虽寡过未遑，而廉洁之守，差可自信，亦庶可见信于同志。每念昔日袁世凯密令徒众诬蔑我　总理受袁馈赠三百万元，至于　总理逝世以后，其谣大白，中正何人，敢避疑谤。唯欲昭告国人者，中正在职一日，决不使公家有一分之浪费，决不使部属有一文之中饱，亦决不因任何艰难而使前方将士受一日之饥饿。（二）外交方针，中正始终尊重政治会议及政府，从无于中央决定以外，单独行动，本党政府对日本之方略如何，中央早有决定，中正决不与之妥协。至于联俄政策，为　总理所遗留，目前虽有其代表日久骄纵，对本党领袖多方压迫，但中正认此为其个人之行动，与苏俄以平

等待我之精神，不相牵涉，无论其个人态度如何，吾人对于苏俄，决哓改向日之关系。且即使苏俄不以平等精神待我，吾人仍当向前奋斗，对付任何之帝国主义，不打倒之不已。

（三）关于妥协奉鲁军一事，更为可笑。中正受命治军，虽有主持和战之主权，但一切进止，始终请命中央及政治会议，如此大计，决无专擅决定之理，在中央未决定妥协以前，对于任何方面，中正绝不与之妥协。吾人为解放民众疾苦而革命，苟无端放弃打倒军阀之目的，则国民革命岂复尚有意义，中正诚不知造谣煽惑者其心何居。但敢明白宣言，无论后方如何捣乱，决不稍改铲除军阀之初心，总之中正今日他无所念，唯以革命之前途为念，他无所希冀，唯以革命之成功为望，他无所顾虑，唯以革命中途受人破坏或阻碍为虑。凡我同学，应知破坏者之技，将愈出而愈奇，此后诪张为幻，不知伊于胡底。若中正坚持革命不肯放弃一日，则中伤者之作用亦将一日不止。但中正非至仃止吾最后呼吸之日，决不中止革命之奋斗，破坏者利用诸同学与我之关系，使诸同学怀疑于余，不满于余，督责于余，以为如此足证余之行为，尚不能见信于学生，学生之责难，定必使余必受最大之创痛。抑知余若偷安畏难，放弃革命之职责，诸同学虽不加责备，余已失却生存之价值。反之，若校长努力于革命，而学生惑于中伤者之言，加以挫阻，则中正敢信，即使诸同学经已弃余而去，余苟尚存一枪一卒，亦誓必为国民革命而决战，不能成功，即当成仁，自许身党国之日，早已矢有死无二之心，昧昧者欲以此相阻挠，多见其不自量也。唯念本校为　总理亲手所创造，　总理虽死，有诸同学戮力于革命，即　总理之精神不死。今当　总理逝世此二周纪念之时，诸同学瞻顾　遗徽，追念　遗教，应知本党环境之险恶，宵小者惟恐吾内部不破裂，更应知我全体同学前途之困难，反侧者惟怕本校学生之不堕落，本校团结之不破败，吾全体同学应如何恤党国之艰危，作百倍之奋斗，以沉静之理解辨别事实，以一致之决心拥护革命，须知革命环境莫良于今日！而妨障革命者之行动亦莫烈于今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唯有以大勇克大难，方不致当垂成而失败。故缕述革命之危机，与中正之所以自处以及吾同学天职之所在，为同学痛切道之，吾同学其勉之哉。

（原载《蒋胡最近言论集》，1927年9月出版）

#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

郭 沫 若

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营，就是惨杀民众的大屠场。他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獪的刽子手了。他的罪恶书不胜书，我现在只把他三月二十三日在安庆屠杀党员、屠杀民众的最近的逆迹向我们的同志及各界民众公布。

我们是三月十六离开南昌的，他比我们早一天到达九江。九江的“三一七”惨杀已经在我们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一个永远不能磨灭的污点，但我们那时候对于惨杀的暗幕还不曾明了，主持这场惨杀的究竟是甚么人我们还不曾知道。我们对于他虽然不免已有几分怀疑，但我们还以为他总不会是主使的人，主使的人一定是段锡朋、周利生等等背叛民众的党棍和走狗。及到“三二三”的惨案发生，我们才知道了这个阴贼险狠的大叛徒——这个万恶滔天的蒋介石！

“三一七”惨案发生后，第二天他就命令我们到安庆去。我们是在十九号到达安庆的，他比我们迟到一天。安庆的民众在省市党部的指导之下所表示的欢迎他的热诚，可以说是空前所未有。安庆在“青天白日”的旗帜（国民党的党旗）之下复活了起来，安徽省党部正在召集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准备组织正式省党部以推行国民党的主张。代表大会本是予定三月十号开幕的，听说蒋介石要移驻安庆，便专为他延期到三月二十二日。安徽省的党员同志对于他所表示的拥戴的热诚，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了。但就是这个过于迁就的表示早伏下了无穷的危机，我早就忧虑到大会的进行恐不能够顺利地闭幕。不料我所怀抱的忧虑竟成了显然的现实——而且是很残酷的现实。

三月二十二日代表大会开幕，就在开幕的那一天，便发生了惨案的痕迹了。

先是安庆城内有四个总工会，一个是在省党部指导之下成立的，其他三个都是投机分子们的非法的组织，三个之中比较纯正的两个，已经由省党部和政治部把他们合并了起来，只剩下鲁班阁的伪总工会，完全是由劣绅土豪收买流氓地痞所组织的。每人出洋四元，入会后不纳会费，并赠送一个银质的徽章。如此重价收买，也才仅仅得了一二百名的会员。这个伪总工会无论怎样是不能够听他存在的，所以党部早就有命令叫他们解散。我们总政治部到后，也就在二十二的那一天，下了一道命令去叫他们停止职权，听候审查。但他们所借口的是说奉了总司令的命令组织的。在当初我们还以为是他们的梦呓，所以我

们也就没有顾虑。不料就在二十二的那一天下午二时的光景，刚刚把代表大会的开幕典礼举行完毕，他们伪总工会的暴徒们便簇拥至设在省长公署的总司令行营前面。他们举了代表去要求见蒋介石，蒋介石也出来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说是他们受了压迫，本总司令是要秉公办理的，务要使他们不受压迫，望他们安心。

总政治部是设在第一中学的，那时候我也没有在总司令部，我因为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典礼，弄得一身都是汗，我便偷了一点机会去洗澡。当我洗澡还未完毕，便有人来报告我，我便赶到总部行营，看见暴徒们还聚集未散，总司令部特务处的付处长温建刚在那儿指挥，我向他询问一切的情势，他才把蒋介石的一段话告诉了我。我还听说是省党部的常务委员光明甫同志在总部行营前已经受了暴徒的殴打。我没有再事羁延，便一直跑到内里的总司令室里面去。

蒋介石的居屋是平列的两进房间，第一进是会客室，第二进才是他的寝室。我走进第一进的时候，看见光明甫同志坐在那儿，他把他扯坏了的衣裳和抓破的颈部指示给我看。我看了又走进了第二进去，蒋介石正坐在书案的旁边，他立起来叫我坐，我也就坐了。——这是他对于我的惯用的礼貌，别的部员见了他的时候，总是用立正的姿势来向他对话的。

他说："今天的事情你晓得么？"

我说："我到总部里面来才晓得的。"

他问我究竟是怎么的一个起因。我便把伪总工会的构成和我们对于他的态度说了。

他说："你以后对于民众团体的态度总要不偏不袒才好。你去调查一下，把他们合并起来，把他们调和起来好了。"

我说："只要有调和的余地，我们当然要替他们调和。不过恐怕事实上很难，总司令是看见的，他们在总部面前便实行用武力打人。"

他说："好啦，好啦，你去调查一下好啦，唵，唵，你去调查一下好啦。"

不得要领的说了一番话，我便退了出来，他也跟着我出来。我们又同光明甫同志会谈。光明甫同志请求他对于当日的暴动要加以相当的制裁。他只口口声声的说："好啦，好啦，调查好啦，让政治部调查好啦。"

明甫同志说："今天的事情可以无须乎调查，他们是在总司令部的面前行凶，总司令是亲眼看见的。我这伤痕，我这衣服，便是真实的证据。总要请总司令立刻查办一下，我们做党的工作的人才能得到一种保障。不然，我们党部同志个人的生命不足惜，我们的党是永远立不住脚的。"

明甫同志很象是一位直爽的人，他又受了侮辱，他的神气已经有几分激昂，而他的语气更不免带了几分愤意。

蒋介石也不客气的用批评的态度说道："其实你们做指导工作的人没有做好，你们不免有些偏袒，所以才激成了这样的事变。我已经叫总政治部去调查了，我看最好是把两个工会合并起来才好。"

明甫同志说："工会是一回事，暴动是一回事，工会的合并由总政治部去调查，只要认为可以合并就合并起来，只是今日的暴动要请总司令惩办一下。"

我在旁边也帮助明甫说了一遍，逼得他没法，只得信口的说道："好啦，好啦，我警

戒他们一下好啦，唵，唵。”

就这样不得要领地又谈了一番话，明甫先走了。蒋介石对我说：“安徽的事情是顶难办的，顶扯烂污的是安徽人，在革命党中扯烂污的多是安徽的同志，你不信，你看，他们还要打呢，还要打呢。”

做一个总司令的人，自认为最能够革命，是革命党的领袖的人，竟说出这样无聊的话。他明知道他们还要打，而他全不加以丝毫制裁，这是甚么道理？我当时心里不免有这样的愤恨，我相信读者读到这儿也不免会有这样的愤恨，但是不忙，且看下文便可以知道他的葫芦中卖的是甚么药了。

二十二日的晚上反动团体送了一张请单来。请单的上面是这样写的：

安徽省农民协会<br>安徽省总工会<br>安庆市商民协会　各筹备处谨择三月二十三日<br>安徽省学联会<br>安徽省妇女协会

休业一天，于上午九时在白日青天开市民欢迎大会。

安庆市民大会敬订

欢迎蒋介石的市民大会已经在二十号举行过一次，由省市两党部共同召集的。现在又要来举行，他们反动团体的阴谋是很显著的。我预算着他们是定会有一番大规模的暴动，当晚我就派人出去调查，没有得到甚么结果。第二天清早又继续调查，并得着第三十三军政治部的报告，晓得他们组织了一百名的敢死队，是出钱买来的流氓，每人四元，并且还有一种赏格，便是负轻伤者一百元，负重伤者五百元，丧命者一千五百元。暗中主使的是总司令部的某某人我们也知道了。我当时便派人出去通知市党部及各种合法的民众团体，叫他们先作准备。一方面我又亲自跑去见蒋介石。

二十三日的一天是大雨，我们还以为反动分子的集会或者会延期，但是走到街上各家铺店多已贴出一种红纸墨字的印刷的标帖，写着“本日欢迎蒋总司令，一体停市一日，安庆市民大会订”等字样，可见他们的阴谋是很有准备、很有组织的了。我走到总部行营门口的时候，看见特务处长杨虎、付处长温建刚、总部参议刘文明、前总部秘书现充独立第五师党代表姚觉吾、第四十军党代表李因等，全身雨衣雨帽，神色惚惚的由总部走出，大有如临大敌的光景。我一直走进总司令室的门前，门是由里面反扣了的。我问侍从付官，说是在会客，我便退入西侧——总参谋长室。该室与总司令室对称，中间隔了一个小小的中堂。室中也分二进，总参谋长朱一民也在第一进里会客，我便退在一旁。我隔着门帘看见第二进的寝室里有许多长袍短褂的人，在总部里素来是没有看见过的。那些人都站着好象在等待甚么，又好象在开会的光景。少时杨虎和姚觉吾先后进来，和我略略应酬了一下。又走进内室里去了。我坐了一会，又来了一位安庆电报局长，这是一位矮小半胖的人，大概有四十三四岁的光景，脸色是带青灰色的，左眼有点斜视，矮子的姓名我现在已经忘记了。他来和我寒暄，问我认不认识谢慧生（谢持），认不认识杨庶戡，我都答道认识。又问我从前在上海住在甚么地方，我说是环龙路四十四号。他大约相信我是西山会议派的一个分子了罢，便把声音放低，便对我说出许多秘密的话来。我把他招到屋隅，两人并坐在

一张长藤椅上说话。

他说："我们这一次的工作做得还算不差，我们在三个礼拜以前便把各种行邦的工头买贿好了，我们立刻就把总工会组织了起来。其他农会、妇女协会、商民协会我们都组织好了，所以我们党部的捣乱分子，走来就插不住脚。"

我称赞了他们一番，又说："好是好，但只是一个空头的团体，他们捣乱分子依然还是要捣乱的，我们总要有一种武力来制裁他们才好。"

他听见我说，便很得意的说道："有的，有的，我们昨天打了一次你是晓得的，我们今天还要打呢。"

又另外说了些闲话，我问他安庆的青红邦有多少人。他说："不少，不少。"

我说："青红邦我们和他们总要有联络才好。"

他说："是呢，是呢，我们早连络好了，九江、安庆、芜湖、南京、上海一带，我们都和我们的'老头子'连络好了，我们要走一路打一路，专门打倒赤化分子。"

我说："我们的杨处长杨大哥，他这一次的功劳很不小。"

"嗳！就全靠他老哥子！"你矮胖的斜眼局长！我真多谢你这一句话，所有一切的内幕我已经知道了一半了。在二月初头的时候，蒋介石委任了四个上海的大流氓为驻沪特务员，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他的用意之所在。那时候我和总政治部铁罗尼顾问谈起，铁顾问问我是何用意，不消说我是没有话来回答，我记得我只回答了一句笑话，"大约这就是他的所谓下层工作罢"。但是现在我明了了，我得到明确的答案了。我们的总司令是勾结青红邦来和我们革命的民众作战的英雄！你看我们国民革命军三色识别带不是变成了青红带了吗？这就是说我们革命军的总司令已经成了青红邦的老头子了。我们是何等的光荣呵，三民主义已经被流氓主义代替了，猗欤休哉！

我和斜眼局长谈话的时候，杨虎、姚觉吾诸人惶惶然如将赴猎的鹰犬，时出时入，并不断注视我，我也不便再行多谈，并且我也恨我的听觉不幸得了慢性的中耳炎，斜眼局长告诉我的秘密，我至多只听到了三成，然而我也算达到目的了。

我推诿着要去见总司令，便把谈话中止，走出室来。总司令室的房门依然是反扣着的。我告诉了侍从付官，说我到交通处去了，请你随后来关照我。

我一直走出来，走向交通处长陆福庭的房里去。走过第二进的大堂的时候，已经有不少的反动团体的打手鹄立在那儿，有刘文明、李因、温建刚诸位豪杰在那儿指挥。我走过身去见了陆福庭。

福庭他号叫心亘，是从"恒"字拆开的，取的是"人贵有恒"的意思。他是一位忠厚长者，在总部里面我最喜欢他这一个人，他也很能和我要好，但我现在要把他告诉我的一番话实写出来。心亘呵！我知道你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你是具有革命热诚的人，万一我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于你的地位，乃至于你的生命有甚么危险的时候，我请你不要怨恨我。

我见了福庭，他也不免带了几分愁容在他的古铜色的罗汉模样的脸上。他开口便向我说："安徽的事情弄得这样糟，你是政治部主任，你应该怎样办呢？"

我说："我能够怎么办呢？总司令不要我办，你叫我怎样办呢？我今天就是要去向总司令请示办法的。"

"你见过他没有呢？"

“他还在会客。”

“昨天打架的事情你晓得不晓得？”

“我怎么不晓得呢，今天还要打呢。”

“是啊，是啊，要闹得一榻〔塌〕糊涂。”

我说：“你怎么不去向他说呢？”

“我怎么能够向他说呢？”

我说：“你是安徽人，你又是一位忠厚长者，老总待你也不薄。你看见老总一天一天和民众脱离，你看见安徽的民众一天一天的更要受深厚的痛苦，你应该救救你们的乡梓，应该救救老总才行。你的话老总一定能够相信的，你赶快向他忠告一下罢。”

他抱着手只是摇头。他叹了一口气说：“哎，我敢说一句话，总部里面的安徽人除开我而外那一个不是忘八蛋！他们只顾自己的升官发财，天天去包围老总，把老总弄得个莫名其妙。我一个人孤掌难鸣，所以我也只好装聋装瞎装哑，看见的当着不看见，听见的当着不听见，假使张治中还在这儿，我也没有这样孤单，我也可以说两句话。”

他说的时候，两眼圆睁着分外的发光，全部的面孔都涨红了。这正是他的诚恳的人格的表现，我在他的面前总觉得自己这样不好，我不该假意的做出了许多表情来逗引他说出比我更知道得详细的秘密。

我说：“假使老总不给我一个办法时，我要向他辞职，你看怎么样？”

他连连摇头说：“不好，不好，到了南京再说。”

我说：“陆大哥，你要替我想一条出路呢！”

他只是说到了南京的时候再说。他仃了一下又说：“到了南京一定是要大流血的，你看吧，你看吧，老总一定是要拿人！”

“你看他拿人的时候会不会先拿我？”

他略略仃顿了一下说：“不会罢！”

我又激励着他说：“你究竟还是应该先向他忠告一下的好。”

他说：“我是不好说的。”

我故意地激昂起来，我说：“你不敢说，那我要去说，我今天是决了心来的，他要枪毙我，我也要向他说。象他这样和民众脱离，我不忍心见他走到绝路。”

福庭沉默了一晌。他说“你晓得他们打架，在暗中主持的是甚么人？”

我说：“我怎么不晓得呢，就是杨虎他们连络起青红邦干的好事。”

“对，你晓得了，你还说什么！”

我说：“唯其是晓得，我定要去说。他们这些人不消说也是忠于老总的，但他们所用的方法只是送葬老总的。我不忍心看见他被他们包围。”

他又叹了一口气说：“哎，我看你还是不去说的好罢。”他把声音放低，又向我的耳边说道：“你晓得吗，杨虎是老总命令他来干的！”

说着，他把眼睛向外放出一段白光看着我，他的面孔还带着一个“你晓得吗？”的神气。

我又沉默了一下，又问他：“你怎么晓得？”

他说：“是小波（杨虎的号）亲口对我说的。”

两人从此沉默了。啊，我已经知道了这场黑幕的全部了。陈赞贤的惨案为甚么他批准了对于倪弼的免职查办时又叫我不要打电报到赣州去？段锡朋、周利生等为什么敢那样坚决地解决南昌市党部？九江的"三一七"惨杀为什么发生得那样离奇？这一切的背景我是完全知道了。在这儿让我来补叙一下以往的历史罢。

赣州事件的起初是在正月尾间，那时蒋介石在庐山，总部的事情是由张群一手包办，他当时接到倪弼捏造的电报，便把新编第一师第二团团党代表段喆人免职查办了。不久蒋介石回了南昌，才将赣州事件的全案交政治部查办。我当时便拟了一个办法呈报给他，请他将倪弼调开，然后赣州的事情才有办法，但他没有批发下来。后来我又当面向他说过两次，两次他都答应了我要把倪弼调开，但总不见他实行。最后倪弼更加刁恶了起来，终竟把陈赞贤杀害了。省政府当时来了一个公函请政治部严办。三月十二日的清早，就是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的那一天，我拿着公函去向他请示。他说："免职查办罢。"我说："那末请总司令亲笔批示。"他说："好的。"便提起笔来想了一下，批了"免职查办"四字。我又问如何查办法，命令如何下？他说："你用我的名字拿去登报好了，但不忙打电报到赣州去。"他这岂不是欺骗的行为，只是略略用些伎俩欺骗民众吗？

就是段锡朋、周利生等的行为我也当面向他说过几次。就在他临走的十五号的晚上，我听说省党部有解决市党部的消息，我又向他说。他当时便写了一封信给段锡朋，说"江西党务以后事事须与总政治部接洽，对于市党部事宜缓和为是"等语。我当时觉得非常的满足，以为可以免去一场纠纷以静待中央的命令。但是当晚他走了，第二天我们也奉命出发了，段锡朋、周利生辈终竟把市党部强制解散了。俟后南昌总部、省政府、省党部打成一片，背叛中央，收买流氓伤兵几次想大肆屠杀，幸亏第三军第七师深能负责，保护地方的治安，他们的阴谋也就没有方法暴露出来。最近听说总部已向赣州调新编第一师来南昌，这是显然要把屠杀赣州的手段在南昌重演一次，这些假设没有蒋介石的命令，总部留守的张群，他有这样的狗胆吗？

三月十六我们到了九江，第二天他就命令我上庐山去视察阵亡将士墓的工程。我到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回九江，刚刚遇到暴徒们把九江市党部打完了的时候。暴徒们手拿武器在街上游行，长矛大刀等等不一，尤有一种特别的武器形如连枷，上面纵横都是尖刀，也有的是竹头的尖钉。我走到总工会门首的时候，看见一位工友被打得头破血流，一身都是血渍，我才知道已经打伤了好几个市党部的执行委员，还打死了好几个。那时街上有些店铺已经罢起市来，我便跑到审判厅的总部行营里面去见蒋介石。门首正簇拥着无数暴徒，参谋长朱一民正在代表蒋介石向暴徒们演说。所说的话刚好和蒋介石向安徽伪总工会所说的一样。

我去见蒋介石，把外边的情形报告给他，请他派兵去赶快把暴徒弹压着，首先要解除他们的武装。不一会朱一民进来，报告他代表答话的情形，说他们送了六个人来，如何处置。蒋问有名单没有？朱一民交出了一张名单。蒋说把他们接受起来。我又催促派兵弹压。我说假使不赶快弹压，九江会要罢市，全体的工人也会要罢工，情势是很严重的。他当时便命令朱一民派兵，我也就退了出来，因为他叫我们十八号出发。但他派兵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暴徒们暴动后，工友们愤激起来，顿时召集了纠察队来要求解除暴民的武装。他派了他的卫士大队去一方面弹压工人，一方面掩护暴民出市，同时借保护为名竟把市党

部总工会占领了。工友们愤不欲生，开会讨论对策，全场只是痛哭，那种凄怆的情境真是惨不忍见、惨不忍闻。工友们要求“三一八”全体总罢工，后来又举出代表向总部请愿，算把六位打得半死的同志解救了回来，但因为念到军事时期，南京尚未克复，正是输运军队的时候，大家都忍气吞声，没有把罢工的事情实现。但是蒋介石对于罢工的策略，却早已决定好了，他当晚就任命第六军的留守唐蟒为戒严司令官，叫他要禁止工人罢工，同时又密令初开到九江的警卫团，假如“三一八”有工人罢工，便立行拘捕。

他对待民众就是这样的态度！一方面雇用流氓地痞来强奸民意，把革命的民众打得一个落花流水了，他又实行用武力来镇压一切。这就是他对于我们民众的态度！他自称是总理的信徒，实则他的手段比袁世凯、段祺瑞还要凶狠。他走一路打一路，真好威风。他之所谓赴前线督师作战就是督流氓地痞之师来和我们民众作战！赣州、南昌、九江的事变都是出于他的指使，但我们还找不出他指使的真凭实据来。我们还替他原谅，就是说或者不是出于他的本心，只因为他的环境不良，他是被他周围的群小误了。国民党内的人们可以说大多数都在这样的替他原谅，总要想出方法来救他。但是现在我把他的假面具揭穿了。在安庆“三二三”之变我看出了他的真相来，他不是为群小所误，他根本是一个小人！他的环境是他自己制造成的，并不是环境把他逼成了这个样子。我们听了斜眼局长那番话，谁个还有方法来替他辩护呢？现在还有人来替他辩护，那就是国贼，那就是民众的叛徒，我们要尽力的打倒他！

我在陆福庭房里谈了一番话后，蒋介石的侍从付官来了，我便走进去见他，照例是那几位豪杰杨虎、朱一民、温建刚、姚觉吾、刘文明、李因等等正在提刀上马准备和暴徒们出去杀民。朱一民是代表蒋介石出席大会的，他是今天的暴徒们的代理总司令了。

我去见了蒋介石，他带着一种栖遑不定的神气。

我说：“今天又要开会了”。

他说：“他们那么样子干，我是不出席的。”——看，他这岂不是不打自招吗？他刚才反闭着房门在和甚么人密议些甚么，我们是很可以想象得出的了。

我也老着面皮向他讲：“我们可不可以派点兵去保护省市党部呢？”

他说：“你去向参谋长讲罢。”

我反说：“象现在这样军事紧急的时期，这种捣乱的集会，我看总司令可以下一道命令去解散。”

他说：“好吗，你去向陈调元讲罢。”他还要解释一句说：“他是维护这儿治安的。”

我平生最感趣味的，无过于这一段对话。他以为我是全不知情，在把我当成了小孩子一样欺骗呵。蒋介石，你要掩盖些甚么，你的肺肝我已经看得透明，你真可谓心劳日拙了。

我又只好退了出来，朱一民一面好象忘了甚么东西又回转到他的参谋长室，我也把派兵的话说了一遍。他马马虎虎的答应了，也没有说派，也没有说不派。他走出去，我也跟着他走出去。那一群豪杰杨虎、刘文明、温建刚、李因、姚觉吾等等指挥着流氓把朱一民簇拥起去了。我从流氓群中赶回总政治部，又派人往四处通报消息，叫他们没有准备就赶快回避。还算好，待我第三次派人出去回来报告，说省党部及各种合法的民众团体统统都

被捣毁了，打伤了六个人，重要的人物都避开了。

这打伤了的六个人里面有两个是七军政治部的人；有一个是省党部的干事；有三个是外县来赴会的代表。三个代表有一个是从旅馆拉出来的，有两个是一位男同志和一位女同志，他们到省党部去开会，适逢着暴徒们，便被擒着。暴徒们把他们的外衣剥了，只剩着一件衬衫，打得半死之后拉着他们游街，说他们在省党部白昼宣淫，这就是共产公妻的赤化分子榜样。暴徒们沿途高呼口号，甚么“新军阀神圣万岁”啦，甚么“蒋总司令万岁”啦，甚么“打倒赤化分子”啦，真是叫得恰如其量。他们确是捧出了一个“新军阀”来，他们确是捧出了一个“实行讨赤的新五省联军总司令”来了。暴徒们把打伤了的人拖到总司令部的门前便一哄而散了。这就是蒋中正的群众，这就是蒋中正的忠实的同志，这就是蒋中正的纯正的三民主义的信徒，也就是他所认为可以候补文天祥、陆秀夫、岳武穆的材料了。真真是新军阀神圣万岁啦！讨赤联军总司令万岁啦！猗欤休哉！猗欤休哉！

写到此地我也可以不必再写了，但是还有一点余谈。

那天暴动了之后，李德邻军长曾去见蒋介石，问他有甚么办法。他说：“是民众打了的，我有甚么办法呢？”

我当天晚上也冒着险去会他，他仍然是那种老调子：“好啦，你去调查一下好啦，唵，唵。”他最后还向我说：“你去把他们各项的执行委员找出来罢，我们好保护他们。”我心里倒忍不着要笑了，好保护他们？哼，找出来好让你一网打尽吗？

这是我和他的最后的一次谈话。他第二天清早便乘着军舰出发了，我们以为他到了芜湖必定又有一场杀伐，但是南京克复就在他痛打安庆民众的这一天，他大约是在途中得到这个消息，所以就赶到上海去了。他日夜梦想的就是在克复南京，好实现他新五省联军总司令的春梦！但不幸克复南京的是富有革命性的程颂云军长所指挥的第六军。在第六军未克复南京之前他使程颂云军长孤军奋斗，不给以充分的接济，不给以充分的后援，想和程军长攻入南昌城一样再加以一次打击。然而勇敢善战的第六军终竟把南京克复了，从浙江入江苏的第二军也和第六军会集了起来，这是我们革命势力的最大的一个屏障。他现在新发表了一个作战计划，就是要把第六军第二军调赴徐州，把何应钦和白崇禧所领率的他的直属部队来镇守南京，他的阴谋是十二分地显著的。他现在想解决第六军第二军，同时还想解决第七军第三军，他和陈调元、王普、叶开鑫等深深勾结起来，陈王的军队现驻在芜湖，本来是应赴皖北的江左军（第七军）只有一营人驻在安庆，他也把他调到了芜湖，这就是他一方面想借陈王的军队来断绝六、二两军的后路，一方〔面〕也想来解决七军的一营。他取的是零碎击破的策略，这个策略在对第三军的手段上更为明显。他把第三军第九师调到当涂，名义上归程颂云军长指挥，把第三军的第一师驻扎安庆，名义上给李德邻军长指挥，驻扎南昌的第七师他仍然在不断的零碎调遣，他这样使第三军已经不得成军，而他在江西方面不久正要为所欲为。目前所有的交通机关都握在他的手里，电信、邮局可被他严密的检查，前后方的消息完全隔绝，他防备近友比防备敌人还要厉害。我们从安庆拍发的通电全被扣留，比如安庆“三二三”的惨案，九江、南昌的同志，竟连丝毫的信息也不曾得到，拍到各地方的电报也被扣留了。中央已发表以李德邻军长为安徽政务委员会主席，被他扣压着没有发表，另外擅行委任了一批二十八名的政务委员，去掉几位洁身自好绝对不会服从他的伪命令的同志之外，都是些败残的军阀，安福系、西山会议派的余孽，流氓痞

棍的头目，比如青红邦上的杨虎、李因，著名的大刀会匪的首领刘文明都是榜上有名的人物，而以陈调元为主席。现在安庆城内完全为白色的恐怖所支配，党部的同志除少数已赴武汉传达消息之外，都坚持着住在城内以与恶势力作殊死战。到了黄花岗节（三月二十九日）一定有冲突的，因为两方面都有准备，现在还没有消息传来，不知道又流了多少同志们的鲜血了。

但是这场奋斗是最有意义的。蒋介石叛党叛国叛民众的罪恶如此显著，我们是再不能姑息了。他在国民党内比党外的敌人还要危险。他第一步勾结流氓地痞，第二步勾结奉系军阀，第三步勾结帝国主义者，现在他差不多步步都已经做到了，他已经加入反共的联合战线，他不是我们孙总理的继承者，他是孙传芳的继承者了！同志们，我们赶快把对于他的迷恋打破了罢！把对于他的顾虑消除了罢！国贼不除，我们的革命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数万战士所流的鲜血便要化为白水，我们不能忍心看着我们垂成的事业就被他一手毁坏。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

现在我们中央已经一天一天的巩固起来，新改组的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国民政府已经正式成立，武汉已经真真正正的成为了革命的新都！单从军事的指挥上来说，现在有了军事委员会，已经用不着再有蒋介石这个"总司令"了。所以消灭这个总司令，在军事的指挥上只是有好的影响，并没有坏的影响。

或者有人说：现在奉系军阀还没有打倒，我们便自相残杀起来，这于革命有很大的危险。我敢说这完全是一种杞忧，而且是蒋介石派反宣传的一种策略。他天天都在残杀我们内部，而他偏偏说"你们不要残杀"。"不要残杀"，就是说"我打你，你不要还手，好让我来独霸！"这是一种反宣传，我们千万不要中他们的毒计！

至于未打倒奉系军阀的话，我还敢说一句：未打倒奉系军阀，先要打倒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已经成了张作霖的爪牙。张作霖的命令他已经早早奉行了。张作霖说："你把左派排开，你把赤化分子除掉，我就和你合作。"蒋介石早就拚命的排斥左派，拚命的讨伐赤化了。我们根本的作战计划本来是决定北上与西北国民革命军连成一气，先去打倒张作霖的。蒋介石因为想实现他的新五省联军总司令的美梦，他因为妒嫉冯焕章，怕冯焕章夺了他的首功，所以他题外生枝，要来解决长江下游。他对于冯焕章不肯加以接济，使他久陷在西北边地，不能早日东出会师中原；他甚至连武汉方面的党军也不肯加以充分的接济，使西路军不能早入河南。他把张作霖的势力养得非常雄厚，而自己摧残自己，他这还是我们的友人、还是我们的同志吗？他这不是比我们的敌人还要厉害吗？同志们，我们学他一句话："你看他该杀不该杀！"

现在幸亏我们前敌将士的奋勇和民众的努力，我们已经把长江下游肃清了。河南方面靳云鹗司令所率领的军队也深明大义克复了郑州，使敌将于珍战死。西北国民革命军经过长久的苦战奋斗已经到了洛阳。我们可以说消灭奉系军并不是困难的事情。我们当前的敌人就是我们内部的国贼！国贼不除，我们的内部只有崩溃下去的，民众一天一天和我们脱离，勇敢有为的同志一天一天被他们排挤，不要等奉系军阀、帝国主义者来攻击我们，我们自己就会败亡的。所以我们未打倒张作霖，先要打倒蒋介石！

或者有人说：他是劳苦功高，我们不能因为他一时错误便抹杀他以往的功绩。这是骗

人的话！他劳苦甚么？深居高拱，食前方丈，比古时候的南面王所过的生活还要优渥。他劳苦甚么？前呼后拥的被无数的手机关枪、驳壳枪簇拥着，偶尔上上战线看察，这是那个干不来的事体？至于说到功高，那更是封建时代的废话。大凡一种事业决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任何个人不能独居其功，即使有功——就是说把一件事业做好了——这也是应分的事体，并不能以此自矜。蒋介石以往的军事并不是他一个人所手创的，都是同志们为革命为国家努力的结晶，同志们为革命为国家努力，这是十二万分应该的，这有甚么功？而他个人的功又高在那里？我们只有革命事业，只有国家，没有个人。同志们努力的结晶，便结成革命的光荣历史，这是永远不能磨灭的。有人想要来磨灭他，毁灭他，这就是革命叛徒！这种人我们对他不应该有甚么姑息，不应该有甚么迷恋，不应该有甚么顾虑的。蒋介石就是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为尊重我们革命先烈所遗下来的光荣历史，我们要保存这种历史，我们要继续着这种历史的创造，所以我们尤须急于的要打倒他、消灭他、宣布他的死罪！

我想说的话也大抵说完了。我是三月二十八由安庆动身的，本是奉了中央的命令要赴上海工作，但因种种关系先折转到了南昌来。前天我到九江的时候，听说中央已经免了蒋介石的职。今天是三月三十一日，我在南昌草写这篇檄文，愿我忠实的革命同志，愿我一切革命的民众迅速起来，拥护中央，迅速起来反蒋！

最后让我们高呼：

打倒背叛革命、屠杀民众的蒋介石！

铲除一切国贼！

惩办各地惨杀事变的凶手！

以革命的手段向白色恐怖复仇！

拥护武汉的新都！

拥护中央最近全体会议的一切决议案！

拥护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原载《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2期）

## 〔附〕赣州总工会横遭摧残的情形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五日南昌通信）

赵　幼　侬

在叙述之先，应先将赣州的环境简单分析一下：赣州的商民，站在可左可右的地位，

但易于和旧势力结合。学界有一部分反动者，欧阳魁余虫天最甚。因赣南新报经省党部议决封闭，余欧二人极愤（余为反动之赣南新报主笔）。因此对革命势力，发生反感，种种风潮，便种了大因，所谓赣州纠纷，即是由此产生，赣州总工会即是在此而遭摧残。兹将遭摧残的经过，写在下面。

（一）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洋货绸缎布匹店员工会店员往二女师看演新剧，该校不许，有一二无知店员在校门外照墙上用黄土写了“男女不平等便是反革命”“男子睡上，女子睡下”“打倒二女师”等字样（绝对与妇女解放协会无涉）。

（二）次日欧阳魁召集各团体开会，谓店员侮辱妇女（指墙上的字而言），在这会上议决解散洋货绸缎布匹店员工会（该会千余会员，竟因此些小事，受人欺压，一至于此），且不许店员入党——国民党。

（三）三十一日，欧阳魁等复召集各团体在县署开会，讨论解散工会事，各界旁观者约有千人之谱，商人工人学界妇女小孩，无所不有。主席只许妇女演说骂工人，禁止工人演说辩白，因此引起工人责问，人声嚣喧，秩序大乱。欧阳魁等无中生有，蒙电上峰捏造蜚言，不可胜数，如曰：“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萧韶钟友千等，纠集工友千余人，包围会场见人便打，捣毁器具，殴打党员捣毁县署……”，只恐诬陷之不足，不按事实之真相，其目的不外摧残工会而已。

（四）洋货绸缎布匹店员工会加薪问题，在店主方面，已表示允许依照工会最初提案减六十元。惟去留店员一层未允许，反动者借此鼓动商民，与工会为难。实际此时，已发起工商恳亲会，以调剂一切。

（五）新编第一师之政治部主任（师党代表）倪弼，由南昌抵赣州，不向工会调查情形，只偏听欧阳魁等一面之词，对工会时有不满表示，外间偏传彼欲以武力干涉工会。

（六）倪弼致函赣县公署，托名召集各团体开会解决纠纷，并分配驻兵地点，实际此时无多大纠纷，要如此大会解决，倪弼因欲诱工会负责人而入之于罪，故有此无事自扰之会。在开会之先，街市纷传倪弼欲于会议席上捆绑总工会委员长，将开会时，果密布驳壳兵于会场内外，并皆出枪实弹，而各街口亦散放步哨。如临大敌。因此总工会委员长未出席，只派代表萧诗友出席。倪弼于会议席上，任意怒骂，当〔即〕扣押萧诗友，随派大队驳壳兵入总工会搜索，捕去文牍陈存善，收发赖质文，又工友二名，并发枪二声，又派武装兵驻守城门，搜缉总工会办事人员，又派兵驻守邮电局，阻截总工会文电，——十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以后事也。

（七）一月二十七日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钟友千，因避倪弼凶焰，不知去向，萧韶又于数日前回家，总工会无人负责，各工会乃秘密开联席会议，推选临时委员长阳立垣刘昌英焦清鉴三人，暂维现状，并派代表十一人赴省向各机关请愿，结果，经中央党部政治会议议决，由总政治部会同省党部工人部，张师长与仁，调查办理，现请愿代表尚滞留南昌，非达到下列目的不止：（甲）撤换倪弼；（乙）取消秘密搜缉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萧韶钟友千令；（丙）释放被捕之工会人员；（丁）撤退邮电局军队；（戊）保障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

## 附　赣州各工会代表团请愿书

为新编第一师师党代表倪弼压迫工人，摧残工会，请予援救事。缘赣州工会自组织以来，迭遭旧社会一部分人之诬陷，如洋货绸缎布匹店员，因往二女师范看戏被拒，在校门外写了二句骂刘淑贞之文字，此乃工人个人之一时错误行动，而该校校长欧阳魁遂扩大风潮，召集各团体，议决解散工会，电蒙上峰，诬告工人捣毁县署，殴打欧阳魁、陈铁等人，总工会已将其虚伪证实报告政务委员会特派员孔献瑋先生。又一次赣县党部筹备处谢溥泉等，违法舞弊，引起同志间不满致代表大会未开成，此乃纯粹国民党内之事；乃代表许迪献等竟电蒙上峰，谓工人代表，推翻桌凳，痛殴书记，并牵涉与此事毫无关系之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现今倪党代表利用旧社会一部分人之薄弱心理，借解决纠纷为名，制造纠纷，大发宣言通电，诬陷工人及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等，赣州各工会工人深知陈赞贤等为真正革命者，确实替工人谋利益之人，倪党代表诬以工贼之恶名，秘密严缉，赣州各工会工人认为系用去火抽薪之方法，借此摧残工会；且倪党代表实行用武力拘捕工会人员，摧残工会，赣州各工会工人认为已陷于严重压迫之下，非请求上峰充分解救，将使民众运动，无法发展，故各工会全体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议决推派代表等来省请愿，谨将倪党代表摧残工会之事实，详叙如左：

一、倪党代表初到赣州，外间即盛传其欲以武力干涉工会。

二、有一次履业工人，因开会晚回，店主不开门，致在外受冻一宵，次日与店主交涉，有一军官以驳壳恐吓工人云："你们的什么吊毛工会"；又交一名片与店主云："以后工会如果与你们为难，你来找我，自有办法。"又有一次纸业工人，因违反工会议决，工会执行处罚，有一军官，以驳壳恐吓禁止工会处罚。以上二事皆由于倪党代表，主张以武力干涉工会所致。

三、一月二十六日，倪党代表函请赣县临时政务委员会，召集各团体负责人，开会解决纠纷，并分配驻兵地点，期前各处纷传倪党代表，欲于席间捆押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将开会时，会场内果然密布驳壳兵，各街亦散放步哨，如临大敌，总工会委员长恐发生意外，不敢前往，派代表萧诗友与会，倪党代表于席间大发雷霆，极意怒骂，当将萧诗友拘押。

四、一月二十六日晚，倪党代表派驳壳官兵二十余人（背刀带者甚多）入赣州总工会搜索，捕去文牍陈存善，收发赖质文又工人二名，并放枪二响。

五、一月二十六日后，倪党代表派兵驻守各城门，通缉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萧韶、钟有千等，又派兵驻守邮局电局，阻绝赣州总工会之来往文电。

六、倪党代表召集商学各团体，组织人民裁判委员会，裁判陈赞贤等，人民裁判委员会之组织，乃对待敌人之办法，从未闻用以对待做工人运动者。且陈赞贤等乃国民党员，尤不能交人民裁判，破坏党纪。

七、倪党代表，往工会演讲，谓："各工友工会皆甚好，惟有陈赞贤不好，如你等能打倒陈赞贤，我当时常来指导你等。"工人不服其话，即又谓："你们拥护陈赞贤，便是反革命。"如陈赞贤不好，何以能训练良好工人组织良好工会？此不解者一；在不服倪党代表之话以前，尚是甚好之工人（早已开拥护陈赞贤大会）何以片刻之后，便变为反革

命之工人？此不解者二。

窃赣州各工会工友万余人，付托于代表等之职务，为要求下列条件：

（一）撤换倪党代表。（二）取消秘密通辑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萧韶、钟友千令。（三）释放被捕之工会人员。（四）撤退邮电局军队。（五）保障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以上要求，万恳俯予允许，使赣州工会得巩固之保障，代表等代表赣州二万工友，当效死以报。谨呈。

赣州各工会代表请愿团印二月十二日

（原载《向导》191期，1927年3月出版）

# 〔附〕江西民众代表关于<br>蒋介石摧残南昌、九江党部经过报告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九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

江西代表邓鹤鸣：

鹤鸣受南昌民众的委托，代表请愿，兹将最近江西反动派行为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江西省党部为张静江陈果夫私人的党，收买教育界的反动分子，思想落后的青年组织A、B与总理三大政策完全相反，派人到各县党部组织包办，如永丰等县，业已改选，下届尚未到期，复令重行改选，务期党务包办，变成段锡朋私党而后已。赣州的惨案是国家主义的胜利，醒狮周报每期销数甚多，此次国家主义者日日在赣州挑拨民众感情，挑拨工人与商人感情，将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杀死，人人愤激，向省党部请愿有十余万人，段锡朋至总司令部请兵，解散民众请愿，最近南昌市党部筹备总理二周年纪念大会，是南昌市民自动组织，计筹备有一月，是整个的纪念，而省党部与A、B，又复单独组织，破坏民众组织，仅演戏纪念，而演之戏多失总理精神，当日开会口号之提出，蒋至会场大为不满，问口号是谁提出（或谓民众意思），我有我的口号，就是拥护江西省党部，反对江西省党部的即应打倒，蒋是15日离南昌，16日解散南昌市党部，封闭贯彻日报（按贯彻日报不过多登些消息），新闻记者被捕，并声明解散市党部、农协、工会，工人大愤，拟立与奋斗，由工会、农协负责同志力加劝止，目前不必抵抗，中央自有正当解决。16日鹤鸣到九江蒋亦抵九江，九江县党部收买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将市党部国民新闻，农协皆行捣毁，国民新闻被捕三人。又在南昌发行一千五百万公债，增加人民负担，以七百万买军械，添募省防军，养成军阀。又将南昌市同志比行通缉，种种反革命行动，罄竹难书，张作霖张宗昌所不敢做者，蒋皆悍然为之，南昌此次欢迎党军，牺牲三千余农民，房屋烧毁

数十间，而所得报酬如此，言之尤为痛心。将江西变成白色恐怖，希望中央将省党部取消！鹤鸣此次亦参加省党部执监委员之改选，见其行为荒谬，遂行退出，16日南昌情形17日九江情形，另由同志报告。

## 南昌市党部代表报告

南昌市此次反对非法举动，16日发生严重事变，派来向中央报告，南昌市之电报拍发不出，为反动派所把持，15日晚封闭贯彻日报，市党部一闻此信，立加准备，恐有暴徒来袭，蒋临行时曾写信告段锡朋一切不必操之过激，可与郭付主任商量。自得中央执行委员会改选江西省党部消息后，顿形恐慌，遂召集五百余人开会（教育界反动分子，国家主义者，流氓地痞等），仅由主席之报告，并无决议，谓实现中国国民党，必须打倒市党部，说罢立即蜂拥至市党部，事前市党部已将文件搬出，未为搜得，遂将会计一人，用绳捆綁送至省党部，不二分钟由省党部某代表，取出名单按人拘拿。十六日晚街市空气非常恐怖，必欲尽得市党部之执行委员而甘心。本定捣毁市党部，并捣毁农民协会，总工会工友愤愤不平，遂向之质问，后经总工会代表极力劝止，然工人之愤激实欲与之决一死斗，如维持稍松，则定演流血惨剧，现向中央请求如不早日解决，则重演九江事变。

## 九江代表报告

此次因惨案逃出，九江十七日之惨杀，为空前所未有，自江西省党部非法改选后执监各委员皆反动分子，反动派遂着手组织九江县党部筹备处，令各区党部解散。一面用土豪劣绅为党员，一面用地痞流氓捣毁九江市党部、农协而由省党部取消之。所有标语皆为撕毁，自联络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捣毁区党部市党部农协以后，其目的盖以先摧毁九江，其余乡间必可解体，国民新闻记者之被捕，兄弟亦在其内，由各团体之请愿，13日始行释放，十七日流氓地痞持刀剑棍棒将市党部、农协、总工会、国民新闻捣毁，市党部死三人，农协死一人，秘书与组织部长伤势甚重，现在也许已死，总工会死纠察一人，秘书宣传伤势亦重，国民新闻捆去一人迄无下落。此惨案未发生以前曾报蒋总司令，蒋答不能干涉，是人民的事，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于是置不闻问，工友大愤，拟打倒土豪劣绅，经负责同志劝止，并捉去同志六七十人，蒋将此六七十人解送总司令部，自17晚得消息后即自中央控告，本拟书面详细报告，因为文件为流氓地痞捣毁，仅口头报告，请中央从速赐予办法。

## 〔附〕广州市党部代表黄侠生关于党部被反动派摧残情形的报告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速记录——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兄弟是代表一、二、三、四、五、七、八、十，八个区党部及第十三区党部属下七个区分部来报告从前与最近情形：广州市共有13个区党部，先由八个区党部举发第十三区党部选举黑幕，其他六、九、十一、十二之区党部，虽皆在反动派势力之下然其属下之区分部亦多数是革命的，八个区党部会议他们亦派员参加，现分期报告：当张静江派兵包围市党部解散市党部时，同志因慑于兵威不敢抵抗，欲到国民新闻民国日报将此消息传播又不为登载遂无办法，张静江借口市党部执行委员过期尚未改选，不知市党部不能改选实系奉中央组织部（陈果夫）令非俟新党证发清不能改选，而陈果夫故意延宕从七月起直至十二月六日解散之日，尚未将党证发下，以致党员登记之后，旧党证既缴入中央党部，新党证又未领到，一无凭据，如何能改选。而张静江又阻不令发给，同时中央各区党部可介绍者，市党部皆行接受。张因无私人在候选遂包围市党部，区党部党员有质问其根据何项党章？则又禁锢其六小时，不许外出。其发纵指示为甘乃光、徐天深、李济深、陈孚木、曾养甫等加以包围，认为党员为谋叛，各区党员皆觉得奇怪异常。自经特别委员会之接收组织部部长为徐天深，对于凡努力党员以及热心之各区党部之职员，皆视为CP，尽数排除其区党部。有受其非法命令者如第三、第四两区党部则又令人捣毁，又派兵接收，其摧残情形如此。宣传部部长甘乃光接受国家主义之宣传，最可叹者一夜之间雇佣二百余人负了二百多个阅书报处招牌到各区分部挂起，而作为各该区分部图书报处之成立，宣传部并未发给书报，各区分部因预备书报来不及党员往阅，不得书报，遂与区分部发生纠纷，同时甘乃光组织LY（左社）之团体谓系照CY办法，此为甘乃光的小团体，凡党员皆需加入此小组否则必要排除，与湖南左社极似，至工人部反动情形，则陈孚木一身兼有农工厅长、省党部工人部长、市党部工人部长，骤看似甚统一，但陈曾告省党部工人部职员，不许发出统一工会之通知，其意不但不欲工会统一，且欲其分裂，又组织青白社，唆摆反动工人，加入该社，并向工人声称此青白系农工厅省市党部工人部职员，如果工人皆加入，则工会即可立案，工人不知加入青白社以为可以立案，孰知竟误堕其彀中，该青白社社址在云南会馆，系占据中央党部所立之工人俱乐部地址，陈孚木亦有纵恿抢油等工会之嫌疑，又唆令机器工会（反动派）捣毁粤汉、广三、广九三铁路工会，李济深并派亲信人至机器工会邦忙文字上反革命之煽动。市党部之改选，本定中央市党各九人，各区介绍二人，自特别委员会成立，各

区党部之介绍候选人，皆遭推翻，其介绍者多非本区党员，且未登记如唐允恭本报八区居住，乃因欲当选之故，漏夜迁移住址，此外如十二区之李悦义（青年部部长）亦皆如此。且有不在河南住者到选举时，派人兜揽，由军队巡警抢票代选，或逼令其必选某人，凡各区执委皆不令到场监视，始而宣布李悦义无效，明日忽又宣布有效，取舍均有一人之意思而定。李悦义曾西盛在教育会不许党员开会带了军警多名，赶走党员二千余人，并有某同志被殴甚重，奄奄一息，党员大会因之不能召集，又仿照张静江办法，派兵到第三第四区党部接收并捕去同志数人，何同志与我，曾被围困三四日，现在不能在广州进行党务到中央来请愿，除八个区党部外，十三区党部因常务委员为曾西盛禁锢不能行使职权，所以十三区属下之七个区分部，及油业工会、面粉工会、景轮吉照工会亦托本人代表他们前来请愿，陈森以杀凶犯现居然能出入往来公安局，故各工会尤形恐慌，兹请求中央允准各事：（一）规复原日广州市党部第一届执监委员会并加派人员回粤协理。（二）宣布张静江个人所委之特别委员会无效及分别制裁。（三）取消违法选出之第二届执监委员并分别查办。（四）着原日第一届执委以最短期间依法筹备从新改选并严密审查候选人。（五）训令广州政治分会广东省政府及第四、第五两军广属警备司令市政府公安局等机关妥为保护。（六）关于第三、第四两个区党部执监委应特别注意明令保障。（七）开除曾西盛工贼党籍，并注意左社行动。

#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

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还正在那里伺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是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级（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不至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警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释解。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示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亦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商协，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披沥陈词，万希各省自察！勿致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

汪精卫、陈独秀

#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前后后

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编

## 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

### 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接应下杀奔上海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海总工会率领八十万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地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两天一夜的剧烈巷战，打败了北洋军阀直鲁联军的顽抗，胜利地占领了上海。在战斗结束后，上海总工会即迁入闸北湖州会馆公开办公，同时为了加强上海工人自卫的力量，保卫胜利的果实，即将夺自军阀手中的大批军械，武装了一支二千七百人的纠察队。

当起义开始时，上海总工会曾派代表（据中国济难会一九二九年编印的"牺牲集"中说，是汪寿华同志亲自去的）至龙华，请求在那里的北伐军将领白崇禧派队前来邦助工人的起义。然而，那时白崇禧已接得蒋介石的命令按兵不动。总工会代表虽再三请求，仍是毫无结果。直到二十二日下午六时，在上海工人占领了上海数小时之后，白崇禧才带了军队开进了上海。蒋介石当时的阴谋计划，就是先让上海工人去独力和北洋军阀流血苦战，让北洋军阀和工人阶级两败俱伤；这样，他既可坐享胜利的果实，又可便于进行镇压工人阶级的反革命政变。

一九二六年冬，北伐军胜利前进到长江流域，工农运动猛烈发展，尤其是一九二七年一月间，汉口、九江的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驱走英帝国主义者、收复英租界的事件，震动了帝国主义与中国一切反动派。各帝国主义者一面急急忙忙增兵上海，一面加紧进行分化国民党内部的工作，以便从里面来破坏中国的革命。当时上海英帝国主义的报纸《字林西报》就大大奖励国民党内的"温和派"。这时蒋介石在南昌，就进行叛卖革命的准备。他于二月初派戴季陶到日本去，和日本的外务省次官、亚洲司长及条约司长等会谈，要求日本对于中日外交事件先向南方政府商议，就是说要求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他（戴季陶直到四月二日才由日本回上海）。蒋介石也公开对美国表示友谊，要求美帝国主义的援助。这时，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买办走狗们纷纷前往南昌，邦助蒋介石作叛卖革命的准备。其中为英、美所豢养的大买办虞洽卿，就在南昌和蒋介石商议，如果蒋决定反共灭共，虞洽卿可以送给他巨额款项作军饷。蒋介石得到这些支持，反革命的狗胆就越来越大了。三月十一

日，蒋介石开始向革命开刀，唆使他的走狗倪弼杀害了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共产党员）。三月十六日，蒋的走狗段锡朋、周利生受命解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十七日九江发生惨案，在蒋的指使下，流氓和反革命分子捣毁九江总工会和执行三大政策的市党部，工会多人被殴伤，市党部被解散。二十三日，蒋介石指使流氓匪徒，在安庆公然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

在上海，当工人三次起义获得胜利后，各帝国主义者急忙将大批侵略军调来。据英文《泰晤士报》供认：当时上海驻有英军一万二千七百余人，美海军约三千五百余人，日海军四千余人，法国海、陆军二千五百余人。四国驻军已超过二万三千人，连同所谓“万国商团”与巡捕，全部帝国主义的侵略军约共三万人，尚有军队陆续来华。凶残的帝国主义者并不以增派驻军为足，当它们看到自己忠顺的走狗蒋介石从南昌一路杀出来时，一面鼓掌称赞他是“唯一有武力进攻激烈分子，维持这里（按指上海）局面的人物”（《美国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S.〕一九二七年，卷二，页九四），一面又惟恐他力量不足，决心不大，“他是否有足够忠实于他的部队来执行这项任务（按即摧残中国革命，屠杀革命人民的反革命任务），同时，他是否能立刻见之于坚决的行动以控制这里的情况呢？这倒是一个疑问”（同上）。于是它们就决定以直接的军事行动来接应和支持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三月二十四日夜间，即北伐军第六军与第二军（有共产党人林伯渠、李富春等参加领导）击溃直鲁联军、收复南京的当晚，英、美、日、法、意等国领事，借口侨民及领事馆受“暴民侵害”，突然下令仃泊下关江面的各国军舰对南京的革命军队与和平居民进行猛烈轰击，杀伤了两千多人。帝国主义者以此来阻止革命军向上海前进，并邦助蒋介石插足到南京和上海。果然，蒋介石就在这样的接应下立即从安庆乘着军舰直奔上海。当他路过芜湖时，还特地派人到南京与各国领事通款曲，并无耻地对记者表示：“南京事件起因，完全出于流氓捣乱。”（三月二十七日上海《时报》）

在蒋介石抵达上海的前夕，帝国主义者对他来此的“任务”已看得很清楚，“据准确之观察，国民党中不久将发生分裂。白崇禧是右派的坚强支持者，他会邦助蒋介石。此间在林钧领导下之共产党人，对白不满，将要求孙科来此加以支持”（《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日报》〔Shanghai Municipal Couneil Police Daily Report〕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三月二十六日中午，蒋介石到达上海，在高昌庙码头上岸，帝国主义者特地派了汽车把他“护送”到法租界祁齐路交涉署。血腥的交易，立即在那里开始。第一个到他那里去的，就是他的老师父大流氓黄金荣，第二个是租界“政事处长”、帝国主义派在中国的大特务头子吉文斯（T.Patrick Gigens）。吉文斯为了给蒋介石镇压革命力量以便利，当面送给他一张特别通行证，允许他可以带着卫兵自由进出租界。蒋介石当即表示：“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字林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接着一群大买办大地主的代表、青红邦头目和新军阀，如吴稚晖、宋子文、张静江、钮永建、虞洽卿、王晓籁、张啸林、杜月笙、白崇禧和周凤歧等等，分批进见蒋介石，确定了大举屠杀革命人民的阴谋计划。

## 蒋介石及其徒党加紧准备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抵沪后，为了表示对外国主子的忠顺，一再通令“保护外侨”，公开声明租界问题由“外交途径”解决，“决不以武力收回租界”，并负责保障上海的“秩序”。三月二十七日《时报》载：“上海领袖领事昨嘱路透社声明：白崇禧司令与领袖领事晤谈时，请领袖领事通告上海人民，白可负责维持秩序，白极欲维持秩序，并有维持之工具，并称决无扰乱上海治安之事。渠为国民党，并为工会负完全责任。渠愿向公共声明，未有可惶恐之理由。”毫无疑义，白崇禧的声明是蒋介石授意的。

但帝国主义对于这些“官样文章”并不感到多大兴趣，他们要的是血腥的“行动”。当蒋介石到上海的第三天，即三月二十八日，《字林西报》就露骨地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倘若蒋介石愿意拯救中国人民出于共产党之手，那末他必须迅速而决断地行动起来。”这样，蒋介石就更加加紧作大屠杀的各项准备。蒋介石深知上海工人和革命人民的力量不可侮，因此，他先从上海外围的重要城市动手：（一）调派大刽子手何应钦到南京，将卫戍南京的革命主力三个团缴械，解散南京共产党支部；（二）在杭州组织流氓匪徒，于三月二十九日袭击杭州总工会，屠杀革命工人及其领袖；（三）勾结收买军阀孙传芳部五师师长白宝山（驻扬州）和九师师长李宝章（驻南通），分别委任为第三十五军与第八军军长。上面三个步骤，意在巩固其反革命统治，孤立上海的革命力量，并作为四一二大屠杀的预演。之后，蒋介石便用全力布置上海的屠杀。

**一、和汪精卫等举行反共会议** 四月三日，汪精卫从国外回上海，和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吴稚晖等开秘密会议。吴稚晖责骂汪精卫降共，汪申辩说，他也是反共的，不过用的手段不同而已。这个秘密会议从三日到五日连续开了好几次，得到了一些反动协议。仅从当时报纸上透露的一些记载，也可以看出这些反动协议就是蒋介石准备实行屠杀的预告。

> “连日国民党要人在上海莫利爱路孙总理遗宅及总司令部，因党事纠纷开重要谈话会。与会者汪精卫、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黄绍雄、甘乃光、柏文蔚、白崇禧、宋子文、蔡元培、古应芬、李石曾、吴稚晖等十余人，讨论近日国民党情形、所有汉口之命令、上海及各地之行动，各有建议。最后乃共依汪精卫氏之主张，暂时容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其主要办法，即于四月十五日召集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于南京，以求解决。在未开会之前，汪精卫氏赞成暂时应急之办法数条如下：（一）由汪精卫负责通知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君，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即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仃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因被操纵，所发命令不能健全，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不接受此项命令；（三）现在各军队及各省之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在军队应由各军最高级长官饬属暂时取缔，在各党部、各团体、各机关，亦由主要负责人暂时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

阴谋团体，不准存在。并闻在会议中提及所有汉口发表之决议案及命令，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在未审查以前不能有效云。”（四月八日《申报》）

**二、组织流氓打手集团** 蒋介石本是上海青红邦中一个流氓，他在九江、安庆等地制造的屠杀案，都是利用流氓作打手，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到上海后仍如法泡制，即刻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相勾结，组织一批流氓，成立所谓“中华共进会”，由帝国主义者及买办资本家共同资助金钱枪械，暗中准备以暴力捣毁工会，屠杀工人。“工部局警务处”四月三日情报称：“张啸林等正计划重新组织共进会。该会会员将包括青邦秘密结社徒弟。其目的则系对付上海总工会及工人煽动分子。张啸林将租赁大楼一处作为该会办公处，可能在法租界内。此一运动，由蒋介石全力支持。”接着报纸上即刊出消息：“该会业已呈请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按即蒋介石司令部）核准恢复，并设会所于法租界格洛克路紫阳里七号。”（四月五日《申报》）该“共进会”成立以后，流氓们即准备屠杀工人。“工部局警务处”四月七日情报称：“闸北及高昌庙上海总工会武装工人之非法活动，已使蒋介石之官员极为不满。共进会正准备奇袭上海总工会办事处，并解除居住在内人员之武装。奇袭将由青邦社员负责，由便衣士兵协助。”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指派董福开、张伯歧等一些流氓兵痞，设立所谓“上蒋工界联合总会”，以反对上海总工会。“工部局警务处”四月二日情报称：“据报，蒋介石正着手组织上海工界联合总会，以对抗目前上海总工会之活动，其组成分子皆系蒋介石之党徒。”四日情报又称：“蒋介石组织之上海工界联合总会，今日开始工作，其目的系对抗布尔塞维克领导之上海总工会。”

该“工联总会”挂起了招牌以后，并没有任何真正的工会团体加入，只是派了一些流氓，四出活动，招摇撞骗，制造纠纷。上海总工会特在各报刊登启事，要工人和市民当心这些流氓的阴谋诡计。原启事两则如下：

“启者，据报近有奸人假借工会名义，在外募捐并勒索金钱等事，此种举动，真是破坏工会名誉，扰乱地方治安。本会特向社会郑重声明：以后如迁有前项事情发生时，请即来本会报告，或直送地方长官惩办可也。

“革命势力胜利后，各界各团体在街市中贴有各种标语，借以唤醒民众。乃者地方秩序未定，奸滑反动之徒，亦乱贴标语口号，意含挑拨。本会特郑重申明：凡本会及所属各工会所贴标语，俱印有本会及各工会之名称，并有密记，否则概不负责。”

当时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曾下令查究“工联总会”，并在各报刊登紧急启事如下：

“上海整个的工人运动，素有上海总工会为领导，中外人士莫不知晓。乃近日忽有不逞之徒，假借名义，组织所谓‘上海工界联合总会’，希图破坏工人运动。此种反动行为，本部除严行查究外，特此登报声明，望我全沪职工慎勿受该‘工界联合总会’之愚，至要、至要。

上海特别市党部工农部　四月五日”

但在蒋介石的庇护下，该“工联总会”继续进行各种阴谋活动。它的办公处就和所谓“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蒋介石在沪设立的地方军政最高机构）同在沪海道尹公署内。很显然，此时蒋介石已决心取消上海总工会，而以该“工联总会”来代替。

**三、调配反革命的军队** 工人武装起义占领上海后，最先进驻闸北的是第一师。上海

总工会为表示欢迎北伐军的到来，曾举行几次兵工联欢大会，兵工关系很融洽。蒋介石抵沪后，对此大为不满，即将第一师调驻南市，调派反动的刘峙率第二师驻闸北，以便就近监视上海总工会及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均设闸北）。刘峙驻闸北后，即派人四处散布谣言，说工人纠察队自由捕人，扰乱社会治安；说工人纠察队要冲入租界，引起国际交涉。刘峙即借口这些自己制造出来的谣言，密派军队将纠察队及总工会四周包围，加以监视。

此时，总工会仍以兵工联合同乐会等方式，与第二师士兵联络感情，并进行宣传教育。蒋介石深恐军心不稳，特于四月四日下午四时，召集第一、二两师各级军官二百余人谈话。“由蒋总司令详细报告本党内部实在情形，并谓现有不良之人，散布种种无事实之空气，希图扰乱军心，甚望各同学（因到者多系黄埔军校学生）千万不可轻信。”（四月五日《申报》）

但蒋介石对于受过革命训练的一、二两师官兵，终究不放心，深恐他们不肯执行屠杀工人的阴谋计划，遂于四月五日下令将一、二两师于八日前分批调往南京，所有沪上防务，调新近投靠过来的、蒋介石认为亲信的旧军阀部队二十六军周凤岐部担任，自六日起该部分别来沪接防。

以上是军队调动的情况。同时，蒋介石为了制造紧张空气，限制工人群众的革命活动，于三月底即命令南市、闸北、沪西、浦东等地驻军，自四月一日起“均特别戒严，遇有行迹可疑工人即加检查”（四月二日《时报》）。至四月五日，更借口“日来形势严重”，由总司令部宣布正式戒严。九日各报公布了反动的“战时戒严条例”十二条，由蒋介石指派白崇禧和周凤岐为正付司令，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淞沪警察厅（厅长是蒋介石的走狗吴忠信）并根据“戒严条例”，下令禁止集会、罢工、游行等事。

蒋介石在一切布置就绪后，于四月九日离沪赴宁。临行前复布置其心腹刽子手杨虎留驻上海，直接监督执行其阴谋计划。“蒋总司令以沪地关系重要，离沪时业委特务处长杨虎常驻留守，以资接洽。日来该处办理公务颇为忙碌。并为郑重起见，将周凤岐部之第三团拨归杨直接指挥。”（四月十二日《申报》）

蒋介石这一连串的反革命布置，获得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的赞赏。英帝国主义驻沪海军司令邓肯说：“蒋介石已获得人们（按即反革命的人）的敬佩，因为他不仅发表言论，而且照样实行。”（四月七日《新闻报》）同时，上海的中外反革命分子送给蒋介石等一千五百万元，作为屠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的经费（《密勒氏评论报》四月九日）。这笔血款据说是这样分配的：蒋介石一千二百万元，白崇禧一百五十万元，周凤岐一百万元，收买青红邦流氓五十万元。中外反革命分子并且预约在大屠杀之后，将以三千万元的巨款，作为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王朝的资本（《中国年鉴》〔Tne China Year Book〕一九二八年，页一三七四）。

## 蒋介石对工人的欺骗与步步进迫

蒋介石惯于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手腕：他一面在暗地里加紧准备屠杀革命人民，步步进迫；一面则使用其欺骗与麻痹手段。蒋介石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总工会，尤其是对于

武装的工人纠察队，是恨之切骨的，但表面上则不动声色。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抵沪后，昨日（二十八）上海总工会特派交际部主任赵子敬为代表，往谒于徐家汇交涉使署。蒋介石亲出接见。首由赵陈述上海总同盟罢工响应北伐军之经过，蒋氏颇为赞许。次说传闻有将闸北薛岳师长调驻他处，由第二师长刘峙驻防，并将敝会纠察队缴械消息，请总司令一言以释群疑。蒋答：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复由赵陈述恐有流氓乘机捣乱纠察队及敝会事情，蒋答此事当由余严行制止，尽可放心。”（三月二十九日《申报》）

刘峙师驻防闸北后，在蒋的授意下，也发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第七号布告：

“……近日本师奉令驻沪，竟有不逞之徒妄造谣言，谓本师将不利于本埠工友，推其用心，无非从中挑拨。……须知本师与工友系在同一战线，彼此只有联合，别无其他。”（三月三十日《申报》）

三月三十日蒋介石接见外报记者，和日本新闻记者有下列一段谈话：

“记者问：‘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之武装，有永远承认之理由乎？’

蒋答：‘此系工人自卫上所必要者，惟为武装必须令受军事训练。’”

蒋介石并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亲赠“共同奋斗”锦旗一面，表示对上海革命工人的“敬意”。

另一面蒋介石便利用陈独秀机会主义者的软弱，而步步进迫。

第一步就是下令制止上海市政府成立。本来，上海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召开了市民代表大会，选举了委员十九人——白崇禧、钮永建、杨杏佛、王晓籁、虞洽卿、陆文韶、何洛、汪寿华、林钧、侯绍裘、谢福生、陈光甫、罗亦农、王汉良、顾顺章、李泊之、郑毓秀、王景云、丁晓先（其中共产党员占过半数）——组织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并报请武汉国民政府批准任命。但当三月二十九日市民代表大会开会，各委员（白、钮、虞、陈等七人未到会）准备宣誓就职，正在万众热烈欢呼之际，蒋介石忽然送来一信，要市政府“暂缓”成立。原信如下：

“敬启者，顷阅报载尊处通告于本月二十九日行正式就职典礼。查上海市之政治建设，实为当今要图，欲谋市政之建设，在此军事期内，一切行政处处与军事政治系统攸关，若不审慎于先，难免纠纷于后。中正为完成政治系统及确定市政制度计，已另电中央熟商办法，务望暂缓办公，以待最后之决定。此致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

白崇禧也送来一信，要取消市政府。当天在全场群众一致支持下，市政府在形式上虽是成立了，但并未办公。在蒋、白指使下，钮永建及在蒋的总司令部担任工作的谢福生、郑毓秀等首先申明辞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虞洽卿、陈光甫以至杨杏佛、王晓籁等，也纷纷请求辞职。帝国主义者对此拍手称快：“蒋介石及白崇禧对最近成立之上海市政府均表不满。委员中包括林钧（共产党员）、王汉良等人。现蒋、白二人已下令解散此一组织。”（“工部局警务处”三月三十一日情报）

此时，陈独秀机会主义者，不是更深入地发动群众，来支持和巩固这个政府，而是怕市政府中没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便不能进行工作。他们说：“如果只有我们单独开会，那这还是什么政府呢？”于是忙着去拉拢资产阶级的代表来参加。后来好容易把王晓籁拉了

来，推选他担任市政府委员会的主席，在四月三日举行的第五次市民代表大会上，又补选了两个资产阶级代表叶惠钧、赵南山为委员，才决定正式行使职权。但正式办公也只是发布了一些文告，如“全市市民总要求及各界总要求”和“市政府政纲草案”等，仍没有进行切实的工作。蒋介石看到陈独秀机会主义者的软弱，就指派其党徒吴稚晖、钮永建、白崇禧、吴忠信、陈果夫、陈其采、叶楚伧、杨树庄、杨杏佛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该会设于沪海道尹公署旧址，在四月八日开第一次委员会，正式办公。蒋介石规定该会“得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并指导当地党务”（四月九日《时报》），就这样篡夺了上海人民的政权。

蒋介石破坏了上海市政府之后，即进一步向武汉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邓演达、郭沫若等领导）派驻上海的机构开刀。自四月二日至六日，总政治部曾在上海各报连续刊登半版大的巨幅标语：“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肃清奉系军阀”“一切权力属于党，党权高于一切”等等，以反对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流氓的背叛革命行为和蛮横的专权。同时总政治部并通告召集各军政治工作人员会议，进行革命宣传。蒋介石与汪精卫等取得反动协议后，立即下令取缔总政治部，由白崇禧派兵一连于六日下午四时前往高昌庙制造局路将总政治部查封，并捕去办事职员十九人。蒋介石并为此发布了一篇又长又臭的布告，侮蔑总政治部人员“淆惑军心，背叛主义”，“破坏革命战线”；又通电各军，“嗣后望各军、师、团、营部，各政治部，严密注意此种捣乱分子之羼入。如发现有此种情事，或该总政治部仍假借名义派人到部，应即严行拒绝，或严行惩办”（四月九日《申报》）。就在下令查封总政治部的同一天（五日），蒋介石也发布命令，把他认为不大可靠的第一师和第二师从上海调走了。

接着来的是封锁和检查新闻。兹将刽子手陈群主持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的公告原文录后：

> “径启者：奉总司令蒋谕：‘从本日起，所有武汉发来之电报、函件及武汉各报淆惑听闻妨碍革命之记载，并总政治部等各种反宣传广告，一概不许刊登及转载。如有故意违抗者，在戒严期内，应按戒严条例惩办。’等因，奉此，特此通告上海各报馆均鉴。十六年四月六日。”

从此，蒋介石反动派控制了报纸，革命人民的言论自由被剥夺了。反动派却利用报纸发动了一连串的反革命宣传，歪曲是非，颠倒黑白。陈群的“政治部”天天在各报刊登巨幅广告。这时的上海已陷入大屠杀前夕的昏暗中了。

*　　　　*　　　　*

当时革命阵营对于蒋介石的种种阴谋活动，并不是完全不知道。上海总工会在四一二事变的前数天，就屡次接到工人的报告说：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共同组织的流氓已集中五百人，每人发给盒子炮一枝，将定期从租界冲出，由军队接应邦助，袭击上海总工会及工人纠察队。但陈独秀机会主义者面对着这种反革命阴谋，不是提高警惕，进行有效的准备与斗争，而是“委屈求全”，步步退让。这种可耻的退让政策表现在各方面：在市政府问题上，已如前述；在军事问题上，原驻上海的一、二两师对革命本有好感，尤其是在第一师的军官中，共产党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但陈独秀机会主义者没有运用这种力量，切实设法

争取他们坚决站在革命方面，结果蒋介石一纸命令就把他们轻易调走了。据说：第一师"在调赴南京前，曾在一次兵工联欢大会上，暗示我们要当心！"（商务印书馆老工人赵伯恒的回忆）第一师的调走，对于上海工人是一个打击。当时南市市民代表大会及很多工人群众，曾纷纷提意见挽留，但缺乏有组织的活动，因而未发生效力。更可耻的是四月五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在各报发表所谓《联合宣言》，完全是为了"缓和局势"，没有一言一字指责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这篇"宣言"是对于工人阶级的欺骗，实际上成了蒋介石布置屠杀的烟幕弹。帝国主义者对于这篇宣言的内幕是很清楚的："据报蒋介石正利用汪精卫以消除共产党之对抗，汪在蒋介石与陈独秀之间的调解甚为成功。"（"工部局警务处"四月五日情报）同日，汪精卫和蒋介石等开秘密会议时，吴稚晖报告，"因今日报纸登载国民党共产党两首领之宣言，外间误会者甚多，以为从此中国归两党共同治理，信有之乎？汪君大笑，以为那读报的太不辨文理了。全部宣言'仅言两党之误会不可发生，未言两党共理中国'。吴君问，先生所谓'仅言两党之误会不可发生，未言两党共理中国'，能许在报上发表吗？汪君坦然允许。"（四月六日《申报》）可见汪精卫赞成发表此宣言，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而陈独秀在发表了"宣言"以后，却以为"万事大吉"，和汪精卫一道乘轮船离沪赴汉了。

上海总工会面对这一恶劣局势，曾进行了以下的一些活动：

"△上海总工会四日举行执委会

前日（四日）上午九时，上海总工会在该会会所召集第二次全体执行委员会，到各委员三十六人，由汪寿华主席。甲、常务委员报告。乙、议决重要问题三项：(一)外交问题——一、主张绝对要收回租界，要如何收回，当与国民政府及各团体共同商榷，一致行动；二、最近本埠谣言日盛，谓工人将单独对于租界有所行动，致华租两界戒备甚严，决定发一总的声明，说明工人决不单独行动；三、发起工商学各界联席会议，讨论外交问题；四、发表宣传大纲，表明对外交问题之态度，使各工会负责人依据指挥；（二）纠察队问题——现在军事当局因帝国主义与反动派之挑拨，有解除武装工人之谣传，执行委员会除一面尽力对军事当局，加以详细说明，并陈述工人武装不可解除外，决定以下三种办法：一、切实加紧训练纠察队，使其格外严守秩序与纪律；二、如各方面不谅解，必欲解除上海工人之武装时，则全上海工人全体一致罢工，一致对付；三、对外宣言说明工人武装之必要的理由；（三）经济斗争问题——决定：一、尚未提出条件，不能罢工；二、条件提出无结果，复行交涉，再无结果，提至高级工会主持，派代表前往接洽，如再无办法，然后决定罢工；三、条件不必太高；四、条件提出时与解决时须大会通过；五、条件提出后须分别呈报上级工会；六、对平定物价事，已与商联会等团体商量；七、对减少房租事，一致赞同。"（四月六日《申报》）

"△上海总工会敬告全上海市民书

本会自公开办公以来，帝国主义者、反动的买办阶级与资产阶级以及反革命分子，见工人势力之日益发展，深恐有不利于己之趋势，于是造为谰言，尽力挑拨，以遂其中伤捣乱之阴谋。而不良分子，更受其雇用，冒充本会名义，勒索撞骗，诿罪于本会纠察队。旬日以来，讹言四起，市民惶惑，不能自安，其直接致函本会询问真相

者，日至数十起。为此特行声明，幸全沪市民注意及之：

本会诞生于五卅惨案以后，所属工会，有长时间之历史，对于工友，有长时间之训练，有严密的组织，有划一的纪律，行动一致，不许自由。前事俱在，不容掩饰。今之敲诈、勒索、招摇撞骗者，皆反动派托名捣乱，陷害本会者也。本会除从严究惩外，尚望全沪市民协力制止之。至对于外交事件，本会已一再宣言，全由国民政府外交部与军事当局之主持及应付，本会不过领导工人为外交问题之后盾而已。夫工人虽至愚，岂有单独行动以起外交纠纷之理！故外传沪上工人将冲入租界者，又反动派扰乱之谣也。至本会之组织纠察队，理由至简单，不过欲保护工会，防止反动派扰乱而已。试观近日以来，福州、南昌、赣州、宁波、杭州之各工会，无不被反动派捣毁，本会为自卫计，为保护全上海所属八十万工人之代表机关计，为应付蠢蠢欲动将不利于本会之反动派计，对此区区之工人武装，实有绝对拥护之必要。不但止此，本会之纠察队可以使商人得不少之利益，盖沪上五方杂处，乘机捣乱之不良分子所在多有，有纠察队以镇压之，若辈因有所惧而不敢为非。此次上海革命之后，设无武装之工人，则溃兵抢劫，暴徒掳掠，将有不堪设想者。故商人为利益计，实应同情于本会之武装也。上海工人已为革命民众之主力军，而武装工人，尤足为国民革命之后盾。制止投机分子，消灭反动行为，皆可由武装之工人任之；使革命军队，得专心致力，打倒当前之大敌奉系军阀，而无后顾之忧。故为革命军队顺利军事行动计，尤应与民众之武力相结合，此蒋总司令所以有'工人武装为自卫计应存在'之语也（对日记者谈话）。本会以纠察队难免有极少数不良分子之轨外行动，已竭力纠正，严密注意之矣。兹恐莠言惑众，特此谨告。上海总工会，四月五日。"（四月六日《申报》）

"△上海总工会紧急启事

各级工会委员会转全体纠察队员及全体工友公鉴：本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一）全体工友与纠察队员不得任意拘捕任何人，违者按纪律严办；（二）全体纠察队队员未有差遣，不得武装持枪在马路上行走，违者除严加惩办外，并解除其武装。"（四月初旬上海各报）

"△总工会七日开代表大会

上海总工会于昨日（七日）上午十时，举行全上海各工会代表大会，计共到二百三十一工会代表八百余人。甲、公推汪寿华、张昆弟、董新五为主席团。乙、追悼死难烈士，静默五分钟。丙、委员施英报告最近国内政治、外交各方面之情形。丁、讨论各项重要问题，全体一致通过下列五项决议案：（一）对纠察队问题决议案——全上海工人代表大会对武装纠察队问题，特训令执行委员会，现在纠察队之组织与训练，已渐次就绪，此后更当加紧整顿训练，并须严明纪律。本会武装纠察队之目的，在于拥护革命政府，拥护革命军，保护工会，保障工人群众之利益，倘有破坏本会纠察队或有不利于本会纠察队武装之行动，代表大会特别议决，全上海工人当起而一致拥护，以群众的行动制止之。（二）对于反动工会案——最近发现反动工会（按指'上海工界联合总会'），应即日要求市政府予以查办封闭，同时本会及全上海工人登报否认，使全上海工友勿堕其术。（三）经济斗争决议案——一、先向厂主提出条件；二、所提条件要经过上级工会审查及代表大会之通过；三、条件提出时，应派代表向厂主直接交涉；四、与厂主决裂时，由上级工会主持，

非得到上级工会之允许，不得自由罢工；五、无论何时，须严守秩序；六、要求市政府命令各厂家，不得无故或借故闭厂。（四）对于此次响应北伐军行动内之死伤抚恤决议案——一、即日组织死伤抚恤委员会；二、通告被难家属到本会报告一切情形；三、派代表慰问死伤者家属；四、筹备死难烈士追悼丧葬与纪念事宜。（五）工会纪律议决案——一、各工会未得总工会之允许，不准收费；二、不准打架；三、不准打商店及公司；四、不准捕人；五、不准处罚银钱。将上列各项纪律分发各工会及工友云。”（四月八日《申报》）

“△总工会辟单独冲入租界之谣言

本埠总工会昨（七）发出告工友书云：现在上海租界以内，异常恐慌，说我们工人将要单独冲入租界，攻击巡捕房，弄得租界内居民，十分惶惑。帝国主义者自然不免恐慌，沙包铁丝网随处都是，俨然如临大敌。这全是反动派造谣陷害上海总工会的。我们应有广大的宣传，免除无谓的恐慌。我们绝对主张收回租界，但这个责任，当由国民政府外交部、军事当局去负，我们只能做外交的后盾，绝对没有单独冲入租界引起纠纷之理。我们对于外交问题的行动，与国民政府是一致的，更无随便夺取租界之理。以上的意思，应使每个工友都很明白。上海总工会。”（四月八日《申报》）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上海总工会曾严正地揭露和指责了反动派的阴谋活动，特别是对于反动派妄图解散工人纠察队的阴谋，给了严厉的警告；但另一方面，由于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影响，对工人斗争和纠察队的活动作了消极的限制，而没有能够从积极方面进一步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到斗争中来，和进一步加强与扩大工人的武装力量。蒋介石就利用工人方面这种没有充分防备的状态，迅速地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 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情况及各方面的反应

### 四月十二日晨流氓和蒋介石军队围攻工人纠察队经过

帝国主义者不仅指使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而且直接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打急先锋。四月十一日晚七时，美、英、法、意、日等国竟假借“南京事件”的名义，向蒋介石提出通牒，要求“惩罚酿成南京事件的他国（按指苏联）及中国的特殊势力（按指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美国外交文件》一九二七年，卷二，页一八七）。这个蛮横的通牒，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对蒋介石所下的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同一天晚上，帝国主义在沪的侵略军更在租界内进行搜查和逮捕。例如：“十一日晚，工部局巡捕及日本水兵前往北四川路三十七号广东店员俱乐部进行搜查，发现煽动性传单若干，其中之一提出收复旅顺、大连之要求。在与俱乐部连接的空房间内发现斧头四柄。该部会员十人，似正在该处举行会议，当即加以逮捕，现为日本海军当局审讯中。”（“工部局警务处”四月十二日情报）

蒋介石就在帝国主义的指使督促下，发动了对上海工人大规模的残酷的屠杀。四月十二日黎明前，蒋介石发出了大屠杀的命令，仃泊在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在租界内早已准备好了的青红邦流氓凶手遂分头冲出，在闸北、南市、沪西等地与反革命军队一起动手屠杀，使全上海投入了血海。

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二千七百人，分驻于闸北、吴淞、浦东、南市等地。四月初，当第二师刘峙部队驻防闸北时，即对总工会会所及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采取包围形势。自七日二师开走，二十六军周凤歧部开来后，即对工人假意表示绝无恶意，闸北戒严情形，亦较前松懈。但在十一日下午四时后，二十六军第二师大批军队，忽然散布街市，形势突趋紧张。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事前得到密报，获悉当夜将有大批流氓在帝国主义者保护下从租界冲出，会合军队袭击工人纠察队。纠察队总指挥处当晚即送公函至二十六军司令部，请求万一发生不幸事件时，望予援助，但未得答复，纠察队总指挥处即通知各地纠察队，加紧戒备。十时左右，形势更形严重，军队往来巡梭，断绝行人。次晨（十二日）四时左右，各地流氓和军队同时动作，向工人纠察队进攻。兹根据各报记载，将经过情形分录于后。

## 一 闸北总工会会所（湖州会馆）

《申报》四月十三日载："据工会方面调查云，昨晨（十二日）四时许，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设于商务俱乐部）方面，突闻湖州会馆发生枪声。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顾顺章（顾顺章于一九三一年叛党，出卖了恽代英等同志——编者）即偕卫队二人及军医、书记等，往该会馆总工会会所视察情形，入内略事休息，约过二十分钟，枪声复作，顾氏出外探视，即见有六十余便衣军，臂缠白布黑'工'字徽章，正向会所内放枪，门前纠察队二十余人，亦向之抵御。未及十分钟，又有大批二十六军部队开到，当有五团团长邢霆如向纠察队谓：'请你们不要还击，我们来为你们缴他们（指便衣军）的械。'说毕，即将所有便衣军枪械，未经抵抗，即完全缴下，并用绳索捆绑。纠察队见状，即请党军入内吃茶及香烟，邢团长、章营长即对顾谓：'既有今夜这件事情发生，请你同我们到二师司令部，见我们师长，商议解决办法。'顾即不疑，偕六纠察队员同往。讵行至半途，邢团长忽变色谓：'他们（指便衣军）的枪械既已被缴了，可是你们的枪械，也应该缴下才好。'顾答：'不可，他们流氓是捣乱的，我们工人纠察队是革命的，如何能够缴械呢？'章营长即指挥卫队将顾及纠察队之械缴下，又令顾回会，下令全部纠察队自动缴械。顾坚持不可，谓：'本会委员长外出，未得总工会命令，不能擅专。'于是邢团长及章营长即说：'是的，缴械这事是不好看，不要缴吧！我们另外想想法子，请你们把枪通通靠起来。'该会纠察队见总指挥被捉，只得依言三叉式将枪靠好。党军又逼令纠察队向后退三步，并将机关枪等对准湖州会馆，纠察队至此，遂无能为力。党军即入内占据该会，办事员亦全部退出。随后邢团长即要顾同赴第二师师长处谈话，顾无法反抗，遂同到宝山路天主堂二师司令部，时在上午七时，拘至下午三时许，始行释出。"

## 二 闸北商务总厂

同日《申报》载："又据工会方面调查云，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在俱乐部对

面）楼上，本有纠察队六十余人，耳门有六人通夜守卫。十二日晨五时许，忽有六人自租界出，臂缠白布，上书黑色'工'字，手执盒子炮，向耳门守卫轰击，守卫与之抗拒，但楼上纠察队已有被弹击伤者。俄而二十六军大批从宝山路方面开来，大呼：'不要打，我们都是自己人，不要误会，我们是来调解的。'及抵门首即令守卫开门谈话。守卫见党军至，不疑有他，即依言开门，门启，大队即一哄而入，上楼将纠察队完全缴械，并将薄子间及商务工人办事室完全抄过，计抄去步枪六十余枝。纠察队员由后门尚公学校逃遁，并被拘捕一人解至二师司令部。"

## 三　闸北商务俱乐部（即纠察队总指挥处）

同日《申报》载："又据工会方面调查云，商务总厂纠察队被缴械之同时，约在五时二十分左右，俱乐部总指挥处忽来着党军服式手缠白布'工'字符号者二、三百人，在该处铁门前高喊一声散开，即有数十人向前门冲锋，并大呼'缴枪！缴枪！'时铁门前纠察队付队长杨凤山与之理论，该项人等即将杨所携之盒子炮一枝夺下，并当场将其击毙，转向内面冲锋。惟该门岗甚多，难于冲进，乃从俱乐部嘉庆里后面夹击，登时枪声大作，初仅长枪盒子炮声，继以手机关枪，并至十数排之多，均射于俱乐部图书馆三层楼墙壁上，泥瓦纷飞。在内之纠察队，亦据图书馆俱乐部各窗口以米袋堆起，作防御战。至八时许，第二十六军第二师派出第五团前来，并携一函，略谓：'贵处与某方发生误会，此种不幸之事件，应即双方仃战（吹号为记），敝部特派第五团邢团长前来调仃。如有某一方面不服从调仃者，即解决某一方面，调仃时间以十一时为限。'该部队一至，即向俱乐部取包围形势，并拟进内交涉缴械，纠察队方面不允。第五团团长邢某要求派代表同往上海总工会交涉，纠察队以总指挥不在，允派大队长二人同往，该团长仍以无正式代表为辞。适此时有职员周某，从某医院得悉此讯，急奔至俱乐部内，力谓可负全责。该团长又谓须先向司令部呈明经过情形，周君即偕往，当被禁于司令部。半时后该团长即回俱乐部，要纠察队全体集合谈话，当时纠察队见该团长态度十分和善，不疑有他，即遵令集合。邢团长遂向纠察队全体队员讲话，略谓：'工友们，二十六军系人民之武力，民众之军队，愿意保护你们纠察队，昨天晚上，我们敝部接到报告，谓有人将于今晚冲突，同时总指挥部亦接到同样报告，故发下训令，命我们军部防备。今早又得到总指挥的电话，要我们军队将双方缴械。我们已拿到反动派五十余人，将予严办。现在我只得照长官的命令执行，你们可将枪械尽数藏起来不动，关起门来不要开枪。你们周代表刚才同赴我们师部，也说枪无论如何不能缴去，放在里面是可以的。现在他去军部去了，一切事件总由我们军部负责，不会缴你们的枪。现在我本人还有一点意见，就是外面对于今早这件事情发生误会，最好由我们派一连徒手士兵，与纠察队徒手游行一次，表示切实联络。'纠察队员是时鼓掌赞成。后纠察队出发，所有该团部队在宝山路一带者，乘机纷拥入内，将俱乐部完全占据，并将楼上下严密搜查，枪械全部搜去。（据同日《时报》载，搜去步枪约一千余枝，此外，纠察队之衣服银钱杂物亦被军队尽数取去，其时为上午十一时许。）并将各着便衣办事人一律搜查一遍，驱逐出外。现该处已完全为二师部队驻扎，游行之纠察队，至青云路，亦即四散报告各工会。"

又据同日《申报》载，十二日上午五、六时许，当国民党军队围攻商务俱乐部工人

纠察队之际，先有英国两飞艇于俱乐部上空侦察，后有国民党航空司令部派出之飞机一架，于闸北上空视察战况。

## 四　闸北天通庵

《时报》四月十三日载："天通庵路栖流所，驻有总工会纠察队四、五百名。昨晨七时半，亦由司令部派遣第四团前往缴械。双方开枪约半小时左右，纠察队不敌，终屈服，并被捕去五、六人，两方各有受伤。"

## 五　南市华商电车公司

同日《时报》载："昨晨三时许，南车站一带军队步哨，直放至西门大小南门一带陆家浜一带；有形似工人臂缠白布黑'工'字徽章者，约二百五十人，自法租界南洋桥乘汽车冲入华界。彼等持手枪、盒子炮、炸弹等，分三路包围南车站前面之华商电车公司：一由南站火车轨道越过，一由兵工厂望道桥而过，一由沪军营地方前进。追越轨而过之一队甫至南站前门地方，为纠察队放哨之士兵所见，向诘口号不合，急回电车公司报告（该公司内亦有纠察队百余人驻防），乃由纠察队发令拒敌，时已四时三十分。二十六军一团第三营及机关枪一连亦到，先放空枪两响，继以步枪，至五时许未能攻破，乃用机枪扫射，两面墙壁上之枪洞，密如蜂窝，附近电车线亦完全倒下，垂地如网。至六时遂将大门打开，各兵一拥而入，于大门内抄得旧式机关枪四架，盒子炮两杆，手枪三枝，步枪三百余枝。又入内至各办公室搜查，所有门窗及写字台尽行击毁，公文信件凌乱满地，银箱亦被翻倒。军队方面伤三名，一弹穿掌心，一伤臂，一伤手。厂内一某姓茶房面部着弹，夜班机匠两人，一伤肩部，一伤胸部，卧地不起，势极沉重，旋由红十字会用车载去医治，纠察队亦全释去。至下午三时许，所有围攻军队完全退去，厂门亦闭，其办公室前由白崇禧贴有布告云：'查电气事业系关公用，不容一日间断，现华商电气公司工人因故纷散，应即立时复工，以免阻碍地方安宁秩序。本总指挥部本保障工人利益之旨，对于捣乱分子自应严予取缔，对于纯良工友则当力予保护。为此布告周知，望毋轻信谣传，其各安心任事，切切此布！'但电车昨日终未开驶。"

同日《申报》记载包围及激战之情形，其时间略有出入，可作为补充："据军队方面调查云，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孟获洲，奉令担任收缴南市华商电气公司内枪械，即于昨日拂晓，率领士兵三连，前往围缴，相持至七时许，工人纠察队之枪械始被缴去。详情如下：（一）出发包围之情形——孟营长于前日（十一日）下午十一时二十分，奉到命令，当即饬令第一营兵士预备，于昨晨（十二日）四时三十分出发。逾十余分钟，即将华商电气公司包围，计有机关枪连一连，步兵一连，手提机关枪一队，共有机关枪四架，两架置半淞园门前，枪口向北面华商电气公司之房屋，两架设置南火车站门前，枪口向南方华商电气公司房屋之后面，步兵及手提机关枪分布于该公司大门前及周围墙脚，相机进行。(二）抵抗时之情形——各士兵布置妥当后，孟营长即派士兵两名，攀墙了望墙内动静。孟营长并亲率士兵数名。意欲叩门入内，当被门内之纠察队步哨瞥见，开枪向外射击，四围兵士，立即还击，惟此时并不激烈。移时公司内之屋顶，有机关枪射出，于是孟营长即下令开机关枪，并用手榴弹向内抛掷，同时选派奋勇士兵数名，猛力向

铁栅门推进，一时枪声齐发，密如燃放鞭炮。当推铁栅门时，有两兵受伤，铁栅门推开后，各步兵及手提机关枪队，即奋勇入内，分头搜索。（三）缴枪之情形——各兵士入内后，因各间房屋，均系紧闭，此时登楼之兵士，已在屋顶搜得机关枪两架，各士兵因恐工人伏于房内，袭击外面，甚为危险，乃将各房窗门打破抄查，结果抄出机关枪两架，步枪数枝，子弹甚多，并捕获工人数十名，旋即开释。缴械后，各兵士仍分布于公司内外，监视公司内各工人之行动，直至下午三时始撤去。”

## 六　南市三山会馆

十三日《时报》载：“围缴南车站后面三山会馆纠察队枪械之军士，系二十六军一师二团一营杨其藻部。该部于昨晨（十二日）三时半开抵该处，即将会馆四面包围。先由连长翁国华、排长付国俊叩门入内，限十分钟内将枪悉数交出，当遭拒绝。该部遂开始用机关枪、步枪、迫击炮等分两面射击，会馆墙垣高厚，弹不得入，遂用仰射法，弹子纷纷由高下坠，在内纠察队则分藏大殿及后屋等处。至五时顷，枪声稍息。越五分钟，兵士又高吹冲锋号，枪声又作，伤纠察队五名，死一名。至六时许，在内之纠察队一百余人（《申报》载有六百余人，恐不可靠——编者），知困守无益，遂开门缴械，各兵即一拥而入，缴步枪三百四十五枝，重机关枪五架，新式机关枪二架，手提机关枪三架（《申报》载有十余枝），各纠察队员制服亦均卸去，并将大队长何杰等多人，连同枪械，一并解至新普育堂团本部，经团长赵观涛一一讯明，即行开释，惟大队长何杰（《申报》载何自我，系黄埔军校出身），于下午解往龙华总指挥部（按即戒严司令部）。现三山会馆内已由二十二师政治部迁入办公。”

又，同日《时报》载：“南市陆家浜铜锡公所内，亦由总工会分设办事处，驻有纠察队，其枪械亦被军队一并缴去。当两方激战时，流弹横飞，纠察队有两人受伤，西门口卖菜乡人两名亦被弹伤手足，均由红十字会救去医治。”

## 七　沪西曹家渡

十三日《时报》载：“沪西曹家渡于昨晨（十二日）四时许，有身佩白布工字符号者十余人，分乘汽车二辆，到申新、民生、丰田各纱厂工会内，将该会委员长施丽清、金三宝及交通二人（以上共计四人）打死，另有重伤五人，尚在医院内。该项人等又将各工会捣毁，仍乘汽车驶去。”

同报载：“又据外人消息，曹家渡昨有工人纠察队多名，于冲突时四名受弹倒毙，十人被缴械，计缴去机关枪二架，来福枪四十杆。”

## 八　浦东各处

《时报》十三日载：“驻扎浦东俞家庙东路前敌总指挥部特务营周济民营长，接奉密令，于昨晨四时三刻，分往烂泥渡、陆家嘴、杨家渡、洋泾、塘桥等处，实行缴械，一时枪声四起，约二十分钟始息，计缴获大小枪械三百余枝，子弹万余发，纠察队死伤约十余人。兹将详情调查录下：（一）缴械时情形——原驻浦东三区警署纠察第八队，春江码头第九队，暨各分队约共六、七百人，是晚得总工会命令，特别戒备，多未解衣而卧。至清

晨四时许，因精神疲倦多回队休息，迨军队到来，不及抵御，纷纷弃械由后门出走，间有持枪作瞄准式者，致遭击毙，受伤者轻重不一。（二）死伤者姓名——第八队小队长湖北人彭海清，队士冷汉魁，又小队长扬州人汤斌权，队士杨森云四名，当场击毙；其余黄子卿、袁林生、陈康林、沈长山、王安堂、姜洪桃、王安桂、吴喜欢等八名，各受枪弹刺刀等伤。内有重伤两名，已转送浦西医院，恐有性命之虞。”

## 九　吴淞与江湾

《时报》十三日载：“吴淞纠察队向分驻三处；一在大街西市圣公会，一在旗站六营公所，为国立政治大学学生宿舍；一在大街。昨晨三时由军队（《申报》载系驻淞二十六军二师六团吴秉元部）前往，分令将所有军械缴出，纠察队尚无抵抗，只开放空枪二响而已。又昨晨一时，另队步兵（《申报》载系吴秉元团第二营）步行前往江湾镇，抵该镇时，所有在江湾之工人纠察队已先走散，该部当晚仍开回吴淞。”

又同日《申报》载吴淞缴械后之情况如下：“迨军队将所缴枪械及纠察队百二十余人，一并收押团部后，工会方面曾聚集工人数十名，列队至团部，要求发还枪械并释放纠察队工人，当经吴秉元团长劝散。”

*　　　*　　　*

据《申报》四月十三日载，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于十二日上午四时起均宣布特别戒严：“公共租界军事当局……加紧戒备，北区与闸北毗连，当兵工互相开枪时，所有界路驻防英兵均皆警备，及至枪声仃息，形势始稍缓和。……在吴淞路北四川路一带，则由日本军队以十余名或七、八名为一组，竟日梭巡。沪西沿苏洲河之防范亦一律戒备，上午凡由闸北往南各路俱不通行。”“本埠法租界当道，因华界收缴各工会枪械，特别戒严，界内各栅门立时关闭，自昨晨（十二日）四时起至十时止，虽有通行证，亦难通过。”

*　　　*　　　*

帝国主义者对于这次缴械是非常关心的，不仅在租界区宣布了特别戒严，并且详细地收集了情报。“工部局警务处”四月十二日的情报称：“今晨（十二日）一点钟至五点钟，以机关枪、手枪及手榴弹武装之蒋介石便衣党徒（按即“中华共进会”的流氓），前往闸北、南市各武装工人占领之房屋（按即工人纠察队驻地）进行搜捕。据估计同一时间进行搜捕之人数（按即流氓及军队）共达一万五千人。”“闸北宝山路商务印书馆中之武装工人约三百人，对搜捕队（按即流氓与军队）进行激烈之抵抗，士兵遂将房屋包围，并拟向吴淞炮台调用大炮向此一堡垒轰击。最后消息（上午十时）谓武装工人三百五十人已投降（按即被骗徒手出外游行），并已被解除武装。”又四月十三日情报称：“昨在南市、闸北、浦东、吴淞及曹家渡等地上海总工会办事处搜捕结果，共缴获步枪、手枪一千五百枝及机枪若干挺。”四月十四日的情报更有全面的叙述：“蒋介石党徒于四月十二日清晨前往各武装工人地点进行搜捕之清单”除各报已公开揭载的地点外，被搜查缴械的尚有“沪西梵皇渡路第六区警察局”“浦东烂泥渡英美烟厂工会”“高昌庙一工人宿舍、广福园饭店、袜厂机匠工会”“小东门银楼职工会”等。情报继称：“总计共缴武器有步枪三千

枝，机枪二十挺，毛瑟手枪二百枝，自动手枪四百枝。在闸北商务印书馆大楼则缴获子弹八十万发以及其他，平均每一枝步枪或手枪子弹一百发。在商务大楼另外移出斧头七老虎车。在江湾东岳庙则缴获长矛二千枝。”又称：“担任搜捕人数，据可靠估计约有一万五千人，其中一人死亡，二十五人受伤。武装工人死亡者一百二十人，受伤者一百八十人。全部缴获之武器弹药已移交北伐军二十六军军长周凤歧。”

又十三日《申报》记载，十二日晨被缴械之纠察队共有十四处，缴械时工人、市民之死伤情形如下：“据国民社消息，昨日大惨剧中，全市死伤者约有百余之众（按此数与帝国主义情报所载有出入），现可查者，计总工会会所内及商务俱乐部内纠察队各死一人，闸北长老会堂内前流弹死市民二人，中兴路三九五号流弹死一女孩，俱乐部隔壁教会流弹死一女人，浦东死纠察队五人，南市死纠察队五人，俱乐部前兵士死八人，其余伤者尚不计其数云。”

* * *

从以上的一些记载，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次军队围缴工人纠察队枪械的举动，完全是蒋介石匪邦与帝国主义共同预定的阴谋诡计：帝国主义者从租界放出流氓，军队则假维持、援助之名，骗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有些地方则直接由军队动手，乘纠察队不备而包围缴械。

## 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同志被暗杀

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于工人纠察队被缴械的前夕，即四月十一日晚失踪。十四日《时报》刊出《汪寿华失踪已三日》的消息。同日《时事新报》关于汪之失踪及被暗杀有较详细的记载，兹录原文如下：

> “国民社云：本社于前晚（十一日）即得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已被暗杀之讯，惟以事无佐证，未便发表。日来此项凶耗，愈传愈盛，本社记者乃于昨日下午往访总工会职员某君。据云：汪君于十一日晚八时雇一汽车出外，不料一去之后，迄今未回，当时本会职员以是晚法租界戒严，与华界交通断绝，对于汪君之不归，当不置深疑，乃一日又一日，至今未返。第二日之晨，即自某可靠方面传来消息，谓汪君已被暗杀。截至昨日止，汪氏本人及临时所雇之汽车夫，俱未见返。处此反动潮流高涨之际，汪君之遭奸徒暗杀，乃可信之事。连日此项消息，已传普于全沪，工人愤慨之气，不可复遏，各工会除高呼为汪君复仇之口号外，并拟与此次死难诸烈士定期同开追悼大会云云。”

另据“工部局警务处”四月十二日情报称：“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于四月十一日夜十一时在法租界被捕，现为便衣队（按即‘中华共进会’之流氓）拘押中。”十四日情报又称：“据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于四月十二日在法租界某处被捕后，即押往龙华，并在该处执行死刑。”

又据身历四一二事变、并与汪寿华熟识的商务印书馆老工人谢庆斋回忆称：“四月十一日，青洪邦头子杜月笙邀请汪寿华同志晚餐。当晚局势已很紧张，总工会已得到流氓要

来缴械的报告，李泊之同志（总工会负责人之一）等曾劝汪寿华不要去法租界赴约，汪考虑后认为还是应该去。他说：‘我过去和青洪邦流氓常打交道，他们还讲义气，去了或许可以把话谈谈开，不去反叫人耻笑！’但为了慎重起见，他告诉李泊之同志在宴会附近处等他，李泊之同志等了两小时不见汪出来，知道事情糟了。”

从以上的记载和回忆，尤其是帝国主义分子的情报，足以证明汪寿华同志系于十一日晚自闸北去法租界赴杜月笙之约，陷入了反动派予先布置的圈套，因而被害。当工人群众听到这消息时，都怒不可遏，高呼“为汪寿华同志报仇”！蒋介石匪邦一直不敢承认这件血案，在十六日白崇禧招待记者会上，记者曾问及汪寿华的行踪，白匪竟推说“完全不知”（四月十七日上海各报）。

## 缴械后反动派对工人的诬陷

自工人纠察队枪械完全被缴后，即由白崇禧、周凤歧以淞沪戒严司令名义，发布通电与布告，诬称流氓袭击工人为“工人内讧”，所以缴械。又恐工人罢工援助，同时颁布严禁罢工令。但二十六军一师师长伍文渊对《新闻报》记者的谈话，则供认此次缴工人纠察队枪械，系因“接奉白总指挥密令，以蒋总司令迭据密报，有人假借工会名义，欲冲入租界，扰乱秩序，……嘱令将激烈分子，从速缴械”。浦东特务营周营长之布告则又谓：“奉总指挥白令开：淞沪一带，查有反动分子，受敌贿买，煽惑捣乱；着将民间所有枪枝，一律收缴。”从这些自相矛盾的言词中，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反动派故意诬陷工人的奸计。兹将“戒严司令部”的通电与布告原文等抄录如下：

### 一　淞沪戒严司令部十二日通电

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汪主席总司令蒋总指挥何及各报馆均鉴：本早闸北武装工友大肆械斗，崇禧为维持地方安宁秩序起见，不得不严行制止，除派部队将双方肇事工友武装一律解除，并派员与上海总工会妥商善后办法外，谨特奉闻。上海戒严司令官白崇禧、付司令官周凤歧同叩。（四月十三日《时报》）

### 二　戒严司令部严禁罢工的布告

为布告事：现值戒严期间，地方治安，亟应维持。闻有不肖奸徒，受敌贿卖，煽惑罢工，希图扰乱，殊堪痛恨。深望各工友明白大义，勿中奸谋，如敢故违，即系甘心破坏国民革命，自弃于中国国民党之外。本司令有维持地方治安之责，在此戒严期间，如有上项情事发生，不问首从，定即按照戒严条例严惩不贷，特此布告。戒严司令官白崇禧、戒严付司令官周凤歧。（同日《时报》）

### 三　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兼戒严司令白崇禧十二日布告

为布告事：本早闸北武装工友，大肆械斗。值此戒严时期，并当前方用兵之际，武装工友任意冲突，殊属妨碍地方安宁秩序。本总指挥职责所在，不得不严行制止，以保公安，除派部队将双方肇事工友武装一律解除外，并派员与上海总工会妥商善后办法，以免

再启斗争，而维地方秩序。所有本埠各厂工友务各照常工作，毋得轻信谣传，自贻伊戚，为此布告，仰各界人等一律知悉，此布。（同日《时报》）

## 四　第二十六军军长兼戒严副司令周凤岐十二日布告

照得本日拂晓，本埠各处，忽闻枪声四起，即经派人调查，据报系有工人及莠民暨类似军人持械互哄，势甚危急等语。当以本埠地处冲要，偶有不靖，势将影响大局；况当戒严之际，尤不容有此等越轨行动，危及安宁。本部职责所在，不得不力予维持，妥为消弭，当即分饬所部，赶赴各地弹压，不论何方面有不遵约束者，即依照戒严条例，勒令解散缴械，以靖地方。兹据报称，所有各地持械之工人、莠民等，势甚嚣张，无法制止，业经遵令一律解散，并将所持枪械暂为收缴等情。是此突如其来之事变，业已平定，深恐地方人民未明真相，转滋误会，合亟布告，仰尔军民人等一体知悉，务宜各安生业，勿得惊扰，致碍治安。倘有不逞之徒，仍敢造谣生事，一经查觉，定当严办不贷。切切此布。（同日《时报》）

## 五　前敌政治部命令

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昨发出命令云：今晨上海总工会各工友自起冲突，殊属不幸；现奉白总指挥面谕，双方均不得以武力相见，静候调处。兹特派董福开、袁逸波、费公侠、唐尧卿、程致、蔡公时、李子峰、刘公畏、王次宾诸同志为专员，速组织委员会，以董同志为主席，调查此次起衅原因，并设法秉公处理。务使风潮早息，各工友均得安居乐业幸福为宗旨。如何情形，盼速具报核办。此令！（同日《时报》）

## 六　浦东特务营营长周济民布告

案奉总指挥白令开："淞沪一带，查有反动分子，受敌贿买，煽惑捣乱；着将民间所有枪枝，一律收缴，以遏乱萌"等因。奉此：遵即将浦东纠察队枪枝暂行收缴。尔等须知，此举纯属防止反动分子之破坏，国民革命军原非得已，切勿妄听谣言，自相惊扰。地方治安及工友利益，本营长自当切实负维持及保障之责。倘有不肖奸徒造谣滋事，或私藏枪火不即报缴，一经察觉，定即严惩不贷。切切此布。（十四日《时报》）

## 七　伍师长之谈话

十三日下午五时许，《新闻报》记者赴海潮寺往谒第二十六军第一师师长伍文渊君，询以办理缴械经过情形。据云："敝部前晚接奉白总指挥密令，以蒋总司令迭据密报，有人假借工会名义，欲冲入租界，扰乱秩序，殊与地方治安有关，嘱令将激烈分子，从速缴械，以免扰乱。敝部奉令后，即于昨晨派第一团长赵观涛、第二团长徐雄前往电车公司及三山会馆缴械，当时电车公司有工人一百余人，曾先开枪抗拒，争持一小时始解决。一团兵士受伤三人，当场缴到机关枪二架，枪四枝。三山会馆有工人四百余人，工人紧闭大门，兵士曾开排枪两次，未伤人，至七时许工人表示愿缴械，当场缴得机关枪七架，枪三百余枝，并拘获抗拒首领何大队长一人，已解往总指挥部，工人即解散。至上午九时许，秩序即恢复。伍师长云：值此前线军事吃紧之际，后方断不容人捣乱，即使收回租界，亦

应用正当方法交涉。设令无知者一味胡闹，则不特租界不能收回，反可令外人有所借口，殊非吾国民所应出。此次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无非为谋地方之安宁而已”云云。（十四日《新闻报》）

## 各机关、群众团体对工人的声援

自十二日蒋介石匪邦围攻纠察队事件发生后，当时各革命机关、群众团体都非常愤慨，纷纷发表宣言文电或提出责问，一致声援上海总工会，指责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兹将国民党市党部、临时市政府及学生联合会等活动分述于后。

### 一　国民党市党部

十二日午前十一时半，市党部为纠察队被缴械事，特派陈泽华、冯先为代表，面谒白总指挥询问真相，并请制止反动派之暴行，保障党员的安全。当由传达队长黄遂白接见，其谈话如次：

“问：‘今晨南北市总工会纠察队被人缴械，是因何故？总工会在本党部领导之下，自有裁制，此事恐系反动派所为，白总指挥已否加以惩治？”

答：‘此事全属工人双方的械斗，白总指挥为维持地方治安起见，已将双方械斗之工人全体缴械。至善后事宜，白总指挥将与总工会妥善协商。现已印就布告一纸，请阅读便知。’（当以布告出见）

问：‘白总指挥将与总工会妥商善后事宜甚善，然则工人武装应得保存。’

答：‘已详布告，不必再答。’

问：‘既经如此，白总指挥究关于此事有何意见？’

答：‘现在还只有办了一半，还有一半未曾办理，一时殊难具体作答。俟白总指挥回来后，当以书面答复贵市党部。’

问：‘上海全市党员、市民，对于此种缴械事项甚为怀疑，且多觉恐慌。白总指挥为本党上海最高军事领袖，甚望能加以保障。’

答：‘大家都是三民主义信徒，有何恐慌可言。’

问：‘正因为大家都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正因为大家都是中国国民党的忠实党员，所以有请我们的武装同志，制止反动派的阴谋，严加保障的必要。’”（十三日《时报》）

市党部于十三日特发表通电，电文如下：

“（衔略）昨晨四时，突有武装流氓自租界冲出，身着制服，袖佩工字符号，在闸北、南市、浦东、吴淞各处，向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攻击。驻本埠军队各师团营部亦同时动作，缴去工人全体枪械，并击伤多人，捣毁第一区党部办公处。前后情形，有目昭著。本党部除派代表向工人慰问及请求军事当局发还工人枪械外，特此通电周知。”（十四日《时报》）

市党部又发表以下之宣言：

“年来国民革命之长足发展，为本党总理所手订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之实效

具体表现。而农工政策之真精神，不只在为工农群众谋利益，尤其使工农阶级自己觉悟，助长其政治斗争力量，为国民革命主力军。在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之次殖民地，中华民族工农群众之参加革命，事实已表现在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上海为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大本营，绾毂全国经济输纳，过去的革命斗争，我奋勇无前之工人群众，无一次不流血牺牲；最近攻击鲁军之役，竟发动两次，鏖战三日之久。总工会领导上海百五十万工人，在本市党部领导之下，为沪上唯一健全机关。此次中反动派阴谋，乘隙偾鯆，突被缴械，本党部认为此种事情影响所关，不只沪上民众运动突受挫折，即对于革命的战线上，灭掉大部分之实力。工人群众必须有政治斗争力量，方能在军阀政治推翻后，表示民主政权之切实开始。我工人群众应即不稍退让，整顿队伍，领导国民革命；军事当局亦当将枪械交还工会，切实保护工人组织。特此宣言。”

## 二　市民代表会和市政府

“市民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昨致电武汉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请对此事（按即指纠察队被缴械事）予以严重惩办。另致蒋介石一电，请彻底查究，所缴枪械悉数发还，并予切实保障，此后不再发生此类事端。电文从略。”（十四日“时报”）

临时市政府于十二日致函白崇禧责问，原函如下：

“白总指挥钧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所部，突于今日黎明时，将南市及闸北工人纠察队军械悉数追缴。查工人纠察队，在过去不惜重大牺牲，响应北伐军，消灭直鲁匪军，其功绩昭然在人耳目；上海克服以后，协同军警维持秩序，对于地方亦不无微劳足录，是以蒋总司令对之极为赞许，赠以旌旗，题曰‘共同奋斗’。夫解放民众为吾党之职志，扶助农工，为总理手定之政策，工人纠察队为民众武装自卫之表现，方提倡奖励无不暇，今反横肆摧残，何以自解于革命民众？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此举谅必别有误会，应请钧座将二十六军所缴该队枪械，迅予令饬悉数发还，并予以确实保障，以巩固革命的军民之联合战线，免为反革命派奸计所中伤，庶几无背于国民革命之初旨，并完成总理之遗命。不第上海市民之幸，党国前途，实利赖之。兹派季应仁同志趋前请命，乞赐延见，俾面呈一切。临书无任企祷之至。”（十三日“时报”）

## 三　上海市学联

上海市学生联合会于十二日下午四时，派代表杨卓初（升恒）、宋至门二君前往龙华，持函往见白崇禧，请其保护工人纠察队，并迅速派员彻查真相，停止战争（按指反动派军队围攻工人之武装冲突），恢复秩序，以免闸北市民重受战争之苦。抵龙华司令部后，由付官处接见云：“白总指挥公务甚忙，不能接见面答。对于工人纠察队事，本部亦未接得各方报告，无从答复。可将此函留下，以后再作书面答复。”该代表等复请见参谋长，以便面陈一切，不意参谋长公出，该代表等只得将原函留下而返。原函如下：

“敬启者，顷得闸北方面同学报告，驻扎东方图书馆（商务俱乐部）之工人纠察队，于昨晚突遭便衣军士袭击，战事甚烈，枪弹横飞，房屋为墟。窃上海自齐卢战事以还，民生凋敝，以达极点。此次北伐军抵沪，毕庶澄部顽强抵抗，闸北一带，焚毁掳掠，所受损失更非言语所可比拟。幸得钧座来驻沪滨，社会秩序日见恢复。方

期奠定基础，急图建设，振军继武，直捣幽燕，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讵意此种足以影响革命工作、破坏社会治安之不幸事情，忽又发现于风声鹤唳之闸北。工人武装自卫原为先总理之遗教，我党所定之策略。沪上之工人纠察队，于此次光复淞沪战争中，与直鲁反动军阀苦战二日之久，幸获最后之成功，对革命运动不无多少邦助；事变以后，亦未见有所殒越。钧座与蒋总司令亦曾明令保护，维持现状。昨晚一部分便衣兵士对工人纠察队之举动，想系反动分子企图抢械，冀谋扰乱、破坏大局，恳乞钧座迅予派员彻查，仃止战争，严惩反动分子，保护工人武装，以免蹂躏市民而维社会治安。特派杨卓初、宋至门二君代表前来，陈述一切，希赐接见为荷。（十三日《申报》）

学联会并议决罢课三日。十四日《时报》载："学生联合会于昨日（十三）午后二时开第三次执行委员会，计到同文、法政、复旦中学、复旦、上海大学、光华、新华、景贤、法科、惠灵、国民、南洋、南洋高商、南光，同德等十余校代表二十余人。由总务主任主席，报告各界来件及总工会派代表来本会接洽并求援助之经过，随即讨论援助工人纠察队案，议决办法数项：（1）全沪学校宣布罢课三日（自今日起至礼拜六止），促当局发还工人枪械，维持社会治安，保障革命运动；（2）致函当局；（3）派刘子明、龙芹怀、符彪、周宪文、黄树芬五人代表前往质问；（4）发表援助宣言；（5）在罢课期内全沪同学出发演讲；（6）派李伟、陈序伦二人慰问总工会；（7）通告各校学生会发表援助宣言；（8）电请国民政府惩办反动派；（9）电请国民政府抚恤死难工人家属；（10）各校学生会派代表质问当局。"

此外，上海市各界妇女联合会等团体，亦曾发表宣言文电声援。

## 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不满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因此在四一二事变前后，军队中曾有不少革命军人反对蒋介石匪邦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

据《时事新报》等报记载，自四月十二日晨缴械事件发生后，二十六军（即当日执行缴械的军队）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赵舒十分愤慨，反对无效，因而留书出走。赵出走后，该军政治部全体工作人员，亦同时自行宣告解散；并有数十名革命兵士携带枪械逃离部队。兹将赵舒离职时的通电原文录下：

"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各军师长、各军师政治部、各省市政治委员会、各省党部、各报馆均鉴：舒矢志革命，奔走半生，戎马间关，备尝艰苦。去冬奉命出为党国监军，偕周军长转辗数千里，历时数阅月，领导兵民，一致杀贼。兹幸两浙肃清，三苏平定，虽将士用命，民众尽力，舒亦可以告无罪于党国者。革命之使命虽未完成，而军事步骤已可告一段落。惟目前各方怪象丛生，惶惑万状，舒本萍梗身世，又以重大刺激，积为采薪之忧，业已电请中央党部军人部，辞去二十六军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各职，暂息仔肩，藉资休养。但呼吸尚存，素愿不渝，此后有生之日，仍是党国之身。用特电闻，统祈鉴察。赵舒四月十二日。"（《时报》四月十四日）

在四月十六日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白崇禧："某军反对反共产派，是否确实？"白

匪不敢面对现实，连忙推说："这完全是共产党造谣。"（十七日《民国日报》）但事实是否认不了的。军队内部的不满，更足以说明蒋介石的反革命屠杀是如何的不得人心。

## 帝国主义者和大资产阶级对蒋的赞扬和捧场

这次事变发生后，帝国主义的报纸一致赞扬蒋介石反动派处置得当。日本《朝日新闻》论蒋介石此举"可造成更稳之空气而终止上海仇外骚扰"（路透社十三日东京电，载十四日《申报》）。《日日新闻》更露骨地说："上海方面之行使非常手段，一面表示蒋介石一派与武汉派决裂固不待言，同时亦表示驱逐在武汉派后面之鲍罗庭以下之俄国势力，此点与北方军阀之主张实属一致。孙传芳与蒋介石一派，除此问题以外殆无相争之理由。由此观之，则此际孙军之进攻，似非可赏赞之行动。"狡猾的帝国主义者已把蒋介石看作他们最好的走狗，用来压迫和破坏中国革命，比孙传芳更有用处。同时。蒋介石反动派对于外国主子的意旨也极端顺从，四月十六日白崇禧在上海招待记者会上和日本记者有下列一段问答：

"日记者问：'如奉方与俄宣战，国民军之态度如何？'

白崇禧答：'余只知国民革命为主义而战，不知有他。如奉方能服从三民主义，亦可与之合作。又孙传芳派来多人接洽，谓孙旨在讨赤，现革命军亦在抗赤。彼知确有诚意，当不深拒。'"

这一段谈话充分暴露了蒋介石反动派早就愿与任何军阀合作，以共同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恶事业。

大资产阶级对于蒋介石反动派屠杀工人和共产党人的暴行也歌功颂德，热烈捧场。他们对于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本是敌视的。在三月二十三日上海总商会召集的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银行、钱业两公会暨入会各业团体的联席会议上，若干资本家的发言就明显的表示了这种态度：

"荣宗敬（纱厂联合会代表）：'工潮不决，纷扰无已。根本解决，须请白总指挥发统一命令解决工潮，乃可复工。工人手内一有枪械（按指武装工人纠察队），闻者寒心，务须收回枪械，以维治安。

主席（傅筱庵）：'……荣君之主张甚是，如欲致函白总指挥，鄙意由三商会（按指总商会与南、北市商会）及银钱两公会出面最好。'

陈良玉：'有关系之厂家最好亦加入具名。'

主席：'不若今日到会各团体一并具名，以厚势力。'

徐春荣：'对于请求复工，不若径函总工会要求，以免误会。'

黄搢臣（丝茧总公所代表）：'应先决定是否承认总工会，如承认，再行去函。'

荣宗敬：'公司内有第三者出而干涉，事不易办。请函白总指挥要求总工会负责，以后工人不带枪械，则开工后纠纷自无。'

沈田莘：'荣君主张扼要，致函时应由总商会单独出面，且须迅速进行。'

主席：'……照刻下情形，总工会似须承认。致函时，照潮流所趋，今日到会各团体共同具名最好。'

方树伯（总商会付会长）：‘不若由三商会出面致函总工会，并将今日到会各团体叙入其内。’

徐春荣：‘总工会现已勘定办公地点，乘此致函与彼表示携手，可以免去一切误会。’

陈良玉：‘徐君所言甚是，现潮流如是，先与接洽，可免隔阂。’

王吉申（丝茧总公所代表）：不赞成径函总工会。

黄搢臣：主请白总指挥先维持秩序，然后再谈开工问题。

王彬彦（闸北商会代表）：主请傅筱庵会长与总工会会长汪寿华君面洽开工问题。

主席：‘请王彬彦、徐春荣二君与汪寿华君接洽。’（众皆赞成）……

主席：以三商会出面致函白总指挥，请速维持地方治安，以安人心，付表决。

全体赞成由总商会主稿，再行会衔。”（总商会会议记录）

由上可见，大资产阶级对于上海总工会，尤其是武装工人纠察队，心存疑惧，以取消之为快。故当四一二事变发生后，他们就立即为蒋介石反动派欢呼捧场。

兹将各报所载南北市商联会等对于“共进会”流氓攻打上海总工会成功之“贺电”抄录如下：

“南京蒋总司令、上海白总指挥、各军师旅团营长、中华共进会、各团体、各报馆、全国父老均鉴：共产主义乃是共同劳动生产，共同平均享用，共同办理事件的共生共享共治的世界主义；不是团结土匪流氓，破坏秩序纪纲、抢夺他人现有财产，供给少数党人挥霍，垄断一切党权、政权、军权、破人财产，并人国家，毁人名誉，害人生命的共死主义。请看苏俄一九一九年破坏摧残惨死千余万人生命的空前大祸乱，世界人类无不悼恤。该党在俄已抛弃毫无准备之制度，而退回新经济政策，偏又来华孕育国民党内，实行其共产政策，推翻民生而为民死，打倒智识，利用劳动，为彼牺牲，侵夺利权，商人破产，工人失业，颠沛流离，毫不顾恤，是而可容，人道将绝！兹幸救国义士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密率敢死同志，于四月十二日午前四时，包围自由捕杀商工男女、胁迫罢工、不事生产、恶贯满盈之总工会，搜剿枪械，解散不法武装之纠察工贼，并痛惩不明共产主义之共产党员，全埠二百万中外士女，聆此除暴佳音，一致踊跃庆贺。希望全国各省县商埠父老所组各团体一致仿效上海，起而诛戮共产党，民国幸甚，国民幸甚。江苏省青年励志协会、北伐国民军后援协会、江苏农民联合会、中国工界总联合协进会、南北市商联会等六十三大公团同启。”

包括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交易所联合会、纱厂联合会、运输公会及染织布厂联合会等六十余团体的上海商业联合会，四月十六日又电南京称：

“南京蒋总司令并转中央执监委员诸公钧鉴：窃维革命告成，建设随之。不图共产党只知破坏，阴谋暴露，事实俱在；幸当局未雨绸缪，俾免赤祸蔓延，此商民所感慰者也。顷读吴稚晖先生呈请清党电文，益见当局具有扫荡反动分子之决心。诸公此次列席会议，解决国是，在兹一举，可否之间，关系甚巨。敝会一致议决愿与三民主义相始终，对于当局清党主张愿为后盾。谨此电闻。”（十七日上海各报）

另据“工部局警务处”四月二十日情报称：“蒋介石特务处长杨虎，于四月十九日下午一时四十分赴爱多亚路三十八号总会，会晤上海总商会主席傅筱庵及其他商界闻人。在

该总会举行的午宴席上，傅筱庵发表简短演说，斥责布尔塞维克在中国之活动，谴责职工对雇主之态度，盛赞蒋介石及杨虎制服上海赤色分子的功绩。”

## 三　上海工人的英勇反抗及宝山路大流血

### 工人夺回总工会会所与全市总同盟罢工

各厂工人群众在十二日早晨听到纠察队被流氓、军队包围枪击，都非常激愤，纷纷仃工出厂，要求士兵仃枪，声泪俱下。当日闸北、南市、沪西及浦东各地纷开群众大会（另详），一致要求：（一）交还工人纠察队枪械；（二）保护上海总工会；（三）惩办流氓，肃清反动分子。

据四月十三日《申报》和《时报》记载，十二日中午数万徒手工人在闸北青云路开大会后，即出发游行，由青云路、宝兴路而中华新路，沿途高呼口号，抵达湖州会馆总工会会所时，一致要求军队撤退，交还总工会会所，军队起初拒绝撤退，工人群众悲愤填膺，不顾性命，齐声高呼，一拥而入，驻军始被迫退出。湖州会馆夺回后，秩序仍由纠察队维持，总工会亦于群众拍掌欢呼声中，继续办公。（据商务老工人谢庆斋回忆，是夜湖州会馆内有徒手工人万人，露宿天井中，忍受冷风苦雨不肯离去，以保护自己的总工会。）其时，总工会立即在大天井中，召开工会代表大会，一致议决为反抗计，即日起宣告全市总罢工。

总工会发布之紧急罢工命令原文如下：“各工会转全体工友们：今日早晨四时许本会被反动派捣毁，并将所有纠察队枪械全体缴去。工友们，这是我们莫大的损失！现在我们要用总罢工的手段去对付他。望各工会转所属工友们，接到这个万急命令，立刻火速罢工，誓死奋斗，非达到打倒反动派、赔偿本会一切损失的目的誓不休止！特此切切紧急命令。”（十三日《时报》）

总工会又一通告云：“各级工会委员会：兹定于明日（十三日）上午十时，所有全上海各业工会所属群众，均一律罢工。罢工工友并须全体一致到闸北总工会开会，通过下列四项：（一）发还纠察队枪械；（二）要求保护工人纠察队；（三）释放被捕者；（四）拥护总工会。”（同前）

上海总工会于十一、十二日，原在各报刊登广告，通告全市各业工人（除市政公用事业）于十二日全体休业一天，参加欢迎“汪精卫主席”复职市民大会（按总工会召开此会，目的在表示拥护武汉革命政府，以反抗蒋介石之蛮横压迫。故汪虽已离沪，欢迎会仍决定举行），故总同盟罢工系于十三日开始，除前述紧急命令外，总工会复于十三日上午向各界发表总同盟罢工宣言：“昨日（十二日）晨四时，突有由租界冲出之武装流氓，身着制服，袖佩工字符号，在闸北、南市、浦东、吴淞各处向本会纠察队攻击，驻本埠军队各师、团、营部预奉有命令，亦同时动作，以种种欺骗手段，缴去本会纠察队全体枪械，并抢去工会及纠察队驻所一切物品，虽一衣一履，囊括无遗。缴械而后，呼啸入租界而去。本会纠察队因抵抗而死者百余人，工友群众死者数百人。自昨晨六时起，各处工友

陆续罢工出厂援救，对兵士哀号泣恳，竟遭射击。前后情形惨不忍言。军事当局与租界中敌人默契，昭然若揭，事实俱在，证据确实。本会至此，唯有宣告全上海总同盟罢工，以为抵抗。本会所领导八十万工友，誓死奋斗，宁愿死于以国民革命为旗帜者之手，虽死亦有荣。谨此宣言，惟各界同胞鉴察。上海总工会”

上海总工会又将此次事变真相通电全国，呼吁全国人民一致援助。通电原文如下：“全国各界同胞均鉴：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突于本月十二日上午四时，下令沪上各军与租界当局所收买之流氓便衣军，包围上海闸北、南市、浦东之纠察队，用机关枪扫射八时以上，死伤多人，全体缴械。窃我上海工人，素为反帝国主义及军阀之先锋，历次响应北伐军，推倒孙张军阀，牺牲极大，卒能驱除顽强抵抗之奉鲁军阀，在上海工作上不无微劳；而所得者仅此夺自奉鲁军手中之枪械，而编成纠察队用以自卫。此纠察队并非如军阀之欲发展各人之野心，割地盘，争权利，实系根据历年来受帝国主义、军阀、流氓及一切反动分子压迫的经验，为自卫计，不得不成立此一种武装联盟，与商人之商团、市民之保卫团同属民众武力，正合革命需要。反令勾结帝国主义，扑灭民众之武力，得称为革命军正当之行动耶？我上海工人自‘五卅’以来，均在本会指导之下，经过长期之训练，组织严密，向少无意识之举动。当鲁军败退时，帝国主义及鲁军阀之枪炮所引起之宝山路大火，工人纠察队一面与鲁军作战，一面救息火灾，于鲁军被缴械后，立即恢复秩序。于此可见工人纠察队是市民秩序之维护者。党军抵沪，（本会）即再三宣告，对于一切外交问题悉与国民军同一步骤，决无单独行动，以致行动步骤不一致。白总指挥抵沪后，曾正式宣告工人纠察队与别动队不同；蒋总司令亦曾声明此言，谓‘工人武装为自卫计，乃属必要’，并谓‘决不缴械’，今言犹在耳，是工人纠察队毫无违法可言，且国民政府出有通令保护，兹姑退一步言，即令根据如何理由有缴械之必要，同属革命组织，兄弟骨肉，有何不好商量，尽可预先通告，事前商量，乃必出此残酷高压之手段，演成市街之流血，危害市民生活之安全，破坏军民之联合，使帝国主义者乘我兄弟阋墙之际，更可乘机进攻，岂但于法律手续不合，并于革命前途影响实大！此等举动在帝国主义、军阀为之，吾人亦视若寻常，今乃竟由革命之北伐军对于革命之工人纠察队为之，实为国民革命之污点，吾工人甚为耻之。吾工人自始即信任北伐军，虽帝国主义者日日造谣，谓党军如何敌视工人，将缴工人纠察队之械，工人卒不之信，此于党军用欺人手段来缴械时更可证明。不意堂堂皇皇之党军，竟听帝国主义之谗言，并协同之以缴中国工人之械，若全国党军皆如此，吾人不能不为国民革命前途痛哭！现在上海全体工人愤懑自卫武装之被掠夺，总工会之被蹂躏，为革命前途计，为打倒新军阀及帝国主义计，已宣布一致罢工，不达目的不止。吾人要求立还纠察队武装，肃清反革命派及一切流氓工贼，向帝国主义提出严重抗议，保护工会，惩办负责之军事长官。除电请国民政府负责办理外，仅此布闻，深望全国同志一致援助。”

总工会又电蒋介石责问，十四日《时报》载：“昨（十三日）总工会为纠察队缴械事，发表宣言通电，甚为愤激。并电南京蒋总司令，叙述事变经过，末谓上海八十万工人当党军未到时，即由本会领导继续不断与军阀势力奋斗，经了无数的流血奋斗牺牲，才夺获奉鲁军武装，接应革命军顺利来沪，使上海未遭受很大的损失。本会纠察队在此次革命中所树的伟绩，为全国人士所共誉，国民政府已允永久留为民众自卫的武装，总司令亦曾表

示承认此民众的武力，何以今日竟发生此类似军阀之行动？现时全上海工人均愤慨万状，一致罢工要求：（一）交还工人纠察队枪械及所抢衣物银钱文件；（二）保护上海总工会；（三）惩办下令攻击纠察队的军事长官；（四）惩办流氓，肃清一切反动派；（五）向帝国主义者抗议指使流氓由租界武装进攻纠察队。本会盼望蒋总司令对于此次上海事变及工人要求能迅予满意的答复云。”

另据“工部局警务处”四月十三日情报称：“上海总工会今日号召工人举行总罢工，并将于今日上午十时在闸北青云路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工人总罢工及抗议国民军解除工人武装的招贴，今晨在闸北张贴，中国海员工会也发出同样性质的传单。”又称：“居住于闸北湖州会馆上海总工会之工人二千人，于四月十二夜至十三日晨召开大会，决定重新组织工人纠察队，以铁棍武装自己。决议既出，工人八百人即于今晨八时离湖州会馆前往宝山路商务印书馆，该处将作新纠察队之营房及训练处所。”

《时报》四月十四日综合报道：“总工会前日（十二）下令总同盟罢工，各区工会接到此项命令后，即先去执行。兹将各方罢工之情形记录如下：（一）闸北各丝厂、商务印书馆、玻璃厂及各项手工业工人多罢工；（二）南市于昨晨（十三日）六时下总罢工令，各铁厂及华商电车公司全体罢工，电车即行仃驶；（三）小沙渡内外棉及日华、同兴等纱厂（按均为日商纱厂）全体罢工；（四）浦东各烟厂多罢工；吴淞铁路工厂及纱厂多罢工；（五）铁路方面吴淞铁厂及麦根路站完全罢工；（六）市政工人方面，邮务及电、汽车一部罢工；（七）沪东各纱厂、烟厂、铁厂一部罢工；（八）店员罢工者不多。”

各报记载各区各业罢工的消息如下：

△海员工会宣布罢工　“本埠海员昨日（十二）一致罢工，抗议纠察队被解散案。本埠各轮船海员，因骤闻总工会纠察队被解散，甚为悲愤，故昨日已接得海员工会命令，一致罢工，以要求当局恢复纠察队武装。计本埠各轮船海员之参加者，有新江天、新宁绍、海晏、江大、新铭、江安、山东、奉天、吴淞、鄱阳、益利、新宝华、海门、大宁、宝华、永利、万县、大吉、爱仁、昌和、图南、洞庭、利生、顺天、万通、公和、恒生、富升、阜生、大福、襄阳、新济、秀山、南阳、嵩山丸、华山丸、瑞阳丸、盛京、镇安、宜昌、四川、长沙等数十轮船云。”（十三日《申报》）十二日下午海员工会发布之罢工命令原文如下：“万急——海员全体工友鉴：我全上海工人以血肉换来自由与武装，彼国民党右派的军队已在各地缴纠察队武装，包围上海总工会，开枪轰击，竟欲恢复我工人在军阀时代之地位。本会已奉上海总工会紧急命令：限我海员工友接令后，即刻罢工与敌人决一死战，继续暴动，解除右派军队武装。此系我全上海工人阶级生死之关键，凡我海员即刻遵行毋违。此令！中华海员全国联合总会上海分会（印）”（十七日《申报》。按原件系被反动派抄获作为证据者，不一定可靠；又报上铜版印刷模糊，可能有抄错处。）

（附注：据十五日《申报》消息：“海员罢工历时三十八小时，十四日午刻工会执行委员长应各公司之请求，始下复工命令。”）

△公共租界电车仃驶　“公共租界英商电车公司开车、卖票人等，因总工会命令罢工，为军队解散工人武装之声援，故于昨晨（十三日）起一致罢工，所有各路之有轨、无轨电车概行仃驶。”（十四日《时事新报》）

△南市工联会命令全体罢工　“昨日（十二）适值午后一时开欢迎汪主席复职大会，

到会群众五十万，闻悉事变，大为愤激，即整队往龙华去请愿，要求发还枪械，释放被捕诸人等。现闻南市工联会，已命南市工友全体罢工。”（十三《申报》）

△华商电车停驶　“南市华商电车公司，本于昨晨（十三）照常上工，各路电车亦照钟点出厂开驶。忽于上午十时接到总工会之命令，嘱令罢工，故各路电车至十时二十分陆续进厂停驶。至下午四时，驻南站之二十六军一师一团士兵四十余人，接得上官命令，须严密防备，恐有工人聚众前来抢械，立刻特别临时戒严，阻止行人，交通断绝。”（十四日《申报》）

（附注：据《申报》消息，英电工人于十三日下午三时后即被迫陆续复工，华电工人则坚持到十四日下午始复工。）

△店员总会之代表大会　“昨日（十三）下午二时，店员总会召集第五次代表大会，到四十三团体七十六人，开会程序如下：（一）公推章光明君为临时主席；（二）报告——沈资田君报告上海总工会过去光荣斗争历史及纠察队被缴械经过、龙华请愿经过（另详），陈公庆君报告此次总同盟罢工之意义及重要；（三）讨论如何执行总工会罢工命令。决议：（1）自明天起在店总属下未罢工的各工会一律实行罢工，并组织宣传队到各店劝告工友；（2）罢工后到南市游行示威。罢工到交还工人武装严办反动派为止。”（十四日《时报》）

△闸北各丝厂罢工　“闸北各丝厂昨晨（十三日）本已照常工作，迨至十时，因得总工会命令，男女工人遂皆罢工，为被缴械工会纠察队之申援，借示反抗。”（十四日《时事新报》）

△电灯自来水工人　“公共租界工部局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之全体工人，昨日并未卷入罢工旋涡，而该局保护此类工厂，亦甚周密，凡各马路之有自来水亭及电汽间所在，早经派兵驻守，今日防范更严，以免捣乱分子乘机煽惑。”（十四日《时事新报》）

* * *

另据“工部局警务处”四月十三日情报称：“为抗议中国当局于四月十二日搜查工会及解除工人武装，杨树浦及沪西大部工人今日均不到厂工作，纱厂及烟厂实际上全部停工。上海电车公司（英商）外勤人员今日未到厂工作，至上午十时始有车十六辆行驶一路及二路。盛京轮（太古公司）海员三十五人执行海员工会之命令，四月十二日罢工。”十四日情报称：“由于上海总工会号召总罢工结果，工人九万人仍罢工中。”十五日继称：“今日各纱厂、丝厂、烟厂等罢工工人约九万九千人。公用事业方面受波及者有上海电车公司，工人四百人（机匠）未到华成路车厂上工，另工部局杨树浦发电厂一千名工人中有四三五人罢工。”

* * *

从以上一些记载可以看出，上海总工会在工人群众中有极高的威信。工人群众为了抗议蒋介石匪邦的缴械，为了争取自由与生存，不顾反动派的高压，热烈响应总工会的总罢工号召，即使在帝国主义“严密戒备”的发电厂与电车公司中，仍有不少工人英勇参加总罢工！帝国主义分子的情报说，参加总同盟罢工的人数为九万九千人，这显然是缩小了的

数字。因为单是纱厂和丝厂的全体工人参加罢工，即有十数万人，再加上烟厂、海员和其他各业的罢工工人，总数当在二十万人以上。

## 各区的群众大会与龙华大请愿

纠察队被缴械的消息传出后，全沪工人与市民当日（十二日）即纷纷举行群众大会，向反动派表示严重抗议。

### 一　闸北市民大会

据十三日《时报》和《申报》消息："十二日午十二时，闸北市民为纠察队被缴械事，在青云路广场举行市民大会，到各工会各公团一百余团体，共五万余人，由济难会（按该会以救济在一切革命运动中牺牲被难的同胞为宗旨，系进步人士于五卅运动中发起组织者，为中共领导下的革命团体之一。全名为中国济难会，总会在上海，各地设有分会）吴元烈主席。大会议决：（一）拥护工人武装；（二）要求交还纠察队枪械；（三）拥护上海总工会；（四）游行示威；（五）发表宣言。"大会宣言原文如下：

"全国同胞们：上海工人自'五卅'以来，在帝国主义与军阀严重压迫之下，即继续奋斗与各界人民一致做解放运动，并组织一八十余万人之上海总工会。及北伐军出师以来，上海工人复奋不顾身与孙张军阀对抗，屡仆屡起以响应北伐军，卒能使孙张军阀迅速倒台，并驱逐盘据车站之鲁军，使北伐军顺利到达上海，并阻溃兵之抢劫，所以这次上海革命之胜利，上海工人实著有殊功。工人将鲁军驱逐后，即夺其枪械编成纠察队，用以自卫并维持市面治安。此项纠察队之组织，因沪上流氓工贼之多及反动派之猖獗，实有必要。自总指挥抵沪后，即正式申明工人纠察队与别动队不同，当可保存。蒋总司令来沪后，亦申明此旨，并赠工人纠察队'共同奋斗'大旗一面。不料昨晚闸北、南市、浦东、吴淞工人纠察队即被大批党军监视，今晨四时半即协同租界当局所收买之流氓一致动作，至十时后即将所有纠察队一律缴械。纠察队及人民死伤者数百人，凄惨万分。当党军正向纠察队缴械时，帝国主义的飞机复翱翔空中示威。群情愤激，特召集市民大会，一致表决要求下列诸条件：（一）交还纠察队之枪械，不达目的不止；（二）肃清工贼流氓及一切反动派；（三）保护工会；（四）对租界当局直接残杀中国工人纠察队应提严重抗议；（五）请国民政府负责并严办下令缴工人纠察队械之长官。谨此布闻，望全国同胞一致援助。

上海闸北市民大会叩"

### 二　浦东市民大会

《时事新报》十三日载："因当局颁布戒严令，浦东各工会代表昨日不能渡浦参加迎汪复职市民大众，各界群众乃于正午在祥生厂附近空场上开会，到会人数约在二万左右。公推六区党部孙铁海、工界张佩林和商界范渔人三人为大会主席团，继又公推张佩林主席，报告事变经过，公决即日拍电国民政府报告一切。次孙铁海、范渔人、叶呈兴相继演说，经众议决罢工罢市罢课，要求三项：（一）交还纠察队枪械；（二）赔偿工会损失；

（三）追究此案之主使者。表决后已下午三时，群众高呼口号而散。”

## 三　沪西工人大会

据十三日《申报》及《时报》消息，沪西区各工会联合会所属之各工厂工会，共计一百有余，工友有十二万余人，听到纠察队被缴械消息，甚为骇异。十二日各工会奉总工会命令停工一天，参加欢迎汪主席复职市民大会。讵知在出发时，所有各工会之旗帜及各人之符号均被没收，并被阻止前进。工人群众十分激愤，即回到潭子口空地集合，举行大会，决定自十三日起各厂全体罢工。一面由各厂派代表一人，持沪西工联会函到二十六军司令部质问其缴械理由，因在路中被阻，不得已各自返会报告。《申报》刊载质问函原文如下：“敬肃者，窃为敝会之总工会乃本埠最重要之领袖，率领全上海工人打倒一切压迫人民的军阀，而罢工欢迎贵军，经过几次流血才得着区区枪械。不料（贵军）于今晨（十二）突缴收我工人纠察队之枪枝，不卜是何意见，殊难明悉。为此特派代表前来，务希详细示复，希望切勿效前军阀之举也。”

## 四　南市市民大会及龙华大请愿

关于南市市民大会及龙华大请愿的情况，《时报》于十四日详细报道如下。

“四月十二日中午，原定于南市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上海市民欢迎汪主席复职大会，但因是日晨发生特别事变——解除工人武装事，故开会时即由主席团宣布立即向白总指挥请愿。其请愿情形如下：

（一）是日到有各工会各学生会各商会等民众团体，甚为踊跃，群众在五十万人以上，其时市民已知当晚之事变，故一经主席宣布后，即整队向龙华进发，秩序井然，毫无混乱情形。（按十三日《时报》刊登《大公社》报道，曾称群众中有人捣毁方斜路裕源祥国货号，军队急来阻止，一时秩序大乱，群众纷纷逃散。……这显然是恶意造谣，或系反动派军队有意制造之事件。）

（二）至龙华后，经过总指挥部直达大操场开市民大会，公推学联会为大会主席，宣布开会宗旨，迎汪大会改为请愿。请愿条件如下：

一、请白总指挥尊重民意；

二、立即恢复工人武装；

三、保护上海总工会；

四、保护各级党部，因区党部已被反动派捣毁；

五、取缔反动团体。

主席报告请愿条件，即由全体民众欢呼通过。并推举市党部、总工会、学联会、南市区民代表会、南市工联会、市政总工会、店员总联会、各界妇女联合会、九亩地商联会等九团体为总代表。代表推定后，即向总指挥部进发。代表前行，群众追随，悲壮激昂，从来未有。至总指挥部门前，代表入内谒见，群众在外排队立候。

（三）代表入内后，白总指挥公忙，由潘宜之（总指挥部秘书主任）接见。代表等即提出群众决定之请愿条件，开始讨论。

首由潘主任说明武汉国民政府与蒋总司令之关系甚为不好，徐（谦）、邓（演达）等主持之，此间对你们民众亦无办法。次即谈及联俄联共问题，据云，排斥苏俄个人与放弃联俄政策无关，联共是要共产党做国民党工作。再次又谈及农工政策，潘云国民党有国民党的农工政策，是不分阶级的。最后即谈及条件，潘依各代表提出条件逐一答复：

（1）革命军当然要尊重民意；

（2）工人武装是可以恢复的，但因纠察队自相械斗，故解除其武装，以后可由总指挥部指挥；

（3）可以保护上海总工会，但须交党部指挥；

（4）各级党部当然保护；

（5）所有反动派组织团体，可由市党部会同政治部调查取缔。

潘答复后，即由各代表发表意见，对潘答复，详加解释：

（1）关于上海总工会受党的指导是不成问题的，总工会早已在党的指导之下，早已做了党的工作，历次国民革命运动，无不率领上海数十万工友热烈参加，并有伟大光荣之牺牲，且受市党部的津贴。

（2）学联会提出，潘主任所答全系理论，要有确实办法，实际保护，并且眼前即有数十万群众，其意志即应尊重。

（3）总工会提出，工人自相械斗绝无其事，在同一组织之下断无互相冲突之理，只有外人或反动派向纠察队或工会捣乱而引起冲突，但当局为何对纠察队对方之武装未予解除？

（4）工人武装是中心问题，无论如何要尊重眼前数十万民众意见，承认恢复。

经此解释，即开始决定条件。惟恢复武装甚为重要，故讨论甚久。

潘云：要恢复武装，最好待十六号中央执委之解决。

各代表云：群情愤激，务须立即答复，以顺民意。

潘云：须向总指挥请示。

各代表即提出条件办法，恢复武装后可受白总指挥指导。

潘云：纠察队须指定地点驻防，并受政治部训练。

总工会提出实际办法，此后可由总工会、市党部、总指挥部共同组织‘工人纠察队指导委员会’。讨论至此，即由双方同意解决。

其他问题，如保护总工会、各级党部、尊重民意及取缔反动团体等条件，亦由潘主任接受各代表‘确实执行、不重理论’之意见。

（四）以上为条件决定之大概情形。各代表于下午五时入内，双方谈判历三小时之久，其时数十万群众鹄立门外，静候代表回复，虽天雨淋漓，衣服尽湿，而全无退让，为从来所未有之群众大会。后代表出外报告谈判结果，群众对‘纠察队受白总指挥指挥’一条颇为不满，意欲纯属总工会指挥，经总工会代表详加解释，始为平息。惟群众人多，听不清代表报告，故呼‘我们代表何往’之声不绝于耳，后经代表分头报告亦即了解。

（五）条件商妥矣，群众了解矣，遂由各代表商妥潘主任专挂火车数列，将群众

送回市区。”

上述各项记载，充分说明了群众情绪的激昂，尤其是龙华请愿时群众声势的浩大，迫使反动派不得不在口头上接受了一些条件。但反动派已决心与人民为敌，故一面继续使用欺骗手段蒙蔽群众，一面即积极准备更残酷的屠杀，于是有四月十三日宝山路大惨剧的发生！

## 十三日宝山路上群众请愿大流血

上海总工会为纠察队被缴械事，特于十三日在闸北召开工人群众大会。会后群众游行请愿，在宝山路上遭到反动派军队的大屠杀。同日南市工人群众举行游行示威，也遭到反动派的屠杀。据四月十四日各报记载和其他材料，当时情况如下：

十三日上午十时，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虽因反动派借口“戒严期内禁止集会游行”，沿途派军队布岗堵截，沪东、沪西及南市各地工人群众多不易通过前来，但闸北和各区到会工人群众仍有六万余人（《申报》），学生和市民加入者亦甚多。会议开始时，主席（《时报》载王二富）先报告开会意义，说明新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缴纠察队枪械并屠杀工人的经过，又说明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也遭反动派暗杀。现在工会已失保障，工人不能自卫，是无异摧残工人之生命，实令人痛心！我们应如何对付，请众公决云云。工人群众闻言愤慨，多有痛哭失声者。最后通过决议：

一、收回工人的武装；

二、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

三、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

四、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极严重的抗议；

五、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起而援助；

六，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

末高呼口号：收回工人武装！严办肇事军事长官！打倒新军阀！为委员长复仇！为一切死难工友复仇！拥护总工会！拥护武汉国民政府！

下午一时，青云路大会散会后，工人群众即整队游行赴宝山路天主堂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被拘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请愿的队伍排列如下：军乐队及大旗队——纠察队——各工会——劳动童子团——其他团体（学生及市民团体）。当前面的大旗队行至鸿兴路口时，青云路的队伍尚未发动，其长度约有二里许，群众沿途高呼“还我武装！”“打倒新军阀！”等口号。行及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早已接到屠杀密令的布置在各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即分头奔出，向毫无准备的徒手群众开枪，将群众的队伍冲散，并接着用机关枪扫射，死者血流街道，伤者纷纷倒地，一时秩序大乱。但见兵士在街上横冲直撞，如疯如狂，逢人即打，甚至逃到天主堂对面义品里藏起来的工人，也被拉出当场杀死！据估计，当时被击毙者至少在百人以上，伤者更不可数计。其时雨势甚猛，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附近各商店均纷纷闭门停业，居民惊惶万状！反动派演此大惨剧后，为掩盖其血腥罪行，于二时十分，立刻实行特别戒严，禁绝行人，用大卡车把马路上的死者运往荒郊埋掉，每车堆装十数人；尚有重伤未死者，亦被兵士横拖倒曳放置车

上，装往郊外活埋掉。直到下午五时许，反动派把尸首移尽，血迹扫清后，宝山路一带才逐渐恢复交通！

十四日《申报》载："南市工人约五、六千人，于昨日（十三）午后在公共体育场集会后，即整队游行。行至南火车站前，被车站四周之军队发枪射击，当时立毙十余人，击伤数十人。"

另据"工部局警务处"四月十四日情报称："十三日下午四时二十分，南市工人群众游行至南站，系向军队要求发还纠察队武器，士兵拒绝要求并开枪将工人驱散云。"

## 上海总工会发表第二次宣言

上海总工会于宝山路群众请愿大流血后，立即（十三日下午）发表第二次宣言，号召全沪工人坚持总同盟罢工，誓死奋斗。宣言原文如下：

"本会领导全上海八十万工人，自前次'五卅'以来，不断与帝国主义军阀奋斗，一面为自身求生存，一面为全市市民谋解放。自三次徒手奋起与孙传芳、张宗昌军队肉搏，牺牲了许多勇敢的工友，流了无数次的血，最后始于三月二十一日由本会纠察队缴除奉鲁军枪械，响应北伐军顺利来沪，使上海市民避免很大的损失。所有功绩，早为社会人士所称赞。本会纠察队即以夺获军阀的枪械，组成常备纠察队，一面自卫，一面邦助军队、保卫团（按系商界的自卫组织——编者）维持地方治安。以八十万工友之组织，保留此少数武装自卫，以防制流氓之捣乱，实属必要。国民政府亦来电嘉奖此民众之武力，允许其同正式军队一律待遇。然而帝国主义及国内一切反动势力震惊工人革命势力的力量，非常恐惧不安，遂造作诽谤，厚诬上海总工会将指挥工人纠察队冲入租界；厚诬上海工人将乘北伐军前线紧张时在后方捣乱。关于前者，本会早经登报声明，事实俱在，可以调查；关于后者，更不待辨白自明，焉有过去牺牲奋斗以响应北伐军，而今复在后方捣乱之理。当总司令（按指蒋介石——编者）在沪时，亦曾详细为总司令解释一切。不幸昨日（十二日）竟发生军队预设罗网，围缴纠察队武装之毒计！事变以前，军事长官预有密令，证据确实，先由租界冲出流氓，身着党军制服，臂袖工字符号，流氓在前，军队在后，齐来袭击，杀死本会纠察队与工友多人，并将纠察队住所一切物品全数抢去；虽各处工友陆续罢工，出厂援救，对兵士哀号泣恳，亦遭射击！前后情形，惨不忍言。本会委员长亦于前晚被人暗害，军事当局与租界中敌人默契，昭然若揭。全上海八十万工友艰苦奋斗欢迎而来之北伐军，竟给工人以超过孙传芳、张宗昌压迫之报酬。今日工人群众赴司令部请愿，途中又受军士包围枪击，死伤无算。本会此次唯有宣告全上海总同盟罢工，以为抵抗。本会为此深对各界不安，然为本会八十万工友之生存计，势难避免，唯望各界团体加以谅察，并能积极加予援助。本会所领导之八十万工友誓死奋斗，提出以下要求：

（1）交还纠察队枪械；

（2）发还工友被劫衣服并赔偿一切破坏损失；

（3）抚恤死伤工友及其家属；

（4）惩办下令开枪攻打工友的军事长官；

（5）严缉暗杀本会委员长的凶手，为汪寿华报仇；

（6）交还工会各机关，保护总工会；

（7）制止流氓捣乱，肃清一切反动派。

上海总工会 四月十三日”

## 反动派对宝山路屠杀的掩饰与市民群众的公愤

白崇禧、周凤歧遵照蒋介石的密令在宝山路施行空前恐怖的屠杀后，竭力造谣说谎，企图混淆是非，以掩饰其血腥罪行。四月十四日反动派军队将上次俘获之直鲁联军俘虏数十名押解游街，前导大旗，上书“上海总工会通敌证据确实”，“总工会是直鲁联军的机关”，并谓十三日之屠杀，实由工人及直鲁军图攻司令部，兵士乃不得不出于“自卫”之行动。十五日《民国日报》（国民党反动派的机关报）复以大字标题“纠察队缴械中发现可惊消息，总工会竟有通敌证据”，刊出戒严司令部的布告和周凤歧的呈报如下：

**戒严司令部布告** “为布告事：据报本日（十三）下午有二千余人，假要求恢复工人武装为名，冲入二十六军军部。当经守卫部队捕获八十余人，内有四十余人皆系直鲁军余党，并搜出符号，证据确凿，显系反动分子通敌谋乱，破坏国民革命，扰害地方公安。除将捕获之敌党严行讯办外，为此出示布告，仰各界一体知悉。须知良好工友，赞助革命，决不敢勾通敌党，出此谋乱行为，本司令官负有维护地方治安专责，防范綦严，敌匪狡谋决不得逞，其各安居乐业，均勿惊疑，是为至要。切切此布！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司令官白崇禧、付司令官周凤歧。”

**周凤歧（十四日给东路军总指挥部）的呈报文** “十三日下午三时许，有反动分子假借工会名义，先则强迫商店罢市、工人罢工，继则集中游行，乘机分组向职部及第二师司令部政治部等处冲锋而来。每组约有千余人，老幼者居前，持枪负铁棍者在后，岗兵劝不理，复敢开枪乱击，我卫兵为自卫起见，不得已开枪追击，始行溃退。当场捕获凶徒九十余人，检得有直鲁联军散兵六十五名，身藏符号，混杂其间，是上海总工会通敌已有确实证据。除将通敌证据登报披露并另呈报外，合将当时情形，先行呈报钧座察核。”

但此种诬陷，决不能欺骗明眼的群众。当时目击此次大惨杀的上海知识界一些名流，曾以闸北居民的资格联名发表公函，对反动派的血腥屠杀表示了重大的抗议。

“闸北居民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等，因十三日宝山路惨剧，致书上海临时政治分会委员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原文如下：

‘孑民、石曾、稚晖先生：自北伐军攻克江浙，上海市民方自庆幸得从奉鲁土匪军队压迫下解放，昨日闸北，竟演空前之屠杀惨剧。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三一八”案段祺瑞之卫队无此横暴，“五卅”案之英国刽子手无此凶残，而我神圣之革命军人乃竟忍心出之。此次事变，报纸记载，语焉不详，先生等或未能明白真相，弟等寓居闸北，目击其事，敢为先生等述之。四月十三日午后一时半闸北青云路市民大会散会后，群众排队游行经由宝山路，当时群众秩序极佳，且杂有妇女童工。工会纠察队于先一日已被解除武装，足证是日并未携有枪械。群众行至鸿兴路口，正欲前进至虬江路，即被鸿兴路口二十六军司令部门口

守兵拦住去路。正在此时，司令部守兵即开放步枪，嗣又用机关枪向密集宝山路上之群众瞄准扫射，开枪历十五、六分钟，至少当有五、六百发，群众因大队拥挤不及退避，伤毙甚众，宝山路一带百余丈之马路，立时变为血海。群众所持青天白日旗，遍染鲜血，弃置满地。据兵士自述，群众当场死亡约五、六十人，而兵士则无一伤亡者。事后兵士又闯入对面义品里居户，捕得青布短衣之工人，即在路上枪毙。此为昨日午后宝山路所目睹之实况，弟等愿以人格保证，无一字之虚妄。国民革命军为人民之军队，为民族解放自由而奋斗，在吾国革命史上，已有光荣之地位，今乃演此绝灭人道之暴行，实为吾人初料之所不及。革命可以不讲，主义可以不问，若并正义人道而不顾，如此次闸北之屠杀惨剧，则凡一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甚或帝国主义之信徒，皆当为之痛心。先生等以主持正义和平，负一时物望，且身任上海政治委员，负上海治安之最高责任，故敢为先生等道之。弟等以为对于此次闸北四一三惨案，至少应有以下之处置：第一、国民革命军最高当局应即严惩此次暴行中直接负责之官长兵士；第二、当局应保障军队不向徒手民众开枪射击，军队不干涉集会游行。党国大计非弟等所愿过问，惟目观此率兽食人之行为，则万不能苟安缄默；弟等诚不忍见闸北数十万之居民，于遭李宝章、毕庶澄残杀之余，复在青天白日旗下，遭革命军队之屠戮。望先生等有以谅之。涕泣陈词，顺祝革命胜利！’”（十五日《时报》、《时事新报》）

## 四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上海工人忍痛复工，总工会转入秘密斗争

### 总工会会所被霸占，出现了反动的“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

蒋介石在四月初指使其流氓党徒董福开、张伯歧等组织的所谓“上海工界联合总会”，本是专为捣乱上海总工会而设的工具。十二日晨工人纠察队被缴械后，反动派即借口“工人内讧”肇事，指派该“工联总会”的一群流氓为“调查专员”，设法“秉公处理”“办理善后”。这群流氓奉令后即到处奔走捣乱。十四日《申报》载：“十三日上午九时四十分，记者在宝山路二师司令部门口见汽车三辆自北火车站方面飞驶而来，下车后，系总司令部特务处董福开、王次宾……等十余人。当由二师参谋长祝绍周延见于三楼会客室。董君等陈述系奉总指挥部命令洽商解决上海总工会事，并谓总工会在此军事紧急时间，不遵戒严法令，集会游行，并公然登载广告侮辱革命军，其间显系另有作用，应由贵师即行派队制止，勿任游行。祝参谋长谓已奉到总指挥部命令，着即严行制止。并下命令一道，饬驻扎太阳庙路嘉群会馆内第二师五团三营张桂林营长，派队两连驰往湖州会馆驻扎，将工人驱散。董君等遂同时令兵士同乘汽车赴嘉群会馆。”

据同日《申报》载：当十三日下午二时许反动派军队在闸北宝山路将工人群众屠杀驱

散后，张桂林即奉令率队两连，驰赴湖州会馆总工会会所，声称“奉白总指挥命令前来接收会所”，并即驻扎于该处，监视总工会一切行动。至下午三时，“工联总会”的大批流氓来到湖州会馆，将会所内职员或驱逐或殴打，所有总工会一切文件印信用具悉被霸占。这时反动派军队在闸北各马路巷口，密布步哨，见有工人即开枪射击，以致赴总工会之群众皆四散奔逃，不得入内。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亦于四时左右重被军队占领。

“工联总会”的一群流氓，在军队庇护下占领总工会会所后，即发出所谓“就职通告”，宣布“取消”上海总工会。其通告云：

“本月十二日，奉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陈主任令开：今晨上海总工会各工友自起冲突，殊属不幸，现奉白总指挥面谕，双方均不得以武力相见，静候调处。兹特派董福开、袁逸波（按即袁正道，过去陆宗舆的走狗）、费公侠、唐尧卿、程致、蔡公时、李子峰、刘公畏、王次宾、汪啸涯、张伯歧、江革（按即江政卿，孙传芳时代的上海警察厅长）、尹鹏、彭伯威诸同志为专员，迅速组织委员会，以董同志为主席，调查此次起衅原因，并设法秉公处理，务使风潮早息，各工友均得安居乐业幸福为宗旨，如何情形，仍速具报核办，此令，等因，奉此，遵于本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在湖州会馆前上海总工会宣誓就职，当经开会表决，将旧上海总工会及工界联合总会一律取消，统改为上海工联总会，着手改组内部，以期相安，取一致行动，除一面呈请政治部立案外，特此通告。”（载十四日各报）

该会又在各报刊登荒谬的启事如下：

“径启者，上海总工会系少数共产党徒所操纵，纯以压迫恐吓欺骗之手段劫制工友，而使工友供其牺牲。现在工友之因罢工失业者日益增多，至于卖妻鬻子以求一饱，该总工会不惟不为工友设法救济，反更加压迫，以陷工友于死亡，造成彼辈捣乱国家社会之机会。近月以来，此种事实尤为昭著，稍有人心者莫不愤恨。本总会由上海一般觉悟工友联合组织而成，其用意全在实行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一以谋工人本身最正当最确实之利益，一以谋中国建设使获得国际上之平等自由。本总会成立以来，工友及工界团体加入者甚众，对于现在尚被压迫于共产党之工会工友，无不力求拔而出之。现在该总工会之纠察队业经一律缴械，已不能再施压迫于我工友，是我工友可以完全自由，希即推派代表前来本总会接洽，静候解决。倘不逞之徒，仍复暗中威吓阻挠，着立拘交该地军警长官，或拘交本总会追交主使，从严惩办。此布。上海工界联合总会启”

随后，反动派为了缓和工人群众的激烈反对，又将该臭名昭著的“工联总会”改名为“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为此发出通告如下：

“上海工联总会专员委员会系四月十二日上午十时由本部发出命令组织，现于同日午后七时改用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名称，委员仍旧以上海工联总会专员委员会全体专员改充。关于上海各工会均由该会指挥，重新登记，驱逐反对中国国民党分子。一俟各工会整理完善，再由该会召集上海所有各工会派出代表，合组一上海工友总机关，在中国国民党指导之下发展工人运动。”（四月十五日各报）

该“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也于同日在各报刊登如下启事：

“本会奉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命令，改组上海总工会及上海工界联合总会，业于四月十三日改组就绪。自即日起，所有上海总工会及上海工界联合总会等名义一概取消，本委员会为上海各工会最高级机关，负改造指导各工会之完全责任，除呈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外，特此声明。”

该会于同时又在各报刊登“紧急启事”，威吓工人群众，并招认霸占了湖州会馆上海总工会会所。原文如下：

“本会奉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令组织成立，办理此次上海工友纠纷事宜，业由政治部布告在案。此后凡关于上海工会之组织，统由本会完全指导处理，务使工友组织得以统一，工友生活得以安全，与农工学兵各界民众共同服从中国国民党，努力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之工作。如再有敌人间谍流氓匪类或违反三民主义破坏国民党之分子，愚弄工友，妨害国民党之工人运动，及扰乱地方治安各情，即以反革命论罪，决不宽贷。尚望我上海全市工友一致团结在中国国民党指导之下，谋工友本身永久之福利，是为至要。本委员会办公处暂设湖州会馆，凡有关于工会事件，希径向本会接洽可也。”

帝国主义者对于上海总工会的被“取消”，大为称快。“工部局警务处”四月十四日情报称：“由于上海总工会已遭解散，上海工界联合总会已奉白崇禧命代替上海总工会。为此，他们将从闸北浙江北路华兴坊原址迁往湖州会馆。前宁波警备司令张伯歧和前闸北保卫团副团长尹村夫（按即尹鹏）等受命担任改组工作。”十五日情报更称：“由于中国当局（按指蒋介石反动派）在本市对共产党人采取严厉手段之结果，本市在直鲁军失败后所涌现出来的各工会组织近已烟消云散。湖州会馆外面所挂之上海总工会招牌亦经移去，屋内则现驻兵一二六人。”

## 许多机关和群众团体均被封闭解散

自工人纠察队被缴械，总工会会所被流氓占领后，上海市一切革命的机关、团体，均陆续被反动派封闭与解散，稍有进步气息的团体概遭取缔。兹分述如下：

△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十四日中午白崇禧指挥部大队长王瑞华率领武装卫队两排，分乘汽车六辆驰抵上海县公署（市政府办公处），声言：‘白总指挥以市政府组织人员中，混有共产分子，本日特奉白总指挥之命令，将市政府封闭，停止其工作，并逮捕职员，以待研讯。’随即直入市政府上下办公室搜查一过，当将市政府在场开会之执行委员十余人连同办事员茶役等二十余人，押乘汽车一并解往龙华司令部。市政府秘书长林钧，当时适值公出，虽经各室搜寻，终未被捕。”（十五日《时报》）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十四日下午一时，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东路军总指挥部秘书主任潘宜之及吴倚沧等三人，乘坐汽车数辆，随带武装卫士四十余人，到林荫路市党部接收。到后即派军队把守大门，一面指挥卫士守卫二楼三楼各处要道，一面令党部各办事职员及训练班听讲员一律齐集三楼大会场开会。陈群宣布：‘今日奉令来此接收市党部，因从前市党部被共产党及跨党分子把持，吾人今作清党运动，对于共产分子当然势不两立！今后我与潘君宜之、吴君倚沧、罗君家伦四人当积极负市党部一切事务之

责。'当日市党部各执行委员仅汤济沧一人在场。"（十五日《时报》）

△上海学生联合会四一二事变后，学联曾积极支援工人的斗争，决议罢课三天，十四日下午二时并组织各大学学生至闸北一带向市民讲演，指责反动派屠杀工人的罪行。故反动派把学联看作眼中钉，先是指使一些狐群狗党组织所谓"上海学生革命同志会"四处煽动，诬蔑学联负责人；继即成立所谓"上海学生运动指导委员会"，以指导之名强迫改组学联。"东路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为此发出通告如下："兹由本政治部派员组织上海学生运动指导委员会，此后凡关于上海各学生团体一切工作，应受该委员会指导。"（十八日各报）

△上海市各界妇女联合会亦于十四日被反动派接收改组。

△平民日报社《平民日报》系上海总工会的机关报，于二月下旬上海工人举行二次武装起义后出版（确实日期不详），报道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的各项消息，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反动派压迫残杀人民的暴行，宣传革命的道理。帝国主义者曾借口"《平民日报》言词激烈，扰乱租界治安"，由工部局通令所属各捕房查禁该报在租界出售，四月六日虹口捕房并曾拘捕报贩程新甫等三人，将彼等贩卖之《平民日报》一概没收（载四月八日《申报》），可见帝国主义者对革命报纸之仇视。四一二事变起，蒋介石反动派当然也要拔掉这个眼中钉。据十五日各报载："本埠闸北顺成里二号平民日报社，当前日军队与工人激战之际，当局即有封闭之意。昨日（十四）下午一时许，由二十六军二师兵士十数人，武装将该社封闭，并捕去张某一人(按指在该报工作之张静茂)，已解龙华司令部。"又"工部局警务处"十五日情报亦称："昨日下午一时许周凤歧司令部派探子十余人前往闸北中华新路将平民日报社封闭，抄获大量文件并逮捕一人。该报在过去二月中，曾为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并散播共产主义宣传。"

《平民日报》曾公开出版近两月，可惜至今我们尚未收集到一份。现将该报当时在各报刊登的广告录后：

"《平民日报》启事（一）

本报现已出版至四十四期，为沪上唯一的革命报纸，并且在过去上海革命运动中已尽了相当的功劳。现在上海革命虽已取得初步胜利，然革命的危机尚四伏着，所以本报的责任还很重大的。本报前已扩充篇幅一倍，现更扩大为一张半，以符读者殷殷之望，消息加多，内容丰富，言论皆为现时革命运动中之重要问题，'盒子炮'一栏尤有精采，关心时局及热心革命者都不可不读此报。

社址：上海闸北中华新路顺成里二号。

零售：每份售铜元二枚。邮寄订阅：每月大洋三角半，三月一元。各机关各团体另有优待办法。凡关于革命运动的各项消息惠然投稿本报者极所迎欢。"（四月十二日《时事新报》）

"《平民日报》启事（二）

本报连日奉到外埠来稿甚多，只因篇幅有限，未能一一刊登，特有负于热心本报者赞助之热忱。现已将篇幅扩充为一张半，特规定下列几点内容，以作投稿之标准，庶使本报与热心者不致有格格不相入之弊：（一）北伐军事之进展；（二）国民政府治下之各地政绩；（三）军阀治下之压迫与剥削；（四）帝国主义之残暴与勾引反动

派之事实；（五）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破坏民众团结及革命势力之活动；（六）一般的民众运动情形；（七）工农运动的情形。深望热心革命宣传者，尽量照此内容供给稿件。如定期投稿须有酬劳者，希望先将酬劳说明，投稿三次，以便本报斟酌能力决定接收与否，希原谅是幸。”（同前）

△中国济难会　该会会所于十二日即被反动派军队占领。

△新海军社　据十四日《时报》载：本埠一部分进步海军人员，曾在高昌庙设立新海军社。昨日（十三）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忽接到白崇禧公函云：“该社宗旨不明，请即取缔。”杨当于上午十一时派付官率陆战队数十人将该社查封，并捕去该社社员冯骧、陈统铨等九人，闻前曾代表海军加入市民代表会议之陈嘉谟亦在被捕之列。

## 反动派查封一切工会组织，疯狂搜捕屠杀工人领袖

上海警察厅于十四日发布以下之命令：“上海总工会举动不轨，曾奉令缴械，一面查办在案；兹恐境内仍有假工会名义，集众开会等情，特令侦缉长周瑞传集各侦探面谕，分头调查有无工人集会不轨举动，着即查禁。”于是各工会组织概被查抄封闭，工人集会与罢工概被以“反革命”论罪，共产党人及群众领袖陆续被逮捕屠杀者难以数计。从此，上海工人和革命者的一切自由尽被剥夺，完全在刀枪威胁之下过生活。兹根据各报记载和其他材料将当时白色恐怖情况分述于后：

南市方面，反动派调派军队多起，由警厅侦探引导，于十四日午后三时起分赴各处职工会搜查，陆家浜铜锡公所总工会分会、沪城凝河路南货工会、药局弄药业工会、小西门茶食工会及侯家浜酱园业工会等均被查抄，所贴职工会一切纸条均被撕毁。二十六军政治部并于同时派出“宣讲员”多人，在军队庇护下分段演讲，传知各店铺如有人煽动罢工，准扭解军警当局从严惩办。十五日军队继续搜查，将一切工会尽行封闭（《时报》）。

闸北方面，十四日午后一时起即宣布戒严，自宝兴路至宝通路一带商店住户，均被搜查，行人一概不能通过，稍有驻足观望即遭申斥。中兴路宝源路口有被枪杀之尸首六具，尚未收殓（同上）。

浦东方面，十四日上午“工界联合总会”之流氓数百人，在军队保护下，分头拥往花园石桥英美烟厂工会、永吉里日华纱厂工会、陆家宅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会等处，声势汹汹，将各工会内用物尽行捣毁，并殴伤工会职员十余人。当流氓工贼捣毁工会殴打工会职员之际，军队即借口“工人滋事”开枪弹压，流弹击毙十五岁少年王富贵一名，并当场捕去工人群众领袖张义生、马四清等十二人（十五日《时报》）。上述张、马两人于十九日被杀害，浦东特务营执行枪决时，并恶意污蔑他们“聚众捣毁各工会”（二十日《申报》）。

吴淞方面，各工会亦均被查封。十六日晚八时二十六军兵士二十名，至西镇三益路第十八号中国铁工厂工会办事处查抄，将前后门围住，并阻止街上行人，顿时交通断绝，兵士即入内在楼上下各间搜查，当拘去在会工人八人，用封条将十门封闭（十八日《申报》）。

为经济要求正在罢工中的丝厂、药业、茶食等业工人，概被军警威迫上工，工会亦遭封闭。据《时报》载，十四日下午四时许，南市药王庙上海药业饮片职工会有一、二百职工正在开会之际，突来二十六军武装士兵二、三十人及“工联总会”的流氓数十人，将会

内职工完全驱散，并将各项文件等物抄去，同时贴出布告勒令职工即日上工。工会被迫迁至公共租界新世界后面老会所继续办公。反动派即通知租界捕房，于十五日中午前往查封，会员十七人被拘捕，在新闸捕房扣押三小时，会所则被封闭。职工于当日被迫无条件复工。又茶食糖果业职工于十四日下午罢工，要求加薪，十五日下午一时，职工百余人在大南门外茶食公所内开会，警厅立派武装兵士四十余人前往解散，并封闭茶食职工会，职工被迫复工。丝厂工人也遭到同样压迫，闸北天通庵、胡家木桥、新闸路、租界等处八十三家丝厂工人，于十五日被迫恢复工作。

稍后，自四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美商花旗烟公司男女工人一千二百人为反对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及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英商怡和纱厂六千工人（自十九日至二十六日）及中华第一针织厂七百五十工人（自四月十九至五月三日）也因同样要求而罢工，结果均被迫无条件复工。四月二十七日，杨树浦路英商祥泰木行职工因反对解除纠察队武装及资方无理解雇工人而罢工，更受到反动派血腥的镇压。“工部局警务处”四月二十八日情报供认：“祥泰木行全体职工九百人怠工，其中四百八十人原系关厂停工而无工可作者，其余则由于煽动分子活动所促使者。二十七日下午二时半，职工七百人拟在江湾附近萧王庙开大会，但为便衣士兵一百人所阻挠。士兵当场开火，工人被打死三人，伤多人。罢工工人一百五十人左右则被捕送闸北军事司令部。今晨六时已释放。”全体职工愤怒抗议，坚持罢工，至五月三日始被迫复工。

各产业及厂工会亦均被查抄封闭。十五日下午二时许，军队前往闸北恒通路梅园里查抄沪宁铁路总工会，缴出枪械数枝，捕去十九人，即将该会查封（十七日《时报》）。十六日上午十时，总指挥部政治部派兵至民国路海员工会查抄，搜得由汉寄沪大宗传单十篓，每篓约十余万张，并手枪一枝，步枪十枝，子弹二百余颗，当场逮捕十四人，解往司令部（十七日《申报》）。设在炮台营对面庆华里的江南造船所工会，十五日被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派陆战队士兵前往解散，并捕去工会委员潘耀庭及十余工人（十六日《时报》）。光明电气工会于十五日上午被军队搜查，捕去一人（同上）。十六日中午沪西斜土路鲁班路口地毯工会五十余工人开会，被军队驱散，会所被封。同日南市小东门内金银业职工会和侯家浜吴家弄押当公所内的典押业职工会被查封，各捕去二人（同上）。又二十六军补充队队长彭光武率领武装兵士，会同高昌庙二区派出所巡官马文达等，于十五日傍晚，前往车站路新普育堂对面慈善里总工会工人寄宿所搜查，工人事前闻风均已避走，兵士在屋内搜出步枪三十二枝，该寄宿所即由警署发封看管（十七日《申报》）。另据“工部局警务处”十九日情报称：“国民军士兵于十八日下午四时，曾在闸北大东书局搜捕，十七人被逮。士兵曾开枪数响，但无伤亡。”

蒋介石反动派并不以查封工会、压迫罢工为满足，并继之以疯狂的逮捕和秘密屠杀。据“工部局警务处”情报供认：“杨虎司令部十九日晚在龙华秘密枪杀囚犯六人，其中包括海员领袖。总计本市煽动分子及共产党人被处决的已有一百余人，尚有二百余人仍拘押在衙门中，相同数字之人则拘押于白崇禧司令部内。”（四月二十日情报）“二十一日晚龙华秘密枪杀共产党领袖六人，当局拒绝宣布姓名。”（四月二十二日）“四月二十四日在闸北为工部局捕房及闸北警局逮捕之王志英(Wong Ts-ying)，三十日在临时法院受审后即移交于中国当局，当日下午一时即执行死刑，中国当局控告此人为共产党人及上海

总工会沪东区领袖。”（五月一日）“四月二十五夜在龙华有十二人被枪决。二十四日在法租界一面店内被捕之著名共产党人陈博云，又名‘小胡北’也在内。此人系在浦东工人中活动的恐怖分子首领，在其浦东住所曾搜出毛瑟手枪二百枝。”（四月二十六、二十七日）“著名共产党人李民堂（LiMing -t'ang）五月三日晚在龙华枪决。在昨晚枪决之囚犯中，共产党人工人煽动分子何达东也在其中，何系在兆丰路上被巡捕捕获后，解交中国当局者。”（五月五日）“五月九日下午四时在龙华枪决煽动本市救火会罢工之共产党人两名。自从杨虎担任警备司令以来（按杨虎本为蒋介石‘总司令部’特务处长，于四月二十五日由蒋委为上海警备司令），共已下令枪决共产党人五十名。”（五月十日）

杨虎与陈群并于四月二十五日在各报发布命令，悬赏缉捕共产党人及工人运动领袖，其文云：“查得现有反动共产分子林钧、王守谦、余泽鸿、吴广吾、李泊之、顾顺章、朱义权、龙大道等二十人，在沪捣乱后方，宣传共产主义，应即一体查拿。如查获首要者，每名赏给洋一千元，附从者每名赏洋五百元。仰该军警等分别按名严密查缉，务获解惩，以清乱源。”

总之“四一二”以后，上海变成了“狼虎成群”的恐怖世界，到处流着革命人民的鲜血。无数优秀的共产党员及工人领袖，如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张佐臣、杨培生、郭伯和等人，均在这一时期中先后牺牲了。

## 上海工人忍痛复工

四月十五日《时报》载：湖州会馆上海总工会会所被占领后，“总工会于十四日下午仍在某处召集全体执行委员紧急会。会议事项，颇守秘密，微闻对复工问题，经议决命令罢工各业工友，自十五日起于开追悼会后，一律复工，听候各产业总工会及各区域工会联合会指挥。该会暂时命令，概由各产总、各工联传达。此外，如委员长问题、补选常务委员问题、组织系统问题、机关建设问题及失业救济问题等，亦曾有所决议，惟未能探悉”。

兹觅得上海总工会颁布之复工令原文如下：

“全上海的工友们：此次各业各厂工友，因纠察队被追缴械事件，义勇奋发，一致罢工援助，忠勇奋斗，已有三日。现在本会纠察武装虽失，但广大群众之伟力尚在。兹经本会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决，着即命令已罢工各业各厂工友，自十五日起，于开追悼会后，一律忍痛复工，听候各产业总工会及各区域工联会指挥。本会暂时命令，概由各产总、各工联转达。此后本会仍本初衷，领导全上海工友作政治与经济的奋斗。各工友仍当继续团结，勿为反动权势所惑，勿因暂时挫折而气馁。死难烈士之精神不死，全上海工友团结在本会旗帜之下，继续死难烈士之精神以奋斗，是所切盼。此令。”

根据《时报》的消息，上述复工令的颁发大约是在十四日晚或十五日。当时上海工人已处于蒋介石反动派四面刀枪威胁之下，集会枪毙，罢工枪毙，稍一动作即被摧残；同时各革命机关、团体亦均被反动派解散或封闭，工人已陷于孤立，如再继续坚持总同盟罢工，徒然增加无益的牺牲，故总工会颁布此复工命令，实为必要之举。

总工会发布复工令后，十六日《时报》即刊出“罢工者多已上工”的消息，内称吴淞工人已于十五日全体复工，浦东各厂除英美烟厂“整理内部”外，亦已全体复工，惟闸北方面由于反动派的阻挠未曾复工。该消息称：“闸北各业工人，自接到各工会前日（十四）复工命令后，俱拟遵令复工，但以闸北戒严之故，工人往来甚觉困难，致昨日各丝厂、玻璃厂及各小工厂俱未复工。商务印书馆前以交通完全断绝，由厂方于门前贴一纸条，声明十五、十六两日整理内部，工人方面又逃避四散，一时亦未能复工。”

另据“工部局警务处”十六日情报称：“沪东及沪西区目前罢工人数为六三、五〇〇人，较十五日少三五、〇〇〇人。”十八日情报则称：“罢工人数已减至二二、〇〇〇人。”十九日称：“今日罢工人数四、五四九人，由于关厂停工而无工可做之工人则有一三、一三三人。”二十二日称：“今日已无人罢工，但由于关厂停工而无工可做者仍有九、八四五人。”这些数字虽不十分可靠，但也足以说明工人逐渐忍痛复工的情况；同时并说明了资本家乘机以关厂停工的手段来威胁工人，以达到其进一步压迫与榨取工人的目的。

上海工人运动虽受到极严重的摧残，总同盟罢工虽然不得不停止，但上海工人并没有屈服！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中，上海总工会仍然进行秘密的活动，设法恢复或建立工会的组织和工作，领导工人群众坚持和反动派进行斗争。当时报纸及租界工部局的内部材料曾反映一些零星的、侧面的消息如下：

> “二十日本埠南北市有总工会分子秘密散发传单，其传单形式甚小，均系破坏某领袖（按指蒋介石）等词。事为军警机关闻悉，立派侦探四出捕捉，闻已拘获数人押究严办。”（《申报》四月二十一日）
>
> “老上海总工会仍在秘密出版《新世界》，进行煽动性的宣传。该报主要是反对蒋介石及国民党保守派党员。该报于四月二十五日在劳勃生路九十八号日华纱厂发给工人若干份，同日在南京路新新公司则大量分发。”（“工部局警务处日报”四月二十七日）
>
> “二十八日杨树浦路四十六号怡和纱厂有人散发煽动性传单，……发传单人中有一人被捕。”（同上，四月二十九日）
>
>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时半，北浙江路电车上有人散发煽动性传单，系由老上海总工会发出者。传单斥责蒋介石系滥杀工人的新军阀，并号召工人在五月三十日进行罢工。”（同上，五月三十日）
>
> “共产党人在上海仍活跃。六月十二日下午二时在法租界有人散发小册子，对蒋介石进行激烈的攻击。小册子中许多漫画之一描画蒋介石似一臭虫，应立即置之死地。”（同上，六月十三日）

## 上海总工会致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暨国民政府呈文

上海总工会忍痛发布复工令后，复于十五日将四一二事变经过及蒋介石反动派的种种罪行，呈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并特派代表王恩鲁前往武汉当面作详细报告，要求严办反动派。原文如下：

“敬呈者：呜呼，我上海工人流无量数的血，牺牲无量数生命，与北洋军阀艰苦奋斗所欢迎来的革命军蒋总司令，不料既是屠杀我上海工人的刽子手，其居心阴毒，手段之残酷，竟较北洋军阀犹过十倍，是诚我上海工人痛定思痛所意料不到者也！四月十二日搜缴纠察队枪械之惨变；四月十三日包围请愿群众之屠杀；四月十四日以后，军队流氓，仍在到处捕人杀人。帝国主义从而给若辈以种种的便利。上海现时已完全陷入较张宗昌、孙传芳统治时更恐怖的局面当中。工人被杀者三百余人，被捕者五百余人，逃亡失踪者五千余人，失业者更不可数计。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惨遭杀害，上海总工会会所完全为蒋介石任命之流氓占领，各区工会联合会，不出于捣乱、封闭、占领三途。工人拥护总工会之行动与经济要求，不问其正当与否，概照戒严法认为扰乱后方，认为‘反革命’，以军法从事，压迫上工，甚至工人集会之权亦被剥夺。帝国主义者尽量助成蒋之反动政策，容许蒋之军队及所组织之流氓自由携带武装，到租界各处搜捕工人及革命分子。外国厂家大批开除历次参加革命运动的活动工人分子。上海的新闻舆论完全被蒋的权势封锁了，一切有革命历史的革命机关和民众组织，如上海特别市党部、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市政府等，皆随着工人纠察队缴械之后，由军事当局自由封闭或派人改组了；一切革命分子不问其平日言论工作如何，概指为共产党，凡共产党皆以为在可杀之列。一切反革命分子如李宝章、周凤岐（孙军部下）、黄金荣（流氓首）、北洋长警等，皆成总司令所认为国民党之忠实同志而畀以重任。对于帝国主义则日颁保护外人之明令；对于工人经济要求，则日以‘罢工即反革命’相诏语。自此次惨变发生后，我全上海八十万工友即宣布总同盟罢工，以为援助，但残酷阴狠的蒋介石，早有准备，一面依据戒严法，认罢工即是捣乱后方，私通敌人，命令白崇禧、周凤岐任意屠杀；一面又有蒋与帝国主义合同组织之流氓团体为蒋鹰犬，到处搜捕工人领袖，同时示意中外厂家尽量开除工人革命分子，同情工人之团体概受军事机关摧残。新闻舆论，亦为蒋所封锁，拍寄各处之邮电，亦不能发出。本会痛念我上海工友在此一切反动势力围攻之下，孤军奋斗，一时又不能将新军阀打倒，徒然增多牺牲，因劝告各工友于十五日追悼委员长大会后暂时忍痛复工，以听候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之处置。蒋介石现时已完全变为较奉鲁军阀更反动的反革命者，彼口虽日言革命，而所行完全是反革命。约举其在上海最大罪状约有十端：

（一）勾结帝国主义压迫罢工，出卖上海工人阶级。

（二）勾结帝国主义雇用流氓，骗缴工人纠察队武装，惨杀响应革命军有功的工人。

（三）屠杀徒手请愿的群众数百人。

（四）暗杀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

（五）收买流氓捣毁各工会并占据上海总工会。

（六）封锁舆论邮电，禁止民意表现。

（七）军事机关擅自封闭孙中山先生所号召国民政府所批准之上海市民政府。

（八）军事机关擅自改组上海特别市党部。

（九）尽量容纳一切反革命分子，如屠杀上海工人的李宝章，武汉被驱逐的反动

派，孙传芳过去所用的走狗、侦探等，畀以重任。

（十）勾结帝国主义利用流氓四处搜捕一切革命分子。

蒋之反动不独对于上海如是，即在杭州、宁波、南京、无锡、苏州等处，同样发现军队邦同流氓反动派捣毁并占据工会、农会、省市党部及惨杀革命领袖屠戮徒手游行群众之事。呜呼！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只是蒋借以欺骗民众之招牌；中山先生之联俄、联共、拥护工农利益三大革命政策，早为蒋之实际行动破坏无余；国民党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在民众中之信仰，亦因蒋之反动而使民众怀疑愤怒。想我中央党部在群众中之声望，伏祈迅将蒋介石免职查办，明正典刑，以平民众之愤怒，恢复党部与政府之革命声誉；一切附和蒋逆之反动分子亦祈彻底肃清，勿稍宽纵。本会工友一息尚存，当竭力拥护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以和此叛党叛国之奸贼斗争。兹特派代表王恩鲁前来呈报此次惨变经过，恳求中央党部及政府，对此上海八十万忠实革命被压迫的工友和东南数省陷于水深火热的民众，迅速予以援助。不胜迫切待命之至。为此谨呈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国民政府

上海总工会谨呈四月十五日”

（原载《党史资料》1953年7期）

# 〔附〕 弹 劾 共 产 党

（一九二七年四月）

吴 稚 晖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公鉴：窃总理于前年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分子，当时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李大钊，亦曾声明，此等党员止以各个人之资格，服从国民党主义，并非国民党与整个共产党合作。今者，共产党有谋逆之整备，遂喧腾其联共口号，诬罔总理，挟制舆论，以图大逞，按总理容纳共产分子，有两层用意，一、总理于学说旧主自由研究，共产党若无背叛中国与国民党行为，仅研究学说者，可与研究任何并无背叛行为之学说，一同听其研究，二、因总理知共产必不适宜于中国，尤其是阶级争斗之共产主义，故自创三民主义，以适合中国。且允许共产党分子之有觉悟者，服从国民党主义，使之隐销其逆谋。不料自共产党分子加入国民党以后，共产党积渐谋逆，迨总理逝世，尤逐步日肆阴谋，本党乃忍痛迭予以最大之庇护，且瘏口以致其多方之忠告，终望得遂总理销其逆谋之愿；不

料终究适予以得步进步之披猖，遂使帝国主义之国家及国内军阀谋倾本党者，借亦化为口实，淆乱世界之众听。北伐军兴以来之所到之地，皆有"党军可爱，党人可杀。"之怨声。去年国庆后，本委员接得汉口寄来中国共产党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双十节敬告同志宣言，请本委员以监察员资格，有所注意，或加以弹劾，以止叛乱。本委员因诸如此类之叛逆印物，近年以来，时有发见，非密加访察，得其真相，不欲轻为口舌之争。盖彼辈凶狡无赖，若不到彻底解决之时期，彼辈必腾为"老朽昏庸"，"思想落后"，"反动分子"，"反革命派"等之标语，极其惝恍迷离，吠影吠声，函电纷纭，詈骂交哄，使成兽斗泥中之形，以丐其虎据要津之助。（如俄人鲍罗廷之类）一击不中，更张其焰。近半年中，本委员以中央所派江苏特务委员会委员，随钮委员永建之后，同在上海注意时局，乃为若辈包围，离奇逆迹，随在呈露，钮委员焦头烂额，痛苦逾常，穷于应付，迫而谢病，本委员于本年三月六日晚间八时，偕同钮委员及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杨委员铨，晤见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中国共产党上海首领罗亦农，于上海环龙路二十六号钮委员办公处，谈话甚多，其要点：本委员告陈首领，"研究共产学说，自为共产党之责，若实行共产，五六年前苏俄代表越飞，在广州语吾孙总理，当在二百年之后，以我理想，二百年尚嫌不足"，陈首领笑我太迂，我言"急切轻挂招牌，止是赝鼎"。陈说"你更疯颠，请问中国现在的共和，不是伪的么？但你以为康有为之复辟，与伪共和孰优"？本委员遂知中国共产党欲实行伪共产，意在言外，因突然根问，问陈首领"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彼不迟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骇极之情状，随即将陈首领所定二十年中国可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一语，请杨委员于隔座特别注意！时罗首领似怪陈首领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员即乱以闲话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剩十九年了！前时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融商量才好！"因共强笑而罢，本委员自亲在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口中，得到二十年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一语，乃核以去年双十节湖北共产党敬告同志宣言，其扼要之言曰：

"双十节本当庆贺，而无庆贺之价值。……因为内部奸贼仍未彻底铲除，那里赶得上苏俄革命纪念日，值得我们真诚的庆贺啊？"

"同志们！无产阶级人们，……我们最近决议案，是有办法的，有步骤的，只须放大胆量，秘密进行，图我们的新生命，自有铲奸贼，真正成功之一日，那真值得热烈的庆贺。"

"我们的步骤，就是：

一　第一步，我们老实不客气说的，我们现在势力未充，应该利用别人想做新军阀的心理机会，貌合神离的邦助他，以打倒原来一般的旧军阀。"

本委员案：如此蒋中正冯玉祥唐生智暨各军界同志，都是共产党猫脚爪，被他们拿住了，向火里去取煨栗子。不过他们把打倒旧军阀，便算是想做新军阀，乃非常可怪的奇议论。因此，从前共产党反对北伐，又增了一个用意的旁证，所以近来借抑新军阀的外面，在汉口挟着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他们捣乱北伐的内面，都是他们预定的计划。

二　第二步，我们根据最近决议的精神，以党团监督政治，以政治监督军事方案，切实督责想做新军阀的人，倘若还要难为我们，那就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痛痛快快来解决

他，以求最后的彻底吧。

本委员案：乱麻指国民党，快刀必是指无产级级人们的血肉，这种无产阶级人们，又是他们的猫爪，请大家注意，开首唤起语中所谓同志们，无产阶级人们，同志与非同志，多末分得清楚啊。他们必定还有秘密文件，也得云："老实不客气的说，我们现在势力未充，应该利用别人想做无产阶级的心理机关，貌合神离的邦助他，以打倒想做新军阀的国民党；他们借乙打甲，借丙打乙，借丁打丙，抽茧剥蕉方法，已施于国民党者，可以完全证实，他们不认无产阶级人们为同志，足见工呀，农呀，都是他们的猫脚的爪，最后打尽了中国大部分人，止剩他们的同志，就实现清一色的共产世界。所以现在拥汪倒蒋，过些时又必拥鲍倒汪，再过些时，又必拥列宁倒孙文，骂孙文思想不彻底，送他照相到历史博物馆。规规矩矩是二十年；痛痛快快起来，二年二个月，止要有机会。但他们种种丧失信用的利用别人，他们终有给人觉悟的机会。苏俄的阴谋，施诸土耳其而不效，还要拿同样失败的方法，再来中国试验。难道为张邦昌吴三桂是中国的特产品，中国远东病夫，尚够不上土耳其近东病夫么？总理在民族主义第一讲，赞美苏俄抑强扶弱，邦土耳其革命，但是土耳其反了苏俄，为什么呢？总理不说，暗示我们留意罢了！"

"现在我们的口号，是纠正辛亥革命之不彻底，制造新国庆纪念节，打倒新旧一切军阀及资本家，铲除内部的奸贼，劳动罢工绝对自由，马克思主义万岁，阶级斗争万岁，无产阶级人们万岁。"

本委员案，无产阶级人们受他这几句万岁，正同普通开会我们国民党也还正在那里受他"国民党万岁"的荣宠，这都是被他利用时节的奖品！

据上面共产党敬告同志之步骤？参合共产党首领二十年之定期，二十年内中国国民党灭亡，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或止是挂出招牌，似已为难逃之巨祸。加以彼辈敬告同志，明言双十节无价值，值得他们热烈庆贺的，乃系苏俄革命纪念日。又最近湖南省党部已有拥护鲍罗廷之口号，査有欧人李德尔致陈同志友人书，曾言鲍罗廷从前化名犯罪，屡更其国籍，鲍罗廷之名，本非彼之真名，彼在苏俄共产党内，为煽动委员会之委员，故挑拨离间之手段，恶劣万状。对人情厚貌深，乃是中俄共产党普遍训练而成之同一面孔。他们闲谈交际，是温温和和，说起关系话来，是结结硬硬，做出来，是恶恶辣辣。说诳言，是载在他们圣经第一章（此想当然，他们有无圣经则吾不知），鲍在广州时，有广东皇帝之号，我们鄙夷他，以为不配。今观其把持汉口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情形，老成痛心者不敢异同，归化希旨者甘为傀儡，鲍罗廷已支配国民政府下之中国，曾无疑义。则到共产党势力统一，在中国实现共产党之时，中国全归苏俄支配，又无疑义，（共产党用一个指头遮羞，说中俄同在第三国际，不相统属，更是变戏法的说话，其实那种带领引见的情形，蒙古是惯做属国的，我想蒙古容许也说本是属于中国，何妨又属苏俄，中国止是被人一再亡国，却还不曾做过属国，这止好共产党去新试验。我们国民党不愿意，要进第三国际，他们将来自己用国民党去进，不要用列宁式的共产党做贽见去进。）于此而得两结论，乃本委员所不能不举发，而本会所不能不过问者：

一　共产党决定铲除国民党之步骤，有以党团监督政治之言，则明明为已受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预逆谋，此本党不愿亡党，在内部即应当制止者也。

二　现在中国国民政府，已为俄煽动员鲍罗廷个人支配而有余，则将来中国果为共产

党所盗窃，岂能逃苏俄直接之支配，乃在变相帝国主义下为变相之属国，揆之总理遗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大相剌谬，此又应当防止不平等，而早揭破一切卖国之阴谋者也。

（又有人说，俄国已废除不平等条约，然此止平等之一端，如德如奥，皆已废除不平等条约，依照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止能认为最惠国，联合则平等未完全，显生问题，所以德、奥可认为最惠国，尚未联合也。）

因此，本委员认为情事非常重大，现在汉口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共产党及附和共产党之各员，奉俄国共产党煽动员鲍罗廷而盘踞，最近诸多怪谬之改变，乘北伐军坚攻肉搏之时，而肆其咎兵抑将之议，无非有意扰乱后防，盖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本有反对北伐之文，俄国共产党鲍罗廷在广州，亦建缓取江浙之议，即因他们老实不客气，势力未充，不欲国民党羽毛骤丰，使共产党难下摧毁之手段，似此逆谋昭著，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委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未便尚听其行使职权，恣为颠倒，应再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或产生全国代表大会处分。但变故非常，一时不及等待，故本委员会不能不集会摘发，是以本委员特将亡党国卖之逆谋，十万急迫，提呈本会，伏祈予以公决，得咨交中央委员非共产党委员，及未附逆委员临时讨论，可否出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则国民党幸甚，中国幸甚，谨呈。共产党双十节敬告同志宣言一分，合并附呈备查（已存汪主席处）

（原载《吴稚晖言论集》）

# 〔附〕寄李石曾书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

汪精卫

石曾兄鉴：五日谈话会散后，痛苦万分。弟深信弟之意见，决不能得吴先生等之赞同。而吴先生之意见，弟亦决不能赞同。终日谈话讨论，戕贼感情外毫无其他结果，故不如决然舍去也。兄或者怪弟执拗，以为弟何故一人而敢于坚决反对许多师友之意见，弟不能不有所说明如下。

连日讨论弟之意见，可分数点：

第一，民国十三年来改组之国民党，其精神与政策决不可牺牲。

第二，如以党为不必要则已，如以党为必要，则党之纪律不可不守，否则党必为之破碎糜烂。

以上两点是弟之意见根本观念，因此与吴先生等之意见万不能合，请分析如下：

（甲）关于第一点者

（一）联俄是改组之一个重要政策，所谓联俄，其真正的意义，决非如普通之国际关系。乃在认识苏俄革命之意义，而与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然如蔡先生等所说，则根本的不赞成苏俄革命之方式，如兄所说，则以为革命进行分段落，目前只宜“反对北洋军阀”，不必牵涉反对帝国主义，此皆与改组政策相反。

（二）容共是改组之一个重要政策，容共可分析两个意义：

甲，容许共党存于吾党势力所及之地域内。

乙，容纳共党党员同时兼为吾党党员。

然如蔡先生之主张，则对甲且持极端反对态度，对乙则兄等一致主张逐出共党党员于吾党之外。

（乙）关于第二点者

党纲非一成不易之物，如党纲有不适用，决非不可更改，然更改必须依据党的纪律，非可以个人自由行动，亦非可以武力迫成。

改组之政策，是总理所手定，弟以为不可轻言更改。如必欲更改，除全国代表大会外，谁能有此权力。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除中央执行委员会外，谁能有此权力。五日之谈话会，吴蔡诸先生对于第一二次代表大会议决案及历次中央执委之议决案，不知是没有看见，抑看见了也等于没有看见，随心所欲，要说甚么，便说甚么，以党员对于党的决议，如此随便，深可惊駭。

如果说中央监察委员会咨中央执行委员会，叫他执行，没有不可，这更是稀奇。请问中执如不答应，怎么样呢。兄等当知中监之建议，中执不答应，是不能发生效力的，兄等似亦知之，故主张中监提出后，一班军人便附和着干起来。如此，岂非中监率领一班军人将党打得粉碎！所以弟对于第一次看见提议原文时，着急非常，说他们各位如此做法，我宁自杀。第二次看见时，更着急说，请你们各位将我枪毙。而吴先生则谓“狗不如”，“滚蛋”。

（丙）结论

关于第一点之观念，如照兄等主张，则改组精神等于消灭。

关于第二点之观念，如兄等主张，则党归于破碎。

兄试思之，弟如何能赞成，如何能不反对乎。

（丁）弟此行之目的

弟既不能赞成兄等之主张，则弟不能不另立一提案。弟之提案，是开第四次中执全体会议，以解决一切问题，其地以南京为宜。

以上仅为弟个人主张，欲此主张实现，则必须具有以下之条件：

（一）中执答应，

（二）党员赞成及了解。

现时中执在武昌，电报往返，徒费时日。叫弟派人，试问何人可派。所以弟只得自己派自己去。而一班朋友，则谓弟往必受包围。兄试思之，包围之极致，尚有过于连日上海之会谈者乎。生平敬服之师友，聚于一堂，感情道义，至少有十数年之胶结，其力量之伟大，过于万万机关枪炮，感情之痛苦，过于生命之摧毁，然而包围之效，亦已可睹，试问尚有其他势力，能包围弟若是之烈者乎。总而言之，除了枪毙及拘留更无他法，然此仅是

身体之失败，不是精神之失败。

弟等今行矣，兄如能继来与孟余诸人一晤，助成弟等此行之目的，感叔无涯。不则弟等之与兄，仅仅意见之不同，道义感情，一切如故。弟等敢信天壤间，更无一物能摧毁我等之道义感情也。匆匆布达，诸祈鉴照。专此，敬请道安。弟兆铭璧君谨启。四月七日。

弟于此尚有言者，弟此次与兄等意见不同，弟绝不敢谓弟之理想学识高于兄等，故敢悍然不顾兄等之主张。弟意见之根据，一在十三年来党之改组精神及其政策，一在服务于党之责任观念，如是而已。又及。

兄等倘一念及改组以后，一班不肖分子，欲借“反共产”的口号，以反民生主义，以消灭改组以后之中国国民党者，有怦然不安于中者乎。噫。又及。

左派何在，谁是左派，我将寤寐以求之，彷徨以觅之。又及。

（案：此信是汪精卫四月六日由上海去武汉的时候在舟中寄与李石曾的，直到十二月十日才由李平心君在上海发表出来，上海各级皆有登载，见者无不感叹。李平心君并加以案语道：“看了汪精卫这一封信，可知道他四月六日从上海动身，十日到汉口，十四五等日知道上海南京不等候汉口消息便举行清党，他必然反对无疑的。而他所以反对，注重在党纪，不是牢牢的不肯分共。所以他后来在汉口分共，也是无足异的。看了这一封书，同时知道他和李石曾等公义私交不比泛常，他受了吴稚晖‘狗不如’‘滚蛋’等等辱骂，仍然能如此忍受，实在是不容易的。于是乎看了十二月九日吴稚晖等弹劾汪精卫之文书，那一种深文周内的口吻，就不能不令人不寒而栗了。”云云。

附李石曾复汪精卫书（注一）

精卫兄璧君姊大鉴：两奉同样长函及来电，敬悉一切。弟等于十三日来宁，函电由沪转来，已系十九日，迟复之故在此，乞谅之！十六年来关于党事，弟随兄姊之后无异议，今忽有不同之主张，至为伤感！惠书结论，弟与兄姊之意，完全相同，即道义感情，绝不以此稍减。抑又有进者，即于政见，亦无不同，亦可谓殊途同归。（注二）此中详情，当陆续陈述：一部份理论，兄弟所作《现今革命之意义》书中第一章，已刊成小册，回沪后奉上；一部分事实，当陆续函陈或面谈。又吴蔡两先生对于兄姊道义之交，亦完全无缺，亦不过政见偶有不同，尚望吾人有数之朋友，终不为偶然不同及误会所隔阂。就目前局势言之，南京与武汉，已成两团体，弟以为此亦无足有若何之悲观。中国之大，等于全欧，若全欧有一专政政府出现，未必为吾人所愿，在中国，又何独不然。况国民党本以县为单位，与此趋势，并不冲突。普通认为左派者，或谓此意为封建思想。蒲鲁东派，则认此意为Regionalisme与Fedesolisne之思想。（注三）此中争论，蒲马以来，迄未终结，弟固不敢劝人，作何信仰，望兄姊勿过于悲观伤恻，此于公谊私交所同祝者也。至十五日开全体会议之事，未能如兄预定计划行之，诚为憾事，沪方诸人，到宁候会。武汉方面同志不来，开会不成，乃将监察会之书送出。就此点言之，和平之破裂，则在武汉，而不在江宁，不遵兄之提议者，亦武汉而非江宁也。来汉一节，在今日局势之下，不能遵命，想承鉴谅，因兄姊虽不见罪，武汉诸人，则不闻也。弟不日赴沪，望于沪上与月姊晤谈一切，余容续布。敬颂双安！弟煜瀛敬启。二十日早。

（注一）原函于备极伤感之外，其大意有四可略述之；但未得作者同意，不便发表全

（一）不赞同吴先生及监察员之主张，恐国民党为之破碎。

（二）主张在南京开会，和平解决。

（三）谓党纲不可变更，而必用开会之手续。

（四）道义感情，不以意见不同而摧毁。

（注二）吴汪两先生，皆以护党为志职，皆以执行党章为方法。惟精神有两大不同外，汪则极请服从党章之形式，吴则力图攻破害党之阴谋。各以革命之意义，赞同护党而不敢泥守形式者也。

（注三）Regionalisme 与 Fedesolisne 第一字为地方自治之意，第二字作主义之意，此与集权及专政，极端相反。自治与合作，即自由与互助并重之意，此蒲派特重之点。至马派则时时刻刻以专政统一相号召。二者于革命意义中，孰为进化？孰为退化？不难断言也！（石曾注）

（原载《汪精卫集》四卷）

# 〔附〕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阅兵典礼训话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在南京大操场　林春华速记　江涤白整理——

蒋　介　石

各位将士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的纪念日。所以我们把在南京的国民革命军统统集合起来，来同国民政府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共成一个庄严的阅兵典礼，我今天要趁这个机会，把我们这次建都南京的意义，和我们党里最近的清党运动及其影响于中国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同各位来讲一讲。

我们总理，从事革命以来，就定下了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使我们能够照这个主义来奋斗，我们总理除给我们定下了三民主义之外，还有一个政策，是总理革命四十年来念念不忘而终于没有达到的，这是什么呢，就是定都南京的政策，他在将死的时候，他还很诚恳的嘱咐我们把他的遗体葬在南京，所以凡是真正的革命同志，真正的总理信徒，便要努力来实现我们总理建都南京政策，来完成北伐，来完成国民革命，打倒军阀，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这就是我们各位同志，尤其是我们武装同志，所负的最大责任，这个责任是那个交给我们的，是我们的党交给我们的，我们的总理给我们的，今天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在政治会议，已决定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从此我们可以继续我们总理的精神，依照国民政府的指导，来完成我们这个重大的责任。

今天国民政府在南京建都的意义，大略已经说过了，就是要继续我们总理革命的精

神，来完成我们国民革命的责任。现在还有这一回我们党里的事情，也要同各位同志讲一个明白。

各位同志！现在集合在这个场里的同志！可说是我们最纯粹的国民党党员，最忠实的总理信徒，自从总理死了以来，中国共产党，差不多没有一天不是想消灭我们国民党，想破坏国民革命，想捣乱国民革命军，想推倒我们国民政府，要把他的共产党来替代我们国民党，想把他们共产党的劳动政府来替代我们国民政府，老实说：在共产党的心目，早已没有看见我们国民党和我们国民党的党员了，早把我们国民党当作是他们共产党的一个附属品了，看我们的党员，象看待小孩子一样，随他笑骂，随他欺骗，使得我们国民党一天不安稳，自相残杀，他们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里来，好比从前小说里所讲的孙悟空钻到了人的肚子里打筋斗，使得他的五脏起了分化作用，肚子痛得不得了，共产党员加到我们国民党里来，可说也是这么一回事，他极力的把我们国民党内都搅乱撤散了，然后他才可以来替代国民党，现在我们国民党的同志，实在不能容忍了，再不能让共产党的阴谋、盗窃、挑拨等下流行为来消灭我们国民党，来破坏我们国民革命的事业，要是我们再隐耐不发，容忍下去的时候，我们真要自己杀自己，国民党真要给他消灭了，所以我们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就毅然决然的将共产党种种阴谋卖党卖国的证据，统统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全国同志揭发出来，要中央执行委员会赶紧共同一致的起来驱逐共产党，使我们来重新组织一个纯粹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并由政治会议正式的决定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开始办公，使我们将士同志们都能依照这个国民政府的指导，来继续我们总理未竟事业，来完成我们的革命责任。所以今天虽是国民政府成立的一个纪念日，也可以说是我们国民党恢复党权中兴的一个纪念日，且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开始独立自由平等的一个纪念日。现在汉口有一班叛党的党员，勾结共产党，情愿受鲍罗庭的支配，假冒我们国民党的招牌，来骗一般的民众，来破坏国民革命，想把我们国民党的党权政权，统统落在他们的手里，他们愿意受外国人压迫，受外国人支配，愿意卖党卖国，凡是我们真正的国民党员，真正的总理信徒，眼看我们中华民族这样的被共产党糟蹋，这样的被鲍罗庭压迫，是没有一个不疾首痛心的，除非他不是一个中国人，或是一个甘心做亡国奴的蠢才。我们既是一个中国人，既不是一个甘心做亡国奴的蠢才，而且是一个国民党的党员，一个真正总理的信徒，那末我们应当赶快的集合起来，来恢复我们的党权，来拥护我们国民政府，把我们中华民族从共产党的压迫糟蹋之下救转来，使中国还有独立自由平等的一日。

简括的讲一句，今天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的头一个意义，是要实现我们总理平生所计划的的建都南京的政策，这一点，现在我们做到了。第二个意义，我们国民政府，是表示我们不愿受任何异族压迫支配的，我们所不忘的是求民族的独立自由平等，无论共产党怎么样的捣乱，怎么样的压迫，我们还是要格外努力，不达目的不止的，这一点可说是国民政府所负最大使命。我们怎么样晓得共产党要破坏国民革命？我们又怎么样晓得共产党要来消灭国民党，消灭国民革命军？有什么证据呢，各位同志在前方作战，自然不晓得后方共产党捣乱的情形，当我们军队同敌人拼命打仗的时候，他们安安稳稳的坐在武汉，不但不发一个子弹不发一个钱，还要向敌人张宗昌献计，说“你们尽管来打南京。我们武汉的军队决不会去援助东路军同中央军的，待他们消灭之后，我们就可以同你们来妥协”，你们晓得不晓得，这还不够，他们自己通了敌，还要反噬一口说我们同敌人妥协，说我们军队

是反革命军，是匪军，反革命这句话，不晓得从那里说起，到底我们在前方天天同敌人拚命打仗的是反革命呢？还是他们躲在后方不发一个子弹，不发一个钱，还要同敌人通款来破坏我们革命工作的是反革命？他们的所谓反革命，简直的说一句，凡是要实现三民主义者，都是反革命，要是实现共产主义者，都是真革命，原来他们的所谓，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解释，怪不得我们大家都要被骂为反革命了，我们军队从广东转战到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死了三万多将士，要晓得他们现在所盘据着的地方，都是我们将士们的血肉所换来的，他们不但不稍有心感，且用种种阴谋，使我们同志不能站足，党都不能尽量发展，以便他们来包办农工运动，做种种反动的宣传，使一般民众，怀疑我们的党，不信任我们军队，使民众完全脱离我们，消灭我们。各位将士同志们，想想看，共产党这种手段凶不凶？是不是要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我们如再不把共产党驱逐出去，恐怕我们国民革命军所牺牲得来的一点成功，统统要给共产党吞没下去了！那末，我们的牺牲，不是为国民革命，我们的死，也不是为国民革命，而完全是为我们的敌人共产党了，简直的说一句，就是我们做的不是我们国民党救国救民的工作，而是为他们共产党做工作，为共产党做了傀儡，来卖我们本党同志，各位将士同志们！我们拚命打仗是要谋中国独立自由平等，绝对不是为共产党员升官发财的，要是为人家的升官发财来拚命打仗，不但是没有功劳，实在还是一个中华民族的罪人哩！各位同志：请看看武汉的情形，我们真正国民党党员如十一军军长陈铭枢，师长张光鼐，及其他信仰三民主义官长学生和各界的民众，统统被驱逐的驱逐，被綁去的綁去，许多且被枪毙了，总之，一定不使你有一个国民党员站在武汉，致有阻碍他们的捣乱行为，这种情形之下，你说我们还能容忍么？！

我们总理为什么要容纳共产党员来加入国民党，这是什么道理呢？各位同志要明白，我们总理所以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里来，是要拿三民主义来溶化共产主义，使共产主义不至在中国蔓延，不至来扰乱中国国民革命，在这种主张之下，所以总理才允许他们加进来，可是现在怎么样呢，现在不仅是共产党员不肯受国民党纪律的约束，我们国民党反要受共产党的指挥了，否则他就说你是反革命，是右派，是反动派，是昏庸老朽，不仅是三民主义不能溶化共产主义，并且共产主义要来消灭三民主义了！象现在这种情形，就是总理今日还在的时候，也绝不能容忍共产党这样横行跋扈的，现在我们的生命，已经操在共产党的手里，共产党的刀镰子，已经架在我们头上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不用决绝手段把他赶走，还想用什么和平法子来解决，那不啻是我们自杀，要晓得共产党是非打不走的，非我们去消灭他，他就要来消灭我们，非我们去杀他，他就要来杀我们，无论那个都晓得，共产党是不容许第二个党的，除了共产党之外，一切民众，都是他们的奴隶，都要听他们的支配，我们革命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为求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平等才来革命的，绝对不是要这个来压迫那个的，如果有这个压迫那个的时候，我们就要革这个的命。

现在国民政府，已经在南京成立了，我们同志也已从共产党的压迫底下脱离出来了，从此我们能够严密我们的组织，自由行使我们的职权。自满清以来，在南京建都的已有三次，第一次就是太平天国这个政府，表示中华民族不愿受异族支配的一个政府，不幸，不久就被汉奸来消灭了，没有成功。第二次就是民国元年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可说是中国脱离专制进入民主自由的第一个政府，可是不久就被袁世凯盗窃去了。现在我们国民政府在南京建都，是第三次了，中国有一句土话，无论甚么事情，到了第三次一定可以成功的，

这一次如果我们能够依着总理主义，努力做上去，我想是一定可以成功的，各位将士同志们要明白现在我们革命的环境，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南京地位，处在上海汉口之间，上海是各国帝国主义者的根据地，时用强横的手段压迫我们，汉口现在被共产党占据，勾结了赤色帝国主义者来捣乱我们的后方，所以现在我们正处在赤白帝国主义者夹攻之下，而奉鲁军阀又时时向我们进攻，我们四周的环境，既是这样严重，如果我们还不赶紧觉悟起来，向这种恶劣的环境冲出一条血路来求生的时候，那我们的失败，比第一二次还要来得厉害，还要不容易反头，我们已往的努力已往的牺牲，也都要归于空，各位将士同志们！形势已是如此，我们就是要偷懒也不可偷懒，要安乐也是不可以安乐了，我们唯有决心服从我们国民政府的命令，依照国民政府的政纲政策，用十二分努力，一步一步的做上去，同敌人来冲锋，向敌人来拼命，那末我总理的三民主义一定可以由这个南京政府的发展而实现，国民革命也可以由此完成，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自由平等也就可以由此实现了！

讲起环境来，危险固然危险，但各位更要明白，从四月十号，我在上海封了武汉派来的总政治部之后，接着在杭州，广东，南京，福建，等处的共产党，统统都给我们本党驱逐完了，并且各处民众都极力的通电表示拥护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现在山西陕西四川等省的当局，如冯玉祥阎锡山刘湘等诸同志，也统统起来驱逐共产党，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实实在在能表示他是一个三民主义的信徒了，全国一般民众的心理，也都望共产党早日消灭，使他们能够早一日起来解放痛苦；我们有这种普遍的革命群众，我们还怕什么呢，这一回我们驱逐共产党是为我们党来肃清叛逆分子，为人民来除去暴戾分子，现在全国人心大快，晓得只有我们国民党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为农工谋解放的，各位将士同志们，现在全国人心已倾向我们，只要我们不自暴自弃，自趋堕落，我们是一定可以成功的，各位将士要晓得，现在的革命军纯粹是国民党的军队了，没有人来捣我们的乱了，以后可以努力大胆前进了，希望各位将士同志，能够趁此时机，格外的努力奋斗，来完成国民革命，使三民主义能够早些实施于中国，中国国民党的生命，国民革命军的生命，以及全国民众的生命，已完全寄托在我们各位将士身上，各位将士负了这样重大的责任，非努力奋斗，是不能达到最后胜利的，我们作战，不怕强敌，不怕艰难，只怕我们队伍里有不良分子捣乱，现在不良分子已经给我们驱逐完了，我们的军队已是很纯粹的了，我们的军队既已纯粹了，那末我们不仅有几十万士兵，就是只有几千个士兵，只要大家同心一致团结精神，仍可以打二百万，甚至二千万敌人也可以被我们来消灭的，军队作战的心理，只怕内部不稳固，精神团结，总理讲，一个打百个，有十万革命军，就可以打千万的反革命军，现在我们内部已经肃清，精神完全团结了，我们还怕什么呢？以后只要问各位要不要成功，要成功的时候，就要努力奋斗，现在我们军纪渐渐的坏起来了，各位有没有觉得，在南京街上所看到者，都是军服不洁，扣子不齐的士兵，还有许多士兵官长，跑到旅馆里，或人家的家里，做种种不规则的事情，这种军容不整，风纪不严，实在是军队里最不好，最危险的现象；如果大家要把革命事业成功，大家还要赶速革除这种恶习惯，把精神赶起来争口气，不要以为共产党已经赶走了，国民革命可以无忧了，要晓得共产党现在虽是驱逐出了，我们国民革命军还是要更加努力的，不然我们仍时时有被消灭的危险，希望各位将士要特别留意！

今天是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的纪念日，亦就是各位同志们努力奋斗的一个最好机会，只

要各将士能够严守纪律，服从主义，有暇的时候还希望各位多看一些书，那末，国民革命之完成是可以不成问题的，如果本总司令有违反纪律，背叛三民主义，为个人来谋地位的时候，各位尽可来制裁我，如我没有这种反动的行为，那末各位还要在我的指导之下，真正的为党为国为民众来奋斗来牺牲。

今天我所讲的话，一般士兵都没有听见，请各位将士回去之后，将我所讲之话，一句一句的告诉士兵，我们为什么要革命，今天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为什么驱逐共产党，以后我们要更加遵守纪律，拥护政府服从命令，我们要为党国争一口气。今天要喊几句口号：（一）纯粹的国民党员团结起来！（一）纯粹的国民革命军团结起来！（一）打倒破坏革命的反动派，共产党！（一）拥护国民政府！（一）拥护中国国民党！（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盾！（一）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后盾！（一）实现三民主义！（一）完成国民革命（一）继续总理革命的精神！（一）打倒一切反动派！（一）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一）打倒军阀！（一）国民革命成功万岁！（一）各位将士万岁！（一）（各将士齐呼）蒋总司令万岁！

（原载《蒋胡最近言论集》，1927年7月出版）

# 〔附〕对于第二期清党之意见

（一九二七年四月）

蒋　介　石

清党之目的：为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而清党——为拥护农工利益而清党。

党员今后之责任：要严密组织遵守纪律——对跨党分子检举要严重处分要审慎——要继续努力革命工作。

“待敌人慈悲，即待同志残酷；”此为共产党告戒其党徒对待敌党不嫌残忍之信条；“不为同志，便为仇仇；不为信徒，便为叛逆；”此中正数年来自勉以同志之规箴；在此次清党运动中，对此二者，不能不深自惕励。

在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北伐军事尚待急进之际，吾人因共产党徒之捣乱谋叛，遂不得不于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以外，兼作此次清党运动，此吾党之不幸也。向使本党同志，为真正信仰三民主义之同志，自始即有明确之认识，坚决之意志，强固之组织，严密之训练，全体一致，努力工作，深入民众，无懈可击，共产党徒虽极险狠狡诈，亦未必能售其操纵破坏之奸；故今日之清党运动，实由本党同志自种其因。自中央监察委员会揭发共产党徒逆谋以后，各方同志忠勇奋发，齐起奋斗，卒于最短期间，举共产党徒数年来险谋捣乱之布置，悉推陷而廓清之，则又明示吾人以本党同志在平时虽不免有涣散松懈之弊，而一

至本党生死关头，涣散者团结，松懈者紧张，此又吾党之大幸也。虽然，得失相倚，祸福相伏，往事皆然；清党之为祸为福，亦在吾人之自求而已。吾人若为清党运动已有相当之成绩，党之生命已立于至安全之地位，而今而后，又可偷一日之安，则涣散松懈之弊终不得除，清党之效果将等于零；又或有鉴于共产党徒之齿莽灭裂，遂矫枉过正；不复深入民间，则将使党之生命，痿痿以亡。故吾人今日必须认定，清党以后，方为本党真正生死关头。今日以前，共产党徒寄生党内，挟其诡秘之党团作用，把持操纵。无所不用其极，因而激起本党忠实同志之义愤，苦心衡虑，以谋救党；今日以后，共产党徒不复能在本党作祟，本党同志苟存莫予毒焉之心，一念骄矜，足使全党堕落，清党之效用，充其极只能使共产党徒不为我害而已，不能保障我自身之决不腐化也。今日以前，共产党徒劫持本党，愚惑民众，悬羊头而市狗肉，以致本党主义未能普及，党纲政纲未能实现，其咎可由共产党徒尸之；今日以后，本党以党治国之障碍既除，存亡治乱，一切责在本党，民众执党义以相绳，苟有差池，无可复诿；又或党员行动，无异官僚，青天白日之下，阴霾如故，则怨读所归，将不在个人而在党，党之信用隳，而党之生命亦危，又何能保共产余孽之不乘隙而起也。吾为此惧，乃不辞口，晓音以告我同志曰：清党之事业犹未完成，清党之精神必须持续。第一期之清党运动，在以极敏捷严厉之手腕，扑灭共产党徒之逆谋，屏除共产党徒于党外，其事犹易；第二期之清党，则必以至大至久之恒心与毅力，肃清潜伏之共产分子，绝其根株，同时确立本党之新生命，自强不息，使一切危害本党与腐化本党者咸无从立足，此其事盖甚难也；我同志能深知其难，而又有不畏难之决心，锲而不舍，以求达此目的，则党事其庶几矣。兹更分举清党第二期最应注意之点，与我同志商榷之。

（一）各级党部之组织必十分严密，党员必遵守纪律。共产党徒寄生本党，以数量言，当不逮本党同志二十分之一，然彼常能以少胜多，操纵如意者，其组织之严密胜于我，其党员之尊重纪律亦过于我也，共产党之阴谋固可诛，共产党之组织则确有可采者。本党在民国十三年改组之时，本已采用苏俄共产党之组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之总章，自区分部而上，系统井然，其于党员义务，亦有明白之规定，无如本党同志多不耐严格之训练，往往视党章为具文，甚或不知党章之所制定者究为何事，而各级党部乃徒为跨党分子垄断党务之工具，此最可痛心者也。今既有清党运动，必注意于党员之训练，入党之审查勿滥，工作之考核宜严，一切投机及腐化分子，咸宜屏除，务使本党之组织视共产党更为坚强，本党之纪律视共产党更为严整。凡共产党组织之特长，足补本党党章所未备者，咸可择善而从，而党章则尤须实力奉行。真正坚信三民主义之同志，当有铁的团结，以党之生命为自己之生命；而欲维持此铁的团结永久，非有极严密之组织，其道无由。清党之真正目的在此，清党后之最重要工作亦在此，凡我同志，幸各努力。

（二）第二期之清党，应注重根本消弭之方，对于跨党分子之检举，不容稍宽，惟处理必求审慎，且须切实防止挟嫌倾陷情事，第二期之清党，有与第一期不同者：第一期之清党，为紧急处分，其时共产党徒谋叛正亟，非各地同时采用极严峻之手段，无以遏抑乱萌；第二期则为根本整理，肃清共产党徒之根株，勿使复活，此必有待于缜密统一之方案。第一期清党，自打倒共产党领袖及其著名活动分子入手，此等人之罪状皆甚明显；第二期则须遍及一般跨党分子，其证据比较难得，挟嫌诬陷者易施其技，办理稍有不慎，将增加人民之恐怖，斫丧社会之元气，而党务进行亦大受其影响，此不可不注意者也。现在

清党运动，已由中央拟定统一办法；各地同志对于跨党分子，如有发见，急当尽量检举，惟审查决定，必须遵照中央所定办法，执行处分之权，尤应统一于中央。吾人对于跨党分子，苟非捣乱谋叛具有证佐者，只须仃止其党籍，限制其自由，予以警告，促其自新。无论湘鄂共产党徒仇杀国民党员，如何惨暴，吾人绝不必存报复之念，效其所为，对敌人固不宜慈悲，亦不必如共产党徒之残酷也。若夫怀挟私怨，攘夺权利，诬人以莫须有之罪名，则尤非本党同志所宜出；不幸有之，则清党之结果不特将治丝益棼，且有摘瓜抱蔓之忧矣。

（三）清党运动应认清题目，吾人非为帝国主义者与资本家排除共产党，对于打倒帝国主义与拥护农工利益之工作，仍须继续努力。吾人何为而清党，以共产党徒捣乱我国民革命之阵线也；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就使中国不自由平等者，惟帝国主义；故打倒帝国主义，为国民革命最切要之工作。帝国主义与国民革命势不两立。证以最近英帝国主义之行动而益信。自国民革命军在江西与孙传芳以重创，连克闽浙以来，帝国主义者之飞机炮舰，络绎不绝，如临大敌。彼时犹得曰防止共产党攻击租界也；今我党自动的肃清共产党徒，国民政府之外交方针，已布告于世界，而英帝国主义非特无撤兵诚意，铁丝网沙包之妨碍我商业如故，飞机炮舰之任意游弋如故，甚且在江阴镇江开炮轰击居民，飞行机助渤海舰队在吴淞示威；英帝国主义历年以来，援助陈炯明吴佩孚孙传芳以抗阻我国民革命军，无役不败，今犹不悛，又转而援助张宗昌矣，因帝国主义之援助军阀，与本党为敌，故本党必须领导全国民众，打倒帝国主义而后已。本党为民众而革命，民众之最大多数为农工，国民革命本为解除农工痛苦而来。共产党徒既遮断本党与农工之联结，且任意欺骗农工，故本党欲拥护农工利益，必先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乃为农工谋真正之利益，为国家谋产业之发展，调节劳资，使农工得在三民主义之下，自由滋荣，吾人固不高唱打倒资本家之呼声，然若资本家误认共产党打倒以后，本党不复为工人保障利益，彼等可任意虐待工人，则此等为富不仁者，亦非打倒不可，我同志必须认清题目，吾人绝非为帝国主义打倒共产党，亦非为资本家打倒共产党，吾人正因为要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农工利益，方不能不打倒共产党，吾人为实行三民主义，贯彻以党治国之宗旨，更不能不从速铲除共产党，清党既略告段落，工作应加倍努力，此至明显之理也。

凡兹所陈，初无高论，然而清党之成败，实系于此，昔孟子欲息邪说，正人心，历述舜禹以来至于孔子一治一乱之局，吾初不解天下何以治而必乱，由今思之，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无党的团结，以为持久之奋斗也，清党运动，本非一手一足之烈，清党以后，党员能万众一心，以党之生命为己之生命，奋斗不懈，有同志而无仇仇，有信徒而无叛逆，国民革命由此完成，世界大同由此开始，此总理创造本党之微意，亦我同志拥护本党之职志也，中正不敏，愿与同志共勉之！

（原载《蒋胡最近言论集》，1927年9月出版）

# 〔附〕谨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

（一九二七年七月）

蒋　介　石

内容大纲

（一）国民党内部纠纷之原因，（二）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过去及破坏本党与国民革命之事实，1、共产党反对北伐之经过，2、中央迁移之经过，3、第三次执委会之经过及开会时之情形，4、武汉所谓中央内容之分析，5，“以国制国”之策，（三）不分之不可能三，1、何以为军（分化及扣饷械等事），2、何以为党（江西等处党部事实），3、何以为国（必至亡国而后已），①农工及社会经济，②政治，③教育，④外交，（四）所闹之谬点三，1、国民党为民众而革命民众决不会抛弃国民党之谬论，2、“民生主义就是共产党主义”说之曲解，3、共产党愿与国民党提携说之谬误，（五）根据三种深信，1、三民主义为惟一救国主义，2、中国民族当自决其命运，3、不分则国民党与中国将归于尽，（六）总理容纳共产党之意思两种，（七）一致拥护南京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并自动清党，（八）最后劝告武汉中央执委各个分子，（九）护党绝非叛党，（十）注重军政非养成个人独裁专政——共产党之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必为流氓政客之独裁专政，（十一）愿受真正的国民党中央任何裁判，（十二）以陆秀夫期所有忠诚党员为护党救国运动奋斗。

中正自誓师北伐以来，即置生命于度外。秉总理遗训，解除全国民众之痛苦。以求完成国民革命之工作。赖我同志努力，将士奋勇，首奠湘鄂，继克赣闽；而浙，而皖，而苏，以至沪宁克复，长江底定，国民革命之成功，已经逼近事实，无如大敌尚在前线，阴谋启于后方。苟我确信三民主义之同志，不有真正之觉悟，坚固之联合，不特国民革命将功败垂成，且祸害必至亡党亡国而后已。中正目睹身经，肺肝如鑠。谨暴真相，以告我忠实之同志。

自不明内容者观察，则此次破裂，仅系国民党内部之纠纷，简直言之，则苟无共产党之阴谋操纵，本党有何不可解之纠纷可言？国民党是整个的，分离我辈者为共产党。国民党却是比较宽大的，利用我之宽大，以组织小党团而在我党内横冲直撞者，亦为共产党。共产党自有其组织之系统，自有其革命之方式。自本党决定北伐以来，共产党即首先反对。不自度量，初拟以全力攫取广东，坐视中原水深火热，然后由彼兴师，彼党方为中国唯一之宰制者。故我军待命出发，彼等首先运动罢工，以阻碍军事行动。以后见大势所趋，无法制止，乃改变策略，借国民革命军之掩护，用国民党之名义，以随地扩张其党权，应用其党略，为太阿倒持之地步。今日我军以血战克复之名城，明日即成彼党以阴谋

袭取之营垒。钩心斗角，机牙肆张。务使真正国民党员不能参与党务，不能参与农工运动。彼等深知本党为全体人民谋解放，当然首重大多数之农工；以治党治国，当然最重要者为党务。二者既得，何有其他？当我军血战赣闽之时，彼等即尽全力以盘踞湘鄂。益知武汉将为临时都城，必造成环境，使他日中央机关任其操纵，我党不得不向其乞怜，中正坦白为怀，最初即主中央迁往武汉，以后因奉鲁军侵入江淮，底定东南，瞬不容缓。。军政时期一切大计赖中央之主持指导者至亟。乃由中央执行委员常务会议及政治会议议决，将中央机关暂驻南昌。初非有何作用。乃武汉方面，竟违抗南昌中央执委常会及政治会议一切议决，抗拒改组政治会议武汉分会，转继续其法律上已失根据之联席会议。是破坏中央之议案，实始于当时假托中央名义而号召之中央。乃美其名曰“革命的需要”。试问“革命的需要”何限于此？况后来主张迁鄂者，即多当日力持驻赣之人，一转转移间，令人莫测，往来信使，多以南昌不迁，则大局立时破裂，武汉将另设中央。中正以大敌在前，当顾全局，遂疏通在赣同志，请其即日迁移以完成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辞去两种主席，以为开诚见心，中央委员必有公允办法，不受他党操纵，以保持本党生命，完成国民革命工作。孰意中央执委开会之前，彼等早已布置就绪。开会之时，竟造成武力挟迫，暴徒示威之恐怖局面。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转战湘鄂，抵定武汉，劳苦功高，竟被宵夜逼走。反散布谣言，谓中正令其捕拿中央执行委员，不愿违心，遂行辞职。陈君犹在，文电可查。欺世欺心，胡为斯极？中央常务委员会书记长李仲公则被其借口拘禁。我革命将士被杀戮者有之，被禁闭者有之，甚至被迫无路，投江自尽者有之。武昌军事政治分校及学兵团学生之不甘盲从而被拘囚者，竟至千人之多。暗无天日，有过于此者乎？中央执委开会以后，共产党以自己之干部，操纵本党之官僚政客，利用其升官发财之心理，意志薄弱之痛根，于是“以国制国”之阴谋，竟成为明白彰著之事实，对第二次执委全体会议规定党部部长不得任用共产党员之议案，阳奉阴违，且于交出共产党名册，及组织两党联席会议之事，一字不提。共产党员随时吸收增加，又复秘密，除少数已经公开者外，谁能办之？如筑垣墙，先无础石，则想象中之森严壁垒，终属乌有子虚，况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常务委员及政治委员，国民政府部长，莫不有公开之共产党员或准共产党员在内。我党真有主张之中坚分子，或因职守，或因环境关系，多不能到，等于挂名。其所设军事委员会之内容，亦复如此。同志不察，或被蒙欺，分析内容，可为痛哭！中央在赣，彼辈乃有应“革命的需要”而产生之联席会议，否认中央一切议案。中央在汉，则中央复一变而为神圣。似此狐狸狐猾，予取予求，名为提高党权，而党权堕于零点；名为拥护党权，中正实不知党权之谁属？中正固反对封建思想；然封建思想中尚侠好义，犹有可称。若“挟天子以令诸候”乃操莽故智，等封建思想而下之。

当大敌在前国内鼎沸，此正总理所规定之军政时期也。军政之成败，不但关系本党，而且关系中国之生存。统一指挥：在革命军事上为必要。出师以来，小有成功，端借于此，每逢调度各方，筹划作战，中正莫不宵夜彷徨，劳心积虑。至于身先士卒，仅其余事。统一指挥之责，中正早视为莫大艰巨非有任何权利可言，诚以我五十万革命军人生死所关，数千里人民安危所系，不敢不勉效死力。乃彼等竟背总理建国大纲之遗训离间我革命军人，妨碍我军事行动。假军事委员会之名，而行施其分化我党军队之阴谋。我以五十万革命军人之生命，托之于数千里外毫不知兵，或甘苦不同者之手。于前敌作战最烈之会，竟扣

留饷械不发，复用种种方法，把持就地饷源。于中正则造谣诬蔑谓账目不清。不知中正生死且置之度外，何有于身外之财产。于中正嘱拨各军饷械，竟有谓中正吝不肯发，乃由彼等另发以市私惠。共产党员以运动工人之法，运动军队者，发现宁止一次。与敌人勾结妥协之谣，又何止万千。种种阴谋，无非欲使我奋斗之革命军人解体，以听敌人消灭。于日日与敌人肉搏相持艰苦作战之将士，则诬为不革命的，甚至诬为反革命的。于捣乱后方，坐拥革命将士鲜血换来之高官厚禄者，系真正革命的。人心未死，公理何存。长此颠倒，何以为军？

以党治国，为本党坚决主张。共产党认定枢纽所在，处处把持党务，借彼等策略上之训练，与有革命经验者之指挥，以少胜多，无处不握党中之重心地位。于新党员之有成为真正三民主义信徒之可能者则加排斥，于有变成共产党之可能者，则尽量吸收。威胁利诱，至于欲加入国民党者，非先表示能与共产党同声相应不可。而国民党遂成为共产党之预备学校。甚至多年之纯粹党员，欲求一度登记而不可得。于不在彼等把握中之党部若不号召流氓借农工之名以事捣乱压迫，亦必借中央或高级党部之力，命令解散。江西省党部捣毁者数次，服务之党员被杀者十数人，不过其彰彰大者。然在武汉中央视之，几若当然。如该处中央勒令解散江西省党部及广东市党部之举，无非欲压迫我忠实国民党员毁坏其组织，以造成清一色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强奸党意。至于九江安庆上海等处问题，诚属不幸。然不过民众与民众，党部与党部之冲突，乃深文周纳，必欲嫁中正以摧残党务，压迫民众之罪名，凡希冀攫取或保全禄位，随声附和者，则为国民党之革命分子；凡不顾禄位以治党务者，则为“党贼”为“昏庸老朽”。擅造种种派别名称，以求其分化。共产党上借自称国民党中央之掩护，下有精密阴险之党团，如有国际团体在经济上之援助，与有经验者备顾问，遂无处不占优势。致我国民党员有隶党籍之名，无握党权之实。不但内外交迫，无立足地；且处此状况之下，谁复顾问党务？各处同志莫不义愤填膺，涕泣而道，党务如此，不亡何待？以总理艰难缔造，借以贯彻三民主义，挽救中国之唯一政党，乃任后之主持者，大度包荒，明卖暗送，为换取个人虚荣实利之资。亡党纵非其所惜，中正实无颜以对总理不朽之遗颜。长此迁延，何以为党？

当此最大改革之会，我党同志，当力谋减少中国全体人民在此改革程序中所受之痛苦。用有条理步趋之方法，以增进民众之生存幸福。民众之最大多数为农工，我党自当极力协助农友工友之运动与组织，乃凡涉农工之事，几为共产党所包办。苟共产党能为真正农工谋利益，夫复何说。无如共产党对于任何土豪劣绅，地痞流氓，苟能为其利用以攫取农工攘夺政权者，无不四处位置，充分利用，当年阿附军阀惨杀工人者，今日何曾不据湘鄂政府之要津？利用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之名，其实不过以此派之土豪劣绅，打倒彼派之土豪劣绅，或竟为土豪劣绅之所顾忌者。于农民运动，则除促其抗租；于工人运动，则除促其增加数倍或数十倍之工资外，别无宣传。余则以利用以杀人越货，作政争工具。农工目前之痛苦，实不可言。苟有人心。孰不愿其立刻改善。无如中国经济现状，国际商场的环境，亦当顾虑，断不能以同归于尽之手段使农工目前最低限度之生活，亦不能维持。总理明示我辈以革命手段，用以解决政治问题则可，用以解决经济问题，则有所不能。（民生主义第二讲）苏俄于牺牲千数百万之生命而后，不得已而行新经济政策。中国人口数倍俄国，苟任其为共产党之试验品，则牺牲数目，必数倍之。此数千万人，果何为而死者？总理解放农民，自有步趋，详于其亲自鉴定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利盘剥，为本党

所禁。今规定之农民银行等计划，尚未实行，而武汉第三次中央执委大会中，竟有“取消全国农民债务”之议案。以为饵而近利，必能得全国农民同情。不思春耕在即，农民将何法再行借贷？名为爱之，实以害之。此案虽幸暂搁，然彼辈举动，显违总理主张。与彼相共，何以谋国？他国工人向工会纳资，系用以改良工人生活，或为罢工时之准备金。在中国则工人所加工资，强半甚至全部入于工会。工会首领以办工会而致巨富者，在昔日广东湖北，习见不鲜。用工人血汗或罢工争来之所得，以为招练纠察队之饷项。动辄用纠察队挟以示威，形同押解。同时生活增高，工人所得工资之购买力，亦因此减少。厂作倒闭，店主弃产潜逃之事，各处多有。虽其中不乏有意操纵之徒，自当立法严禁，然因资本绝乏，无力支持者，亦居多数。工人失业数目，日增一日。工人痛苦，亦日甚一日。良好工人至于敢怒而不敢言。不特社会经济，而且国民经济，行将完全破产。中正偕我数十万革命军人，转战数千里，其目的在为我最大多数农工谋解放，减少我农友工友之痛苦。不意师行所至之地，处处为共产党把持，使真正农友工友反益陷于水深火热。环顾四周，可为痛哭。至于共产党利用农工以作政争之策略，尤为恶毒。凡地痞流氓，一着纠察队制服，即有生杀予夺之权，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民众。稍经依法制止，即为摧残农工，罪在不赦，如上海之纠察队多系招集孙传芳毕庶澄之散兵，与以利器。四月十三日围攻闸北第二十六军司令部之时，当场捕获九十余人，其中四十余人，皆身带直鲁匪军遣派之证号。苟能破坏我国民革命工作，虽勾通万恶军阀，亦所不惜，至于各处利用农工之名，以摧残我真正党员之事，更不胜言。江西省政府委员教育厅长程天放被殴垂毙，尚在狱中，在群众则听人指挥，任意暴动，实不知死者何故当杀；自身因冲突而死，亦不知致死何因。至于共产分子把持之县党部，竟有执行枪毙之权，更不知自何取得。使国民政府任命之官吏，亦逡巡惶怖，无可如何。政治如此，有何办法？以言教育，则湘鄂除中央军事政治分校，及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应付时局之机关而外，大学仅具虚名，中小学几全部停顿。非能造成清一色共产党员之学校，则宁可使其无有，不可任其存在。致“读书即不革命，不革命即反革命”之口号竟由湖北党部发出。“党化教育”意岂在此？以言外交，则国民政府外交政策，先从集中对付一国着手。帝国主义，虽皆可恨，然单独对付一国，在外交策略上，不能不如此进行。今各处事件发生，牵涉多国，务必造成帝国主义者之联合战线；此中真相，深待研究考虑。政府自当拥护民众，民众亦当听政府之指挥。大智不限于反唇，大勇不限于攘臂，此非与人妥洽，甘心被诬为“帝国主义走狗”，乃谋国者统筹全局所当然。何必立陷中国于四面楚歌之地，以投入国外特殊国家，及特殊国体之圈套，完全听其指挥而后已。破坏统一的外交政策之责，谁实负之。中正谨郑重告我党同志：我党今系掌握政权之政党，既已“以党治国”相号召；本党必示国人以能治国之能力与办法。今共产党穴社凭城，处处捣乱，以最卑劣之阴谋，蒙国民党的名义，倒行逆施。一切责任，彼等可以不负，而负之者为我国民党。长江一带，已有“党军可爱，党人可杀”之言。一般民众，宁知党中内幕？本党信用，恐因此扫地以尽。国人厌恨军阀久矣，中正可断言其不愿再返诸军阀治下。全国唯一希望，已系于我国民党。而共产党则处处谋破坏我国民党之主张与政策，使其当举国唾弃，众叛亲离之时，彼乃能利用人民“求条出路”之渴望，托身为拯救中国之天使。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今中国所有生机，将被其斩伐殆尽。长此披猖，何以为国？

中正默察本党同志心理，有一部分因他党宣传结果，产生以下三种谬误观念，最不可

以不加辨察。

（一）有谓国民党既为民众谋利益而革命，则革命成功以后，民众决不会抛弃本党。此语似是而非，仅得事理之半。民众为抽象名词，其借以具体表现者为组织，民众之抛弃本党与否，在于本党之是否有民众组织，以领导民众为断。不然，本党既欲民众之不我弃而不可得，民众即欲不弃本党，亦无法得具体之表现。三年以来真正国民党党员从事工农运动工作者，不为共产党挤排以去，则利诱威迫，使惟彼党之命是听。对工会农会，亦复如是，百计欺瞒，百计挑拨，遮断国民党与民众见面之机会，此为纂乱阴谋之大者。最近广东上海福建浙江安徽各省，发露彼党之阴谋，民众乃始认识国民党之真面目，而知所依归。长沙武汉则除彼等散播其所强奸之民意外，民众如堕云雾，如入地狱，大抵不敢言而敢怒，以怨怒共产之故，并疑国民党为已共产化，使其呼吁无门，而言者不悟，犹谓民众如何如何，自非目盲，何至若是？

（二）本党之中有断章取义截取总理"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之字句，以为彼等明显提倡共产之护符。不知总理定名"民生主义"之时，即声明非因袭何人之陈说，民生主义在于求全体及个人生存条件之满足，其出发点，决非"唯物史观"（民生主义第一讲）。阶级战争与无产专制，是共产党唯一的策略，而总理则明言"但在中国实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师马克思之意则可；师马克思之法则不可"（民生主义第二讲），"照马克思的党徒，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同上）所以主张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为"思患预防的方法"以免中国再蹈欧洲经济发展情形之故辙。总理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乃于取喻之时就其最后目的之一部分及其字面泛义而言。不然何以又联及派别繁多之社会主义？故总理在同一演讲又言，"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其将来，不是共现在"（同上）。总理为根据事实，确有办法之伟大先觉。因此说，"世界各国因为情形各不相同，资本发达的程度也是各不相同，所以解决民生问题的办法，各国也是不能相同，"（同上）。明训彰彰，断难曲解。况三民主义系整个的，有机体的，当同时实行的，亦不能抛弃民族民权而曲解民生。

（三）目前我党同志，及一般国民，均有一种错误心理。以为当此大敌在前，苟国民党愿与共产党妥协，共产党必愿与国民党竭诚提携，不然则共产党亦是自杀，共产党员宁见不及此。共产党领袖早有此种策略上之论调，但共产党对于一切党外分子，根本否认其所谓奴隶道德之信义。党国生存问题岂个人片纸空言所能保障。妥协不在言论而在事实。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与国民革命之事实，前已缕晰言之。一语破的，共产党之大敌，非军阀而系国民党。共产党革命方式，极为明了。无极大破坏不能发生极大暴动，无极大暴动共产党不能夺取政权。军阀愈横暴则共产党愈易成功。惟国民党真能当权则共产党在中国之前途，几等绝望。故在德法国会之中，共产党常与复辟党相提携。此等策略，已国际化。自中正誓师北伐，打倒万恶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辈以来，举国皆顿悟军阀为不难荡平之物。共产党宁不知之？于是在此国民革命将告完成之时，共产党更觉大敌在此而不在彼。故破坏国民革命工作之进行，亦愈形猛烈。设国民革命一旦完成，则他国在华之共产党员，亦多曾在土耳其者，宁不以昔日之经验引为深诫，谓其欲与杂参共产党血统，不惜以国民党蜕化而为共产党之中央相提携，则彼辈早已挟其名义以号召。至于和纯粹的国民党

妥协，以完成国民革命之工作，则请悬中正之首于国门耳。

中正沥胆披肝，言已至此。曲直存亡之关键，为有常识者所能洞明。中正谨竭至诚，举扼要者数事，以与我真正同志互相勉策。

（一）凡我忠实同志，务须努力促成国民革命。我党外有帝国主义与军阀之大敌，内有共产党卑劣之阴谋，以离间我同志及革命军人。故国民革命之工作，已处于自来未有之困难。在此境遇，亦再足试验我同志之忠勇与人格。为求全国民众解放，则不能不与帝国主义及军阀奋斗到底。为极力谋减少全国民众在革命过程中之痛苦，而防止中国一切发展入于岐途，故不能不与共产党分裂与奋斗。务须待军阀完全推翻，不平等条约次第取消，全国民众不受共产党恐怖政治之痛苦而能自由发展，逐渐满足其生存条件之时，我国民革命方能告一时之段落。我数十万革命将士，正冒枪林弹雨与敌人相肉搏，设我同志甘受他人分化，自相残害，而不努力于功亏一篑之伟大国民革命，更有何面目以对国民以对总理与死难诸将士？更有何心肝以生存于世间？

（二）努力民众工作，为本党党员急切之责任。本党为民众而革命，民众之最大多数为农工。设农工痛苦不但不能解除而且增加，则国民革命有何意义？在今日大势之下，反农工无异促成党国的自杀。在生活压迫之下，农工既无人指导，亦将自动组织，如河南之红枪会，其显著者。目前问题，即谁助农工组织，为其谋利益者，则农工听其指挥，为其友；谁反农工组织及其利益者，则农工与之反抗，为其敌。我党同志往往眼光短浅，重视一时政权，不知大多数民众在他人掌握之中，政权无非傀儡式之机械。共产党窥破此种弱点，故国民党员之欲得高官厚禄者，莫不极力拥护，任其取求。至于农工，则视为彼辈禁脔，绝对不令染指。我党设与民众分离，则不腐化亦归消灭。从事农工运动，自当艰苦辛劳，然为党国大本。正我恫众在抱，有心党国之同志所当努力。以前本党同志对于此种工作，实太忽视。待他人布置就绪任意利用农工之事实暴露以后，又复太息咨嗟以为事不可为。往车既复，来轸方遒。为今之计，只有我忠实之青年党员，坚抱三民主义向民间去。国事如此决非我辈养尊处优，坐而论道之时。亦不当待领袖三熏三沐，悬而后发。乃须孤军深入，自动的去争工作，若不改弦更张，则虽有圣智亦无从救党国之危殆。

（三）凡真正坚信三民主义之同志，当有铁的团结，肃清党的内部。不因共产党造谣离间，遂致堕其分化策略之中。本党领袖追随总理，与本党有长期之历史关系，为各方面所属望者，尤当眷念党国，化除小嫌，而团结一致。不以包围而分，亦不以被谣而退。年来共产党分化我党政策，无所不用其极。造作“左派”“右派”“西山会议派”“新右派”等等名词，任意加于本党同志之上。受之者如被符魇，立即瘫痪而退。其实所谓各种派别，从何衡评？今日之为左派者，明日即可为右派。今日之为右派者，明日即可为左派。西山会议派尤为代表任何罪恶之名词，可以加之任何不取悦于共产党者之身。其实主持西山会议者，苟愿被其利用，又何尝不可据其所谓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最高之位置。中正愿与本党同志约，以后种种敌人用以分化吾辈之名词，一概摒弃。是否真正国民党员，是否总理信徒，当以是否遵从三民主义，是否对于本党有真正工作，是否依照总理遗嘱所举之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及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行事为定。总理当年只允容纳共产党员，单独的参加国民党与国民革命工作，本无所谓“联共”。今共产党既违反总理本意，极力破坏国民党与国民革命，自与总理本意相背。应将跨党分子，一律肃清。由纯粹的三民主

义之信徒，本总理遗训，以完成国民革命，以建设态度鲜明之政党，以建设总理规划之民国。

事已至此，非有最后决心，不足以救党国之危亡。中正立此决心，乃根据于下三种深信：

（一）中正深信三民主义为惟一的救国主义。总理伟大之主义，实根据中国本身情况，切合于中国全体民族之利害，断非随意舶来之学说所可比拟。三民主义为整个的，为有机体的，为同时并进的，为随时进步的，断不容假借附会者之曲解。

（二）中正深信中国民族，当有处分中国本身命运之权，在系统上不应受任何外团所操纵作其实验。三年以来之经验终觉国外团体纵有十分扶助中国之诚心，则人为我谋，终属隔靴抓痒。且他人果有此诚心，何不先扶助中国国民革命，先跻中国于自由平等之域，而必斤斤于系统上之附属与包办。况中国国民革命亦即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正本民族自决之义，于中国民族解放以后，当为世界上弱小或受压迫之民族，力求解放。希望世界革命，早日完成中国有为人类奋斗之荣誉。但对此项奋斗，中国当为实力的与独立的参加。不当为“拉夫式的”参加。不为他人所拉之夫，亦即不为他人之“猫爪”。

（三）中正深信此时我党不与共产党分离，则国民革命断难成功。而中国与我民族甚至于灭亡。事实具在何劳多举。若任共产党之篡窃与大破坏，国民党将与中国同归于尽。国民党为有办法与负责之政党，断不能任共产党悬羊头而市狗肉，作不负责任之大破坏。

况当年总理之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参与国民革命工作不外两种用意：（一）为弭除共产党危险起见，欲借此用三民主义以融化共产主义与以思想上之感化。（二）欲使共产党中之青年，有机会努力国民革命工作。此意总理曾为中正屡次道及，常侍总理之同志亦必不乏闻之者。今共产党不特坚持其舶来之主义，毫不变更，而且以种种阴谋辣手，破坏国民革命与总理亲手缔造之国民党。种种事实，显与总理原意违背。此岂总理所及料？此共产党之有负于总理，非国民党之有负于共产党也。

今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不特充满共产党血统，利用本党浮荡少年，卑劣政客由其操纵把持，且其地点复处于武力暴徒挟迫之下。虽其中不乏忠实同志然亦受其蒙蔽包围；纵有言论，绝难自由发表。第三次执委常会之乱命，无一不图离间分化我革命军人，破坏国民革命工作，无一不图分化我忠实党员，篡窃我一切党权，破坏我一切党务。从根本上将我国民党推翻。中央监察委员会为本党最高监督机关，各委员中复多才高德望。久为全国思想领导，随总理革命半生，与本党生死相共之先觉。至今不忍坐视党国沦亡国民革命军被人破坏，中国民众痛苦愈将不可收拾，爰在上海南京先后开会，揭发武汉联席会议抗命改组以后及第三次执行委员会一切卖党卖国之非法议决，提出弹劾停止其执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继续在南京行使职权，中央党部已经成立，与国民政府同时建都南京。总理指定之都城，此后乃能永奠。中枢既定，务望忠实一致听其指导。中正统率全军，誓死听其指挥与制裁，为同志同胞先。各地党员，已风起云涌自动清党。党之最高权威，本在全体党员。实际上真正三民主义信徒，何止超过跨党分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过平日被彼辈蒙蔽，或受其挟制，或因机关在其掌握，真正意思无从表现。今党国危亡在即，我同志孰不当有最后之决心，岂忍坐视其强奸党意，破坏国民革命，断绝中国民族之生存。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愿我同志，奋起图之！至于武汉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中之忠实党员或因受一面宣传者，请其屏除成见，考察全部事实。或有感觉言论行动不自由者，请其力谋脱离束缚恢复自由。如有感觉骑虎难下者，当知此事关系党国存亡，断非个人面子问题。如

能拥护纯粹之国民党，促成国民革命遵从并贯彻总理遗志者，中正毫无个人嫌怨，誓与推诚合作。皎皎天日，实证此言。

恐此书达于我同志之日，武汉浑合共产党由其绝对统治之所谓中央，施其故伎，竟任意诬中正为“叛党”。中正被诬久矣——身在前敌，生死本不足数，诬蔑更何足言，诬中正为“叛党”中正实不知所叛者为何党？如云叛共产党，则中正始终为共产党之敌人。如谓叛国民党则中正只知真正的与纯粹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之中央已定都南京行使职权，誓死服从。提高党权“一切权力属于党”，中正不但赞成，而且根本主张。但提高党权，当提高纯粹国民党之权。一切权利属于党，当属于纯粹的国民党，而非属于已由共产党把持篡窃之党。中正坚决奋斗者，正是拥护我国民党之生命，以谋我真正国民党能有自由发展，统治一切之机会。此心此志，不但为我忠实同志之所共鉴，亦且天日之所鉴临。

近来共产党四处散布谣言，谓中正思“个人独裁专政”，谓中正希望成“新军阀”，同志不察，或为所惑，不知当此军阀及帝国主义作战时代，实总理所谓“军政时期”，亦则他国之所谓“国家总动员”时期。国民革命之成败，系于军事之成败。举国之努力或赞助国民革命者当牺牲一切以图国民革命的军事上之成功，不然则为破坏国民革命，为反国民革命！目前一切事务，当以顾全军事为前提。不幸中正当军事之中枢，遂被淆乱是非居心离间者，妄行诬蔑，有意将军政与中正混为一谈，统一军事指挥，为国民革命军事成败上绝对的需要，苟非有意破坏国民革命，幸我奋斗的革命军人被敌人消灭，则何至于我军正与敌人血战之时，分化我军队，捣乱我军队后方，扣饷扣械，无所不用其极。至于军政与军令，有划分之必要，是乃由经验而得者。克复南昌以后，中正早自提倡，今则军政已属于军事委员会，而总司令独司军令，不知共产党复有何说，吾知其必另有以为军事独裁之解释者也。总之中正所努力者为国民革命以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与一切黑暗横暴势力为职志。自誓师北伐以来，常指挥陷阵，身先士卒，生死问题，且置度外，更何有于政权？何有于军阀式地盘之割据？中正秉总理遗训，以为中国之解放乃全体民众的解放。故必谋中国全体民众单独的或集合的，均能满足其生存条件而后已。“农工商学兵大联合”即系全国各阶级的共同合作，若共产党根本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就中国现状观之，实为流氓政客的独裁专政。我国民党乃应民众的要求而革命，共产党乃为革命而造成流氓的无产阶级，以听流氓政客之指挥。此种重要区别，同志务须明了。今中央已在南京定都，自由行施职权，指导既有所归，务望一致听其指导，并继续厉行清党运动，促成国民革命，永久保持光大纯粹的国民党。由纯粹的国民党去提高党权，且享有一切党力。纯粹的国民党中央既继续信任中正，中正自当勉效死力，完成国民革命，以期军事早日结束。建设得从速着手，全国民众得早离痛苦，苟中正举动有任何失当不法之处，亦当束身解甲，听中央任何严重之制裁。今涕泣于总理伟大遗象之前，指此心以为证！

时至今日，不论何时，国民党负伟大使命以救中国。党存则国存，中正亦存。党亡则国亡，中正亦亡。昔总理亲以本党之陆秀夫期中正，中正谨以党国之陆秀夫互期我全体忠诚之同志。设我同志，人人有作陆秀夫之决心，则党必不亡，国必不亡，且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在国际上跻中国于自由平等之地位！由国民革命可靠的路径以达到世界革命的成功！

明者见先于时，昧者过时而悔。愿我真正国民党同志，纯粹三民主义信徒，一致有决心努力，以作护党救国运动之奋斗！口号

（一）纯粹国民党党员团结起来。

（二）国民党员要到工厂农村里去做下层工作扶助农工组织各种团体。

（三）国民党员切不要想做官发财。

（四）国民党员严防官僚化。

（五）国民党员要严守党纪服从党令。

（六）国民党里没有左右派，只有三民主义的信徒。

（七）国民党要严防投机分子。

（八）要国民党的组织坚强，先要分子纯粹，党员努力。

（九）国民党员是要为民众谋解放，为国家求独立而来入党的，不要存一毫自私自利的心思。

（十）国民党员要为本党来牺牲其幸福与生命。

（十一）打倒帝国主义。

（十二）打倒军阀。

（十三）实现三民主义。

（十四）主义不行，党员之羞。

（十五）革命不成，吾党之耻。

（十六）完成国民革命。

（十七）中国国民党万岁。

（十八）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万岁。

（原载《蒋胡最近言论集》1927年9月出版）

## 〔附〕国民党的独立是中国独立的基础

（一九二七年四月）

戴　季　陶

这一次国民党的独立，是中国独立的基础，国民党的心，这才回来了。党国的情形，已经危急到了十二万分。现在一般忠实的同志，既已努力作成了国民党的统一独立的基础，此时救党救国的路，已经明白表现出来，就是国民党人自己恢复自己的自信力和团结力，心口如一地组织起来，中国才有一线的生路。如果不然，国民党一亡，中国就是落在奉鲁军阀的手里，而使全国陷于黑暗。自从改组以来，国民党内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在有了

两个中心。而大多数的党员，迷惑在二心之间，无所适从。前年中山先生逝世以后，我所以大胆地冒大险，犯大难，求要国民党的同志，很纯粹地集中在先生的思想和主张的下面，同时劝告在共产党的青年，不要为了迷信一个唯物史观，打破国民革命，就是明明白白看见后来的悲惨。不晓得为什么当时全党的同志，都是迷惑不醒，两年以来，不知不识间，把全国多数有为的青年，赶着向共产党去。二次大会以后，我的自信力，被全党的空气和一个组织与纪律的空名，压服到不能再起。去年张静江蒋介石两先生，再三要我去广东，我不能去的原因，因为一面接受着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同时忍受着精神上的大矛盾，以致一病失神，数次频危，死而复苏者数次，病中惶惑失志，几乎趋于断灭。后来病稍愈，到广东之后，以神经根本受病之人，一面受四围境遇的压迫，一面生出自己心里的怀疑，再处处被大会的决议联会的决议束缚着，要保全国民党的组织，和统一的革命势力呢？抑或是要创国民党自存的新生呢？自己既精神衰弱；只不知不觉地受环境的支配，而事实问题和精神状况，愈趋愈苦。我自己很明白，中国一切的矛盾，国民党中所存在的矛盾，和国民党领袖间的思想，行为，派别的矛盾，时时刻刻，使我的精神状态愈加衰弱，这样作人，绝无一刻的生理，这样作党更那里有一线的生理。当时我明明看见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弥缝一时的，就是促成汪蒋合作到打破北京，再说整理党务的话。一条路是正本清源的，由国民党忠实的领袖，不理问什么纪律什么组织，拼命行一种迪克推多，建设起国民党的纪纲来，再说组织和纪律的话。因为人心是一切的基础。人心已经到了绝境，组织便等于废物。中央地点的问题，和两年来共产党处心积虑的破坏和压迫，生出一个大波澜。由此发生出国民党历史的保障者的吴李张蒋诸同志的决心，唤起一个伟大的国民党的清党运动。我对于此次党内的问题，想说一句很公道的话。中央的干部，除了徐季龙一个人好象有一种特别的所图而外，其余的人，本来没有很多的意见，有也不是坚确。如果中央迁移是一齐出发，或许没有以后的种种纠纷。至于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党问题。国民党内有了一个共产党，就有了两个中心，再好的人也要扰昏的。现在与共产党合作的事，是已经绝对抛弃，国民党的心，应可以回来了。此时如果国民党的人，仍旧不能够把主义的自信力恢复起来，确实相信地，集中在总理的思想主义的下面，确立起纪纲来，做纪律和组织的基础，不但是党无可救；中国的国家和民族，都无可救。此后的中国，连一点恢复的余地都没有。硬把毫无教育，毫无实力，毫无组织的中国人，送了去做帝国主义国际，和共产主义国际大战的战场。无论这一场战争的结果如何，中国民族要损失几千万的人口，黑暗几十年，还够不上造成俄国今天这样一个假名共产的状态。因为中国，连俄国这样的物质基础，和精神的能力都没有。本来把共产党员，统率在国民党的当中，完成取消不平等条约，和开国民会议的两大工作，这是总理所取的政策。但是这个政策，总理逝世以后，在事实上，成了国民党的癌肿，今天已经切开了。此后的道路，我们很可以看得到，我们要以三民主义救国家的危亡，和民族的危亡，完成国民革命。不要把没有教养和组织力的中国民族，眼睁睁地送给两个赤白国际来作决战的试验品，国民党只有一致地团结起来，以纯粹的国民革命方法，完成取消不平等条约，和开国民会议两件大事。中国需要的建设，是要工业先进国援助，德国的科学和美国的机器，才是建设中国的真正材料。同时我们要明白，中国人把中国的改造完成起来，就是世界革命的工作。中国人今天不能在中国之外去寻世界，要在中国之外去寻世界，就是一种妄想。自己的国家建设不起，

民族振兴不起，是没有说世界革命的余地的。这两年来，本党当中把世界革命拿来做成主要口号之殿，对于党内不能唱高调的人，便极力压迫。不错，这也是一条路的。但是这一条路就算是成功了，而成功不知在何年何月。如果二十年不能达到完全打倒现存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目的。中国人就要作二十年的无代价的牺牲。这是先自己造成战后土耳其的国际地位，然后才来造俄国式的革命。就算是完全成了功，还是只有用德国的科学，和美国的资本来做建设。这几十年的岁月，几千万人的牺牲，只算是做了第三国际的试验品，为什么今天不直接了当的，一面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同时教民众作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的工作，使中国的生机，在平和中培养起来，把中国过多的人口移向中国的四围，如蒙古、西藏、新疆、川边地方去生息，而把他们逼向战争的一条路去呢？战争本不定是罪恶，但是也还有“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的话。现在中国的情形，在二十年能免得了国际战争，照总理建国方略所说的利用世界的资本和技能，先造成物质的建设，然后中国人的自信力也才生得出，要作世界革命，也才有基础。第二次代表大会，如前次广东联席会议的议决案，只跟着第三国际的压迫，同时使中国柔弱的国民，终久为救国爱国不得不走战争的路，这样的方法，直是先求民死，再说民生，将来生否不可知，而跟前就是驱民于死地。我们反抗帝国主义，我们中国的力量，只有用和平的手段，唤起世界民众的同情，和中国国民的觉悟和组织，不是马上要制造国际战争。但是照第三国际下的共产党的作法，两三年内，就可以造出国际战争来，无知识，无组织，无训练，无交通制造设备的中国国民，岂不是悲惨到了极点了么？为国家争独立，为民族争平等，为民众求解放的中国国民党的方针，决不应该如此的。所以总理说，要确立起民众的自信力，使民族主义成了功，然后才可以讲世界主义。这两年来第三国际下的共产党，在东方所逼成的战争机运，已经进行到相当程度。我们中国的革命运动的目标，如果很明白地在中国的独立和自由，国际战争，是决定非避免不可。然而这两年国民党对于国民，不确实地苦教国民作卧薪尝胆的工作，只是教国民作破釜沉舟的运动，这一个方针，和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的目的，可以说是相反的。我们要记得总理北上那一年对国民说：“我们要国民会议实现，只要国民的意思集中，要国民的意思发表，十万个电报，胜过军阀十万的大兵。”我们已经很明白地看出来，如果中国国民党不是纯粹的三民主义的党，不是纯粹的国民党员，来组织这一个国际的平和政策，一定做不到，非到很近便引起一场大的国际战争不休，这不单是国民党自己替自己造棺材，简直是替中国国家造棺材。两年以来，我们无论如何想，总想不出国民党有一条生路可走。就是为此，现在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了，作救国的革命呢？作亡国的革命呢？先亡了国再做革命，这是共产党的策略；先教民死，再作共产的企图，这是共产党的策略；先牺牲了中国国家的存在，和民众的生存，去巩固第三国际的基础，再图世界革命的成功，这是共产党的策略；但是中国的国民，中国国民党是不应该如此的。再说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要学土耳其的方法，目前是做不到的，我们中国的国民，没有土耳其国民对于战争的素养，没有象土耳其在欧战当中所造成的大规模的新式战备，土耳其之陷于灭亡，是欧战的结果，同时克马耳的以战争复兴国土，也是欧战的结果，这是很明白的。所以我们中国国民，在今天不能不时时有对帝国主义决死的心；而不能不努力做忍辱负重的预备工作。

一个国民的存在，必须有一个意识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国民的自信。中国的国民，不要图存在发展则已，要图存在发展，只有很坚确地信仰中国人民有创造文化的能力。这个

信仰，就是中山先生的主义想思。我确信总理的三民主义的理论，在世界革命的理论当中，他是后来居上，他的伟大和崇高，确实在马克思列宁之上。何以他的理论和伟大崇高在马克思列宁之上呢？这就是他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四千余年文化的结晶。我确信他的思想，在世界上一定成为新世界精神的物质的建设之指导原则，世界一切革命的国民，在他们经过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悲惨之后，一定会了解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才是真正促进人类进化，社会进化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只有能够说明历史变化的过程，而不是造成人类真正文化的基础。中国人要确信三民主义，才可以救中国，世界一切人类，要确信三民主义，才可以得平和，是可以垂诸数千年而不变的。这是一句精确的话，可以说明先生的主义的伟大。中山先生的主义最崇高的一点，是在他说明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精神，是民族自信力的基础，人失自信力即死，失却道德的精神，就是失却自信力，这是成己成人的要义。社会是人类的集合体，各人不能完成其人格，则各人失却自信力，而社会的意力，也就不能巩固，国家和世界的幸福，都无从产生。中国共产党的青年们，以及许多迷信物质的青年们，不承认中国民族的精神，不承认中国固有道德的教义。口里讲的是马克思主义，而实际所行的，却是俄国前几十年以唾弃一切为宗旨的虚无主义，和世界大都会中的游荡空气所产生的享乐主义。一切只有性的放纵对于男女关系是如此，于是对于一切事物，无往而不如此。这种行为，本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列宁，直是革命的发酵性所产生出的废物。如此的共产党，只有造乱，那能建国。性的放纵的结果，就是造杀机，造死因，绝没有生机生因可以造出的。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及一切的遗教，根本绝不是如此。即使世界的人类，今天不能觉悟，各国多数的民众，仍旧迷信马克思主义，便是将来到得马克思主义实行之后，也必然的一定回到孙先生的教义上来。因为如果不是以道德作信的基础，世界一定没有和平的一天。战国时代，大家鄙弃孔子的教义，所得的就是几百年的战乱，要到得秦楚之交，人口几乎灭尽的时代，大家才懂得孔子的教义是平和和幸福的基础。今天的中国国民，要想得较为和平的革命成功，一定是要确信中山先生遗教的全部。要晓得民族主义的基础，就是在孝慈的道德，民权主义的基础，就是在信义的道德，民生主义的基础，就是在仁爱和平的道德；中国人要想免却无代价的牺牲，无目的的盲动，一定要有确实相信中山先生主义的全部。要相信他一切的教义，没有不是正确的，没有不是真实的，没有不是后来居上的。再简单说几句话，中国要得救，国民党要得救，一定要确实相信民生主义的目的，和共产主义的动机和手段，绝然不同；要确实相信中国民族创造文化的能力，并不在各国人之下，而在各国人之上；要确实相信中山先生是世界革命的领袖中最伟大而崇高的导师，他的理论，是世界上后来居上的革命理论。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信徒，要到了受尽艰难之后，一旦翻然觉悟，来研究信仰中山先生的主义，世界的革命，才可以造成一个新纪元，才可以建设真正的新世界。物质的繁华，要人才能造，要人才能有，要人才能享，中山先生的主义，是人支配物的主义，不是物支配人的主义，人支配物，才有人生，物支配人，就只有死灭，中家人要得救，要完全信仰中山先生的遗教，一切学问智识，只有用来作证明的材料，说明的方法，如果要怀疑中山先生的思想，和他的学说，就是中国人的自杀。国民党两年来造成的环境，是国民党的自杀，同时也是中国人国家的自杀。现在已经到了垂危的绝境，前后左右，都是陷井，要革命，要国民党的人，自己很坚确地把自己的思想，根本改变过来，不要盲信外国学者的思想高过中国人，

马克思的学问好过孙中山，如果要有这一点心，就是绝对无救。我们学中山先生，不但是要学他的思想主义，更要学他的行为，学他的存心，多一个人学他，就是中国多一点生机，多学得他一点，就是多一点的生机；本来革命是一件困苦艰难的事业，中山先生说，不怕死就是真革命党，不怕死而肯刻刻努力，立己立人，就是好革命党。我们党中的同志，思想行为，都能确实相信中山先生，而能刻刻以死生去修得保持他的能有几人，所以国民党从改组以后，自杀到如今。但是我们领袖同志当中，我们看蒋介石同志，他为了保持继续总理的事业，能够不怕死，而刻刻努力，立己立人，张静江、吴稚辉、李石曾等几位先生，他们都能够有这两个特点，一个党是要历史继续的，有了历史的保障者之努力，今天在断续存亡的时候，才把人心收拾起一半来，今后怎么呢，就是全党的同志，大家要齐心一德地，一点不怀疑地，确信总理的遗教，拥护而且扶助着信存的几个忠实的领袖，建设起纪纲来。由纪纲的确立，建设起纪律来，党才可以有救，国才可以有救。

我们从前对于总理随时所取的政策，时时反对，不能明了，到事后才渐渐地明白他的价值。张蒋等中央诸同志，在今天能不被过去党内的决议，以及虚伪的民众操纵者，所制造的环境迷惑颠倒，毅然决然的行动，这可以说是国民党历史的力量和中国民族历史的力量，所发现出来的一种精神能力，这可以晓得是民生主义的天然力量。民族和社会民众要求生存在必要的时候，便于发挥他的能力，我们不能不认识社会生存意力的伟大，和不断的为社会公众求生存的努力的伟大，不能认识真正的民生，一定是时时刻刻会被虚伪社会意力锁住，莫有坚强的为社会公众求生存的努力，也时时会被空理论迷住的。凡是我们的同志，是要确信真正党的指导者，是党的历史保障者，是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保障者，中国国民前途无限的生机，却是如此。国民党同志的毛病，是人人抱一种特殊的思想，而怀疑他人，怀疑自己，时而自己被自己的智识经验迷住，时而被自己的利害迷住，时而被不真确的民众意思迷住，时而被组织和纪律的意思迷住，时而被朋友感情迷住，时而被国家和民众的利害迷住，就会生出怀疑来，这种怀疑，只有确信总理之主义而决死，才可以胜得过他。然而这一个奉唯物教的共产党，他在党中来发挥一种特殊的理论，和人物的分析，立出许多派别来，对工农就教他只争自己阶级的利益，而不顾全体，对学生就使他只信马克思列宁而鄙言孙文，因为有了这一个癌肿在国民党内，年长日久，便成了割也割不得，医也医不得的大毛病。现在已经割了，国民党呢？在此刻只有下一次决心，和总理在二次革命后，创立中华革命党一样，完全从新作起，方才可以望好，不然前途的危险，是怎样呢？

> 官僚军阀坐收渔人之利，而帝国主义者，乘势进攻，国民党外抗帝国主义，内抗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力尽势竭，日趋危险，而中国国内，重陷于辛亥年因武汉南京之争而袁氏专政之现象，国际间则引起第二巴尔干战争之乱局，且至发生全世界人人所日夕求避免之第二大战，上海变为君士坦丁，而张作霖等于皇帝，数十年中，中国全国无干净土而完全陷入黑暗时代。

要避免这一大危机，只有全国一致的，在总理主义下面，造成一个青年的国民党，照着总理的主义去干，干成功了中国今天得救，就是中途失败，而留着一个失败的历史，将来中国的民族，也可以得救。成功的事业，是永远的生机，失败的教训，也是永远的生机。中国民族中有了一个孙中山先生，这就是中国民族得救的元素，只要全国的人，信仰孙先

生的主义，信仰他就是实行的起点，实行他就是成功的起点，决死就是解除怀疑的起点。我们认识蒋介石同志，这一次的护党救国，他是从许多怀疑当中，以决死去争出一条生路来，以决死去造出一个自信来的，过去两年间的忍耐和这一回的决心，是我们作人的模范，尤其是作党员的模范。我在总理死后，很辛苦地坚持着非中国国民党纯粹独立，则救国的责任，决负不起，但是受了二次代表大会的打击，而大多数的先辈同志主张，都是偏向一边，国际的压迫，又一天一天的强烈，便引起我自己的怀疑来，怀疑的结果，变成了极端的精神衰弱，这个结果，只是不能以死去争自信。现在国民党的自信回来了，我确信国民党当中，所有的派别，原因只在怀疑，怀疑的原因很多，而最大的要点，是在不能够确信中山先生的主义，在世界上是后来居上。更有一个问题，就是联俄的问题，俄国是欧战后一个新国家，他的地位，和一般帝国主义的国家，立于反对的地位，而且他是对于中国，最先取消不平等条约。总理当时主张联俄，就是为此。但是我们联俄的要义，是站在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上，不是和共产党一样的见地，而且我们决不能作第三国际的附属品。在过去两年当中，国民党对于联俄的问题，因为共产党的关系，变做实际和俄国没有交涉，对于第三国际的关系，更是完全受共产党间接的支配，国民党是一点莫有提出过什么要求和主张的。更有一层，俄国既然说是同情于中国的革命，援助国民政府，而两年当中，既没有和国民政府定过相互的平等条约，也没有和国民政府交换过正式代表。我们过去两年当中，因为自己的地位，没有巩固，不曾提出这个问题来，现在我们应该很明白地了解，俄国既没有正式承认我们国民政府，我们就无从承认俄国对我们的革命，有正确的了解和同情的援助。对中国取消不平等条约的不只一国，德国也和俄国一样，是战后革命的新国，而且他在中国一切的权利，都抛弃干净了的；最近墨西哥对于中国，也自动地废弃不平等条约。总理遗嘱上说，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奋斗，我们该要认清楚以平等待我的，不只俄国一国。要是真正以平等待我的国家，我们都应该提携，不是真实以平等待我的国家，我们应该反对，这才是立国的道理，才是争自由平等的路径。

我们看看，世界的形势，和东方的形势，我们晓得东方已经回复到一九〇四年以前的危机，同时世界也现出一九〇四年以前的危机，大有一触即发的形势。战争的必然性，虽然不能绝对的打消，但是可以相对的避免。欧洲战争后的结果如何呢？罗马诺夫亡，该萨亡，约瑟夫亡，一切战胜战败的国家，没有一国，不是受绝大的打击。可知战争是绝对的罪恶，以战争求国际的胜利，和对殖民地的压迫成功，这是一种妄想。英国现在所取的对华政策，是造成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恶因，和开英帝国倒溃的路，此外一无所有。其他的国家，如果和英国一样，也是自己造灭亡的路，无可疑的。我们中国为民族的利益计，现在的时期中，应该要努力唤起世界民众的注意，一致反对英日等国制造世界战争的政策，保持世界民众的利益。但是我们中国民众此时，要觉悟到我们要一致团结在青天白日旗下，予备不可避免的决死时代，时时存决死的心，努力作求生的事，中国的民族才可以得救。此后世界如果和平破裂的时候，中国人决不能象日俄战争和欧战时可以旁观的。

（原载《戴季陶文存》）

# 〔附〕清党之意义

（一九二七年四月）

胡　汉　民

中国国民党何以有这次的清党运动呢？要彻底明了其中的意义，必先要认清楚本党的使命，本党的精神，和本党的历史。

中国国民党最初的组织是兴中会，后来扩大为同盟会，民国初年改为国民党，二次革命后改为中华革命党，民国十三年才改为现在这个名称。

兴中会成立于前清光绪二十年。先生自传曰："余自己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定倾复满清，创建民国之志，……至甲午中东战起……乃创立兴中会，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应者寥寥。"又兴中会宣言曰："呜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附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我们再默念一下。总理遗嘱里所谓"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及"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的话，就可以了然总理自组织兴中会至于辞世的刹那间，始终是以唤醒锢塞的人心，并领导着他们去革命来实现三民主义以救国家的危亡，为自己的责任，同时也就是　总理付托给中国国民党的责任。

我们天天说革命革命，革命到底从那里来的呢？它不是从我们口中喊出来的，也不是它自己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应环境的需要，从人民的心窝里钻出来的。时代不仃地推进，文明踏着大步前行，人类的欲望和知识也似潮水般汹涌增长，而社会的制度却是万分顽固不灵，它不管你说什么自由平等，平等自由，它只是闭着眼睛，掩着耳朵给你一个不理。旧制度不适于新的环境，简单的理论不能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新时代的人物忍受着无穷的痛苦，冷酷的制度只是板着老绉的面孔。可是一朝有个绝顶聪明，勇敢无畏的人登高一呼，革命的火焰就爆发了。在中国，这个人就是我们的　总理孙先生。他不但敢挺身首先向旧势力攻击，把我们从梦中唤醒，他还根据着中国实际情状的需要，世界思想潮流的趋势指示给我们一条革命的道路，就是三民主义的道路。

革命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做得成功的，必须集合信仰相同的同志来共同奋斗，于是就有革命党，因为革命是以一切旧的腐败的思想和制度为破坏的对象，在初期革命的势力尚未充分养成的时候，那里敌得过那根深蒂固的旧的反革命势力呢？革命家在那个时期是时刻都有杀头的危险的。所以那个时候，敢来加入革命党的，没有一个不是极纯洁，极勇敢，不能成功就准备成仁的志士。这种人自然是用不着什么组织，什么纪律来范围，也可以同心合力去奋斗牺牲的。我们只看看兴中会和同盟会时候的精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死难之役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举动，岂是区区什么组织，什么纪律所能造成的？然而这种热烈的感情终竟是靠不住的，只能维系于一时，不能继续于久远的。曾经暗杀过这个亲王，那个将军，曾经参加过黄花岗之役幸而不死的同志们，到民国之后变节的不是也还有吗？无他，

一个人并不是一定要存心变节才会变节，敌不过环境的压迫，利禄的引诱，就会不知不觉地软化了。况且，纵然这少数的志士能始终不变，而革命的范围一天天地扩大，革命的战士一天天地增加，也一定要有极严密的组织，极整肃的纪律，才能把精神团结起来，把力量集中起来，把革命党的生命长久维系下去。

自民国以来，因为我们也常常占领着一块根据地，来和反革命的势力搏斗，有许多党外的人，甚至不少自己的同志，都以为本党是一个政党，和那些什么北洋派，奉系，直系不过是派别的不同并不是性质有什么差异。这真是荒谬之极！不要说这些直系，奉系，北洋派等等根本上还够不上叫政党，就是真正一个完全的政党也何能与本党相提并论？一个政党的根本信条是承认目前的现状。而本党第一个大前题就是要破坏目前的现状。这如何能说性质是相同呢？中国国民党并不是坐在议会里卖口才，博拍掌或是举票，乃是站在战场上为一种看得见捉得着的理想——三民主义——而用积极的行动去奋斗的革命党。我们可以更明白干脆的说，除掉了革命的精神就不成其为中国国民党，抹杀了三民主义也不成其为中国国民党。

我们说到清党这件事，翻一下本党的历史，就可以看见乃是常有的事。民国二年解散了国民党，另行组织中华革命党，是第一次的清党。总理自己说，是恢复民国前革命党的面目，而加以严格的训练，言外之意，就是不满意宋教仁把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引了许多腐败官僚，滑头政客进来，把同盟会的好分子也腐化了去，把活活的一个革命党，弄成个不生不死的政党。第二次清党，是民国十三年的中国国民党改组运动，这一次的改组运动，包含着几种非常深刻而重大的意义。第一，它把第一次清党的精神更加彻底地实现出来，毫不姑息地去掉旧的腐败分子，毫无限制地吸收新的青年学生；第二，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严秘的组织，和注重民众运动的新方针；第三，他重新确定了三民主义在本党的绝对性，和本党在中国的独一性——以党治国；第四，他在本党的历史上成了一个“托孤”的纪念，因为还没有等到第二次代表大会，我们的 总理孙先生就长辞我们而去了。

从上面的观察，我们可以归纳出下边这几个要点来：——

一、三民主义是孙先生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根据着世界思潮的趋势而创造的救国主义；中国国民党是为唤起民众及领导着他们去实现这个主义的革命党。

二、中国国民党无论名称如何更换，组织如何改变，而宗旨和精神是始终一贯的，不能更改的。他的宗旨始终是实现三民主义，他的精神始终是革命的精神。

三、中国国民党为完成他的使命起见，是不佇地在巩固他的基础，严密他的组织，整肃他的纪律，所以他随时随地都在清除他内部一切不良分子和各种的障碍。

现在再来观察这次的清党。我在前边说过，民国十三年的改组，加入了很多很多的青年，这里头有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当时就有很多同志怀疑：一个媳妇有两个婆婆尚且不易对付，何况一个人同时做两个主义不相同的党员呢？李大钊以是乃在代表大会中郑重负责当众声明，共产党徒是纯粹以个人资格加入来信仰三民主义，遵守中国国民党纪律，实行做国民革命的工作的。这无异是说凡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都是已经脱离共产党的关系。而且，实际上凡是共产党员入党也和普通人同样经过一样的手续；总理也始终未说过要对共产党员有什么优待。在总理的意思，以为革命乃是大家的事，救国更是匹夫匹妇的责任，这里头并没有什么权利可争，来的人自然都是诚意来革命来救国的，我们为什

么先要存着卑鄙的心理去疑心人呢？所以 总理虽未说过要优待他们，也着实替他们解释过不少的。并且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选，也给他们占了不少的席数，中国国民党对共产党员总算推心置腹，无以复加了。他们给我们的报酬是什么呢？第一，就是给我们制造了一批非常能干，又会看风使帆，又会吃西陂口沫的左派；第二，又给我们制造了一批五花八门的右派，新右派，新新右派，新军阀，新官僚，工贼，昏庸老朽，老朽昏庸等等，似乎中国国民党，除了这些就什么都没有了！几年以来，到处听见人说共产党把持我们的党部，破坏我们的基本组织，分裂我们同志的结合，如今看起来，真是一点也没错。拿各地清党以后的情形看起来就知道了。怎样的情形呢？党部是空虚的，民众是纷乱的，上下是不相连络的，这不是共产党那三种阴谋所造成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眼看着人家一面挖我们的心，一面吸我们的血，一面割我们的手足也不管吗？管就得清党。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我们的党呢？简单说：就是要救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破坏我们的党呢？就是要害中国。要救中国就得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要打倒这两个东西，第一步，就是北伐。我们要救中国，所以无论如何困苦艰难也要北伐；共产党不要救中国，所以无论如何艰难困苦也要破坏北伐。否则，当我们未出师以前，还可说是怕实力未足，徒劳无功；然而当我们已下湘鄂，定闽赣，出师东向，和孙传芳张宗昌数十万虎狼之师血战于沙场的时候，为什么偏偏要散布种种的谣言，什么英雄主义，个人独裁，什么军饷不清，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妥协等等来破坏军事领袖的信用，摇动前敌将士的军心？难道你们安坐武汉，才算是革命？难道你们断绝军需的接济，置十余万武装同志生命于不顾，就是提高党权？不错，几时国民革命军死绝了，共产党自然就会把国民党的党权和中山先生的遗象抬到历史博物馆的六层楼上去了，那自然是很高了！

共产党果然是真看得破。当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虎视眈眈，惟恐没有借口以实施他们武装联合压迫革命军，实力邦助军阀的时候，他还要不惜牺牲所谓他们的农工群众，大暴动冲入租界，给帝国主义者一个借口。本来在他们看起来，农工和国民党都不过是猫爪，国民党已可破坏，农工为什么不能牺牲呢？只要中国共产党能存在，中国四万万人死绝了有什么要紧？反正饿着肚子的俄罗斯人还多得很呵！中国亡了又算得什么？反正中国共产党还可以到俄国去呵！有人说，共产党是要实行马克思主义所以才破坏国民党，所以才阻止北伐破坏国民革命。如果真是这样，那到也不失为马克思的忠实信徒；可是他们的陈大领袖独秀先生却老实对吴稚晖先生承认二十年就要实行共产，纵然只是挂挂招牌！

本着我们已往的使命，本着我们一向的精神，我们能容这个破坏本党，牺牲国家，欺骗农工，背叛主义，只顾争夺私人权利的中国共产党？不能的！（不但是我们不能容它，凡是马克思的忠实信徒都应该起来打倒这个假共产党！）我们过去的清党只是把不良分子清出党外就完了，我们这次的清党是要进一步把共产的死灰都要送还给俄罗斯，不能让它遗留在中国的。干脆地说，这次的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

可是我们应该知道共产党全国的党员，据他们自己的报告说，不过八千，何以他以这样少数的人就能操纵把持我们各地的党务呢？这就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利用中央的威权，当谭平山当组织部长的时候，在各地先立下一个基础；一方面又利用各地的真正的土豪劣绅勾结着一切无赖分子。这样的上下包庇，就可以横冲直撞，闹得真正的良民避之惟恐不及，还敢来入党吗？各地的下级党部十有八九都是这种情形。这种党员不要说三民主义不能了

解，恐怕是连三民主义叫什么还说不出来。本来当初要他们入党的人，就只是想利用他们来投票，他们也只想要张党证来做护身符，或者还正不要本钱，乐得做个人情，他管你什么三民四民呢。我们要消灭共产党，非将他这个基础铲除不可。我们要清党清得干净，非将这班无赖分子，土豪劣绅，及一切不知主义为何物的党员，一概清除出去不可。不怕每个地方只剩下一个党员，甚至没有一个党员也不要紧。我们清党既不能单以党证为凭，也不能因为他没有共产嫌疑就算是党员，我们一定要以了解主义与否为去取的标准。说到打倒土豪劣绅，共产党叫得比谁都响，但是有好多是“土其所谓土”，“非吾所谓土”，“劣其所谓劣”，“非吾所谓劣”的，我们在这种地方一定要分别清楚啊！

我常常想，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五六岁的乳臭小儿，中国国民党却正当状年经验丰富有作为之年，论分子中国国民党多他百倍，论势力中国国民党也大他百倍，为什么倒被他这个小鬼捣得乱纷纷呢？虽说是人家挑拨离间的手段非常毒辣，然而上当不上当到底也全在乎自己。虽说很多是敌不过人家威胁利诱而上当，然而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对于主义没有彻底的了解，故没有坚决的信仰，所以也生不出一种力量来抵抗引诱和威迫，因此，今天以为三民主义是好的，明天也许以为马克思主义更好，后天或者又以克鲁泡特金的主义更好了。这如何能做忠实的党员？这样的党员如何能够团结起来？这样的党如何能不坍台？对于主义怀疑是顶要不得的，尤其是革命党对于自己的领袖和主义信仰不笃，真是革命党的致命伤。因为一生怀疑，就会变成反动。我敢武断地说一句，我们的同志，就是常在 总理左右的同志，也多半对于 总理只有绝对的敬仰，没有绝对的信仰；对于主义也只有口头上的赞许，没有真心的笃信。人人都以为 总理的见解也不过如此吧，我的见解也不见得比 总理差吧。甚至于站在领导者地位的人，也居然说得出我们只要努力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成功以后的事，可以不必过问。这成什么话！我要问问说这话的人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如果真是这样糊涂，那就连党员都不配做，不要说是领导者了！如果是装的，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要如此不光明？是怕；还是故意不说，来迎合某种人的心理？跟随 总理左右二十多年的人，还不免如此，何况一般普遍的党员呢？如何能怪他们不笃信 总理和他的主义呢？如何能念他们抵抗不住威逼和利诱呢？啊，想起罗马末年基督教徒信仰主义那种坚定不拔的精神，受了兽餐火烧种种奇奇怪怪的酷刑而至死不怕不变的精神，我们真要惭愧死了！所以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企图，就是要造成绝对统一的信仰。以我个人的经验，我深知就是处理一件很小的事体，我们的见解都还不及 总理。我们不但是要敬仰 总理，我们简直要绝对的信仰他和他的主义，甚至于迷信他也是应该的。吴稚晖先生说：六十年前中国会产生一个孙中山，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我们都应该有这种信念啊！譬如说到马克思主义适合不适合于中国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彻底理解自然最好，否则我们就应该相信如果是马克思主义能适合于中国 总理早就会采用了它，（那里还轮到陈独秀去当领袖呢？）不用呕尽心血来创造自己的主义了。我们须知 总理创造出三民主义来，不是为增光图书馆的，是要使它实现的，（如果照中国共产党的见解，是只有把三民主义放进图书馆去的。）而中国国民党就是要用积极的行动去促这个主义实现的革命党。但是党员先没有一个绝对统一的信仰，如何能有一致的行动呢？季陶说得好：“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我们这一次的清党一定要十分注意于共信之认识，互信之确立的，否则，虽然把共产党扑灭的干干净净，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

末了，我们要认清楚的，就是我们每次的清党，在行为上虽是消极的，而在动机和结果说却是积极的，进步的。中华革命党比国民党进步，中国国民党比中华革命党更进步，这是事实，不是空话。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希望，不但徒然希望而应切实去做到，清党以后的中国国民党一定比清党以前的中国国民党更好，更要进步。而且论理也应该是那样的，清党以前还有共产党破坏捣乱，清党以后这些障碍都没有了。做得到或做不到全靠我们了。我们要紧紧记着：清党不只是要把共产分子，投机分子，土豪劣绅清除出去，并且要是把：

本党的忠实同志团结起来！

本党的基础巩固起来！

本党的工作表现出来！

本党的精神发扬出来！

本党的使命完成！

本党的主义实现出来！

（原载《胡汉民言行录》，1931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

# 〔附〕反映资产阶级动向的几个材料

（一九二六年）

## 一　全国实业界应要求蒋介石宣明态度

汉口为南北枢纽，政治关系，姑置不论，经济地位，实可会聚长江黄河两流域之势力而支配之；非可以僻在西南一域之广州，所能比拟。今一旦为蒋军所据，政治上将生若何之变化，吾人且观其后，而与民生关系密切之经济上，恐即有不测之动摇，迫在目前。故全国实业界，咸有踌躇不安之色，恐慌难言之状。所以然者，蒋军对于经济政策之态度，极为不明耳。赤俄之政治政策，表面上一以解放为主，反对帝国主义之侵略；经济政策，表面上一以共产为归，反对资本主义之存在。蒋军之政治政策，固尚鲜明；而经济政策，极为暧昧。谓为赤化也，则广州尚未闻资本制度之废除；谓为非赤化也，则广州咸传为劳工势力所支配。暧昧不明，高深莫测。当其据在全国经济关系较浅之广州，实业界尚有观望之余闲，一旦奄有全国经济关系极深之武汉，实业界已无从容之余地。故吾人以为全国实业界有急起要求蒋介石宣明态度之必要。就其大者言之，究竟蒋介石之经济政策，是否仿照赤俄，抑或别有所在？如仿照赤俄，将以其旧政策为模范耶，抑以其新政策为模范耶？如别有所在，其以共产主义为主义乎，将以资本主义为主义乎，抑介二者之间别有新政策

乎？要当以具体方案，昭示全国，不得仅以“民主主义”空泛无边之四字，依违取巧于其间。就其小者言之，在广州之劳工政策，将推行于长江流域乎？对香港之封锁政策，将采用于全国商埠乎？吾人以为时至今日，实业界有正式要求蒋介石宣明之必要。吾人非欲于此时与蒋介石讨论共产主义之是非，乃欲先问蒋介石之主义安在？而加以讨论耳。赤化也可，非赤化也可，其他具体之新经济政策亦可。吾人甚盼蒋介石予实业界以明白之答复。勿以鲍加在侧而踌躇，勿以英日嫉视而趑趄，始终持暖昧不明之态度，而作依违两可之宣言，使天下后世笑蒋介石之革命，一无政策之可言也。连年战祸，遍于全国，民生困苦，十室九空，农废于野，工嬉于市，内地生产，已无可言；而通商大埠仅存之实业生机，亦不绝如线。苟内争不已，战事缠绵，初不得共产主义之来，先经此非共产主义之蹂躏已可摧残净尽。乃于此时，据有支配全国经济势力之武汉，复入于主义暧昧不明之方，致使生产机关，进退失据，莫知所可。国计民生之危险，未有甚于此时者。故吾人为实业界设想，不必畏蒋介石如虎，尽可堂堂皇皇质问其政策安在，而思补救之方。勿庸一方疑其赤化，一方又幸其非赤化也。为蒋介石设想，勿以为天下人可欺，始终暧暧昧昧，含糊其真意所在，而失鲜明之度，致疑一方畏赤俄绳其后，一方俱英日障其前也。实业界之勇气若何，蒋介石之诚意若何，将试观此文发布后之收效若何。且吾人更有言者：外交公开，已为世界有识者所主张，亦为民党有力者之宿论。究竟广州政府与亦俄生若何之关系？人言言殊，举世忧之。为国家计，凡为中国人，皆可要求蒋介石代表广州政府为之说明。为广州政府计，亦不应蹈专制政府之复辙，举国家公然之外交，作一政府私有之秘密。使天下人士战栗恐俱，疑内争为外战，日日以为国际纷争，将起于目前，而发生国家种族上莫大之危险也。（前溪）

（原载《国闻周报》3卷36期，
1926年9月19日出版）

## 二 劳 工 运 动

国民党自民国十三年改组以来，容纳共产党分子，于是劳工运动，占党中工作之最大部分。广东工潮，日不绝书。其初为工人与资本主义之争，其继则工人中左右派之争。党军入湘入鄂，所谓工潮也者亦随其势力以蔓延。于是社会骚然，人人危惧，惴惴于无产阶级独裁制之将施行于中国。自吾人观之，于兹思想混沌，战火正急之际。一方主持劳工运动者，挟其方张之势，破坏惟恐不极，利用劳工运动者明知逾越范围，于己不利，而形格势禁，遏止又有所顾虑。一方反对劳动运动者，则茫然不知所以应付之道。强者则乞怜于实力派，不知助长军阀，适以促进赤化。弱者则呻吟太息，悲观躲避，不知怯懦畏事，适以召侮致祸。须知德国革命之后，有斯巴达古斯特党者，强暴正与俄国共产革命等，然其扑灭之者德之民众也。匈牙利战后亦尝有共产党革命之事，然不数日而失败，亦民众反对之结果也。意大利工业地米兰等处亦尝发生工人占领工场之暴举，然乘时崛起，号召民众，以恢复秩序，致成今日汛西士党专政之功者固当时民众之力也。中国之民性久伏于专制淫威之下，良懦而缺乏抵抗力。故虎而冠者往往横行于乡里；而不谈政治，不问公事者，乃自诩为乱世明哲保身之绅士。今之厌恶工潮畏俱工潮者，其心理正与向来厌恶军

阀、畏惧军阀相等。放任一久，劳资固同归于尽。而主持工潮之新青年，与利用工潮之新军人，将共受其害而生噬脐不及之叹。为今之计，第一在要求党军首领表明其全部经济政策，与其对于劳资关系之真见解。第二在赤裸裸公开说明中国经济事业之险象，与夫国际经济压迫之真相，以及经济破坏后对国家国民之影响。第三在使学生工人了解欧美劳工运动之历史，与欧美劳工生活状况，及其技能效率，并社会组织之所以不同于中国者安在，使知盲从附和有损无益，且翻译式之劳动运动亦终无在中国长久立足之可能也。

（原载《国闻周报》3卷46期，
1926年11月28日出版）

## 三　武汉工潮感想

自党军统治武汉以来，工潮汹涌，不可响迩。依物理定则而言，压力与反动力为正比例，压力愈大，则其反动亦如其量。当北军秉政之日，对于劳工阶级，不无过渡之抑压，则党军入主之后，其反动自亦难免逸出常轨之外者。汉口工潮，首发难者，为外侨家宅之佣工，原因虽属要求加薪，性质却含对外反抗，故不能以单纯罢工视之。据昨日沪汉来电所述，则各种事业之工人，显有总罢工之倾向，而南浔方面亦渐有波及之虞，汉口罢工事件中，尤以印刷工潮为最足令人注目。吾人姑就兹事，略述所感，以告工人。

罢工为工人维持生存权之唯一武器，在现代资产制度之下，自有难免于使用者。然唯其为武器也，故用之不能不慎。譬彼利刃，欲保其锋，须善藏之。必其对象有可用之价值，而环境又有不能不用之趋势，而后始勉用之，庶不至滥用，徒缺锋刃，自失其作用。我国工人之团体的训练，尚乏经验，而罢工之意义，亦多未能了解，故往往为野心家所利用，盲从附和，一若罢工结果，工人终属有利者，何不思之甚耶？在我国今日产业制度之下，苟工人不知劳资双方所处之地位，动以罢工要挟资本家，则收其利者，尽为外国帝国主义者矣。

我国产业之能勉强支持者，寥寥可数。外受列强之侵占，内感资料之缺乏及技术之拙劣，劳资通力合作，奋斗苦斗，犹恐不易防守国内之市场。若劳资更立于敌对地位，则任何事业皆将立见败坏，而充斥吾市场，吸收吾骨髓者，悉为外货矣。故居今日而谈劳资问题，只可合作，不可敌对。劳资宜联立于一方以对抗外国资本家，不宜分立于两方以分散吾一致对外之实力。就劳资之广义的意义而言，则中国人皆工人，外人始为真正之资本家。外国之劳资问题为国内的性质，中国之劳资问题，则为国际的性质。此理一明，万事皆易得其正当解决之道。

今日我国资本家待遇工人，自多不备。亟待改良者，必属不可。当此工人知识日益发达，生活程度日益增高之际，则资本家之对待工人自亦不能一若曩昔之以生产机械视之者，为理势所必至。资本家倘仍维持从前政策，则工人之起而反抗，亦天赋生存权之所命也，故吾人希望资本家自动的尽量优待工人，务使工人所得足偿其所劳，而工作之余，且有修养之暇，则工人精神知识发达，间接所增进其能率及技艺者，自属不鲜，而最后仍为资本家之利。资本家苟能放大眼光，从远处大处着想，凡工人在合理范围之请求，皆力谋有以满足之之道，则劳资之纠纷，较易妥协矣。

此次汉口印刷工人提出条件，详见昨报。考其内容，实属失当。我国报业，尚极幼稚。综观全国新闻，真能营业独立者，寥若晨星，除上海一二家报馆年可获得厚利外，京汉港粤各处，似只有数家不至亏损。汉口报纸销路尤狭，即广告亦未能发达，若照工人所提条件，一一承诺，则承诺之后，亦只有即日关闭而已。……

工人虽以罢工为贯彻要求之后盾，然其要求必能博社会之同情，始有获得最后胜利之可能。若不问要求是否合理，动以罢工为要挟，则其结果未有不失败者也。以英国工会势力之伟大，基金之丰富，有时因要求太过，社会群起而抵制工人，工人终亦不能不屈服，而与资本家谋谅解。足见罢工虽为最有效之武器，而用之不得其当，亦将见其刃折锋摧而已。武汉工会近始成立，内部组织既未完备，储藏基金亦必有限，假使报馆宣告仃刊，则工人反有失业之忧。其不能不让步，盖极明显。报馆为宣传文化机关，与其他产业，大异其质。工人以此对待报馆，吾知社会之上能表同情于工人者，舍有政治作用外，必无其人也。今日我国工人知识程度，尚不足以言组织，无可讳饰。工潮发动之内幕，必有人焉，为之操纵，亦难掩盖。吾人所欲正告若辈者，指导工人可也，利用工人则不可也。各国工会之发达，最初必有知识阶级中人为之谋主，已成必经之阶程。唯步步须为工人自身利益打算。处处须从产业前途发展着想。无产业便无工人，有工人方有产业，二者形影相依，不可分离。既不可因产业而奴使工人，亦不可因工人而破坏产业。工人与产业能互守其界，始能成两利之局。而工人能否在正当轨道之上，谋其合理之生存，责在今之指导劳动运动者。苟使工人走入歧途，则劳动运动之前途，不堪设想矣。（渊泉）

（原载1926年11月28日北京《晨报》）

# 〔附〕上海商业联合会①致电蒋介石庆贺并表示支持清党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

“南京蒋总司令并转中央执行监察委员诸公钧监：窃维革命告成，建设随之。不图共产党只知破坏，阴谋暴露，事实俱在，幸当局未雨绸缪，俾免亦祸蔓延，此商民所感慰者也。顷读吴稚晖先生呈请清党呈文，益见当局具有扫荡反动分子之决心。诸公此次列席会议，解决国是，在兹一举，可否之间，关系甚巨。敝会一致议决愿与三民主义相始终，对于当局清党主张愿为后盾。谨此电闻。”（十七日上海各报）

（原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人民大学出版）

① 上海商业联合会包括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交易所联合会、纱厂联合会、运输公会及染织布厂联合会等六十余团体。——编者。

# 〔附〕江浙财团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

## 一　概　　说

中国有代表性的财阀，一般认为是所谓"浙江财阀"。我们的前辈对于浙江财阀有过如下的说明。

第一、主要以上海为根据地的浙江籍的金融业者及实业家的总称。这是一种狭义的解释。按照这个解释的浙江财阀，又分为籍隶宁波、绍兴等地的浙西邦和籍隶南浔、湖州、嘉兴、杭州等地的浙东邦。

第二、主要以上海为根据地的江浙两省的金融业者及实业家的总称。这个解释比起第一个解释来是广义的，按照这个含义，也许称之为上海财阀或江浙资产阶级更贴切些。

第三、凡以上海为根据地而进行活动的金融业者和实业家，并包括财界、政界的巨头，不论其籍隶浙江、广东、江苏或其他省分，统称之浙江财阀。按照这个含义，与其称之为浙江财阀，倒不如称之中国新兴资本团阀更为切合实际。一般人所说的浙江财阀都是指这个解释的含义而言。

以宁波邦为中心的江浙乡邦的同乡集团，形成了上海资产阶级，形成了浙江财阀。这个财阀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是上海城市的发展；第二、是江浙各地的土著资本积聚和集中的发展；第三、是担负国民革命任务的浙江军阀的发展。所谓上海城市的发展，意味着随着中国殖民地近代化，上海成了买办城市，同时也成了工业城市。在这个过程中，起了最重要作用的是以宁波邦为中心的江浙各乡邦的土著资本，而江浙各乡邦土著资产阶级的发展，到了1927年，很容易地就促使以蒋介石为首的浙江革命军阀右倾了。到此，所谓南京政府和浙江财阀的联合势力成长起来了。

（李公绰摘译自山上金男：《浙江财阀的基础的考察》，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

## 二　从金融活动开始

初期的江浙财阀，其性质，在于地方性的及基尔特性的。是总括的对于浙江（所谓浙江，并不专限于浙江，可以说是浙江、江苏，或者说，不论地域，凡是在上海的都包括在内。）在上海的实业家的集团的称谓。所谓财阀，也并不是指"财阀金融资本，康采伦"，或者高度资本主义国家的独占形态的财阀。

浙江财阀的特征是：他从买办资本发生而以民族银行资本为骨干的，就是银行资本家的集团。例如：上海市商会的构成分子，最主要的是银行业同业公会，当1934年，公会代表21人中，浙江占10人，江苏占9人，湖南及安徽各1人；看了这种事实，也便可以明白了。

那么，这样的银行资本集团，是如何形成的？这集团形态，向如何的方向发展，关于这，王承志在中国金融资本论中，有过详细的分析。

中国的银行，有着好几个银行集团，而所谓江浙财阀，在商业界、金融界掌握着最大的权力，其地位也比其他财阀为优越。实际上，所谓江浙财阀，只是在上海金融市场角逐的一部分人，可掌握着金融上的权力，而无可与匹敌者。

从实际情形上来分析，除了有超然地位的各银行之外，国内各商业银行，从其性质及动态上来看，可分为南北东西的四大财阀。这四大财阀反映于实际上的，便是各地华商银行的分布状态及消长盛衰。

华南财阀，在福建、广东及南洋方面活跃，握住华侨金融的枢纽，负着疏通南洋侨胞与祖国的经济关系的命使。华北财阀是20余年前的新兴势力，当北京政府时代，居金融界的领袖地位，其发展的迅速冠于全国银行，而利用联合营业的优势，给各方面以威胁。迨南京建都，金融中心是由上海独占了，这种活动，也渐渐的移到江苏、浙江、安徽方面，于是，与华东财阀的营业竞争，互作秘密的策略，表演白热化的战斗。华东财阀，即江苏、浙江、安徽的当地人银行，一方面有着长久的历史，且得地利、人和，最初是在上海建树基础。及国民政府成立，其势力日益增大，成为其中坚的便是有名的所谓江浙财阀。至于华西财阀，因为诸银行设立的日子浅，实力上也较逊，且其活动偏于四川一隅，所以，不能成为一大势力。

中国的银行业，除与政府有关系的之外，实际上，华北、华东两财阀，为左右全国金融业的骨干，而两者的中坚，即所谓“南四行系”及“北四行系”。

华北财阀，分为直鲁系与北四行系。属直鲁系的，有边业银行、东华银行；属于北四行系，为盐业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及金城银行。

华东财阀，分为南四行系（也称南五行系）、宁波系、安徽系。属于南五行系的，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及浙江实业银行。属于宁波系的，为四明银行、通商银行、垦业银行。属于安徽系的，为中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

华南财阀分为福建系与港粤系。属于福建系的，为华侨银行、中国兴业银行；港粤系的，为四海通商银行、广东银行、东亚银行及国民银行。

属于华西财阀的，为聚兴诚银行。

所谓“南四行系”，只是金融界习惯的名称，并没有具体的组织。四行系，是在江浙区域最活跃的分子，不但有长久的历史，而且其财力的巨大，也压倒其他各银行，成为“江浙财阀”的领袖，自成一个系统，成为中国金融界最大的势力。

据以上所述，江浙财阀的势力及其地位，已大体可明白了。

形成中国近代的民族资本的基础，是前清末年以来的“官僚资本”，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培养出来的所谓“买办资本”。这两者，随着中国的资本主义成长而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民族资本的形态。因此，所谓江浙财阀，从其产生上来看，是买办资本的集合，尤其是当地人银行资本为其骨干，

那末，为什么在中国，未见产业资本的发达，而只见银行资本发达的呢？换句话说，江浙财阀（以民族银行资本为骨干）为什么能够成立，能够发展的呢？这，当然，是由银行资本与政府资本相结合而成立发展的。其虚伪的繁荣是建筑在对于公债及地产的投机事

业上的。并不是由产业发达而蓄积资本的，而是由于参与政府的公债政策及地产交易的投机事业上的；就是，与生产事业毫无关系，单单由于资本的流通以膨胀资本，而作虚伪的积蓄的。江浙财阀的膨胀，在于与政府公债的关系。

（《重庆灵魂的浙江财阀》《中国内幕》第三种1941年4月，新中国报社出版）

如说中国财阀，则江浙财阀当居首位。事实上，它有支配的权威，故本篇研究，以江浙财阀为中心；同时兼及于财阀之全貌。江浙财阀，是以金融资本为中心之财阀。上海为江浙财阀之根据地。兹先研究上海之金融发达史。

上海，1842年依南京条约辟为商埠，在英租界设立当时，可视为金融机关或财阀者，惟山西票号而已。然此山西票号，因外国银行之设立，银号或钱压业之簇起，国内新式银行之发达，其势力，不久即行消失。

兹先述钱庄之发达。统计光绪初年之最盛时，南京北市合计，业此者有400以上，此种钱庄业，形成上海金融界之支配的势力。此等经营人大部分因地域的关系，多出身自宁波，绍兴、苏州、镇江等处。

迄光绪7年（1881年）中法战争勃发之际，财界极其动摇与混乱，遂一时减为20余；惟媾和条约成立后，复增加至百余。然经过此次之创期的动摇，结果，钱庄业发生显著的变化，今日之所谓江浙财阀之基础，即筑于此时。

当此动摇期，出身于浙江、江苏之钱庄业者之对立势力加以淘汰；苏州、镇江等之江苏系遂为绍兴、宁波之浙江系所压倒，而居于次位。此种势力淘汰之原因如次。

第一、宁波、绍兴系之金融业者，数量方面无条件的较江苏系为优越。

第二、上海开港时，浙江系先与外商交易，而蓄积有巨额资金。

第三、上海钱庄业屡遭变故，辄受影响，变化层出，其主要原因如次：

（一）光绪20年，因营口市场恐慌之影响，即中日战争，旅顺、大连、营口之天宇号钱庄相继倒闭；上海金融界亦受影响。

（二）光绪24年起，宣统元年止，有橡皮股投机之反动。

（三）辛亥革命之影响，当辛亥革命勃发时，全国震动，上海北市之钱庄业，激减之余，为数不到五十。

（四）此后，上海金融市场逐渐入于安定时期，后虽有欧洲大战及世界恐慌，然其安静状态亦未变化，惟此不过为相对的比较说法，因世界恐慌之深刻化与国内经济之崩溃，遂致钱庄之危机不可避免。然此事瞬息万变，本编未能为详细之调查。

惟此之际，宁波、绍兴系之执此业者，着着进展，而确保其独占的地位，不容忽视。

其次，就国内新式银行加以考察。新式银行与钱庄业立于对立的地位；国营者，如大清（中国银行前身）、交通两银行创设当时，其代表人物为焦乐山、倪锡畸等，悉为镇江系人物。四明银行为纯粹民营银行，由上海宁波出身之朱葆三、孙衡甫等巨商所经营；此金融机关尝被目为宁波、绍兴系之根据地。浙江兴业银行因建设浙江铁路（现在之沪杭甬铁路）而创设，其实权操于宁波系之盛竹书、叶揆初之手。浙江实业银行民国元年创设，当时为官商合办，其后归民营；以李馥荪为中心，而形成所谓浙江系之主要金融机关。

此等国内新式银行，自清末迄民国初年，其势力并不如浙江系钱庄势力之巨大，乃周

知之事实；民国以后，逐渐增大而有今日之状态，浙江系曾将上海之土著新式银行之大半收归其掌握之下。关于浙江金融财阀发展之原因，可举如次之各项：

（一）民国初年以来，上海财团之有力者多为浙江系。且政治的势力亦多为其所把持。民国初期，上海都督陈其美（浙江吴县人），为浙江革命党之首领；其势力在上海风靡一时（蒋介石当时不过为彼之参谋）。被目为浙江财阀中心人物之张静江（浙江吴兴人），现为国民党之元老。曾任财长的宋子文，其原籍亦属浙江（宋子文原籍海南岛，但有些人却以为他是浙江人，是不确切的——编者）。上海财界之耆宿而曾于民国16年任国民政府署理财政部长的钱永铭（原籍上海人），其他如王正廷（浙江吴兴人）等等，不胜其数。此等人物，对于江浙财阀今日势力之育成，曾有极大之功劳。又上海财界之中心为江浙财阀之干城的上海总商会；其它闸北商会、上海县商会、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钱业公会等，其实权皆操之于江浙系人物之手；例如，严筱芳、周佩箴、朱葆三、宋汉章、傅筱庵、虞洽卿、方椒伯、沈联芳、王晓籁、王一亭、钱永铭、张公权、虞文溥、秦润卿等，即其代表者。

江浙系资本家，早已跻于本国之资本家的先锋地位，而业已具备积极活动之条件。

（二）江浙金融界之此等有力者，由共存共荣之见地，以横的结合，而努力确保其独占的支配势力。因此，彼等历代与军阀勾结，而努力获得其政治的权力。例如，上海都督陈其美下台以后，与北京政府要人结托，尤其与梁士詒一派合作。孙传芳为五省联军总司令时，亦与孙结托，更国民党北伐以来，完全收握于自己之掌中，负担国民政府之公债，而其势力亦反映于政体上矣。

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入民国后，其初握实权之镇江系资本家之势力，次第转换为江浙系，宋汉章、钱永铭、盛竹书等为中心干部，由江浙系人物经营，事实上形成江浙财阀之地盘了。

又，民国17年，宋子文财政部长创设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也完全由江浙系人物占据，是不待言。此等特殊重要银行，既为今日江浙财阀之重要中枢机关，其支配的独占地位益可了然。以上略述上海金融界之发达，江浙财阀之发展小史，亦一瞥之矣。同时，江浙财阀之为金融财阀之就里，更为窥其梗概矣。

兹概观上海各种企业之发展，而简单探寻财阀角逐之迹。

## 三　江浙财团与企业关系

自1842年，上海开辟为商埠以来，不久即为对外贸易之中心地。先从商业部门，或原始产业部门观之。输出贸易之重要者，丝、茶居首，次为毛皮、茶叶、木材、杂粮等。

在上海最初掌握生丝海外输出者，系外商属下之广东买办，然因地理的关系，其支配权次第归于浙江系；今日浙江湖州人，已夺得其利权。

茶业之经营，亦由广东人着手。至于现在，广东系亦尚保持优越势力。安徽系次之；江苏系、浙江系，近来渐次抬头，但不及广东系。

毛皮、药材等，系浙江系所占有，杂粮、油类等，江苏系、浙江系互相角逐；但江苏系稍见优势。

其次，输入贸易方面，金属、染料、棉布、棉纱、砂糖、机械、杂货等外国输入品之经营，数十年来，为宁波人绝对独占，逐年有增长之势。

工业方面，自然可以说全部是轻工业。轻工业之主体为制粉、纺织。

制粉业。斯业之最初设立者为阜丰面粉厂，30余年前，由山东巡抚孙家鼐创设于上海。继起者，有中兴、华兴两粉厂。现在营业状况较佳者，唯阜丰厂而已；中兴、华兴早已合并于福新面粉厂，由无锡人荣宗敬所经营，上海有7个工厂、汉口亦有分厂，可谓中国制粉界之支配者。

纺织业。光绪14年，盛宣怀创设三新纱厂，是为创始者。该工厂，民国元年以后，为革命政府所没收；民国2年，登记为英国籍。欧洲大战之际，遭遇历史的发展期，乃周知之事实，振华、申新、永安、大中华、华丰、溥益、纬通、厚生、统益、恒大等各工厂，约计70万锭。现在占优势者，为广东系郭乐、郭标等所经营之永安纺织公司，与制粉界之支配者荣宗敬所支配之申新纱厂；宁波系、江苏系、湖南系等，亦有相当势力。

制丝业。约在40年前，创设于苏州河畔一带。当初为湖州系所支配；十余年来，其霸权，移于无锡系；近时土著制丝业，陷于绝望的不振，然占有支配的地位者为无锡系。

机械铁工业。其势甚微，为宁波系所支配；当初不过为小规模旧式工场；最近七、八年以前，大隆机器厂设立以后，斯业方踏进新式化之第一阶段。工厂主严裕棠，支配人及其他皆宁波人。

造船业。南市有求新造船厂，20余年前，由上海系之朱志尧所创设；今为中法合办。

烟草业。有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中国兴业烟草公司、华成烟公司等。南洋、中国兴业、华成公司皆属于广东系。其余之大小烟工厂多为浙江系之投资。

## 四　各行业人事调查

海运业——开始最大者，为现国民政府管理之招商总局（事实上为浙江系，今后益增厚其色彩），此外，最有力者为三北轮船公司与宁绍轮船公司。此两者均属于浙江系，宁波、绍兴系。

一、三北轮船公司——创设者为浙江财阀之台柱虞洽卿。所有汽船，为凤浦、伏龙、宁兴等，合计20只；最大者2,700吨，最少者1,700吨。平均二千二、三百吨。

二、宁绍轮船公司——创设时由上海之宁波、绍兴出身者所经营，与当时独占上海之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相对抗。现在之船只，为新宁波（2,200吨），绍宁（1,900吨），甬兴（1,400吨），经营宁波、长江航路。主权者为上海著名之实业家袁履登，宁波人。

制糖业——上海之砂糖业者，大小五、六十家。最大规模者为厦门之黄炳记、祯祥、日兴行、黄日兴、聚德隆等18家；均为华侨出身所经营，办理爪哇直接输入。

与厦门邦对抗者，为宁波人方氏经营者，即元益、元裕、元惠和、方本和元泰恒、裕大恒等10余家，非特与爪哇，且与日本之贸易亦甚大。方椒伯、方稼荪为方氏之代表，为上海财界著名之人物。此外，镇江系之元和、仁和、广源，虽亦为第一流，但不及厦门、宁波系。

海味行——大小有50以上，大部分为宁波系之经营，资财约10万两。设立于新开河之东盛公、东源、源记、震新等，最著名。

米谷油业——最大者称为“行”或称“号”，约20家，主要者集于南市豆市街。小者，南北市无数。资财上10万两之大者，大抵为上海人之经营。其中宁波甬江出身者李氏之新丰行最有名。但于此等之经营中，金融关系非常重要，因今日与浙江财阀有不可分之关系；“行”“号”之经营主，上海系多；支配人、职员多出身于宁波、绍兴。

酿造业——大规模者，在上海南北市百余家，小者无数。

最主要者为福建路之张崇新酱园，与新闸路之张振新酱园，均有百万两以上之资本。浙江系张逸云（先代）之开设者约有70余家之酱园，受其支配、店号“张”者，为张家单独经营。标“万”字者，为间接共同经营。完全处于独占状态。

调味粉业——张崇新酱园张逸云（浙江人）13年前资本金20万元；法租界菜市路，创设天厨味精厂，为中国制造“味之素”之头一家。不久，程龄孙（安徽系富豪）投资50万元，开设中国振泰公司工厂于法租界。

其次，宁波人方液仙（砂糖主方椒伯之甥），原为天厨味精厂发起人之一，创设中国化学工业社于小沙渡。

民国15年，叶墨君（杭洲人）与孙春荣（宁波人）共同出资创设天一味母厂于韬明路集贤里。

药材行及药店——合计2百数十家。大部分为浙江系。主要药材行，在南市咸瓜街；如元丰润、元大、元升、日新盛、裕大等（最大资金四、五万两）。大药店，如蔡同德、胡庆余、王大吉、奚良斋等，资金二、三十万两。

人参业——上海参行，大小有4千余家。南市咸瓜街为中心市场，殆全部为宁波系。阜昌、元昌、阜大、德昌等最有名（资本约五、六十万两）。

颜料业——约80余家。大半为浙江系。今日上海之主要颜料业者，均大战当时获巨利者。如瑞康盛（宁波系贝润生经营）、咸康润（宁波系薛宝润经营）、恒丰昌（苏州秦涵琛经营）、德昶润（镇江系丘省三经营）等，资金四、五百万两。二、三流者，资金约有10万两，现状尚好。

棉花业——上海从事于棉花业者，合花行或花号，共计60内外。轧花厂10余家，花行上海系最大；花号汉口系占优势。宁波、余姚、南通花号次之，其资力，大者有五、六十万两。纤维产业，一般浙江系居于劣势，然自金融关系则构成密切的支配关系。

轧花厂之最大者为益泰顺记（厦门路），系浙江薛文泰之经营。

纺织业——纺织业浙江系方面比较不振，今试述与浙江系有直接关系者如下：

一、大丰庆记纺织有限公司——资本金150万两。宁波纺布业界之巨头徐庆云，与上海钱庄业界有力者秦润卿之共同经营。

二、厚生滋记纺织有限公司——资本200万两。宁波系颜料业主薛宝润与贝润生共同经营。

三、振华利记纺织有限公司——资本30万两。宁波系薛文泰经营。

四、振泰纺织有限公司——资本80万两。宁波系朱葆三经营。

五、崇信纺织公司——资本150万两。宁波系邵声涛与苏州吴麟书共同经营。其中有英国资本。

六、华丰纺织有限公司——资本200万两。由王正廷、钱永铭发起，但现在由日华纺

纱厂所经营。

棉纱业——大小百余家。江苏系与浙江系立于对立关系。广东系、四川系次之。最有势力者为益大号。系江苏系吴麟书所经营。资本500万两。次为福大号(宁波路)与宗德号(天津里)均为浙江系。前者为徐庆云(资本300万两)所经营,后者为邵声涛(资本百万两)所经营。

棉布业——大小300余。以办理日本制品与英国制品为主。大者百万两内外。第一流者为五、六十万两,第二、三流者约10万两。

最著名者,为杭州系,陈、步两姓所经营。法租界公馆马路之日新盛、日新增(以上为陈晋轩所经营),协祥、小东门之恒丰(以上为步翰承所经营)等是。资本百万两。宁波系万成永、源茂盛(以上南京路)、正大(天津路)等,稍有逊色,资本50万两。此外,宁波系徐承恩经营之裕康、裕春等,亦属相当。

又兼营棉布业与染织业者,有达丰染织厂、纶昌染织厂,主要出资者,万成永号之店主李学畅,其他大部主要之棉布商亦为该工厂之股东。

制丝业——上海制丝工厂约有五十余家,大抵非自己之工厂,多系从他人贷借而经营者。

规模最大者,约有五百数十釜,最少者二百釜内外。其流动资本极为贫弱;最大者,不过20万两内外。故原料之购入,工场之经营,必须有金融界之通融。

经营人无锡系最多。次为浙江。最有力者为湖州系沈联芳。

次就生丝商加以考察。特别有力,称为丝栈者20余家;为湖南系经营者如泰康祥、同康泰,宁波系者有宝元祥。

绸缎业——大小200余。苏州系以外,殆为浙江系湖州、杭州、绍兴与宁波系。其中著名者,为南京路之老九章,小东门内之阿福昌及悦昌文等杭庄(杭州绸缎店),资本四、五十万两。现已组织绸缎银行。

五金业——即金属制造关系者,大小百六、七十家。大半为浙江系、宁波系叶氏经营之新顺记、老顺记、新顺泰(各100万两左右)最有名。最近占势力者为瑞昌顺(宁波系杨氏经营)、顺利(宁波系徐悉顺经营),凌驾乎老顺记等,资本约百万两。

锡、钢铁业——大小100余,宁波系占半数。资本四、五万两左右,实力雄厚之利昌铁号(宁波系戴耕集经营)、可织铁行(宁波陈学昌经营)、宏永锡号等比较著名。

银楼——南北市60余家,有大同行(一流之老铺)与新同行(二、三流店)之区别。大概为宁波系经营。

大同行特著名者,裘天宝、老凤祥、杨庆和、方九霞、费文元(以上在南京路)等是;资本三、四十万两。新同行10万乃至20万两,彼等亦经营金融事业。

石炭业——上海煤炭商大小200余家,大抵为宁波系、绍兴系所占。主要如下:(一)义泰兴煤号,开业以来已有26年。绍兴系杜家坤为最大之股东。杜氏死后,因嗣子杜启明年少,由经理沈锦州监督之。资财300万两左右,为上海石炭业之巨子。(二)源泰煤号,宁波系刘鸿生经营,为开滦矿务局之买办,系与开滦煤矿之有力连结者。为上海煤炭界之第一人。资本800万两内外(三)源记煤号,为浙江绍兴系韩蕻根所经营,与刘鸿生齐名,资本约300万两。(四)此外,泰记、裕昌、元一、人和新、三和新、升和集等,资力20——30万两内外。

(原载《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册)

# 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

中国共产党完全赞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罢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除党籍和拿办的决定。

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现在决不能容许他再留在国民革命的党内了，决不能再信托他当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了。他反叛国民政府，他谋推翻国民政府，这个革命的叛徒值得国民政府最严厉处分的。工人阶级是极端拥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去肃清内部一切反动分子和战胜国民革命的敌人的。

国民党内部的冲突，结果采取了这种严厉而且必须的对付蒋介石的行动，这是有很深刻的社会意义的。这不是一个人违叛党国，违叛革命。蒋介石与他的党羽是代表国民党内与党外一种社会成分。国民党自从改组后，成了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的革命党。可是资产阶级甚至反动的封建分子仍然留在党内。直到如今，这些分子总是设法使国民党脱离革命的道路。于是发生了内部斗争，这斗争趋向于解决以下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国民党应该变为一个阶级的党或者是一个人民党——就是，国民党的政纲与政策应该依照上层阶级（大资产阶级与封建分子）的利益而决定，或者依照被压迫剥削的大多数的民众而决定。这就是随着北伐发展后，国民党内严重危机的社会背影。

上年三月二十号的政变，国民党内资产阶级与封建分子推翻了广州革命的民主政权。他们得到政权后，于是计划依照他们阶级的利益去领导革命。为着要巩固他们的政权，于是破坏拥护国民党革命派的群众组织（进攻工农运动，解散党部等等）。

群众拥护北伐，为北伐而牺牲，以求发展革命，资产阶级与封建分子却认为是夺得更大权力的道路。但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的进展，发动了伟大的革命势力，使国民党之资产阶级与封建派发生恐慌。很显然的，北伐的胜利有取消三月二十号政变的危险。群众反抗封建与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拥护三月二十号被推翻的国民党中的革命派。于是国民党内封建资产阶级的右派与革命民主的左派之斗争遂厉害起来了。

国民革命军达到长江流域后，已经危害及帝国主义的基础。很明显的，帝国主义是不能不用公开武装斗争而根本让步的。帝国主义一方面与国民政府协商租界问题，一方面准备武装干涉。国民政府要能够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军阀之联合势力，必须发动广大的群众自觉的起来拥护，只有他们的力量的牺牲是革命唯一的保障。换句话说，民族主义的中国必须建设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的政权。这个意思就是国民革命应该首先是一个农民革命。

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若不经过农民革命，革命的民主主义的政权是不能够建

设的。法国农民拥护拿破仑二十年，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对于农民给了一个改善的办法。在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各省，农民运动如野火一般的散布起来。如果国民政府能根本改革农民数千年来所受之奴隶境遇与痛苦，国民革命就有了真正的保障。——国民革命军将更成为不可抵御的势力。法国农民邦助拿破仑战胜封建的欧洲。中国的农民将拥护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使中国脱离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统治。

农民革命是与国民革命不可分开的。但是在现在的中国情形之下，农民革命是与封建分子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仇视的。农业既为中国之基本产业，农民既为主要的生产阶级，因此农民便成为一切剥削的目的物——封建、帝国主义与资本家的剥削。所以国民革命再进向前发展便需要一个农民革命，这种事实已经是很明显的。国民党内的革命派承认这个必要，而国民党内的封建资产阶级分子却感觉他们的地位动摇了。他们企图领导革命向别一条道路走去，结果必致与反动势力妥协，向帝国主义投降。他们宁可出卖党的主义，污辱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出卖整个的国家，而不愿减捐他们的阶级利益。蒋介石所代表的就是国民党内之反革命的封建资产阶级分子之反革命的倾向。自从三月二十号以后，他就举起这些分子的旗帜。等到他不能够将整个的国民党变为封建资产阶级之反动的工具时，他就与国民党宣战了。如果民族运动不照着这个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的资产阶级所企图的那条路走，他们就不迟疑的要分裂他，叛逆他，不犹豫的与军阀帝国主义勾结以镇压他。蒋介石便代表国民党党内外的封建资产阶级分子做出了这些事实。

国民党决议将蒋介石免职开除党籍，拿办，这个意义就是国民党宣布在他的行伍中之封建资产阶级分子已经反叛革命，应该公认为敌人，为国民革命之完成与最后胜利计，必须战胜这些敌人。这个决议案是表现随着革命之发展而发展的阶级分化之一个时期。共产党坚决的拥护这个决议，因为无产阶级坚决的要巩固革命的民主政权，而且是民主革命政权的主干。

蒋介石与封建资产阶级已向国民党宣战，他拿工人阶级做进攻的第一个目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极凶恶的向江西、浙江、安徽、南京、上海、广东、福建的工农大肆屠杀。共产党成为他最仇恨的目标，蒋介石知道，除非破坏工人阶级组织的力量，左派的政权是推不翻的，民族运动是不能作为封建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的。无产阶级方面也明白蒋介石不过是反革命的封建资产阶级的刽子手。消灭蒋介石须要战胜国民党内外之封建资产阶级。假使蒋介石所代表的反革命的社会力量一日不消灭，那末打倒一个蒋介石之后，难免不有更残忍更流血的蒋介石之继起。

封建资产阶级分子以前勉强的同着国民革命走，现在已经跑到反革命的营垒里去了。蒋介石新军阀已经成为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国民革命的新工具。封建资产阶级抢不着民族运动的领导权，遂想分裂国民革命党，设立一个对抗的党部与政府，用民族主义的假面具来出卖党出卖革命，勾结反动军阀，与帝国主义妥协。单是开除蒋介石，但还没有根本取消这个危险。他还是要想设立一个对立的国民政府。不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他仍然还是带领很多军事势力。他想欺骗民主主义的民族分子，散布反对武汉的谣言，说国民党已经成为共产党的工具。他以及他所代表的阶级已经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他还想用阴险的造谣手段，来混乱这个情形。

开除蒋介石党籍之后，蒋介石主义的根芽还可以在所有国民政府领土内找得着。这就

是反动的社会阶级——地主土豪劣绅等，只有国民革命用激进的农民改革政策，才能消灭这些势力，使蒋介石主义衰弱下去。从前封建资产阶级分子跟着国民革命走，所以策略上尚须有步骤的发展阶级斗争。现在他们已经采白色恐怖屠杀政策宣布阶级战争了，那末任何策略上的顾虑都不能阻止向反动的阶级的进攻了。这是推翻新军阀蒋介石，破坏他设立对抗的“国民政府”的企图，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的联合势力之最有效力的唯一方法。

打倒蒋介石——封建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代表，帝国主义的工具！

打倒军事专政！

革命民主主义的联合万岁！

无产阶级农民与中等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原载《向导》194期，1927年5月出版）

# 第三国际代表团宣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中国革命很快的发展，已使得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更加锐利了。国际帝国主义因用间接的行动——即经过中国国内的军阀——而阻碍革命胜利进行的失败，他们于是决定用公开的武装干涉。实际上不仅上海已被帝国主义占领，即许多内地的重要地方，特别是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业已在可怖的大队军舰恫吓之下。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威胁。帝国主义强盗们要中国人民降服在他们枪炮之下。英美法意日送交国民政府的共同通谍上，罗列了许多不能接受的条件。设若这些条件都得顺从，那末国民政府不啻宣称，中国的主人翁不是中国人民而是外国帝国主义了。国民政府虽然已经给了那盛气凌人的哀的美敦书一个很合理的——实在是过于通融的——答复，但是这尚不足以平帝国主义的愤怒，他们宁用暴力，而不愿采取如国民政府所提议的提交国际联盟的办法。国际联盟是掩饰帝国主义掠夺政策的遮蔽物。可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掠夺政策业已彰明较著，所以他们连这样掩饰的遮蔽物，都是不要的了。

中国国民一定要以革命的联合战线，来对付帝国主义这样进攻。在国民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对于革命势力的目的和指挥的统一，从来没有象现在中国这样的重要。但是在国民党内部由蒋介石所领导的封建资产阶级的分裂却在这个时候，破坏了国民革命势力的统一。蒋介石这样的做法，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们，已变成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的工具。事实上，是因为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的中央政权，和企图分裂国民党的势力，才鼓励了帝国主义采取进攻的态度。蒋介石要在南京设立一个所谓对抗的“国民政府”，这是他反革命行动的最高点。他这个行动，较之他从前许多的非法行动（如三月事变攻击国民党中的革命派，在江西九江之压迫工农运动，企图建设他个人的独裁制，以及最后屠杀上海工人），尤为不可宽恕。我们看到蒋介石和他的代理人们一切非法行动，是异常愤激的，但是还希望他对于从国民革命，而转变到公开叛逆的道路，尚能稍事犹疑。在国民革命这种很严重的时期维持统一战线，是很要紧的，便是凡系从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他们一切的罪过，都可暂时宽恕。但是封建资产阶级自私的利益，不仅是和工农的利益相反，并且是和整个人民的利益相冲突。结果，蒋介石，于屠杀江西和上海等处的工人以后，他的罪恶还未能宣告结束以至继续发展，而达到背叛人民的政党和人民的政府的最高点。现在蒋介石已经是民族的叛徒了，惩罚他必须和惩罚叛徒们一样的利害。

他是惯用这种手段的：自称忠于国民党，而将分裂的责任归诸中央执行委员会——来欺骗人民。我们判断他这是一个无耻的诳语。当蒋介石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冲突日渐利害的时候，蒋介石曾请求第三国际代表团去见他，在我们动身去看他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接到一个消息，说是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几位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开了一次会，并宣言武汉

联席会议系使党分裂的企图。我们立刻打电报给他，请他仃止会议，并履行他在上海和汪精卫同志所订的协商，便是把一切争论的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来解决，蒋介石本人也应当参加这个扩大会。在这个电报中我们又告诉他，如果他接受我们的忠告，我们一定去见他，以便讨论在帝国主义进攻时期，我们保持革命势力统一的方法。他没有答复我们的电报，并继续进行他破坏党的计划。

当我们宣布蒋介石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屠杀工农的凶手，和民族的叛徒的时候，我们要请中国人民注意一件事实，就是□并不是个人或某几个人叛党，而是一个整个的社会阶级离开了国民革命，并且转过来反对国民革命。我们不仅应当推翻蒋介石和他的屠杀助手们广西军等的霸权，并且所有全国的封建资产阶级分子，都应当扑灭净尽，应当铲除蒋介石主义的发源地。仅仅到上海南京去进攻蒋介石还不够，我们在每个乡村每个城市中都要向他的势力进攻，扑灭封建制度权力和反动资产阶级。铲除蒋介石主义的根株，这在国民革命发展中的最近阶段上，要算是主要的工作。在国民党领土中，巩固革命民主势力联合战线，绝不至做象封建资产阶级分子的阴谋和背叛所给与国民革命运动的那些危害一样。因封建资产阶级的背叛和蒋介石新军阀反革命的行动，已经使帝国主义列强获得了威吓国民政府的机会。至于乡村和城市的势力之联合（就是无产阶级农民和中等阶级），乃是拥护国民政府，使他抵抗帝国主义的进攻，并且使国民政府能在民众上面巩固国民革命的基础，而发展国民革命。这样国民革命便能脱去反动分子背叛的危险，而获得战胜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保证。

打倒蒋介石主义！

打倒反革命的封建资产阶级！

打倒帝国主义！

国民政府万岁！

国民党万岁！

第三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团

# 〔附〕关于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经过报告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

徐　谦

徐谦：在二月廿一日由扩大联席会议开会，决定结束临时联席会议，同时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即日开始办公。现在再追溯临时联席会议之经过，自去年在广州政治会议议决

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移武汉以应革命时势之要求，先推定国民政府四部部长（外交、财政、交通、司法）以及一部分国民政府委员先来武汉准备，自十一月十六日由广州出发，此为第一批出发同志，于去年十二月一日到南昌，与蒋总司令及其他同志见面后，即到牯岭开谈话会，讨论外交、财政、军事各问题，对迁鄂问题皆认为甚重要必须从速准备，数日后谈话会终了，第一批同志于十二月十日来到武汉，武汉同志及各民众团体皆热烈欢迎，皆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决定迁鄂完成革命使命而为众知众晓，但经过四、五日后，各种重要问题因无中央机关皆不能办，国民政府各部虽已到达武汉，而因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未到，无指导机关，无法开始办事，且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同时于十二月五日在广州宣布停止办公，如武汉亦不能办事，则中央政府势将中断，不但办事困难，且恐发生危险，当时同人在此开一谈话会，于此会中各同志均认为非有一临时办法则政治必将停顿，故决定将此谈话会改为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鄂开会以前执行最高职权，即刻通知成立并订定组织法，以为决定应付重要问题之机关。所定出席人数未能扩大，以中央执行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及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汉口特别市党部、湖北省党部代表各一人为限，于十二月十三日成立，并通电报告联席会议所以必须成立，系站在革命利益上，是应付革命需要与时局之发展，因国民政府在粤已停止办公，如武汉方面又不能办事，必致所有重大问题陷诸停顿，反革命之宣传得以乘机鼓簧，政治未免有时虞发生危险之可能，故联席会议必须成立。南昌方面蒋同志得电后，亦认为重要，并复电赞成。后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第二批人员于去年十二月七日自粤出发，于十二月卅一日到达南昌，初临时联席会议本认为不过两周即可终了，方谓中央一到便可结束，讵知一月七日接南昌密电，忽有决议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暂驻南昌。联席会议认为如此办法，外交、财政及其他种种大事件皆易动摇，且当时正占领汉口英租界，如中央又迁南昌，非特英方以为畏缩，且将使民众大失所望，故联席会议得电后正在秘密拟电南昌同志解释不可驻南昌之理由；而外面报纸则已宣布此电。同时复因"一三"惨案英水兵之残杀民众事件发生，当时武汉革命民众并不怕帝国主义之凶狠，民众之聚集愈形扩大，当时联席会议接到此种报告，咸认必须为人民报仇雪耻，在办法未定之先二十四小时以内，中央必决定办法使人民满意，由大会公推本席与蒋作宾同志前往晓喻，正英水兵露其兽性惨杀民众之时，睹此情形不胜悲愤！当时宣告民众，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等危险，并于廿四小时以内政府决定办法，必使人民满意，于是群众欢呼立即撤退，英水兵亦不敢再肆兽性，英租界内不致再发生屠杀之事，并由英租界当局请求派兵保护，政府立即允求，派出得力军队与党代表指挥，接受租界群众尤十分满意，对中央信任愈臻巩固。此时群众皆有组织能进能退，英人遂不敢再有动作，且请求保护租界，当时一发千钧之时，一班民众均认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改驻南昌之提议，殆有惧怕英人之嫌疑。及后南昌来电谓联席会议改湖北政治分会，当时亦曾召集一临时会议，讨论结果认为政治分会为一省指导政治机关，此间应有代表中央之机关庶几政治外交，不感应付困难，因武汉为革命中心地，若复在南昌设立政府便为两个中心，应付收回英租界事亦复困难，佥认政治分会暂时无庸成立，应电催促南昌中央委员赶紧前来武汉。旋复接南昌来电：仍要求联席会议毋庸继续，当时恰开会，立时宣告改谈话会，在讨论时均认有继续之必要，并须请南昌速来，由何香凝同志主席。即蒋同志之来鄂视察经各团体之宴请，在席上经民众之一致要求迁鄂，蒋同志经公

并承认，蒋同志到联席会议出席并提出议案，认为有续开之必要。蒋同志回南昌后，曾有一决议，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地址决定在武汉，于二月七日开始前来，谭祖庵同志来电谓十四日后即可全部到汉，但迄未到来。按临时联席会议为应革命之需要，因南昌之停顿，以至开了两个多月的会，决议案二百数十件之多，其中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亦甚多。联会将结束时发生第十五军与汉阳兵工厂工人之冲突，第十五军士兵打死工人几至全体罢工，又是时联席会议已闭会，无人负责，形势甚急，后来多数工友遂至本席家中要求答复，本席立即电话卫戍司令部会同厂长令工友停止罢工，并惩办第十五军滋扰兵士，此皆临时想不到事之突然发生，故联席会议对外之收回英租界，对内之保护一切公安皆须负责。南昌同志十六日、廿一日皆不能来，临时联席会议又不能永远开下去，于是廿一日召集执监扩大会议，经本席及外部报告后，一致表决承认，良以本席与陈友仁同志之报告，联席会议实有成立之必要，所以维持革命进行，任谁也应对联席会议有相当的同意。后孙科同志提议，结束联席会议，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即开始办公，但南昌同时又有决议，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暂仍在南昌办公。试问现在是党的决议有效，是个人的意思有效？如认不能服从个人，就应该一致的拥护党，在南昌革命军日报第一十五期蒋同志演说：联席会议，非法，违党章，与西山会议有何分别？须知党章是应革命的需要而产生，西山会议是反革命，联席会议是革命，将革命看反革命，那末反革命不是倒成了革命吗？我们不能将党的问题牵涉到个人的问题，今日党的制度须改正，为一班的要求，非对个人，即党与革命不能客气，个人错误要改正，个人自由，党不自由。本席报告联席会议是应革命的需要，请同志评判！是不是为党奋斗，请主席对此应有决议。

附注：本文摘之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第二次速记录。

## 〔附〕纪国民党中央第三次执行委员会议

（一九二七年三月）

三月十日至十七日国民党开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于汉口，对党务、军政、外交、财政、农民问题，均有许多非常重要之决议，兹分叙如次，以供留心时事者之参考。内中农民问题特别重要，下期本报当以专篇详为纪录，并加评论，本篇从略。

一、会议撮要：国民党中央党部实行迁鄂后，即于三月十日，在汉口南洋大楼，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七日开予备会一次，八九两日，开提案委员会，十日始行正式开幕。蒋介石原有到汉之说，后竟不至，张静江亦未来，李烈均则由九江至汉口中途折回，并未出席，惟谭延闿自南昌来，盖与国民党内部问题有关也。第一次会议于十日午后一时开会，出席委员三十三人，主席团公推谭延闿主席临时报告事件二项。（一）徐

谦报告，武阳夏及汉口特别市全体党员代表大会代表孔庚等五人，到会请愿十一条，全部接纳。（按请愿内容不外巩固党权等项）（二）徐谦报告，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会议成立原因及其经过。决议，对于去年十二月中，在武汉成立之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现虽已结束，所有议决案，本全体会议，认为继续有效。以上两报告毕，依照议事日程：（一）讨论第七条，"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第十五案并案讨论。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计条文八条，完全通过。（二）讨论第八条，"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大纲计六章二十四条，完全通过。八时散会（两案条文录后）。第二次会议于十一日午后二时开会，出席委员二十八人，主席团公推孙科主席，依照议事日程，改选各项委员。（一）改選常务委员九人案，当选者，汪精卫等。（二）改选中央各部长案，当选者，组织部长汪精卫等。（三）改选政治委员会六人案（按政治委员为十五人，其中九人，为新选之常务委员，故只选六人，并指定政委中七人为主席团。），当选者宋子文、陈友仁等。主席团当选者，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四）新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案，当选者，蒋中正、谭延闿、冯玉祥等。主席团当选者汪精卫、谭延闿、蒋中正等。（五）改选国民政府委员案，当选者，汪精卫、谭延闿、于右任等。八时十五分散会。第三次会议于十三日午后二时开会，出席委员三十二人，主席团公推徐谦主席，临时报告三项：（一）黄实报告代表朱培德，述明赴前方在即，未能出席原因，并述朱培德绝对拥护全体会议决议案，并盼立刻施行。（二）林祖涵报告江右军前方战况，并称已于十二日占领东梁山。（三）决议由国民政府通令严缉付小庵。以上报告事毕，即依议事日程讨论案件，议决如下：（一）统一革命势力案决：（甲）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立开联席会议，讨论合作办法。（乙）本党应第三国际之邀请，即派代表团三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接洽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二）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组织大纲案，交付审查。（三）国民政府增设各部案，决增设劳工、农政、教育、实业、卫生五部。（四）修正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通过。（五）内蒙古国民党问题案，审查报告，据内蒙古党部代表包悦卿来鄂请愿意义有三点：1、保存内蒙古国民党名称。2、与本党联合组织，3、受本党之指挥，通过。（六）外蒙古国民党关系案决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选派驻外蒙古库伦代表一人，并电外蒙古国民党，速派驻中央所在地代表一人。第四次会议于十四日午后三时开会，出席委员二十七人，主席团公推顾孟余主席。总司令部军需处长临时出席报告总司令部北伐期间收入支出概算状况，及三月份所需军费之数目，并呈请自三月份起，各军经费，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支给等情。宋子文报告，关于军费支配，已予备提案，十五日提出讨论，经众讨论结果，组织予算委员会。关于自三月份起军费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给事，电总司令蒋，俟军事委员会成立，本月底当可实行云云。次依议事日程讨论九案，录两要案如下：（一）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案，由常务委员会赶速筹备，从速决定召集日期。（二）取消违法选举之各省市党部，选举另行改选案决。广东省党部江西省党部广州特别市党部执监委员选举，违背总章，应交常务委员会从速改选。最后主席提议闭会时间问题，一致议决于十六日闭会，所有重要案件，统于十五、十六两日，讨论完毕。时已八时，宣告散会。第五次会议于十五日午后三时开会，出席委员二十七人，主席团公推谭延闿主席，丁超五临时报告□阳惨案详情，并请全体会议处理，议决组织委员会，指定邓演达、吴玉章、毛泽东三人为委员，与湖北省党部、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省农民协会开联

席会议，迅速处理之。次依议事日程讨论案件如下：（一）关于党员服兵法征集委员案，议决指定谭延闿、孙科、徐谦为委员。（二）土地问题案，邓演达临时动议改为农民问题案，议决交付审查。（三）对农民宣言案，议决与前案并案审查。（四）请拨款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案，议决交常务委员会。临时提案如下：（一）以财政部长兼江苏财政处长统一财政案，议决通过。（二）湖北省党部惩治土豪劣绅条例，及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条例，议决批准。（三）总政治部组织大纲审查案，议决通过。（四）裁撤中央军人部案，议决通过。（五）关于特别党部审查案，议决通过。（六）任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案，议决通过。九时散会。第六次会议于十六日午后二时五十分开会，出席委员二十七人，主席团公推孙科主席。将前次修正未决之案，提出表决如下：（一）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全体党员训令，议决通过。（二）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全国民众宣言议决通过。（三）修正农民问题案，议决通过。（四）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全国农民宣言，议决通过。（五）省民会议通则，议决保留。（六）修正湖南省民会议组织法，议决补入省民会议通则重要各点，再付讨论。（七）由外部严重抗议新嘉坡英警惨杀华侨案，议决通过。讨论至此，时已九时，尚有要案多件未决，顾孟余临时动议延会一日（原定十六日闭会），主席付表决，通过，遂散会。第七次会议于十七日午后三时开会，出席委员二十九人，主席团公推徐谦主席，讨论案件如下：

（一）陈其瑗辞商民部长，请改选案，议决通过。王法勤以十一票当选。（按陈其瑗当选后，因何香凝指摘其与廖仲恺被杀案有关，故辞不就职。）（二）审判贺德霖案议决交政治委员会，组织人民审判委员会以反革命罪条例审判。（贺于十五日在汉口被捕，事后经当局宣布谓贺于三一八惨案北京政府阁员，应负责任。）（三）英水兵在芜湖登陆案，议决由外交部提出抗议。（四）湖南省民会议大纲案，议决通过。（五）湖南省民会组织法案，议决批准，并决定五月一日召集。（六）统一财政提议案（提案委员会提出七项原则），议决通过。（七）统一外交提议案，决议通过。（八）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计七条），议决通过。（九）关于军事政治学校之提案，议决通过。（十）关于组织堤工经费之特别保管机关案，议决通过。（十一）中央执行委员萧佛成，在暹罗一切措置，违背党章，请予处分案，议决停止萧佛成中央委员职权。主席团临时提议，时间过晏，主张议事日程所列第七至第十案，交常委员办理，议决通过。（按第七至第十为中央工人部提出。）（七）为扩大工人运动。请求将工人部每月八百元之活动费，增至一万元案。（八）安徽省临时执行委员会请在纪念费项下划拨总理逝世二周纪念预算二千五百元案。（九）妇女部何香凝同志提出：1、本人以六个月办党，六个月办仲恺先生纪念学校，请假期内，以韦增瑛同志代理，请批准，否则愿辞中央妇女部长职。2、请接济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经费。（十）吴玉章同志提议，实行中央各省联席会议增加党费决议案，其支配预算，交常务委员会决定案。遂宣言举行闭会式。

二，新选干部，兹观本届干部改选案及名单并得票数如下：

1、改选常务委员九人案，按照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常务委员应依党章不设主席，此次中央执委全体会议，应即互选常务委员九人，负责执行党的主要事务，决议通过。选举结果，当选人计汪精卫（二十一票）、谭延闿（二十票）、蒋中正（二十票）、顾孟余（二十票）、孙科（二十票）、谭平山（二十票）、陈公博（二十票）、徐谦（十九票）、

吴玉章（十九票）。

2、改选中央各部长案，此次中央党部各部，因事实上之要求，须由中央执委全体会议全部改选各部长，以便整理党务，议决通过。选举结果，当选人计组织部长汪精卫（二十一票）、宣传部长顾孟余（二十票）、农民部长邓演达（十八票）、工人部长陈公博（二十票）、商民部长陈其瑗（八票）、妇女部长何香凝（十九票）、海外部长彭泽民（二十票）。

3、改选政治委员会委员六人按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政治委员会设委员十五人，其中九人为新选之常务委员，其余六人，由中央执委全体会议互选之，并指定全体政委中七人为主席团，决议通过。选举结果，当选人计宋子文（二十一票）、陈友仁（二十票）、邓演达（二十票）、林祖涵（十八票）、王法勤（十九票）、孙宋庆龄（二十票）。

4、新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案，按照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案，应由国民革命各军队高级军官中，选委员九人，另于中央执委中选委员六人，并推定七委员为主席团，决议通过选举结果当选人计蒋中正（二十一票）、谭延闿（二十票）冯玉祥（二十票）、唐生智（二十一票）、程潜（二十票）、李宗仁（二十一票）、何应钦（十九票）、李济深（二十一票）、朱培德（二十一票）、张发奎（二十票）、汪精卫（二十票）、孙科（二十票）、顾孟余（十九票）、宋子文（十九票）、徐谦（十九票）邓演达（二十票）。主席团当选人计汪精卫（二十票）、谭延闿（十九票）、蒋中正（十八票）、唐生智（二十票）、程潜（二十票）、邓演达（十九票）、徐谦（十六票）。

5、改选国民政府委员案，现在国民革命进展，已有统一全国之可能，武汉形成革命之中心，国民政府应时势之要求，迁移至鄂，武汉即为革命时期之首都，于此时期，实有扩大国民政府内容，集中全国革命势力领袖之必要，应即改选国民政府委员若干人，组织国民政府委员会，并指定常务委员五人决议通过，并增加决定。（一）国民政府委员之任免，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执行之，但在全体会议闭幕时，当由常务委员会任免，惟须于下次全体会议提出追认。（二）决定委员二十八人，选举结果当选人计汪精卫（二十票）、谭延闿（十九票）、于右任（二十票）、程潜（二十票）、孙科（二十票）、李宗仁（十九票）、黄绍雄（十四票）、徐谦（二十票）、蒋中正（十六票）、宋子文（二十票）、朱培德（十八票）、李济深（十八票）、唐生智（十八票）、冯玉祥（二十票）、陈友仁（十九票）、顾孟余（十八票）、谭平山（十九票）、孔庚（十五票）、杨树庄（十一票）、柏文蔚（十六票）、钮永建（十六票）、何应钦（十五票）、彭泽民（十四票）、经享颐（十四票）、孙宋庆龄（十五票）、王法勤（十六票）、吴玉章(十六票)、陈调元（十一票）。

按此次改选之先。国民党干部人物如下记诸人，对照观之亦足供研究也。

甲、中央执行委员会

1、常务委员会

一、委员长：蒋介石。

二、委员：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蒋介石、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

三、候补委员：顾孟余、李济深、何香凝、于树德、彭泽民、王法勤、丁惟汾。

2、委员（定额三十六名）

汪精卫、谭平山、谭延闿、蒋介石、胡汉民、宋庆龄、陈公博、恩巴克图、于右任、程潜、朱培德、徐谦、顾孟余、经享颐、宋子文、柏文蔚、伍朝枢、何香凝、丁惟汾、林祖涵、戴天仇、李济深、李大钊、于树德、甘乃光、吴玉章、李烈钧、陈友仁、王法勤、杨匏安、恽代英、彭泽民、朱季恂、刘宋中、萧佛成、孙科。

3、候补委员（二十四名）

白云悌、毛泽东、许苏魂、周启刚、夏曦、邓演达、韩麟符、洛友宇、黄实、董用威、屈武、邓颖超、王乐平、陈嘉祐、朱霁青、丁超五、陈其瑗、何应钦、陈树人、褚民谊、缪斌、吴铁城、詹大悲。

乙、中央监察委员会

一、常务委员：张静江、高络罕、邓泽如、古应芬、陈璧君。

二、委员：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古应芬、李石曾、邵力子、高络罕、柳亚子、陈果夫、陈璧君、邓泽如。

三、候补委员：黄绍雄、李宗仁、江浩、郭春涛、李福林、潘云超、邓懋修、谢晋。

丙、政治委员会

一、主席委员：汪精卫。

　　　　代：谭延闿。

二、委员：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伍朝枢、孙科、谭平山、朱培德、宋子文。

三、候补委员：甘乃光、林祖涵、邵力子、陈公博。

丁、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机关

一、组织部：部长，蒋介石。

二、宣传部：部长，汪精卫。

　　　　代，顾孟余。

三、军人部：部长，蒋介石。

四、工人部：部长，胡汉民。

　　　　代，陈树人。

五、农民部：部长，甘乃光。

六、商民部：部长，宋子文。

七、青年部：部长，丁维汾。

八、妇人部：部长，何香凝。

九、海外部：部长，彭泽民。

戊、国民政府

一、审议机关

国民政府委员会

主席委员：汪精卫。

　　代：谭延闿。

常务委员：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伍朝枢、古应芬。

委员：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伍朝枢、古应芬、许崇智、张静江、徐谦、朱培德、孙科、程潜、戴天仇、张继、于右任、宋子文、邓泽如、李宗仁、黄绍雄、蒋介石、李济深、李烈钧、唐生智、蒋作宾。

二、行政机关

外交部：部长，胡汉民。

　　　　代，陈友仁。

财政部：部长，宋子文。

军事部：部长，谭延闿。

交通部：部长，孙科。

司法部：部长，徐谦。

军事委员会：主席委员：蒋介石。

常务委员：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

委员：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朱培德、伍朝枢、程潜、古应芬、李济深、李宗仁、黄绍雄。

大会成绩，据三月十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会之日，谭延闿主席宣称，本会议原规定每三月一次，只因北伐委员分散工作，不及召集，故此次会议，其意义乃较前重大，吾党军事，固属有莫大进展，而党政方面问题，尔来极形严重，吾人适见武汉民众如此热烈希望，可知普遍民众需求革命之急，因此，全体会议须担负起此项责任。党内问题之发生，以吾人以往之经验，乃知系组织之不良。全体会议于此须当注意，同人本着党的精神，继续努力，巩固的力量，发扬党的权威，必可达到云云。因此之故，此次会议最重要之工作，如巩固党之组织，提高党权。现于该会议发表之时全体党员训令，可以窥见者内幕，兹节录如下："在此种困难环境之下，最使吾人忧虑者，乃本党内部组织根本之缺陷，本党自去岁以来，党内即多纠纷，中央执行委员会因外虑反动势力之强诺，内恐革命势力之分裂，屡次迁就事实，冀图能集合一切革命分子，以保全中国微弱之革命根基，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之集中个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党的指导，而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此种制度，弊害甚多，不但使党内之昏庸老朽分子盘踞于内，官僚市侩及一切投机分子乘机而入，因此纵成个人独裁军事专政之误谬，妨害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政治上之权威，形成党内投机腐化之倾向，且亦使军事呈纷争复杂之象，而不能收整齐统一之效。盖国民革命军至于今日已扩充至四十余军，非有党之最高机关以绝对的权威，统一指导，决不能在名义上与实际上悉纳于国民革命军统系之下也。且各地党部亦间有参杂投机分子为士绅把持，与民众隔离之错误，与本党集中革命民众之旨，背道而驰，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深感目前本党之危机，认为必须有切实挽救之方法，方足以付全国代表大会之重大委托。故详慎考虑，决定使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此等议案，乃为适合中国革命之需要，将借此以防止党内投机腐化，与个人独裁军事专政之倾向。中央委员会毅然出此，乃基于民主集中制之观点，对封建势力奋斗，决非对个人有所爱憎，且坚决反对一切因个人爱憎而处理党务之行为，因以个人爱憎而处理党务，即违反民主制度之原则也。

根据上述原则，因决议：（一）除工厂及军队外，不得设立特别党部，已设立者均须取消（如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等特别党部）。（二）甲、工厂及产业工人之特别党部，依其性质范围，分别隶属于各该地区之党部。乙、军队之特别党部。丙、须该军已有各级政治部组织，及连政治指导员与党部组织，经中央审核认为完备者。戊、省军可设立特别党部，但须隶属于省党部。（三）特别党部，关于全国代表大会及各级代表大会之代表选举，在选举法中另行规定，此外又通过统一党的指导机关案。其条文如下：

第一条　依照本党总章，全国表代大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每年开会一次（但临时会不在此限），行使最高权。

第二条　全国代表大会闭会后，党的权力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每三个月开全体会议一次（但临时会不在此限），行使最高权，对全国代表大会负责。

第三条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前后两会之间，由全体会议互选之常务委员九人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对于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除党务直接处理外，交国民政府执行之。

常务委员于次期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会时终了其任务。

第四条　关于执行党务之日常工作，由常务委员互选秘书三人组织秘书处处理之。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得开扩大会议，通知在开会地之中央执监委员及候补中央执监委员列席。

第六条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军事委员会之组织大纲另定之。

第七条　政治委员会，以常务委员会全体委员及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之中央执行委员及后补执行委员六人组织之。

国民政府部长虽非政治委员会委员，应得列席政治委员会，但无表决权，政治委员会委员中，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指定七人为主席团。

第八条　政治委员会，对于政治问题，议决后，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执行之。

复因裁抑军人专制独裁之弊，议决裁撤中央军人部又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如下：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军事委员会设立之目的，在巩固国民政府统治下之疆域，扑灭国内反革命武力，以谋全国统一，并筹划国防，使不受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军事进攻之危害。

第二条　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行政机关。

第三条　军事委员会有管理全国水陆空兵力及军事制造机关之权。

第四条　军事委员会因负战事准备之责须采取适当方法，并加以适宜之指导以强固水陆空军事之战斗力。

第五条　军事委员会规定国防军之数额、组织法及设备，并管理军事教育事务。

第六条　军事委员会得规划新军队之组织。

第七条　军事委员会规定军队之制度，及所需军械之数量与种类，并购办军事制造机关所需之机器及材料，此项机器及材料如向外国购买时，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

第八条 军事委员会分配兵工厂自造或向外国购买之军械于各军队。

第九条 军事委员会制定维持全国军队所需，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一切军事教育机关及中央总政治训练部之予算，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分配中央执行委员会核准给发之款项于上开军队及机关，并监督用途，须为合理之支出，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决算。

第十条 军事委员会管辖并养成水陆空干部人员及高级军官并军事技术人才，现有或将来开办之各种军事学校，及一切军事教育机关，均须受军事委员会之管辖。

第十一条 军事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所议决之重要议案及办法，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方生效力。已通过之决议及办法，由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交军事该管机关执行之。

关于军队之政治训练，另定条例办理。

第二章 组织

第十二条 军事委员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于高级军官中，选出委员九人至十三人，并于不任军职之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选出委员六人，共同组织之。

第十三条 军事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平时一月开会二次，战时至少每两月开会一次。

第十四条 全体委员会议以有全体委员的半数之出席为法定人数。

开会时至少须有不任军职之中央委员三人出席。

第十五条 军事委员会设立主席团七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指定之，须有不任军职之中央委员三人。

第十六条 军事委员会一切会议之议决以出席委员之过半数行之。

第三章 军事委员会主席团

第十七条 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执行中央委员会关于军事之决议及军事委员会全体会议及军事委员会关于军事之决议及军事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决定，并处理军事日常事务。

第十八条 主席团会议，每星期至少开两次，但其他委员得列席。

第十九条 主席团之决议及发布命令，须有主席团委员四人签名方生效力。

第二十条 在战时为指挥战时行动，及使各军队为战事准备指挥统一起见，得设立总司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于军事委员会委员中指定之。

第四章 军事委员会下（设）各处

第二十一条 为便利军事进行及指挥国民政府所有一切武装势力起见，于军事委员会设立左列各处。

一、参谋处。

二、军械制造处。

三、军事处。

四、陆军处。

五、航空处。

六、经理处。

七、审计处。

八、秘书处。

九、军事教育管理处。

各处组织条例另定之。

第五章　革命军事裁判所

第二十二条　军事委员会为镇压反革命及裁判军事犯，设立革命军事裁判所，组织条例另定之。

第六章　军官之任免

第二十三条　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军长等职由军事委员会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任免之。

第二十四条　师长至团长及其同等级军官，由军事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任免之，全体会议不开会时得经主席团通过任免之，但须经全体会议之追认。

此外又通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为：（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依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第二十条之规定，由国民政府特任之。（二）在战时总司令，有使水陆空各军队为战事准备，并统一指挥各军队战事行动之权，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三）总司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因指挥作战之便利，随时出驻前方。（四）出征动员会，须由军事委员会议决，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交由总司令执行之。（五）动员令下后，即为战事状态，总司令在作战地及警备地，有宣布戒严令之权，并得指挥前方之军民财政各机关。（六）中华民国十五年七月七日国民政府公布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组织大纲，废止之。（七）总司令之编制，由军事委员会另定之。

除上述最重要之决议案外，复有统一财政案计原则七项如下：（一）国民政府治下各省财政，急谋统一，在各省正式省政府未成立前。财政主管人员，由财政部选任，对财政部完全负责。凡收复省份，应即由部派员接受，所有财政一切建设，悉照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案办理。（二）国民政府治下各省，非经政府许可，不得征收新税，改变税率，组织新银行，发行新公债及钞票，或取消通行钞票之使用权。（三）设立予算委员会，审定国民政府予算，其委员由国民政府任免之。（四）征收直接税，如所得税、资产税、遗产税等。（五）改良地税，其税率须以现在农产之市价为标准。（六）中央银行为国家金融机关，调剂全国金融，并须积贮大宗准备金，以平准国外汇兑。（七）改组关税保管机关，厘定进出口税率，又统一外交案。计：1、本党党员，对于外交方面，有擅自变更本党外交政策之主张，或直接间接向帝国主义列强接洽者，以违背党纪论，应予除名处分。2、政府职员，非外交当局或未受外交部长之委托，私擅与帝国主义者为外交的接洽，或进行秘密交涉者，一经发觉证实，应即免职查办。3、在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地区，所有外交人员，均由外交部直接任免，地方政府及军事长官不得再有任免交涉员之事。

此次大会尚有一重大表示，即扶助国内少数民族之自决是也，据该会议对全体党员训令云：“更有进者，本党已至以革命统一全国之动机，今后不但须使中华民族对外求到自由平等，且须使国内少数民族一律平等，以证实本党之民族主义为民族解放，非国家主义者之貌为外抗强权，而内则压制弱小民族者，所可比附。本党同志，当对于满蒙回藏少数民族之解放，力予援助，使能在本党统一之后，相与自由联合，此尤为本党同志所应注意者也。”云云。根据此义，因有前纪关于内外蒙古之议决案。

# 〔附〕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农民宣言

（一九二七年三月）

经济落后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生活的大部分还是农业，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农民。中国国民受了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三种剥削，其困苦达于极点！自求解放之心，十分迫切。因此中国国民革命最大部分的目标，在于使农民得到解放；农民如不得解放，国民革命断不能底于完成。中国国民党为领导国民革命之最大政党，负有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民国十三年一月本党改组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发布宣言，对于农民问题，特加注意；民国十五年一月为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又议决对于农民运动的纲要；同年十月中央各省联席会议，发布新政纲，关于拥护农民利益者二十二条。三年以来，本党党员从事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引导广大的农民群众，为拥护自身利益，参加国民革命，组织之广，几遍全国，使革命风潮，特别扩大，革命进行，特别顺利。这都是因为农民受痛苦最深，求解放最切，而本党适能拥护其利益，扩大其组织，领导其行动，才有这样的结果。

最近各地农民起来的形势，至为迅猛——特别是湘鄂赣三省，短期间内，有极大的发展；长江下游及北方各省以北伐军的进展，农民必定迅速的起来，成为拥护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参加革命的第一个行动，除参人战争，扶助革命军得到胜利外，就是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的特权——这个封建地主阶级，乃直接剥削农民最厉害的一个特殊阶级，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对于农民的剥削，都凭附这个特殊阶级，才能达到目的；故封建地主阶级，乃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及一切反革命派之真实的基础；不推翻这个特殊阶级的权力，则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及一切反革命派，虽有形式上之破败，其使之存在的实质，并未消灭，时常有使革命改变性质之可能。在农民方面，几千年来被统治于封建地主政权之下，不推翻封建地主在乡村的政权，则一切经济争斗——如减租减息等等，简直无从说起。因此革命的要求，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每一个农村里，都必须有一个大大的变革，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之活动，在农民威力之下，完全消灭，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移转到农民手中，在乡村中建设农民领导的民主的乡村自治机关。这是完成民主政治的唯一道路。本党具有最大之决心，将领导此种争斗，使得到最后的胜利。

本党为领导代表民主势力的农民与代表封建势力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争斗，并使这个争斗的胜利得到保障，则农民得到武装，实为重要条件之一；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如民团，保卫团，及团防局等均须解除交与农民。此外本党尚当设法使农民廉价购得武装。总之，须使农民有足以保卫其自己利益的武器。这是农村的革命胜利，即民主势力推翻封建势力胜利之确实的保障。

农民在政治争斗胜利之后，经济争斗便随着开始。农民经济争斗的意义，为反抗帝国

主义，军阀，特别是地主阶级的剥削——这个剥削的总数，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本党的任务，即在领导农民反抗这个剥削。本党联席会议议决政纲有如下数条：（一）减轻佃田租百分之二十五。（二）禁止重利盘剥，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廿。(三)禁止上期租。（四）禁止予征钱粮。（五）禁止包佃制。此次全体会议决定佃农使用土地权，改良田税法则，并规定区乡自治机关，关于地方经济事务之各项主管权力。此皆属农民初步的经济争斗之纲领，本党必须领导此争斗使继政治争斗而得到胜利。在国民政府管辖区域内，当用政治的力量，邦助农民达到目的。

不但如此，因为革命的进展，农民的要求，已是很迅速的由初步进到了等二步——即在许多地方，已发生严重的土地问题。原来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的数目，到近年愈扩大，完全无产的赤贫农民，与有产不多不够生活的次贫农民，占全体农民中之大部分。这个广大的贫农阶级之存在，乃一切纷扰变乱的根源，同时即为革命动力的要素。贫农问题不解决，一切纷扰变乱都不会平息，革命亦将终久没有完成的一日。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的问题，现国民政府管辖下的各省——特别是广东，湖南，湖北农民运动发展的地方，贫民对于土地的要求，已甚迫切；北方贫农群众的土地问题，也是极其严重。本党总理孙先生深见于此，二十年前，即已提出“平均地权”为革命政纲；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到：“农民之失去土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种；” 总理并于民生主义讲演中，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此皆深知农民的最后要求，在于土地；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因此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斗争，至于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而后止。

贫农不仅无土地，而且无资本。革命发展的结果，乡村富有阶级，极端闭借；许多地方，几于断绝借贷关系，至使贫农社会惶惶不可终日，非有一具体政策不足解决此资本缺乏问题。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有云：“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借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中央各省联席会议政纲——亦以农民银行，列为专条；并规定以年利百分之五贷款与农民。本党当于最短期间，在革命势力所及之地，使本党政府努力设立此等条件极低之贷款机关，以解决农民之资本乏缺问题。

总之：国民革命的完成，有赖于全国农民之兴起！本党始终站在农民利益方面，代表农民而奋斗！本党始终拥护农民一切合理的斗争，务使一切剥削农民的特殊阶级失去其凭借，减轻其剥削，使每个受压迫的农民，都得到切实的解放。这是本党历史的使命，本党当毫不犹疑的执行之。

（原载《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

# 武汉国民党中央免蒋介石本兼各职令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七日）

蒋中正屠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此令。国民革命第一集团军所统率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方面军及总予备队，着均归军事委员会直辖，此令。

# 〔附〕汪精卫斥蒋介石违背中央命令反抗中央铣电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

国急，各省区、各级党部、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各军将士均鉴：兆铭抵沪后，曾发支（四日）电、赴鄂时，曾发鱼（六日）电、抵鄂后，曾发寒（十四日）电，想均承签收。兹接各处报告，知有人在沪假借兆铭名义，颠倒是非，特将在沪经过概括报告，以塞造谣者之口。兆铭初抵沪时晤蒋中正等，知彼辈方聚集在沪中央执行监察委员数人，谋开西山会议式之会议，以反抗中央，并拟提出反共产口号，以博帝国主义军阀及一般反革命派之同情，且拟借围缴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抢械，为献媚之资。兆铭海外乍归，目睹旧时同志走入歧途既痛且愤，曾再三忠告，略谓集中一切革命分子，本为总理遗训，当此国民革命积极发展之际，正宜同心戮力，以博最后之胜利，何可使革命战线自身动摇，授敌以隙。倘以党内纠纷，亟须整理，尽可根据党纲建议中央，特开会议以谋解决。若召集西山会议式之会议，是直接使本党陷于分裂，至于围缴工人纠察队枪械，既违背中央之命令，且与总理扶助农工政策大相刺谬，悍然行之，无异甘为民众之公敌。后于濒行留书蒋中正，告以当总理改组本党之际，蒋实赞其谋，今日何忍对于总理留遗之党及政策，加以毁坏。意谓蒋苛对于总理犹有丝毫纪念，或能悔而中止。蒸（十日）抵鄂，闻中央已决定移往南京，且对于兆铭特开会议之建议，亦允予讨论，方以为中央措置已定，一切凶谋，均消弭于无形，不图蒋等竟敢使西山会议，继续开演于南京，且竟于上海屠杀工人，似此丧心病狂，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具在，难逃大戮。至其对于兆铭假借名义，捏造黑白，犹其罪之小者，用特报告诸祈鉴察。汪兆铭铣（十六）。

# 〔附〕书汪精卫先生铣电后

（一九二七年四月）

吴 稚 晖

人家问：汪精卫先生何以这一回还是跑去汉口，甘心受共产党的包围，甚而至于还做那双簧里面画眼睛戴小帽的人物，不啻若自其口出的喊那（三大政策），（联合战线），在演台拼命，在电报上卖力呢，他为什么呢？

我答道：没什么，断断不是有所为而为的，汪先生有他的真挚的人格，此其所以有汪先生的价值，故我四月五号上午十时在沪海道尹楼上对他说："我相信你终有一天来向我相对痛哭，我所以不望你马上加入我们一边来。"各位要明白：共产党实是一个神通广大的狐狸精，若不是亲自窥见过他的原形，尽你说他如何凶妖可怕，终不肯相信。被他已经迷到病骨支离，见他回眸一笑，还是立刻爱情浓郁，不顾生命的向他了。二是做阔老的，那里会看见他们鬼鬼祟祟的把戏：他们伺候阔人，是比孝子顺孙还强，说话又甜蜜，又爽快，把一顶伟大左派的帽子轻松松的套在你头上，你终以为什么天大的把戏，都由我管得了的。三是一年前的共产党，同一年来的共产党，还是那么一个了吗？然而汪先生去国一年，他只知道还是那么一个共产党，他的疾病坎坷，久在欧西三十天内经过了木司科，接晤了一群久慕大名的大革命家，半个月的俄国火车，俄国轮船，伴送了回来，又一向有深刻的总理联俄容共历史，影在脑中，如何能在上海听了几个老朽朋友的一席话，就马上突然交换了一个大方向呢？这不但汪先生自信力强到十二分的人做不到，便是谁亦做不到！所以六号早上，李石曾先生去了孔宅回来，他说"精卫说过要走，一定说好了才走，不料他竟昨天下午瞒着走了，那么样，他约十五到南京开会，靠得住么？"我微笑道，开会不开会，止是那么说着罢了，果然四月十八汉口的中央日报记事，他告诉人，他虑蒋要中止其行，故秘密登舟，俟出吴淞口后，始致书与蒋。他至心诚意，还要去同那班狐狸精相处一阵，终要有一天眼见了原形，他才自动的想法子。我们难道从前不是同他一样，也訑訑拒人过的吗，何必以五十步笑百步，诧怪今日汪先生呢？若说汪先生可以被他们做商标，来登广告，这亦不过汪先生自己触霉头，还充他们一阵的傀儡罢了，于我们无损。因为共产党卖空买空，专靠登广告，造起空中楼阁来，大摆其迷魂阵，老是这套把戏，西洋景亦渐渐拆穿了。人家知道汪先生愚得可笑。汪先生到底又不肯卖国，他们利用亦不会长久的。所以前天有位戴君从长沙经过武汉东来，他坚决的说：汪先生已被他们暗中监视了，失却言动的自由了。这亦是可能的。因而有这个四月十六号的铣电，借他的口来诋諆蒋先生，别的不容先辩，他里面说我们"谋开西山会议式会议"这那里象汪先生的话，并且那里象人说的话。当他到沪之际，会议不会议，我们没有半个会字。半个议字，我们其时方以为共产党叛逆有据，事实具在，那里用得会同议呢？全是汪先生

自己对李石曾吴稚晖等首先说要会议解决，更两次在总理遗宅及沪海道尹署楼上对十许人说了又说，说了不算数，汪先生出了吴淞口，寄给蒋先生的信。又说："以铭之愚，一线生机，惟在开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又给张静江先生的信说。十五开会议在南京，旁边又注云，"愈早愈好。"我们相信汪先生是个领袖，他的提议，必有根据，所谓南京，他必定知道第三十六条党章中央全体会必开于政府所在地，所以我们马不停蹄的赶上南京赴会，到南京得汪先生元电，果说政府定在南京，又赶紧日夜不停的把政府筹设起来，好使中央在南京开会。汪先生定十五开会，所以十四便由到会的委员，开了予备会，十五上午足足静候了三点钟，全会开不成，改开谈话会，从此一天一天的候着开会，终开不成。汪先生好似开玩笑的会是不来开，反在那里说风凉话，累我们好似痴汉候婆娘，至今牢牢的候着。那个铣电不说我们上当，倒说我们"谋开"，是不是象共产党泼皮赖人的口气，那里象是汪先生诚笃君子的说话呢？至于铣电里面一篇大道理，说如何反共的不当，如何缴去工械的不对，全是似是而非，一种共产党混同夹账的声口，也不象汪先生的话，若说汪先生还不曾予做反共，亦不愿定要缴去工械，汪先生自以为体总理之心为心，我们亦知道的。可是容共原是要他们来邦助革命，不是革命，革命，连国民党的命，都革起来了。这个道理，汪先生亦应该清楚的。工人有了械，邦助国民党革命，是十分欢迎的，若拿了他的械，来助共产党革国民党的命，这个叫做叛逆，汪先生四月三号在总理遗宅亲口告诉白健生先生等要捆起来的，（这句话，我没留意，李石曾先生再三说听得清清楚楚），依汪先生把他们捆了起来，他们的手亦没有了，要械何用呢，不缴何待呢？我所谓汪先生体总理之心为心，见汪先生四月五号寄给蒋先生的信，有云："改组之精神及其方策，实总理苦心孤诣所独创，而吾弟实左右之，铭不过追随之一人。"又五月三号在总理遗宅，汪先生亲对蒋先生说："总理改组国民党，便是我与你同着仲凯三人，最深知之"，所谓苦心孤诣，所谓独创，大约便是指要与俄国联合，要容纳共产党，甚而至于要行农工政策，定要武装工人，就是共产党现在把他吹得震天响的三大政策。那么我要敬告汪先生，我们并不是一只牛，我们并不曾连这一点灵性都没有，我们亦曾把苏俄当神仙待过，亦曾把共产党当兄弟亲过，我们亦口口声声说革命要注重农工，为了这个，我们亦得罪过多少朋友，可是同时却不曾奉到总理的密命，说明苏俄要把共产党来消灭国民党，亦应该同他联到底。（其实事实上，还做不到，到国民党消灭的一天，联苏俄的，便轮不到孙中山先生了。）共产党要革国民党的命，亦应该容纳到底。（是同一事实上更做不到，彼时他已不屑容纳你，谁配你去容纳他呢？）农工邦了共产党革国民党的命，也应注重这种农工到底。（这就是孙哲生先生请几个共产党书记代枪，在交通部纪念周说的漂亮话，他说我们要知道革命是民众的事，民众为需要解放，所以才有革命，要革命所以才有党。）这无异说：农工要做共产党，国民党便不该存在，要存在国民党，（这完全已经走上了反革命的路上），这才聒聒叫的宁馨跨灶人物，并且父子至亲，必有我们听不到的耳提面命，在汪先生依了总理苦心孤诣的独创，体他的心，来做自己的心，已是隔膜了，所以他会说出"捆绑叛逆民众"的话来，何等不合革命的原理呢。故论起派别来，孙哲生方是真左派，汪精卫止合称做准左派罢了。因为没有总理密令，吩咐我们把国民党可以送与共产党，我们老实不客气，自然提出反共口号；自然围缴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枪械。那个替汪先生做铣电的人，（我想汪先生心地决下会如此龌龊）糟塌我们。以博帝国主义军阀及一般反革命者之同情，为

献媚之资，然后我们要想免给汪先生这样的糟塌，我们除了把国民党送与共产党，还有甚么方法呢？就把汪先生自己的观察来证明。（一）四月一号黄昏，我在孔宅当了蒋宋李三位之面，对汪先生说："陈仲甫他言二十年就要把中国变共产国了"，汪说："那里要二十年呢！两年罢！"（二）四月二号早上，在孔宅楼上，当李蔡二位之面，汪先生说："我过莫斯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是予定的，断不能为了我们变的。"（三）同时又说："他们当什么人都是工具，就是他们自己的重要人物，不需要了，也就把他去了。"那么他们是予定在中国要行共产，不肯改变的，是汪先生晓得他一定的了。他们把国民党完全算做工具。到不需要了，即便丢了。汪先生亦晓得一定要有丢的时期，陈独秀说二十年，还是宽慰朋友的，其实只需二年，汪先生亦晓得一定的了。然则所谓革命，便是替共产党革命，"反共便是不革命"，亦是一句不客气的实话。承蒙四月十二的汉口中央日报，称我与蔡李"都是忠厚老实，但不知革命方法"，方法就是指武装的工人，面子上逼帝国主义者来残杀，算是反对帝国主义，其实又增加共产党武装暴动的大成功，愈把国民革命军可以维持国民党的势力减缩下去。这又名为限制新军阀，在共产党成功他的革命，自然十分满意了，在国民党要想成功自己的国民革命，那就倒看千里镜，愈弄愈远了。这种革命的工作方法，或者就是汪先生所谓总理苦心孤诣所独创的呢，还是别人苦心孤诣独创了来，断送国民党的呢？所以汪先生致蒋先生书，开头有云："抵沪以来，痛苦万状，今日散会后尤甚，总理所遗留之国民党，果从此已耶，总理所以改组之国民党，果从此已耶"？汪先生所痛苦者，即为我等老朽昏庸不知"革命工作方法之故"，但我亦套他调子还告之云："在沪见汪先生痛苦万状，今日见他的铣电，痛苦尤甚，总理所遗留之国民党，果从此已耶，总理所改组之国民党，果从此已耶？我们所痛苦者，即汪先生误认共产党消灭国民党的革命工作方法。便算国民党进行之革命工作方法，总而言之，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的方法至佳，但我们反了他，让我们自己来行，便是国民党革命，若与他一同来行，便变了共产党革命，工人武装暴动的方法，亦是至佳，但我们不要工人归到共产党手里，反来革我们国民党的命，我们要武装国民党的工人，完成我们总理的工人革命，这是总理改组国民党时苦心孤诣容纳共产党的意思，暗示我们到了他们要拿出共产党手段危害我们国民党便请他出去，这就是汪先生所谓独创。我已寻到了总理亲笔证据，请在下面申说，至于汪先生那种不顾消灭国民党，只贪看共产党革命成功，认为就是国民党革命的成功，乃是汪先生个人的信仰。（共产党革命决不会成功，当另作一文请教于汪先生。）总理并无此意，汪先生是总理唯一的信徒，不可谬误至此。（汪先生在汉口寄李先生有左派右派，寤寐以求之等语；汪先生耻为右派，力争左派，亦就可谓情见乎词，然彼误认能上共产党的当或共产党自身是左派，固已错极，还有共产党所加国民党人左派之名，若观其秘密文件，当作三日恶，此亦当另为一文。）"

当十三年改组国民党之时，疑虑纷起，总理曾批示邓泽如先生，其原文已另制写铜板，今转录如下，且加按语，使总理之意晓然大明也！

此稿为我请鲍君（按即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按苏俄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人，是打成一片整个儿的，总理是包含万有的心胸，那里愿意测度他们的表里为奸，到了今年四月五号汪陈都用领袖资格共发宣言，才知他们果有神鬼。）俄国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我国革命之所以不能

成功，则各党员至今仍不明三民主义之过也。（按何等沉痛，我们自反，真应愧煞，俄国党人，无不深明其共产主义，故成功，总理的党员，自有三民主义，却不愿明白。总理命他学步俄人，则又认共产手段，便是国民革命，三民主义还自己看做不时髦，所谓至今仍不明者，将终古仍不明矣，噫，嘻！）质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按：说得何等明白，一以晓谕党员不要把共产党看作异类，即我国民党亦是共产之一派、二以暗示党员不要见异思迁，我的民生主义便是共产主义，诚把民生主义的专书一看，民生主义还是进步的共产主义，非如俄国共产主义乃是马克思病理的共产主义，是民死主义，不过其捣乱精神，亦可以节取者耳。）俄国革命之初，不过民权民生二主义而已，恢复后与列强奋斗六年，始知其用力之最甚者，实为对于民族主义。此乃中国学生自以为是，反用以崇拜俄国革命过当之态度。（按何如说汪先生勇于做左派，总理婉讽之曰过当，难道总理亦是忠厚老实耶？）其所以竭力排挤而诋毁吾党者，（按他们是整个儿的。自始至终，即与我们不能两立。）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我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我党争衡也，（按，他们是整个儿的，与吾党争衡，是其惟一目的。至于包揽交际，正是俄国要他包揽，与我往来，也是俄国正欲往来，惟有今日共产党人遮断农工，不任与国民党往来，乃是他们自树一帜的惟一目的物。所以两领袖共发宣言后，中国共产党江浙区执行委员会，应和一宣言，有云："中国国民党乃中国各阶级起来革命的惟一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惟一政党。"马上把全国无祖国的工人，一齐夺归共产党手里去了。所以吴稚晖顶倒霉，广州把和着陈炯明造反的商团惩创了，许多反对国民党的，大骂特骂，吴稚晖冒了不韪，形似不立于民众方面出来辩护，那还算不冤枉，曾得了汪先生称许。现在上海又把邦助着共产党造反的工会缴了械，那弄到国民党的汪先生也出来发火，骂那保护国民党的军队，说是"无异甘为民众之公敌。"又说"似此丧心病狂，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具在，难逃大戮。"我觉汪先生现在的一味直觉，也与向日时事新报等漫骂杀商团，同一有所拘蔽。吴稚晖本了汪先生捆绑叛工之旨，又冒不韪，又似立于民众方面出来辩护。大约目前定不得汪先生原谅，必要到了相对痛哭时，或皱眉一叹。）乃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学问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愚，（按共产党与李闯张献忠在实际上并无分别，所以象煞有价事，居然以主义名者，即文之以"学问经验之人"，宜乎总理久为所欺，彼等是整个儿的，少年正为所愚耳，那里有鲍罗廷其人反为少年所愚乎。）且窥破彼等伎俩，于是大不以为然，故为我纠正之，且欲彼等必参加国民党与我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按今日汪先生反要我们与他一致动作，岂不与总理之意相反，不与我一致动作，则当绝之，总理说得明明白白，并且得苏俄之同意，今乃曰"反共即反革命"，学了共产党口气说此屁话，粪话，放屁都还要香些，真总理之罪人也，此总理亲笔之证据也。）且又为我晓喻之，谓民族主义者，正适时之良药，并非过去之遗物，（按，伤哉，总理之心，岂即汪先生漠然于做人工具之心乎，劝此辈少年勿做张邦昌吴三桂李完用，此所谓民族主义，正适时之良药也；劝党员不可听其亡党，此又所谓民族主义非过去之遗物也，此数说乃总理批示邓先生之中心要说也。）故彼等亦多罪悟而参加于吾党，（按共产党觉悟了民族主义，乃许其参加吾党，今汪先生乃恨军队得罪了无祖国的上海总工会工人，要行大戮，真咄咄大怪事！）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陈欲不服从吾党，亦必弃之。（按总理亲笔证据，大家看清

楚，“如不服从吾党，我必弃之”，何等说得斩绝，所谓共产党背叛国民党，定即弃之是也，今乃曰“反共即反革命”，学了共产党口气，说此屁话粪话放屁狗之话，真总理之罪人也。）

准此而观，汪先生铣电，幸而笔笔不类汪先生，我等对于汪先生之信仰，仍可无间，至于电中又言：“对于兆铭假借名义，颠倒是非”，不知何所指。幸而我们终始未认汪先生知有是非，故我们还未曾有借重之机会也。总之，双管不能齐下，挂一必且漏万；当继续贡其所知以明真相，故除上举“俄国共产革命，必不能成功”“左派真相”两题，当继此而作外，又有“两月内个人反共之历史”“共产党之卖空买空手段”等题，亦要写出，参互读之，庶无漏义。

（原载《吴稚晖言论集》）

# 武汉政府继续北伐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至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月）

萨坡什尼柯夫

蒋介石背叛革命事业以后，作为革命中心的武汉政府的势力已扩展到湖南、湖北、江西各省及河南省的某些地区。

早在1927年3月，国民党左派在武汉政府中已居于领导地位。这个政府是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的。同时也有两个共产党员参加。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武汉政府马上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4月中旬下令革除蒋介石总司令的职务；委任冯玉祥接替蒋介石的职务，并任命第八军军长唐生智为付总司令。在1927年4月15日武汉政府所公布的通缉蒋介石的命令中说："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①

武汉政府继续北伐。当时武汉政府的主要敌人是盘踞在东三省、热河、察哈尔、直隶、山东及河南、安徽、江苏北部一带幅员达150万方公里、人口达9000万以上的地区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奉系军阀张作霖拥有军队25万人、大炮450门、飞机60架②。

军阀张作霖的军队就是英、美、日帝国主义强盗一手建立的"安国军"的主要力量。

加入"安国军"的阎锡山的军队，以山西和绥远一带为根据地，拥有10——12个步兵师，共有5——6万官兵。

在河南前线迎击武汉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部队的，是在武汉地区失败后从华中退却下来经过数次改编的残兵败将。其中有吴佩孚的部队（5个师）和豫军（5个步兵师及3个独立旅），总共约有5万人。

在四川和湖北省西部地区蛰居着将近10个互相敌视的不同派系。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行动促使四川某些将领公开地走向反革命的道路。杨森的第二十军有5个师和4个旅约4万人，占据重庆一带。赖心辉的第二十二军约2万人，占据四川省北部地区。邓锡候的第二十八军约3万人，占据着成都。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约3万人，占据了四川省南部。

分布在湖北省西部一带的，有地方军阀的军队（包括第五师、第七师、第八师、第十八师及第二十六师），总人数约两万人。

---

①"中国问题资料"第十卷，第79页。

②张宗昌的鲁军有20个步兵师和步兵旅，共有9——10万人、100门大炮、8——10架飞机和4辆装甲列车。

孙传芳的部队在沪宁地区失败之后，所占据的地区只剩下江西省的北部。尚有8——9个师的兵力，约计2万至23000人左右。孙传芳也加入了“安国军”，但他本人并没有实权，因为他的军队人数不多，同时战斗力又非常薄弱。

当时能够用来抵抗武汉政府国民革命军的，由美、英、日帝国主义所武装起来的各军阀的联合兵力，共达50万人左右。

对武汉的中国国民政府说来，甚至还要把“在南京的旗帜下统一全国”①做为自己的任务的、准备坚决反对武汉政府的国民革命军的武装力量，即蒋介石的南京反革命政府的武装力量，计算到敌对兵力中去②。

蒋介石统治了江苏（上海、南京一带）、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和广西各省。蒋介石的军队约有12万人，有大炮60门、机关枪150挺。拥有官兵18000——20000人左右的、在何应钦指挥下的第一军（6个师）便是蒋介石可靠的支柱。另外，蒋介石还指靠着对武汉政府心怀叵测的、拥有15000人的李宗仁的第七军，拥有35000人的第十军及第十六军，拥有将近5000人的赖世璜的第十四军，拥有将近1万人左右的浙军第十七军和第十九军，拥有2万人的皖军第二十七军和第三十七军，拥有6000人的叶开鑫的暂编第五军，以及拥有将近4000人的由鄂湘两军改编而成的柏文蔚的第三十三军。他们都一致声明承认南京政府。连粤军军团（约2万人）也用来做为对抗武汉政府的工具。

那么武汉政府以什么来对抗这么多的敌人呢？

这时武汉政府国民革命军的成员，包括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军、第三军及第六军，贺龙的第十五独立师及叶挺的第二十四师③，总共约有5万人左右。

国民革命军的成员中还包括唐生智所指挥的军团：第八军、第二十五军和第三十六军，共有官兵31000人；以吴佩孚原第十五师为基础所改编的暂编第四军，以吴佩孚原第十七师为基础所改编的暂编第五军，以及暂编第九军和其他规模较小的部分军队。

武汉国民革命军的总人数已超过10万人以上。

武汉政府还有冯玉祥国民军的协助。这时冯玉祥的军队已占领了陕西、甘肃、河南省西部、绥远南部一带等地。冯玉祥的军队号称13万人（16个军，但缩编为8个军了，即仅有7——8万人）。虽然革命军队在数量上远不及反革命军队那么多，但是，他们在战斗力上和道义上都大大地胜过反革命军队，又加上反革命势力间由于存在着矛盾，常常发生武装冲突，这也就保证了国民革命军对北洋军阀的讨伐的顺利进行。

当时受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所鼓午的、以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为首的北洋军阀，便决计一举而消灭武汉的革命中心。

1927年4月张作霖的先遣部队沿京汉铁路向南展开进攻，结果遂平——驻马店（武胜关北120公里）一带被他们占领了。参加这次进攻的是张作霖的精锐部队：第八军、第十军、第十一军、第十五军及第二十七军（共20个步兵师和骑兵旅），总人数共有6——7万人，由张学良指挥进攻。军队的武装很完备，并配备有足够数量的炮兵和空军。

---

①1927年4月21日“南京日报”。

②张作霖和蒋介石之间在后者叛变革命之前就已进行了谈判，其结果就是达成了关于联合反对革命的武汉的协议。

③占领武昌之后，叶挺的独立团便扩大为第二十四师。

在遂平——驻马店一带，河南军阀的部队以及从武汉败退的吴佩孚的个别残部，共约25000——30000人也加入了张学良的进攻部队。

吴佩孚把他的司令部从洛阳又迁到南阳，并和从前鄂军（第七、第八、第十八及第二十六步兵师）的指挥人员建立了联系，通过他们和四川军阀杨森也拉上了关系。4月13日鄂军和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在南阳一带交战。在这次战役中，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失败了。这样一来，敌人就开辟了一条向湖北省北部地区进攻的道路。此外，曾和吴佩孚结成联盟的四川军阀杨森也开始向汉口进攻。4月16日占领了湖北西部的宜昌和沙市，并驻兵在汉口西250公里的地区。这就给国民革命军造成一种非常紧张的局势。

由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武汉革命根据地同时实行封锁，局势也就更加复杂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挺身反击北洋军阀才是保卫武汉政府唯一的必要措施。摆脱这种情况的较好的办法，就是在冯玉祥的军队从西面向开封进攻的同时，国民革命军取北面方向沿京汉铁路向开封进攻。4月21日两军同时开始向开封进攻：冯玉祥的军队顺利地沿陇海铁路向前挺进，国民革命军的部队穿过武胜关沿京汉铁路向北推进。参加这次进攻的国民革命军部队有张发奎的军团，其中包括第四军、第十一军及贺龙的第十五独立师，共有步兵22000人；唐生智（第八军军长）的军团，其成员有第二十五军、第二十六军及第八军的几个师，共有步兵22000人。这两个军团都集中在驻马店——汝南（位于信阳东北80公里）一带。在上蔡一带，张发奎的军团和敌军开始了战斗。经过一场激战张发奎的军团终于占领了上蔡和遂平两地。敌第十一军、第十三军、第十七军及寇英杰的豫军全被击溃，狼狈北逃。

沿京汉铁路进攻的唐生智军团的先遣部队（第三十六军）也在驻马店一带战败了敌军。

5月26日和27日两天，国民革命军的部队强行渡过沙河，占领了襄城，突破了敌军在这一带的防御阵地，抵达许州和扶沟（位于郑州和开封南80——100公里）。敌军死伤及被俘近2万人，残部逃往开封和郑州。

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军队（第一军、第三军、第五军）于5月20日到达洛阳，包围了盘踞该城的陕西军阀刘镇华的军队，并向郑州进攻。冯玉祥的南路军（第八军和第十七军）在邓宝珊将军的指挥下，从荆紫关（位于陕西、河南、湖北的交界地）一带，开始向吴佩孚的司令部所在地南阳进攻，于5月28日占领了南阳，吴佩孚的军队大败。6月1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军）占领了郑州。6月2日张发奎的军团占领了开封。这时冯玉祥的军队也向郑州开来。敌军开始往黄河北岸溃退。

这是革命军的一次大胜利。国民革命军和冯玉祥军队的获胜，也就给从各系军阀手中解放中国的整个国土和巩固武汉政府的政权创造了条件。然而，冯玉祥却把自己在郑州一带的胜利消息用电报通知了蒋介石，以此表明他自己的退出武汉政府的立场。

正当国民革命军顺利地打击张学良军队时，四川军阀杨森的军队于5月24日沿长江北岸又向汉口进攻。敌军第十四师切断了粤汉铁路，占领了蒲圻和咸宁。杨森的军队于5月28日开到天门——潜江——监利（位于汉口以西和西南100——120公里）战线。武汉政府费很大气力才将各路军聚齐，分别派往各个战区。第十五军的一个师调往天门，第二军第四师、第五师、第六师及第八军的一个师调往潜江，独立步兵旅从常德调往武昌，他们的

任务是解除敌军对汉口的威胁并挡住军阀杨森的进攻矛头。

共产党员是参加打击军阀杨森的革命军中最积极、最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哪里有他们参战，那里的局势就会完全转为对国民革命军有利。往潜江推进的第八军的某师中约有70名共产党员，他们于1927年5月26日发动和团结了附近乡村的农民3000多人，于5月27日夜从北面包抄潜江，使敌军遭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打击。这一次突然的猛烈攻击使敌人惊慌万状，扔下8门大炮、40多挺机枪和许多军用品，狼狈地从阵地逃命。抗击军阀杨森的其他部队也都仿效了这“70个人的榜样”，前方局面就随之稳定下来了。

但是，在抗击杨森的战斗考验中，国民革命军组织中的一系列的缺点也暴露出来了。国民革命军组织中的主要缺点是在国民革命军的队伍中尚有一些不可靠的指挥干部存在。在军队中居重要地位的某些反动将领和反动军官对政府的各项军事措施实行怠工，并时刻准备着向敌方投降。

这种情况就迫切需要由革命的工农重新编成一支对革命绝对可靠的军队。同时，也需要广泛地吸收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参加军队工作，清洗军队中的反革命分子，建立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①。

然而国民党领导集团对于加强军队这方面的工作却什么都没有做。

中国革命的命运就决定于：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把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争取到手。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的一致见解。然而，掌握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权的投降主义者陈独秀，却千方百计地设法阻碍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工作。毛泽东和其他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员，为了使国民革命军成为真正的革命军队，为了吸收广大的中国人民大众参加抗击反革命的武装斗争，他们曾竭尽最大的努力，克服投降主义者陈独秀的一切阻力。

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湖南建立了大批有战斗力的农民自卫队。在其他各省中，共产党人也同样组织了农民进行武装斗争。

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战士都成了当时到处兴起的农民武装自卫队的领导者。这些队伍往往是由附近工业区的工人党员领导的。

共产党卓越的活动家——朱德、周恩来、叶挺以及其他等同志，都直接领导过军队工作。由他们所领导的以及受他们影响的部队都是革命最可靠的支柱。城市中的军事工作也是由共产党员进行的。卓越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刘少奇同志就领导过武汉工人武装队伍的组织工作。

当时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各系军阀的斗争，开始规模越来越大地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了。

中国千千万万农民都开始起来为获得土地而斗争了。

农民们没收了地主、高利贷者和绅士们的土地、财产，进行了平分。在这一工作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16个省份中到1927年6月已团结了900万会员的农民协会②。

---

①参看“从中国的实例看共产国际在殖民地民族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文献集），1934年莫斯科版第177页。

②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1951年上海版第283——284页。

农民协会实际上已经成为乡村中革命政权的执行机关了。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是当时土地运动的领导者。

中国工业中心地区的共产党员和工人，领导了许多地方的农民协会。他们取得了农村中的贫农和中农群众的绝对信任。

在革命农民的一致压力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7年4月27日终于通过了关于支持农民获得地主的土地的愿望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农村中农民组织以及关于解散地主的团防局的决议。

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国民党所采取的蛊惑民心的措施而已。

实际上，国民党政府是反对土地运动的。在土地问题上陈独秀所领导的党也施行了类似的政策。因此革命事业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1927年5月，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地区的局势日益趋向恶化。资产阶级对政府的各项措施开始实行公开的经济怠工和政治怠工。帝国主义者和伪南京政府对武汉的封锁也更加严紧。1927年5月13日的“湖南日报”写道：“为了避免危险，就连一只燕子都不让飞过武汉地区了。”

正当国民政府的军队顺利地向北展开进攻，已距郑州、开封两地仅20——30公里，而冯玉祥的军队已从西面直逼郑州时，在武汉政府管辖的地区内，在距离汉口仅有250公里的长沙的反革命势力又重新抬头了。

5月16日夏斗寅的第十五军第十四师叛变了武汉政府。这支叛军本来是被派去和军阀杨森的队伍作战的，但却与杨森合污了。这时长沙和武汉实际上已断绝了关系，因为夏斗寅的叛军已占领了岳州（位于汉口南约100公里），并沿粤汉铁路继续向北进攻，直逼汉口。随后于5月21日陆军上校许克祥又在长沙举行反革命叛变。工会被迫解散，工人纠察队也被解除了武装，大屠杀又开始了。这些反动军官在长沙的行动都是外国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策动的。由于国内外反革命的压迫，一方面促使农民运动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及在武汉的国民党党员干部的动摇。这些人从1927年4月开始，是受中国人民隐蔽的敌人、日本的走狗汪精卫的领导。汪精卫以及他在武汉的同谋党羽，不仅阻碍了对中国劳动人民有利的革命问题的解决，同时还纵容反革命分子协助心怀叛逆的将领和军官去镇压革命工农。

从5月17日夜到18日，在武昌举行了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第八军和第十五军指挥人员的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有关推翻“武汉共产党政府”的问题。当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报告说汪精卫同意“镇压农村的骚动”之后，参加会议的人便中止了关于推翻政府问题的讨论，力图与汪精卫相勾结。汪精卫和他的同谋者（顾孟余、谭延闿、朱培德等人）认为公开地反对共产党人、工人和农民为时尚早，所以仍继续用革命的词句来欺骗人民和军队。领导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会主义者陈独秀，极力赞许武汉政府的以日本间谍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要人的政策，使共产党人的警惕性陷于麻痹状态。

汪精卫一方面公开咒骂“南京的独裁者”（蒋介石），但同时又进行了投降蒋介石的最后秘密谈判。

5月18日夜叛军已抵达距武昌30——40公里的地方。

外国帝国主义者存心给武汉增加紧张气氛，以此来支持反革命势力。法国当局用铁丝

网将法租界围起来，表示他们是在加强警备。仃泊在长江的外国兵舰的海员也被禁止登陆。

当时驻武汉的一个英国外交官员B·S·牛顿公开地出来反对武汉政府。

当汪精卫和他的党羽们的叛变行动已迫近时，领导军队工作的共产党人——朱德、周恩来、叶挺以及中国人民的其他进步代表自动地组织了抗击反革命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由富有战斗力的战士所组成的、在贺龙指挥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已被调来此地。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作为掩护队以抗击四川军阀杨森，而贺龙和叶挺率领的第二十军和第二十四师的部队则投入反击夏斗寅的战斗。夏斗寅的叛军随被击退，狼狈地逃往江西。这次同夏斗寅叛军作战中，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战士又一次表现出他们是英勇顽强和忠于革命事业的模范。虽然在数次战斗中国民革命军损失很大（约伤亡1200多人），但终于取得了完全胜利。

由毛泽东在湖南培养起来的农民武装队伍也同国民革命军一道参加了抗击叛军的战斗。

但是，武汉政府非但没有对叛变的将领进行坚决的斗争，反而和他们进行无限期的谈判。实际上，这就是对反革命的默许。

这时迫害革命工农的恐怖行动在武汉政府所管辖的各地都先后出现了。特别是汉口，反革命军队和武装的革命工人队伍之间的冲突事件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以陈独秀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领导，决意“仃止和我们的纲领、策略不符的‘幼稚的’农民行动”这时的形势证明，在武汉抬头的反革命分子同工农间公开的阶级斗争已经迫近；但陈独秀却向长沙发出“不许农民队伍和反革命军队发生公开冲突”的训令。向陕西、河南的党委会也发出了关于制止农民运动的训令，其目的是使他们不要对冯玉祥施加压力，免得他离开武汉政府。训令发出时，冯玉祥早已准备和蒋介石进行关于联合行动起来反对革命的秘密商谈了。

1927年6月1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在南昌叛变。这一次，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约300人被捕和被逐出第三军。所有的工农组织以及他们在市内的武装队伍全被解散了。

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也解除了湖北省西部一带农民协会的武装。

所有这些对革命工农的迫害和恐怖行为都是有计划进行的，并得到蒋介石南京政府、汪精卫及其党羽的支持。

发生在武汉的各个事件的消息传到了北方前线（开封一带），使得国民革命军的士气大大低落。反动军官们都消极地对待自己组织进攻北洋军阀的战斗任务。甚至有很多军官公开表示要开始反对农民运动。

国民革命军部队讨伐张作霖以及河南、湖北军阀所取得的胜利尚未巩固，又奉武汉政府的命令调回武汉集中。这一行动看起来好象是为了“反击蒋介石”，实际却是用来镇压工农运动。

正当忠实于武汉政府的革命战士们已取得了讨伐张作霖军队的胜利，迫使张学良军队退往黄河北岸之际，蒋介石由于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已得到“和解”，也就完成了他自己的反革命事业。

反人民的南京政府成立后，该政府的魁首——卖国贼蒋介石也就开始活动起来。他恢复了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旧有权利。英国人恢复了在上海的霸权。大批横行无忌的美国“顾问”已成了南京的主人。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三省和内蒙古竟企图久占为业。反人民的南京政府放弃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切斗争。他们肆无忌惮地出卖中国的财富。国际资本利用白银跌价、金融崩溃和国民党匪邦完全投降的机会，继续大规模地从中国榨取宝藏。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贸易，恢复了不受限制的权利。国民党分子在关税自主权的问题上也做了可耻的让步。

武汉政府军队的胜利使蒋介石感到不安。企图在黄河及长江之间占领南京政府地盘、扩张自己势力范围的张宗昌和孙传芳的行动，也使得蒋介石大为惊慌。蒋介石为了保全自己的权势，决定反攻北洋军阀。1927年5月11日南京政府的军队开始沿津浦铁路进攻。

蒋介石军队在5月里进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夺取武汉军队的主要铁路交通线，占领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的交叉点徐州，从而稳定黄河、长江之间一带的局势”。

蒋介石以3路军进攻。由第十四军和第十七军的4个师所组成的右路军（由何应钦指挥）沿运河向宿迁进攻；由第十五军及第十六军所改编的第一军的3个师所组成的中路军（由白崇禧指挥）沿津浦铁路向徐州进攻；由第十军、第二十七军和第三十三军所改编的第五师和第七师所组成的左路军（由李宗仁指挥）协助中央军团攻取蚌埠，并转攻徐州；第十九军、第二十六军及第三十七军则作为预备队。

5月底何应钦军团占领了扬州及天长（位于长江北岸）。据守扬州的孙传芳部队向北撤退。白崇禧军团占领了滁州、六合和来安（位于长江北岸、南京的西北）。鲁军（第一军、第四军、第五军、第六军、第七军）总共约有45000人，这时据守蚌埠——凤阳(在安徽省内）。徐州一带是由第三军和第十军防卫，约有1万名官兵。在徐州以北临城车站一带作为后备队的有官兵8000人。在济南——青岛一带集中的有1万到2万人。

在蒋介石向北进军之前，日本外交家们，特别是日本的报刊，就已承认了南京政府以武力统一中国的“合理性”。日本企图先使蒋介石同孙传芳、张宗昌发生正面冲突，当两败俱伤之后，再迫使他们接受它的条件。当南京中央军团逼近徐州时，日本军队已在青岛登陆，并“促令”蒋介石注意日本帝国在山东省的一切权益。南京政府就乖乖地从命了，6月1日则下令3路军队退回南京和上海。蒋介石充分暴露出投降派的真面目。此后，他更准备满足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一切要求。他已经成为国际帝国主义手中的听话的工具了。

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美国，更加强了对中国的干涉。

1927年6月配备有大量的炮和坦克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个团在天津登陆。天津飞机场已成为美国两个轰炸中队的基地。在美国的报刊上，根据美国参谋本部的“黄色计划”，公开地讨论了以强大的力量对中国内政加以干涉的问题①。

当时武汉的情形又是如何呢？武汉政府中的某些“国民党左派”已开始公开对农民运动的高涨和共产党员在农村中的威信的日益提高表示不满。他们要求采取断然的措施制止

①军阀张作霖鉴于美国在中国的势力日益强大，他不愿再做日本顺从的仆从。他表示，如果美国政府承认他在东三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各省的政权时，他愿效忠美国。

工农的革命行动。

1927年6月武汉政府发表声明："不准示威游行，不准集会。"政府并准备解除工人纠察队和民兵的武装。武汉政府这一声明，引起武昌、汉口和汉阳无产阶级的一致愤慨。6月14日武汉三镇的无产阶级组织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政策。汪精卫及他的党羽们决定利用工人起来反对政府这个机会来破坏共产党的威信。他们宣称工人和农民反对政府的行动是共产党人"一手造成的"。

1927年6月19日冯玉祥和蒋介石之间早就举行的谈判达成了协议。根据协议，冯玉祥的军队已编入南京政府的武装力量中。"谈判双方"发出劝汪精卫投降南京反革命政府的通电就是冯玉祥妥协的结果。

从6月14日到7月15日这一个月当中，汪精卫集团反对武汉、长沙、南昌、九江以及其他城市工人的挑衅行为，和反对湖南、湖北和江西等地农民的挑衅行为，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最后，于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公开破坏统一战线，起来攻击共产党和革命工农。在武汉政府所管辖的地区汪精卫分子血腥的反革命的恐怖屠杀开始了。

这样，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叛变了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忠于人民，并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而续继斗争。

（原载《1924——1927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军事史略）》，标题为编者所加）

# 〔附〕南行使命

刘骥

一九二六年三月，冯玉祥由平地泉取道库伦前往苏联，在莫斯科仃留了三个多月，回到五原誓师参加北伐。冯在莫斯科时，派我和李鸣钟赴广州与国民政府联系，这是冯玉祥由北洋军阀系统里分化出来正式参加国民革命的开始。当时我在粤、汉两地，替冯做了些活动，现在我把此行的前前后后，就记忆所及，叙述如下。

## 一

一九二四年北京政变之后，吴佩孚兵溃南逃，直系军队的主力基本上已被消灭。奉系军队虽然乘战胜余威，一度南下，但在外受到孙传芳的回击，全军仓皇北撤，在内遭到郭松龄的反戈，沈阳几乎不保，它的力量也有一定程度的削弱和分化。孙传芳在东南虽然形成了一个割据的局面，但他是新起来的势力，基础还不稳固。从整个形势看，北京政变的

发动，对于根深蒂固的北洋军阀势力，确实起了很大的瓦解作用，给予它以致命的打击。这就为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在客观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是但，当时冯在北方遭到各方的嫉视；他的地位是十分孤立的，加之国民军内部发生的问题，也使得冯感到很大的困难。

一九二五年冬，冯的国民一军打垮了李景林的军队，占领了天津，把血战夺来的直隶省地盘给了国民三军的孙岳。天津一役，国民一军虽然打了胜仗，但损失甚重，而且国民二、三军和国民一军内部意见也不一致，要钱、要械、要弹药、要地盘，冯玉祥苦于无法应付（当时有“一军私、二军贫、三军乱”之说）。同时，郭松龄反对张作霖的战争，以日本军队的助张而归于失败，奉张的军队，乘战胜郭松龄之势，逼进关内。武汉方面的吴佩孚，又复蠢蠢欲动。当时形势，对冯极为不利，冯为了争取缓冲的余地，便叫部下去应付，自己就在一九二六年一月间通电下野。他旋以游历为名，在三月二十日由平地泉赴库伦转往莫斯科，亲自与苏联联系，寻找他的出路。冯出国后，四月间国民军撤出北京，退守南口，我随军退到张家口，不久，冯来电邀我往苏联。此时，李鸣钟见到国民军形势不利，不愿留在军中，也要赴苏，遂与我偕行，一同到达莫斯科。

冯在莫斯科的期间，由于吴佩孚从“讨贼”（讨伐张作霖）转到联张（联合张作霖），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使得冯原来授意张之江、鹿钟麟等与吴重修旧好、联合对付奉张的打算完全落了空，以致国民军在北方陷于应付困难的地步，甚至有被张、吴消灭的危险。冯经常接到张之江等的电报，报告国内局势的变化和国民军处境的艰险。他对此万分焦虑，真是废寝忘食，坐卧不安，再也不能在莫斯科住下去了。他在分析当时国内形势和今后国民军出路的时候，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从北京政变后，在反动的北洋军阀的心目中，他已经变成了北洋军阀阵营里一个“叛逆”人物，谁也不敢再和他接近了（张作霖曾电骂冯为“人中妖孽，世界凶徒，中外共愤，天地不容”，吴佩孚讨冯通电中骂冯为“巧于遁饰，更肆毒谋”），有些人甚至目冯为“赤化”。他再不能够对这些人存有合作的幻想；甚至求得一定程度的谅解，做到彼此相安无事，也是不可能的了。这就迫使他不能不考虑新的出路。他在苏联同很多苏联的党、政、军领导人见过面，看到苏联革命后的兴旺气象，听到许多有关革命的理论，参观了许多革命后的新建设，所有这一切，对他确实起了很大的鼓午作用。他感到只有走革命的道路，才能挽救中国的命运，也才有自己的出路。他感到自己过去对革命的认识过于肤浅，既没有革命的主义，又没有革命的策略，只凭自己的一点爱国热情，就想推翻旧社会的暗黑统治，那怎能会不失败呢。这时，他才进一步认识到，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才是真正的革命的主义，虽然中山先生已经去世，可是广东方面正在遵循着他的主义展开了革命的斗争，而且还有苏联的援助，不久将有很大的发展。广东努力的方向，也就是国民军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当然，摆在面前的还有很多困难；但是，只要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有了苏联的支持，取得广东方面的合作，再加上国民军吃苦耐劳、牺牲战斗的精神，任何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当冯反复地考虑了这些问题之后，决定派人去广东先摸底，看看那边的实际情况，以及如何与广东国民政府取得密切联系，然后再决定他自己的行止。

## 二

约在一九二六年六月间，冯决定派我和李鸣钟到广东去和国民政府进行联系。临行，

冯对我们说："现在广东的国民政府准备北伐，就要出动。我已加入国民党（冯在赴苏途中经徐谦、于右任的介绍加入国民党），接受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联苏、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决心与国民革命军合作，南北双方遥为策应，彻底打倒北洋军阀的封建势力，完成我若干年来救国的志愿。目下我军固守南口，已逾两月，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等联合进攻，其势甚猛，而山西的阎锡山又复邦助敌人在大同方面扰我后方，尤为恶毒。我军前后受敌，艰困万分，每一念及，真是痛心极了。因此，我请两弟前往广东一行，代表我与国民政府取得密切的联系，与北伐军商定合作的办法，并且催促他们迅速北进，早日到达长江流域。那时，敌人兵力分散，首尾不能相顾，我军将根据实际情况的可能，或者是反攻京、津，直下鲁、豫，或者是取道甘、陕，打出潼关。我们一定要在南北两大革命力量紧密合作之下，杀出一条血路，来救国自救。徐季龙（徐谦）先生已经由这里致电广东，告以你们马上就去商洽一切，季龙先生不日也要回国赴粤。他和我们的关系很深，对于国民政府内部又很熟悉，你们先去接洽，等季龙先生到时迂事和他商量进行。我在适当的时候，也就回到军中，继续奋斗。"

我和李鸣钟接受任务以后，离开莫斯科，先到海参崴。海参崴的中国领事馆的负责人，当时是张作霖方面的人物，我们为了避免暴露行踪和防止无谓的麻烦，没有和领事馆接触，就在旅馆里等待船期，过了几天，搭乘苏联的商轮出发赴上海。那时，上海是孙传芳的势力范围，与北伐军处于敌对的地位，船到吴淞口外，忽然仃止前进，听说要检查旅客。我们带着冯玉祥给广东方面的书信和有关文件，恐被查出，招致意外，当与苏联船长说明情形，请其协助。他马上给我们找了一只小船，直送至黄浦江法租界靠岸。我们上岸以后，找一饭店住下，候船先到香港，再转广州，因为由上海到广州，没有直航载客的大轮船。

## 三

在上海候船期间，我迂到久未见面的旧友张九维。他是我的同乡，从前在德国学军事，回国后，做过湖南督军汤芗铭部下的旅长。张敬尧入湘时，他的一旅经不起战斗，一接触就垮了；他这一旅是汤的主力部队，他垮了，汤芗铭也就垮了。此时，张在上海闲住，旧雨重逢，畅叙契阔。他告诉我："何成浚在这里代表蒋介石活动，何不先去见见他。"何成浚与我的三哥刘一清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因此我和他也很熟悉，我就马上去找何。何见我后，问明来意，喜出望外，他说："我在这里代表蒋介石和各方联络，现在北伐军已经出发，进行颇为顺利。你们代表国民军来和国民革命军接洽合作，这对于北伐军的声势方面大有邦助，我们非常欢迎你们。我们对孙传芳已有联系，可望在不侵犯他的利益的情况下，他不妨碍我们的行动。"他问我南口战况如何，我说："我在旅途中间，无法与军中通信，只不过从报上看到些消息。不过我可断言，国民军上下一致，人怀必死之心，一定能够抗住顽敌的进攻。"

我和何成浚既是旧友，在我所负的使命方面也有同他联络的必要，因而往来较为频繁，这就引起了李鸣钟的不满。他以为何是一个没有实力、卖空买空的人，与这种人往还没有用处，始终不愿与何见面。李初次到上海，对于洋场十里，纸醉金迷，深感兴趣，打

算多盘桓些日子。同时，他认为广东军队空喊北伐，哪里敌得过北洋劲旅，迟早必归失败。他主张在上海看看风色，再定行止，坚决不肯与我同行赴粤。他是冯玉祥的爱将，一向受到冯的纵容，动不动就发脾气，这回又要起少爷的作风来了，我只好平心静气地劝他以使命为重，应当共同行动，同去广州，他执意不允。没有办法，船期到了，我就先动身，同行的有方本仁、张九维。方本仁是在江西失败后投奔广东去的，张九维是去广东活动职位的。

我们三人到了香港，住在皇后酒店，刚刚安顿好，方本仁忽然要搬走。他说，他瞧见岑德广在这个酒店里看朋友，他和岑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过，所以要换一个旅馆住。原来方本仁在江西当督办的时候，岑德广带了大批伪造的中国银行钞票到卢山游玩，被当地发觉破案，把他驱逐出境，岑因此恨方入骨，声言定要报复。岑在香港居住多年，人头很熟，方怕吃他的眼前亏，故尔要避开他。结果，我们三人就一同搬到九龙饭店去了（岑后来当了汉奸，做汪伪的赈务委员会委员长）。在香港，我没有见到任何方面的人，住了几天我们就离开了。

## 四

大约在七月中旬，正是很热的天气，我到了广州，住在大新公司的旅馆里，受到国民政府的招待。我初到广州，人地生疏，言语不通，国民政府派参事包惠僧、张宇新陪我活动。我见到了当时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负责人，如张人杰、谭延闿、宋子文、孙科等等，向他们表达了冯玉祥接受三民主义和联苏、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决心共同北伐的来意。我见谭延闿的时候，因为他和我的三哥刘一清是老朋友（在湖北人驱逐督军王占元、湖南人驱逐督军张敬尧的时候，两湖人士有过联合行动，谭和我的三哥在这次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运动中结成了好友），所以和我谈得很亲切。我们先谈了一些过去的事情，然后就谈到了国民军的问题。他说："目前大局形势很好，广东境内的反动势力已经肃清，北伐军事进展得很顺利。焕章先生在北方有威信，如果长期在国外，不但影响国民军的士气，对整个革命事业也是不利的。希望他早日回国，联合起来，共同为革命事业奋斗。"我说："在我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冯总司令已经在作回国的准备，不久他就会回到军中的。国民军人数不下十万，是一支有力的革命部队，前年冯总司令用这支部队发动了北京政变，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不料段祺瑞勾结张作霖，窃取了政变的果实，使冯原定拥护中山先生的计划，归于失败。尽管如此，但是北京政变对北洋军阀的反动势力，还是给了一个致命的打击，为目前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扫清了道路。几个月来，国民军在南口方面，抗击着张作霖、吴佩孚的联合进攻，孤军奋战，英勇坚持。现在北伐军已经出动，而且进展很快，南北两大革命势力已能遥相呼应，国民军不再孤立，而国民革命军也在北方建立了可靠的同盟军，这声势可就大了。冯总司令的意思，希望国民政府对北伐军事作一通盘的筹划，使国民军与国民革命军不但在精神上互相支援，而且还能够很好地配合作战，以加速北洋军阀的崩溃。当然，国民军也还有不少困难，南北地方贫瘠，饷项给养不易筹措，加以长期转战，弹药更为缺乏，将来随着军事的进展，到了南北双方能够接上气的时候，还要仰仗国民政府给予物质上的接济。"谭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并表示

在条件许可的时候，一定对国民军尽力支援。随后，我又见到了负后方留守责任的李济深和广州卫戌司令钱大钧。这时，张人杰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谭延闿是国民政府的主席，宋子文是财政部长，孙科是广州市政督办兼公安局局长。我又见到了鲍罗廷顾问和加伦将军等人，他们对于国民军在南口抗敌，坚持奋斗，大加赞扬。由于冯玉祥与国民党从前有过联系，并曾经欢迎过孙中山先生北上，所以这些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对国民军寄托着一定的希望，因而对于我这远道而来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初到之时，我列席国府会议，参加各种集会，真有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派头。宋子文、孙科等人，也常常到我的住处来。我参观了广州的市政建设，凭吊了黄花岗烈士墓，游览了各处的风景古迹。有一天，谭延闿招待我去参观黄埔军官学校，集合了全体学生，请我讲话。我报告了国民军建军的历史、军队的编制和历次反封建、反北洋军阀的事迹以及现在在南口作战，牵制了张作霖、吴佩孚的主力，有利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当前形势。这一报告，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对于鼓午北伐军的士气起了些作用。通过这次参观，我看到了黄埔军校在国共合作、共产党领导政治工作的情况下，全校学生普遍表现着非常活跃的气氛，对革命前途充满着坚强的信心，这时，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负责人是恽代英，我与他谈得很投机。

我奉冯命来广州，主要是商洽国民军与北伐军的合作，所以对于统率北伐军队的蒋介石，必须首先联系。我到广州时，他已去韶关督师。我给他去了一个电报，他回电说，北伐军进展甚速，他已由韶关前进，请我先和国民政府接洽，他已另电通知了国府。蒋介石掌握军事实权，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有重大事件，经常取决于他，此时，他已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了。不久，徐谦到了广州。通过协商，我和国民政府的谭延闿、徐谦、宋子文、孙科等人，在座谈的形式下做了决定，主要内容：1、冯玉祥统率所部的国民军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联苏、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从北方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行；2、国民政府对于国民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标准，一律待迂。我把这一决定电达冯玉祥报告，电报托由苏联顾问发到莫斯科去，过了几天，冯复电完全同意。从此，冯玉祥的国民军就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了。

## 五

我在广州把诸事忓妥以后，正在准备回到上海的时候，李鸣钟由上海来到广州。旋即接到我军由南口撤退的消息，好象在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一样，顿时感到前途暗淡。接着，又得到冯玉祥由莫斯科动身回国的消息，以为只要冯回到队伍，国民军就能够获得新的转机，我就同李鸣钟一同乘轮北返上海。

北伐军克复汉口、汉阳后，我由上海到汉口。这时，武昌城还未攻下，我是武昌人，北伐军曾邀我去协助攻城的策划工作。武昌三面环水，唯有东门易于进攻，太平天国两次攻克武昌，都由东门进入。这次北伐军攻武昌，得到内应，结果，也由东门攻进。武昌既下，武汉三镇的局面稳定了。在这里负军事责任的是邓演达和唐生智，唐管作战，与我联系较多的还是邓演达。邓是蒋介石的总司令行营主任，受邓命来招待我的仍旧是在广州招待我的包惠僧。邓对我说："蒋总司令在江西布置军事，不久就来武汉，他来电请你在武汉等他，不必去南昌，叫我和你多多联系。"于是我就在汉口住下来，成立了国民军驻

汉办事处。李鸣钟本在上海，这时看到国民军和北伐军指日会师中原，形势甚好，就由上海到了汉口。

邓演达为了加强和国民军的联系，打算请我暂任行营的参谋长，叫包惠僧征求我的同意。我以冯玉祥已经到五原誓师北伐，正在整顿队伍，向陕西方面挺进，我在武汉完成代表的任务以后，仍须回到军中，未便在武汉就事，当既婉辞谢绝。后来邓演达请示了蒋介石，由行营派我为河南招抚使，希望我对于留在河南的国民二、三军的旧部和其他与我有关系的军队，如袁家骥、马吉第、贺国光等部，作些收编工作。我想这和行营参谋长不同，收编这些部队，还是可以比较容易做到的，于是我就担起了这项任务，派了许多人分头和这些部队联络；以后国民军到达河南，我把他们介绍给冯玉祥，在扫除北伐的障碍和扩大北伐的声势方面起了一些作用。但是我始终没有组织招抚使办公的机构。

不久，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除原有各部外，增设了三个部：农工部，部长苏兆征；劳动部，部长谭平山；司法部，部长徐谦。旋又设立军事委员会，由谭延闿兼任委员会的主席，下设四处：秘书处，处长林祖涵；军需处，处长吴玉章；参谋长，处长龚浩；由我担任陆军处处长。国民党上层人物与冯玉祥关系最深的是徐谦，他一向以国民军作为他的政治资本，所以这次他提议要我担任这个陆军处长。我惟恐引起冯的多心，认为我也在抢官作，经徐征求冯的同意后，我才接受了这个职务。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下旬，蒋介石由南昌来到武汉。这时，国民军已经打出潼关，会师中原已是指顾间事。蒋对国民军开始重视了，一到武汉，立即接见我和李鸣钟，由邓演达陪同前往。我们是初次和他见面，首先代冯向他致意并表达冯对共同完成北伐的决心和信心。他殷勤接待我们，对我们说："上次你们二位到广州，我因军队进展甚速，没有能够迅速和你们见面，甚为抱歉。国民军纪律的严明和战斗力的坚强，我们久所熟闻，冯总司令的治军、用兵，尤所钦佩。北伐大业得到冯总司令的参加，进行定必更加迅速。将来北方之事，仰赖冯总司令之处极多，希望你们转达我意，请他多多指教。我在江西方面指挥军事，不能久驻武汉，国民军需要什么，你们有什么困难要解决，请你们随时与邓主任接洽办理。"我们从表面上看来，这时邓演达似乎还是蒋介石的亲信，终日不离左右，每逢蒋介石演讲之时，讲到激昂的地方，邓即带头大喊口号，以助声势。其实，据我当时听到的，两人已经貌合神离，蒋介石已经日趋反动了。蒋在武汉巡视后，在一个深夜里，悄悄地乘轮回航江西，行前知者甚少。

## 六

由于宁、汉分裂的表面化和斗争的尖锐化，又由于第二集团军（冯于五月一日就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职，从这时起，国民军就改称为第二集团军）在军事上的胜利和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冯的政治态度如何，就成了宁、汉两方极为重视的问题，他在宁、汉斗争中居于举足重轻的地位。

此时，蒋介石军事独裁的狰狞面目，日益暴露，他在南昌发号施令，反对和共产党合作，处心积虑，要颠复武汉国民政府，而力量不够、不敢发动军事冲突。适于此时，国民军平定甘、陕，出兵潼关，他盼望得到冯的支持，来共同对付武汉。有一次，蒋以亲

笔信邀我去南昌参加军事会议，这次会议有李宗仁、何应钦、鲁涤平、张群等人参加，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布置第一集团军北伐军事，同时讨论了第一、二两集团军相互支援的问题。会后蒋对我说："最好住在南昌，不要再去汉口。"显而易见，他是希望把冯拉他这方面来的。我以武汉尚有职务，所以没有在南昌住下去。

在武汉方面，对于蒋介石的破坏国共合作，分裂国民政府，群情早已极为愤慨，而蒋介石变本加厉，竟敢公开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事变，大规模地残杀在一条战线上共同北伐的共产党人。武汉的人民群众无法再事容忍，一致要求对蒋严厉制裁，但因国民党上层负责的军政人员，意见不能一致，以汪精卫为首的一群投机分子首先表示动摇，因此，国民党的左派把联合对付蒋的希望也寄托在冯玉祥的支援上面。唐生智的代表曾到潼关探测冯的态度，邓演达并曾亲到潼关，观察冯的真意所在，结果，得知冯并不同意反蒋，因而武汉的危机日益加甚。

宁、汉之争，引起了冯的极大忧虑，因为他的军队从撤出南口到转战陕、甘，是拚着命从饥饿线上挣扎过来的，只有军事上取得胜利，才能找到出路，得到补偿，所以他的主张是军事第一，一切都要服从军事，他的主张也代表了全军上层的意志。他曾经对人说："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打倒军阀，完成国民革命，所有力量都应集中于此，不容分化，现在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的势力还盘踞在黄河南北，没有彻底击溃，目前当务之急，就是团结北伐，不应自相水火，为敌所乘。"冯的这种看法，从表面上看，似乎对宁、汉双方并无所谓左右袒，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他在刚刚由苏联回国的时候，革命意志确很坚决。他曾经明确地表示："现在我们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今后要将国民军建立在民众的意志上，完全成为民众的武力。军队所在的地方，对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均当予以邦助，并联合其他民众团体，共负革命的责任。"可是一旦当群众起来之后，他的态度却又渐渐改变了。

当时，陕西省内因为驻军过多，军用的征发，已使地方陷于窘境，于是有些县党部的政治工作人员就向人民宣传，叫他们不完粮，不纳税。遇有军队过境，向地方要粮草，要车马，他们就向人民宣传，反对摊派差役，反对征发军用物资。甘肃也有同样的情况。有一天，国民二军的一个姓何的旅长向冯报告，说他的部队驻防在西安附近盩厔、鄠县一带，农民拒绝纳租纳税，每逢征发给养，就遭到农民协会的反对；农协在党部支持之下，不经地方军政长官的准许，擅自捕人、杀人，有的乡镇长就被他们杀掉。冯听了报告，非常不满。在四·一二事变之后，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屠杀，引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无比愤怒。冯在潼关的时候，政治工作人员有人提出倒蒋的口号，同时街上也贴着倒蒋的标语，冯不以为然，当即集合大家讲话说："在目前的情况下，首要的任务就是团结一致，打倒军阀，万不可自相水火。"事后，政工人员谈论冯的讲话，有一位政治部的贾科长表示反对。他说："我们一致要求倒蒋，因为他已经背叛革命；可是有一个人偏偏要庇护蒋，庇护蒋的就是军阀，就是反动，我们就连他一块儿打倒。"这些话被冯亲自听到，他忍不住地对贾说："我已经一再和大家讲过，我们不要轻举妄动，随声附和，等事情弄明白了，我们自有主张。你现在又说这些话作什么？你要倒蒋，你倒你的去，我们还不到时候。"贾仍不同意冯的说法，和冯争论起来，并且提出自由、平等的口号，说冯不应当凭借自己

的地位，对他专制和高压。冯大为不满，于是就以维持军纪为理由，命令把贾拘押，旋经政治部长刘伯坚的解释，才予以释放。所有这一类的事情，都是冯所认为触犯到他的生命线的大事，是使他最为厌恶和害怕的。因此，当他听到武汉方面一些措施有点“过火”而蒋介石对武汉持反对态度的时候，就很自然地倾向于蒋介石方面，而走上助长反动的途径了。

我是一个军人，当时代表冯玉祥与国民政府联络，总是盼望早日完成北伐，国民军得到出路，我也可以跟着有出路，而且我驻在武汉办事，也就希望武汉政府的成功，至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我并不十分了解。所以我对宁、汉之争，只看作是权利之争，却看不到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冯当时也有相同的看法）。但是我亲眼看到共产党人不顾生死，前仆后继，共同北伐，立下大功，而蒋介石以怨报德，惨杀战友，这不是自坏长城，妨碍北伐，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吗！因此，我对蒋介石的这种做法，认为失计。

## 七

郑州会师后，谭延闿、汪精卫、徐谦、顾孟余、孙科、邓演达、唐生智等都到郑州，冯玉祥也从潼关来会，大家就在六月十日在陇海铁路车站附近的陇海花园里举行会议。我那时也由武汉到了郑州，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首先是谭延闿对冯恭维了一番，他说：“焕章先生发动北京政变，推倒曹、吴，是符合革命要求的一件大事；第二集团军纪律严明，作风朴素，是我们治军的榜样。特别是这次从苏联回国参加国民革命，转战数千里，很快就打出潼关，对于加速北伐的进展起了很大作用，真是劳苦功高，我们应向焕章先生和他的全军将士致敬。现在敌人还在负隅顽抗，北伐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希望焕章先生今后在军事上对北方担起更重大的责任，而且也只有焕章先生能够担起这个重任。”冯对谭的这番恭维话表示了谦逊，并说：“如果没有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使得敌人首尾不能兼顾，二集团军的进展也不会如此顺利。希望今后在我们革命的队伍中加强团结，齐心协力地完成革命大业。至于我本人以及二集团军全体官兵，只要有利于北伐的革命事业，无不尽力以赴。”接着就是汪精卫发言，他一方面谴责了蒋介石独裁专行，目无国府，他他：“蒋介石要把党和政府放在他的军权控制之下，这是我们所反对的，”另一方面，他对共产党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说：“共产党借口国共合作，搞他的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秩序大乱，这是破坏国民革命，应予严厉制止。”在他看来，好象蒋介石的反共是共产党咎由自取似的。徐谦的发言，着重说明了南口战役的重要意义。他说：“国民军在南口苦战数月，牵制了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等军队不下二三十万人，这对国民政府的北伐来说，不仅起了南北呼应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还起了分散敌人兵力的作用。”接着又谈了一些冯的为人以及参加革命的决心，在有意无意之间似乎是让在座的人知道他和冯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邓演达本来是一位很会讲话的人，但在这次会上发言不多，唐生智也很少发言，可能是他们在事先摸了冯的底，知道冯的态度和他们完全相左，故尔不愿发表意见，仅对冯表示了好感而已。在此期间，徐谦、孙科和冯谈了些武汉的情形，指出他们所认为不满意的一些事实，例如他们说：“每次开群众大会，总说是到了二十万人或说是十几万人，其实连一万人都不到”；又说“社会秩序紊乱，商店店员只

顾游行开会，不做工作，也不许店主做生意"等等。何键又对冯谈了些湖南的情况。他诬蔑群众运动，说："现在湖南的情形真是一团糟，稍为有几个钱的人，都无法安居了。就是士兵们带上三、五元或十元、二十元回到家乡，当地也要对他收税，甚至加以拘禁，说大家都是无产阶级，你不应随意享用此钱。连长、营长的父母兄弟，有的被拘捕了去当土豪劣绅惩办。我的军队里，官长多数是湖南人，现在驻在河南，听说家乡如此不能安心，都急着要回老家去。你看，这样下去，还能打仗吗？"冯听到这一类的话，由于他的阶级本质的限制，同时，他联系到陕、甘境内和军队里发现了对他有着尖锐矛盾的情况，他就对武汉更加不同情了。

本来武汉方面是要拉冯反蒋的，可是当他们窥察到冯的意向之后，就不能不暂时把他们的打算收起来了。所以在这次会议中，对于如何采取步骤制裁蒋介石的破坏国共合作、惨杀共产党人的罪恶行为，谁也没有提出明确的主张；而冯在会议上，则总是无原则地力劝武汉继续北伐为重，停止宁、汉之争，而对于蒋介石的反动行为则是闭口不谈一字。在冯玉祥的主观上，可能是为了调解争端，力求团结，完成北伐，而在客观上却只能起着支持蒋介石搞垮武汉政府、帮助反革命的作用。

会议决定组织河南省政府并设立开封政治分会，这两个机构都由冯来负责组织；陇海路以北、平汉路以东的敌人，统由冯来负责肃清；所有在河南的北伐部队，一律撤回武汉整理，巩固长江方面的防务（后来才知道是为了镇压工农运动）。会议只进行了两天，汪精卫、谭延闿等突然要回武汉，冯挽留无效，等他们走后，冯就问我："究竟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行色匆匆，说走就走？你去武汉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明底细，以为或者是武汉发生了什么突变。我乘火车去武汉时，在车上盘算：万一汉口出了乱子，我的行动倒要多加小心，于是我就在离汉口还有一站的刘家庙下了车，马上去见住在法租界的汪精卫，才知道他们得到密报，说是冯已与蒋介石秘密勾结，要把他们扣留在郑州，故而他们匆匆离去。这当然是一种谣传，因为冯、蒋当时尚没有那样密切的关系。但在六月十三日郑州会议结束以后，冯紧跟着就应了蒋介石的邀约，于六月十九日在徐州参加了所谓徐州会议。经过徐州会议，冯玉祥被蒋介石拉了过去，跟着蒋介石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他不但反对武汉政府，也在他的军队中和所辖的地区内进行清党反共了。关于冯、蒋的关系和徐州会议的情况，容另作专题叙述，这里从略。

## 八

我在武汉当代表这一段时间里，替国民军从军事委员会陆续领到些款项和几百万发枪弹。当时武汉与西安之间，交通未复，汇兑也不通，而武汉纸币的币值，又复逐渐下跌，只好把一部分款项买成布匹、汽油、五金材料等物，连同枪弹，装载木船，由汉水溯流运出，打算取道襄阳、荆紫关入陕。我一面电请驻军龙驹寨的孙连仲派兵一营前来迎接，一面派熊斌由武汉随船押运。不料船到襄阳，被当地驻军张联升把子弹扣留，吓得熊斌逃回武汉，而孙连仲派来接运的一营军队也到了武汉。这一营军队就归我指挥，在夏斗寅叛变的时候，武汉防务空虚，还参加过保卫武汉的任务。

当我与李鸣钟同在汉口时，有一次群众举行"三一八"惨案纪念的大会，由徐谦主持开

会。会后，演出“三一八”惨案的话剧。剧中有惨案发生后当时的代理警备总司令李鸣钟被段祺瑞大加斥斥的一幕，李鸣钟由小丑扮演，状极狼狈。李鸣钟在街道上看到纪念惨案的标语，又听到话剧里关于他的情节，对武汉政府非常愤恨，认为是有意叫他难堪。同时，徐谦还逮捕了段祺瑞时代的财政总长贺德麟，要追究“三一八”惨案的责任。李鸣钟恐怕牵连到他，于是连夜离汉赴南京，竭力向蒋介石方面活动。六月十九日的徐州会议，李鸣钟由南京随蒋去徐，在冯、蒋之间做了些拉拢工作。后来李鸣钟终于被收买（有一次蒋就送李十万元，后来李到上海去，又被绑票匪绑票，把十万元绑去了），成了蒋介石手中瓦解西北军的一个筹码。

（戈定远整理）

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九日

#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

（一九二七年五月）

全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们！

过去二年之间，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伟大迅速的发展。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用压迫、剥削、抢掠、攻袭的手段以获得并巩固其势力，如今这些势力已经发生摇动了。当此革命胜利的斗争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确是主要的动力。因为劳动群众的拥护，国民革命运动曾在广东得到过巩固的基础；因有工农群众的邦助，国民革命军曾使革命的领域扩张至长江流域。当帝国主义者实行以武力侵占上海镇压革命军时，首先立身于帝国主义炮火之前者，就是英勇的无产阶级。促成武汉国民政府的建立，削弱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之势力的，也是革命的民众势力。在过去，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已经为革命而战斗而牺牲了，革命的前途也要依他们的战斗意志而前进，以他们的决心而胜利！

在这严重的革命进展的阶段中，国民革命战线内的阶级分化确系一个重要的现象。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没有反对大资本家及封建势力的剥削之斗争与之相伴而进，是决不能发展的。阶级的斗争和国民革命的斗争，势必同时进展。现在国民革命阵线之中，因为大资产阶级的背叛而日益冲突，最终结果，乃至分裂。

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在中国并非新的发现。自帝国主义建立其统治以来，早已有这种斗争的发生。过去革命运动（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庚子之役），都是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情绪之原始的表现，然而一般反动派称他们是排外运动。

帝国主义之统治在中国的形成，由于两个方式：第一，帝国主义兽性的武力侵略；第二，国内满清皇族及封建官吏的贪婪腐败。第一种是在帝国主义侵入时期的主要方法；第二种能促成帝国主义统治的巩固。过去的革命运动，都为列强的新式武器和中国的封建军阀的政权所镇压下去了。此后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渐见民权主义的色彩，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遂推翻满清统治的皇朝。所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推翻封建势力以及其他反民权分子的斗争，总是同时并举的；这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现象，乃是近百年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共同的主要原素。中国革命运动愈进展，民权和封建势力之剧战，也愈显著。

中国辛亥的革命虽说将贪淫的满洲皇帝推翻了，但未曾将民权主义实现于全国。其原因就是革命的社会基础太狭隘。当时参加革命的只有资产阶级和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力量决不敌帝国主义所卵翼的反动势力。所以第一次的共和终归夭亡，革命运动亦遂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所保护的帝制运动（袁世凯），只因帝国主义者内部的嫉忌，方被扫除。

欧战以后，国民革命运动，获得了广大的民权派的社会基础。在反对巴黎和约口号之下，恢复民权运动的生命。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的主力，就是城市的民权

派，当时的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式的知识界，特别是学生。但在这个时期，群众运动的社会基础并不深远。无产阶级尚未引进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抵制仇货的运动确实打击了帝国主义，但是，并没有提出扫除封建势力及一切反动分子之要求，以表露此次革命运动之民权主义的特质。——而封建势力和其他反动分子，却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实基础。

而且排货运动有他的限度。要想使排货运动达到严重打击帝国主义的程度，就不能不妨害本国贩卖洋货的商人。这种内部冲突，确实是五四运动的弱点。不过我们决不要忘记：五四运动是后来有广大社会基础的真正革命运动之发端。五四运动的确对于那些无确定阶级的知识分子给了一个有价值的革命课程，使他们的视线移转到劳苦的群众，使他们认识无产阶级是当时革命势力的后备军。

近五六年来从事工农运动的先锋，大都是由五四运动后逐渐训练出来的。这个事实，指明在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之过程中，社会的关系将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结合在一起。现在的革命，需要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共同合作，所以五四运动的先例，很值得我们回忆。城市的民权派（小企业家、小商人、技师、知识分子、雇员），在政治经济上都居于被压迫的地位。他们要求政权和经济的发展。他们因为不满意于现状，所以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但是，不求得他们的切身的阶级利益，他们是不能将反帝国主义运动发展至如何深远的程度的。然而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不免有暂时阻滞商业的影响，这不仅麻烦了大资产阶级（如银行家、买办、批发外国货者），同时也妨害了些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城市的民权派作领导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因为内部的冲突，不能有深远的发展。就是政权的斗争也不能举行，因为经济的冲突不加紧，政权的斗争不能紧张。五四运动就是一个明证。此时小资产阶级中的最进步分子（阶级性不确定者），恐怕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因内部的冲突而停滞。于是中国革命不得不另找斗争的出路——这个出路就在工人阶级奋斗之中找到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只有和无产阶级联合向帝国主义及其同盟军（封建势力和军阀）同时攻击，才能达到他们经济的利益，获得民治的政权。

小资产阶级经济之所以不能开展，并非帝国主义统治之直接的结果。反之，现时中国小资产阶级经济的存在，乃是自由的繁荣的外国商业所赐与。真正能妨害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者，乃是国民经济的封建性，和循环的军阀战争。这两种形式和帝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这却是帝国主义统治的结果了。封建式的经济阻滞了内地商场的开展。中国封建形式的统治机关，采用多种方式（苛税和厘金等），以阻碍自由的贸易。军阀以重税压迫商人，实际上就能破坏商业。封建军阀的专制，将中等阶级的权利完全剥夺。所有这些现象统统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至于工农更不用说了。城市民权派的反帝国主义情绪，是不自觉的，虽说他们反抗压迫，但不认识敌人的所在。如果直接反抗帝国主义呢，登时他们又觉着妨害着自己的利益；于是他们在失望之中，就将此斗争放弃了。欲保持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必须根本铲除直接压迫他们的势力（就是妨害商场，破坏贸易，并侵害知识分子雇员之经济利益的军阀士绅）。但是，小资产阶级的自身不能找到革命的路径以图自救。只有和无产阶级联盟，在无产阶级影响之下，小资产阶级才得到解放。五四运动最重要的建树，就是小资产阶级在客观上（不是自觉的），趋向于无产阶级去了。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之五卅运动，证实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形成了伟大的群众运动。在此运动之前，曾有一个组织工人群众的时期。此时所提出的要求，如废除不

平等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国民会议，亦并非纸上谈兵，此种要求之后，的确代表广大群众的意志，而得其拥护。群众的意旨发生群众的行动。上海无产阶级及城市民权派的革命行动，虽然陷于血泊之中，但是他的影响普遍全国，变更了帝国主义的态度。

上海工人的经济罢工，加上了革命的政治色彩之后，那些和帝国主义有密切关系的大资产阶级，立刻起来消灭这个运动。结果，他们破坏了革命的战线，邦助了帝国主义。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并非帝国主义者为报答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勋劳而开的，乃是无产阶级和民权势力用革命的行动在帝国主义者手中所强夺来的。

中国革命民众的觉醒，还有其他的证明，就是以前的海员罢工和五卅时之粤港罢工。五卅时之粤港罢工是纯粹的政治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永放光明。那时无产阶级的行动，巩固了广东革命政府的社会基础，并将国民政府形成了反帝国主义及民权自由运动的中心机关。

民权的势力及广东国民政府，因有无产阶级的邦助，将英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的反革命势力，打的体无完肤。买办阶级企谋推翻国民政府，无产阶级毅然拥护着他。所以，捍卫广东，反对香港英帝国主义的攻击，并以一年余的经济封锁，削弱帝国主义的商业者，更是中国的无产阶级。

以上和其他可记忆的事件，都表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社会基础，已经扩大起来。伟大的革命运动亦已卷进了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过这一运动的原动力，仍旧是无产阶级和民权派的势力。无产阶级和民权派的势力在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亲密的同盟。然而，在这国民革命运动的组织中，阶级的冲突决不能全部泯灭。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设非和阶级斗争同时发展，决不能按革命的路程前进。国民革命的职任不仅是反抗帝国主义，并且同时便要肃清阻碍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封建宗法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冲破了资产阶级式的民权主义之限制。

国民革命运动性质的更变，不仅吓怕了帝国主义，同时惊醒了大资产阶级。在民权革命运动进展的过程中，大资产阶级发觉了与他们利益有妨害的事实。他们希望无产阶级和民权派只为他们的革命而牺牲，同时不要妨害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革命运动客观的性质，决不能因大资产阶级主观的欲望而削弱。

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的独占相冲突；所以，过去资产阶级不但参加革命，并且在初期曾经领导革命。虽然，中国民众与帝国主义间的冲突，非常之深刻。中国各阶级同时反对帝国主义，而各阶级的目标却各不相同：资产阶级想和帝国主义谋妥协，而无产阶级则需要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的势力。中国资产阶级之中，除买办阶级外，和帝国主义固无好感，但是他们自己却希望能够自由行使其剥削。完全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必须破坏封建式的资本主义之一切剥削，——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根基。换言之，就是完全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必须加紧阶级斗争；此种前途便恐吓了资产阶级。

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不能阻滞无产阶级和民权势力所推动的国民革命运动，终竟破坏了革命的联合战线。三月二十事变后，资产阶级恢复了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并且努力缩小革命运动的路程，使合于资产阶级的利益，结果因中国的客观环境关系，势必走到和帝国主义妥协的道路，蒋介石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纲，是想用军事的胜利统一中

国，然后与帝国主义谋妥协，使中国大多数民众仍被剥削。

当资产阶级反抗军阀的时候，客观上带些反帝国主义性，所以无产阶级和他们在初期建立联合战线，集合工农的力量赞助北伐，以反抗北洋军阀。设非工农的邦助北伐军，消灭吴佩孚、孙传芳的势力，决不是那样容易。资产阶级却要想从军事的胜利中，只保护他们一阶级的私利；然而，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以客观条件的规定，不能只按照某一部分人的私利而进展。中国全体民众的利益，是要求扫除封建势力，建立民权政府，推翻帝国主义。国民革命军胜利后，适于民众运动发展的环境已经造成，反对封建势力，攻击帝国主义及建立民权政府的斗争，因而加紧。结果，北伐的胜利，一方面固然强健了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亦削弱了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组织力量，打破了蒋介石以军事独裁控制国民革命，并单独为资产阶级谋利益的企图。但是资产阶级确实强大起来了，他竟领导着一部力量脱离革命的战线了。这样一来，资产阶级虽说勉强戴着国民革命的面具，他们确实变成军阀的友军和帝国主义的工具了。

蒋介石所领导的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在未正式脱离国民革命战线之前，已经有反革命的行动了。蒋介石在江西屠杀工人领袖，就是他仇视工农运动的表现。上海无产阶级发起武装暴动邦助国民革命军，蒋介石却故意下令阻止军队不使前进。蒋介石峻拒了上海无产阶级伟大的、友谊的援助，并且坐视孙传芳屠杀工人，不为之稍动。蒋介石既到上海之后，接受帝国主义的怂恿，用暴力压迫为欢迎国民革命军而兴起的工人阶级。

蒋介石打击工人运动，极力仇视共产党，终竟揭破了他的国民革命的假面具。在这个革命阶段之中，工农群众更是国民革命的发动力了。唯有他们斗争，才能保证反帝国主义的胜利。所以反对劳苦群众的革命行动，破坏工农的组织者，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乃是国民革命的敌人。蒋介石及其部下的行动，自三月以后都是反对国民革命的，他们的行动决非个人的行动，乃是代表了一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国民革命军在长江流域的胜利，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恐怖了帝国主义。中国的内河充集了外国炮舰，在上海（帝国主义的根据地）实行武装警戒，以防御国民革命军的侵袭。但是帝国主义究竟不敢以直接行动反抗革命军。他们企图插入革命的战线，以腐化革命分子。帝国主义认清了中国资产阶级在反革命上是他们客观上的同盟军。所以他们一面表示对于革命的一般的敌意，一面却表示：如果资产阶级反对革命，他们可以保障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看到了帝国主义这种政策，于是下决心反叛革命。

资产阶级的反叛，兴奋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拟利用革命战线的破裂，决定实行武装干涉。帝国主义因武汉革命政府采用了侵略的政策，精神上邦助了资产阶级和他们戴着国民革命假面具的南京政府。

阶级的分化和帝国主义的干涉，是现时革命阶段里的显著的特性。如果不明了阶级分化的意义和教训，那就决不容易战胜帝国主义的干涉政策。阶级的斗争更加紧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更不能和阶级斗争分开了。在过去，资产阶级能间接反抗帝国主义时，无产阶级也努力和他们保持联合战线。现在资产阶级公然放弃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回头向工人阶级宣战了。资产阶级的背后，就是封建的反动势力，军阀和帝国主义。他们这些成分已经联合了一个反革命的大同盟，来镇压国民革命。所以革命势力的职任，是反抗以至歼灭这

个反革命的联盟。

中国的工人们和农民们！强健起你们的组织，来和城市民权势力建立革命的同盟，拥护革命的政府，使他永远立于不败的地位。

革命运动定要向前进行，应在各地摧毁反动势力的根株，以冲破反革命的同盟，消除军阀，推翻帝国主义。革命的基础，一定要使它深入。无产阶级、农民群众和城市民权势力，既然为革命而战斗、而牺牲，革命的发展必须能保障他们的利益，扑灭他们的敌人。

帝国主义除非有中国工具的邦助，是不能向革命势力宣战的，过去的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在现在的阶段中，我们必须破坏这些工具，才能削弱帝国主义的基础。反叛的资产阶级拟集合所有在国民政府领域内的反动势力于他们的周围，至于在广东、上海、南京、广西、四川已经建立了一个反革命的环形，逐渐向前进展，以达到禁闭国民政府的目的。反革命的势力自然借助于封建宗法的成分。革命的国民政府，欲战胜反革命的阴谋，必须要在自己领域内消灭反革命的根基。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必须拥护政府完成这个职任。在现在的革命阶段中，国民革命必须和农民革命吻合一致。

大地主的田地必须没入。民团、团防必须解除武装，绅士的政权必须消除，乡村自治政府，必须以乡村民权势力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组织农民自卫军以保障革命。“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可以建起雄伟的革命军队，并能使革命永立于不败之地。

国民政府治下的农民革命，必能引起其他省份农民群众的同情与援助。这样可以扑灭军阀的势力。国民革命必为各地的农民所欢迎，如同欢迎他们的解放者；军阀的势力，必定消灭于外部革命军的攻击和内部农民的暴动两个烈火之间。

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封建势力的束缚贸易，以及近年来的战争，妨害了小资产阶级。所以小资产阶级必须和工农群众建立同盟，以反抗帝国主义军阀和封建势力。中国共产党定要领导无产阶级保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农民必与小地主建立同盟以消灭封建的专制和绅士的政权，小商人必须脱离苛税的压迫。

无产阶级是民权同盟的先锋。只有在保护他们自己阶级利益之下，才能完成他们的使命。生活程度的提高可以增加他们的战斗力。在领导农民进攻封建势力，保障小资产阶级利益之下，无产阶级不能削弱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改良待遇等。更进一层，我们看到帝国主义所以能操纵中国的经济生命，因为他们占有了中国的重工业、银行以及铁路，无产阶级一定要求这些生产金融机关收归国有。无产阶级保障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小资产阶级赞助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唯有在这个互助的关系之上，农工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同盟才能建立起来。

国民党自从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分子脱离之后，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民权同盟。联合民权派的一切成分于国民党旗帜之下，以强健这个革命的同盟，是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阶段中主要的职任。革命的民权同盟，是国民革命的指导者。为着强健这个同盟，无产阶级要在革命斗争中行使领导权。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政府的工作，并非是以竞争者的态度要夺得政权。所以这样，是为的巩固革命分子的结合，保障革命的发展。

欲战胜帝国主义干涉及反革命同盟阴谋之急切的危险，必须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依工农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的本性，国民革命的政体应当是民权的，可是对其他

阶级必须是独裁的。凡是不和革命站在一起，并且反对我们的，都应当以无情的手段对付他，这是国民革命中唯一的原则。

现在是中国国民革命发展到了最高的决战时期，客观的环境，无论国内国际，都对于革命是有利的。实在是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环境，中国国民革命才发展到了这个阶段。

大资产阶级的脱离，使国民革命运动解脱了内部冲突和不协调的原因，使整个的运动向一个简单的目标进行。因有阶级的分化，使这运动有深入他的社会基础的必要。因此广大的群众可以吸引到在这个斗争之中，促成革命运动的伟大的发展。

国际情况也是同样的顺利。帝国主义者尝试造成共同的反中国革命的联合战线，但是世界资本主义普遍衰落时期，各国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正在日益加增。对于积极的武力干涉中国，他们不能一致。就是在一国内的同一资产阶级对这个问题意见也不一致。有些主张采用侵略的策略以保护已得的权利，有些主张依和平的条件以进行贸易。这个情形减轻了各国即时共同干涉中国的危险。如果反叛的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那就可以给帝国主义干涉中国一个新工具。

另外还有一种势力使武力干涉不易实现者，就是帝国主义国内无产阶级的反抗。用几只兵舰，数百水兵威吓中国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如果实行武力干涉中国，结果就是长期的战争，帝国主义国内的无产阶级一定很决绝的反对殖民地的战争。这个方法恐不能应用了。再者，如果对中国宣战，参加战争的各帝国主义国内，一定要发生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另一方面，全世界表同情或邦助中国的革命的实在有伟大的群众。所有世界上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都和为自由而战的中国民众站在一起。

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们！

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需要更多的牺牲，更勇敢的决心的时期了。不只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世界革命的发展也全靠你们了。你们决无表示灰心的理由，革命的胜利已经在最近的将来了！

你们一定要战斗，你们一定要胜利，你们一定要歼灭军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建立新的自由的中国。

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叛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联盟！

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权同盟万岁！

中国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

#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五月）

## 一　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因为国际决议案中，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指示及革命策略的规定，都适合于现在革命阶段中之客观的环境。第五次大会认为现在革命阶段的特质，是需要建立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只有这个政权，以无产阶级作领导，才能解决现在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并引导革命向非资本主义之发展方面进行。

第五次大会必定使全党研究与明了，并按照国际决议案所指示的，努力工作。

## 二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

1．从上次本党大会以来，革命发展得很快，党的长大也同样的快。从第四次全国大会到现在，党员自九百余人增至五万余。党的政治影响比数量的增加更快。本党无疑的成为全国工农的领袖；领导无产阶级经过两年的不断的斗争，斗争中包含好几次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武装暴动。在党的领导之下，四年短期之内，二百八十余万工人与九百余万农民，已经组织起来。本党已成为群众的党了。

自五卅起，上海无产阶级的斗争，香港罢工，汉口无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斗争……都是中国革命史中重要的事件。在过去的二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站在最主要的地位上。如今他已取得斗争的领导权。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这样的地位，足以保证革命的前途，将来不会开出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而是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

2．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符合第七次国际扩大会议决议案所指出的道路。民族革命之发展加紧了阶级斗争。国民党内的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想领导革命，以与本国反动派及外国帝国主义妥协；然而包含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左派，则反对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于是在民族解放运动之中，发现了危机。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看见不能依了他们的阶级利益而领导革命，他们就把国民党分裂了。他们不但离开了国民革命的斗争，并且转而反对之。他们已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上海无产阶级，做了两次英勇的暴动以欢迎革命军，他们在反抗北方反动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南军占领上海后，不久蒋介石就在上海下命令屠杀工人。

现在革命已进到第三个阶段，封建分子与大资产阶级已转过来反对革命。在这阶段中，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在这革命的联盟之中，无产阶级将实行其领导权。

3．革命运动发展，无产阶级势力增加，同时，反革命的势力也渐渐形成。反革命势力的形成，有下列的表演：（A）帝国主义列强之联合的直接武力干涉，（B）反动军阀与大资产阶级同盟反对国民革命。帝国主义者看到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政权，足以给帝国主义者及其同盟军以最后的打击，他们便想用武力恐吓手段强逼革命的国民政府采用妥协政策，另一方面，他们邦助并鼓励军阀与大资产阶级建立反革命的同盟。革命运动中第三阶段之初期，就遇到了帝国主义军阀与大资产阶级联盟的这种威吓。但是，革命运动正要在坚决反抗这反革命联盟的斗争中，更加向前进展。革命势力定能巩固集合民族的精力，巩固一切革命力量，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政权，以反抗并破坏反革命的同盟。

4．从五卅起，无产阶级开始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领导权而斗争。这个斗争建立了广州革命的国民政府，获得暂时的成功。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分子，看见这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将走得太远，客观上危害了他们的阶级利益，于是他们也开始用全力使民族解放运动移转到他们的指挥之下。当时我们的党，却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互争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第一个表现就是三月二十日的事变，蒋介石推翻了左派政府。

三月二十日事变，开了争夺领导权的第二阶段。在此时期，资产阶级占了上风。他们利用他们在广东的胜利，而想把他们的权力扩大至于全国。在这时间本党没有正确的政策。固然，资产阶级一天留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我们就一天须与他们结合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但是资产阶级将来的作用，在三月二十日之后，已经更加清楚了。然而本党没有懂得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得到民族革命的领导，并想消灭革命。因为本党对于大资产阶级在此后革命阶段中的作用，没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在讲联合战线时，没有致力于给劳苦群众的利益以足够的保障。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三月二十日以后的反动时期中，要立刻倒蒋。本党的任务是继续的去争领导权，——建立一个左派的革命联盟，包含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反对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的领导，这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领导，客观上是必将出卖革命。这个任务并不与联合战线势不两立。

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在农民中得到同盟者。无产阶级要提出急进的土地改良之要求，以巩固与农民之团结，向封建分子资产阶级之反动奋斗。本党没有实行这个任务以领导无产阶级。联合战线做得太广泛了，甚至乡村中的封建宗法的反动分子也联合在内。在本党领导之下的广东农民运动，除要求组织农民协会与减租外，没有更急进的要求。当时封建分子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已经准备使革命妥协，至于消灭，而本党没有认明；应当在乡村之中攻打他们的根基。实则只有进攻这种封建分子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才可使革命的社会基础更加深入。这件事没有做，为了这个原故，广东便很容易地失掉了。

5．北伐之主观上的动机，是资产阶级想扩大他的权力。但是客观上北伐是发展革命的方法，所以邦助北伐的政策是对的。但在此革命地盘扩大之时，本党未能充分注意使革命的社会基础同时深入之必要。这种疏忽，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过分估量了大资产阶级

的作用。那时的策略，是先邦助资产阶级完成其革命的第一阶段（扩大），然后再来做第二阶段的深入。因为有这错误政策，所以不能征调全国革命的民权派的力量，以限制封建分子资产阶级想利用军事胜利之邦助，而加强其势力之企图。最后封建及资产阶级分子的势力已经很强大，于是他们公开宣告包办整个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实行其分裂革命之政策。因为对于联合战线的见解错误，所以在革命军所占据的地域中，一切反动的社会基础，仍任其存在。因此，到蒋介石叛党的时候，不能使他孤立，封建的资产阶级分子，居然带着很大的力量，从民族革命中分裂出去。倘能及早在城市与乡村中（特别是乡村中）加紧阶级斗争，那末，早就可以动摇反动势力的地位，——例如广东之失，也就不会这样容易的了。

6．对大资产阶级估量不确，甚至于过分，于是对小资产阶级的估量就过小。小资产阶级不会成为一个独立政治力量的，当大资产阶级与封建反动势力联合而预备使革命势力妥协之时，无产阶级应非常注意小资产阶级，否则，他将与资产阶级一路走。上海暴动之失败，最大原因是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赞助。

蒋介石并不是在四月十二日突然变成反革命，而命令在上海的街道上屠杀工人的。从三月二十日起，他已经是革命的仇敌了。但党没有指出蒋介石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他要消灭革命，因此，也就未能充分号召城市中民权派的群众，使他们围绕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以防止蒋介石能够在上海建立其新军阀的独裁。

7．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以为上海无产阶级的二月暴动是太早熟了，在那时候的革命热情中，党不能有计划的指挥群众，建立苏维埃式的市民政府的尝试，更是太早熟了。

大资产阶级一开始时便没有邦助这个运动；白色恐怖起来，小资产阶级也吓退了；于是无产阶级陷于孤立。二月暴动失败后至三月暴动之间的时期，是很可以利用之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亲密联盟，以为革命的民权政府的基础。但是因为第一次早熟运动的失败，使党跳到另一个极端；因此，过于重视资产阶级，拉他进市民政府，而忽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本党的另一错误，是于不自觉之中把上海运动做成是一种独立的，而未顾及全国民族运动的联系。

8．第五次大会认识上海无产阶级在本党领导之下英勇斗争的历史意义。大会认为：虽然上海事件有许多失败与错误，但不失为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之斗争中的重大事件。在这时期中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民权联盟，已经成为革命的唯一的社会基础。上海无产阶级仍为革命的柱石，上海仍是斗争的重要中心之一。上海无产阶级从五卅以来就继续不断的在本党领导之下做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他的斗争必能坚决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并且反对资产阶级的妥协，将来一定是打倒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

9．第五次大会坚决的认为：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叛离，不足以削弱革命。现在的时期不是革命低落的时期，而是紧涨剧烈的革命斗争时期。在这时期里无产阶级成为争斗的原动力，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当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留在民族运动中的时候，他们阻碍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政纲的实现，因此，群众的革命力量是被遏制的。现在革命的民权派力量之自由发展的障碍已经减轻，所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的运动可以加强起来。

革命基础之地域，需要很快的扩张，但是同时在这地域之中要把革命的社会基础使之

深入。广东之失去，表现出革命只扩大而不深入的危险。这个时期里革命的主要任务，是除去反动根基，以巩固革命。要做这件事，必需执行急进的土地改良政纲和创造乡村的革命民主政权。

10．革命势力的发展使帝国主义的干涉更加严重。于是小资产阶级之中发生一种恐惧失败的情绪，想要将革命根据地从帝国主义威胁之地，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第五次大会警告全党：应当反对这种无根据的失败主义的趋向。帝国主义的干涉，确实存在。中国共产党应当领导工农群众从坚决的斗争中，保护革命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要巩固革命于中国的中部及南部，并不是忽视扩大革命地域之可能与必要。但中国共产党必定反对以扩大革命地域为籍口，而实际上抛弃或削弱现时革命根据（地）的倾向。

第五次大会认为共产党应当竭力执行深入革命的职任，以巩固革命的根据地。如果认为要先完成北伐而后始执行急进的土地改良与民主政权之创造，那么，这正可以使资产阶级在他所占领的沿海诸省，戴着民族主义者的假面具而在极短时期内巩固他们的势力，以邦助帝国主义。东南诸省是经济上最先进最富饶的地方，我们不能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否则，这就是使帝国主义更加强固（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太弱，不能独立的生存）。如果这样，中国将要走进一个时期，在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的领导权之下，发展经济，使世界资本主义有很大的稳定。中国将继续处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虽然统治方式上或者略有改变，然而实质上这就等于消灭革命。

第五次大会认为共产党必须领导劳苦群众反对封建资产阶级等的反动派，以巩固革命的胜利。革命的根据地一定要在那种省份里巩固起来，那边要有久经战斗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农民组织，以及高度发展的国民党及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不能想出一个更天然可靠的基础，如上海无产阶级，广州工人阶级，广东江西湖南湖北的革命农民。第五次大会丝毫不减少扩大革命地盘与打倒张作霖的需要，同时也以为党有一个目前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浙江诸省，毫不留情的与反动势力作战。这个任务的完成，其意义是在很大的地域上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这地域在社会情形及经济上都是合宜的。这样可以铲除封建资产阶级消灭革命的企图。客观上的条件（国内的与国际的），都利于中国革命发展到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这个革命前途不仅是国际议决案所指示的，而且是由事实所产生的。如果对于这种前途有分歧的政策，那就是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其意义就是消灭革命。

11．四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两种条件之下，加入中国国民党，（A）保持组织的独立，（B）有批评的自由，以执行其拥护工人阶级利益之政治的主张。在此合作中，本党曾很坚决的反对右派，因右派系主张限制本党的独立组织者。但是本党在国民党中，以前只有离开国民党而求所谓“独立”的政策，而实际上并未能将真正独立的工人阶级之政策执行起来。主要的原因，就是本党对于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未能正确的认识。在现时这一革命的阶段之中，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影响，应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政治上很明显的很坚决的表现出来。

革命的现时阶段之中，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比以前应当更加密切。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是这个联盟的原动力。在这种情形之下，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权。共产党

一定要使一切革命政策、政纲与策略之决定中，都考虑到工农的利益。共产党不能做国民党的旁观者或反对者。这革命的联盟，必定要立在一个共同的国民革命的政纲上。

共产党的加入国民政府与省政府，以及由联席会议讨论革命的实际问题之新方法，都已表现国共两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在这新的情况之下，党团工作变成非常重要。要经过党团使政权与党的机关影响群众。第五次大会警告全党：决不可以因为我们与国民党关系的新方式而发生取消派的倾向。要知道一个革命的联盟并不就等于一个党。

现在阶段之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这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土地革命），是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所必需的；工人阶级领导着这个革命。第五次大会不赞成“共产党是工党，国民党是农党”的机械理论。土地革命就是推翻封建宗法的革命；这种革命当然要当代最革命的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是现在中国最革命的阶级，他应当领导农民去实行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

12．现时的革命阶段的主要特质，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在斗争之中取得领导权。然而必须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有了保证，他才能完全实现这个政治上的功用而行使其革命的领导权。须有英勇的革命斗争，才能获得光明的政治发展。工资低微，营养恶劣，衣服褴褛受尽剥削的工人，决不能负担这个责任；所以要领导工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第一条件，就是共产党要很坚决的为提高工人生活程度而奋斗。第五次大会认为：为实现工人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起见，应当为工人力争下列的要求之实行：（一）八小时工作，（二）足够供给生活的工资，（三）劳动保护法，（四）救济失业，并为失业者觅得工作，（五）劳动保险及恤老金，（六）保护女工与童工。

13．现时大资产阶级对于国民政府仇视，组织一个很显著的反革命大联盟，会同着帝国主义的干涉及经济封锁，来威吓国民政府，于是国民政府在财政方面感觉很大的困难。如果财政困难不能解决，那么，革命的斗争便不能继续进行，军队便不能改造，将要发展而成民权独裁制的政府机关，也不能建设。共产党应坚决的反对增加劳苦群众经济负担的企图，因为这不是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法，而恰巧相反，这种企图却会削弱国民政府的基础。第五次大会认为：对于财政困难唯一的稳当的解决方法，便是农民革命。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向来交付给地主的地租，便可以有一部分以地税的形式交给国家，使国家增加了一大批财富。现在暂时解决财政的方法还有两点：A.征收很重的财产税，B.发行革命战争的公债，而把公债的担负加于不劳而获的阶级身上（资产阶级和地主）。

14．在革命运动发展中，中国的青年们有很大的作用。在各种斗争中，青年们在CY指导之下，总是站在前线上，而给党以很大的邦助。在现在时期中，当革命运动要深入和扩大之时，青年的革命意义格外增加了。党对于青年之革命的意义须加以严重的注意。从前党对于青年运动，未尝加以充分的注意。将来党对于CY必须建立一种亲密的联合，必须积极的领导CY，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加以邦助。CY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主要的一部分，CY是一条运河，党须经过个这条运河，而影响到广大的劳苦青年群众。我们现在如果把CY的数量上的增加和CY应负的任务比较起来，就可以看见现时CY组织上的发展是很不够的；这是因为以前在各种斗争中，CY的群众工作太薄弱，或者CY不能在他的组织下面巩固他的政治影响。CY将来的工作，一定要很注意于群众运动的发展，要利用一切的机会，在工人之中以及乡村和军队之中去发展青年的群众运动。党盼望CY的第四次大会能根据

这个精神去进行他的工作。

15．党对于被剥削的妇女群众的工作，必须较之从前更加注意的去做。在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之中，被剥削的妇女们，一定无疑的是很重要的分子。妇女是人民中最受压迫的一部分，她们在革命队伍之中，也是最为热心于革命的。

16．去年的经验，已经认明了一切无党的普通群众组织，特别是济难会，在革命战线上，对于革命群众，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党以后对于这些组织也必须加以重大的注意，为的是经过这些组织，而在工农和知识分子之中扩大和巩固党的影响。

# 三　土地问题议决案

## 一　土地问题意义

一、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大半尚建筑在封建的关系之上。大部分的田地（约百分之六十六）为收租的大地主所占有。佃农及半佃农耕种田地，而没有享有田地的权利。田租的方式既不确定，租佃权也不能永久享有。田租大抵要占农民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五十，除此而外，农民对于地主阶级以及握有政治的军阀统治者，还要交纳种种苛捐杂税。

中国田地只有百分之三十四属于农民。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的农业，固然除北方各省如山东满州外，几乎无有。然寺庙祠堂等所属之地，占有耕地之数目，亦实有可观。井田之制，久已消灭，惟所谓公有田产之管理制度，尚遗留于乡村间，作为乡村中宗法社会政权之基础。此等田地的主有权，已为乡绅所篡夺，耕田者反而失却享有的权利，乡绅等得变为地主，更利用此种权利，以行使其宗法社会的威权及统治。

军阀的统治，就建筑在这种土地关系之上，因为地主阶级的权力，实使封建宗法制度，在中国农村之中，仍旧保持其为经济政治组织及行使制度之重要特质。

二、同时，初期的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亦已深入于农村经济之中。所以中国农民实在同时受两种剥削：一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即封建制度式的）剥削，一是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其结果，中国农民日就穷困，国民经济制度特别落后。

地主阶级所提取的田租特别的高，致使耕者反无剩余的收获。他们所得的，不能供给日常的需要。此种形式，即资本主义前期的剥削。在此剥削下，不许农民改善其生产方法，结果中国农业依然保持其原始状态。实际上就等于奴隶制度。农民只为消费而生产，其剩余都为地主所占有。

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也在这种封建式的关系上建立起来，地主所收的佃租多属谷类（这又是封建制度的遗留），农产品的剩余，多归他们手里。但是地主得因此而变成商业资本家。不过他们的原始的封建性阻碍那充分的资本主义化的趋向。他们以原始式的剥削手段而积聚起来的财产，并未变成生产的资本，仍用到购置田地及重利盘剥等的投机事业。

经济的落后，阻止了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同时全国经济形成了破碎不连的现象，将全国区分为多数孤立的商场，此等商场即为掠夺剩余农产品的地主所操纵。在此情形下，地主阶级便能强行抬高物债，如此不仅剥削农民，而且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亦

在被掠夺之列。工资极低的无产阶级，却要出高价换得食物；就是小商人，也变成了地主阶级垄断的投机事业之牺牲品。

重利盘剥制度，即在此复杂的原始的剥削形式之下，很快的发展起来。此是唯一的交易制度，唯一的资本主义式的积累方法。然而重利盘剥者的资本，并不能促进商业或产业，依然用到土地投机事业上去。残酷的田租征收以及其他封建式的压逼，重利盘剥等的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再加上军阀机关的榨取，致使农民陷于永久的饥饿之中。

军阀在多数省分中占据着最高的政权，其统治机关在种种不同的方式下，剥削一般农民，以下即为其中最厉害的：

A　正税与苛税（预征钱粮）

B　军事给养（米粮靴鞋马匹等）

C　战时苛酷的征收

D　拉夫（运输军用品）

E　滥发无价值的纸币（军用票）

F　厘金征收

三、帝国主义的统治，阻止中国经济的进展：于是中国产业特别落后，形成农村人口的过剩；而农村人口过剩的现象，实足以延长军阀封建式的剥削制度之生存。可见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农民问题有极密切的联系。

帝国主义因欲为其本国的产业找到贱价的原料，为其商品找到市场，于是力求殖民地的扩张。劳动力是最可宝贵的材料，殖民地半殖民地充满了贱价的劳动后备军，当然是帝国主义国家中之产业的凭籍。结果帝国主义的统治造成了殖民地产业的落后，而殖民地永久仃滞于原始农业生产的状态。因此新式产业的发展，农村中的劳动力，不能充分向城市中转移。这样的退步现象，造成农村居民过剩，维持了封建经济的生命；否则，新式生产的发展，早将他们打破了。

帝国主义所引起的农村人口的过剩，延长了封建制度及其剥削。破产农民继续不断的增加军队的数量，致使劳动者的工资，落到最低限度，帝国主义的根基，因之更形巩固。综起这许多原因，造成了农民中极端的贫困与荒芜。失业的农民，既无处施用其生产的劳动力，于是变成为土匪与雇佣的兵士。中国的军阀，确是一个奇特的社会征象，其形成在乎国家经济的不完整不统一。军阀是封建势力剧烈的表现，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这种军阀会同买办及地主乡绅重利盘剥者，组成一个极大的机器，混合封建反动式的剥削与初期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于一炉而冶之，炼成压榨农民的铁钢。这一个机器吮吸了农民的血汗，破坏国家的经济组织。在此背景上，帝国主义进行其最完备的资本主义的掠夺。

经济的破产，驱使农民于重利盘剥者的铁腕中，利率渐渐增高，致使农民永不能脱离债务的负担，以致出卖或抵押其土地，土地遂集中于高利盘剥者之手。再则帝国主义者买办及土豪等还要借此以垄断原料，如预先放债给农民，使他们不得不以贱价将原料抵债等；这亦是对于农民的一种很苛酷的剥削。同时，帝国主义者，如基督教教会及农业公司，还有直接以贱价勒买田地的；这种剥削方式便更加是帝国主义殖民地政策的表演。

四、中国的军阀吮吸全国的膏髓，外国帝国主义阻碍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他们两者

的根据地都是农村中的封建组织。所以中国民众欲达到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的目的，基本的条件就是肃清农村中封建势力的残余及宗法社会式的政权。急剧的变更土地所有制度，是国民革命中唯一的原则，非然者，为真正民权的自由战争，将仃滞而不能前进；欲消除上层的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组织，必须破坏他的根基。

五、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没有他们自动的自觉的来参加，国民革命是决不会成功的。农民的精力，必能贡献于国民革命，如果农民的剥削机关能彻底解除。农民革命——打破封建制度——是建立民权制度的革命所不能离的。在通常社会的发展中，资产阶级能为农民破除封建的锁链。但是此种通常的社会进化，在中国已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所扰乱。中国的资产阶级并未形成一个反封建势力的成分。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因为是从地主阶级产生出来的，依然同地主阶级保持亲密的结合，甚而至于变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民众的工具（如买办）；在这两个情形之下，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剥削农民的势力有密切的连系。所以他不能作农民革命的战士。中国资产阶级仇视农民革命，他不但不能为民权自由而奋斗，反而作民权自由的敌人（蒋介石的分离革命即其一例）。

农民将要受无产阶级的赞助（并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为助手），而从事于历史的战争，消灭封建势力及其党羽。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客观上系反对帝国主义垄断中国经济的；帝国主义的垄断，是保持乡村中封建关系的主要原因。但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关系亲密；虽与他们阶级有利，他们也不能完成土地革命以促进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六、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的剥削之影响于经济者，为食料价格的增高，商业的仃滞。此两种影响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共同感觉到的。所以这两个阶级都是反对剥削农民的，农村的急剧改革，使耕者有其田，不但农民本身获得利益，全部人民都蒙其益。农民群众生活程度的提高，商业因之而大发展。设若耕者能享用其自己生产的剩余，债主的铁腕将失掉其作用，农民可用由农产得来的资本，从事于改良耕种的方法及工具。结果全国农业产额必为发生自由的市场，可使物价降低。最终，因封建式佃租的取消，国家税收可以得到新的源泉。

七、要取消封建式的剥削，只有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才能实现。要破灭乡村宗法社会的政权，必须取消绅士对于所谓公有的祠堂寺庙的田产的管理权。为保证农村急剧改革的实行，农民必须握得乡村中的政权，乡村中之武装势力，必须由绅士手里，夺回来交给农民。失业的农民既然得到土地或能从事于生产工作之后，军阀的祸患，将不复存在于中国。重利盘剥的现象，也因为他的经济根基既行取消，势必消灭。国有农业银行的建设，信用合作等的设立，必使重利剥削者完全丧失作用，这种打倒重利盘剥的斗争，亦是农村革命的重要工作。所有这些工作，都有相互的关系，不能分离解决的；唯有从事这些工作，使农民群众从封建宗法的剥削下解放出来，国民革命的成功才有保证。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以为必须要在平均享用地权的原则之下，彻底将土地再行分配，方能使土地问题解决，欲实现此步骤必须土地国有。共产党将领导农民从事于平均地权的斗争，向着土地国有，取消土地私有制度的方向，而努力进行。土地国有确系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的党纲上的基本原则。

## 二 中国农民运动之趋势

一、中国农民运动，依粤、湘、鄂等省的经验，大半都是以贫农（佃农、半佃农、雇农及地少的自耕农）为中枢。农民运动的这种社会基础，很明显的指示农民运动的前途，必然是土地革命。最迫切的现时的运动趋势，已经是铲除宗法封建的政权，而建立农民的政权。自然在这种斗争中农民武装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种总的趋势中，有些地方已经进一步而到了实际开始解决土地问题。

二、各省农民运动发展之阶段，现在还有许多参差。北方各省在军阀残暴的压迫剥削之下，农民协会尚在秘密组织之中，没有很大的发展。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省，农民运动在胚胎之中，减租抗税的斗争，反对重利盘剥及土豪乡绅的斗争都已经开始。但是他们遇见蒋介石反动的压迫。广东农民运动发展最早，但是，客观上虽然农民群众早已从减租的口号进而要求政权，要求武装，甚至于土地，然而我们党在广东农民两年艰苦的剧烈的斗争过程中，没有确定的一贯的政策去指导。李济琛的反动，使广东农民现在处于非常之大的压迫之下，土豪劣绅的反攻更加残暴起来。江西、湖南、湖北在革命的国民政府之下。江西农民虽然已经开始减租等的初步斗争，但是大致说来还在组织集中力量的时期，这是因为江西久处于蒋介石势力之下，经过左右派政权两次转移的斗争。现在农民运动发展的阶段之中，要算两湖的为最高，尤其是湖南。湖南不但实际上农民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至少已经动摇他们的权力，而且要自己起来建立政权，有些地方，并且参加县政权。不但如此，两湖的农民斗争，已经开始要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并有分配土地的运动。

三、中国农民运动，大部分都在无产阶级的指导之下，不得无产阶级的领导，他的发展不能有正确的革命的道路。但是如红枪会、硬肚会等运动，也是农民运动的一种方式，他们是中世纪式的组织和斗争方法，这在阶级分化不甚清晰的地方，如河南等处，往往以地主土豪为领袖，有一部分甚至会受反革命派的利用。然而这种运动，当他们反抗军阀，代表小农利益而抗捐抗税，反对县官的时候，确是革命的。

四、农民运动发展的时候，封建宗法的反动政权（所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自然竭力压迫。他们勾结军阀，利用自己的武装（民团团防等）以及土匪，来进攻农民，屠杀农民，要想镇压农民运动。然而国民政府的革命政权之下，农民运动至少得到相当的自由。所以农民运动在特定的条件之下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而形成伟大的势力之时，土豪乡绅的势力大大削弱，他们就实行消极抵抗，阴谋破坏，如运米出境，拒绝借款等，或者自己冒充农民，组织假农民协会。蒋介石派的反动势力之下，差不多只有这种土豪乡绅组织的所谓农民协会，才能存在。就是国民政府之下，土豪乡绅亦在联合军队中封建分子，时时刻刻在那里力谋反攻农民。所以现时农村中的斗争，实在是非常之剧烈的。

五、农民的斗争大致起初总是减租，抗税，减息等等及反抗土豪乡绅的压迫，但是随后的发展，往往立刻便要进到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进到夺取武装，以至于武装冲突。而在革命战争的军事时期，农民斗争一开始便是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治势力，这是因为不但取得土地，就是实行减租，也非有农民自己的武装和政权不可。所以农民斗争必然要经过一

个猛攻宗法封建势力的时期。这种猛攻的革命斗争中，总是以贫农为中坚。农民的革命政权，实际上不能不以贫农为领导者。这种推翻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的运动，客观上是以开始解决土地问题为目的，中国农民，尤其是贫农，他们很深切的感觉土地之缺之，田租杂捐的剥削。他们实行革命斗争的目的，是要自己拿住政权，是要推翻土豪乡绅包办税捐的制度，而自已来管理，是要取得土地，而夺回地主等剥削他们收入的大部分——由减租直到耕地农有，平均耕地。

六、现在革命的阶段之中，农民运动——乡村中农民反抗豪绅地主的阶级斗争，虽然在全国范围内，他的发展阶段很有参差，但是大致的趋势，已经是摧毁封建宗法政权而开始解决土地问题的时期，这是中国革命现时的新阶段之主要的特点。现在乡村中阶级斗争的开展，及农民革命的深入，不但要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统治的工具，而且就是严重的打击反动的封建分子及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使帝国主义的势力无所凭借而组织反革命运动，这就是说：现在革命的趋势，是要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的政权，实行改良农民的经济地位，一直到分配土地。

## 三 国民革命中的农民政纲

按照上面的分析，农民运动客观的条件与主观的力量都已经可以知道。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决议在目前的革命阶段中，为农民问题之解决，须要以下的策略：

（一）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此等没收的土地之管理，应付诸土地委员会。此等土地的管理形式，是否采用公有制度或分配于耕种者的农民，皆由土地委员会决定之。

（二）（甲）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将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乙）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丙）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可不没收。（丁）革命军兵士中没有土地者，于革命战役完终后，可领得土地耕种。

（三）耕种已没收的土地之农民，除缴纳累进的地税于政府外，不纳任何杂税。未没收的土地之租率，应减至于累进的田税相当的程度。耕种未没收的土地之农民，只缴纳确定的佃租，不纳其他杂税，并永久享有租佃权。

（四）取消地主绅士所有的一切政权及权利。建立农民的乡村自治政府，对农村各被压迫阶级所组织的乡民会议负责。农民协会并当参加民权的县政府之创造。

（五）解除乡村中反动势力的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保障自治政府及革命的胜利。

（六）建立国家农业银行及农民的消费、生产、信用合作社，改良水利。

（七）取消重利债务的利息。限制重利盘剥，规定最高限度的利率。

# 四 职工运动议决案

## 一 职工运动两年来的发展及现在的形势

本党第四次全国大会时，正是职工运动复兴时期的开始，两年以来，经过五卅运动、

省港罢工，反奉战争中河南天津唐山职工运动的勃兴，铁路工会的恢复与发展，北伐后湘鄂赣皖苏浙的发展，以至上海三次暴动，虽然有此仆彼兴，时起时伏的现象，然整个的形势，都是在不断的争斗继续高涨中。在政治上已经推进了国民革命的发展，给帝国主义以莫大的打击。从争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一直到参加政权的实现，充分的表现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经济上劳动条件，已有很显著的改善，从要求待遇的改善，团体契约权之获得，直到要求参加国有产业的管理的实现。群众生活的水平线，已有很显著的提高。在组织上，工会的权力，已渐次集中，纵的方面，从零碎的行会的组合，发展到统一的产业组合（虽然现在还是很弱小的）。横的方面，各地方总工会，更具有最高的权力。工会会员数量上，由五十四万增到二百八十万。所以这两年来猛勇争斗的结果，的确有很显著的急速的进步。

中国职工运动发展的结果，使资产阶级受了莫大的威吓，渐次背叛革命（蒋介石叛变），不惜与帝国主义妥协，专力来打击工人阶级以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帝国主义因见旧有工具军阀系统的溃崩，亦欲在中国找到新的工具，因此帝国主义与中国资产阶级之中，发生一种亲和力，互相吸引，因此资产阶级将渐次变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新工具。

资产阶级在这个新的企图之下，遂尽力打击工人阶级。一方面组织法西斯蒂，来屠杀工人领袖，破坏工会；现在苏、浙、闽、广、皖、赣、川等处，已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了。另一方面，又欲以改良主义来欺骗工人阶级，如蒋介石颁布的工会条例，几乎全抄上海总工会提出的上海工人的经济总要求。并企图组织御用的黄色工会。在武汉的资产阶级亦欲以改良主义，来缓和工人阶级的进攻，如提倡分红利制度，甚至要工会来代管生产，以红利的大部份分给工人等。虽然我们在经济的分析上，看不出中国资产阶级有实行改良主义与工人阶级改良主义化的可能；但资产阶级在他的政权区域内，为欲巩固他的政权，与在工人阶级参加政权的区域内，欲缓和工人的进攻，的确有企图采用改良主义的倾向。我们应该加紧工人阶级的团结，组织工人阶级的武装来抵抗法西斯蒂，动摇资产阶级的政权。同时要极力提高工人的要求，发展经济罢工，揭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假面具。

## 二　职工运动的新方针

在党的政治议决案上，已指明“中国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了，中国革命将要在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政权之下，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在党的总的政策之下，职工运动自然应该定出新的方针。其主要点：

第一，要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的进攻，一直到要求没收一切银行、矿山、铁路、轮船、大企业、大工厂等归国有的实现。

第二，要求参加国有产业的生产管理，监督生产。使国有产业能向非资本主义的路线发展，不致官僚化。

第三，要求政府实行高度劳工政策，颁布劳工保护法，工厂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及最低限度工资等，使工人生活水平线，能随时提高。这些工作都应该是劳工部主要的工作，并须设立监察机关，保障这些法令的实施。

第四，要求社会保险之实施，救济失业工人，同时要建立工人宿舍，公共食堂等。

第五，要求设立国家商店，公卖一切日需品（食粮燃料等），并发展合作社等等的组织。

第六，各地总工会应该随时提出工人的行动总纲，为各地工人阶级奋斗的目标。

第七，发展全国一致的政治的经济的争斗，各全国产业总工会应即提出总的经济要求。

上面七项是职工运动方针之骨干，在国民政府管辖之区域内，应该加紧争斗，使能加速的实现。在蒋介石政权之下（资产阶级政权），北方军阀政权之下亦须极力宣传，各级工会提出之要求总纲中，都应该尽可能的提出。（自然要特别注意当地工人阶级当前的最迫切的要求）必须如此，才能兴奋工人阶级革命的勇气，抵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侵入。必须如此才可以保障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

## 三 经 济 斗 争

过去有些地方（如反奉战争中北京、天津、唐山等处）偏重于政治斗争，不注意工人的经济斗争，结果反减了工人对政治斗争的认识和勇气，并影响到组织的发展，这是我们很可宝贵的经验。所以在第四次大会的决议案中所说的，只有提高工人的经济要求，才能兴奋工人政治斗争的勇气，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经济斗争是工会的日常生活，必须如此才能吸引广大的群众，加紧群众的组织。这是以后工作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在蒋介石统治之下，有组织黄色工会实行改良主义的倾向，我们应该极力提高工人的经济要求，尽量发展经济斗争，攻击这些黄色工会的组织，才能使工人不致受改良主义的欺骗，而扩大我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北方军阀统治之下，自然没有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可能，但我们应该注意工人日常的迫切的生活痛苦，发展工人部份的零碎斗争，在可能时，仍须举行大的斗争，使工人群众在这些争斗中团结起来。但是在宣传上仍须提出总的经济要求来吸引群众。在武汉工人群众已经普遍的经过一次经济争斗，但是资本家随时将物价提高，使工人生活几乎毫无改良，甚至挨饿，因此一部分群众发现对政治斗争的消极。这是职工运动一个很大的危机。挽救这个危机的方法，只有一面提高工人的经济要求，继续争斗，另一方面要求政府限制物价，或设立国家商店，公卖一切日需品。还有一种危机就是用革命危急的恐吓，来限制工人的斗争。这样可使工人阶级成为其他阶级的工具，我们应该极力与这种主张奋斗。

自经济罢工发展后，而资产阶级及其代表者倡为“罢工循环”之说，其用意则在打击工人阶级，就是国民党左派中亦往往有人因此学说而动摇。要知一般物价之增加决非因罢工所致，而有其根本原因，即供给与需要的关系及种种政治战争的影响，所以我们应尽力根据事实作广大的宣传，与此类学说奋斗。

手工工厂工人与店员的争斗，成为目前很重大的问题，许多人以为欲保证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须绝对付止争斗，这句话未免矫枉过正。工人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和领导小资产阶级，决不单是消极的方面让步可以得到的，而是要在积极的方面加紧反帝国主义运动，加紧反大资产阶级的争斗，不断的提出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扩大一般市民的要求等。所以我们对手工工厂工人和店员的争斗，仍是要积极的拥护，才可以取得这些群众。

第一、中国产业无产阶级的数量太少，必须使手工工厂工人与店员，完全团结在产业工人的周围，力量才能伟大；第二、手工工厂工人与大部分店员生活极为痛苦，只有发展经济争斗，才能组织起来；第三、手工工厂工人与大部分店员的劳动关系，多半是一种封建式的主奴关系，不经过争斗，不能打破封建势力的束缚。尤其是非产业的区域（各县、市、镇），手工工厂工人与店员，就是地方的无产阶级的代理人。应该是这些地方政治上的领导势力。但这些是他们被小资产阶级利用封建思想与权力所束缚，我们要使他组织起来，成为政治斗争的领导力量。自然，在手工工厂与店员的斗争中，要注意资本家的经济能力，提出的要求不可超过他的能力之外，对于团体契约权的争斗，也应就客观的形势而相当的让步。

在工会参加管理的国有产业中，将有一种反对经济争斗的倾向发生。这种倾向发生的根源，一方面将是政府中代表资产阶级的分子要使这些国有产业能按照他的利益发展，而限制工人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将有人误认这些国有产业已经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工人阶级自己的产业）。这种倾向不单是要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线低降，并且要影响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发展，我们应该极力的与这个倾向争斗，只有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线能随国有产业的发展而随时提高，才能保证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所以在这些国有产业下的工会，应该注意这些产业的发展，随时提出进步工人经济要求而争斗。

在劳动保护法已经颁布以后，监督这个法令之实施将成为工会主要责任之一。工会应该注意资本家对于工人的欺骗，随时代工人向监察机关，提出抗议。使工人阶级的生活，真能得这些法令的保障而提高。

## 四 组 织 问 题

现在工会组织有几个重大的缺点：第一，无论在纵的方面（产业组合）横的方面（地方组合）还是很零乱散漫，直到现在全国产业总工会，只有海员，铁路，邮政，建立起来，并且没有力量。中华全国总工会完全没有尽他对于下级工会指导的责任，甚至毫无关系。各地总工会，虽然权力比较集中，但是所属各工会的组织，亦是非常散漫。所以目前职工运动在组织上的第一个责任，就是要强固中华全国总工会，强固并建立各产业总工会。合并许多小工会成为有力的产业的大工会。第二，许多工会还带很深的行会主义的色彩，甚至仅将行会组织改了一面工会的招牌，所以我们要极力与这种行会主义的工会组织奋斗，要限制手工工厂厂主店东包头等加入工会。第三，为准备参加生产管理，须组织强固的工厂委员会。过去虽然在许多地方的工会，有类似工厂委员会之组织，（每工厂一委员会）但实际上仅仅做了一些工会的日常工作。以后的工厂委员会，除了工会的日常工作，还要注意本工厂的一切的经济情形的调查和统计，然后将来才可以尽他的监督生产的责任。第四，在广东上海……等处，已经有黄色工会的组织，我们要使这些工会统一起来，只有在这些工会下面的群众中去发展我们的影响和极力提高工人经济的要求。决不可以专与他们的几个首领联欢，希寄一种上层的统一。第五，手工业工人与店员的组织，（尤其是在各县市中）许多地方都以一种产业的方法去组织他。这是不可能的，这些工人，我们应按照他的职业和他过去组织的习惯，来做组织的原则，中华全国总工会应该即

刻颁布一种关于手工业工人与店员工会的组织大纲，来做各地的标准。第六，铁路工人运动本为本党最早的工作，而且曾有伟大的斗争，因本党年来政策之极端与对此运动之轻视，到现在几乎完全放弃了，这是本党莫大的错误。以后应特别注意铁路工人，把铁总强大起来，在各铁路组织秘密工会，须由铁总派特派员到各路工作，以建立铁路工会的系统性，同时须在各地党部指挥之下，以建立党与工会的亲密关系。第七，第四次大会后，海员转变到本党指导之下，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本党应该继续加紧海员中的工作。惟海员运动，虽渐次在各轮船推行支部的组织，特别以省港轮船组织为最有成绩，但是宁波籍海员仍未完全组织在海员工会之下，内河轮船分会有放弃轮船而只组织木船划子的倾向，都是应该纠正的。第八，矿工运动在此二年内仅唐山曾有一度之发展，但党对于矿工甚为漠视，如北方及关外矿域最多，而我们只注意了城市的工人运动，未注意矿工，此后对于抚顺、开滦、山西、山东、焦作各矿工，本党应积极去做，以树立矿工运动之基础。第九，重工业，过去对于重工业工人很少注意，如上海轻工业同志达数千人，而重工业如某一造船厂仅只几个同志，可以证明，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重工业工人，在职工运动上应占重要的地位，在全部的数量上亦复不少，如我们不有计划的加紧在矿工工人中去工作，则重工业工人已经有广东机器工会之影响，不难为黄色派所取去。

工人领袖官僚化之危险，是目前的严重问题，其原因广大的工人群众缺乏健全的组织和充分的训练，工会干部人材太少，我们党的发展赶不上工人运动的发展，以致工会多为少数领袖包办，脱离群众的监督或党的指导，而趋于官僚化。救济这个危险，应该切实执行“工会民主化”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应该且必须要经过工人群众大会、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各种会议中决定工会的工作，要在这些工作中去健全工会组织，训练工人群众，培植工人运动人才，产出工人运动领袖，必须如此，才能挽救这个官僚化的危险。

国民党应该是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而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之政党，因此应无限制的引导工人阶级加入国民党，充实其内容，才能实现领导之作用。

## 五 失 业 问 题

现在全国各处都有广大的失业工人，尤其是被帝国主义封锁的武汉，差不多有十万以上的失业，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如果我们不为失业的恐慌而争斗，可以影响整个的职工运动。第一在武汉政府之下，应即刻要求社会保险制度之实施，救济失业工人，同时须加速大产业国有及国营的经济政策的实现，才可以挽救失业的恐慌。第二应该使失业工人完全在工会组织之下去争斗，在可能的地方，应该在工会内设立职业介绍所及互济会等组织，总之无论如何要使失业工人不离开工会的影响，而为资本家或其他反动派所利用。

## 六 童工与女工

童工与女工问题，在党的过去议决案上，都有很详细的规定，但到现在各地还未能正确的执行。各级工会均少注意童工与女工的利益，不引导童工女工参加工会工作，以致童工女工不了解工会的意义，不积极的拥护工会，或另外成立组织，形成如另一工会的形

势，这是很危险的现象。以后各地工会要积极的拥护童工女工的利益，每次经济罢工均须提出童工女工的要求，引导童工女工参加工会工作。（工会的各级机关均须有童工女工参加）才能挽救这个危险。

现在劳动童子的组织，超越了他的教育宣传的意义，差不多变成了一种童工工会，以致与工会常常发生冲突。这是由于工会未能注意童工，和在童子团工作的同志不了解童子团组织的性质和意义的原因。以后各工会均须设立童工委员会（或学徒运动委员会）。童子团在组织上应该隶属于工会组织系统之下。尤其要注意童子团的童子化。

## 七　宣传与教育工作

宣传工作在职工运动上占很重要的地位，过去很少注意，以后在各工会应极力发展宣传队的组织，各地方总工会至少须有一周刊和会报的发行（尤其要注意群众化），中华全国总工会已有发行日报的需要，务在最近期间实现。各种小册子的编辑，亦极为重要。

过去工会的教育工作，在提高工人阶级文化程度上多未注意，此项工作，极为重要，在各地方总工会均须有教育委员会的组织，并须极力利用各级政府的教育经费来发展工人教育。在教材的方面，要多注意政治的教育，并须编制劳动教科书，供各地工会应用。

## 八　工人纠察队与武装

工人纠察队，不管公开或秘密的地方皆须有普遍的发展。工人有武装在最初仅止自卫，（对付工贼流氓等）维持秩序，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而认为工人纠察队是保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所以只要有工会的地方，不管是秘密的或公开的，都应该有这样的组织，其注意点：（一）要是真正工人的组织，不可让流氓混迹其中，失业工人也不可过多。（二）纠察队应采用征兵制，使全体工人有受军事训练之机会。（三）纠察队可有相当之常备队。（四）中华全国总工会应公布工人纠察队统一的编制法及设立一部以管理之。

现在的军队，多半是游民无产阶级的分子，很难使他革命化，所以我们要使军队革命化，和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必须有多数的工人去当兵。因此到军队中去，拿枪去的口号，应该很广大的在工人群众中去宣传，打破一般不愿意当兵的观念！

## 九　工　农　关　系

现在资本家借口工人工资的增加，任意提高物价，使一般农民对工人不满，因此在许多地方都发生工农冲突的事。这是可以影响到整个的革命前途的。要使工农关系更加亲密起来，自然要把工人生活的痛苦，及物价增高的原因（完全是市场需要与供给的消长），完全是资本家的罪恶，尽量的宣传出来。但是仅只这样的消极的宣传是不够的，一定要各地工会能够与农民发生亲密的关系，邦助农民的组织，拥护农民的争斗，直到邦助农民取得土地，这样才能使农民了解只有工人是他真正的朋友，不受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派的挑

拨和利用。

## 十　与各国工会建立亲密的关系

中国革命的完成，一定要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邦助，所以中国工会应该与各国工会发生经常的亲密的关系。把中国工人的痛苦及斗争的情形尽量的向各国工人群众中宣传，以取得各国工人的深切的同情与拥护。尤其是在太平洋沿岸各国工人，只有中国工会比较进步，所以太平洋劳动大会，无论如何要在最短的期间召集，并须由此建立经常的宣传通信机关。

## 十一　党与工会的关系

党与工会，在过去仍未能有正确的关系，不是使工会成了党的附属的机关，即是工会完全脱离了党的指导。其实工会的斗争应当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同时不能使工会失了他独立的性质。具体的说，就是党对于工会的指导，第一应该是党的支部在群众中起作用，使群众完全受党的影响；第二，在工会的机关中，应该有党办的组织，使党的意志去影响工会的一切工作。这样自然可使工会的机关和群众，都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了。同时，党在每个时期的政策（如宣言、主张等），应尽可能的使公开的在工会中讨论，增加群众对于党的认识。

中央工委过去几乎完全仃顿，因此党对于全国职工的运动的方针与策略，完全缺乏指导。以后应该极力将工委强健起来，使能充分的工作。以前许多区委工委都很懦弱，甚至无工委的组织（如北方），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应该积极的纠正过来。

现在各处工会，无论是上层领袖或下层的干部人材，都极缺乏，这也是可以阻碍职工运动发展的。要训练人材，第一要使工人群众多参加工会的工作，使在许多斗争中，增高他们的经验和工作能力。特别要注意工人代表会的建立和训练。第二，在各地总工会都要设立短期的职工运动训练班。党应该选择很好的工人同志，办一高等职工运动学校，养成高级的干部人材。

#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

（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决案）

## 第一章　党　　员

第一条　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第二条　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党员一人之介绍，经过支部干事会之审查，支部会议之通过，市委员会或县委员会之批准，始得为本党正式党员或候补党员。

第三条　候补党员候补期，劳动者（工人、农民、手工工人、店员、士兵等）无候补期；非劳动者，（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之候补期三个月；但市委员会或县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

第四条　候补党员参加支部会议时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但其义务与正式党员同，遇必要时得由市或县委员会决定允许其参加市或县党员大会；但无表决权。

第五条　凡经中央委员会或省委员会直接承认之党员，当通告该党所在地之市或县委员会，非劳动者亦须经过候补期。

第六条　凡党员移转国外，须得中央之同意及第三国际之介绍，始得为所在国共产党党员。

第七条　凡已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经中央审查后得为本党正式党员。

第八条　党员年龄须在十八岁以上，凡年龄在二十岁以内而愿入党者，必须经过青年团；但青年军人不在此例。

第九条　凡党员由一地党部转到另一地党部，须在该地党部登记成为该地党员。凡党员在省内移转须得省委员会同意；省外的移转须得中央的同意，但遇有特别情形，（如在秘密工作情形之下）得酌量通融。

第十条　党员自愿出党须经过所在地之市或县委员会之决定，收回其党证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须有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如违犯时由市或县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

第十一条　凡开除党员须经隶属之支部大会及省监察委员会决议及得省委员会之批准方能生效。并将其开除的理由刊布在党的刊物；在省委未批准以前得停止其一切权利及工作。

## 第二章　党的建设

第十二条　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

第十三条　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一定区域内建立这一区域内党的最高机关，管理这一区域内党的部分组织。

党部之执行机关概以党员大会或其代表大会选举，上级机关批准为原则；但特殊情形之下，上级机关得指定之。

第十四条　地方党部对于地方部分的问题有自行解决的权利。

第十五条　各级党部最高的机关为：全体党员大会及代表大会。

第十六条　全体党员大会及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各级委员会。委员会在大会闭会期间为该级党部最高权力机关，执行并指导党务及政策。

第十七条　党的组织系统为：

全国——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

省——省代表大会——省委员会

市或县——市或县代表大会——市或县委员会

区——区代表大会——区委员会

生产单位——支部党员全体大会——支部干事会

第十八条　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的报告及提议与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有所命令及指导均按照党的系统手续。

第十九条　为党的各种专门工作各级党部得设立各部管理之（如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等等）各级党部之下的各部均隶属于各级党部。各级党部之下的各部组织制度均须得中央之命令或同意。

第二十条　区委员会之下的党部须得区委员会之批准与市或县委员会的追认；市或县委员会之下的党部须得市或县委员会之批准；省委员会之下的党部须得省委员会之批准；省委员会之组织须得中央委员会的批准。

各级党部之执行机关（自省委至支分部干事会或书记）之选定及撤换须得上级机关之批准。

## 第三章　党的中央机关

第二十一条　党的最高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委员会召集一次；中央认为必要时或有三分之一党员及三分之一省的党部之请求得召集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中央已经决定或三分之一的党员及三分之一省的党部请求之临时代表大会中央须在两个月内实现之。全国党的代表大会之召集与大会之议事日程，中央委员会须在大会前一个半月公布；全国代表大会须有代表全国党员之过半数方为合法，代表人数百分率由中央委员会规定之。

第二十二条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工作为：

1、讨论与准备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其他中央各部工作的报告。

2、审查与修改党纲及党章。

3、决定一切重要问题政策的方针。

4、改选中央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及其他等等。

第二十三条　中央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数由大会规定，遇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监察委员离职时由候补委员按次递补。

第二十四条　中央委员会得代表党与其他政党及机关发生关系；得组织党的各种机关并指导其行动；得指导与监督中央机关报并指定党的机关报的主任；得分配党的人才及支配党的经费。

第二十五条　中央委员会经过党团指示政府及其他社会团体之工作方针。

第二十六条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须每三个月召集一次；遇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中央委员会议或扩大中央委员会议。候补中央委员得参加中央委员会议及扩大中央委员会议，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但中央委员缺席时，候补委员临时依次递补，则取得表决权。

第二十七条　中央委员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一人为总书记及中央正式委员若干人组织中央政治局指导全国一切政治工作，并选正式中央执行委员若干人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政治局委员参加政治局会议时，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正式政治局委员离职时候补政治局委员依次递补。全体中央委员会议得改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互推若干人组织中央常务委员会（SECRETARIAT）处理党的日常事务。

第二十八条　中央委员会至少每两月须给省委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书面的报告。

## 第四章　省的组织

第二十九条　各省有两个市或县委员会以上，中央委员会认为有组织省委员会之必要时，即派员到该省召集省代表大会，由该代表大会选举省委员会（简称省委）。

第三十条　省委员会正式委员人数及候补委员人数由省代表大会决定；但须得中央委员会之同意。如正式委员缺席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

第三十一条　省之范围由中央委员会规定并得随时变更之。

第三十二条　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委托一个市委员会暂代省委员会之职权。

第三十三条　凡不能成立省委员会之党部，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其附属于邻近之省委员会或直接隶属于中央委员会。

第三十四条　省委员会可推举省委员若干人组织常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

第三十五条　省委员会得指导省委之下各种机关；得指导与监督省委机关报及指定省委机关报主任；得分配工作人才；得分配省委经费；得经过党团指导省政府及其他社会团体之工作方针。

第三十六条　省委员会每六个月召集一次省代表大会报告省委员会工作，及改选省委员会。

第三十七条　省委员会每月须向中央委员会作省委员会及县或市委员会工作书面的报告。

## 第五章　市及县的组织

第三十八条　各市或县有两个区委员会以上或有五个支部以上经省委员会之认可，并派员至该市或县召集市或县代表大会，由该代表大会选举市或县委员会（简称市或县委）。

第三十九条　市或县委员会均隶属省委员会。

第四十条　省委员会所在之市，该市不另组织市委员会，该市之区委员会，直接隶属于省委员会。

第四十一条　市或县委员会正式委员人数及候补委员人数由市或县代表大会决定，但须得省委员会之同意，正式委员缺席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

第四十二条　凡不能成立市或县委员会之地，该市或县之党部则由省委员会决定隶属于邻近之市或县委员会或直接隶属于省委员会。

第四十三条　市或县委员会可互推委员三人至五人组织常务委员会，处决临时事务。

第四十四条　市及县委员会得指导市或县执行委员会下之各种机关；得指导与监督市或县机关报；得指定市或县委员会机关报主任；得经过党团指示市或县政府及社会团体之工作方针；得分配工作人才及支部市或县委员会的经费。

第四十五条　市及县委员会每三个月召集市或县代表大会或全体党员大会一次，报告市或县委员会工作及改选市或县委员会。

第四十六条　市或县的划分，由省执行委员会决定之。

## 第六章　区的组织

第四十七条　凡在一区内有两个支部以上，市或县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派员赴该区召集党员大会，由该大会选举区委员会（简称区委）。

第四十八条　区委员会人数，由党员大会决定之；但须经市或县委员会之同意。

第四十九条　凡不能成立区委员会区域内之支部，由区委员会或市或县委员会，决定其附属邻近之区委员会，或直接隶属于市或县委员会。

第五十条　区之划区，由市或县委员会决定之。

第五十一条　区委员会每三个月改选一次。

## 第七章　党的支部

第五十二条　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农村，各兵营，各学校，各街道及其各机关内或附近，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支部但须得区或县委员会之批准。

第五十三条　支部是党与群众直接发生关系的组织，支部的任务是：

（一）积极在各该工厂等之内活动，领导该处群众之日常斗争，扩大党的影响；

（二）实行党的口号与决议于群众中；

（三）吸收新的党员；

（四）服从地方党部从事组织与宣传的工作；

（五）积极参加地方政治经济的斗争；

（六）尽可能讨论党的重要问题。

第五十四条　每一个支部公推书记一人，或公推三人组织支部干事会，隶属于区委员会，无区委员会之地，则直接隶属于县或市委员会。

第五十五条　在多量党员产业生产部门中，可组织支分部，支分部亦可组织干事会，不能组织支分部之党员多的支部，得组织小组，支分部下亦得组织小组，小组公推小组组长一人，直隶属于支部干事会，或支分部干事会。

第五十六条　党员不满三人之处，则设一通讯员，属于最近之区委员会，或市县委员会。

第五十七条　支部干事会议，每两星期中，至少召集一次支部党员大会，报告支部干事会的工作，及讨论支部所在之机关或区域内的一切实际政治及经济斗争的问题。

第五十八条　支部干事会每三个月改选一次。

第五十九条　军队中支部，直归军事部管理，关于政治宣传及教育训练工作，则由宣传部及组织部经过军事部执行之。

第六十条　支部书记之撤换，须经过支部全体党员大会之通过及得区或县市委员会之同意。

## 第八章　监察委员会

第六十一条　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

第六十二条　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不得以中央委员及省委员兼任。

第六十三条　中央及省监察委员，得参加中央及省委员会议，但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遇必要时，得参加相当的党部之各种会议。

第六十四条　中央及省委员会，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但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必须得中央及省委员会之同意，方能生效与执行。遇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意见不同时，则移交至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联席会议，如联席会议再不能解决时，则移交省及全国代表大会或移交于高级监察委员会解决之。

## 第九章　纪　律

第六十五条　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党部机关之决议，应当敏捷的与正确的执行之，但对于党内一切争论问题，在未解决以前，完全自由讨论之。

第六十六条　不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及其他破坏党的行为，即认为违背党的共同意志而处罚之，处罚之方式如下：

A、对于整个的党部则加以警告，改组或举行总的重新登记（解散组织）。

B、对党员个人，则加以警告，在党内公开的警告，临时取消其党的，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的及其他的工作。留党察看，及开除党籍。

第六十七条　党的一切决议取决于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党员及下级机关对于上级机关决议不同意时，得各该党部过半数党员的同意，得对于上级机关提出抗议，但在抗议时期内，未解决以前仍须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

第六十八条　党员不经党的许可，不得加入一切政治党派，其前已隶属一切政治党派者，加入本党时，若不得党的许可，应正式宣告脱离。

第六十九条　党员未得党的同意，不得任国家机关内任何的职务。

第七十条　对于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须经党的委员会，党员大会，或监察委员会，依合法手续审查之。

## 第十章　党　团

第七十一条　在所有一切非党群众会议，及执行的机关（国民党国民政府工会农协会等等）中，有党员三人以上，均须组织党团，党团的目的，是在各方面加紧党的影响，而实行党的政策于非党的群众中。

第七十二条　在党的执行委员会中，讨论与某个党团有关系之问题时，该党团得派代表参加讨论。但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

第七十三条　为实行党团的日常工作，当指定党团干事会或党团书记处理党团的日常事务。

第七十四条　各级党团均隶属各级党的委员会，党团对于党已有决议之各种问题，应严守与正确执行之。党的委员会得添派或撤回党团的分子，但须向党团说明其理由。

第七十五条　党团对于其本身之日常问题得自由解决之，党团与党的委员会有不同意见时，党的委员会，应召集党团全体会议重新讨论之。并决定最后的办法，在党团方面对于最后之决定须敏捷执行之。

第七十六条　在党团所在之机关或组织中的重要位置的候补人选，党团须与所隶属之党部机关共同商定之。对于工作位置的调换，亦须用上列方法。

第七十七条　党团所讨论之事项，有关于含有政治性的问题时，党部机关须派代表参加。

第七十八条　在非党群众及组织中，遇有解决重要问题时，党团须在党团会议，或党团干事会中事先讨论与决定。

第七十九条　在非党组织中对于每一个问题的决定，当在该非党的组织会议中付表决时，在该会议中之全体党员（即党团分子）如有违反党的决议，则按党的纪律处罚。

## 第十一章　经　　费

第八十条　本党经费的收入如下列各项：

（一）党费　党员每月收入在三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二角。凡无收入，及月薪不满二十元者，得由市或县委斟酌情形核定减免之。在三十元以上至六十元者缴一元；六十元以上至八十元者，缴百分之三，八十元以外者特别征收之，失业工人及在狱或在CY的党员均免缴党费。

（二）党内义务捐，由各地党的委员会酌量地方经费及党员经济力定之。

（三）党外协助。

第八十一条　军队中党员党费，由所在地军部征收，转交党部会计科。

第八十二条　本党一切经费收入，均由中央委员会支配之。

## 第十二章　与青年团的关系

第八十三条　青年团中央，应派代表出席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各级团部亦应派代表参加各级党部机关之常务委员会议，此等团部之出席代表应有表决权。

第八十四条　党的中央委员会应派中央委员任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各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应为当地党的委员会委员。

第八十五条　各地党部机关应派代表出席各级团部机关之会议。

# 中国共产青年团第四次全国大会的意义

（一九二七年五月）

弼　时

中国共产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已于5月16号在武汉闭幕了。这次大会所讨论的重要问题，都是根据去年11月共产国际和少年国际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及中国共产党今年5月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而决定的。

当大会开幕的时候，正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断然脱离民族革命联合战线，屠杀工农领袖和共产主义者，帝国主义积极准备武装干涉，经济封锁武汉，军阀向革命民众示威，绞死李守常等二十余人的时期。换言之，就是帝国主义军阀反动资产阶级联合向革命民众进攻的时期。

虽然大会的四周充满了反动的空气，会议时，每天得到各地电信，报告我们最勇敢忠实的同志被新旧军阀张作霖张宗昌蒋介石李济琛枪毙腰斩火烧的消息，但是这不独没有引起大会的恐慌心理，反而使各地代表在悲愤之后更加团集精神解决各种重要议程。所以这次大会第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表示中国共产青年团当这最严重时期，聚集自己的力量，来估计过去革命经验，按照现在革命的要求，规定今后斗争方针，为的是要继续已死同志完成未竟的事业，以答复新旧军阀的白色恐怖和帝国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武装干涉！

当中国共产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1925）的时候，他还是一个组织很小，影响极微，带了很充分学生色彩的青年团体。在这两年来的斗争中，虽然受了不少的损失（被新旧军阀与帝国主义杀戮的同志，总数在500人以上，被囚禁者200余人），然而他的组织有了极大的发展，接近了广大工人的青年群众，已经走向渐次变成无产阶级青年群众革命组织的道路。但是过去因为资产阶级混在革命的联合战线以内，和没有明确的革命前途，因此一切工作都受许多客观的牵制，并且免不了有许多的错误。这次大会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应争得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而达到社会主义的实现，指出团的任务是应领导工农青年群众，参加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反抗背叛民族利益的资产阶级，努力促成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亲密联合，实现其民主独裁的政权；发展农村土地革命，扩大无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影响，并建立工农自卫的武装，领导青年工农在工会农协之内去就改良生活与待遇，和反抗压迫势力的经济与政治斗争。因此这次大会的第二种重要意义，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确定了中国革命的远景和团的工作新方针，这必定更能提高劳动民众为远大目的而积极奋斗的精神，和国际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援助中国革命的努力。

"五四"以后，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者是智识阶级青年的学生，斗争的目标是思想上的革新，和反对日本的压迫。当时劳动青年群众，几乎完全没有参加这一运动。一直到"五卅"的前夜，都是如此。因此青年运动，并没有深入群众。"五卅"以后，青年工人随着工人阶级而跃入中国革命运动的午台，因为轻工业为中国产业的中心，所以占轻工业工人主要成分的青年工人变成了中国革命运动中极重要的动力。此时中国青年的领导渐次转移到劳动青年的身上。自北伐胜利以后，中国南部农民运动有了惊人的发展，而思想天真的农村青年，更变成农民运动的中坚。因此中国青年运动有了更广大的下层基础，并且这一运动的领导，完全由智识阶级的青年学生转交于中国的劳动青年群众了。所以这次大会指出今后中国学生群众在革命运动中已不能有以前同样的作用，但是在革命运动发展中仍是具有参加工农运动，到工农群众中服务以谋革命完成及学生自身解放之伟大使命。因此这次大会的第三个重要意义，就是指明中国青年运动趋势，并且更加确定了共产青年团的性质，应当消灭团内智识阶级的习性，而完全变成真正无产阶级青年的群众组织，努力在工农群众中去扩大自己的队伍与影响。由此而加重中国劳动青年和其先锋——中国共产青年团在革命中的责任与使命。

过去青年运动因为中国革命突飞的发展，多偏重于一般政治上的活动与斗争，很少注意到青年本身生活和利益的改善。这是中国青年运动虽然有了很好的下层基础而未能使其深入的根本原因。近年以来，因为战争天灾的影响，大小工业与农村经济，均成破产之象，生活程度较几年前高涨数倍以上。工人不独工资与工时毫无改善，而且常有失业的恐慌。农民不独缺少耕地，并且不能安居乐业，日受军阀官僚土豪劣绅高利贷者的剥削与压迫，常被迫而流为兵匪。学生因家庭经济之破产，政府教育经费提作军用，校舍变为兵房，而致求学无门，流为失学游民。手工业者因与帝国主义工厂生产竞争以图生存，对于手工业工人的压迫，更是无以复加。这些职业中的青年工人农人学生和学徒的生活更是不堪言状了，他们几乎牛马犹不如，常为军阀炮火的肉塞，和帝国主义榨压血汗的源泉。若是他们得不到生活上的改善，便不能使他们为革命有更多的努力与牺牲和保障革命已得的胜利，甚至将趋于消极。因此这次大会特别指出领导青年为其本身利益而争斗的重要意义，反对任何阶级调和和妥协的理论，尤其是要注意青年工人学徒的经济斗争，这是这次大会的第四个重要意义精神。

总括起来，中国共产青年团当中国资产阶级脱离革命联合战线，联络一切反动势力而来与无产阶级以武力争取革命领导权的革命严重时期，召集他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自然就可以看出这次大会意义的重要，而这次大会确能根据他七年以来斗争经验，决定了中国青年运动中许多重要的问题。我们并且可以相信大会的决议是非常正确而适合中国青年群众的客观要求与需要。在过去很短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旅程中，已大半为青年无产阶级死战的尸骸和血迹所铺满。中国CY四次大会之新的决议案和作战计划，将成为全国青年群众争自由、杀敌人之新的标志。每一热血的青年战士，都应齐向此标志奋勇前进。

我们不独希望中国共产青年团的团员接受大会的决议而努力按照去执行，并且希望能得到广大青年群众对于大会决议的拥护，努力站在共产青年团旗帜之下，使中国青年运动更加发展和深入。如此中国青年乃真不愧为中国革命的少年先锋队！

（原载《中国青年》163、164期，1927年6月13日出版）

# 中国共产党
# 致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亲爱的同志们：

自“二七”以来，中国工人阶级和本党携手奋斗，已经四年多了。这四年当中，中国工人阶级和本党同志为革命奋斗而为帝国主义、军阀及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所屠杀者，遍于全中国南北各省，积尸可以成山，尤其是最近封建、资产阶级的代表新军阀蒋介石及其党徒白崇禧、李济琛、夏斗寅、许克祥等在南方之屠杀，旧军阀张作霖、张宗昌在北方之屠杀，更为残酷。本党李大钊等同志们在北京之死难，汪寿华等同志们在上海之死难，邓培、李森、刘尔崧等同志们在广州之死难，杨昭植等同志们在湖南之死难，其惨烈当为中国工人阶级及本党永远不忘之事。

中国革命愈向前进展，帝国主义愈惊恐发狂地教唆其走狗向中国革命的工人阶级及本党横施屠杀；帝国主义愈惊恐发狂，教唆其走狗之范围愈扩大，不独旧军阀受其教唆，即曾经投机混入革命之新军阀，及一切游疑中立分子，亦受其教唆，转过头来，戴着革命的假面具，向工人阶级及本党毫无顾忌的摧残。

工友同志们！现在和革命势力不相容的，不只是帝国主义及其老走狗张作霖，也不只是帝国主义的新走狗蒋介石，凡是被革命高潮所吓退而接受帝国主义教唆的人，都会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走到反革命那边去；所以中国革命成功的担保，即中国民族脱离帝国主义之压迫剥削而解放的担保，乃是工人阶级及本党同志的血。

现当革命的高潮中，反革命的恶潮亦日益增涨，造成中国革命运动之一大危机。革命的工人阶级正在此危机中召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是有非常严重意义的。

工友同志们！我们在第四次大会时的力量固然比前几次大会时的力量增加了，但是敌人的力量也同时增加了；因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不但是老军阀，现在又加上了大资产阶级及大地主的代表新军阀。我们今后向他们作战的力量，不但要集中工人阶级自己的努力，而且要领导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结成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向共同的敌人作战。因为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同样是受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及大资产阶级之压迫者，这三个阶级都是中国革命的势力。所以此次大会的中心口号应该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工友同志们！今后革命的争斗将愈加艰难困苦，我们须愈加努力。本党庆祝大会之成功，同时预祝大会后全国工友们和本党携着手奋斗到底，以获得我们的最后胜利！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万岁！

全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万岁！
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万岁！
中国国民革命万岁！
世界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原载《向导》200期，1927年7月8日出版）

# 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摘要）

（一九二七年六月）

刘 少 奇

## 一 全国总工会一年来的概况

（一）全国总工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第三次劳动大会以后，北伐军由广州进军到汉口，又由武汉进军到郑州。在这个期间工人运动日益扩大，有组织的工人由一百二十万增加到二百九十万，全国总工会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地位亦随之大为提高。这是全国总工会全部工作的成果。可是，全国工人对全国总工会的信仰究竟是怎样的？全国总工会是否是具有威信的、享有众望的机关呢？只要从二月二十八日全国各地所举行的一小时总罢工的结果来看，就可以知道，全国总工会确实已经是有威信的、受工人群众信任的机关。

（二）全国总工会的工作和北迁。

全国总工会的三十五名执行委员，都是各地工会的主要活动人物，大部分都在各地工作；全国总工会的九名常务委员也都分散在各地，不能专门从事全国总工会的工作。因此，全国总工会的工作时断时续，成绩不甚显著。今年一月以来，革命势力得到了发展，武汉变成了革命的新根据地，也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全国总工会为了便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由广州迁来汉口。从此，中国工人运动展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全国总工会的工作从广东、广西发展到北方及上海、长江流域，日益成为全国工人的领导核心。

（三）全国工人运动的集中统一问题。

过去，全国总工会未能完全统一全国工人运动的原因，是没有专职的负责人。委员长苏兆征同志在广东担任了七个工会的委员长，不能倾全力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组织部长李立三同志由广东移往上海，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来到汉口。宣传部长邓中夏同志最近来到汉口，而且还忙于许多其他工作。本人担任秘书长职务来汉口亦不久，并且尚在处理湖北总工会的重要工作。就是这样，几乎没有人经常在全国总工会做工作。（中间省略）这就是常务委员会的真实情况。其他委员亦都在各地工作，全国总工会的工作自然不能统一起来，以致表现出不活跃的现象。

但是，全国工人运动并不是没有统一的可能。“二七”事件以前，全国总工会尚未成立，只有一个劳动组合书记部，但是当时的工人运动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指导下非常集中统一。因此，现在全国工人运动没有理由说不能统一集中在全国总工会领导之下。总而

言之，中国工人运动的集中统一，不是不可能的。

其次，第二个原因是交通不便。有的地方通信就需要一两个月。于是，全国总工会也就几乎没有办法领导这些地方的工作。

第三个原因是由于工作人员都担负各地的重要工作，全国总工会不能随时派出适当的工作人员。因此，即使某些地方缺少工作人员，总工会亦不能立即派人去补充。

第四个原因是中国各地的政治环境不同，在这个地方工会是公开的，而在那个地方则是秘密的，在今天虽是公开的，而到明天便又突然变成秘密的，这就使工作甚为困难。因此，全国总工会不能很好的巩固，而各地方总工会却是巩固的。这种情况，固然是由于交通和政治环境而造成的，但也与全国总工会的执行委员会的能力不足有关。希望第四次劳动大会能选出优秀的同志，加强全国总工会，集中统一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

## 二　执行委员会及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情况

（一）执行委员会的情况：

执行委员会共三十五人，召开过四次会议，议案六十余件，有关组织教育、宣传方面的决议甚多，在政治上发表了许多主张。比如当北伐时，各方面的人们都想假借北伐，限制工人的自由，要工人牺牲自己的利益，要求仃止一切罢工的行动；这时，全国总工会发表了一个宣言，不仅反对因北伐而牺牲工人的利益，并且要求在北伐中使工人获得更多的利益，同时还宣布全国工人要参加并支持北伐。这个宣言发表后，各方面的舆论为之一变，工人全力支持这个宣言的主张。因此，在这个期间工人没有牺牲自己的一点利益，可以说，这是全国总工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

在反对帝国主义上，全国总工会在广东或在汉口，都屡次的揭破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领导工人打击帝国主义，使帝国主义日趋崩溃。

（二）常务委员会的情况：

委员九人，开会三十余次，议案二百余件。

（三）执委扩大会议：

全国总工会迁到汉口以后，召开了一次执委扩大会议，除执行委员以外，有各地代表五十余人参加会议。在一个星期的会议过程中，通过决议案三十余件；其中重要的决议案有全国工人阶级当前的行动纲领及举行一小时的全国总罢工等。

（甲）全国工人阶级当前的行动纲领是为了满足全国工人的要求，为统一全国工人阶级的行动和要求而决定的。

（乙）举行一小时的全国总罢工的决议，是为了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出兵而发动的。参加罢工者全国有七个省、二百余万工人。湖南、湖北、广东的成绩最好，罢工的时间不长也不短，整是一个小时；在罢工时间里，全市寂然无人，使人敬慕。这表明了全国工人阶级很好的服从全国总工会的命令，吓破了帝国主义的狗胆。这也表明，全国工人阶级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出兵的，决不是寥寥少数人的行动。这就使得帝国主义不敢以武力来干涉我们。

## 三　各地办事处的工作

过去本会在广东时，只在上海及汉口设有办事处。以后本会迁来汉口，在广东设了办事处。

（一）上海：

上海办事处与上海总工会在工作上经常保持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五卅”运动纪念的时候联系的最好。因此，上海总工会的组织特别好，力量也有很大发展，以致能够在今年举行了两次总罢工、三次武装起义，以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打倒了奉鲁军阀。

（二）广州：

广州办事处的工作范围是广东、广西、香港、南洋。广东没有总工会的组织，实际上这个办事处很好的领导了这四个地方的工会。教育方面的成绩也特别好。只有南洋方面的工人运动还未充分发展起来；一个工会仅有几十个人或者几百个人，最多者也不过千余人。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会表现出光荣的斗争行动。

我们希望第四次大会特别注意南洋的问题。

（三）汉口：

全国总工会尚未迁来汉口时，汉口办事处领导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安徽等五个地方的工作；除湖北以外的各省，都派出特派员指导实际工作。

## 四　北伐进军中的工作

在北伐战争中，工人进行了很多工作支援北伐军。在敌人后方的铁路及交通部门，给敌人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工人组织了铁路队，专门给友军方便，破坏敌人行动。这在军事上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上海工人的三次起义，对革命军的援助尤为重大。工人以自己的力量消灭了上海的军阀，组织了上海市政府。这是值得敬佩的行动。但不幸令人痛恨的是，大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蒋介石一到上海，即改变了态度，屠杀我们工人和同志。

湖北工人在北伐中也进行了不少的工作。比如北伐军进军岳州后，吴佩孚全力抵抗，但由于粤汉路已被工人破坏，交通十分困难，终于失败。在这个斗争中，陈定一同志遭到牺牲，实为遗憾。汉阳兵工厂的工人觉悟到他们制造的枪弹被军阀用来屠杀他们的同志，不顾吴佩孚统治之严厉，举行了罢工，使吴军的军火无法补充，归于失败。再有省港罢工工人组织运输队，邦助北伐军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胜利。

在第二次北伐战争中，工人进行的工作也是伟大的。铁路队的工作较以前更为加强，力量更加扩大。杨森、夏斗寅的叛变所以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被粉碎，即是由于工人阶级迅速的武装起来，参加了前线的斗争。这些均是全国总工会领导工人斗争的成就。

## 五　省港罢工及其成果

第三次劳动大会以后，省港罢工仍然继续进行。我们知道省港罢工在表面上虽未得到胜利，但实际上，省港罢工对广东政府的财政、政治以及北伐，都给了极大的邦助。国民政府与英国政府所一度进行的谈判，在我国外交史上是极其光辉的一页，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起了不少的作用。去年十月十日，罢工工人鉴于政治及外交的新形势，认识到暂时仃止罢工对革命更为有利，遂决定仃止罢工，由国民政府处理罢工的善后事宜。总而言之，这次罢工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获得了很好的结果，并使革命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 六　参加国民革命

工人阶级为国民革命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在巩固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工人阶级尽了最大的力量。因之，工人阶级当然必须参加国民政府，以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全国总工会决定要求让工人阶级参加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同志已任国民政府的劳工部长，湖北总工会委员长向忠发同志已任汉口市政府委员，这就开创工人阶级参加政府机关工作的最初先例，希望以后日益增多。

## 七　太平洋劳动大会

“五卅”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并且参加了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赤色职工国际。在第三次劳动大会以后，英、苏、法、美等国的工会都曾派代表来中国参观，并于五月在中国召开了太平洋劳动大会。参加这个大会的有九个国家的代表，会上除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罗佐夫斯基同志的“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职工运动的报告”外，还有各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并通过了二十个决议案。

## 八　全国总工会各部门的工作

（一）宣传工作：除出版“工人之路”“中国工人”等二十多种报刊外，还发行了很多小册子、画报、标语等，并且组织了国际通讯局，从事国外宣传。

（二）秘书处的工作。在广东时的工作，因为缺乏材料，不能做报告，自迁到汉口以后，共发出信件五百零四件，收到信件一千八百七十九件。

（三）组织工作。派特派员到各地努力组织工会；全国有组织的工人由一百二十万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万人。

## 九　结　　论

执行委员会自第三次劳动大会以后，在一年的工作中，虽然工作的成绩还很不够，但

每个委员在自己的工作上并不是不努力的，并且作出了一定的工作成绩，但由于全国总工会不健全，以致还缺乏统一集中。

我们在这次第四次大会上提出的口号是：

一、加强全国总工会。

二、所有的工会工作人员归全国总工会调动。

三、各地工会要按时向全国总工会交纳会费。

四、设立北方办事处，做为北方工人运动的领导核心。

五、全国总工会要设专职领导人员，并经常派遣人员去各地巡视。

（转自《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

# 〔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经过及其决议

中华全国总工会鉴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南京政府对于上海总工会进行之反革命政变，认为有举行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必要，曾于同月发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召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告工友书，及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二种。二者内容大略相同，大意如下：

（一）全国工友自第一次大会以后数次奋斗之结果，遗留伟大之功绩于世界。

（二）买办，大资产阶级，退出国民革命之联合战线，中国革命运动变为小资产阶级及农民民众的共同运动，而转入一新时期。

（三）本大会讨论下列事项：

甲、援助农民打倒土豪劣绅封建制，并建立乡村民主政权；

乙、指导全国民众与小资产阶级成立工农革命同盟，以对抗反革命勢力和白色恐怖；

丙、按太平洋劳动会议之决议，确立全国无产阶级之联合，俾反抗帝国主义者之结合并防止破坏苏维埃制之阴谋；

丁、反对大资产阶级之阴谋，并提倡非资本主义之革命；

戊、促进小商人及小资产阶级的自觉；

已、要求编订劳动保护法，工场法及国立劳工保险制，参加国有产业之管理；并没收帝国主义在华所有之大产业；

庚、确定并划一总工会之组织系统；

辛、教育宣传方法及工人武装方法。

该大会原定一九二七年五一节在汉口开幕，嗣因太平洋劳动会议适于是日在汉口开会，遂改定于该年五月三十日举行。后因筹备事繁，交通梗阻，延至六月十九日始得正式开幕，兹将连日开会之要求事项，摘录如下：

六月十八日先在汉口“血花世界”举行予备会议，到各地代表四百余人。此外尚有苏联、爪哇、朝鲜等代表数十人。苏兆征主席。首由李立三起立演说云：“此次之会议，与

前三次之集会不同。此次意义极为重大即：（一）中国之劳动运动，今已划一新时期，吾人不可不巩固农、工阶级之组织，以达成工、农革命之目的；（二）期望小资产阶级与劳农阶级巩固团结，协力联合，实行革命；（三）使政府担任救济被压迫之农、工阶级，确定依劳农组织之农工政策；（四）农、工阶级联合，打倒封建制度遗物及一切革命障碍物。”继复讨论议事日程，会议事项，进行方法等。并予定十九日起正式开会，每日午前午后各开会一次。

十九日午后三时正式开幕。参加者有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赤色职工国际及各机关团体之代表共四百余人。旁听者三百余人。并通过大会之通电及通令。内容与四月间之宣言，大略相同。

六月二十日出席代表三百五十六人，李立三作政治现状之报告，重要节目如下：

（一）“五卅”后之北伐运动，香港罢工，各地工人之援助北伐，上海武装暴动，北伐与工会发展等。（二）大资产阶级背叛后之情况，革命之破坏手段，法西斯蒂主义。（三）国民革命之趋势，小资产阶级及农工革命运动，工人参加改良问题，土地问题，非资本主义经济之建设。

六月二十一日出席者三百八十一人。赤色国际委员长拉斯布斯基报告世界革命运动，此外并有各地代表之报告及希望。其主要希望如下：（一）反对白色恐怖；（二）区别真正之友与真正之敌；（三）巩固小资产阶级之联合战线；（四）没收帝国主义者手中之一切产业；（五）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六）工人参加国有产业之管理。

六月二十二日出席者三百八十人，其要点为今后应联合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者及大资产阶级作猛烈之斗争，扩张劳动阶级之组织与能力，激励其奋斗，并使之努力于政治经济方面。最后提出临时提案四件，其主要者为请求国民政府勿取缔农工运动（湖北代表提出）及急速派遣讨伐军。均经通过。

六月二十三日出席者三百八十人，有全国总工会过去一年间之报告，继提出“会务决议案”通过之。

二十四、五、六各日，各地代表报告，二十六日通过“失业工人保障案”。

六月二十七日出席代表四百二十人。由主席团之刘少奇，提出中国工会组织问题案，原案议决通过。

六月二十八日为大会最后之一日。是日上海代表提出反对法西斯蒂之议案，经大会通过。此外尚有各地各工会之决议案报告及女工童工之决议案等。

兹将该次大会之各项决议案照录如下：

## 一　会务报告决议案

（一）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在过去一年中，对于全国工人阶级政治的经济的斗争，有适当之指导。如引导工人参加北伐斗争，反对借口北伐牺牲工农自由斗争，香港罢工仃止武装封锁，上海三次暴动，指示各地不断的做改良生活运动，以及全体一致罢工一小时作反帝国主义武力干涉中国之表示等。大会认为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确能认清革命环境与时机，完全站在工人阶级利益上领导工人阶级上前奋斗。一切政策都是对

的，大会非常满意。（二）全总在广东时，曾发展广东各县及南洋各部之工会组织，北伐后，又加紧发展湖南、湖北、上海、河南之工会组织，及迁鄂后，又陆续发展江西、安徽各地之工会组织，组织的工人之增加，有惊人的进步。第三次劳动大会人数一百二十万人，现在已增到二百九十万人，大会非常满意的。（三）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往往因客观需要分散各地，以致会中技术工作，不能完备。大会责成下届执行委员会，纠正此项缺点，必须集中得力人员住会办事，对各地应有经常之指导。中华全国总工会成为健全机关，尽他伟大的指导责任。（四）各地方各产业工会，对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绝对表示拥护和信任。全国工人阶级，誓立在全国总工会旗帜之下，谋得阶级之完全解放。法西斯蒂与改良派之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及广东总工会有另组全国总工会逆谋，大会责成各地一致反对；（五）第二届执行委员李森、何耀全、邓培、刘国裳、缪卓民诸同志，被反革命派所杀，大会誓愿为诸烈士复仇，继续其精神奋斗。

## 二　关于工会组织问题之决议案

（一）职工运动到今虽大有进步，但第二次及第三次大会，关于组织决议案，到现在尚可以通用的；（二）中国的工人若是有六百万人，那末手工业工人和店员便要占四百万人，所以关于手工业工会和店员工会的组织问题，要在第四次大会特别注意；（三）各地工会的组织虽有进步，但终久还没有建立稳固的基础，所以此后我们应想法集中工会的组织及稳固的基础；（四）工人中的斗争和组织，两者是相辅而行，缺一即失其功效；（五）集中工会的权力，免除组织紊乱；（六）政治环境时常变更，而工会当其变更的时期应特别注意；（七）女工、童工同样的为工会会员，不应有其他组织，但同时要保障童工、女工本身的利益；（八）职工运动已由经济的斗争进入政治的斗争了，所以对于工人的武装问题，应特别注意；（九）工会向会员征收会费的标准，及将会费之一部分作工会基金和失业救济金；（十）关于组织各种产业的全国总工会及强固全国总工会的必要与计划；（十一）大会对于广东机器工会及江西景德镇反动武装进攻之事，应极力宣传以暴露反动派之真相；（十二）结论。

## 三　关于童工女工之决议案

（一）在中国工人中童工、女工占大多数，所以要特别注意；（二）童工、女工的生活困苦情形；（三）工作时间之规定及年龄之限制；（四）改进卫生；（五）待遇应与成年工人一样；（六）工资应与成年工人一样；（七）应设立艺徒学校；（八）不能虐待；（九）女工产前产后的待遇；（十）应规定经常休息时间；（十一）应为童工、女工设立俱乐部；（十二）童工、女工应与成年工人一样的享受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十三）要解除童工、女工的种种痛苦。

## 四　关于失业问题之决议案

（甲）保障失业工人决议案：（一）凡能容十人以上之作坊、工厂、商店，行业及雇

退工人须经政府之许可；（二）凡工厂、作坊、商店仃歇及辞退工人，须于一月前公布仃歇及辞退之理由；（三）凡因营业在原有资本亏本三分之一者，得呈请政府邦助，继续维持营业现状。亏本达二分之一者，得准其缩小范围。亏本超过二分之一以上者，经政府之许可，方准其仃歇；（四）凡无故仃歇者，得呈请政府没收其生产机关。惟国有及社会日常生活必需品之生产机关，不得仃歇及辞退工人；（五）凡因亏本经政府允许缩小范围或仃歇者，应发给被辞退工人之遣散费。手工业者与店员，按原工资发给三月，大生产机关给四月，未经政府允许者遣散费一律加倍；（六）政府指定医院，为失业工人疾病治疗所，并应拨款建设失业工人寄宿舍及饭堂；（七）由政府设立失业工人俱乐部、职业讲习所及子弟学校。

（乙）救济失业工人决议案：（一）呈请政府设立救济机关，拨款救济（二）由政府命令各工厂、作坊、商店，按百分之几，作失业工人之救济金；（三）由政府在各种捐税内，增加百分之几，作失业工人救济金；（四）由各团体募捐交救济机关，救济失业工人；（五）各工会应由每月月费项内，抽出百分之三，作救济失业工人之救济金。

（丙）安插失业工人决议案：（一）由政府协同工会，设立失业工人职业介绍所；（二）凡工厂、作坊、商店扩张营业增加工人者，应请职业介绍所介绍，不得自由雇请；（三）由政府筹款兴办实业安插失业工人。

（原载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1928年12月出版，转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关于政局的公开的信——

（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鉴：

亲爱的同志！

中国革命正在经过一个危急的阶段，在这阶段中，革命必定迂到许多难关，并且要克服许多困难问题。目前根本的问题是怎样实施某种限度的土地改革，以满足已醒觉的农民群众之正当要求，而达到革命根基深入之目的。国民党革命的农民政策已经促起农民群众之奋起，实施这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因为国民党是三民主义的革命党，他的历史上的职任，就是实行他的土地政策——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中国革命的将来，中国人民的命运，全靠贵党在此时期之坚决的行动。

土地改革刚才开始，就促进了反动分子之反革命行动。代表不劳而获的大地主阶级之封建军阀，已经起来实行用武力反抗农民。他们威吓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欲加以破坏，——如果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依然忠实于他们革命的主义，依然领导农民从事历史上的反封建势力之斗争。

军队中有些分子反对土地改革确是事实。不过整个的国民革命军并非——亦不能——反对农民的解放。兵士们大都是无地或贫苦的农民，他们不会很自觉的反对农民运动。如果兵士们对土地改革表示敌意，就是他们还没有觉悟他们仍在受军队中反动分子的剥削。以兵士论，革命军在客观上应当是一个土地革命的军队。大多数的下级军官也是从中等阶级招募来的，他们也是被剥削者，被压迫者；国民革命并妨害不着他们的财产，他们必不以行动来保护豪绅大地主的政权和利益。现在把持一切政权和特殊权利的是豪绅和大地主。他们消灭之后，经济的关系和政治的权利一定要民权化。所以土地改革，不但不妨害城乡的中等阶级，并且可以解除他们的经济的仃滞，给他们以政权。如果将这一点给他们说明白，革命军中之下级军官一定很忠实的赞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民权的土地改革政策。再者国民革命军的将领都是相信民主自由的革命领袖，对于土地改革定能拥护。

国民革命军的组织如此，整个的革命军决不能敌视土地改革。其绝大部分（兵士，下级军官，上级首领）定能拥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那么，最少数的反动分子处于孤立的地位，如果他们有反革命的行动，不难一鼓荡平之。

在选择道路上国民党已无丝毫犹豫的余地。土地的改革是到革命之道路。反动军阀所取者是反革命的路。革命的国民党不可站在一个分歧的路口。反动的军阀已经公开的反叛革命（夏斗寅的叛变，长沙的政变可十足的表明这一点）。他们已经向工农运动宣战了。

他们的屠杀工农群众，和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蒋介石、李济琛一模一样。他们要挟国民党放弃土地改革政策，以赚得大地主和劣绅的爱戴。他们侮蔑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威权。长沙政变发生后，湖南省党部即被解散，并未得国民党中央的批准，擅自成立省党部。（及所谓救党委员会）打毁党校，劫夺前方购买军米之款项，国民政府所派遣之特别委员团中途被阻不得到长沙，并且自由派军队到各县屠杀农民、工人、学生、妇女。

这是明白的反革命行动。少数反动军阀，背叛了国民党国民政府以及高级军事长官，而在湖南篡夺了政权。国民党的责任到此情形之下，非常明显，宜立即下令讨灭此少数叛徒，以维系其最高权威，还是和他们妥协？国民党如果采用第二种办法，国民党的历史，国民党的主义，国民党的政纲，都将推翻，将在国民党政治的生命发生非常严重的影响。湖南的反革命必须讨灭，迅速的行动已经十二分必要了。犹豫不决，必遗后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采用以下的行动，削平湖南的反革命：

一、国民政府明令宣布长沙叛徒许克祥等所组织之委员会系反革命，并令军队联合革命的民众共同推翻之。

二、解散叛徒的委员会另委合法的省政府。

三、火速派兵讨伐叛乱，与唐总指挥以派兵之权削平之。

四、取消叛徒窃据之省党部，另由国民党中央下令改选新省党部行使职权。

五、国民政府明令宣布工农组织及共产党在湖南得享完全的自由。

六、武装农民以防御反革命叛乱之发生。

以此行动处置反革命，不仅湖南一省工农群众对国民党发生坚强的信仰，全国各地的工农，定要遥瞻国民革命的旗帜，认识国民党的党徽，为他们自由之标志。他们必定自己起来向国民政府之敌作战！

当大资产阶级、封建反动势力和他们的军阀代表向国民革命反抗时，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一定要和民权主义的群众结成更密切的关系，促醒他们革命的觉悟，并领导着他们大胆的向反革命进攻。当反动分子以公开的反叛行动集合他们的力量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倘不果决的领导劳苦群众向反革命势力作殊死的革命战斗，则一切反革命势力得有更多机会放胆集合发展其势力向革命进攻，革命前途将陷于危险！　谨致

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陈独秀

（原载《向导》197期，1927年6月8日出版）

# 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三日）

为令遵事。农民运动，过去因为发展甚速，组织上未能健全，加以土豪劣绅猛力反攻，遂使乡村斗争日趋急剧；上级机关之指导偶有不周，即不免发生无组织之行动。已经本会临字第一号训令及第二号训令明令各级农民协会，极力纠正，务使各地农民，俱在农民协会指挥之下，有组织有计划的继续与一切土豪劣绅反动封建势力斗争，以尽我农民在革命过程中推翻帝国主义剥削中国乡村的经济基础，及军阀统治的政治基础之职责，并指出各地农民目前的斗争目标，应为建立乡村自治而奋斗。现据各方报告，在湘、鄂、赣三省中，土豪劣绅进攻农民，非常猛烈。在江西，六月五日当局遣散党务政治工作人员后，各地土豪劣绅，纷纷乘机蠢动。吉水劣绅，则勾结流氓，进攻农民协会，下乡捉人；南昌一区，劣绅则拘捕执行委员；新建土豪劣绅，则逮捕农协会员，牵去农民耕牛；铜鼓革命团体均被捣毁；弋阳反动军队，更大行残杀农协职员；泰和四区农协，不但为反动派所捣毁，并被捕去职委二人。在湖南，五月二号（二十一日）事变日许克祥即屠杀省农协、省工会、工人运动讲习所、党校等处同志及农民、工友共三十余人。事变以后，更派兵袭击湘潭、常德各县民众，而农民死伤枕籍者，将及万人；并将湘潭总工会委员长斩决，而以脚踢其头，更用洋油注其腹内而焚之；旁观民众，莫不愤怒万状。在湖北尤为凶猛。湖北各县土豪劣绅，不但勾结土匪及会党的腐败领袖，惨杀农民。如阳新土豪劣绅用洋油烧死农民九人；沔阳土劣勾结"硬肚会"惨杀农民五十余人；天门土劣勾结土匪惨杀农友二十余人；钟祥土豪劣绅勾结"硬肚会"惨杀农友十余人；汉川土豪劣绅勾结流氓杀伤农友十余人；麻城土豪劣绅勾结"红枪会"、"黑枪会"、"白枪会"残杀农友百余人、烧毁民房数十村皆是；他们更利用反动军队力量，以图根本扑灭农运，因以动摇革命根据地。夏逆，许、张、于诸逆相继叛变，每到一处，即将在押土豪劣绅释放，使之率领逆军到处屠杀。嘉鱼杀死农民三十余人；咸宁、武昌均杀死五十余人；天门烧农民房屋三百余间，杀二十余人；公安烙死数十人；枣阳残杀五百余人；沔阳残杀二十余人；宜都残杀数十人；麻城乡捕杀，烧毁房屋，奸淫妇女，共杀死五百余人；随县前后杀死一千人以上；罗田惨杀六十余人；黄安惨杀一百余人；钟祥劣绅王恕堂更占领县城，挨户搜索，惨杀二百余人。其他夏口、黄冈、应山、应城、圻春、江陵等县的豪绅，亦莫不闻风兴起，向农民进攻。挖眼拔舌，刳肠斩首，刀割沙磨，洋油焚烧，红铁火烙，均为豪绅对待革命农民的残酷刑罚。对待妇女，则以绳穿贯其乳，而趋其裸体游行，或零碎割死。农民之死难者已达四五千人，而荆门、松磁、宜昌等县，仍在继续屠杀中；即国民政府首都武汉，仅距汉阳县城十余里之地，亦不免发生土豪劣绅围杀农民之事实。湖北全省完全为白色恐怖所笼罩。总计湘、鄂、赣三省党员、农民、工人之牺牲者，不下一万数千人，其挑拨革命军人与农民

感情之毒计，亦正积极进行。往往捏造事实，指鹿为马，故甚其辞，希冀军人向民众团体发生剧烈之冲突，离间军民感情，分裂联合战线，破坏三大政策；于以推翻党国，虽人民痛苦，亡国灭种，亦所不惜。同时，贪官污吏起而与土豪劣绅，互相响应，共同捏辞诬蔑农民，以图离间政府与人民之关系。如黄冈农民协会，本无铲挖烟苗事项，而贪官污吏，竟蒙呈中央予以解散，即其著例。现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因以明悉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买办洋奴以及一切反动派，乘我军北伐与奉军战斗剧烈之际，向我国民政府联合进攻之毒计，而训令全体武装同志，对于指鹿为马，过甚其词之传言，谨慎调查，毋堕反动派之阴谋。然日来各地土豪劣绅，勾结土匪、溃军屠杀农民事实，仍有愈演愈烈之势。贪官污吏离间政府与人民之阴谋，亦复屡出不穷。各机关近来接得诬控农民之状纸，每日不下数起。在此种严重情形之下，各级农民协会极应一致请求国民政府：（一）明令保护工农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并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后方之反动派，使工会、农会、共产党等革命组织，享有完全自由，团结革命势力，实行讨伐蒋介石。（二）肃清湖北各县勾结逆军土匪屠杀农民、工人之土豪劣绅，严惩造谣离间的蒋介石奸细及一切反动分子，以巩固武汉。（三）明令惩办许克祥、仇鳌、彭国钧、萧翼鲲，解散其救党委员会、清党委员会等反动机关，恢复湖南省政府、省党部、省工会、省农协及一切被摧残之革命团体，接受湖南请愿代表团之请愿，并令湖南省政府唐主席从速镇压湖南之反革命派。（四）明令制止江西驱逐共产党及工农领袖之行动，并严惩屠杀民众之反动派。农民协会本身尤应更加努力，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卫，以反抗土豪劣绅武装袭击，而镇压一切反动封建势力之挑拨离间。因为土豪劣绅之气焰不灭，则创设乡村自治，建立民主政权，终属不可能之事；经济上之建设，更无从可以实现，而国民政府之基础，亦未由巩固也。此令。

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谭延闿　谭平山　邓演达　毛泽东　陆沈
（原载1927年6月15、17日汉口《民国日报》，
并参照同报6月18日《全国农协呈请国民政府
保护农工组织》一文校订）

## 〔附〕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布告*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为布告事。照得农民占全国人口之最大多数，国民革命主要目的之一，在乎扶助农民，以求解放。本党政府，前才发出宣言及所定政策，对于农民利益，无不特加注意。去岁中

央执行委员会，及各省联席会议，暨今年三月第三次中央全体执行委员会会议，先后议决，拥护农民利益，具体政纲数十条；最近并特设农政部，以专责成。凡关于保护农民政策；务冀按照客观环境与主观力量，尽其可能，次第施行。惟近来革命势力，发展日速。乡村封建制度，逐渐崩坏；而新的民主制度，尚未完全建设。际兹革命过程，新陈代谢之期，不免发生部分纷扰现象，幼稚举动，时有所闻，甚至轶出正轨者，亦所难免。凡兹事实，乃俱因农民要求迫切，而又无法遵循正轨以达其要求之所致。似此殊非本党政府扶助农民、保护农民之本意。本部职司农政，实负有领导农民、诱掖农民之责任，对于农民所有一切幼稚举动，应加以纠正；而对于轶出正轨，妨碍大多数农民利益者，更不得不加以制裁。再者，目下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所有都市、农村之旧势力、旧制度，因革命之进展而摧毁。最近工作，应即集中一切新势力，建设一种新制度，以创造革命秩序。故在都市工人，急需联合被压迫而有革命需要之工商业者，以建立革命同盟。在农村，亦应本此原则。农民应该与农村中一切民主势力密切联合，然后新建设之基础，乃克形成。为此布告民众：今后农村居民，凡同情于革命者，皆应集合于本党政府保护农民政策之下，共谋新制度之建设，以促民生政治之实现，俾农民得遵循正轨，以达其迫切之要求，即一切农村居民，亦得早日享有安居守业之幸福。至于反革命分子如何肃清，土豪劣绅如何惩办，农村附逆如何处分，应按照本党政府最近所颁各种条例，一概交由政府机关办理，不得自由行动。如有违犯，定必严惩。本部一面自当督促所属，于最短期间，建立县、区、乡自治政府，改良农村经济，巩固农村自卫，普及农村教育等等，以切实保护农民利益。须知本党政府前后政策，莫不以拥护农民为主要点；最近对于农民所发生幼稚举动，加以裁制者，亦无非为完成解放农民之使命，而非对于保护农民政策，有所变更。各地方长官，应体会此意，善为诱导。倘有挟意曲解，借此压制农民，定当严办不贷。仰各地民众暨各县长，一体知悉。切切此布。

（原载1927年5月27日汉口《民国日报》）

---

* 标题是编者加的。

# 马日事变的回忆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

直　荀

现在略述马日事变前后湖南的情形。

一九二七年春季的湖南，的确是一个革命的湖南。当时不独农民纷纷的起来，有组织、有农协会员册可查的计五百十八万，能影响的人数在千万以上；即不脱行会性质，最难组织的手工业工人，也一律组织起来了。城市中的工会，乡村中的农民协会，简直是当时第二政府，政府的命令非经过工农两会，简直无法执行。他们的工作就是向豪绅资产阶级及一切封建势力宣战。省县之特别法庭乃大形忙碌，然而杀人并不多，五月之久经省特别法庭判决执行死刑者还不到二十人，其余多半是判徒刑或罚金。而民众自己动手惩办的为数更少，不过湘潭之晏容秋等二三人而已。而在当时一班封建余孽、豪绅领袖，却没有损坏他们的毫末，最大原因就是他们多半是所谓革命军人的家属，服从当时所谓革命纪律，没有去动。

这种反封建势力豪绅资产阶级的工作，撼动了代表封建势力豪绅资产阶级的军人。熊震，当他卫戍长沙的时候，表示很左，及开到辰州听说他的岳父被农民捉了游乡，勃然大怒，而开始极端的反工农运动。谭延闿听说农民要他的女婿（长沙大资产阶级朱雨田嫡孙）捐款，也连电托人说情。而何键、叶琪更是自始至终的反对工农运动，开到常德时即开始屠杀农民。其他土匪编成的国民革命军，如攸县之罗定，宝庆之王锡焘，更无论矣。当时最足撼动一班豪绅，使之震慄的，就是在长沙省城枪决全国封建余孽豪绅领袖的叶德辉。当叶被枪决后，一班土豪劣绅大为震动，纷纷投入军队，而袁家普、曹典球一班人都投到反动最力的何键部下充参议长和秘书长了。同时他们开始向军士反宣传：说怎样的兵士六个月不回家，老婆要离婚另嫁；兵士寄回家的饷银全被农协没收了；乡中的田全被瓜分了，兵士退伍后将没有田耕呵。据邓演达说，他们竟刻了许多省农民协会的图章，将兵士寄回家的饷银，全部没收，而将图章盖在上面，说这是被农协没收了。总之，他们用尽了卑污恶浊、阴险狠毒的手段，以造成这反动的局面。而民众方面，对于本身利益的要求，急转直下，日益迫切，农民则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工人则要求增加工资。在城市他们只认得工会是为他们谋利益的机关；在乡村就只有农协。国民党在群众当中始终没有发生影响，湖南农民自看到国民党三个字起就认定它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有钱的入国民，无钱的入农民”，这是他们对于国民党深切的认识。

而我们自己呢？当时实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中。既要与一切封建势力土豪劣绅资产阶级宣战，而在另一方面又要与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又要与封建余孽、豪绅资

产阶级的走狗，大小新军阀，讲亲善，谋妥协。对工农的要求，则制止工农自己动手来解决，而要他们等待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命令。这岂不是和俟河之清一样的无期吗？

而客观的环境，一天一天的险恶。蒋介石、李济琛相继在上海、广州屠杀工农了。夏斗寅叛变了，何键反工农的空气一天一天的高了。忽然接着了一个报告，说临湘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李中和被前次为民众拘捕而为刘岳峙所保释的团防局长詹仙侠所杀，凌迟处死，割心剖腹，备极残酷。五月二十日晚益阳农民协会委员长廖贯一来省报告，则何键之部下已于前一日将益阳县工会农协占据，农民自卫军及工人纠察队均被缴械。空气更紧张，更险恶，许逆克祥于五月二十一日夜十时许正式围攻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及该两会之一切附属机关。

事变之前，我们知道事变之将到，原有一个反攻的计划。但是当时的共产党虽则组织尚好，但只是一个太平时代的党，没有斗争的经验，不能应付这个斗争的环境，而只是一个反攻，不是知道事变将至，取积极进攻的计划。因此事变临头，手忙足乱，一切计划全归失败。仅有长沙附近数县有一个于五月三十一日进攻长沙的计划，同时屯驻了万余工农义勇队于湘潭附近三十里的姜畲地方，但因没有适当的指挥人才，结果是被敌人各个的击破。而约定进攻长沙的各处工农义勇队，因为在省方的负责人不知道武汉方面的实际情况，又听说国民党中央派人来湖南调查和解释误会，以为不可暴动，破了面子，将来难于收拾，中途改变方针，叫他们仃止出发。当时因发信太迟，浏阳的部队已经出发，因此有五月三十一日下午浏阳工农军单独进扑长沙的壮举。虽则失败，然而这次英勇的斗争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这次起义事件失败的总原因可说是中了机会主义的毒。当时曾用省农协临时办事处的名义，发了一个告全省农民书，主张没收地主的土地，主张镇压土豪劣绅。虽有这个纸上的空言，然而不能坚决的执行，一则专注意于攻城等军事行动，而没有注意到这种根本的工作；一则虽主张普遍的没收土地分给农民（上面没有提出没收一百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等口号），然而没有提出具体的办法，使农民无从下手；虽则主张镇压土豪劣绅，但是当时的农民还没有受过马日事变后的大清乡大屠杀，以为这种举动未免太过火了，不忍动手；虽则发展了广大的民众，各县都有好几万人集中，一切粮食都是由各地征发得来的，即未集中的，也在本地担任戒严的工作，然而没有好的组织、好的指挥，尤其是没有武装起义的经验。结果是失败。

失败后第一个牺牲者就是我们英勇的战士湘潭县工会的委员长杨昭植同志。杨同志的死，是在豪绅资产阶级残酷的野蛮的刑法中死去的。同时被牺牲者是在湘潭任农运工作的柳季刚同志及一位女同志。

湘潭起义虽然失败，然而各县仍继续起义。而当时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尚抱一种幻想，致不愿公然采取起义政策。郭亮同志以千余言的长信，请求在乡间组织游击队，实行打倒土豪劣绅和没收土地，但被阻止。

（原载《布尔什维克》120期，1928年5月30日出版）

# 〔附〕长沙事变经过情形一

——湖南各团体请愿代表团之报告——

（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

长沙事变之原因可以概述如下：

远因：主观方面的——湖南农工运动起来太速，不免有幼稚的行动，以致敌人乘机以逞，党的发展较民众团体的发展为慢，所以没有全部领导的能力，这是我们应该首先认错的地方。客观方面的：（1）蒋介石在湖南年来所组织的团体有左社（刘岳峙）、拥蒋棒喝团（李致等）、三爱党（彭健初）及各县的团防局（如宜章团防局长旷黄等将县党部李佐民挖眼剖心破肚游行，他如临湘、华容、武冈、益阳、浏阳、湘阴等县惨案后头主使者皆为蒋逆介石）。（2）唆使土豪劣绅混入乡村农民协会及党部专事捣乱。总之，湖南反动派之成绩多为蒋介石在湖南工作的结果。

近因：主观方面——（1）近月以来因党部及民众团体忙于执行中央党部之外交政策、经济政策及第二次北伐后防粮食招募等工作，而对镇压反动派工作不免有疏懈的地方，这个懈怠恰恰是反动派大举反攻的时期。（2）农民群众因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迫切，我们事先没有好的宣传和灵敏的指导反为反动派借此鼓惑军心的张本。（3）湖南妇女起来很快，各地作妇女运动的同志对于强迫剪发放足及轻断离婚案件时有所闻，于是又为反动派宣传"要公妻了"的张本。（4）乡村的农民没有得政府及党之坚确的命令，因此不能完全接收乡村的武装及政权，这也是我们的缺点。客观方面：（1）湖南既有了他们的组织（左社、三爱党、拥蒋棒喝团、保产党），又有了土豪劣绅大地主仍霸占了乡村政权，又有了团防局及许克祥的武装，这皆是蒋在湖南的基础建筑完成。（2）上海、广东、重庆及湖南边塞各县的惨杀加以杨、夏的反叛及第二次北伐的紧张，而湖南又立于第二次北伐后防的重要地位（粮食与募兵），这恰好是他们大举反叛的好时机。（3）他们在二十一日事变以前的工作：军事的：唆使第十六军第四师的募兵处在各县运动（如平江、衡阳、浏阳、祁阳、益阳、湘乡、常德、临湘、衡山等处）收买土匪夺取枪枝、惨杀乡民、强劫货船等。经济的：十五日至十九日他们看见省政府及省农协所派出的采办军米专员每天能运得两千石米来出口，这更是他们所嫉恨的地方，所以有夏斗寅之断绝交通和他们的鼓动商民不用金库券及米商的无形闭市。政治的：他们在政治方面的工作唯一的就是造谣，如十七、十八、十九的谣言有以下几种：1、武汉的国民政府倒台；2、汪主席坐飞艇逃走；3、鲍顾问枪毙了；4、谭主席微服逃走常德；5、邓主任被捕；6、程总指挥割发为僧；7、三十五军反水；8、唐总指挥被部下软禁于信阳；9、何军长在广水就总指挥职；10、各军政治人员皆被枪决；11、刘军长反水占领兵工厂；12、杨森的军队进据刘家庙，夏斗寅的军队进据武昌城；13、熊旅长屠杀常德民众，张师长亦反水；

14、工农军要缴革命军的枪；15、李福林的军队到了衡州，夏斗寅与三十五军即日到长沙等谣言。以上各谣言正在武汉与长沙的交通断绝的时期，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于是省政府省党部及各民众团体开紧急联席会议，用不得已的办法，宣布全省戒严。（4）因为湖南到了这样紧急的时期，我们不得不准备工作如下：宣布全省戒严；准备全省武装工农组织"中国国民党湖南义勇队"，交省政府指挥戒备一切；派人来中央及唐总指挥处报告湖南情形，不料事变仓卒，竟未成行；派熊委员、石校长、陈军长赴岳，协助驻岳军队讨伐夏斗寅，并电调陈军全部来省；经济委员会尽量维持金库券，凡五元以下，准许现金流通，对现金集中省金库的政策稍加变通，以维持金融；各团体发通告、出布告、组织宣传队，镇压谣言。以上系二十一晚以前我们的工作。

十九、二十、二十一，三天长沙社会的情况。

除我们防御工作及反动派工作情形如上述的情况外，所有社会方面的情形如下：

十九日，我们一方面忙于运军米及解决谣言所影响的经济问题与各县联席会议闭幕及镇压谣言工作外，十九晚南门学院街突有枪声，枪声的来源，因三十五军留守处驻扎学院，于是晚因工农纠察队十余人押解工贼犯事毕，经过是处无口号被留守处缴械，又省党部侧富雅里十号火警，兵工厂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被许克祥唆使伤兵，强夺枪枝，打伤纠察队数人，同时亦有伤兵数人被捕，因此二十号的谣言更大。二十号情形：三十五军与总工会双方解释误会，并交还枪枝，双方和平解决，惟兵工厂纠察队所捕之伤兵于是日送交戒严司令部，乃被伤兵包围未果。是日市面情形，因谣言更甚，恐慌已达极点。下午六时，纷传是晚必缴工农纠察队的枪，到此时农协负责同志只好用电话通告工农会，令纠察队镇静待缴，并请政府加倍戒严，维持秩序；不料是晚静听一夜，并无枪声。二十一日情形：是日为省党校开学之日，政府与党部及民众团体负责同志多有到会讲演，又接有军事委员会转唐总指挥第一次胜利之电报，至下午谣风稍为和平，不料反动派又谣传唐总指挥的电报是假造，省党部各要人均已跑尽，本来是日凌委员禀、夏委员曦及李教务主任达均未参加党校开学典礼。省党部于是日下午三时召集紧急会议，所决定的办法：请省政府召集驻省军官及工农武装解释种种谣言，并议决共同继续镇压反动派谣言的办法。不料是晚十时半，全城枪声大作，步枪声、手枪声、驳壳枪声、机关枪声、大炮声直响至二十二日七时方休。

廿二日的情形如下：

（一）省农协死十余人。

（二）省工会死四人。

（三）工人运动讲习所死伤六七人。

（四）党校死二人。

（五）工农纠察队、党校及工运讲习所、工运训练班及县市工农纠察队全部缴枪。

（六）所有民众团体及党校机关皆为许军强掠一空并封闭。

（七）省总工会及省农协所存武汉解往采办军米之现金概被许军抢去。

（八）将所有拥护中央、打倒蒋介石、铲除土豪劣绅的标语概被许军撕毁。

（九）将所有监狱人犯尽行解放。

（十）省特别法庭全部捣毁。

（十一）慰劳革命兵士委员会的慰劳品概被抢去。

（十二）凡军队必缠白色袖章、白色符号，否则被许军辱骂殴打。

（十三）贺国华同志于下午一时被许军在小西门码头枪决了，南门城口同时亦枪决数人，但未详其姓名。

（十四）总工会黄龙、蔡寿民等十余人被捕生死莫卜。

（十五）建设厅邓寿荃、戴述人家及高中、周南、自治、长师、恕泽等学校，皆被捣毁。

（十六）许克祥所布口号如下：

铲除屠杀无辜民众的暴徒分子。

铲除假公报私肥私利己的暴徒分子。

铲除混入工农团体肥私利己的暴徒分子。

拥护真正工农利益。

拥护真正国民党。

廿三日的情形：

（一）邓寿荃、朱剑凡、李维汉、夏曦等家概行被抄。恕泽、复初、周南、南华、甲工、衡粹等校概被捣毁，并向各邻近住宅大行搜索。

（二）三分校学生有一部分被许克祥威吓佩带白符号，手执白旗，分途在城乡内外讲演，内容除根据许克祥所贴的标语外，并加以反国民政府、反中央党部、反工农运动、反共产与封闭民报为演题材料。

（三）省党校亦有部分学生被许威吓组织“善后维持会”，分途讲演。

（四）许克祥之主席团及通电均于是日报上登载了，并知道廿一晚之事变的临时指挥官为许克祥，同时此时湖南已有两个政府，但政权完全被许克祥之主席团抢去了。

廿四日之情形除大行搜捕外，与廿二、廿三大约相同，并于各城门口枪决了数人，但不忆及其姓名。

廿五日除继续搜索外，许克祥准备进攻湘潭，并发表恢复团防局、清查户口等政见。

廿六日仍是继续搜捕，并派兵挨户询问如有交出委员长者有赏。

以后情形与前略同，唯六月一号又大屠杀一次，详细情形尚不得而知。

结论：

（1）我们这个报告是在逃难中所得的消息，详细情形事后当然有许多材料可以补充。

（2）在我们这个简略报告中，可以看出此次长沙事变纯是蒋介石所主使的，其意义与上海、广东、重庆等地的屠杀是一样的，此次的罪魁除蒋介石而外，即为许克祥、仇鳌、萧翼鲲、彭国钧等人犯。

（3）长沙事变影响北伐前途及革命整个的前途至为重大，非从速根据中央党部、唐总指挥及八军将领的处理办法解决，于革命前途障碍甚大。

（4）我们代表团来的任务：

1、请求讨伐湖南反动派。

2、请求恢复省党部及各民众团体，并交还武装。

3、请特别委员会及周、叶两军长从速逼湘工作，因为早一日解决湖南问题，即是早一日解决革命过程中所发生的障碍。

最近还有要报告湖南农民均已动员讨许者近数十县，有武装者万余人，已在醴陵、湘潭等地集中，究竟详情怎样，我们还没有得到确实的报告，然大半是谣言。昕闻张代主席已被许军软禁，失掉自由，建设厅已被许军各部捣毁，邓厅长已逃走了，教育厅董厅长亦被许军驱走了。

（原载《向导》199期，1927年6月22日出版）

# 〔附〕长沙事变经过情形二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一，屠杀惨状。湖南自长沙五月二十一日事变后，许克祥、彭国钧、仇鳌、萧翼鲲等叛逆，日益嚣张，反革命工作扩张到乡村中去了，农工民众大遭屠杀，兹就最近得到的消息，分别报告如次。（一）长沙方面：许逆克祥捣毁、封闭各种革命团体后，白昼戒严，夜行屠杀，不问理由及事实，只要是各级党部、各级农会、各级工会及其他民众团体负责的同志，即行拘捕，以处死刑。他们的刑法很残酷的：如杀女子，先行割去乳部，用刀斩断颈部一半，又用步枪向阴门一枪；杀男子，先用极惨刑法拷问，再用刀及枪的重刑而死。其如腰斩暴刑，割剖，种种惨杀，实极为悲惨，令人痛心疾首。此种处决，均在夜间或清晨举行，并无罪状宣布，即有罪状，亦系成文油印之罪状纸，只在罪状上面添写被杀姓名，如杀省民会议代表李异云、曾做学生运动的田波扬、省党部青年部的秘书贾云吉、省学联四届总务主任等七同志时，均系先用极酷的毒打，再行斩首，田波扬夫人陈爱云去保释田君，亦被扣留惨杀。六月一日，浏阳民众被反动派摧残，不知长沙已变，逃来省垣请愿，该许克祥等叛逆，即取军事行动，在长沙小吴门外屠杀请愿民众一百三十余人，同时将小吴门行走的女子诬为侦探，就地枪毙五人。自六月一日后，长沙每天至少要惨杀民众数十余人，擅行拘捕而不见释放者无算。（二）常德方面：一、五月二十四日，发生同样的事变。二、总工会执行委员，仅委员长未杀及，不知逃往何方。三、县农协及各级农协执行委员及农民被杀者二百余人。四、事变时死伤革命民众共六百余人。（三）衡阳、醴陵、武冈、益阳、湘阴、桃源、永州、浏阳、临湘、安乡、辰州，叙浦，均发生屠杀惨状，各种革命团体概被反动派捣毁，白色恐怖可说遍布全湘了。（四）湘潭——该县农民原本拟与叛军抵抗，卒以许逆太恶，大受残杀。

第二，政治上的猖獗。许克祥等叛逆，为的欺骗民众，非有一个名义不足以号召，所以他仍假借湘南省政府唐主席的名义，命令一般驻湘思想摇动的军人助逆叛变，张贴拥护铲

除暴徒分子的唐指挥、拥护打倒共产党的唐总指挥、拥护蒋唐合作、拥护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拥护劳苦功高的蒋总司令等标语，在他们这些标语中，可以看到他们反动的目的，确是蒋介石嗾使所为，我们从没有听见唐总指挥有破坏总理的政策而打倒共产党的主张，反革命的蒋介石与革命的唐总指挥那能够有合作的可能？所以在他们的这些政治上的主张，就看见了他们的原形了。

第三，摧残党务及民众团体。自许克祥等叛逆非法组织"救党委员会"之后，即通令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一律改组，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的执行委员，通令各县一律拿办，枪杀勿论，以期造成清一色的反动势力。

第四，摧残教育。长沙的学校，自五月二十一以后，被陆续的检查，更有被抄抢的，男女学生均不能出校门一步，最近限令一律仃办，学生均不准驻校。而各县均发生了白色的恐怖，拿捕侮辱学生，无所不用其极；尤其是对于女生，脱衣脱裤，嘻皮笑脸，加以百般的侮辱，甚至奸淫的事实也不时发生；在此时的学生，求学不可得，归家不可能。而长沙遇学生即行检查拘拿，生命均朝不及夕了。

第五，任意捕党人。他们遇了穿中山装的即拘捕审讯，遇穿中山装衣背边下有义子的即是共产党党员（义子说是共字的两点）均枪杀勿论，好一个诬害民众的方法，不知从那里想来的。并有一首反动派的歌——许克祥等的"救党"办公处，做一个反革命的歌，使之灌入儿童的脑子里面，在街上大唱特唱，看了这一歌，就可知许逆的反动："巴巴头万万岁，瓢杷鸡婆要枪毙，男女学生一头睡，养出儿子当纠察队。工会你莫凶，三十三团用炮冲，农会你莫恶，我们要你的脑壳"。

第六，恢复反革命机关。许逆克祥等为的要鼓吹他们的反动空气，恢复长沙"民国日报"及"大公报"，这两个报馆均是左社主办的，左社又是蒋介石的走狗党羽，从此又可见是蒋介石的阴谋，欲夺取湖南为反革命的根据地。

第七，所谓军民误会抑系反革命政变。至于所谓军民误会，则全系空气作用。只看下列几点，可以知道长沙事件的确是反革命的政变：（一）此次事变，绝非军民冲突，而实为一部分军人与小资产阶级因利益上之关系，对于工农运动有所怀疑，于是反动派乘机而向农工进攻。兹为易于明白起见，再分述如左。(甲)兵士自前方寄款归家，间有被乡农民协会截留者。然此系极少数，甚至有奸人故意作此伎俩诬嫁农协的。实则一般人曾了解革命与农工运动之意义。近因反革命之进攻，而引起经济恐慌，因革命之进展而农工兴起，农工运动中发生左倾幼稚病。对此等事，则颇有不能着实了解，而时怀不安者。结果以利益之冲突，遂憎恶农工。加之吾国封建势力雄厚，一部分军人及行政长官，其周围又率多被代表封建资产阶级势力之辈所包围，浸假因此而形成豪绅资产阶级向农工进攻之斗争，亦即资产阶级欲取得革命领导之斗争。马夜事变之真正起因即在此。(乙)为此事变，予先实有一定之计划，首则夏斗寅起难于鄂西，继则许克祥发难于长沙，再次则湘境各属，除岳州外，群起响应，前后时日，不出一星期，而各方一致；非预先定有计划，何能办此？（丙）事变方起之日，许克祥即派兵把守电报局，禁止外人拍电；同时唐总指挥所来之电报，任意改纂，披露报端；他如汉口报纸，予以扣留；来往信件，一律检查。凡此足以证明许等计划之周详也。(二)当马夜事变未发动之前数日，长沙即谣言纷起，或谓某军反水，或谓唐总指挥被部下包围，或谓农工将于六月一日起实行大屠杀，人心惶惶，不可

终日。省党部、省政府、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及农工妇女商务各团体，为巩固后防起见，于二十日下午在人民俱乐部开联席会议，会场中共产党代表曹典琦谓事已至此，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总随各团体之后，大家要如何都宜一致协力办理。此足以证明共产党之退让态度。外间所传，谓此次事变全系共产党发号施令，记者为真理与良心所驱使，认为全系嫁罪之言。（三）马夜事变未起之前，得知夏斗寅高揭反共之旗。工农两会，即戒备森严，大东茅巷与曾公祠，为工农两会所在地，均宣布戒严，其意恐反动派用蒋介石之故伎，雇流氓地痞，捣毁两会，则其出于自卫之手段，可想而知。若谓工农围攻三十五军军部，抢劫枪支，则实事后嫁罪之言。盖工人纠察队与农民自卫军在省城者不过千人，而枪支不满四百；以器械论，多不精良；以训练论；多未娴熟。共产党如以此区区而欲起事，实以卵投石，多见其不自量也？且以理论言之，共产党如有此项动作，则其计划必定周详，何以马夜事变，竟不数小时而解决？况共产党非疯子党，又何所恃而敢于犯此大祸。即以工农"抢劫"军队枪支之地点而言，亦人各一说，有谓在小吴门乐道古巷者，有谓在八角亭者，有谓在学院街者，有谓在大东茅巷者，可见随意捏造，并无确实证据。若工农军预先定有计划，何以铁路输船交通未曾罢工？何以电灯电话未曾间断？何以店员未曾要挟罢市？而马夜事起，工农领袖及共产党领袖，均销声匿迹，不闻有何举动。虽有柳直荀之聚众湘乡，杨昭植之聚众湘潭，及各地之响应，浏阳工农之请愿，然皆在马夜事变以后数日之事。以记者观察，此盖各别之举动，并未受上级之命令也。（四）事变以后，报纸所披露，许克祥等所宣传，均谓暴徒之罪过，为造成盐荒、米荒及金融恐慌，为劫制政府。又谓郭亮有现洋二百万元，夏有现洋四十万元，张代主席在纪念周政治报告中，且谓"暴徒将以六月一日起，实行大屠杀，凡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者，皆在被杀之列"。此种宣传，颇得一小部分人之信仰。（五）事变之时，除将工农两会、市党部、省党部捣毁一空，立将工农武装缴尽外，他如建设厅邓寿荃家及剑凡家均被捣毁。（六）事变以后，街市即满布标语，大旨不外宣传"暴徒"罪恶。同时并有请"真正国民党员"仇亦山、彭国钧、萧翼鲲等组织省党部之标语，不数日而"救党委员会"出现。其重要脚色除仇、彭、萧三人外，即为许克祥、陈其祥；其重要工作，即为检举跨党分子，自周叔祁军长到省后，许克祥即行敛迹。然该会之态度，甚为坚强，谓中央所派改组湖南党部之人，必先得该会同意。此外取消土地问题案，取消特别法庭，均为该会最近之工作。同时各地"救党分会"亦应风而起，其中率多为土豪劣绅所把持。（七）事变方起之夕，特别法庭所监禁土豪劣绅，一概被许克祥释放。（八）事变之夕，军队方面死伤三数人，工农十数人。以后由戒严司令部被捕获、被许逆克祥枪决者约八十余人。但各地不在此数。（九）目前湖南之情形，则为各县之"清乡"发生重大之纠纷。则反革命派向革命派进攻，为一种屠杀主义之动作。又湖南金融，枯竭万分，省金库券暗盘只值大洋五角二分，百货均涨一倍。（十）自周叔祁军长到省，情形略有变动，周召集会议数次，许逆克祥均未到席。周在欢迎大会中，宣布此次回湘，系奉中央及唐总指挥命令，如能依此命令，则湘事自有办法，否则无办法。周个人并谓竭诚拥护三大政策。自周到省时，国民党左派人物均已出走；故其每日所接洽者，为仇亦山辈。（十一）记者再须补述者，则当事变以前，有三事颇惹大众注意：（甲）湖南省县及特别区党部联席会议于此时举行，关于土地问题，业已解决。（乙）长沙市民会议代表大会业已闭幕，市政府委员选举结果，全系左派人物，反革命派落选。（丙）湘省防军不多，当

时有周西成进窥湘西、李济琛进攻湘南、李烈钧残部集中修水之说，湘省正陷四面楚歌之中，在党部联席会议各县代表中，有数县联防之说，同时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亦大加整顿，总工会即于是时任命袁某为全省工人纠察总队长，在省教育会草坪举行就职典礼，声势颇壮，凡此颇惹一般人之注意。实在工农与党部之意，全在巩固北伐后防也。以上三者，均惹起许多误会与推想，于马夜事变，极有影响。（十二）事变后，除商民协会、新闻记者联合会以外，其他各民众团体，均无形消灭，故此时实无民众之可言。尤可注意者，有二事焉：（甲）知识分子之革命性，素不坚强，然此次"救党委员会"，除一般无聊政客热心奔走外，其他知识分子，均不与闻，彭国钧虽有"学生数千而无与我共事者"之语。（乙）自"救党委员会"起，各县土劣，均捏故陷忠实同志，乡间自区党部以至区分部常委、区乡农协委员长均不能安生。然曾为政客或有贪污土劣之嫌者，其中亦不少明了之人，如前长沙县长周伯南，该县土劣欲乘此时机，陷害忠实同志，彼坚不与闻。以上所述均系实情，特拉杂无层次，深为缺憾耳。

（原载《向导》199期，1927年6月22日出版）

# 〔附〕何键反共训令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于六月二十九日发表对官兵宣言如下。

为什么要革命呢。曰为痛苦民众求出路也。民众因何而痛苦呢。曰帝国主义之侵略。军阀之横暴。贪官污吏之搜括。土豪劣绅之剥削。皆所以陷民众于水深火燃之中。致民于不自由不平等地位者。不速为之铲除。则痛苦之民。永无出路。此先总理之所以致力于国民革命也。今革命进展。由东南接于西北。帝国主义在华之势力已动摇矣。军阀如吴如孙如奉张如鲁张已一败再败。气息奄奄矣。各地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打倒亦已不少矣。而何以民众之痛苦丝毫未减。且反加甚者。岂革命之道路。理论上说得过。事实上行不通欤。曰非也。吾将详语其故。革命以唤起民众为主。民众中农工占大多数。故农运工运。亦极重要。但民众两字。容易被人假借。农工知识浅短。容易被人利用。就两湖的事实观察。中央党部。中央政府。对于农工利益。算是极力提高。革命军人对于农工政策。也是极力拥护。乃两湖地方。民众团体。时常发现越轨行动。而湖南各县。闹得更是极糟。指有饭吃有衣穿的人为土豪。指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为劣绅。私擅逮捕。任意残杀。勒款罚钱。敲骨吸髓。小民因之破家倾产。服毒悬梁者。不知凡几。又或勒烧祖宗主位。并毁其祠堂。捣毁寺庙佛象。并收其财气。中央本无废止祀孔命令。总理亦无反对孔教宣言。竟将孔庙毁去。焚其牌位。关岳本千古精忠。人人钦敬。乃至杀其神象。不问农工如何紧急。强迫到会。逆者处罚。以会场为刑场。以杀人为儿戏。不报告姓名。不宣布罪状。迫

令民众举手。不举手者即为反革命。妇女运动有不要亲夫翁姑的标语。学生运动有仇父仇母的口号。佃户压迫田东。店员压迫店主。农不耕田。工不作事。商不营业。士不读书。提倡兽化。毁弃人伦。天昏地黑。人人自危。古来大乱。未有如此。至于截夺军米。阻碍招兵。打毁税收机关。杀害军人家属。禁止谷米出境。闹成米荒。保护坟宅的树木。强令砍伐。猪不能喂。犬不能畜。犹其余事。从前咸以为是农工运动幼稚。工作过火。发生错误。系国民革命过程中必经之阶段。迄今考察。乃知不然。纯系共产党中暴徒之策略。并非幼稚过火之错误。不过借此名词。以掩其阴谋耳。现张代表政治报告。搜出议决案。凡年满二十五岁未入彼党者。一律屠杀。违背人道。至于此极。阳奉三民主义。暗行屠杀掠夺之实。此所以民众痛苦。日益加甚。几疑革命道路。莫能通达也。或谓共产主义。理论不错。虽一时不易行通。将来当可实现。又谓湖南之事。实是幼稚发生的错误。目为阴谋。未免深文周纳。故入人罪。此种皮相之论。足使一般人疑团莫释。不可不略道所以。总理有言。“马克思认定阶级斗争。为社会进化的原因。这是倒果为因。因为他的学说。颠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从他的学说出世之后。各国社会上所发生的事势。便与他的学说不合。有的时候并且相反”总理斯言。诚为特见。理论如果不错。行之事实。一定顺利。他的因果既颠倒。理论即非正当。事实自不能通。所以马克思的党徒。互相攻讦分成数派。（一）正统派。笃信议会主义。谋与资本家妥协。（二）修正派。主张改良的或进化的主义。（三）工团派。主张革命的阶级斗争。（四）基尔特社会主义。即组合社会主义。（五）布尔什维党即劳工专政。五派之中。以工团派之阶级斗争为最过激。欧美各国以其太残酷。迄未举行。今湖南所试验者即工团派之阶级斗争也。如提倡卖淫。破坏孔教。打倒知识分子。推翻商人制度。扶植流氓地痞。打破家庭观念。无一不是阶级斗争书中所主张者。明是彼之阴谋。而反代诿为幼稚错误。又乌乎可。我前在汉。激于良心。略揭彼辈之隐。彼辈即大起恐慌。长沙马日事变。彼辈阴谋。于焉大露。我总司令唐公洞烛其奸。铣日通电。可以概见。此次回到湖南。定可大加整顿。我中央党部中央政府。亦有训令纠正。前途极可乐观。本勿庸吾人过虑了。惟探查彼辈阴谋。进行较前尤烈。变相充作国民党。混入军队中。冀图将来之大暴动。此而不去。祸将不堪。用是继述上情。昭告于我官佐士兵夫暨各界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共起急图。并呈请我中央政府。我唐总司令。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庶民众痛苦可望减除。三民主义可以实现。国民革命可告成功。我们应呼以下的口号。（一）拥护总理的三民主义。（二）拥护中国国民党。（三）拥护国民政府。（四）拥护真正农工利益。（五）农工商学兵大联合。（六）铲除屠杀良民的暴徒。（七）铲除蔑弃人伦发展兽犯的暴徒。（八）铲除欺农工的暴徒。（九）铲除扰乱后方的暴徒。（十）中国国民党万岁中国革命成功万岁。

（原载《国闻周报》4卷29期，1927年7月31日出版）

# 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

——帝国主义困迫武汉抑系工农运动？

是要巩固革命不是要放纵反革命。——

（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

张 太 雷

帝国主义真厉害！先是几十条兵舰几千大兵，帝国主义要用武力压迫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武汉，后来因为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及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结果未能实行；但是是否帝国主义破坏武汉革命根据地的阴谋和缓了没有呢？没有，非特没有，更外加厉了呵！帝国主义采用了更厉害的策略——经济封锁武汉的策略。他不仅是把他们在武汉的银行关闭，不接受中央银行钞票，不与武汉做买卖，并且勾结了中国大资产阶级实行仃止沪汉的汇兑，断绝长江的交通，串通武汉奸商破坏金融，仃闭工厂商店，蒋介石组织土匪，勾结军队，造谣恐吓，——闹得武汉社会鸡犬不宁，风声鹤唳，市面萧条，财政困难；湖南有许克祥之变，湖北有夏斗寅、杨森、于学忠、张联升及鄂东土匪的峰起。尤可怕者，革命的内部发生了摇动，我所以说：帝国主义真厉害！

但是一般革命者不是完全明了我们现在两湖的厄运是帝国主义勾结了中国大资产阶级所给与我们的；有很多革命同志虽然很反对反革命，但是不自觉地很听信他们的话，说：现在两湖的厄运，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是我们革命基本势力——工农运动所造成的。以前我们听见反革命说我们的工农运动是地痞流氓运动，我们反驳他攻击他，但是我们现在自己亦承认目前两湖的厄运是因为地痞流氓运动！蒋介石脱离革命，据说是因为工农运动的幼稚病及革命运动的进展太快了；现在我们自己亦是口口声声骂工农的幼稚与过火，把现在武汉政府一切困难却〔都〕推在工农运动身上。几乎大家认为：假使没有工农运动，许克祥与夏斗寅是不会反的，政府的财政是不会困难的，甚至以为国民革命就可安安稳稳成功的。这话当然说得似乎"过火"一点，但是试问现在是不是有这一种的空气。敌人向我们的进攻，我们是不怕的，我们最怕的是：我们把应对着敌人的枪口来对着我们自己的基本势力示威。这是在目前敌人压迫我们的时候最值得我们考虑的一件事。

假使我们能了解：现在我们的厄运是反革命给我们的；现在是反革命四面八方来压迫及从内部来破坏我们的局面；因为敌人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来进攻我们，而我们自己是无组织的抵抗，因此我们现在落在很困难的地位。那末，我们现在应付的方针，就不应是撤退或解散我们的队伍，而应是整顿与强固我们的队伍，并一变以前无组织的反抗，使成为有组织的抵抗反革命的进攻。

工农群众一旦感觉到帝国主义、军阀及封建势力的压迫一松，他们马上就如怒潮凶涌地谋自己的解放，他们在这种初期解放运动中因客观的情形，不免是一种缺乏组织的状态，苟能有大批的干部人材及上面的真〔正〕确领导，亦能有很多的补助，但是事实上，这两种主观的条件是缺乏了的。群众这种初期的猛烈谋解放的一种欠缺组织的运动之阶段，在无论那一个革命中所不可免的，自法国大革命到俄国十月革命都是如此，就是中国以前各朝代更换的时候，所谓真命天子出世，亦不免有一个时期的混乱，何况是一个革命——一件砖头瓦片大翻身的事件呢？

这种欠缺组织的初期状态，当然不应永久让他继续下去。为什么不能让他继续下去呢？因为初期的解放运动把反革命打了一下，反革命因为没有准备而暂时溃退。但是反革命不是那样容易扑灭的，他受了一次挫折后，必然是卷土重来，这时的反革命不是以前那样无组织的无准备的，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反攻。革命势力为应付此种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敌人，非自己亦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抵抗不可，不然革命是要失败的。所以跟着这初期的欠缺组织的解放运动的时期，即应该使民众运动更有组织更有纪律及更有计划。

这次在反革命有组织进攻时，我们很不能制胜，因此要稍退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准备，没有及早以政府力量巩固革命的胜利，没有使民众运动更进一步而有组织，庶几反革命来反攻时能有充分的抵抗力，或者使反革命虽欲反攻而不能。所以现时我们在反革命有准备的进攻而我们没有准备的抵抗时，我们要退却一步以便整顿我们队伍使有纪律有组织以谋最后的胜利。同时国民政府赞助民众而镇压反动之职任，格外严重了。假使我们现时看见反革〔命〕势力浩大及革命势力无组织，我们就忘记了抵抗反革命，或竟转而撤散自己队伍，长反动派之气焰，在客观上便是满足敌人的欲望，这便是革命的危机。

因此，本着以上的理由，我们对于湖北省现时应做的事件列举如下：

一、革命纪律是巩固民众运动，而不应是压制民众的。省总工会好久以前就颁布了工人革命的纪律，最近又有工商联席会议的议决，苟能切实执行，非特是工人运动更有组织，即城市中等阶级亦不能表示不满，不应不履行自己同意于前的劳资契约，否则社会上之纠纷，是不能由工人负责的。农民方面因为人数之多与散居地域之广，更需要实行革命纪律，使省农协会能依照一般革命的需要指导农民群众。但是此种革命纪律对民众的实施决不是几道机械式的命令所可做到的，应该有一个广泛的宣传运动及积极的指示。对革命的民众固然要有革命的纪律，但对反革命尤其要有严格的镇压反革命的纪律，如对奸商操纵金融粮食，贪官污吏勒索行贿，及劣绅土豪的屠杀良民，必加以更严重之处罚，至于许克祥等类之叛变，更须以革命的军律处治。

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地位之提高并巩固其下级党部。党部一定要能依照党的政策与领导民众，而不应与民众团体站对立的地位，党的领导地位决非以命令式的办法所能做到的，第一，要使党不是少数机关上人的党而能群众化，第二，要党有正确的政策去影响民众。下级党部因在和平时代发展的多投机分子，所以应改组的要无所顾忌地改组之，并使下级党部要绝对听省党部之指挥，如此省党部的威权自可树立，省党部权力既已树立，再加上中央党部时常有正确的指导给与省党部，那时一切本省政务、党务必多能上正轨。仅仅嫌恶之而不加以指导与改正，此非求党改善之道也。

三、给农民政治上经济上正当的出路。现在乡村中有些地方还是开始或正在与劣绅土

豪斗争，除非我们改变不革命，不然我们一定要邦助农民来铲除此种封建势力。所以继续进行打倒劣绅土豪的运动，是必需的。如果省农民协会及党部能实际领导，那末有少许流弊当然可以免去。有些地方劣绅土豪势力已大致消灭，农民已确实把有乡村的政权，此地乡村自治就应当立刻实现，给农民政权以法律上的保障。苟一方面农民已握乡村政权，而一方面政府又不以实力赞助农民铲除土豪劣绅之政治势力，而切实实行乡村自治，使农民能依导施行。因此而发生法律上的纠纷，其咎当不能归之于农民。农村经济因劣绅土豪之封锁经济，贫者无处借贷，金融仃滞；当然我们不能采取压迫农民再使当铺老板或高利盘剥者回复吸血式的放债政策，所以我们一定想一种新的乡村金融方法，农民银行的设立及合作社之推行，是目前绝对必要的。现在鄂西鄂北是在反动军阀蹂躏之下，鄂东鄂南土匪如毛，罗田，黄安，麻城，崇阳，通山，蕲水等处不是遭了屠杀的，就是马上要受屠杀的。我们不能单单注意到几个土豪劣绅被农民枪杀的事实，而痛骂农民该杀。我们更应打听一打听农民被屠杀之事实，全省农民被反革命所屠杀者总有数千，这总不能说他们是该杀的罢！所以在此种乡村反革命势力进攻中政府应派军队剿匪并邦助农民武装起来以自卫。对农民运动单单是消极的禁止，或下令解散是不够的，是应该有积极的领导与给农民以正当的出路。

湖北问题整个儿的解决，当然不能只在求本省的整顿就可解决的，还要靠北伐的成功，与长江下游蒋介石势力的打倒，及湖南问题的解决——这样湖北的财政与经济因交通的舒展，而能得到解决，帝国主义与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封锁政策才能打破，革命的战线才能巩固，革命的后方才能稳定，湖北的革命基础才能深入与强固，以推动全国革命运动之进展。

（原载《向导》197期，1927年6月8日出版）

# 湖北全省总工会解散纠察队的几个文件

（一九二七年六月）

## 一、湖北全省总工会解散纠察队的布告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为布告事：现在武汉反动派企图挑拨工兵之感情，制造种种谣言，中伤本会纠察队，以致飞短流长，淆乱外间听闻，影响工兵联合战线。本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造谣起见，业于本月二十八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①。所有前领枪弹，并经交存政府。一面仍请政府派兵保护工会。深恐外间不明真相，致滋疑窦。为此布告，仰各界人等一体知照。此布。

（1927年7月11日北京《晨报》）

## 二、湖北全省总工会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信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敬启者：现在武汉反动派企图挑拨离间工兵之感情，于是制造种种谣言，对于敝会纠察队肆口中伤，飞短流长，实足淆乱听闻，影响工兵联合战线。敝会为避免造谣者借口起见，决定自本月二十八日起，自动将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此领到枪弹，已交存管理汉口卫戍事宜办公处，免滋外人疑窦；但是反动派破坏工会，几于唯力是视，务恳准予派兵保护，并一面通令武汉各军事长官知照，无任盼祷、并俟见复。此致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1927年7月11日北京《晨报》）

## 三、湖北全省总工会致管理武汉卫戍事宜汉口办事处的信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敬启者：现在武汉反动派企图挑拨离间工兵之感情，制造种种谣言，中伤敝会纠察队，以致飞短流长，淆乱外间听闻，影响工兵联合战线。敝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造谣起见，业于本月二十八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领枪弹，应即刻交存贵处。除枪

---

① 湖北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纠察队，是根据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的指示作出来的。

弹清册随枪送交外，相应先行函达贵处，烦为查照，于本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派员来敝会点收。无任企祷，立盼示复。此致

管理武汉卫戍事宜汉口办事处

（1927年7月11日北京《晨报》）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

全国的工人农民及一般革命平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革命之危急存亡的时候，对于你们发表宣言，意思是要解释明白国民政府在反动阴谋之下的政局，以及本党为保持民众之革命胜利而奋斗的政策。

一年以前，国民党的政权还不过在广东一省，而在此之前，甚至广东省内还有许多区域，和中国其他各地一样，都在反动军阀的掌握之中。——这些反动军阀，继续不断的自相攻战，极其残酷的压迫平民，将我们中国零星分割而出卖于外国帝国主义，维持着垂死的封建制度，这种特殊的封建制度，使几万万民众永久的处于奴隶地位，永久的穷困饥饿。然而从国民党改组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指导之下，造成了广东的革命基础；从广东向北发展，得着全国各地革命平民的响应，居然将许多巨大的军阀逐一的打倒，——这些大军阀的武装力量其实比国民革命军要利害得多呢。吴佩孚的势力被歼灭于两湖，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也被打败，最近张作霖又在河南败绩。中国之大部分，已经脱离旧时军阀的统治，民众应当可以自由的组织起来，以求自己及中国之最后解放。革命运动的力量，已经有伟大的表演，甚至于列强帝国主义也不得不向群众的猛进让步：例如英国在汉口，九江的租界竟不能不交还中国，并且始终不敢公开的实行其久已准备的武装干涉。这种革命胜利的原因何在呢？何以军阀、帝国主义不能不对于革命民众的进攻而退却呢？

革命胜利的原因，当然不在某某总司令某某军长的善战，亦不在某某领袖的善于外交，而在于革命得着中国人民之极大多数的赞助，尤其是工农群众的努力，并且有各种被压迫阶级因反抗一切剥削而团结的坚固的革命联盟。中国革命之伟大领袖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根据革命的三民主义而明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革命之进行当在此三大政策领导之下的时候，国民革命日见其巩固发展，而成为革命敌人所震骇失措的伟大力量。中国受帝国主义国内军阀的压迫，已经几十百年，如今走上了自由解放独立的道路，眼见得可以得着经济发展的前途；所以中国的农民，本是几百千年受豪绅地主的压迫；中国的工人，本是在囚徒牛马似的条件之下工作；中国的贫苦市民，手工工人以及小商人，本是异常的贫困日趋于破产；——他们这些极大多数的中国平民，在这一时期之中都奋起斗争，力求自己的解放。民众在三大政策之下得以勇猛前进，捶碎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制度之锁链，而锻炼解放中国的武器，以力争极大多数人民之民权。以解除中国之束缚，以消灭中国经济发展之障碍。

然而一方面固然逐步的得着胜利，中国劳动民众固然警醒起来努力于自己的组织和斗

争；而别方面，平民之明的暗的仇敌，也就觉察得到自己的危险，寻找种种方法来阻遏革命进展的潮流。他们的手段和方法有许多种。外国帝国主义者派遣军舰军队到中国，驱使他们的爪牙北方军阀作战，并且挑拨离间国民革命军的长官。以前军阀是公开的反对国民党的，后来看见不能够反对革命的伟大旗帜，于是假意归顺革命，戴起国民党的假面具，想在国民党内部来从事破坏革命。至于豪绅地主、贪官污吏、买办阶级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更是用尽方法压迫工农运动，或是公开的用武力来摧残，或是秘密的用挑拨离间造谣诬告的手段来破坏。资产阶级呢，他以前是和群众运动同路的，随后看见群众运动的发展而吓退了，于是宁可跑到革命的敌人方面去，只要能够镇压工农运动，——可见中国资产阶级，宁可心甘情愿的替帝国主义者当奴才，婢膝奴颜的求他们谅解，却不肯牺牲一个大钱来改善工农的生活！

再则，国民革命军中本来有许多长官，冒着国民党的招牌而自己扩充武力，搜括金钱；到后来，他们看见民众的胜利将近实现，各种各式的军阀制度都要完全灭亡，——就公开的背叛革命，同着资产阶级共同积聚力量，以攫取国民革命的指挥权，压迫工农，而与人民的仇敌妥协。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的叛变，便是这种阴谋的第一步，然而没有完全成功。这是因为北伐的胜利解放了中部中国，民众运动积极的自动的发展；表现伟大的新的力量，足以打击军事独裁的暴力。然而蒋介石的野心不死，他到今年三月间，便公开的叛离国民政府，夺取东南诸省，自江西至上海沿途屠杀工农，而把持国民党于自己掌握之中。

这就是对于国民革命的第一次严重的打击。

当时国民党的领袖对于蒋介石的叛变，对于这种阶级分化的现象，持什么样的态度呢？那时国民党指导机关的革命性还没有用尽，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级也还有些前进的勇气。今年三月间武汉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就足以表示国民党的指导机关，还能够依据于有组织的工农群众，以抵抗反动。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完全赞助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使他易于团结大多数人民而与封建资产阶级及反动潮流相奋斗，并且中国共产党决定自己的党员应加入国民政府，以分负武汉国民党在此艰巨时期的重任。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许多议决案，形成我们联盟的政纲。这些决议是：巩固党权推翻军事独裁；镇压一切反革命；实行乡村自治召集省民会议以实现国家政权之民主化；为赞助工农经济状况之改善而设立农政部劳工部，以便制定改良社会之法则，而实行之；坚决的赞助工农群众运动，以及其他。

所以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足以悉显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决心抵抗反动进攻，而且愿意广大的发展工农运动以保障国民革命之向前发展。

国民党既然有这种决心，共产党自然更加要与国民党巩固的联合，而为双方共同的任务奋斗。共产党派遣自己的党员加入国民政府，同时当然认定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将要很诚意的履行自己第三次全体会议所规定的责任，当能和本党党员之参加政府者共同努力于革命斗争之进展。

然而最近几月的政局，使中国一切革命人民大大的失望。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及国民政府，并不实行那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及责任。国民党中央自己将人民的希望打消

了，——中国人民原本是相信国民党的中央及其许多领袖是革命的！

正因为人民相信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是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那国民政府领域之内反抗封建余孽列强侵略的工农运动，乃有如此迅速和广大的规模。两湖农民有好几百万都奋起斗争，反抗封建阶级的统治，反对豪绅地主贪官污吏及军阀，要求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标语之实现，要求平民政权之建立。城市中的工人，也努力的起来推翻残酷的牛马似的劳动条件。如果国民党中央真能依据民众运动，那么千余万有组织的农民，二百八十余万有组织的工人，必定要成为国民革命之极巩固的基础。那时，中国的封建制度，必定要受着致命的打击，而不能复活。然而国民党的指导机关不愿意如此！国民党中央与垂死的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的关系，却比他与中国新兴的革命力量的关系更加密切些；因此，国民党的许多领袖消极动摇犹豫得不堪言状，其结果，领导权又落在反动军人之手。

今年四月间，国民党中央已经拒绝公布土地委员会关于土地制度改良的决议草案，当然更不说实行了。而劳动法的制定与公布更遇到许多阻碍。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照理应当注意中国平民之被压迫阶级工人农民手工工人的呼声，但是他却不是如此，他专听豪绅地主出身的反动军官，——这些反动的军官是时时反对农民运动的。今年四五月间，正是应当实行社会改良以扫除城乡封建关系之根株，而与反动派以致命的打击的时候，正是应当武装工农以抵抗反革命的时候，——在这种时候，国民党领袖及国民政府反而发出许多训令宣言，专以限制工农运动，更使动摇犹豫的分子转移于反动派方面去，并放任反动派使能自由的准备进攻革命。反动军官利用这些犹豫动摇的政策，而公开的反攻民众运动。反动的恶浪陆续继起：蒋介石走狗的杨森进攻鄂西；于学忠、张联升等叛变于湖北西北；夏斗寅进窥武昌；许克祥实行政变于湖南；以及最近冯玉祥表明反对工农群众运动及共产党。工农的血流遍中原，民众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革命的胜利全被消灭！

现在早已到了国民党中央应当选择正道的最后时机：究竟是同着革命前进还是同着反动后退！直到最近，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仍旧是不肯决然的同着革命前进，仍旧继续限制群众运动的政策，任令一切反革命行动不受任何惩罚。对于湖南的反革命政变，没有任何的处置；国民政府反而默认这些政变而加以掩护，与以合法的根据，使反动派得以完全摧残工农运动。湖北夏斗寅的反动势力并未歼灭，其实很有充足的军力足以办到。而湖北各县的反动派，却摧灭了许多的农民协会。国民政府不但绝无肃清反动的办法，反而事实上邦助反动派的进攻，——因为政府的政策是解散或改组工农团体，这些工农团体的罪状，就是努力牺牲以反抗封建制度而已！

这种情形是国民党中央多数领袖公开的赞助反革命军官，一般都是动摇妥协的政策，其结果，使反革命在武汉首都，也筑下巩固的基础。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

本党的观察，认为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多数领袖的这种政策，——实足以使国民革命陷于澌灭。这种政策使武汉同化于南京，变成新式军阀的结合与纷争。可使宰割中国的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及其他军阀的旧统治，仍旧一变而为瓜分中国的蒋介石、冯玉祥、许克祥等新式军阀伪国民党之统治。中国仍将继续受着残酷的剥削，革命将受普遍的摧残，民众将更受无限痛苦，封建的无政府状态将要高奏凯旋，帝国主义的统治更加可以稳定。中国

共产党永久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广大的民众利益而奋斗，决不能对于国民党中央现时这种政策负责。中国共产党反对这种政策，因为对于他，民众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几千共产党员，在革命军进攻武昌、南昌的时候；在攻打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的时候；在广东的田间、上海、广州的街市，反抗蒋介石派叛徒的时候；在湖南、湖北反抗反动军官的时候；——战死的战死，被残杀的被残杀，凡此一切已足证明共产党永久与工农民众共同奋斗，不顾任何巨大的牺牲，——就在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抛弃劳动民众的时候，亦是如此。

因此一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一切工人农民兵士及一般革命平民，不论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都可以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始终与你们共同奋斗到底的，必定能够引导民众经过革命的一切艰苦时期，去达到最后的胜利，国民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必将努力奋斗，反抗反动军官封建豪绅的资产阶级完全攫政〔取〕国民革命运动的阴谋，反抗他们屠杀工农剥削民众的政策；他们这种阴谋和暴行是使革命破产，实在就是和帝国主义妥协，——因为抛弃土地革命，就是抛弃消灭封建制度的革命运动，而封建制度不消灭，帝国主义的压迫是决不能推翻的。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绝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力争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实行关税自主，解放中国。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反对军阀的斗争，力争国家的统一，建立地方及中央的民权主义的政治。

中国共产党将要反对一切封建余孽，力求革命之完全胜利，以求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之发展。

中国共产党将要更加努力，以实现并巩固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及苏联之真正联盟。

中国共产党更将继续增进工人利益的斗争：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的严格确定，改良劳动条件，救济失业工人，保护女工童工，力争工人罢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及工人之武装自卫。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解放农民之斗争：地主的田地无代价的交与耕种的农民，保护小田主的田地享有权，不没收的田地当实行极大限度的减租，废除苛捐杂税陋规苛约，改良雇农之待遇增加其工资，解除豪绅地主贪官污吏之武装推翻其政权，力争农民武装自卫之权，建立乡村自治，限制高利盘剥，设立农民合作社，要求国家以充分的经济辅助农业，并实行拨款借贷于农民。

中国共产党亦将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废除一切直接间接的苛捐杂税，制定统一的稳定的货币，反对新旧军阀阻碍商业交通，保护本国工商业以反抗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反对买办高利盘剥者之剥削小资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更将为兵士的利益而斗争：要求兵饷按时发给，反对克扣兵饷，要求改良兵士的待遇及生活条件，反对新旧军阀牺牲兵士的生命而从事于争权夺利的私战，主张兵士退伍后应由国家发给土地或与以工作，使得从事于和平的生产事业，对于归入革命营垒的所谓土匪、游民亦应当如此。

凡此一切革命工作，中国共产党都要和国民党党员群众一切真正革命分子，共同去实行——因此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

如果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及国民政府真能实行这种革命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制度及反动派的阴谋，那么，中国共产党必以全力赞助这种真正革命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永久认为革命的利益民众的利益高于一切——较之保存某种政治联盟领袖结合高出十倍。中国共产党不能放任背叛革命的军人以及犹豫骑墙的政治家，冒充国民党假借孙中山先生的旗号以自文饰。中国共产党决意与一切革命分子合作，只要他们能够诚实的、坚决的根据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而奋斗——民族解放民权政治民生改善的三民主义，联俄联共赞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是伟大的孙中山先生之遗训。所以中国共产党，必定严厉的揭发一切假借孙中山先生旗号的伪国民党之出卖革命。

国民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之光荣的旗帜，永久是在革命的民众，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广大的群众方面，决非反动的妥协的伪国民党所能盗窃的。中国几万万的民众始终要认得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始终知道中国共产党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民众的力量始终要战胜一切反动叛徒的野心，而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原载《向导》201期，1927年7月18日出版）

# 谭平山、苏兆征辞职书

（一九二七年七月）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全党同志公鉴：

今平山兆征谨宣言退出国民政府，敢以退出之理由为全党同志及全国人民一详陈之，庶便平山兆征此举之意义昭然于世以示郑重。

平山兆征之加入国民政府本为国民党内一切革命分子亲密合作之一种表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孙总理即认定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为国民革命成功之必要条件。此诚中国革命人民伟大领袖所手订之明确政策，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历次中央全体会议，复加以肯定的阐明与承受。

直至民国十五年五月十五日蒋介石所主持之中央会议，乃以所谓整理党务案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工作之权利，此种破坏孙总理容共政策之行为，使国民党受巨大之损失，盖自此以后，蒋介石式之军事党羽乃渐足而攘权，于是党权遂日以丧失。然共产党员素视其为国民革命之工作，在于如何使革命日益进展，绝无视国民党中工作为猎取高官厚禄之意，共产党员及一切国民党忠实党员之任务，皆在使国民党以工农小资产阶级之群众运动为根据而日达于革命。故虽有五月十五日中央会议之整理党务案，而共产党员仍努力继续实行合作政策。于此可见首先破坏孙总理合作政策者非共产党员，乃冒充孙总理信徒之叛徒也。此等为国民党员以限制共产党为名，实则图谋以军事独裁压制国民党。不宁唯是，破坏孙总理革命分子集中国民党的政策者，其目的尚不限于阴谋以军治党，且在于修改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国民党之主义乃代表大多数民众，尤其为农人以反抗半封建制度的余孽力求解放之理论。而封建余孽之肃清又为全国人民埠据三民主义而争得解放之必要条件。今蒋介石等之政策则恰与此相反。故其行为乃为抛弃民众运动之正轨，而走入与人民公敌合作之歧途，其始终与豪绅、反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军阀相妥协，固无足怪也。

然共产党员终为忠实于孙总理之主义及政策之信徒，始终留在国民党之内，至今不稍动摇，盖吾人之希望乃在国民党以党的力量战胜其少数领袖之具有反革命的阴谋或其他犹豫动摇之政策。

国民党内及国民革命军内真正革命的孙总理信徒以及共产党员，以最大的努力向前奋斗，复类世界革命民众之代表共产国际与以伟大的赞助，中国民众始终团集于国民党旗帜之下，而同向军阀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进攻。于是去年第一次北伐乃大异于畴昔，盖此次北伐得工农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之参加，乃能继续摧灭许多人民之公敌。人民之希望于北伐者，在于其能除去中国民众之内外压迫，故虽有如此巨大之牺牲能仍不惜赴汤蹈火以赞助之也。为国民革命而死者以数万计，伏尸累累或死于敌人之枪炮，或死于敌人之虐诬，

或且为响应北伐军而死。死者之中，谁为国民党员谁为共产党员将不可分析！彼等之英勇的牺牲，使军队及民众皆随之而益加奋励。

综览北伐的整个过程中，真正国民党员及共产党员曾以万分的努力保持革命的联合战线，造成广大民众中之基础，使革命得以进展至于长江流域。民众运动及军队之英勇曾经屡次打击国民党中反革命的及犹豫妥协的领袖之阴谋。此等所谓领袖，当时即已图谋出卖革命，以便走入豪绅、反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军阀、帝国主义之反革命的营垒。

革命军占领长江流域之后，北伐告一段落，方将补充增加新的力量，而准备最后决战以达到完全之成功。然广州三月二十日之故技，复发现于长江流域，为国民党的领袖以及永久犹豫动摇之分子，又起而破坏革命的联合战线，阴谋根本推翻集中革命分子于国民党之政策，而欲使革命转入反革命的途径。当时蒋介石要求中央党部及政府均迁赴南昌；此种要求，实欲使革命及党的指导机关，尽入其军事独裁之掌握，以便实现其将国民革命转移于买办资产阶级及反革命营垒之企图，终至屠杀工农以逞其欲。迁都南昌之要求，实为三月二十日反革命政变及五月十五日背叛孙总理政策之复演，且为其更扩大更详尽之计划。

当时国民党中央即觉南昌方面之要来〔求〕，对于国民革命含有危险性；虽国民党中央当时所见之危险仅在党权军权之争，而大多数未深察其军事独裁之社会基础，然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之运动已造成相当的基础，使国民党内一切革命分子得以亲密合作，而武汉遂成真正国民党之中心。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于以召集，对于南昌方面加以纪律之制裁，并通过各种决议案明定国民革命进行之方针，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之议决案，如能诚意的履众，则国民革命之完成指日可期，而反革命的一切根株皆当断绝。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之议决案不仅可为国民党内一切革命分子亲密合作之基础，且予共产党员以义务便〔使〕分负国民政府对于国民革命之艰巨的责任，而革命战线亦因此而愈益巩固。共产党员之加入政府，即为国民党承认群众运动为国民革命中之伟大动力的表示，并以对抗南京政府所依赖之买办封建资产阶级。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决定推举共产党员加入政府，实有历史的意义，盖中国国民运动已显然分为两个营垒：一方面为半封建的分子及买办资产阶级；别方面为广大的劳动民众以及一切真正民主分子，武汉之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实能继承孙总理所领导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精神，决然与劳动民众民主分子相结合，而认明革命的道路。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决定共产党员加入政府之决议，其意义如此。非然者武汉中央与南京方面叛徒之决裂，即毫无意义可言，至多不过是各个私人之争权夺利而已。共产党员之加入政府，决非为个人之争权，乃欲以国民党内一切革命分子之共同努力的继续发展国民革命以至于最后的成功，而反对南京方面叛徒之反革命以救革命于澌灭也。

自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以来，革命运动中乃有极重大之事件，即所谓湖南问题是也。湖南农民运动之进展，已至于与封建余孽决死斗争之阶段，或且为反抗千百年来积重的压迫及不堪言状的穷困而发生之民众暴动。农民运动之如此伟大的进展，乃使阶级矛盾更深一层的暴露出来，甚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中亦发现此种矛盾之存在。此等极严重的问题，使国民党中央不得不与以明确的答复。解答此问题之道有三：（一）赞助农民运动，以党及政府的积极办法领导农民运动，使渐达革命之根本目的；（二）为所谓过火所震惊，其实所谓过火即革命的急剧风潮，及一切有历史意义的群众革命运动所不能免，如

为之震惊失措，则势必进而反对农民运动，压迫农民群众；（三）立于旁观地位，任令反革命势力消灭一切革命运动，施行残暴的屠杀。此三者之中，中央所择者为何？

或谓湖南问题之解决当为和平方法。诚然，为保持联合战线以反抗奉张、宁蒋之反革命起见，共产党员不但不反对和平的解决方法，且竭力赞助之。此则更可见只须尚有丝毫保持联合战线之诚意，共产党员终为联合而牺牲。

今事实上则所谓和平的解决方法，已变成空前未有之屠杀，国民政府领域之内屠杀之事迭见不鲜，党部则被捣毁，工农团体及其自卫之武装则被解散。中央委员之中如徐谦、顾孟余等方在日夜咒骂民众，凡民众救护革命之行动，概视为不当；又复曲解孙总理之理论，谓中国不能有阶级斗争。实则中国国民革命之全部历史，皆阶级斗争之历史。唯反对垂死的反动的封建阶级及买办资产阶级之阶级争斗，为发展国民革命之最大动力。帝国主义对华之经济上财产上的独裁，固经过买办资产阶级以实行者也；而买办资产阶级之剥削工农，未有不经过豪绅等类封建阶级。反抗此等阶级之阶级斗争，实为国民革命之要素，非此不能完成三民主义之革命。

然国民党中央委员之中，竟有人敢于与民众运动宣战，甚至与国民党历史上之革命的主义及政策宣战。

此种情形之下，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之议决案，已为中央自身所背弃，当然更不能见诸实行。国民党而不能实行此等议决案；则其结果将不免回复到改组以前之状态，即完全依赖极不稳定之军事结合。尚何遵照第三次全体中央全体会议议决案之精神以发展国民革命之可言！

因此共产党员同意于加入政府之基础已经消失。共产党员既为革命的国民党员及共产主义者，则在此种状况之下退出政府，乃其天职。

平山兆征之决然退出政府，其理由如此。平山兆征之引退乃对于国民革命与民众明认自己之责任。国民党中之革命同志当能谅解平山兆征退出政府之意义。平山兆征之行为，实为国民革命之利益起见，始终遵循孙总理之革命的遗训，忠实于吾党。此后当为国民革命努力奋斗，益加奋勉，愿致全体同志共勉之。

谭平山
苏兆征

（原载《响导》201期，1927年7月18日出版）

# 国民革命的目前行动政纲草案

（一九二七年七月）

（中国共产党提出此草案，愿与全国一切革命分子共同商榷而实行之。）

一、反帝国主义

A、反对列强武力干涉中国，全国民众应一致要求立即撤退驻华之外国海陆军。

B、收回租界，由租界居民组织市民议会管理之。外人之居住租界者，均须受中国法律之约束并负担同等之纳税义务。

C、取销在华外国银行之一切特权，禁止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发行纸币，凡中国资本之银行，具有充分之担保金与合法之地位者，其纸币得通用于全国。

D、无条件交还海关，建立减轻出口税增加入口税之保护税则。

E、取销外国商轮自由航行中国内河及滨海各埠之特权，严禁私运军火及鸦片吗啡等类毒物。为发达本国航业计，应将招商局收归国有并加以扩充，得政府许可之私人航业，亦予以保护。

F、外人投资于大企业如铁路矿山之类，因而获得之管理权及政治权利，应一律取销，并从新厘定其经济权利。外人在中国境内开设之工厂，须重新登记，受政府之完全管理。不得国民政府之允许，外人不得在中国境内自由开设工厂。

G、外人在中国境内开设之教会、学校、医院、报馆及其他以慈善为名之机关，均须受中国法律之管理，不得国民政府之许可，不得借口此等名义购置地产。

二、经济

A、立即恢复铁路与轮船之交通，禁止军人扣留车辆船只和阻碍其通行之举动，如有不服禁止者，应由政府严惩之。

B、商品应自由流通，特别是日用品，如米煤茶盐等类贸易，应逐渐由政府管理，以免奸商操纵居奇。

C、废除厘金及农产附加税，停止预征钱粮，并减轻一般日用品之税收，增加奢侈税，并规定统一税则及每年一次的农业税。

D、统一财政，取销苛捐杂税，禁止一切摊派及勒索。

E、由政府颁布工厂法，劳动保护法及商店法规，务使被雇于工商业之劳动人民的生活，得以改善。

F、合併中央中国交通三行为一国家银行，发行一种全国通行之纸币，私立银行概无发行纸币之权。

三、政治

A、巩固革命势力的联合，以促进中国的统一，反对任何分裂革命势力之企图。

B、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组织乡民会议、市民会议，县民会议，以实现县市乡之完全自治，并组织省民会议，为省政府之监督机关。

C、筹备召集国民会议，各省代表应由各省省民会议及人民团体选出。国民会议之目的，应解决免除外力侵略统一中国解除人民痛苦诸大端，反对蒋介石等利用国民会议为称孤道寡之御用机关。

D、实行澄清吏治，剔除财政积弊，建立廉洁政府，使人民得安居乐业。

E、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组织革命团体之一切自由。

四、工人

A、规定产业工人的八小时工作制，手工工厂作场工人及店员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十一小时。童工女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

B、规定最低限度工资，并应随着物价增加工资（在现在经济状况紊乱时期，应每季调查一次为增加工资之标准。）

C、扫除封建式的劳资关系，建立契约式的劳资关系。

D、切实救济失业工人（由政府拨款或收集慈善机关的款项，制定失业保险法等）。

E、禁止虐待童工女工和使用童工女工作危险的工作。

F、工厂须遵守政府的工厂法改良工人卫生状况，同样的工作，须给以同样的工资。

G、女工产前产后，应有六星期休息，照给工资。

H、开除工会职员，须得工会同意，雇用工人应以工会会员为限。

I、发展工人补习教育。

J、工人有组织工会与罢工的自由及武装自卫权。

五、农民

A、农民有组织农会之自由及武装自卫权。

B、一律减租百分之二十五，佃农交句租额最高不得超过收获量百分之三十。

C、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由原佃耕种，纳租于政府。

D、非地主收回自耕及农民自愿让佃，地主不得自由换佃。

E、废止包田制及押金制。

F、取销租额以外之各种苛例，如田鸡小稞等。

G、禁止高利借贷，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

H、由政府设立农民银行，以低利贷款于农民，并由政府扶助农民设立消费生产贩卖信用等合作社。

I、取销旧有民团团防局等机关，禁止任何方面武装袭击农民。

六、军人

为减轻革命军人痛苦起见，应由政府设法改良兵士生活，至少军饷不得拖欠。政府并应没收一致反革命派之财产，以之建立设备较周之军人医院，优恤残废军人，并教养其子女。退伍兵士，由政府给予土地。

七、教育

确定教育经费，提倡平民教育及补习教育，增加小学教师薪金，减轻学生学费。

八、妇女

禁止缠足，童养媳及买卖妇女等恶习，男女在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一律平等。

（原载《向导》201期，1927年7月18日出版）

# 〔附〕武汉国民党政委会主席团宣言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

“本党于今年三月开第三次会议，议决本党与共产党开联席会议，讨论一般的合作办法，尤为本党对共产党之诚意的表现。自有此决议以后，本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便邀集共产党诸负责同志，开联席会议，或每日一次，或间日一次，开会时间往往延至四五小时，对于国内外一切问题，皆提出讨论，共同解决，政委主席团以为如此办法，必能使容共政策，得更大的效果。”

“不幸六月初旬，政委主席团忽然由共产党负责同志交纳一个秘密决议案，这议决的内容，是对于本党的生命，加以根本的危害，这一位负责同志的姓名，此时不能宣布，所可声明的，这一位负责同志，不是以秘密形式，而是以开诚形式，来与本党商榷。惟共产党方面，立即将这一位负责同志驱逐出去了，其罪名是泄漏秘密，共产党既然如此瞒神瞒鬼，所谓联席会议，岂不是一纸空文，此不能不令政委主席团大为失望的。”今只将这议决案的内容摘要宣布如左。

（一）关于土地革命，应从下级没收土地，不用上级机关国民政府下命令没收土地。

（政委案）这种主张，对与不对，姑且勿论。但这决不是本党的主张，民生主义里说明“耕者有其田”的意义，但是同时说明“要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民国十三年八月二十日总理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演说耕者有其田的意思，再三叮咛，要求这种主张之实现，必须农民起来在政府领导之下，以和平方法，得到解决。如今他们却主张应从下级没收土地，不用国民政府下令没收土地，岂不是与本党的主张大相违背！倘使共产党方面在联席会议上提出这种主张，与本党商榷，甚至争论，甚至决裂，尚不失为相见以诚，光明正大。然共产党方面绝不提出这种主张，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军民冲突事件发生后，共产党方面也承认农民运动的幼稚与错误，也承认应加以制裁，却不知湖南农民运动所以如此幼稚与错误，完全是不受本党上级机关之指导弄出来的，而这却是共产党方面的主张。共产党方面，如今却又以本党制裁农民运动之幼稚与错误为借口，而说本党不要民众了。

（二）在中央委员中增加新的领袖，将老中央委员代替了。

（政委案）这种主张，是根本破坏中央执行委员会，须知中央执行委员是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的，如今却将新的来代替旧的，这岂不是根本破坏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织，岂不是根本的破坏中国国民党？

（三）国民党现在的构造，必须改变。

（政委案）这种主张，更是荒谬，其破坏本党之阴谋，可谓尽情暴露。

（四）消灭现在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加上从两湖挑选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

（政委案）这种主张是根本破坏国民革命军，而建设共产军。本党自实行总理容共政策以来，在武装同志中，向来没有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的区别，每每对武装同志演说，我们生在一块，死在一块，无可分析，这是本党负责同志所谆谆而道的。如今他们却偏要分出谁是共产党员，谁是非共产党员，要武装两万共产党员来消灭非共产党员的军队，所谓工农分子，其名则美，既经挑选，其必为共产分子，不言可知。这种主张，如果实行，则国民革命军与共产军战争，必不可免，这真所谓大乱之道。

（五）以知名的国民党员作领袖（不是共产党员），组织革命法庭，处罚反动的军官。

（政委案）这种主张，不值一笑。在共产党看来，知名的国民党员，不过是共产党的刽子手。

"政委主席团自发现这决议案以后，因关系重大，不能不审慎考虑，既不愿轻率的破弃革命联合战线，又不能不为本党生命及国民革命前途谋安全之保障，及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正当审慎考虑之际，而七月十三日又有所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对于本党，厚诬丑诋，无所不至，并郑重申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这是共产党员破坏本党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国民政府是本党执行命令之最高机关，既然退出国民政府，便无异脱离本党，乃偏说退出国民政府以后，仍在国民党，于理论上实为矛盾。且国民革命及各级政府机关，都属于国民政府系统，既然退出国民政府，则在国民革命军中，及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

"本党既发见了共产党方面危害本党生命的决议案，又发见了共产党方面退出国民政府的宣言，容共政策，已可谓破坏无余。然本党仍体念总理遗教，对于共产党力求容忍，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七月十五日通过决议案原文，与共产党七月十三日宣言，两相比较，谁是极意保持革命联合战线，谁是任意诿过他人，借端攻击，读者必能一览无遗的。"

（原载《吴稚晖言行录》）

## 〔附〕告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本月十三日发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时局宣言，十九日再发现中国共产党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国劳苦青年群众书，对于本党肆行抨击，妄

本党容共经过，已由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公布，我们一方面很痛心共产党同志不能体念本党总理容共之深心，一方面更痛心共产党加入本党的同志不愿接受本党决议，而至破坏全部的革命工作。我们本着总理的遗训，本党的政策，深信在革命时期，须由国民党来统一指导权。因为两党或两个以上的党来指导革命，结果必至于革命的政策不一致，革命的力量不集中，必至革命失败而后止。这个统一革命领导权的理论，不独我们肯定，就是共党负责的同志们口头上也承认。无如革命军到了长江以后，共产党的同志忽然发挥两党建国论，在莫斯科同志中更倡言中国国民党是由共产党领导。是则不但共产党间接要分裂本党的领导权，并且接受要夺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了。

我们要知道中国有中国的需要，中国有中国的历史，中国国民党是孙先生手创的党，有三十余年的历史和经验，决不是象爪哇以共产党制造的国民党。中国国民党要本着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来完成国民革命，决不能以没条理暴动的方法来没收一切。当湖南事件未发生以前，为着土地问题，本党曾继续开会讨论求一解决的方法，当时共党同志也有许多参加。当时共同讨论只为政治上的没收，而共党同志居然在湖南自行召集所谓两党联席会议，自布一种经济没收的办法。共党的同志即然不能接受本党的决议和纪律，是共产党自绝于本党，表现不愿与本党合作。不但如此，我们发现许多共产党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案，指导本党的共党分子一切重要问题，只要报告共党的农民部。在共同革命的时期，而有此种隐秘的行动，更表现共产党不愿与本党合作。

至莫斯科决议希图消灭本党以后，共产党更积极向本党攻击。我们明知共产党的方法不能适应于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决计不受本党的指导；我们为中国整个革命前途计，为全国的贫苦人民计，对于共党同志，不能不加以裁制。然而尤复承认共产党为革命的友党，不惜迭次训令保护其身体自由，以表示本党依然认共产党在革命上立于友党之地位。

现在迭次发现共党对于本党攻击的文件，捏造事实，备肆诋诬。我们很诚恳的愿受别党的批评，但决不能忍受别党的污蔑。如果共产党尚承认中国有国民革命之必要，及尚承认共产党还须努力于革命，则共产党应即自憬，放弃其对于本党敌视的态度。否则本党为革命利益计，不能不执行相当的纪律。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原载《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

# 〔附〕夹攻中之奋斗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汪 精 卫

我们正在为国民革命而奋斗的当中，我们的队伍里，忽然生了裂痕了，共产党同志，根据他们中央委员会七月十三日对时局宣言，退出国民政府了，我们的队伍里，忽然溃退了一部分了。

几个月来，我们和反革命者奋斗，以帝国主义者之经济的封锁，军阀之武力的压迫，以及反革命者之抵瑕乘隙无所不至，当然使我们遇着了无数的困难，与无数的障碍，有我们许多想做的事，眼睛望着，做不到手，有许多我们所不愿见的现象，摆在面前，撇不开去，因此，引起了一般人无穷的失望，与无穷的怨恨，我们一方面要用十二分勇气，来战胜这些困难与障碍，同时一方面还是要用十二分勇气，来忍受这些失望与怨恨。共产党同志，觉得不能和我们分担这些失望与怨恨事，于是做一篇对时局宣言，将所有失望与怨恨，一齐推在我们身上，而他们自己走了开去，落个干净。我们此时，可怎么样呢？只有不容分辩的，单独担负起来。

有人说道，"共产党同志，既然脱离了他们的队伍，他们可要渐渐的腐化起来了。"哼！不要说这样无理的话，我们不肯共产化，我们尤其不肯腐化，我们不能共产化的理由，在我们所做的"我们要建设怎样的国家"及"主义与政策"里，已经说得明白，今试将我们不能腐化的缘故，试说如下：（1）我们要坚决的继续做反帝国主义运动。反帝国主义与否，是本党里头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之分野，亦可说是左派与右派之分野，其实已经反革命了，那里还配称做右派呢！本党自改组以来，反帝国主义的色彩，分外显明，反革命派对此便不安起来了，他们第一怕租界里不能安居乐业，第二怕亡命的时候，得不着领事签字的护照，因此对于反帝国主义的口号，诋为不度德，不量力，不识时务，这是改组以来反革命派口中所公然说出来的，冯自由便是其中一个代表者。至于革命派呢，认清国民革命之对象，是帝国主义，认清非打倒帝国主义，不能得中国之自由平等，认清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打倒帝国主义之最大手段，虽然打倒帝国主义的用心，或者与共产党同志不同，共产党同志，则从第三国际着想，而我们则从救国着想，所以所用的方法，有时也不能一致，然其认打倒帝国主义为目前最大之工作，则无不同的，我们如其坚决的继续反帝国主义运动，则我们决不会腐化。（2）我们要坚决的继续做唤起民众运动。反革命派是不要民众的，他们对于一切民众运动，不但漠视，而且仇视，他们里头，文人的结果，不过做个官僚，武人的结果，不过做个军阀。有人说他们是代表资产阶级，这话是不确的。中国如今并没有独立的资产阶级，祗有一些食帝国主义者之馋余以为生存的奴隶性的资产阶级，这些奴隶性的资产阶级，有帝国主义者做靠山，并不要他们来做代表，他们亦不能

做代表，最多不过做利用机会狼狈为奸罢了；反革命者，所过的是这样生活，所以心目中，并没有所谓民众，西山会议，便是这种精神的表现。至于革命派呢，守着总理唤起民众的遗训，以"扶助农工"培养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以"农工商学联合起来"扩大革命之联合战线，他和共产党同志不同的所在，共产党是一阶级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以无产阶级专政为革命之目的，对于其他民众，不过一时利用，认为同盟。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而是一切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的党，其革命之目的，在使国民得到革命之共同利益，征之历史，必是以一切被压迫民众为基础，没有以一阶级为基础的。所以中国国民革命，必须以中国国民党为领导者，其领导之作用，即在联合一切被压迫民众起来，参加革命，我们如其坚决的继续做唤起民众运动，则我们不但不会腐化，而且必然可以完成国民革命。

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共同致力国民革命，这是总理的政策。我们因为笃信谨守，曾经与违背这政策的人，实行决裂，无论他们在党里有如何的关系，和我们曾经如何同生死共患难，我们因为他们违背总理政策，便无疑无贰的，和他们实行决裂。如今放弃总理政策的，不出于他人，而出于共产党同志了。有人很担心的，对我们说道，"你们未免太孤了。"我们不孤，我们有总理的遗训，悬在我们的面前，宛如大海茫茫狂风骇浪之中，一个放出光明的灯塔，我们要忠实而勇敢的，继续奋斗，继续猛向前进。

（原载《汪精卫集》第三卷）

# 〔附〕论国民革命唯一之路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孙　科

具有四十多年历史的中国国民党，他有他自己的主义，有他自己的目的，有他自己的纲领，更有他自己的理论与策略。一句话说，他有他自己所要走的路。

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领导者。他的使命，就是要率领全中国被压迫的民众，去作政治的斗争，以求得革命的胜利。

革命原是要打破旧环境，创造新环境的。故除却清楚自己所要打破的对象外，还更有一个具体的建设的目标。中国国民党对于这两点是早经确定了的。就破坏方面说，就有两句鲜明的口号：（一）打倒帝国主义；（二）打倒军阀。就建设方面说，则要依照总理所定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以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国家。

中国国民党自改组以后，一直到现在，都是要遵照着总理所指示的这条三民主义的大路，与手定的种种政策和程序，作不断的努力，绝未有改变过他本来的志向。

几年以来，帝国主义者，造为“实行共产”“赤化”等等谣言，来愚惑一般民众。这已是辩不胜辩的了。可是最近中国共产党，又有说本党是将要同着反动后退的。我们在此，实在有向全国民众重申本党的真实态度之必要。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已经到了一个歧路。由此岔点出发，可以有三条路让我们选择的。我们由此岔点出发，如果走错了路，中国国民革命的进行，就会走到前途荆棘的绝境。看我国革命的民众究竟是要走那一条路呢？

第一条路，是向右急转直到法西士蒂的路。蒋介石就是已经走向这条路了。他一面见得帝国主义有联合进攻的企图，一方面惊骇民众权力之高涨，所以一面要和帝国主义妥协和洋奴资产阶级联络，一面要摧残农工团体，残杀共产党员，想借此来巩固他的地位。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任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经济的基础永久存在，同时又压抑农工使不能抬起头来，则将来中国的政权，必然的落在一般洋奴资产阶级的手上。那末不独是国家民族独立自由之期望不能达到，各阶级共治的民主政治不能实现，而一般穷苦农工的生计，也因为还受列强政治经济势力的压迫，仍不能得相当的改进。这是和三民主义背道而驰的。我们决不肯走向这一条路。

第二条路是向左急转直到波尔斯维克的路。国际的共产党是要我们走这一条路的。虽然共产国际的革命理论，也曾经变了几变。共产党的最初主张本来即是托罗斯基派的主张，是要以工人无产阶级来专政的。后来列宁以俄国的工业，仍未达于全盛时期，工人无产阶级专政的路既走不通，所以转而主张农工阶级联合专政。最近第三国际训令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又有所谓农工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理论。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些都不过是共产党的一种暂时的策略，不过是想借此联络民众，来夺取政权，以实施他们的共产主义，在中国建立一个波尔斯维克式国家的企图。

我们对于共产党这种主张的对不对，暂且不论。但是中国的现状，究竟能否容许共产党这样照着俄国的办法干下去呢？

先就工人阶级来论。中国是产业最落后的国家，国内的新式工业，比较俄国未革命前，要落后得多。现在除却沿海沿江的通商大埠，有些外人开办的工厂外，其余还是不脱中世纪手工业的状况。新工业既不能发达，真正无产阶级的数量，实是占全国人口之很少数。如果硬要主张无产阶级在中国专政，与全国其他阶级民众利益不能调和，一定是走不通的。俄国革命后列宁之改变主张，要联合农民，即是最明显的先例。

再就农民阶级来论。中国现在农村状况和俄国未革命前的农村状况，也有大大的分别。俄国的土地人口比之中国，可说是地广人稀，其土地大半是落于很少数贵族大地主之手，而大多数农民都是由农奴解放后所变成的佃农。故此俄国革命后把少数大地主的田地没收，分配于一般贫农，平均每人得到几十亩田，农民生计问题便可以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中国是自耕农占其多数，过千亩的大地主已为数很少，而且本部各省都是地少人稠，即照共产党同志的调整，象湖南一带，如果把耕地平均分配起来每人得不到三亩。如此纵能将全省大中小地主之土地全数没收，从新平均分配一回，恐怕每人只有两亩多地的所得，仍是解决不了农民生计贫困的问题。

因此我们如果现在真要跟从共产国际的指导，用急激的手段，实行农工专政，造成波尔斯维克的恐怖，使社会发生一场大大的变乱，其结果必激起全国的大反动大屠杀。旧的

经济基础既摧毁无余，而新的经济基础一时又不能建立，这时全国大乱，更易为帝国主义的武力所压服，而陷国民革命于失败之路。

所以共产党这一条路，不独是违反三民主义，而且简直是一条绝路。我们也是不能走的。

第三条路就是总理要我们走的三民主义这条大路。这条路是我们一向所走的。现在也是要照着这条路往前奋进的。这条路的程序，已见之总理的著作，用不着费解，也用不着多赘，简直明了的说，就是要用中国国民党做唯一的革命领导，唤起全国革命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向帝国主义来共同奋斗。第一期是军政时期，对内要打倒军阀官僚的专政，建设中国国民党统一的革命政权，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所享有特殊权利地位，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以求得中国国家与民族在国际上之自由平等。第二期是训政时期，在政治方面要运用这个统一的革命政权向各级民众实施训政，使能对于选举、罢官、创制、复决四权，得到直接使用之训练，以建设地方自治的稳固基础。然后由乡民会议、县民会议、省民会议，以至于国民会议，而完成民主政权的建设。在经济方面，则要用国家的力量，发达国家资本，建设国家经济的基础，使中国走上新工业的道路，而新工业之利益则归之全国民众；一面实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办法，防止大资本家大地主之发生。关于土地问题，则由政府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地价税法，不必经过农民的暴动，而用政治的法律的方法，把土地作公平的分配，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这样便可以得着民生问题的全盘的解决。第三期是宪政时期，则中央统治权完全交付于国民大会，使产生民选之政府，实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国家。这种种办法。就是总理诏示我们的三民主义之路。

以上所说，第一条路是中国国民党所不当走也不肯走的；第二条路是中国国民党所不必走也不能走的；只有第三条路才是中国国民党自己的光明的大路。

我们唯有向着这条原定的路猛向前进，才可以防止帝国主义武力压服中国革命的阴谋，才可以消灭反动的法西士蒂势力变更国民革命方向企图，才可以避免共产党这种能破坏不能建设的波尔斯维克的大乱的危险。

一切革命的民众，你们要认识中国国民党领导的路，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你们不要左顾，不要右顾，要照着这条路向前猛进，以达到实行建国大纲建设三民主义国家之伟大目的。

（原载《国闻周报》4卷30期，1927年8月7日出版）

# 〔附〕武汉分共之经过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在广州中大讲，林霖记——

汪　精　卫

主席，各位同志：

今天兄弟来到这个大会，听见主席和曾同志的说话，其中关于兄弟的，兄弟很觉得惭愧不能接受。现在得这个机会来和离别一年多的各位同志作一报告，因此一切客气的话可以放弃。

今天的报告，本来应该把各方面的详细情形都说到，但因为时间关系，只能专就一个标题来报告，这标题是“武汉分共之经过”，武汉几个月来，容共与分共的情形，实有报告的必要。兄弟到了广州也有几天，也作过几次演讲，但都未得把事实上的经过详细报告。经过的事实很多，我知道各位必然愿意知道的。自四月以来，武汉同志的工作，广东后方同志，或者多未完全知道的。因此打算把武汉分共的经过做标题，先对各位说一说。

兄弟愿意把纯粹的事实从头叙说，有时或参加兄弟个人的批评，但这不过是兄弟个人的意见，希望报告事实后得到各位的批评，很严重的很不客气的批评。至于事实有关系于兄弟工作的经过，也应该说一说，因这并非一人的关系，兄弟也是担任革命工作的一分子，所做的工作，非关个人，实关于本党。报告后对于兄弟作一种很严重的很不客气的批评，尤其是兄弟最希望各位的。

要说武汉分共的经过，先把容共的由来说一说。我们要知道“容共政策”四个字，是起于什么时候。兄弟记得在四月中来到武汉，即看见满街把拥护三民主义拥护三大政策的标语并拢贴出，有时拥护三大政策的标语比拥护三民主义还要多些。这个情形是很不对的，因为政策与主义是有分别的。不论是政策或是主义，都是依着时代与环境而定的。在某一时代某一环境下需要什么政策什么主义，然后才定出什么政策什么主义，故主义与政策总脱不了时代环境的关系。可是主义的时间性要长些，有固定性有永久性。政策的时间便不同了，政策系由主义发展出来的，没有主义的时间性长。三民主义是中国国民党的主义，时间性是很长的，自秘密革命运动起以至军政训政完全依三民主义而实行的，到宪政时期更是如此。至于政策是主义的产物，由主义按着时间与环境而定出一种适用的政策，故主义不与政策相提并论的。

兄弟到了武汉，便感觉得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并举是很不妥当的。自从国民党改组以来，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未见过三大政策的名词，这大概是去年才发生的。主义与政策的不同，没有弄清楚，而把主义与政策相混，这是很不对的。说到政策，总理以前有联段政策联张政策。这两个政策在现在看来，似乎是过去的东西，但在当时是重要的，必需的。那时候中国的大军阀，就是曹錕吴佩孚，握有军阀大权，害国殃民的，也就是曹

錕吴佩孚。总理所以把联段政策，联张政策明明白白的定出来，系为打倒曹锟打倒吴佩孚。这个政策是一时的，是不错的。打倒曹锟吴佩孚之后，总理即发表一个宣言，即北上宣言，说明不仅在要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的人！所以曹吴打倒之后，便要变更政策，即是打倒曹锟吴佩孚之后，如有继起的军阀，也应该打倒。那时曹吴打倒后，张作霖实行与帝国主义勾结，段祺瑞大开善后会议，故不能再和他们联合，即吴曹打倒，而段张继起，故应以打倒曹吴的精神，打倒段张。所以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便有对段祺瑞忠告的电，后来更明明白白的，发表宣言，来反对他，这实在是总理联段联张的精神，因为段张已为军阀与曹吴相同，故即放弃联段联张的政策。政策与主义不同，由此便可明白。

联俄与容共政策，为应付时代和环境所取的一种政策，不能与三民主义同样有长久的时间性。时代与环境变了，政策也即随之而变化的。这是对于政策和主义的解释。现在将容共政策的历史考查一下：容共政策的起源要上溯到民国七八年。在民国七年俄国革命之后，总理有电报给列宁庆祝俄国革命的成功。民国十年总理在桂林，俄国派人到广州到桂林去见总理。俄国一面在北方也派人去考察吴佩孚，同时也即在南方考察国民党。这个是联俄容共未实行以前的经过。

到了民国十一年冬，俄国代表越飞在上海和总理联名发表一个宣言，这可算是联俄的起点。当民国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陈逆在广州造反，总理以孤军抵抗了五十多天，然后亡命到上海。正当曹锟吴佩孚二大军阀在北方肆行祸国殃民，南方又有陈逆作乱，总理一人亡命到上海，所处的环境是最为险恶的。宣言中说明俄国愿意邦助中国国民党，反抗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认共产主义是不能实行于中国，故俄国不是来宣传共产主义，而系来赞助国民革命。这篇宣言实系国民党的重要史料，也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史料。苏俄既声明不是要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而是要来邦助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自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便也以这个理由来加入国民党。兄弟此次在上海见着张溥泉先生，他是很光明磊落，他说容共政策，他也要负一点责任，因为第一个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李大钊，就是他介绍入党的。当时李大钊见了总理后，说他加入国民党愿为三民主义为国民革命努力，但是不能脱第三国际党籍。总理说可以的。这便是容共政策的起点。到十三年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在大会内否决了不许党员跨党的提议。自此以后系本党已确定容共政策的时候。

当时虽有持异议的，但经大会决定，故即一致行动，然而当时大家都认国民党和共产党能不能合作到底是一重大问题。有些以为容共政策是因时代因环境而定的，故亦必随时代随环境不同而变化。国民党内固然讨论这个问题，苏俄共产党内也讨论这个问题。在苏俄讨论这个问题的人是很多的，他们的派别也很多，每年大会的讨论结果也不尽同，大约苏俄共产党的意见，可分为三派：一派人称他为最右的。他们主张国民党与共产党可以合作到底，但这派是极少数，而且没有势力。还有托落斯基一派，却是最左的。他主张革命无间，从开始革命，直到共产主义完全实现为止，他主张绝对不妥协，连在俄国，他对于农民也是不主张妥协的。他有许多演说对劳农政府表示不满，反对很力。他说现在的苏俄是假无产阶级的国家，并不是真的无产阶级的国家。他是这样明明白白的说出来。他对于俄国现状尚且如此不满，对于中国，更不用说了。他以前批评总理，说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民国十四年三月间总理去世后，在俄国追悼大会中，托落斯基有一篇演说，

他并非驳斥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他说中国应先经过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等到这种革命完成后，再做无产阶级革命。很明白的，他是不主张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他以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好比前清国民党员加入满清政府去做官一样容易腐化。还有一派，是史达林和布哈林，他们主张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国民党，去操纵一切，慢慢的取得国民党的一切权力，到必要时便消灭国民党。俄国现在得权的就是这一派。

他们这种主张在莫斯科孙文大学的刊物上，有一篇叫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是说得明明白白的。这篇文章已翻译成中文，用真笔版印好的，中大同志谅必有见过的。文中说：我们加入国民党后，得国民党的掩护，已取得广大的工农民众，但我们加入国民党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是策略的，不是主义的。所以共产党应该保存原有的组织，到相当时机，并且不能不要有这个组织的。大意是如此，如要知道详细，请参考原译。如此看来，俄国已明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一种政策，看时代与环境的变化如何而不同的。他们共产党每年大会里都接受各种报告而加以辩论，研究时时变更政策的。自我们容共后，从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他们已变了好几次的政策了。总而言之，我们容共是一种政策，他们加入国民党，也是一种政策，这是很明白的事实。但到何时才分手呢？这实为一个大问题。怎么解答呢？那也是应该以时代环境如何去解答。时代环境变了，政策不能不变，是一定的道理。一切政策都因时代环境的变化而推移的，容共政策，当然也是如此。至于等到何时才改变呢？这是无人能先知道的，不过总不外跟时代环境如何而定的。因为一个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一个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的，总不能永远合作在一起的。有人说，国共两党为国民革命而合作时，可以打一个譬喻，如大家共坐一只船，由香港到上海，但是到了上海后，有的是要到天津去的，有的是要到日本去的。由香港到上海的时候，是不会有问题，所以国民革命的时候，也是不会有问题。然而到了上海之后，便怎么呢？如果是两只船，同走一条航线，彼此照顾，则不但未到上海时，不会有问题，到了上海后，也很容易的，各走各的。如果是一只船，则到上海后，便到了分歧点了，一个要驶往天津，一个要驶往日本，如何不生冲突。

不错，国共两党都要国民革命，然只有一个中国，只有一个国民革命，分明是共坐一只船的譬喻，而不是分坐两只船的譬喻。到了一个时机，国民党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共产党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其势非冲突不可。即使时机未至，而个人已不能不做那必要的准备，所以容共之后，必定分共，是不可免的。不过容共时候，不能说出来，犹之明知到上海后，必然分路，不过从香港到上海的路上，大家都不说出来便了。

有许多同志早就说要分共，但党中大多数都不主张，这全在对于时代环境的看法不同。总理为什么要容共，我们试看看十二三年间的情势如何。那时军阀吴佩孚从江西向北江进攻，东江叛军进到石龙。西江连肇庆也给敌人占去，南路在邓本殷手里。我们只有一个广州，但广州尚有时时可以造反的刘杨，故前后左右都为军阀围住。更有帝国主义的压迫，有商团的作乱。帝国主义明白宣言说，你如打商团我便打你，处在这样危险的情势之下，一定要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敌人，内部分裂，是不许的，所以分共是不许的！虽有许多同志主张即时分共，但都受了总理的诘责，默然而止。至于十四年间总理逝世之后，情势还是一样，东江才于三月克复，而杨刘已在广州阴谋叛乱了。六月十二日才把杨刘打倒，而六月

二十三日帝国主义者已在沙基杀我许多学生，工人，商民，农民，死的满街是血！想来各位当中，必有些是身历其境的，也不忍多说了。沙基惨案之后，不久东江方面，又被敌人占去，把当日克复东江时莫大的牺牲，弄得干干净净，同时反动派又在广州干起来了，八月二十日明目张胆的，杀死了廖仲恺先生！那并非暗杀是明杀的！廖先生被杀的前一日即八月十九日，曾和我说道，听见他们要用手机关枪来杀我们哩！说时觉得很是可笑。明日早上，廖先生坐汽车到了中央党部，他们六七个人真是用大号曲尺装的手机关枪子弹来杀廖先生。那时广州大势，岌岌动摇，东江敌人，已向我们进攻，而南路也同时呼应。在那时候，也有些同志以为容共政策应该变了。但是我们并未注意及此，其所以不注意，如果是因为自私，因为自己的利害，这便是极大罪恶，应该受大家严重的惩处。然而，我们当时实因正在把全力去对付帝国主义，对付军阀，对于他方面的事，不免轻忽不注意。好比上海拉马车的马，他的两只眼都被罩着，只顾往前面直冲，不容旁顾。虽然轻忽不注意的错误，万无可辞，但决不是出于什么自私之心，这是当时的实在情形，兄弟在南京时，已曾说过。

民国十四年冬间，统一广东。十五年春间，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再确定容共政策。当时广东已经统一了。所谓经过一个段落之后便必有一个风潮发生，西山会议派于是决定联蒋倒汪的策略了。当时我们二人是一道奋斗的，他们欲把我们二人分开，所以决定联一打一的策略，三月二十日便是此种策略的成功！兄弟知道将来蒋同志必然明了的，故自动辞职离开广州。离开以后，许久未和国内同志通消息，因为知道蒋同志终必明了，为避去一切离间挑拨，所以缄默不发一言。如果大家说兄弟不应该辞职，不应该出国，致党的裂痕益深，这是兄弟甘愿受大家的责备的！兄弟离开广州以后，往法国读书。学生的心情，彼此是一样的。当七八月的时候，看见法报载中国革命军的胜利，以为可以安心读书，虽则有时看见报上说某同志战死了，觉得很难过。九十月的时候，病得很利害，不能思想。十二月以后，渐渐好了，连接中央及蒋介石同志的电报，催促回来。今年二月间，蒋同志又来一个电报，说你如再不回来我也走了！那时心里才十分难过，不能再读书，精神与书本子已不能联在一起了。后来再接一个电报说党要分裂了，于是兄弟便不能不回来了。

回到上海的时候是四月一号，那时蒋介石，吴稚晖，蔡孑民，李石曾几位二十多年来大家在一起的同志都见面了。见面之后，蒋同志等提出两件事，要兄弟赞成，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共。从四月一号到五号，一共五天大家都是商量这两件事。蒋同志等对于这两件事，很坚决的，以为必需马上就做。而兄弟则以为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蒋同志等说道，中央已开过第三次全体会议了，全为共产党所把持。兄弟说道，如此可以提议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以新决议来变更旧决议，而且南京已经克复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可以由武汉迁到南京，第四次全体会议，即可以在南京开会，会议怎样决定，兄弟无不服从，如不由会议决定，恐分共不成，反致陷党于粉碎糜烂，这是兄弟所不能赞成的。于是兄弟自任前往武汉，向中央提议，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并提议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以讨论决定蒋同志等所提议之事件。蒋同志等很不赞成兄弟往武汉去，而兄弟则以为不得不行，遂于四月六日下船。在船中写了三封信。两封是下船后即发的，一是写给蒋介石同志，一是写给张静江同志，信中大意，是说最好能够

在四月十五日左右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一切。随后又写一封信给李石曾同志，说明十三年改组的精神不可牺牲，党的纪律，不可不守，党的组织，不可破坏。这封信，在南京未曾宣布过，只看见李石曾同志所编“革命”曾发表复兄弟的一封信，而于信末说明，原函未经本人同意，不便发表，只能列举出几点来，并且说“汪精卫先生的主张，与吴稚晖先生不同，汪注意于党的组织和纪律，而吴则注重以革命手段行之，我是赞成吴的主张的。”这封原信，现时已没有发表的必要，然从这封原信看来，可见当时兄弟等主张，确有多歧及其分歧之所在了。四月十日，兄弟到了武汉，闻得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已决定移往南京，极为欣慰，以为分裂之祸，庶几可免。不料十三日以后，便接得南京上海实行分共的消息，并且接得南京成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的消息，兄弟每日均有电报去反对及阻止，至十五日而消息证实，十七日而武汉中央党部也决定免蒋同志的职了。

以上的情形如此，在兄弟当时看来，以为蒋同志等是不对的。但是如今看来，不但不是蒋同志的不对，而且是兄弟的不对。因为当时蒋同志等见兄弟不肯听他们阻止的话，定要往武汉去，不但对武汉同志失望，对兄弟也失望了，所以不待兄弟往武汉去的结果如何而马上就在南京干起来，而兄弟往武汉去的结果，却不出蒋同志等所料，徒然增加了反对蒋同志的声势，所以兄弟事后批评，不说蒋同志不对，而说兄弟不对，这是事实，并不是什么违心之论。

于此有一句附带声明的话，四月四日兄弟曾同陈独秀发表过一篇辟谣宣言。这篇宣言，是有来历的。当四月一二三日，吴蔡李诸同志，曾对兄弟说，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要主使工人，冲入租界，引起冲突，使国民革命在外交上成一个不可解的纠纷，以造成大恐怖的局面。兄弟听得，十分惊讶，曾将这些话质问陈独秀。陈独秀力称决无此事。兄弟以之转告吴蔡李诸同志，吴同志说，“这是口头骗你的话，不要信他。”兄弟又以之告陈独秀，陈独秀遂亲笔作书，并亲笔作此宣言，以解释谣传，表明态度。如今亲笔书函，还在兄弟这里。这一段事，本无关正文，因有人误会谓这篇宣言乃是主张国共两党联合治国的，故不能不附带说明几句。

如今再说自从四月十五日宁汉分裂之后，一般忠实同志从党的组织和纪律着想的，都服从武汉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命令，以反对蒋同志等，然而并不因此而停止了北伐的进行，所以十七日免蒋同志职，十九日依然誓师北伐。关于北伐的事，不在今日演述的范围，如今当说说武汉分共的经过了。

武汉分共的经过，由四月中旬至七月中旬共三个月，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裁制共产党徒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第二阶段是和共产党和平分离，第三阶段是以严厉手段驱除共党，如今逐一说来。

当四月中旬，兄弟到了武汉，看见那边情形，不但不象十三四年间的广东，也不象十五年间的广东了。其时武汉已成为共产党把持的局面了。只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其理论与方法已完全是共产党的，而不是国民党的了。一般忠实同志，痛心之极，然而主张立时分共，是做不到的，因为四月十九日已誓师北伐，第四方面军陆续出发，沿京汉路线，和张作霖作战。第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和张发奎军长所统率的第四军第十一军，及唐生智总指挥所统率的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在容共时代，自然有不少共产分子杂在里头。吴先生曾责备兄弟，为什么说和共产党死在一块，生在一块。其实这是容共时代的事实。十四

年间东征时候，和十五年间北伐时候，死尸堆里可以证明。即如此次北伐，蒋先云等确是共产党人，确是和国民党忠实的武装同志死在一块的。当第四方面军在前方和张作霖死战的时候，如果后方同志，发生分共问题，则联合战线，为之摇动，无异给张作霖以一个绝好的机会了。所以当时一般忠实同志，虽明知已到了国共两党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不是共产党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上去，便是国民党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上去，已是无可并存的，然而为前方武装同志着想，不便提出分共问题，而只提出裁制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由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中共党部决议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检查各级党部，各级政府机关，各种民众团体之一切言论行动，便是此意。可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恶感，从此日深，而斗争亦从此开始了。及至五月二十一日湖南长沙发生反共风潮，当时苏俄代表鲍罗廷等，及中国共产党徒都要求中央党部，对于长沙事件，加以严重之处置。及至六月一日，苏俄代表罗易忽然约兄弟去谈话，说“莫斯科曾有一种决议案，给我与鲍罗廷的，鲍罗廷给你看没有呢？”我说，“没有”。他说，“我可以给你看。”他于是把那决议案给我，一是俄文的，一是中文的。中文的是他们自己翻译出来。兄弟看过以后，觉得严重时期已到了。兄弟说，“可以给我吗？”他当时有点迟疑，最后才说“今天晚上送给你，因为要修改几个字。”晚上果然送来，兄弟如今将这决议案原文送给主席，以备各位同志的参考。那决议案有几点很要注意的。第一点，是说土地革命，主张不要由国民政府下命令，要由下面做起，实行没收土地。这实为湖南事变的原因，为农民运动脱离了国民党的原因。第二点，对于军官和士兵的土地，不要没收，以避免军官和士兵的反对。第三点，要改造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执行委员会中，增加农工领袖，其实即是要增加共产党人去，他不说穿便了，并且公然的说，国民党现在的构造，必须变更。第四点，要武装二万CP党员，并挑选五万农工分子武装起来，他说的农工分子，其实也即是指共产分子。第五点，是要国民党领袖组织革命法庭，来裁判反共产的军官。这就是国民党领袖替共产党做刽子手，来自己杀自己。

这决议案的内容，大概如此。拿刚才的譬喻来说，已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做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一法。正如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恰好这个时候，第四方面军已在河南打破张作霖军队，收复黄河以南。兄弟等便于六月六日前赴郑州，商量第四方面军班师回武汉的事。

六月十三日兄弟等回到武汉，第四方面军已陆续班师回来，在那时候，兄弟忽然听得罗易要走了，不解其故，后来才知道，罗易因为将那决议案交给兄弟，大受鲍罗廷的责备。罗易的意思，以为国民党的左派，必当与共产派同其生存，否则必为右派所消灭，故应该将这决议案，给左派知道。鲍罗廷的意思，则以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不同，他仍然是为国民党的，见了这决议案，必然和共产党决裂，责罗易轻率误事。中国共产党多数是邦助鲍罗廷的，遂将罗易驱逐回去。兄弟等知道这个消息，当然更加紧张，于是从六月中旬起，一面集合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同志，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方法；一面集合非共产党的武装同志，将那决议案宣布，请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听候中央议决，努力奉行。鲍罗廷闻此消息，不能不走，而中央执行委员会遂于七月十五日议决，在一个月内，开

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来讨论决定分共的问题。在未开会以前，裁制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可是，同时又发布命令，保护共产党人之身体自由。由此可见中央虽然因为发现共产党消灭国民党之阴谋，不得已而与之分离，然其分离，必经过郑重的手续，且其分离必采用和平的方法，而不用激烈的行径。无如七月十六日，中央方才宣布以上的决议和命令，而同日市上已看见共产党七月十三日的传单，宣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议决，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惟共产党员，仍须加入国民党，不能退出。及至七月二十日，又看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七月十九日的传单，宣传大意相同，对于国民党厚诬丑诋，无所不用其极。我们其初还不明白，何以共产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后，仍要留在国民党里呢，后来看见莫斯科的电报，才知道共产党留在国民党里，为的是好从中取事，以破坏国民党。而其所以退出国民政府，为的是可以明目张胆做破坏国民革命的工作。所以电报里头，要共产党人在国民党里，建立非法的战斗机关，其用意至为明显。兄弟如今将这两种宣言，和一个电报也都交给主席，留与各位参考。

中央党部，看破了共产党这种阴谋，所以一面训令国民政府，允准共产党人一律退出，一面训令军事委员会，通饬国民革命军各部队长官，将共产党人一律撤去，因为国民革命军是国民政府的军队，共产党人既然退出国民政府，便没理由仍然存留在国民革命军里头，要想利用军队的地位，以为破坏国民政府的利器，这种一相情愿的事，是不可能的。共产党经此一番严密的防范之后，知道计无所施了，只有纠合贺龙叶挺一般党徒，在南昌发难，以希图一逞。南昌之变，江西备受荼毒，其流毒且及于广东，国民党遂不得不由和平的分共而进于严厉的驱共了。

以上便是武汉分共经过之大略。

武汉分共的经过，是很艰苦的，尤其五六月间最为危险，在河南的军队和多一倍的张作霖军队打仗，而杨森军队又到了新堤，如在广东来说，好比敌人已到了黄埔；夏斗寅军队到了土地堂，即好比敌人到了沙河；而下游又天天要来进攻，四面都受敌人的包围，共产党乃乘人之危；德国有一种报纸，译登苏俄中央的会议录，其中有一段是托落斯基质问史达林何故仍要助武汉国民党，史达林说道，因为武汉国民党已在共产党的掌握中。可见共产党在当时的势焰了。分共的时候武汉同志发表许多文章，兄弟也有一篇，题为“夹攻中之奋斗”，说我们虽是孤军，但不要怕，我们要在四面夹攻中奋斗，以三民主义总理给我们的精神去奋斗，有三民主义总理的精神摆在我们面前，鼓午我们奋斗的！我们分共是与张作霖的讨赤，帝国主义的反赤不同，我们是为国民党而分共，是为三民主义而分共的！分共之后是不是有青黄不接的现象？不错，是有的，譬如一个人腹内有病，不能不用剖腹的手术，剖腹之后至少要卧床二三星期才能起来。可是如不割去即死，割去才可以生！国民党到了五六月间，不能不分共，也和人腹内有病，不能不开割一样。开割后之暂时虚弱，是必然的现象，是须培补元气，便能回复健康。所不幸的，国民党于剖腹以后，健康未复，便发一场大热，这个热症，就是南京的特别委员会。然而这个热症，是可以用精神来治好的。广东在四月间已实行分共，武汉则到七月才能分共，然而分共以后，同是害着南京特别委员会这个热症。我们如今须要推倒南京特别委员会，才能不辜负当时的分共。试想，如果说不要党纪，如何能以党治国，如何能以党治军。其结果，必致变为以军治党。如此，这一个兵力大的，便去打那一个，互相争杀，了无穷期，革命永不能成功。故

现在割后之热症，不能不以全付精神去治好他。今天报告完后，希望大家下一个最大的决心，在最短时期以内，治好这割后的热症，即是推倒南京特别委员会！大家在党的主义下党的纪律下党的组织下实行三民主义！我们既然能用开割的手段，来肃清共产党，必然能用肃清共产党的精神，来推倒南京特别委员会。能够把共产党肃清，诚然是一部分的必要工作，但须知道消极的肃清工作是不能够的，还要做积极的肃清工作，巩固发达国民党，便是肃清共产党之根本方法。我们要在三民主义下，在党的纪律下，在党的组织下，把忠实努力的同志，团结起来，担负这些工作，担负救党救中国的责任。要能够于肃清共产党以后，把国民党破坏的能力，建设的能力，同时发挥出来，才能算为忠实努力的同志。将来应该如何做法，现在不及详说，只看我们的努力做到什么田地！我们要把精神力量聚集在党里，对党努力工作！各位对于兄弟关于党的工作，若加以严厉的批评，是兄弟所最希望的。

（原载《汪精卫集》第三卷）

# 〔附〕分 共 以 后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广州执信学校讲——

汪 精 卫

上回说的，是武汉分共之经过。党内分共，武汉为最难，亦为最迟。及至最难的部分，已得到最后的解决，分共便成为党内一致的主张了。如今所要说的，是分共以后，要怎么样？

兄弟在此，想提出几个要点。

第一，我们要继续肃清中国共产党。所谓分共，是将共产党员，从国民党里，分了出去。只是分出去之后，便怎么样呢？七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和七月十九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宣言，都有同样的语调，即是一面攻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一面仍主张不要退出国民党。这显然是借着国民党的掩护，以破坏国民党。恰如要将国民党做鸡蛋壳，而他却要做鸡蛋壳里头未孵化出来的鸡雏，平时借着鸡蛋壳的掩护，时候到了，即破蛋壳而出。这种一相情愿的事，只好说是妄想。他为要实现这妄想，已经定下种种计划。综合几个月来，莫斯科所发表的议论，以及中国以内所得到的报告材料，他的计划，大概是：以蒙古为根据，向北方各省，逐步进取。他以为国民党在北方各省的势力，比较微弱些，可以为所欲为。至于南方各省，无论什么运动，都有国民党做他的对头，所以他必以破坏国民党为第一著。其破坏方法，除在国民党外实行种种扰乱，最狠毒的，莫如混入国民党内，做种种挑拨间离的工作。他以为国民党分裂之

后，创痕是一时不能即合的，借此机会，使国民党自相残杀，不难使之同归于尽。如此说来，现时所谓分共，只能说是国民党已经确定的主张，而不能说此主张已经完全做到。如今担负国民革命之责任的，是国民党，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便是破坏国民革命。不但国民党要一致起来，将他打倒，中国国民，也要一致起来，将他打倒。

第二，我们要重新整理国民革命的理论。我们所谓分共，不但要将共产党分子，从国民党里分出去，尤其要将共产党理论，从国民党里分出去。国民党自施行容共政策以来，共产党分子，在国民党名义之下，向农工商学各团体，宣传了不少共产党的理论。如今共产党分子，虽然分了出去，而其所留下的理论，仍然存在于农工商学各团体里。农工商学各团体，仓卒之间，不能分别出那些是国民党的理论，那些是共产党的理论，这已是极大的危险，而尤其危险的，是农工商学各团体里头，有些热心的人，本来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而误认共产党的理论，是国民党的理论，且以为是国民党里头最革命的理论。这种人，说他是共产党，他必不服，然他的理论，却与共产党一般无异。这人，在农工商学各团体里遇见了不少。所以国民党当前最急的工作，是将数年以来，国民革命的理论，重新整理一遍。将共产党的理论，夹杂在国民党的理论中的，一一剔了出来。明明白白，指示给农工商学各团体，这些是共产党的理论，必须抛弃，这些是国民党的理论，合乎国民革命的需要。然后农工商学各团体，方不致迷了方向，这不但是国民党当采的手段，而且是国民党当尽的义务。不然，只将共产党分子分出去，而共产党理论，仍然存在，分共之目的，是不能达到的。

至于整理的方法，当如何呢？自然是以三民主义为度量衡。凡理论之合于三民主义者则留，不合于三民主义者则去，不能有丝毫苟且假借。举例来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的信条。而民生主义里，却已将阶级斗争的理论，批评得清楚。人类因有阶级，才有斗争，这是事实，无论何人，不能无视的。如其要消灭斗争，必先要消灭阶级，阶级消灭，则人类至于平等，进于大同，自然用不着斗争了。这一点，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之目的，是相同的，所以总理说，“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然共产主义，是要无产阶级，用斗争的力量，打倒其他一切阶级，即有时贪图联合战线的便利，与农民同盟，甚至与小资产阶级同盟，都不过一时的便利，不是永久的结合。所以各阶级间之互相残杀，是必然的现象。而且这些现象，是有意做成，并非是出于意料所不及的。民生主义，则是用思患预防的方法，使阶级之未发生的，从此仃止，已发生的，也逐渐消融，以引而致之于自由平等之域，所谓事半而功倍。所以总理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中国现在的情形，是处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凡是次殖民地的国家，因为经济落后，大工业没有发达，没有什么大资本，没有什么大商业，所以社会阶级，是不甚悬绝的。而且就全社会看来，最大的压迫阶级，是帝国主义，而全社会皆处于被压迫阶级的地位。所以中国今日所需要的，只是国民革命。而国民革命所需要的，是民族联合，反抗帝国主义。社会间各种力量，应该分工合作，以达此目的。提出阶级斗争，使社会间自相残杀，于民族联合，不但无利，而且有害的。照中国现在的情形来说，已是如此。照民生主义之最终目的来说，“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合，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所以要达到民生主义之最终目的，也不当采用阶级斗争之方法，而当采用联合社会间各种力量的

方法。

如今举几件实事来做证明。

先就农民运动来说，自去年北伐以来，共产党在两湖做农民运动，其唯一口号，是没收土地。所以创出“打倒地主”以及“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种种名词。其结果大中小地主一齐打倒，农民一无所得，徒便宜了一般地痞流氓。最可恨的，他们还要用“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来做护符。须知道总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在民生主义第三讲里，说得很明白，是要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的。并且在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里，把耕者有其田的意义，更解说得详细。共产党借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来没收土地，并且由下级机关，自行没收，不经过政府。这种做法，正是民生主义所痛恨的。我们分共之后，必须向农民解释明白，共产党的农民运动之理论与方法，和国民党的，全然不同。共产党之农民政策，所谓没收土地，不过说得好听。其实农民不但没受其益，反受其害。因为他只图唆使农民打倒乡村间其他一切阶级。其结果社会联锁，为之打破，农民亦无以自全。他却正好利用这些失耕农民的骚动，以为其获取政权的凭借。这真是农民之蟊贼。至于国民党之农民政策，载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虽似乎卑无高论，却适合于农民目前之需要。而其指示农民与国民革命之关系，更为非常密切。我们可以对每一个农民说：农民所患的，不是没有土地么？然而中国有些地方土旷人稀，农民不愁没有土地，却愁有地不能种。近年以来，所谓华北旱灾，深知原因的，知道不仅是由于天旱，却是由于有地而不能种。因为农民比工人更苦，工人有了身体手足，便可劳动，以得工钱。农民单是劳动，还不够的，劳动之外，还要本钱。买牛，买耕具，买种子，都是非有本钱不行的。农民何处得本钱呢？是由于借贷。乡村间的高利贷，说起来，骇人听闻的。农民从高利贷得到本钱，幸而那年无水旱之灾，得以丰收，租税之外，得以还债及供衣食。不幸而那年有水旱之灾，赔了本钱不算，还要卖儿卖女，以纳租税，及还债呢。这便是有田而不能种之一原因了。所以农民问题，不是有了土地便得，还须计及本钱。各处设农民银行，以轻微利息，借给农民，资其耕作，才可以解除有地不能耕之苦痛。然而农民银行，谈何容易？若不是国家财政充裕，社会经济舒展，何能办到？可见得解决农民问题，不当但着眼于农民本身，而当兼着眼于社会联锁关系了。有了土地，有了本钱，似乎可以耕作无忧了。然而还是不够的。如果地方不能太平，有土匪打劫，不但禾稼被其蹂躏，鸡狗被其杀戮，田庐被其焚掠，有时连儿女也被其掳去勒赎，再遇着不良军队，真所谓贼过如梳，兵过如篦，其痛苦更不堪言。可见得解决农民问题，不当但着眼于社会相互经济关系，而当兼着眼于政治了。政治清明，地方太平，农民似乎可以安居乐业了。然而还是不够的。出口的是农产品，入口的是工业制造品。农民辛苦种出来的豆子，被外国人用低廉的价，买了出口，再用机器，榨成豆油等等，运之入口，农民辛苦种出来的棉花，被外国人用低廉的价，买了出口，再用机器织成棉布，运之入口，其价值相去，不止倍蓰。诸如此类，数之不尽。农民将一滴滴的汗换得来的金钱，以为可以放在手里，不知其结果是加倍蓰赔了出去。几十处通商口岸，好比人身上几十个创口，有限的膏血，从几十个创口里，日夜流出，无论如何强壮的人，也要病倒的，何况是著名的远东病夫呢。不平等条约，片面义务的关税制度，如果不能废除，全国势必沦于破产，农民自然不能幸免的。可见得解决农民问题，不当但着眼于政治关系，而当兼着眼于国际现状了。以上所说，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外交

关系，和农民本身，密切连带如此。可见得国民革命的三个口号，（一）农工商学联合起来，（二）打倒军阀，（三）打倒帝国主义，正是农民运动所必需的。这三个口号，为国民革命计，亦即为农民计。国民党的农民政策，实实在在是为农民谋利益的。经此一番解释，农民定必恍然无疑。再不去上共产党阶级斗争的老当，而明白承认民族联合共同致力于国民革命，为农民解放运动之唯一方法了。

再就工人运动来说，共产党叫得最响的，无非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以无产阶级独裁为目的，要做成无产阶级的国家。但考之实际，何尝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不过是几个无产阶级领袖的国家罢了。几个领袖，各自以一般无产阶级做背景，来夺取政权。一般无产阶级不过做他夺取政权之牺牲。其他阶级，更不用说。今年五月间，汉阳县党部，为共产党所把持，擅自议决，没收汉阳十五间工厂，组织工人管理委员会。须知道工人管理工厂，是共产党已经试验过失败的事情。俄国十月革命之初，曾经干过工人管理工厂，不多几时，原料缺乏了，工资缺乏了，燃料缺乏了，情见势绌，不能维持下去，赶快由国家收回管理。意大利当大战以后，曾有一两处演过工人管理工厂的喜剧，当其占领工厂之始，竖起红旗，唱国际歌，十分高兴，不多几时，原料工资燃料都无着落，无可奈何，及去请求政府替他向资本家调停，于是慕索里尼窥见弱点，乘之而起，以棒喝团把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这两件失败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岂有不知道的。何以还想在湖北从新搬演？哼，你以为这是他的愚呆么？其实正是他的狠毒。他明知道工人管理工厂，其势不能维持。一面以要求国家管理，挟制国民政府，暴露其弱点。一面利用工人失业之众多，做成社会的恐怖，经济的混乱，得所凭借，以夺取政权。他只图以共产党替代国民党，操纵国民革命，工人的死活，那里放在他的心里。所以与其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之友，不如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之敌。至于国民党之工人政策，载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虽也似乎卑无高论，却适合于工人目前之需要。而且工人之解放，与国民革命，息息相关，也和农民一样。国民革命，不专为工人谋利益，而工人之利益，必于国民革命之后才得到真正之保障。国民党戮力于国民革命，即是戮力于工人之解放。工人如果明白了国民党之主义与政策，必不再信共产党什么无产阶级独裁骗人的话，而诚心诚意加入国民党，以努力于国民革命。

再就商民运动来说，共产党的口号是“打倒资本”，国民党的口号是“节制资本”，两个口号，截然不同。共党还利用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名词，今日说打倒这个，明日说联合那个。九月中旬，我到上海，闻得人说，南京清党的时候，捉着一个当铺的老板，说是共产党，这固然是奇闻。五月中旬，我在汉口，闻得咸宁县党部的宣传，有五十块钱以上的，便是小资产阶级。我想田舍间养一只耕牛，价值往往在五十元以上，然则一只耕牛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了。我因此联想到布哈林说过，“我们对于联合富农，其意味等于养取肥牛，榨取牛奶。”所以共产党说联合小资产阶级，其意味也不外如是。什么联合，不过打倒的代名词罢了。至于国民党之节制资本政策，在建国方略里，说得最为明白。“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今欲利便个人企业之发达于中国，则从来所行之自杀的税制，应即废止，紊乱之货币，立需改良，而各种官吏的障碍，必当排去，尤须辅之以利便之交通。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

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所以打倒资本的口号，实与国民党政策，大相违背。容共时代，有些党员，随着共产党的口吻，高叫打倒资本，实是大上其当。分共以后，按照民生主义和实业计划，切实宣传。并时时注意于改善店员与店东之关系、工人与厂主之关系，调合适当，则一般商民和实业家没有不欢迎国民党的。

再就学生运动来说，五六月间，我闻得湖北省党部青年部的宣传，有所谓“读书即是不革命，不革命即是反革命。”我初时不信，以为断没有如此荒谬的人，说如此荒谬的话，后来问顾孟余同志，始知确有其事，真是可恶之极了。不读书的仍然好叫做学生，犹之不做工的仍然好叫做工人，不耕作的仍然好叫做农民，不做买卖的仍然好叫做商人，真是名实不符之至。他还说道，“打倒知识阶级”。社会譬如人身，劳动阶级，要打倒知识阶级，譬如两只劳动的手，要打倒一个储知识的脑，何愁不打倒，只怕同归于尽罢了。如果想中国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必须有自由平等独立之文化。这个责任全在学生身上，学生不去求知识，是自暴自弃其责任。而所谓打倒知识阶级是逼人自暴自弃其责任。这真真是亡国灭种之罪人了。孙文学说，谆谆告人以知难行易，一方勉人以力行，一方正是勉人以求知，决没有如此灭裂鲁莽的理论的。

以上噜噜嗦嗦的，说了一大段，是证明对于民众运动之理论及方法，共产党的，与国民党的截然不同。分共以后，第一要义，是将共产党的理论，从国民党理论中，分了出去。如今一般腐化分子，口口声声不要民众，凡有接近民众的，几乎就要疑心他是共产党，这种荒谬心理，固然可恨可怜。但是接近民众的时候，如果不将国民党的理论，认识清楚，随手检起一些时髦书籍，便根据宣传，也是莫大的危险的。

第三，中国国民党第一紧要的口号，是“建设起来”。我们的口号，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如今又添了打倒中国共产党，这些诚然是要打倒的。但是打倒以后，可怎样呢？自从北伐以来，我们已打倒了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不久便要打倒了张作霖，我们已收回了汉口、九江英国的租界，我们已将共产党驱逐出国民党以外，这些工作，在国民革命史上，诚然有相当价值的。但这些都是消极的工作，不是积极的工作。只能在国民革命的大路上，排除障碍。还没有将国民革命的目的，实现出来，所以今日，我们第一紧要的任务，是将国民党的主义及政策，实现出来，即使一时力不从心，而最低限度之政纲，不可不求其实现。今日国民之望治，真真如饥者之望食，渴者之望饮了。孟子说得好，“饥者甘食渴者甘饮”；又说“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这真能描出一般人民久乱思治的心理。我们不要性命的去做国民革命，如能为人民解除一些些的痛苦，获得一点点的幸福，我们的良心，也得到安慰。我们如其能建设起来，则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以前做过的，不为徒劳，以后做去，当更有把握。不然，不但不能打倒军阀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反为军阀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做机会了。

以上所说三点，都是分共以后，必要的工作，随便说来，期与诸同志努力做去。

（原载《汪精卫集》第三卷）

# 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

宋 庆 龄

我认为现在我必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来说明我们目前有必要作明确的解释。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今天危机当前，我们应该从基本的问题中去寻求基本的答案。我们必须解答革命性质的问题，特别是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它究竟是政治革命，还是社会革命？它包含些什么变革？

归根结底，一切革命都必须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是改换政府而已。

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交给我们。目前存亡攸关的是民生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在我们的革命中是基本的。从这个主义，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社会价值的分析和他对于工农阶级地位的确定。这两个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作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国民党的社会纲领便会软弱无力、混乱而不合逻辑；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政治问题就模糊不清。如果我们采取了削弱这种支持的任何政策，我们便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而且不是真正忠于孙中山。

现在有许多关于政策的讨论。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但是现在有人说政策必须按照时代的需要而改变，这种说法虽然有一部分道理，但是政策决不应改变到如此地步，以至成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政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而本党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制度才建立起来的。

现在我们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党内种种不同的分子中间发生了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分歧。有人提议一些猛烈的解决办法。由于我认为这些解决办法中有若干项如果实行起来将会摧毁党的力量，并延迟革命的成功，所以我必须发言。这些解决办法在我看来，是一种政策的一部分，这种政策必然会疏远并且压迫我们所依为主力和革命为之奋斗的阶级。我

认为这种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

这种新政策是作为纠正过去错误的一种办法而提出来的。但我看这种纠正办法比原来的错误更加严重。

现在是开诚布公、当机立断的时候了。过去确是犯了错误，但我们同志当中有些人却不愿承认；我们对这些错误所应负的责任，至少与那些我们现在认为他们是完全错了的人一样多。假使我们老老实实回顾一下过去在武汉的几个月，毫不忌讳地审查一下我们自己的言论和决议，我们是逃避不了责任的。演说和宣言都载在党的历史上，但我们现在却要逃避责任，诿过于他人。

是的，错误是有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错误不只是他人的错误，也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我们促成了这些错误，我们也就必须改正这些错误，并且用革命的方法去改正革命的错误。我们不能出卖群众。我们已经使他们抱有极大的希望。他们已对于我们寄以极大的信心。我们要永远矢忠于这种信心。

孙中山是从民间来的。他对我讲过许多早年的事情。他生于农民的家庭。他的父亲种田。他县里的人民都是农民。

孙中山很穷，到十五岁才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

孙中山好几次告诉我说，就在这早年还是贫农家里的贫儿的时候，他变成为一个革命的人。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就为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四十年的生命。

但是今天中国农民的生活比孙中山当初痛感人间不平而终生投入革命的时候是更加困苦了。然而今天自命为孙中山信徒的人，口里谈的是阶级，心里想的却是一种实际上漠视中国千百万贫困农民的疾苦的“革命”。

现在更有人非难农工运动为新近的外国产物。这是谎话。二三十年前孙中山在言论思想中就表示要用革命来改善中国农民的地位。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曾向李鸿章建议社会与经济的改革。在一九一一年，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文章，登在日内瓦“社会主义者”报上，其中他说，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基础就是土地革命。这就是他一生中的巨大目标之一。凡是他所计划的，都是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法。

一九一五年我们在日本的时候，他还要廖仲恺对农民和工人问题作更深刻的研究。

孙中山奋斗了四十年，但是直到最近几年，这些人民革命的计划才开始获得成果。我清楚地记得一九二四年七月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在广州开会。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必然成为中国新力量的中国人民来参加革命。这些农民来自广东各县，许多人赤着脚走了好些里路来到广州。他们衣衫褴褛，有的还带着箩筐和扁担。我深深地受了感动。

孙中山也很受感动。我们回到家里之后，他对我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并且又告诉我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在自救中所必须起的作用。

这些年来，他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但是现在人们又讲什么新近的外来影响了。当俄国还在沙皇铁蹄之下的时候，孙中山就已经倡导中国土地革命了。难道他是外国阴谋的工具吗？

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党就不成为一种为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而会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

我们面临一个严重的危机。但是这个危机对于我们个人比对于中国全国的关系更大。不论现在的国民党在此时是上升到它的最高理想，勇敢地寻求纠正错误的革命方法，还是堕落到一种可耻的反动与妥协的地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我认为我们背弃了孙中山领导群众和加强群众的政策。因此我只有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

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

现在本党虽然有些党员离开了孙中山手定的中国革命的道路，然而已站在本党旗帜之下的千百万中国人民，仍将遵循这条道路以达到最后的目的。所以抱着这样的信念的并不只是我一个人。我相信国民党一切忠实的党员一定都会遵循这条革命的道路。

（转自《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 论陈独秀主义

（一九二八年）

蔡和森

## 一、陈独秀怎样参加了革命的行列

陈独秀主义是什么？是中国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中之机会主义和孟什维克路线之典型的代表。所有从中国近时革命运动中发生出来的各种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自戴季陶主义、彭述之主义、谭平山主义以至鲍罗廷主义，都可以且应该归纳在这一中国孟什维克的总路线之中——即陈独秀主义之中。

陈独秀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而且带着民族资产阶级的理想跑到中国共产党里面来影响中国工人运动，原来是很明显的。他是欧战后中国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主唱者，美国式的"科学"和"民主主义"（"新青年"杂志的两个主要口号）的宣传者；哲学上，他是从美国杜威博士的实验主义进到法国启蒙时代的机械唯物论。这恰好是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欧洲大战时期中发展起来的思想的和政治的表演。这一时髦的表演，在"五四"时期确是起了不少的革命作用。

凭靠在民族资产阶级和学生群众的"五四"反日运动，渐渐的软弱下来，而由此运动所引起的北方工人运动（主要是京汉路工和唐山矿工）和上海以及广东的罢工斗争，继续不断的表现出新社会阶级带着伟大的革命力量跑出舞台。于是陈独秀首先起来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学生群众说："工人的力量比我们大些。"此时正当他们对于"五四"运动的前途发生悲观，对于"五四"以后的发展方向发生徬徨，他们的先进分子正想"从下等社会"中找出自己的力量的来源和凭靠，这就不得不使他们看中了时髦的工人运动。因此陈独秀同着他所影响的急进的知识分子就开始与胡适之派（"新青年"杂志中的右翼）分化，改变自己的方向：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方向改变到社会主义的俄国方向；由凡尔赛会议和华盛顿会议改向远东民族会议（一九二二年在第三国际旗帜之下召集的）。由此，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

## 二、陈独秀主义之"改良"与"进化"

陈独秀主义不是忽然一下形成的，他的发展经过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大约可分为四个时期：一九二三年党的第三次大会之前后建立了他的孟什维克的路线之一般的理论基础；一九二六年三月事变前后以至武汉时期建立了他的机会主义的实际策略；武汉失败至六

次大会时，是他的动摇和消沉时期；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变后，进到公开的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总路线，由取消主义进到“资产阶级工党”之叛逆的社会民主党地位。

## 三、三次大会时代的陈独秀主义

首先看他在党的三次大会时期所形成的孟什维克路线之理论的基础。这一时期有他最典型的两篇文章：“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这两篇文章最能代表他的一般理论的立场和倾向。

假若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二年陈独秀看重过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那末，到一九二三年京汉路罢工失败后，他就跑到孟什维克的根本立场——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势力。他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主要分子，然亦只是主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来说，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展，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此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理想，略分三类：第一，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有许多目前虽是近代产业工人，而他过去未来的生活并未能与独立生产者（小手艺、小商人、小农等）的环境绝缘，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脱神权帝王之迷信……工人阶级的理想尤是宗法社会的而非国家的……。第二，只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只在最进步的海员及铁路工人罢工中才表现出来……。第三，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的阶级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斗争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也并不是少数。”（“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固然中国工人阶级不是没有缺点的，可是陈独秀经常的乐于从缺点方面来看中国工人阶级。他在三次大会的演说中，简直把中国工人阶级咒骂得不成东西。什么“宗法思想”呵！“不脱神权帝王迷信”呵！没有“国家觉悟”呵！他举了许许多多的琐碎事实来形容中国工人阶级之“穷极丑陋”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上面所引的文章，是在大会开幕后写的，语句口气已经比在大会争论时客气万倍了。他在大会中从中国工人阶级的落后、神权帝王迷信及没有国家觉悟的立场发出来的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拚命的肯定中国工人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之后，他就很骄傲的夸大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他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阶级固然一起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同上文）。又说：“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基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此文是大会前二星期写的）。他在大会的答辩中，热烈地辩护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主人。

他对于农民怎样呢？大会中的左翼曾提出工人阶级与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的理论与他对抗，这在他看来简直不值一笑，因为中国农民更是宗法观念、反动思想、神权帝王迷信、散漫不集中的“四不象”。大会闭会后，在他的论文中很客气的这样说：“农民

占中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下，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畏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引文见“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编者）

在他的革命势力的计算中始终没有农民。因为他看定了三个原因，农民难于加入革命。试看他所计划的民族革命联合战线：“中国的经济状况，军阀阶级已与资产阶级显然分开，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所以革命的资产阶级应当与革命的无产阶级妥协，打倒共同的敌对的军阀阶级……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当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引文见“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编者）在一切时候，陈独秀是把农民放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之外，他自始至终了解这联合战线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联合，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阶级合作和阶级妥协，在这革命联合战线中资产阶级是居领导地位，而无产阶级是附属的。

陈独秀怎样决定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呢？他说：“半殖民地的经济权大部分操诸外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诸本国贵族军阀之手，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引文见“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编者）

固然在党的六次大会以前，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全党都没有明确的观念，然而如象陈独秀始终不认识土地革命为中国革命之主要内容，始终不认识而且不愿认识工农民主独裁制，这对于他完全不是偶然的，他说：“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如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予算的可能，也并没有予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同上文）

那末，工人阶级为什么目的要加入这革命呢？他说：“殖民地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意义，就是对外要求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独立，对内则要求一般国民在政治上之自由。这种一般国民之政治自由，如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目前至急的需要。”（同上文）工人阶级参加革命的目的就仅仅在这里——不是为得争取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领导权，不是为得工农民权独裁制的胜利，更不在争得革命之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这种转变的观念在他是完全没有的。他同俄国的少数派一样，把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截然划分为两个不相连续的阶段，即现在既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工人阶级只有邦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他对于农民运动也就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他说：

“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

从以上所述，就可明显的看出陈独秀主义在第三次大会时期所形成之理论的基础，即：中国革命的工人运动中之少数派的路线，他对于革命动力的估量——重视资产阶级，

轻视无产阶级，而忽视农民；对于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妥协，无产阶级隶属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对于革命性质和前途的观念——看不见土地革命的内容，看不见工农民主独裁而更没有看见革命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只有“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待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将来再来社会革命。所以这些就确确实实形成了中国少数派的总路线。从他的“造国论”以至“汪陈宣言”以至中东路事变后的三封信，不过把这总路线“一言以蔽之”吧了！

为什么使他这样呢？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他自始至终是站在左翼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影响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既然自始至终是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所以不能了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而只能了解资产阶级的领导；不能了解土地革命，只能了解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不能了解工农民主独裁，而只能了解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和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造国论之精神）；不能了解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必然要转到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了解革命是仃留在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阶段之上，或完全跳过此阶段。

陈独秀在三次大会的立场既然如此。他当时发出些什么具体的口号呢？“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没有阶级斗争，只有民族斗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话！”“等待和国民党分家后，再组织共产党不迟！”……

三次大会闭会后，陈独秀和马林共同提议响应上海资产阶级的民治委员会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办法是请求国民党发宣言，而不用共产党名义发宣言。当时，我向他们抗议，才把这一个企图打消。难道现在陈独秀的取消主义和叛逆是没有历史的深远的来源？

## 四、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中陈独秀主义之实际的应用

一九二五年的革命高潮，推动中国党开始由知识分子的小团体变为工人群众的党。党在这一高潮中起了相当的组织的和领导的作用。这一高潮首先就是证明中国无产阶级之领导的能力与作用，打破陈独秀马林以至鲍罗廷等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势力之不相信和轻视。陈独秀在相当的短时期中，似乎多少变动了对于革命动力的机会主义观点。可是一到五卅末期——张学良出兵镇压上海工人、郭松龄事变及吴佩孚攻取河南之后，又使陈独秀对于工人阶级势力发生悲观，对于时局发生不正确的估量。他同魏金斯基立刻修改以前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政策，由此以至武汉时期就实行陈独秀主义之机会主义的实际政策。

第一，改变只要左派国民党的方针（坚决打击右派，消弱中派和强大在中共领导之下的左派），号召国民党右派合作，并送右派首领回广东，这是三月事变的主观原因之一。

第二，对三月事变完全采取无原则的退让政策，并实行乡村联合战线的机会主义策略，阻滞广东的土地革命。

第三，北伐开始后，即将独立的工人运动隶属于蒋介石所要挟的民族利益之下，实行阻止和削弱罢工运动的方针；同时扩大乡村联合战线的口号，去阻滞湖南高涨的土地革命。

第四，在上海工人三次暴动中实行“帮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工人阶级只要政治自由”的孟什维克策略。

第五，对于已经开始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代表蒋介石采取卑鄙的屈服退让政策。

第六，北伐出发，鲍罗廷同陈独秀完全把广东交于李济琛，盛行“以甲制乙以乙制甲”的小政客式的上层政策。

上面这些机会主义的实际策略，就规定了一九二七年四月间上海和广东之大失败。

现在再看武汉时期陈独秀主义之实际政策。这一时期，陈独秀主义与鲍罗廷主义混合起来，有名的西北学说的理论与实际成为陈独秀主义之变形发展。他的主要内容是：（一）回避帝国主义离开东南工业中心，接出冯玉祥同到西北去建立革命根据地；（二）停止土地革命，等打到北京后再说；（三）取消所谓工农运动的过火；（四）向小资产阶级让步；（五）承认国民党的领导权，共产党在政治上完全处于隶属地位；（六）完全向汪精卫、唐生智投降，自动的承认退出国民党和其政府，以换得共同打到南京去（详见我的“党的机会主义史”）。

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之断送于陈独秀主义及其变形的西北学说之手，难道还不显明？

## 五、“以退为进”

武汉失败后，陈独秀进到消沉与动摇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他不仅顽固的拒绝承认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且开始演进到取消主义和合法主义的阶段。一九二七年七月底，他向临时中央局提议：（一）把一切工会农会及政权机关转交于国民党左派；（二）我们在左派政权下进行下层群众日常工作；（三）暂时专做反帝运动，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以回避大的牺牲和破坏，这就是他的“保全”自己势力的方法——取消主义合法主义。

以为资产阶级完全胜利了，革命完全没有了。现在要紧的只是怎样回避牺牲保全势力——这就是陈独秀主义发展到取消主义的根本精神。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时，他提出下列主张：（一）苏维埃口号现在不宜采用；（二）农民运动应在四不主义（不缴租、不完粮、不纳税、不还债等）的限度下进行；（三）中国共产党不能一党包办革命，如谭平山等仍应与之党外合作。

这一取消主义的“温和”纲领，难道不是中国孟什维克路线之继续向前发展？

## 六、陈独秀主义之完成——从少数主义到取消主义

陈独秀拒绝出席党的六次大会，违抗两年以来共产国际的电召，他只是口口声声说，共产国际“牺牲了我和平山”。然则他向那方面走呢？早就看得明白：他非走到反革命的营垒不可。南京政府向苏联进攻的冒险事业，就成了他的最后的转变。他向中央进攻的三封信，不外是“资产阶级工党”的大纲。

他对中东路事变的态度根本是站在资产阶级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观点上，绝对的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观点相反。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他自来就是带着资产阶级国家主义

的影响跑到中国共产党内来，现在仍然不得不带着这付本来面目跑出中国党的队伍之外去，所以他不关心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祖国之被攻，而且只关心于国民党强盗统治的中国之变为塞尔维亚第二。他们的主要借口是："此时中国大多数民众尚在眼前的具体的民族利益蒙蔽之下，不能懂得拥护苏联的口号"。他所谓大多数民众自然是把工人与资产阶级混在一起。经过长期激烈的阶级血战之后的中国工人阶级，在陈独秀看来还是这样落后，这样不能了解拥护苏联的口号，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在一九二三年认定中国工人"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没有国家的觉悟"，现在经过七年以上的斗争，中国工人已有了"国家的觉悟"即在民族利益的蒙蔽之下，拿这个和一九二三年他所说的中国工人对照起来已经是大进步了！陈独秀先生！你不是没有进步的呵，拿你的进步，与你所想象的中国工人的落后或进步去比较：你是进步得更远了！中国工人只领导中国革命进到苏维埃阶段，而你却领导孟什维克主义进到资产阶级工党：进到公开反革命！陈独秀先生，你不必拚命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口号"罢，你自己的"反对误国政策"，就是你们自己的阶级口号，改组派同你们一样的采用此口号！

陈独秀对于革命失败后的政权性质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这完全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他自始至终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一切阶级关系都用资产阶级做中心来决定。看他怎样说一九二七年的事变：

"这一种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势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和邦助，加增了他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的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对立地位之过程中变成残余之残余！为自存计，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就是说不得不下全力争取城市工商业的经济势力，做他们各个区域内的统治基础。"……这"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他所看到的主要的只是"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和邦助"，"封建残余受了最后打击，……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他绝对不会梦想到由这一转变中国革命进到苏维埃阶段，资产阶级投降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无产阶级取得了中国之唯一领导地位。这些小事情，在他是不会梦见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中国革命的图表素来就是这样预定的：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下，发展资本主义，再来做社会主义革命。

所以现在陈独秀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完全过渡到托洛茨基主义，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是由蒋介石所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完成了，封建势力不存在了，帝国主义让步了，现在所有的事情只是等待提高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以后再来干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不要了，以后直截了当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共同立场。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口号，自来在陈独秀脑中就没有设想过，直到现在依然不能设想。因为他所能设想的，只是既然叫做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那末一定是资产阶级胜利，建立资产阶级政权，那里会有什么工农专政这回事。中国资产阶级从一九二七年以来已经胜利了，已经"形成了自己为中心领导的统治者，并且已实现了这样的统治，就是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再则反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在陈独秀看来简直不可了解，他至死也不会了解，因为这与他素来所设想的相去太远了。他素来

设想的革命主要动力是资产阶级，若失了资产阶级这革命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然则现在革命动力既然把资产阶级除外，而革命任务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这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什么？

所以陈独秀和托洛茨基接着就提出"国民会议"做目前政治任务的中心口号与中国共产党工农民主独裁和苏维埃口号相对抗。陈独秀自来就不赞成采用苏维埃口号。托洛茨基咒骂在武汉失败后，采取此口号是犯了罪恶。不是别的，只是因为他们认为蒋介石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现在所应有的任务只是召集国民会议来做议会行动，合法运动，及"取得一些自由"罢了。这不是新的，仍是发展他一九二七年七月底的取消主义的大纲。

在这样的取消主义之下，他们自然要拚命否认中国革命高潮，用反对"盲动主义"来做阻止与破坏高潮的借口。陈独秀曲解列宁两个波涛间的话来掩饰自己的取消主义，其实他在武汉失败时就宣言革命在很近的将来很难再起。从他看来中国的事变似乎已经证实了他与彭述之的革命阶段论：现在是南京政府稳定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长的历史时期，现在所有军阀战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发展的过程。托洛茨基在一九二八年就预言蒋介石制度的稳定。国民会议的口号就是建立在他所估量的中国革命低潮上面。

陈独秀把自己装做是革命势力"保全者"，极力咒骂八七以来共产国际与中共新的政策如何牺牲了干部、如何丧失了革命势力，那么我们首先看他在武汉政变时用什么政策"保全"革命势力：他同鲍罗廷规定投降的政策来"保全"革命势力——自动退出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把一切革命领导权政权工农组织交给国民党左派，用"适合工商业利益的政纲"同汪唐共同打到南京去。上帝呵！假若此时没有共产国际坚决的出来打碎你们这一"保全"革命势力的投降政策，还有今日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党吗？还能取得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之唯一的领导地位么？你们自命为革命势力的"保全"者和反对盲动主义的英雄，实际你们只是可耻的投降者，顽固的叛徒。再看你们七月会议的大纲、十一月的大纲（一九二七）以至中东路事变后的大纲，难道你们革命势力的"保全"者之假面具还不显明么？

## 七、陈独秀怎样在"理论"上进攻革命

陈独秀现在全身投到托洛茨基的怀里，用托洛茨基的旗帜来维护他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来破坏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来进攻共产国际。他无耻的宣言他的错误是在所谓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领导之下做出来的，他宣言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及工农民主独裁，而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是盲动主义的策略。他咒骂现在工农革命的高潮为"土匪式的扰乱"，侵犯了资产阶级的"胜利"与"稳定"，使他们国民会议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计划遭遇困难。他不要脸的诬蔑"国际的指导却在当进攻的时候教中国党投降，当退守的时候教中国党胡乱的拼命。"他认为一切罢工斗争、街头示威、游击战争都是盲动主义，都是土匪式的扰乱，他不仅咒骂中国党的领导机关为官僚主义，他更咒骂"国际的领导站在官僚主义的路线上"。

还在武汉失败时陈独秀同鲍罗廷就说"如果说中国党是犯了机会主义，那末，根本这

机会主义就是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国际教我们的，国际教我们加入国民党，教我们邦助蒋介石。”照陈独秀的见解，加入国民党就是“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是鬼话”。这样叛徒的思想难道是一九二三年国际教你们的？断送上海暴动的胜利，对蒋介石卑鄙让步与幻想，隶属工人阶级于民族资产阶级之下，仃止土地革命，取消工农运动的“过火”，以至向汪唐投降……难道这些是国际教你们的？现在你们的假面具要算完全揭穿出来了：你们根本否认工农民主独裁的路线，认定机会主义的路线，因为这一路线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反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路线，是要建立苏维埃的中国，保证他迅速的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这完全违犯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陈独秀主义之资产阶级的立场，所以陈独秀同蒋介石汪精卫一模一样的咒骂“共产国际破坏中国革命”。

## 八、陈独秀主义的康庄大道——社会法西斯蒂

中国革命运动中之有少数派路线和半少数派路线——托洛茨基主义——现在也如俄国一样的：假如托洛茨基主义在俄国革命中表面上能维持一种与布尔什维克对立的第三种路线和第三种派别，那么在中国他（托洛茨基主义）一开始便与取消主义的陈独秀主义完全混同，以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路线相对抗。这完全是自然的，因为一九二八年以后的托洛茨基主义已经从半孟什维克的性质完全进到反革命，所以现在托洛茨基派与陈独秀派在中国所进行的不止是“八月联盟”，而且立即进到“资产阶级工党”的地位。这不是偶然的，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现在中国比“八月联盟”时的俄国，阶级斗争剧烈与革命复兴的状况要不同些。现在的中国（一九二七年以来）的阶级斗争这样的剧烈，与托洛茨基主义混合的陈独秀主义以及托洛茨基主义的本身必然迅速进到社会法西斯蒂主义。陈独秀派马玉夫等在上海工人斗争中的工贼行为就表征了这一社会法西斯蒂的前途——不是远的将来的前途，而且目前的非常之近的前途。

这一社会法西斯主义必然成为民族法西斯主义的补充和助手。

所以对于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任务之一。对于这种斗争的丝毫犹疑或调和态度就是邦助了反革命。

## 九、陈独秀主义与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有“区别”么？

对陈独秀主义的性质阶级基础以及其前途之不正确的了解，就要弄弱对于他们的斗争。比如鲍罗廷在讨论陈独秀主义时（在莫斯科中国科学研究院）开口便说：“陈独秀主义与西欧的孟什维克主义有区别么？我以为在业已走到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欧洲孟什维克主义，与中国的孟什维克主义之间是有区别的。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说他同欧洲的孟什维克是一样的——这是不正确的。这个意义就是我们承认在中国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而资产阶级已站在政权上，孟什维克已在中国起社会法西斯蒂主义的作用。不能断定中国孟什维克主义走到欧洲社会法西斯主义，因为中国革命的道路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是必不可免的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所以说不上中国有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所以陈独秀与他的派别即中国少数派完全不要妄想他们与其欧洲兄弟——即帝国主义

国家孟什维克起同样的作用，换过说，中国孟什维克没有任何前途?

又有一个同志用书面这样的写着："假如我们现在再提出一个问题：陈独秀主义代表什么东西，他的社会基础怎样？那么我们明白做出一种回答，以为陈独秀代表将来的中国社会民主党——这是不正确的。社会民主党有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倾向，有工人贵族做基础，而且只有在财政资本和剩余赢利发达的地方才有地位。以为陈独秀和他的派别会成为中国社会民主党那就会错误，因为要做出这样的结论就须要设想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即开始第二个资本主义时代。照我的意见他的社会基础就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是自己的社会地位与中国资产阶级，一部分买办资产阶级有关系的自由职业者学生等，另方面没有脱离半封建地主的关系。"

上面的见解可以说是补充鲍罗廷的。他们做出陈独秀主义与欧洲孟什维克主义的区别，在陈独秀主义不会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主要理由是中国不是财政资本的国家，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工人贵族等等。这种不正确的区别和否认，不仅是建立在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机械的对照上面，而且建立对于中国阶级关系之不正确的了解上面。所以对陈独秀主义的性质作用及其阶级基础就发生不正确的估量。

陈独秀主义在他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铁一般的证明是在中国工人运动内来执行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影响。无论陈独秀及其派别的个人大都是由上面所引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但当我们要正确的判断陈独秀主义的性质、作用及其代表的阶级基础时，我们就不得不：一方面指出他是在中国工人运动内来执行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另方面指出他是代表中国式的贵族工人（工头及少数的高等熟练工人等）及一部分被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影响包围的落后工人。不指出这两点就不能正确的了解陈独秀主义的性质及作用，也就不能正确的了解陈独秀派与改组派及其他资产阶级派别的区别，和他（陈独秀主义）的危险之更大。

陈独秀主义代表中国式的贵族工人和被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故自来就看不起中国的工人阶级的努力，而欲把工人阶级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之下。陈独秀主义和欧洲孟什维克主义在一切根本问题上——如阶级关系，革命动力之不正确的了解（崇拜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与农民），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及政权性质等等没有任何区别；在工人阶级内来执行资产阶级的影响更没有任何区别；在代表贵族工人和被资产阶级影响包围的落后工人的一点上也找不出严格的区别。毫无疑义的现在陈独秀主义是隶属于民族改良主义下的社会改良主义（如四不主义、限制工人运动于部分的斗争而反对工人的政治进攻、国民会议等等）。所以中国的孟什维克主义也如西欧一样，必然要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而且正在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否认陈独秀主义之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前途，就等于否认陈独秀主义之孟什维克的性质。如果要在他们之间找区别，只能说中国孟什维克主义转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速度比欧洲的特别快些。因为在中国发展社会改良主义至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条件远不如西欧之具备，如果这一转变在欧洲经过一个长时期的过程，而在中国这一过程却是非常之迅速的。这不仅由于中国是殖民地的国家不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资本主义的发展相比较，而且也是由于世界革命时期，尤其是中国阶级斗争特别剧烈，不能容许中国资产阶级工党如欧洲社会民主党一样经过一很长的发展时期才转变到社会法西斯主义阶段，只有在这样的观点上，不能笼统的说陈独秀派完全同欧洲社会民主党一样，因为他的命运特别

短促和不固定，他的发育特别困难。

以为指出陈独秀主义必然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就是设想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这样机械的可笑论证，完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鲍罗廷主义近年以来显然趋向于完全否认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他把民族资产阶级通看为买办资产阶级。鲍罗廷主义对于中国的阶级关系又复活了彭述之主义的"新"解释。

鲍罗廷主义否认陈独秀主义之必然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这对于中国党与陈独秀主义的斗争是很有害的。鲍罗廷主义是陈独秀主义的兄弟。这一否认的意义就是辩护陈独秀主义。

## 十、陈独秀主义的诸友军

对于陈独秀主义之狭义的不正确的了解也是很有害的，以为陈独秀主义就是陈独秀个人和其团体而与其他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以至现在还隐藏在党内各种不正确的倾向没有思想上路线上的联系。所以为要充分的制胜党内右倾的危险，现在主要的危险，必须充分的了解陈独秀主义为中国革命中之孟什维克路线与各种已发生，以及正在发生的机会主义与倾向有密切的思想上的关系。我们单从陈独秀的本身还不能充分了解陈独秀主义，纵然陈独秀自己在机会主义的理论方面和实际方面已做出整个的系统（如以上所述的）。我们必须更从中国革命中之已发生的各种机会主义派别，来观察这一孟什维克的路线与系统。

首先来看戴季陶主义。他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换句话说，以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最高原则，把工人阶级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之下；拚命的反对阶级斗争，也无异是发挥一九二三年陈独秀"只有民族斗争，没有阶级斗争"的原则。假若陈独秀主义在五卅高潮时曾反对过戴季陶主义。那末从五卅末期和三月事变开始，陈独秀主义在客观上就成为在中国工人运动中之戴季陶主义的执行者——把工人阶级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之下。一直到中东路事变陈独秀提出的"反对误国政策"的口号还是隶属于戴季陶的最高原则之下。

再看彭述之主义，彭述之主义的特质就在用左的浮词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来邦助陈独秀主义进行把工人阶级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口头上很漂亮的叫"天然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实际上把革命领导权奉送于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彭述之主义的邦助，陈独秀主义在党内之宗法的统治与党外实际机会主义的政策的发展不能那样顺利。

再看谭平山主义，他在戴季陶的最高原则之下宣布"中国革命要得真正的成功，一定要以广大的劳苦平民为中心，联合一切被压迫的民族，构成民族阶级与帝国主义作整个斗争才能实现。故中国革命充满了阶级性，就是说中国革命的斗争，就是一种阶级斗争，就是无产者国家与有产者国家的斗争。"谭平山的民族阶级和无产者国家，可谓把戴季陶的最高原则发挥尽致了。谭平山比戴季陶聪明些，他不反对阶级斗争，只把阶级斗争翻译成为"被侵略的无产者民族与侵略的有产者一种剧烈的阶级斗争。"陈独秀比谭平山又聪明些，他现在所性用托洛茨基主义来防护中国不变为塞尔维亚第二。

# 十一、鲍罗廷主义

最后不能不说到陈独秀主义一个重要的伴侣——鲍罗廷主义。武汉时期鲍罗廷主义与陈独秀主义混合为一个东西，此处不用赘说。现在所说的，只是一九二七年后，鲍罗廷关于中国问题最近的见解和态度。

在讨论陈独秀主义时（在中国科学研究院），鲍罗廷宣言他在中国革命中的错误，在于他与陈独秀之间发生了重大不同的政见，而他没有把这不同的政见引到公开斗争；他宣言当时有广东路线与上海路线的对抗；他的结论是：假若他的路线与陈独秀的路线引起公开斗争，那就不会有武汉时期那样的失败。

不是一九二七年以后生长的人，大约不会相信鲍罗廷的话是真实的罢！然而不然，竟有同志公开出席替他辩护。可见鲍罗廷主义在我们党的队伍中直到现在不是没有保留重大的影响和残余。这一残余保留在党内终于有复活陈独秀主义的危险。所以在反陈独秀主义的斗争中决不能把鲍罗廷主义除外。

鲍罗廷在中国革命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假若说陈独秀是中国的蒲兰德尔，那末，鲍罗廷就是中国的拉狄克。所以他对于我们党内同志的影响不是不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看他对于中国阶级关系的新见解：

“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相互关系可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当时垄断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经纪地位的，是以皇帝为首的高等官僚贵族……。第二个时期，……即你们所知道的买办阶级……。最后第三个，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时期，这一个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已在排挤第二时期的中间人，排挤买办阶级而开始与帝国主义发生各种相互关系”。

“……资产阶级企图废除不平等条约，不外是企图在中国创造一种条件，在这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更能密切与帝国主义联系。不仅在各大商埠条约上给他与帝国主义联系的可能，而且在全中国。换说一句即为帝国主义肃清在中国道路上一切的障碍，实现买办性质于新形式中，在新环境中，于极广大的范围中。”这在鲍罗廷主义的信徒看来，要算是极革命的极响亮的高调了。看他的下文说些什么呢：

“讲到这一点还必须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全完是另外一个程序的资产阶级，就是这样的资产阶级：他要把中国工业化的大道上的障碍物扫除，准备同国内的封建势力以及与封建势力勾结的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然而我们所看到的全完是另一种性质的资产阶级。”

“当我们说到民族资产阶级还极弱时，我们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不是企图垄断中国与帝国主义间之经纪地位的资产阶级，而是有点工业资产阶级倾向的民族资产阶级，那末我们就应当说这种资产阶级现在还不能引导中国到工业发展的道路上去，因为这种资产阶级现在还极弱。”

原来鲍罗廷主义把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同化之后，还保留一“不企图垄断中国与帝国主义间之经纪地位，准备同国内封建势力及与封建势力勾结的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极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还极弱，还不晓得把中国引到工业发展的道路上去。而其将来怎样呢？这点他虽没有明说，但读者不难从他的观点做出结论，就是从鲍罗廷主义的中国阶级关系的观点非走到复活“民族资产阶级还有革命作用”的机会主义

不止。

鲍罗廷接着上文就来估量无产阶级：

“这种资产阶级在中国现在是极弱的。由此就可明了中国无产阶级也充分的弱，数量太少，他的年龄，总共不过几岁。他的基本群众不在中国内地，而在租界，全完与中国隔离的香港一类的地方。在香港、上海、天津和汉口你们有工业无产阶级基本群众，而在中国其他各地，工业无产阶级在真正的字义上是很少的。”

鲍罗廷新的“租界无产阶级论”的论证仍然回复到自己老的西北主义的结论，就是远居上海、香港等租界之中国无产阶级很难领导中国的农民，中国革命很难凭靠大城市的领导。所以在反动统治下，职工运动的工作没有什么前途，唯一重要的是农民游击战争。中国全体共产党都要加入游击战争，如欧洲共产党全体参加工会工作一样。鲍罗廷主义的根本精神，自始至终，如陈独秀主义一样，怀疑与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鲍罗廷主义不仅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有领导农民，领导革命的能力，而且根本不相信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有用自己的力量完成中国革命之可能。他说：“中国无产阶级的缺点，在数量上，年龄幼维上及其他方面，这些缺点之百倍的补偿，就在不能把中国革命，中国无产阶级从其他世界分开。假若拿中国无产阶级从印度无产阶级，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特别苏联的无产阶级分离起来，那末，自然不待说对于指导基本联盟的农民他要遭受莫大的困难。假若中国无产阶级是分离的，那末就很可怀疑到他是否能成就摆在他前面的伟大任务，即关于指导农民与封建残余斗争，与帝国主义斗争等等。但假若拿他与印度无产阶级，各国无产阶级，特别苏联无产阶级共同来看，那末中国无产阶级之必不可免的历史的缺点就百倍的补偿起来了。从这些的观点看来，中国无产阶级较强于中国资产阶级。”

这是多么漂亮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呵！托洛茨基不相信俄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有用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之可能，鲍罗廷却比较更进一步不相信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有用自己的力量成就中国革命之可能。

中国革命之社会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之必须依靠先进国无产阶级的邦助，尤其苏联的邦助，这是毫无问题的，中国革命之需要国际无产阶级帮助也是毫无问题的。可是照鲍罗廷的观点，就全完是不对的。从列宁主义的观点，中国革命不仅有自己的充分的力量，而且他能促进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以及东方各殖民地革命；中国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强有力的理由，不仅在于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的观点上，而尤其在中国内部阶级势力之对比上。鲍罗廷主义全完与列宁主义相反，从他自己的阶级关系的分析，他断定中国无产阶级比中国资产阶级更弱些，只有在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的观点上中国无产阶级较强于资产阶级。所以他把中国革命的命运完全建立在国际无产阶级的依赖之上。

鲍罗廷主义的信徒以为鲍罗廷同陈独秀“根本不同”的地方就在鲍极看重农民势力，着重游击战争；纵然他在武汉时期与陈独秀共同阻止了土地革命，而现在他却与陈独秀“根本”相反，他“异常”看重土地革命。现在来看他对于农民问题的政见！

“现在说到农民方面。与农民的关系的问题，必须指出下列的根本要点：一、是不是真的在中国乡村中已发生这样的阶级变迁，其结果已使富农分化，而这富农已同着资产阶级组成南京的政权，所以需要与富农斗争。我不否认中国乡村有富裕的农民之存在。但是应当说明富农是什么，其意义就不能如我们（指苏联——森注）所了解的一样，不能搬运

革命以后的我们所有的富农观念到在革命以前的中国所有富农的观念上去。这个不是一样的富农。说到中国农村，那就必然须要一个全体农民的共同民主的战线去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军阀制度反对一切封建基础的上层建筑，反对帝国主义等等（以下大大地引证列宁——森注）。土地革命在中国只有凭靠在中国农村的统一战线上才有可能。”

此外关于国际状况，他做了以下的肯定：“无论怎样还没有牢不可破的论证，证明在最近的将来，在太平洋上美与英日就发生武装冲突。美在中国将采取最谨慎的政策。”

上面一切的话都是从鲍罗廷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日之“中国革命的前途”有名的大报告中引出来的。这是新的变态中的机会主义的大系统，是西北主义之继续发展：在中国革命的一切的根本问题上——阶级关系无产阶级领导权对农民的策略及革命前途等——是与共产国际和列宁主义的路线不能并存的。假若拿了现在的鲍罗廷主义与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九年以及一九二三年的一切机会主义去对照，便可看出中国革命中孟什维克路线之一贯的线索。这一路线的中心点，是在对于资产阶级的态度和对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统一战线之孟什维克的了解从隶属无产阶级于资产阶级（武汉时期以前），做小资产阶级上层领袖的尾巴（武汉时期），以至联合富农。假若陈独秀在一九二九年用托洛茨基观点来攻击中共中央之业已改正的联合富农的错误，那末鲍罗廷在同年就企图恢复以前乡村联合战线的机会主义策略与谭平山的“民族阶级”和统一战线的理论内外相应。由此不难推想：假若中国共产党真正执行反富农路线到底时，陈独秀主义便会同鲍罗廷主义一样暴露其代表富农的真面目。

## 十二、彻底肃清陈独秀主义的影响

陈独秀主义一直到今有他的三个不可分离的机会主义同盟：即彭述之主义、鲍罗廷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彭述之主义早已丧失其独立的影响，因为一方面他早已熔化于陈独秀主义，另方面鲍罗廷主义已摄取了他的精神。所以现在托洛茨基主义和鲍罗廷主义实成为陈独秀主义之左右手。假若陈独秀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共同点在忽视土地革命，忽视农民为革命的动力及不了解工农民主专政；那末陈独秀主义与鲍罗廷主义的共同点就在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势力与领导，轻视中国革命之内部的阶级力量，及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解为隶属于资产阶级——自民族资产阶级以至乡村资产阶级的通常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以与陈独秀主义的坚决斗争，同时就要来打击他的左右手——托洛茨基主义和鲍罗廷主义。

公开的陈独秀派和托洛茨基派在表面上现在虽然已驱逐于党外了，但他暗藏在党内的影响特别是他的友军鲍罗廷主义的影响还很严重。不少的可爱同志在思想上还不能完全从他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如对于富农、对于阶级关系、职工运动和游击战争之不正确的了解等）。这样的现象在反陈独秀主义的斗争中决不应当忽视。为要彻底肃清陈独秀主义在党内的残余，就要求这些同志在以后能自觉的与陈独秀主义的同盟者鲍罗廷主义在思想上完全脱离关系。不然，党就应该作不客气的斗争。

## 十三、结论：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

与陈独秀主义斗争的任务，尤其要执行于一切实际工作，群众工作，党的生活及一切

目前所发现的各种各样的不正确倾向的斗争之中，一切尾巴主义、黄色倾向、失败情绪、合法主义、和平发展倾向、党内调和倾向、盲动情绪、保守观念、极端民主化等等，如若任其发展都可变成陈独秀主义的支流。随时随地制胜这些倾向，其意义就是制胜陈独秀主义。中国革命中和我们党中的危险现在主要的是右倾的危险。譬如富农路线的错误，在上级指导机关，虽然改正，但在实际工作上和在下级党部中，严格的说，还是没有改正过来，有些地方还正在发展。反对农民分土地，固然是富农路线，同时就是在分土地之中也发现了富农路线——如闽西分土地定出以生产工具及资本为标准，显然的是富农路线；同时在闽西苏维埃区域中：不要增加工人工资”之不正确的提议也开始发现。

为要制胜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首先要求对于革命的性质、目前阶级关系的变迁及革命发展的形势有正确的了解和估计，对于这些主要问题的丝毫错误都是邦助了陈独秀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帮助陈独秀主义跳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夸大资产阶级，看不见封建残余势力，因此全完忽视土地革命，而事实上是企图帮助资产阶级来建立他们所梦想的“稳定”去实行国民会议制度；鲍罗廷主义帮助陈独秀主义仃留于他所了解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阶段，夸大封建势力，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企图贯彻把中国革命隶属于资产阶级利益之下的路线，即把以前隶属于城市资产阶级的路线变成隶属于乡村资产阶级的路线。这一孟什维克路线的危险在目前是非常之有害而带现实性的主要危险。陈独秀的根本立场，就是要利用托洛茨基主义的遮饰来实现这一孟什维克的路线。在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鲍罗廷主义，两者都绝对没有目前阶级关系和革命任务的正确观念，尤其两者都绝对没有革命的转变的观念——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有些同志在反对陈独秀主义的过程中，常常发现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观念，或鲍罗廷主义的错误观点，尤其是后者占多数。常常有人把反对富农的路线与反对地主的路线对立起来，常常不了解在中国土地革命中之反富农是同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之反资产阶级的总路线是一致的；常常有人过于夸大封建势力而完全否认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因此，又隐隐的发现复活以前的两个革命阶段论的倾向而完全忽视革命转变的观点。这些都证明右倾是中国共产党目前之主要的危险之表征。他们不能正确的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及过程。当他们“严格的”区别革命的性质及任务时，便连革命的过程——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时，也把他完全划成鸿沟，以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有一道“万里长城”（陈独秀主义和鲍罗廷主义就是这样看法）；或完全跳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而不自觉的堕落到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这种“左”的错误实际是帮助了陈独秀主义。

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是长的过程，但有快的速度之可能，因为他具有很优越的转变的条件——国际的和国内的。国内的条件，如一九二七年以来，无产阶级取得了中国之唯一的革命领导权；土地革命的深入和苏维埃区域之建立，无地的贫农、雇农、苦力以及地少的中农占乡村人口之绝对多数；城市大工业具有相当的经济前提（此前提在工农民主专政的过程中更会大大的加强）；最后尤其是中国革命之反帝国主义的特性，和反资产阶级的特性——自城市资产阶级以至乡村资产阶级。中国农民基本群众已在而且正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反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国际的条

件，如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之大工业化与农村的集体化之异常迅速的发展，欧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及印度等殖民地民族革命之高涨，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资本主义的“稳定”不仅剧烈动摇而且开始崩溃。这些条件对于中国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都有决定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应坚决的明确的站在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上，来执行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的任务，同时准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转变到会社主义革命的社会前提。他丝毫不为企图跳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左”的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所动摇。同时，更丝毫不为企图仃留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右”的机会主义鲍罗廷主义所动摇。他一定要彻底的克服陈独秀主义及其左右手的托洛茨基主义和鲍罗廷主义；他一定要领导现在的革命高潮迅速进到直接革命形势，推翻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中国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由工农民主独裁转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独裁制。

打倒陈独秀主义及其左右手——托洛茨基主义和鲍罗廷主义！

全体党员站到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路线上来！

# 党的机会主义史*

蔡和森

## 六 五次大会

国际决议不是第三国际的指导者机械的搬运俄国革命的方式到中国来，更不是由他们的主观决定要中国实行土地革命，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本身发展到了这样实际阶段，即农民自行没收土地，工人自行趋向工会专政，苦力店员起来推翻劳资关系，妇孺起来反叛一切旧制度。所以国际决议既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也不是从脑袋想出的。认国际决议是“超乎中国实际情形”的新方针是不对的。

五次大会主要的任务便是接受国际决议，改正过去一切机会主义的政策，及根本的错误观念。所有五次大会一切决议案的精神都是根据国际决议的。所以五次大会的本身是正确的。如不承认五次大会的本身是正确，便是不承认国际决议是正确。

后来罗亦农、彭述之要将五次大会后失败的责任归于五次大会的本身，这是一种可耻的企图。他们主要的理论点是：“五次大会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空气。”现在罗亦农、彭述之皆以曾在五次大会中反对过小资产阶级的空气自雄！彭述之并指和森为此空气之一人。其实这是很可笑的；当时的实际情形本来是这样：

（一）五次大会接受国际的指示，肯定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和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制是正确的。注意取得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也是对的。因为小资产阶级最广大的群众是稍有田产的自耕农、手工匠、店员及小商人等。中国是这类小资产阶级群众占多数的国家。这类小资产阶级下层的广大的群众，在革命中及革命后都是应相当注意的。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原则是无可非难的，问题只在领导的政策和态度。俄国也是小资产阶级最多的国家，如多数派在俄国革命中及十月革命后对于领导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及态度，始终是正确的，无可非难的。所以五次大会于坚决的抛弃资产阶级之时，同时又决定有取得小资产阶级领导之必要，这完全是对的。

（二）五次大会只决定必须取得小资产阶级领导权之原则，并未决定领导的具体政策。

（三）上海机会主义的主要负责人，在五次大会中并未抛弃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根本观念。关于这点，独秀同志有正面的不文饰的表示；而亦农与述之则用声东击西的伎俩，从侧面来反对五次大会完全与资产阶级决裂的政策，所以他俩在会中夸张的说了一些小资产阶级的危险。当时和森的答词大意是：“我们与小资产阶级合作不是没有危险的，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但是现在在五次大会中不应象述之同志把此危险夸张的太厉害了，因为现在当前的主要的危险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危险还是将来一点的事。如果现在把

* 此文前缺，所以从（六）五次大会开始。——编者

小资产阶级的危险夸张得过甚便是教我们仍然回复到与资产阶级联盟的老政策呵！”述之及亦农同志要于无形中拉回五次大会继续走他们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旧路，和森公开的揭破了他们的假面具。

（四）要判明和森同志是否是“小资产阶级空气”的罪人，最好去审查和森在五次大会中的演说（当时有印刷的演说稿）。在和森发表关于国际决议的演说中，有一段是关于小资产阶级的，其大意是：首先引证法国大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之不能领导，因为他一见革命发展到最高度时，便畏缩向后退，以致法国大革命失败；俄国亦然，二月革命本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少数派和革命社会党）领导的，但一见工农的高潮起来，即畏缩而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妥协，以致二月革命破产；最后指明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之动摇，坚决的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而能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应采取坚决的领导态度而不应尾随他们的动摇、犹疑，做他们的尾巴。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现在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如若不然，我们的革命也将如法国及俄国二月革命一样的破产。这个演说的末段，特别指出一种“和平转变”的幻想，以为由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及工农小资产阶级政权，可以和平的转变到社会革命，可以不用无产阶级自己的争斗方法，可以到社会革命，和森坚决说明我们现在虽然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合作，但我们不要忘记其中还保留有资产阶级及地主的份子（指孙科、谭延闿等），这些份子是随时可举行三月二十及四月十二的大屠杀对付我们的；既是富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店主、厂主等）亦时有武装暴动反对我们之可能。这个演说，现在还有五次大会的记录保存着。

由以上所引当时之实际情况看来，可见五次大会并无所谓“充满小资产阶级的空气”，只有当两湖失败时跑来北方宣传党的政策“过左”、“只顾工农利益，不顾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彭述之先生才真是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空气！

然则五次大会没有缺点么？有缺点：没有执行政治纪律，没有解决党的组织问题，没有征服机会主义首领的根本观念和思想。因此让机会主义继续其生命与发展。

## 七　五次大会前后新机会主义的来源

上年四月中，我从莫斯科回到武汉，首先撞着一个问题便是第二期北伐的问题。新国际代表鲁易同志一到武汉即与鲍罗廷同志政见冲突。鲍主张立即无条件实行第二期北伐；土地革命待打到北京后再实行。鲁易反对此主张，以为现在革命应深入，应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巩固既得之革命根据地。于是有所谓深入广出之争。鲁易主张先深入然后广出，老鲍主张先广出然后深入。鲁易在五次大会对老鲍的主张取了一个总名称，叫“西北学说”。西北学说的要点大略如下：

（1）帝国主义在东南的势力太大，谁到东南不是投降便是失败，远如太平天国，近如我们的四月十二及蒋介石之投降，所以东南不是革命的根据地。

（2）西北帝国主义的势力薄弱，且又接近苏俄，故可为革命根据地。

（3）东南是中国资产阶级势力的中心，蒋介石与我们正式决裂之后，对于武汉经济封锁，商业停止，汇兑不通，食料燃料日见恐慌，如不迅速北伐跑西北，即使蒋介石不打

来，不到几星期，武汉政府在经济上也要自溃自倒。

（4）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迫在眉睫，河中卅几条兵舰已卸炮衣，水兵陆战队日有上岸之谣，外商尽行关门停业，牵着离开武汉……。若不迅速北伐，没有出路。

（5）现在中国国际状况不如俄国一九一八时代，彼时大战初了，资本主义国家破坏不堪，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牵制并反对武装干涉。若不早为之所行见我们一切皆要失掉，所谓巩固既得根据地，深入土地革命只是句空话。

（6）此时小资产阶级国民党领袖们对于经济封锁，武装干涉，社会普遍的不安与动摇正在忧惶万分，怎能再强迫其实行土地革命？如此只有使国民党离开我们，使左派与蒋介石妥协而与我们分裂。

（7）唐生智靠不住了，非迅速北伐接出冯玉祥出来牵制他不可。同冯玉祥到西北去可以开一新局面。

（8）所以现在革命只有广出，土地革命只有打到北京后再实行。“北伐”可给忧惶无措的小资产阶级首领一个很好的希望与出路，他们必乐意跟着我们走这条路，这样才算是我们领导他们。

由上看来，西北学说实际是一种“逃跑主义”。其中充满了对于自己势力的悲观和对于敌人势力的恐怖，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利用军阀以制军阀的老政策。他对于世界革命是悲观的，过于估量资本主义稳定的势力，而完全不相信国际无产阶级能援助中国革命。他对于中国革命是悲观的，过于估量东南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势力，不相信东南无产阶级的势力，认东南无产阶级势力也如太平天国或蒋介石一样不是失败便是投降，不是投降便是失败。上海四月十二的失败，更坚固了他的这一“定命论”。

西北学说到讨论第二期北伐时才显著，然在此之前，这种思想已影响了实际政策，这便是指对于北伐出发后的广东及东南的态度。北伐出发后，我们在广东的势力并不劣于李济琛。老鲍不于此时企图巩固广东于我们自己的势力之下，反而把广东巩固于李济琛的势力之下，帮助李济琛大大扩充省防军。本来是一个老虎还要为他添一对翅甲！说是要利用李济琛在后防发展势力以牵制前方的蒋介石。为甚么这样糊涂？因为他脑袋里有一种西北学说，认为广东不可为革命根据地。其次是对于蒋介石经营东南的态度完全是放任的，因为他初以为蒋介石到东南不是失败便是投降，横竖东南不可为革命根据地，让他去锐意经营罢。南京本不是蒋介石自己的军队打下的，乃是南京下后，武汉对于自己的军队半点也没有指导，二六军负责工作的同志从南京跑回请方针，而同时二六军已被何应钦解决了。所以广东与南京的失败，西北学说实负了责任。（西北学说的根源，胚胎于越飞及马林在中国之时。彼时马林等认广东在香港炮口之下，不能为革命根据地，应拉孙中山到西北去才能与苏俄接近。故马林反对和森在向导周报七期主张孙中山回粤恢复革命根据地的文章。东江之役，苏俄同志在粤者又有同样倾向，老鲍主张孙中山北上，与此倾向有直接关系。）

然此时所有在武汉的负责同志，对于此西北学说全未知觉，因为老鲍与鲁易激烈的辩论，站在国际代表团以外的我们最初是不知道的。实际老鲍早已将第二期北伐的政策提出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誓师期也公布了，现在只须CP来追认与拥护此政策。因为鲁易激烈的攻击老鲍，老鲍也愤然欲电国际辞职归去。

最初参加此讨论的是平山、秋白、国焘。平山，国焘主张南伐取广东，但偏重于军事、财政方面，秋白主张先打南京，经由陇海路北伐。后来独秀到了，再开正式会议讨论；独秀、述之、太雷是完全赞成老鲍的；国焘、平山仍主南伐；秋白仍是经过南京北伐；和森提出四个条件的北伐政纲：（一）在两湖及其他武汉政府领域之内，立即实行土地革命；（二）实行财政大改革，一切财政负担加于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身上，免除一切工农和穷人的担负；（三）实行军队大改革，增加兵士月饷，取得兵士群众领导权，废除军需制，军需宜属财政部管理以制反动将领之死命，军队指挥权完全属于革命军事委员会；（四）同时巩固后防，南取广东，并包括鲁易计划之各点。和森是主张深入与广出同时并行的，于进攻军阀之同时，给地主阶级及资产阶级以严重打击。当时国焘笑说："照你这四条件，等于取消北伐，国民党怎能接受？还是赞成咱们南伐罢"。

后来决议由秋白起草，鲁易见之仍不满意，事实上，老鲍亦采用了折中的主张，不日国民党即公布迁都南京（东征），但公布之数日，南京失败消息到来，于是仍然回复到老鲍原来的主张，立即由京汉路出发北伐，甚么条件，甚么政纲也未向国民党提出。在财政上，老鲍反实行了一种有名的"现金集中"政策，此政策完全是使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感受痛苦。这是新机会主义西北学说实行的第一步。

当时武汉同志集中火线于攻击上海机会主义；对于此新机会主义之来袭，全然不知不觉。这是有原因的：集中武汉的负责同志们大都是从广东做过工作的。三二十事变以来，老鲍无形中是左倾的领袖，北伐胜利后，他的信任更高，几乎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了。此时国际代表团中的分化是：旧的远东局书记魏琴斯克站在鲁易共同反对老鲍。独秀到武汉后与新国际代表的关系自然是不满的，所以老鲍与独秀之间异常接近。独秀在五次大会中的政治报告，其大纲是鲁易规定的，故有西北学说之一项。鲁易欲移转五次大会的火线向西北学说进攻，是很明显的。然大会从不知道西北学说是怎样一回事，所以当时广东代表团提出抗议，认此为莫须有之学说，要求老鲍出席说明。结果，老鲍向大会复了一个简单的信，否认自己有此学说。同时鲁易在大会中，特别表示反对张太雷同志（认他是鲍罗廷派）而宽恕罗亦农同志，亦是因为要移转火线向西北学说之故。

五次大会开幕前二日，老鲍提出一向帝国主义让步的政策和决议草案。在他的说明中，第一段是说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危机之紧迫，国际革命潮流之低落，不能牵制这种干涉来援助中国革命。第二段说明湖南民众运动之过火，不应直接收回海关、教堂及没收英美煤油公司的财产，外交应由国民政府直接办理，民众不得自由行动以促武装干涉之速来。第三段说明武汉码头工人及苦力不应该"敲外国人的竹杠"，不应该无限制苛索五倍以上十倍以上的运费或车费，起卸时不应该私偷外国公司的货物，他坚决的指斥："这不是真正工人应得的利益，只是流氓的利益，现在只有严厉取缔此种流氓的利益，才能保全工人阶级真正的利益；因为如果放任流氓工人横敲竹杠或偷窃货物，结果是催促外商之离开武汉，即催促武装干涉的速来；干涉一来，国民政府便塌台，革命便失败，工人还有什么利益可占？所以现在损害流氓工人的利益不是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反而是顾全工人阶级和革命的利益！"。第四段援引列宁向帝国主义让步的教训，肯定此让步政策之必要，让步的方法，主要的是向外国商人让步，在武汉政府领域之下，保护外商有营业之自由，禁止民众一切非法行动，挽回外商离开武汉领域的决心，利用外商去反对其本国帝国主义之武装

干涉。末后一段是列举一些取缔流氓工人和民众直接行动与所谓非法行动之具体禁条，流氓工人不服取缔时由总工会逮捕处罚。……等等。这场会议有两湖活动分子参加，鲁易在坐亦未发言；老鲍并交此议案与鲁易修改一下，即通过执行，这是西北学说实行的第二步。

这种“流氓工人”论，“利用外商去反对其本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论，及“外交官办，民众不得自由行动”论等等，这些新理论的发明，现在一见便知道是很臭的机会主义的邪说，但当时从老鲍口中说出来，句句都是香的了。

五次大会开会前几日，在国民党中央公开的讨论没收土地，以邓演达为领袖，集合国民党中各要人，唐系、谭系各将领，我们的农民部长谭平山及毛泽东、夏曦、易礼容诸同志及顾问苏俄同志二人皆参加。此公开讨论延长二星期以上。在此讨论中，军官们只是开顽笑，或则要求保护革命军人家属财产，或则反对公布“保护革命军人财产条例”，以为这是侮辱革命军人人格，谭延闿则公开反对没收土地，以为如此，则一切军队皆将反抗；汪精卫则滑头滑脑的要求规定大地主的标准，曾一度主张没收五十亩以上，邓演达最后不敢多言惹祸，我们的同志态度不一，湖南同志及俄同志主张没收一切土地，谭平山节节退让，提出一些不三不四的所谓地税方法和赎买方法，最后不知怎样与老鲍及独秀商量，定出一有名的所谓“政治没收”，即只没收反革命的财产，以避免军官们的反对及所谓大地主标准难定之难题。从现在看来，这个“政治没收”显然是回避土地革命的表词。这个政治没收，不仅军阀早已行之，即以前的一切朝代亦莫不行之，即犯罪之人，将其田地充公入官是也。此时，发明这个政治没收，仿佛如获宝贝一般。在未打倒北京前而竟能行此政治没收，在当时看来，已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似的。五次大会中，农民问题委员会正式开会讨论土地问题时，即采用了此种政治没收的辩法。当时鲁易在坐并未反对，同时他还发言表示不赞成俄顾问同志所拟之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只赞成没收庙宇祠产及大地主的土地。显见此时，他对土地问题没有确定的具体的态度。这笔回避土地革命的公案，也是在五次大会之前及五次大会之中做出来的。

在五次大会之前，向帝国主义让步的政策既如彼，而回避土地革命的政策又如此，现在剩下的便是对于小资产阶级的问题。对小资产阶级让步的政策是西北学说实行的第三步。

在五次大会前，旧中央局曾经开会讨论店员问题，因意见不一，没有结果。此次会议情形大致如下：独秀同志提出取缔店员要求的条例，并说店员问题非迅速解决不可。和森发问：“为甚么我们现在要注意取缔店员？据我所调查，店员要求并未过火，上几月增加的工资已被提高的物价超过了”；同时反对此条文中“店员增薪应视店东财力之大小为准”的原则，以为一切工薪应以物价为准则。独秀说：“汪精卫到此，首先着急的向我们提出此问题，因为现在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非常动摇，怨恨国民政府，中心问题是店员要求过火”。当时国焘亦反对，所以此次会议没有结果。五次大会闭幕之第几夜，新中央常委开会，有在国民党中央工作的二同志前来报告汉阳店员、童子团又有过火行为。封闭了两个小工厂和钱店，国民党中央闻悉大怒，汪孙谭等顿足痛骂，情形异常严重等等。独秀闻此，亦大为惊怒，因此与国焘口角激烈，国焘愤而退席，几星期不参加会议，外间因有张左陈右之谣。这都是“对小资产阶级诸问题”的决议案未出以前，讨论小资产阶级问题没有结果的经过。

实际上，对小资产阶级让步的问题，在老鲍报告对帝国主义让步政策时即已明示其端，不过彼时鲍鲁之间意见皆未成熟，故只先决定对帝国主义让步的策略。凡国民党首领有所表示，老鲍无不首先接触，故鲍鲁之间在五次大会前后即辩论此问题。原先辩论的详情我们不知，据鲁易说话的语气看来，知道他与老鲍间的意见不是实际让步不让步的问题，而是在几个形式上和原则上的问题，如老鲍主张C.P与国民党总要"共同决议，共同执行"，而鲁易则主张C.P应于每一问题中表示独立的阶级的态度和主张，老鲍主张C.P在形式上应承认国民党的革命领导权，C.P只要在事实上拿住群众，形式上常常拥护国民党的主张也不要紧，这一点是鲁易激烈反对的。可是这些原则上的争点，我们开始并看不清楚，因为他俩的辩论，我们不知道，讨论此问题的会议，老鲍本应出席而未出席。所以他们的意见，我们从好几场会议之后，才隐隐约约看的出一些。

当时实际的情况是这样：（一)两湖资产阶级及地主尽量的把他们的声音送到唐系、谭系、程系的军官政客及国民党中央，口口声声说现在乡村没有国民政府的权力，县知事等于虚设，只有农民协会是政府（这本是实际情形），在城市之中，工会是第二政府或实际的政府；（二）帝国主义者一见国民党政府要人便讥笑他们没有权力，说工会是第二政府；（三）所有土豪劣绅皆宣传农民运动过火，所有城市工商业者皆痛心疾首于店员和工人之"过火"；（四）长江下游的资产阶级全体动员攻击两湖的赤祸，来影响武汉内的地主阶级成分，及推动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五）小资产阶级上层即所谓工商业者异常动摇与怨恨。所有这些情形与影响，在国民党内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首先反映着；在我们党内老鲍首先反映着。

此时国民党假左派首领们的理论是：（一）武汉政府完全孤立危险了，两湖工农过火，闹得天怒人怨，所有军队即将起来反对，所有工商业者皆将起而响应或欢迎蒋介石，既有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干涉的厄运，又有下游封锁和蒋介石打来的危机；奉军在此，杨森窃视于西，这样下去，武汉政府一定要失败的；（二）所谓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现在是绝对没有希望的；所谓工农势力，广东百万农民经不起李济琛之一击，上海八十万工人经不起蒋介石之一击。纸老虎吓死人，坏事有余，成事不足；（三）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只是空招牌，完全成了C.P的傀儡。乡村农民协会是政府，可以没收土地，逮捕及枪毙一切人，城市工会是第二政府；国民党下级党部目无中央，只是服从C.P命令。所谓国民党领导革命完全是空话，完全是C.P骗国民党的；（四）假若C.P能领导革命成功，我们做C.P傀儡还值得，现在C.P乃是领导我们到失败，我们做失败的傀儡太不值得了；(五)两湖的农民运动并不是正真的农民运动，乃是地痞运动，这证明C.P在事实上并不能领导民众运动，因为民众运动"领导失人"，所以弄得这样糟；（六）现在只有饤止一切过火的民众运动，C.P将民众运动领导权和革命的领导权切实归还于国民党，让国民党来纠正他，裁制他，整理他。

现在我们试拿这种假左派的理论来与老鲍的西北学说比较，可见老鲍的态度是由悲观而到退让，假左派的却是由悲观而到进攻（向我们及民众运动）。老鲍由悲观教我们让国民党以形式上的领导权，汪精卫等由悲观硬向我们索实质上的领导权。至于趋向饤止民众动运，把一切罪恶归于所谓工农运动的过火，这是老鲍与汪精卫等之间没有不同的。

五次大会闭幕后，中央政治局第一场正式会议，独秀做了一个政治报告，提出对于小

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问题，说明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之恶化，现在只有两条出路，或是决裂，或是让步。在独秀的报告中，许多材料是从自己及老鲍与汪精卫的接触中得来的，并引了一些老鲍的话。可是这场会议老鲍未出席。鲁易发言的第一句是："五次大会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只决定原则，没有决定具体政策，现在讨论出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具体政策是必要的"。当时鲁易提出三类问题：（一）对城市工商业者的问题，即限制店员要求的问题等；（二）对于乡村小资产阶级问题，即保护小地主等问题；（三）取缔民众直接逮捕与枪毙反革命等问题；在此问题中，鲁易略提出工会是否有"专政倾向"的问题，但他未多说。独秀见事有许多地方是很敏锐的，当时他说："单讨论此三问题还不够，应明白的讨论民群运动和其领导权的问题。现在汪精卫等开口也是领导权，闭口也是领导权，甚至公然说民众运动领导失人，C.P不能领导民众运动，民众不受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指挥……。质言之，其他问题，都是倍亲，主要的是他们要求一切民众运动受他们的制裁和指挥。现在我们应严重的讨论这个根本问题是否能向他们让步？"

独秀一针见血，提出这个根本问题来讨论，这是很对的，当时和森也赞成讨论此根本问题。可是鲁易表示不愿意，他并不多说理由，只是说了一句气愤的话："也许我们永远不愿意同他们讨论此问题"。在这情形中，虽然可见鲁易与老鲍间一定有很深的辩论，而鲁易在会中不向我们作一详细的说明，一面令人莫明其妙，一面令人对于他这种态度感觉不满意。

中央政治局第二次会议，鲁易提出所拟"关于小资产阶级国民党诸问题决议"案，正式通过。至此西北学说的三大政策——回避土地革命的北伐，向帝国主义和小资产阶级让步——遂在实际上大告成功；而此两路线退让的大政方针，遂完全支配了一直到武汉失败的二个月半（五次大会是五月初闭幕的）中最高指导机关的政治生活。这是中国革命第二次大失败的总因，也是五次大会前后新机会主义泉源。以后政治局一切的工作，一切的错误，一切的动摇与犹豫，却不过是演绎此两路总退让的大政方针之必然的现象与结果罢了！

然则当武装干涉的形势那样严重，当小资产阶级那样的动摇，还绝对不应向帝国主义和小资产阶级退让吗？不是的，在一定范围内（即在不妨害土地革命，不损害工农利益的范围内）某几种退让手段是必要的；但这种退让决不是我们政治上的主题，这种手段决不能妨害我们"土地革命"的目标。从五次大会起，我们政治上的主题是"进攻"而不是"退让"；我们的任务是进行土地革命，而不是回避土地革命。在此，我们只有秉着五次大会"进攻"的总方向，土地革命的总目标，以不屈不挠的无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打破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首领的犹豫与动摇，坚决的领导革命一直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跑。这样则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可是事实上完全相反，西北学说，无形之中引导我们转向总退却和回避土地革命的方面走，同时抛弃无产阶级坚决的正确的领导态度，而附和与发展了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的犹疑与动摇。这样一来，革命怎得不破产？

鲁易只有坚决的维持国际决议和五次大会的精神，指明我们现在政治上的主题是"进攻"，是进行土地革命，是要以无产阶级坚决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犹疑与动摇，而一切所谓"让步"的问题不过是一种付题，这样才能树立他在政治局的指导而制胜西北学说的指导。在这一点上说，鲁易在实际上自己也不知道已向西北学说投了降。纵然口头上他还继续维持一些争辩与原则，然实际上西北学说所演绎的退让方针，已成为中央政治局唯一无二的总路线，鲁易也不过是此总路线中左翼的合作者之一员。

鲁易在新中央政治局不能取得信任之次要原因，还有几事：（一）他与平山上年二月间到广东留住了一个多月，对于广东问题，无所建白，仍然维持“利用李济琛中立”的老政策。平山甚至以“广东问题，广东自身不能决定，全靠前方的变化即南昌与武昌间关系的变化来决定”，教训广东负责同志。鲁易与平山离粤不过三星期，李济琛即开始屠杀；（二）鲁易经过湖南时，在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公开表示不赞成反蒋；（三）鲁易初到武汉即欲与魏琴斯克同赴上海去见蒋介石，武汉负责同志严厉的反对，不到二日，四月十二日的消息即传来。

由此，中央政治局中自然西北学说的指导要占绝对优势力！

## 八　机会主义下的中央政治局

五次大会开幕约两星期，五月十八日夏斗寅在湖北叛变，同时许克祥在长沙叛变消息亦非正式的传来。和森与立三提议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领粤汉路，兜剿夏斗寅，若唐生智全部叛变则直由粤汉路取湖南为根据地，再进攻湖北与广东；同时发动一切工农群众起来作殊死战，乘机扩大工农纠察队武装，并开赴前线助战；同时提议积极准备武力对付，以暴动对付暴动。当时鲁易与秋白同志以为现在中心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乃是与左派关系的问题，只有与左派关系弄好一切政策才有中心，现在急务便在建立此中心。

当时实际情形是这样：夏斗寅叛变一起进攻武昌，距武昌只四十里（抵纸坊），所谓左派首领皆吓得面无人色，魂飞天外；民众间亦大起恐怖，纷纷逃亡，即工人纠察队亦有逃亡者；同时谭延闿、唐生智互相放出相反的宣传：唐谓此次两湖事变是由谭延闿勾结他的部下何键起来的；谭谓此次事变是唐主使的，是唐生智的苦肉计，可见C.P一面在湖南胡闹，一面又相信唐生智之不智……。当时和森根据各方面所得材料（此时和森暂代秘书长），证明以上两种宣传都是故意蒙混耳目的，谭之参加此次阴谋自不待说，夏许何是唐的部下，两湖是唐地盘，那有唐反置身事外之理？可是鲁易当此紧张之时不仅未把政治局的中心问题置在镇压反革命上，反而把他建立在所谓与左派的关系上，这是与老鲍全然相同的。

和森立三的提议采用了一半，便是叶挺及中央军校的武力都开去迎击夏斗寅。工人纠察队要求国民政府从汉阳兵工厂发二千支枪，并几千元月费，汪精卫等在口头上答应了。中心问题既然还是“左派”问题，于是对于夏斗寅的叛变只当作是一件临时的事变去应付。中央政治局的全付精神力量自然只集中于所谓左派关系问题。这便是我们在两湖失败的致命伤，两湖始终是由于放任夏斗寅、许克祥的暴动，在肘腋之下长期发展失败的！假使中央政治局一开始便集中全力于剿灭反革命，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巩固两湖根据地，我们决不致遭受后来那样不荣誉不争斗之可耻可羞的大失败。假使当时认为中心问题是以全力扑灭夏许及唐谭一切反革命的阴谋，结果也许可使所谓“左派”由动摇而稳定，由离心而向心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改良与左派的关系，因为所谓左派完全是随势转移的，夏斗寅、许克祥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发展，他们一定要趋向于反革命；我们工农能以自己力量剿灭一切反革命，他们也许中断反革命的倾向。

当然以上所说都属事后追论，当时和森立三并未真知灼见到如上所说之深切。不过假使当时鲁易能因和森立三那种本能的偶然的提议，把中央政治局的火线集中于发动自己的势力去扑灭一切反革命的阴谋，两湖是决不会失败的那样迅速和可耻。

在夏斗寅叛变时的紧急会议上，除了决定一些叶挺出军及发动民众势力，扩充纠察队等办法之外，又推鲁易起草一个关于夏斗寅叛变的宣言。在此宣言中，现在可指出两点错误：（1）承认农民运动的过火，但不是中国C.P做出来的，乃是农民自己做出来的，便是说中国C.P不负此过火的责任；（2）承认C.P不仅保卫工农利益，并要保护中等阶级工商业者之利益，号召这些中等阶级工商业者不要受夏斗寅的鼓惑欺骗。从这两点看来，可见鲁易也丧失了头脑和原则！

不久湖南许克祥的马日事变证实（但中央特派员李维汉同志及湖南省委始终无报告来），老鲍异常焦急，急欲与平山及国民党中央所决定的查办代表团（老鲍、平山、彭泽湘、陈公博及唐生智代表二人）赴湘，一面查办许克祥的叛变，一面查办农运的过火。此事是老鲍决定的，鲁易是反对的。结果老鲍偕此查办团行至岳州，许克祥来一逮捕与就地枪决之电，六人皆逃回武汉，老鲍这种主张当然是很错误的：（1）查办农运过火是原则上的错误；（2）不想用势力去对付反革命，而想用合法手段查办反革命，根本是笑话；（3）"单刀赴会"的故事演不成，结果更丧失了所谓国民政府及老鲍的威信，反革命愈益张目。鲁易反对是对的，可是鲁易也只知消极的反对，并提不出积极的办法。

在有一场政治局会议上，鲁易与老鲍各自发表长篇的演说。老鲍的大意是：（1）现在国民党的左派还是好的，他们没有甚么错误和不好的倾向。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与哥老会而不是我们；（2）我们现在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取得与他们合作是中心的问题，假若现在我们与他们决裂，便是中国革命完全的失败，我们将甚么也没有；（3）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便是指他的现在的中央合作。国民党的中央现在还是好的，离开他的中央，或推翻他的中央，这不是决裂便是政变。现在党内有此危险的倾向，应攻击此倾向（暗指鲁易）；（4）农民运动只要能做到减租减息乡村自治等，便是我们的胜利，便是土地革命；(5) C.P中央及一切工农会现应发表宣言，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最近所公布之一切取缔民众运动过火和错误的法令。

鲁易的大意是：（1）现在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已经不是左派而是土劣地主军阀的代表，我们应号召左派群众起来推翻他们；（2）推翻国民党现在的中央，并不是根本决裂与政变；（3）我们现在应一直到工农民主独裁制（未多说理由）；（4）C.P中央应发宣言，反对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近日所公布之一切反动的法令，在这些法令中不仅反工农运动，并且保护封建制度。

鲁易之后，和森发表的大意是："我们听了老鲍和鲁易的演说之后，发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和政治路线。在老鲍的演说中，有些动听的办法是可宝贵的，但试拿以与国际决议案相比较，则完全与其原则相违背；如国际决议教我们实行土地革命，而老鲍则教我们只做到减租减息便是顶好的土地革命！又如把一切罪过通归于工农运动过火，而认现在代表土劣地主军阀的国民党中央一点不好的倾向也没有，反教我们去拥护他们咒骂民众运动取消民众运动的法令！这样，还有甚么原则？至于鲁易同志所说的一些原则都是很对的，

很可宝贵的，只可惜没有说出办法，每次开会都象上课一般，只是空空洞洞的教我们一些原则，这是不够的。代表土劣的国民党中央已经不是左派，我们应当推翻他，在原则上是对的；但我们对左派群众的工作还是一点没有准备，现在要一声呼喊与国民党中央决裂，事实上不是政变也要发生政变的。至于鲁易忽然提出工农民主独裁制，也与国际决议不相合，是否国际有所改变，应请说明。以我看来，老鲍是有办法而无原则，鲁易是有原则而无办法……”。

秋白同志接着说道："和森同志的批评是很可笑的；在他看来，仿佛鲁易与老鲍之间，一个懂得'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原则，一个不懂得'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原则似的。其实老鲍与鲁易在根本原则上并无不同，只是对于国民政府内资产阶级的成分是否完全排除的估量上有点不同。在鲁易及莫斯科的同志们以为中国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业已成功，国民政府内已经完全没有资产阶级的成分，所以认土地革命可以尽量实行。老鲍则认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还未成功，因国民政府内还保留许多资产阶级成分，所以土地革命不能彻底实行。我（秋白自谓）也觉五次大会决议关于这一点没有指明，太把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说完成了一点，仿佛此联盟完全成功了，没有资产阶级成分在内了，这是一个缺点。"

在有一场政治局会议，独秀同志在报告中说道："我昨日与老鲍谈话，老鲍指出湖南农运不是我们的领导，而是地痞与哥老会的领导。这样怎得不糟！"这个新发明在不接近群众的中央政治局看来，真是动听。由此农运的"地痞论"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国是；每一个农民运动的通告除了抄写一些国民党咒骂农运训令之外，一定要在组织方面禁止地痞做农协委员，一切农协委员皆应由在业农民未离开土地的农民来担任。这个也成为天经地义了！

湖南马日（五月二十一日）事变，不是许克祥的功劳，乃是湖南省委负责人及中央特派员指挥自溃的结果。从五月十八日以来，省委即知道许克祥将响应夏斗寅，中央特派员及省委负责人，先日分析政治，谓将是唐生智整个的叛变，武汉一定已没有了，以为没有办法抵抗。只有逃赴江西边境去；明日知道河南郑州已下，武汉无恙，则又分析政治，以为许克祥不会暴动了；最后知道许克祥确要暴动，省委乃自行解散，重要人每人发二百元，次要一百元，各自逃亡，"藏两个月再说！"后来五人临时委员会决定号召长沙附近各县三十万农民于五月三十日进攻长沙，李维汉同志见此命令大发雷霆，斥为小孩子的把戏。他的理论是："即使我们能取得长沙，唐生智便要与武汉政府翻脸，是我们有了长沙而没有了武汉。现在武汉政府既然存在，便只有请求国民政府用法律手续来解决！"

郑州下，摇动不堪的逆迹显著的假左派首领他们都赴郑州开会。此时中央政治局开了三次重要的会议。一次是讨论郑州下后的北伐问题；此时冯玉祥反共态度已较明，独秀同志已悟前此北伐政策之错误；他现在所忧虑的是冯玉祥所倡的"共同北伐"（号召武汉南京共同北伐），他知道共同北伐成功之日，便是共同解决C.P之日，所以此时独秀同志及老鲍都认"东征"是唯一出路。在此次讨论中，独秀、立三、秋白是主张东征的；鲁易、平山则仍主张南伐取广东；和森则主张解决两湖问题。当时和森这样说："现在我有个奇怪的不同的意见，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都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要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一无所得！这便是说现在我们必须坚决的自觉的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这便是指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湖问题应首先解

决。许克祥的反革命任他在湖南延长的发展，我们所在地的湖北自夏斗寅叛变后已有四十三县的农民和农协处在土劣军阀的白色恐怖之下，死的农民已达三千以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湖反革命大暴动不解决，而高唱东征南伐，只是一句空话！”当时和森提出所拟之湖南湖北的决议案（已在常委通过），要求政治局讨论追认。关于湖南决议案的大要是：（1）坚决的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以自己的势力来解决许克祥，向长沙取围攻封锁之势；（2）绝对的不要相信和依赖国民政府合法的解决，他是故意纵容许克祥的，即使有所谓合法解决之日，他不过是用法律手段来代替许克祥暴烈手段，即合法的来取消农民运动；（3）自动的没收土地，农民势力到那处即将那处的敌人杀尽，土地没收，并建立乡村政权，实行赤色恐怖；（4）在此反许争斗中，应发展农军至五万以上；（5）在最短期间应发展国民党群众至三十万以上，准备推翻现在代表土劣的国民党中央。关于湖北是：（1）积极号召全省农民群众抵抗白色恐怖，向地主土劣军阀猛烈反攻；（2）积极利用省政权（当时在我们之手）县政权，扩大省防军及工农武力，尽量肃清各县一切敌人；（3）尽量扩大武汉三镇工人纠察队及同志的武装；（4）自动没收土地；（5）迅速准备广大群众势力推翻国民党土劣的中央机关，并改组之。此日恰好国际来了一个电报，责斥中央对于土地革命的态度不坚决，责斥平山就职演说之迴避土地革命，警告中央改变态度，否则将在国际机关报上公开批评。同时指令迅速反攻并解决许克祥，农民自动没收土地，否则中国革命将一败涂地。鲁易看完两湖议决案之后，表示完全同意，认为与国际来电相合。翌日鲁易提议要求国民政府讨伐朱培德，同时我们派五十名军事同志赴江西，准备暴动推翻朱培德。和森根据此意用常委名义发一准备暴动推翻朱培德的训令于江西省委。后来平山表示反对。

此时中央政治局有点“进攻”的新空气。同时湖北省委根据上述之湖北决议精神开了一全省代表会。在湖北全省做国民党工作的同志，经过中央常委的指示，开始宣传反对反动的国民党中央。同时派去大批军事同志赴湘发展农民暴动，推翻许克祥。这些军事同志去时，中央常委出席说明是要准备对付整个的唐生智的反动之到来。于是中央与国际代表之间，组织一湖南特别委员会，专为指挥湖南暴动。后来此会开会数次，外国同志将暴动计划改了又改，同时所决定之款项迟延不发，而我们已派去大批军事同志前去，须要计划与款项异常之急；最后外国同志听了一个不关重要的报告，认为我们自己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暴动为不可能，对于前此所决定之款完全翻脸。于是军部周恩来同志与鲁易大闹一场，取消此委员会。

郑州下后，中央政治局另一场会议，独秀同志作了一个乐观的政治报告，大意是：张发奎军队已自动的撤回武汉，唐生智军队亦继续撤回武汉，是共同北伐的计划已被打破，共同解决C.P的危机业已延缓。鲁易接着指明现在情形并不容许乐观，反革命继续在湖南发展，继续屠杀工农和我们的同志（其时长沙C.P省委整个被杀），冯玉祥在河南反动，朱培德在江西反动，驱逐一切C.P份子和政治工作人员出境；他指明现在我们只有向敌人进攻才有出路。当时和森赞成这个进攻论：“我们中央政治局，从今日起，必须具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再也不要说甚么让步，甚么取缔工农过火这类的话了，今后我们的任务再也不要退让而只是进攻。我们应首先向反动的国民党中央总攻击，我们要向民众动员起来攻击他，我们要在机关报上动员攻击他，同时我们准备一进攻的政纲，待汪精卫等由

郑州回来与他正式公开谈判，揭破他们的假面具。”当时任弼时同志提议发宣言，于是宣言政纲皆推鲁易起草。同时鲁易提出两个“惊人”的建议：（1）武汉全体工人总罢工，反抗国民政府纵容许克祥，汉阳兵工厂工人应特别罢工，表示不解决许克祥不再造枪炮杀自己的人；（2）发一反对朱培德、冯玉祥、许克祥的宣传大纲，并提出要求免朱培德职及讨伐朱培德的口号。此两提议虽经多数长久之犹疑与争辩，卒得勉强通过。

可是通过此案的消息传出去之后，真是闻所未闻的骇人听闻！老鲍闻之，气得要死；彭述之闻之，到处宣传中央与湖北省委“荒唐”，“竟喊出打倒朱培德，讨伐朱培德的口号呵！”谭平山闻之，臭骂鲁易左派幼稚病，不懂中国情形……。于是群相告语，若大祸之将至：“这不是与国民政府决裂么？我们有甚么准备，能这样开玩笑！”“兵工厂罢工来一个屠杀怎么办？”“国民政府、唐生智、朱培德、冯玉祥……一律表示反对，我们有何力量抵得他们一个打击？”“荒唐！”“幼稚！”“发狂！”……如此等等，俨然大祸将至一般。为甚么这样惊慌，这样骇怪呢？因为退让已成习惯，对于国民党和新军阀已养成一种驯顺的心理，现在忽然有违反此心理与习惯的决定，所以莫不大惊大怪起来。这是证明机会主义入人之深，已使一切上层同志没有阶级的仇恨情绪与感觉；天天坐视许克祥在湖南，夏斗寅在湖北，朱培德在江西，冯玉祥在河南屠杀放逐，压迫我们的同志及工农群众，这处无抵抗，那处也无抵抗，久而久之，遂把一切上层负指导责任的同志的阶级感觉与仇恨都麻木了。反之，对于久相往来的大人物大领袖之驯顺恭谨的感觉却异常灵敏，所以此时下层群众所感觉奇怪的正是“C、P何以此时不反抗许朱冯等的屠杀压迫及国民政府的纵容？”而上层同志所感觉奇怪的完全相反，乃是“为甚么此时我们可反抗国民政府及汪谭朱冯唐……等？”

于是下一场会议要求取消原案（由多数的反对）。此时和森虽还一度坚持，然鲁易自己表示：“现在既然一些职工运动的重要同志都不赞成罢工反抗国民政府，自然可以容纳大家的意见修改原案。”秋白亦说：“我们进攻是应有准备的，全无准备而冒然进攻是无益的。”于是立三提议改反抗的示威罢工为欢迎北伐军凯旋的罢工。同时关于朱培德的口号，亦大加修改。

由以上的记录看来，从夏斗寅、许克祥叛变之时起，我们便应以“进攻”、“暴动”、“政变”为中心问题；因为从这个时候起，地主土劣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及国民党左派已公开的向我们进攻，向我们暴动，向我们政变。只有以进攻对付进攻，以暴动对付暴动，以政变对付政变，才能制胜一切敌人。在夏斗寅叛变之时，鲁易还认左派关系为我们中心问题，这是与老鲍同样错误。后来否认此左派而主张推翻其中央，这是鲁易的进步；可惜他不能贯彻此主张，公然不讳的承认有“决裂”和“政变”之必要；老鲍反用决裂和政变来反唇相讥，鲁易辄不敢自申其说。郑州下后，鲁易指明时局之严重，第一次明白的提出“进攻”的标语，这是非常之对的！假使鲁易能坚持，不因一时之反对而自缩，结果一定可在中央政治局树立一种进攻的指导去替代那退让的指导。可是鲁易自己不能坚持，一经反对便自行让步。从此中央政治局遂永远不能超出退让政策的厄运；“进攻”的空气刚一抬头即为西北学说的无形势力所打落。

当鲁易提出罢工原案时，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他说“现在有一种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企图反对进攻，便是说我们没有准备不能进攻。”他这句话是指老鲍的。其实湖南五百万

农民的组织，虽受打击，并未冷却火气，两湖工农势力纵不雄大，也不致一个反抗的罢工都不能做。在此情况之下，还以无准备为藉口去阻止进攻的方针之提出，当然是一种西北学说的机会主义。

当郑州未下之前，唐生智的危机并不减于我们，因为他的主要部队都开赴河南，湖南异常空虚，留驻湖南之兵连湘南湘西计算不及四团；而我们湖南农军的枪支早已超过三千以上，叶挺军队藉迎击夏斗寅已扼粤汉路而留驻湘鄂交境，同时湖南有二十县以上（最著者有长沙、浏阳、湘潭、湘乡、宁乡、益阳、茶陵、攸县、湘阴、衡阳、宁乡、衡山、郴县、祁阳、耒阳、安化、新化、安源、萍乡、醴陵、汝城……）的广大农民群众不顾省委之溃走及中央特派员取消暴动之命令，他们英勇的坚决的自发自动的暴动起来，唐生智是完全可以推倒的，并且在我们的政变胜利之下即可用民众的势力来改组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而成功我们领导之下的真正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制。这个可能在当时确是有的。唐生智很懂得这种可能的危险，所以他在当时极力向我们卑词下礼，常常从前方直接打电报于我们的中央表示他的忠实，常常在前方故意公开讲演拥护三大政策，反对许克祥，否认湖南农民运动过火，总括一句，他的言论，比汪精卫、谭延闿任何一个都左很多。他为甚么要这样表示呢？便是他怕我们在两湖起暴动，又知道我们有取得两湖之可能，乃故意卑词下礼来缓和我们，使我们相信他不是夏许叛变之主谋，使我们相信他有自己回湖南解决许克祥之诚心。果然不错，我们就中了他这种鬼计！

第二期北伐有一点好处，便是将唐生智在两湖的主力军调出三分之二于河南。假若我们有先见之明，乘此时机准备两湖暴动，用自己的势力来巩固两湖根据地，来实行土地革命，来改组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老鲍根本无巩固革命根据地和实行土地革命之志愿，不必责备他，鲁易徒有此志愿而完全不知利用北伐出发后之形势，消极方面只知反对北伐，积极方面只知要取广东。老鲍无异抛弃两湖想西北，鲁易无异抛弃两湖想广东！广东与西北虽不同，其忽视两湖是一样。

当夏、许叛变时，我们曾说："这是唐生智的三月二十。"话虽如此说，可是全不知利用"三月二十事变"的经验与教训来对付唐生智。三月二十事变的经验是甚么？蒋介石原先本拟与我们完全决裂，后来检查他自己的势力完全使他失望，因为三月二十以后，黄埔军官学校学生整个左倾，反对蒋介石，不服从蒋之命令或调遣；同时其他各军如谭延闿、程潜之湘军，朱培德之滇军在三月二十都是反蒋的。所以三月二十事变是我们的危机，同时也是蒋介石的危机；蒋于此危机之下只有高唱北伐，找他自己的出路。三月二十事变的教训是甚么？是一味退让而不知反攻。假使三月二十以后，我们能发动愤不可遏的工农势力及左派军事势力来对付蒋，蒋是无可如何的。现在拿上面所述的情形来对照唐生智的三月二十，情形是很相像的，性质与程度却更严重了。因为此时两湖发展的工农势力比较广东三月二十时要大十倍以上，同时湖南五百万组织的农民已实行用自己的势力在那里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权，因此所有一切国民革命旗帜下面的新军阀都倾向反革命，这些都是性质上程度上更严重的地方。因此唐生智经营他自己的三月二十（实际是五月十八）到四月十二（实际是七月十五日）与蒋介石便有些不同；蒋介石积极经营北伐，唐生智对于第二期北伐的态度不是积极的，他开始很不愿意调出他的主要兵力于河南，他知道这个时候对于他两湖的地盘太危险；蒋介石知道两湖江西拿不住，故拼命经营东南做他的根据地，唐

生智则始终知道要巩固两湖做他的根据地，后来之高唱东征不过是一种政治作用。在理我们应当怎样去制胜唐生智的三月二十到四月十二呢？我们只有百倍的利用三月二十事变的教训，乘唐生智兵出河南之后，在两湖举行我们自己的三月二十和四月十二；纵不然，在夏许叛变之后，我们以暴动对付暴动，以自己的势力巩固两湖做我们土地革命的根据地，这样做去未有不胜利的。夏斗寅叛变时中央政治局中有些萌芽之提议，已属迟了一点，郑州下后的鲁易提议已属太迟。然即此一些偶然的萌芽的迟缓的类似“进攻”之微波，在西北学说的大海中是起不了甚么影响和作用的！

## 九　政治局的后一阶段

政治局的后一期，完全表现是一种指导破产的阶段，老鲍于武汉军撤回之后，又极力拉拢唐生智经营东征，以为唐生智野心勃勃，未得东南之时还不致与我们决裂，他再三申言“我的箱内还有草（指苏联对武汉政府之借款），他（指唐）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致跑掉。”由此引起政治局对于撤回武汉的唐生智之最后的幻想；以为夏、许叛变唐不是主谋，相信他回湖南或者有几分诚意解除许克祥亦未可知。

“进攻”的微波被打消之后，鲁易亦丧失了方针，仍然复回到所谓左派中心问题，想极力拉拢汪精卫来挽回一般的危局。由此引起政治局对于汪精卫最后之幻想，以为汪精卫还是左派惟一的首领，唐生智既还需要国民党这块招牌，便不能不屈就汪精卫一些主张，所以拉住汪精卫还是一切政治问题的中心。于是“东征”与汪精卫遂成为后一阶段的送命汤！过去所通过的两湖决议案实行了么？一点也没有实行，现在的两湖似乎更不关重要了，横竖唐生智“还要想吃草”，一时不会和我们翻脸，他既回来，两湖即听他去处理。而且汪精卫还是左派唯一的首领，汪、唐近来关系很好，两湖问题就更可听他两个去处理。

过去所拟左派群众工作实行了么？刚开始团结湘鄂赣及江浙闽左派分子，做反汪反谭反冯唐及朱培德之宣传，谭延闿等知道了（因为毛泽东同志等公开宣传），大骂C・P有推翻国民党阴谋，此消息经独秀闻之，大发雷霆，以为这一手来不得。其实此反国民党中央之宣传是经过中央常委秘书厅指示的。

过去一度拟议之发动群众去攻击国民党中央的反动，这工作做到了甚么程度呢？说来也可笑，便是只在“欢迎铁军凯旋”的仃工之下，湖北总工会违反修改罢工案的精神发了一些反抗国民政府纵容许克祥的宣言，和打倒许克祥及朱培德的标语。这些激烈一点的表示是总工会负责同志刘少奇等经过中央秘书厅的同意做出来的。可是这又做错了，得罪了汪精卫。汪精卫见着总工会的宣言，知道这一日实际是罢工反抗他们的；他一见老鲍和独秀流泪切齿的说：“吴稚晖曾警告我，‘你日后上共产党的当时，记取吴某的话。’我是一个文弱书生，其实他们（即指总工会）何必联络武人来倒我！”所以到七月一日中央在武昌开扩大会议时，独秀的政治报告中犹指此次罢工的“激烈”表示，是开罪国民党左派的主要原因。老鲍尤其深恶痛恨这一日的罢工表示。

前此一度拟议提出“进攻的政纲”与国民党公开谈判的事怎样进行呢？说来更可笑；不仅没有进攻的政纲，即鲁易所拟之最低限度的政纲，也难通过。老鲍坚决的主张在此政纲中：（1）不要提土地革命；（2）不要提武装工农及工人纠察队；（3）此政纲专为

适于东征之用，应特别提出一些有利于“工商业者”资产阶级的条文；（4）把过去一切取缔店员取缔工人取缔农民取缔童子团及取缔一切民众运动的条文都综合上去。

此时不提土地革命的理论是：“现在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冯玉祥一齐叛变，左派与我们的关系千钧一发，还同他谈甚么土地革命，谈更无益。现在只有东征才能跳出此危机。故一切较高的政纲都待打到南京后再说。”从前北伐是唯一出路，现在东征是唯一出路；从前主张打到北京后再实行土地革命，现在主张打到南京后再提其他问题。前后照应，一气相承，这是西北学说的精神！

此时的实际情况是：（1）国民党中央公开的袒护许克祥与朱培德，说许是代表全社会反对农民运动过火的，说朱驱逐C.P及左派的办法完全是对的；（2）冯玉祥仿行朱培德办法，驱逐C.P及政治工作人员出境；（3）朱、冯之举皆先得汪、谭、孙科、徐谦、顾孟余等之主使与同意；（4）汪精卫等对各处被逐来鄂之左派分子表示C.P问题待七月十五之中央会议正式解决；（5）汪精卫孙科极力勾结唐生智经营东南，欲完全取消三大政策和一切民众运动，以博东南资产阶级之同情；（6）唐生智部下将领以何键为领袖，公开宣言不分共不能东征，不愿意为C.P东征；国民政府升许克祥为师长，马日事变之湘省政府主席，张翼鹏为参谋长，中央军委直接发电拉拢夏斗寅。唐生智回武汉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完全成为唐生智的机关，汪精卫是他的“新欢”小老婆。

在此情况之下，我们只有两条出路：或准备暴动，提出一进攻的政纲与所谓左派公开谈判，谈判不遂，即公开宣布左派叛逆革命的罪恶，将其政府与中央推翻而改组之。或是完全投降，赞成修改或抛弃三大政策，仃止工农运动也可以，分共也可，只要你在南京未打下以前，不驱逐或屠杀C.P，在此条件之下，还可合作东征，还可给草与国民政府及唐生智吃。

前一出路，在鲁易初提出进攻及罢工示威之时，有此倾向，但不到三日即被打消。在此情况之下，自然只有由鲍罗廷同志领导我们走后一条路。所以此时显然不需要一个进攻的政纲，只需要一个投降的政纲，即不提土地革命，不提工农武装，而只加重取缔工农运动之过火，把武汉政府一切赤色的标志皆涂黑，由此去博得东南“工商业者”之同情。我们暂时受此委屈与他们合作东征，待东征成功度过现在的难关，然后再与他们谈别的事情。老鲍的意见完全是这样的。所以此时他所亟亟经营的只是拉住汪精卫、唐生智来吃他的草，交换条件只是要他们答应在东征时期暂不实行分共，此案暂时保留到打倒蒋介石后再说，希望他们在各将领间去疏通疏通。可是唐生智直接间接的答复是怎样呢？“对呵！我也是如此想，分共案最好保留到南京打下后再讨论。无奈这些纠纠武夫不听我的话，只听何键的话。所以最好还是C.P顾全大局，自动的解决这个难题！C.P须知现在也非常危险，我也拿不住我的部下！”这是甚么意思呢？这是要C.P自动的退出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免得武人动手，因为“我也拿不住我的部下”。这个意思开始还是暗示，后来汪精卫、唐生智公开的明说，汪精卫把谭平山请去，要他与苏兆征同志立即上辞呈退出国民政府；唐生智则提出优待的办法，送谭部长苏部长出洋考察。老鲍对于后一办法表示可以采纳！

于是最后的买卖是很明白的，老鲍与C.P所要的是在东征时期还不要实行分共；汪精卫与唐生智所要的是在东征时间还要吃草，还要请苏俄的借款快些汇来。“请你保留分

共案到京南取下后再谈呵！”“请你电催苏联借款迅速全数汇来呵！”这是最后的交易。

老奸巨滑的左派政客与新军阀还要讨些便宜，是很显明的。在我们“东征时间不要实行分共”的语气中，也要看出“实行”是不愿意的，但“议决”分共或许是可接受的；横竖这是个实际问题，他们的决议不过是句空话，他们那有势力来管理党部和民众团体，在东征时间，他们尤其无此力量，而且他们互相间的冲突还多呢；即便他们现在决议分共，待打到南京，情形变换，难道不能再作道理？这种空气从老鲍起，在政治局中是可感觉的。假使后来国际训令不来，也许引领我们这样去投降，即一切草料给他们吃，让他们议决分共，待打到南京后情形变易再作道理。

鲁易在他所拟的最低限度的国民革命政纲中，依然提出土地革命，工农武装，惩罚反革命及讨伐广东。这些都是他与老鲍不同的。至于对左派关系及综合过去所决定之限制工农店员要求等具体条例，都没有不同的意见。鲁易自从上次受一打击后，再也不提进攻和准备决裂了。他此时的精神，似乎趋向于经常的合法的政治路线：（1）想极力拉住汪精卫为左派中心；（2）想扩大左派武力，以邓演达、张发奎为中心；（3）想在白纸黑字上维持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的原则；（4）湖南反革命问题要求国民政府惩办；（5）对于东征未表示反对，但仍提出南取广东。事后追论，鲁易始终不失为一个书生，原则是在纸上维持着，实际问题一个也未见到。此时的实际问题是“决裂”，是“暴动”，是以群众的势力没收土地，武装工农，是以群众的势力推翻假左派而建立群众真正的左派和政府；维持原则的政纲之作用不过在用以公开谈判，揭破假左派首领汪精卫等之假面目和藉以与之做正式决裂的口实与号召罢了。此等政纲只有是坚决的准备与汪精卫等决裂才有作用。鲁易始终要拉住汪为中心，又始终要提出汪所不能接受的政纲，这是老鲍始终有力制胜鲁易之点。鲁易的主张始终是矛盾的，老鲍却是始终一贯的，因为他的主张始终是顺从汪等的心理与需要的。始终要拉住汪是老鲍与鲁易相同的；但鲁易始终愿做汪等的头，老鲍始终愿做汪等的尾。结果鲁易是“既不能令又不能受命”；老鲍是“既善顺随，又会揣摩”。

现在再叙述些别的事情：

鲁易所拟扩大左派武力的计划实行了么？没有实行。此计划原本不始于鲁易，在前一期的常务会秘书厅即有此决定，但未实行。邓演达随从第二期北伐出发后，中央军事委员会之权落于谭延闿、程潜、孙科之手，他们大大缩减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之经费并拟遣散教导团或归併于各军，这完全是向邓演达进攻的。我们曾几度计议打破此阴谋，故在郑州将下时即派国焘同志前去河南，与邓商议此事，并谋左派之新团结。然邓演达自讨论土地问题时受谭、唐、程、孙等大众之排斥，不得不离开武汉，随军出发，故他异常消极，且受托洛茨基派俄顾问的影响倾向，有第三党之说，即取消C.P与国民党左派合併组织第三党。其实也是空话，他只是消极悲观。现在鲁易是想扩大张发奎的势力。此事老鲍坚决反对，因此C.P中央军部负责同志及中央政治局多数亦坚决的反对，以为这个意思一露出，唐生智等马上就要和我们翻脸，何键马上即会暴动政变。但是鲁易终不死心，卒把此意完全告知汪精卫。

现在再说工农武装。自上海失败之后，“纸老虎”的工人纠察队迅速发展。虽然五次大会决定军事工作的新方针是破坏一切旧军队和武装工农，然此新方针从未在五次大会后的中央军部执行。在五次大会时有改称“国民党工农义勇军”说，五次大会后，则以工人

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改编入正式军队之论极占优势。夏斗寅叛变时，湖北全省总工会纠察队有逃走怯懦之现象，遂益愈确定了这种"改编入正式军队"的方针。此方针亦成为政治局中之国是，虽然没有正式决议如此写明，然精神和工作上完全是朝着这个方向走。这种军事工作的新方针，在现在看来显然是机会主义的另一方面，并且是违反五次大会决议的。夏斗寅之变，我本决定乘机扩大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中央要求发枪及月费，汪精卫等也曾口头应允发枪二千支及月费若干；但后来他们又故意拖延不发，我们也不去积极要求。政治局中常有人替汪等如此原谅："也难怪他们，武器不是好玩的，现在工农在他们看来如此过火，他们自然怕工农拿着枪便要转来打他们自己呵！"两湖议决案通过之后，湖北省委对于扩大工农武装及省防军之事曾有一度计议，但不久"进攻"空气消沉，这种计议亦随之消沉。

情形是向严重方向迅速发展，"进攻"的微波打落之后，中央政治局的精神愈益混乱不振，大家都沉闷得很，又象迷失路途似的。对于每一问题都是动摇的，犹疑的。此时可举和森来做例；和森深感于对帝国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两让政策没有出路，又见全国反帝高潮已停止半年，尤其是武汉，有一夜与独秀立三纵谈这种感想，因主张提高反帝运动，甚至不惜掀起武装干涉，在抵抗武装干涉的反帝高潮之下来猛烈的实行土地革命。当时独秀、立三皆以此主张为然，翌日在常委即决定发一提高反帝运动的通告，并特别寄一信与上海，内中参加些独秀和立三的意见。在此通告及信的说明中，显然表示一种没有出路的冒险主义拚命主义的精神，及藉民族争斗来遮掩阶级争斗之理论上的根本错误。（这次常委会有独秀、立三、国焘、和森等四人参加）此通告及信发出之后，和森自己感觉不正确，因于翌日及第三日连续召集二次扩大的常委会，请政治局全体来参加此问题之讨论及决定，但二次都只有独秀、和森二人出席。独秀说反帝运动是我们的经常工作，何必再三讨论；和森说此通告及信与对帝国主义的让步政策根本相反，而且其中的说明我不敢自信是正确的，必须提出于政治局正式讨论。是日下午，秋白来常委，和森对秋白说：此信及通知请你仔细看一下，若不是完全对，便是完全不对的。如若不对便是一种蒲兰克主义呵（蒲兰克是法国一个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家。蒲兰克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来便是一种另一形式的机会主义）！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此问题时，鲁易指明提高反帝运动是对的，但其说明在理论上完全错误，并且指明不惜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之冒险政策亦是错误的。当时和森自己提议国焘另起一通告说明前一通告及致上海信之错误。这是当时混乱的表演之一例。

中央政治局的精神既然如此混乱，鲍罗廷主义之一贯的领导愈益促进了混乱动摇和犹疑。有一日老鲍出席于政治局会议，发表他关于中国C.P之目前任务的主张，大意是说："中国C.P目前的任务不要以为只有土地革命是革命的工作，例如现在中国有这样广大的失业群众，假若能把这些失业群众组织起来也便是一件顶革命的工作。又如小资产阶级看不见他们自己的痛苦是由帝国主义的蒋介石的经济封锁，我们能领导工农向他们让步，工农让步之后，他们的痛苦，依然如故，彼时他们便能觉悟到自己的痛苦是由帝国主义及经济封锁来的。我们能使小资产阶级不怨恨工农也便是一件顶革命的工作。总之现在中国C.P应从各方面多做些有效的事情，令人看着佩服……"，这些教训只有使政治局的精神愈益混乱和动摇。这些教训在现在看来完全是一种迴避土地革命的改良主义。

老鲍在另一政治局会议发表他对于土地革命的意见，他公然说明"土地革命即不是没

收土地”。照他的解释，土地革命的意义和内容是：（1）减租减息；（2）乡村自治；（3）保护佃农；（4）武装自卫；（5）办农运讲习所，从新养成不幼稚不过火的农运人材。当时独秀说：“老鲍这种办法好是好，但是修改了国际土地革命的意义。”秋白说：“这不是修改国际土地革命意义，按照中国目前的状况确实只能如此做。”照老鲍的意思看来，武汉国民政府已算是顶土地革命的了，因为上列五项事情几乎皆已办到，而且在未出发北伐前的广东国民政府即已办到了。老鲍一直到底灌输这种改良主义于政治局，怎得不使我们迷离失所！此时大约国际有电报来调鲁易回去，鲁易也不管事了，老鲍每次都能出席于政治局的会议。

鲁易亦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便是中了“汪毒”。他还想拉住这个唐生智的小老婆（汪精卫）来做左派的“中心”，来扩大左派的武力，他竟把国际来电和盘托出告知汪精卫！国际来电的要点：（1）农民自动的没收土地；（2）武装C.P五万人；（3）推翻反动的国民党中央；（4）组织革命法庭，严惩一切反革命。这个电报怎能告知这个逆迹昭著的叛徒？！汪精卫知道这个电报之后，谢谢鲁易，跑向唐生智及其部下将领大大的鼓动起来，说第三国际及C.P即要解决国民党及其一切军队，实行共产革命。在这个严重的错误之下，中央政治局全体反对鲁易，大约老鲍也有电致国际，所以国际调他回去。

假左派叛逆的计划是已确定了的，所犹疑的只是用甚么口实来“分共”。公然抛弃三大政策么？这个太傻。为民众运动的过火么？更揭破了自己的假面具。这对于虚伪的叛徒确是一个难题，使他们不得不犹豫。汪精卫曾拟行一苦肉计，于七月十五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之前赴九江，名为与朱培德会商东征，实际让何键发难开刀，自己避免分共和破坏三大政策之恶名。现在好了，谢谢鲁易先生，为他们解决这个难题，使他们于苦肉计外寻得一更好东西，便是所谓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消灭国民党的阴谋。

现在严重的情形到了最后一阶段：（1）冯玉祥来电驱鲍分共；（2）何键露布讨共檄文，并发讨共通电于全国；（3）叶琪周烂（唐部下）名为回湘查办许克祥，实际举办十路清乡，积极向农民进攻；(4)唐生智回乡之日公开反共将马日事变责任完全推于C.P身上，公开枪决我们二同志；（5）何键等公开要求C.P分子立即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要求解散一切工农会纠察队、童子团及妇女团体；(6)何键之三十五军移驻汉口，其势汹汹，企图开刀。这是六月底的情形。

有一日下午（大约是六月二十七），和森从武昌的病假中（五次大会后决定独秀、国焘、维汉三人组织常委，恩来为秘书长，未到前由和森暂代。后因维汉留湘，不知下落，恩来改任军部书记，国焘因事与独秀口角后消极不管事，后又赴河南。因此始终不能成立确定的秘书厅及常委，而独秀又多外面往来之事；立三忙于全总及劳工部；平山忙于农民部；后补秋白为常委又因病常不能到；而且五次大会后，好几位重要首领，牢骚满腹，善使性气，秘书厅工作是最难做的。和森新从外国回来，事情又不熟习，且终日常驻不能他走，故工作异常不周。因此大家都露骨表示不愿和森再在秘书厅及常委。大约是六月二十四经政治局正式决定邓中夏同志为秘书长，在邓因劳动大会未到前由国焘同志以常委资格兼代秘书长工作。和森因病，于翌日告假到毛泽东同志家——在武昌——休息几日。）回到中央秘书厅之住屋。是夜我们中央军部来一紧急报告，说何键有今夜举事之说，各机关皆须戒备。翌晨，独秀召集在西门子鲍宅开紧急会议，立三、兆征因劳动大会未出席，秋白亦未

到。恩来、太雷（鄂省委书记）皆报告何键起事之消息甚盛，同时放散总工会纠察队将缴三十五军枪械之谣言与马日事变同一把戏；平山报告邓演达已出走，临行希望C.P注意汉口马日事变之来到。据他（邓）所知，何键一定开刀无疑云。同时太雷提出纠察队童子团问题今日一定要解决；恩来报告中央军部与省委军部业已决定于今日下午将总工会纠察队调过武汉入张发奎军，并已与张交涉好，但为避免耳目计，过河时不着纠察队衣服，也不携枪。和森说："这实际是解散纠察队了，何不率性公开宣布，以消灭何键暴动之藉口？"大家遂决定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实际编入张军。同时国焘提议中央机关立即移于武昌，他说："事到如今，我们与国民党要人还有什么接头之余地，（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撞着他们反难为情；我们的武力都在武昌方面，现在不如集中我们势力于武昌，整军经武，准备后事；汉口在何键暴动的威胁之下，唐部重兵皆集于此，武昌却是张发奎贺龙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左派军力所在地。"平山、和森皆赞成此提议。前三日和森在毛泽东家知道唐生智回湘后之公开反动（因每日都有逃亡的同志及农民到毛家来），曾写一信致中央常委说："……唐回湘后反动态度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我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当讨论此问题时，独秀表示犹疑，说过河往返，与国民党接头太不方便。讨论结果，决定中央机关立移武昌，同时省委机关亦移武昌。当即指和森立即往武昌布置机关，独秀、国焘料理常委及秘书厅事务；恩来、太雷料理处理纠察队及童子团等事。和森当即过河布置机关去了。

不意省委及总工会处理纠察队之事，手忙脚乱，未向负责同志说明，以致一时大形混乱，纠察队及办事人弃枪弃职，逃走一空。同时中央秘书厅未发迁移通告，并未将是日决议告之未列席之中央委员及活动分子，以致大家也莫明其妙。

和森在武昌布置机关妥当后，翌日黄昏独秀、国焘过来，不久秋白亦偕一它背毛子来。是夜开会于武昌之新机关：（1）国焘提议整军经武，注意军事工作；（2）（俄国）C.P中央来一决议，批评党的中央回避土地革命，独秀大发雷霆，碎之于地；（3）秋白有甚长之书面提议，大约系说明湖南农民问题所促进之阶级分化的革命危机，主张土地革命暂以减租减息等乡村自治保护佃农等为条件，待有武力再实行没收土地，中心问题仍在贯彻对国民党左派让步政策；（4）它背毛子出一答复国际之电稿，内有"凡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指导权"之语句。

国焘之提议未注意讨论，独秀看完秋白书面提议，深以为然，决定请秋白本此提议起草一正式决议案，于七月一日召集一活动分子会，或中央扩大会。

翌日仍回汉口开会于鲍宅；是日才知道这两日中因解散纠察队和中央秘书厅未迅速发迁移通告问题，同志间精神大形混乱，有几位同志激烈反对中央移于武昌，理由是："我们是领导左派的，左派首领尚在汉口支持革命的局面而向前进行，而我们反离开他们藏到武昌去，成甚么话……"。独秀也以为必须仍回汉口，才便与汪等接头，于是又决定中央机关仍回汉口。同时正式决定七月一日开中央扩大会议。

翌日又开会于鲍宅，老鲍出席做了一个很长的演说。大意是：（1）现在国际方面有一种空气，认我们中国党有改良主义，其实此改良主义并不存在，我的每一政策至少要比鲁易十倍以上的革命；（2）中国现状在客观上是很有利于我们的，在客观上无产阶级本

有取得领导权之可能。例如蒋介石一直到现在并未真正取得群众的领导权，他不过是侥悻成功，机械的用炮火把我们的势力打落下去，可是我们主观的力量没有成熟，我们不能真正领导农民（是地痞领导的），我们不能真正领导工人，我们不能组织广大的失业军，所以我们不能取得领导权；（3）史大林（俄党首领）主张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对的，可是史大林他所接受于季诺维夫（国际第七次扩大会前的委员长，反对派首领）的遗产太坏了。以前季诺维夫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大约指魏琴斯克）只教我们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未教我们武装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现在史大林的政策难于实行。老鲍做这演说时是很精神的。

独秀接着说："以前季诺维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史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它背毛子与少年国际代表则提出一反对老鲍演说的决议。指明第三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方针前后是一致的，从前季诺维夫的政策是经过俄国C.P中央批准的，不是季诺维夫个人决定的。老鲍巧得很，反指他们是帮助季诺维夫说话，是帮助反对派。

老鲍上面这个演说全是文饰自己的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也是他的起身炮，留下一个中国反对派的理论基础；国际方针前后是两截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国际负了责任。也就是说中国党没有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国际以前的政策才是改良主义机会主义。老鲍不说布哈林领导的第三国际"不懂中国情形"，不说史大林领导的俄国党中央"政策太左"，而把一切罪过移于季诺维夫，实际便是把中国机会主义的责任归于第三国际，而自己表面反似站在维护史大林的立场说话。

"我们主观力量没成熟"这句话在西北学说的字典上来解释工农运动过火，我们不能真正领导工农，一言包括，便是我们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太不成熟。若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典来解释，便是我们指导机关社会民主党化，迷信民族资产阶级，回避土地革命，以致不能取得领导权，一言包括，便是三月二十以来的机会主义太成熟了。

最后的破产到了，七月一日武昌的中央扩大会是五次大会后机会主义的总结。但这不是秋白同志和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秋白主持的决议和说明中，不过是两月以来（五次大会后）动摇、犹疑，回避土地革命，向所谓左派让步政策之总结罢了。

## 十　五人政治局至八七会议

不知道是七月初几（和森于七月二日大发旧病，三日由国焘通知说常委决定和森迁入医院养病，愈后即去九江有事），老鲍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威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不日秋白、立三赴九江，老鲍亦赴九江。常委又大掉换两湖工作同志，以为大反动到来，一切过去知名之人皆不应留在原地工作，如向忠发项、德隆等同志决定去俄，毛泽东等则决定派赴四川等。因此许多活动分子认为是"散伙政策"。同时常委决定，中央机关立迁九江而转上海，亦更增加同志之惶惑。

大约国际责斥机会主义调回老鲍及改组中央之训令已来了许久，老鲍秘不发表，中央移武昌时，它背毛子所携致国际电稿内有"……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指导权。

……"之语，我们莫明其妙。此后老鲍之提议改组五人政治局及独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系敷衍国际的；又恐独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参威为陪衬。这种用心至八七会议时才有人说出，原先我们莫明其妙。

此处老鲍又犯了最后的严重的政治错误：（1）假若老鲍早将国际训令发表，何至七月一日武昌中央扩大会犹在那里贯彻那回避土地革命向所谓左派让步的破产政策；（2）假使老鲍在中央扩大会议时国际训令发表，我们能于七月一日决定一与假左派决裂的方针；彼时唐生智、汪精卫与我们决裂的阴谋尚未成熟，势力还未完全集中；我们在鄂豫交界的张兆丰同志（属方振武）之一师二旅劲军还未被解决；张发奎（此时与唐甚冲突）、贺龙、叶挺及军事政治学校之军力皆集中武汉，工农民众冤屈愤慨，正是积久待发；假若此时决定与假左派决裂，便是决定我们在两湖以至江西之暴动，何致待至八月一号才在南昌发作呢？（3）老鲍临行犹给一种"逃跑主义"，"散伙主义"于五人政治局，以为"大反动临头了，中国的一九〇五年到了"，以致使此临时政治局开始即全无斗志，怀疑国际训令。所以老鲍不发表国际来电，敷衍国际之罪小，而延误我们的新方针之接受和新政策之执行其罪大！及至七月十三日的前几日，老鲍才提出国际来电以C.P中央名义发表一批评式的退出国民政府的宣言（国际来电是要我们示威的退出），此宣言之末尾还有"希望"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的幻想。然此宣言在政治上的影响是很大的；当时王荷波同志说："我们工人看了此宣言，虽然未扬眉，但觉吐了一口气……晦气。"

七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开会，我们的平山同志等不敢出席，我们的临时政治局也未准备任何群众示威的表示。只有何键的军队上街示威，并至国民党中央会议处欲捕我们吴玉章同志等。

此时临时中央机关又由汉口复移于武昌。和森在汉口出医院后（大约是十六日以后）曾写七次信于中央常委，提议之事有：（1）提议中央开一正式全体会决定新方针；(2)提议武汉三镇举行一大示威运动，反抗"分共经过"之国民党宣言；（3）提议重新号召土地革命，一切政策及号召以此为中心，揭破国民党减租之假面具（国民党中央于十七日发表一减租命令）；（4）认我们现在的失败不是一九〇五年，认唐汪政权并未稳定，工农势力并未冷火气，因此主张中央仍留两湖奋斗，反对迁去九江或上海之逃跑主义；(5)反对类似"散伙政策"，并自请仍应留两湖工作，不愿去海参威办党校；（6）主张在张发奎军中准备独立动作，并公开作反汪派之鼓动。此时国际代表已到汉口，且态度异常严厉，主张立即惩罚独秀、平山、维汉，又骂国焘等不赞成土地革命，不配当中央指导人，又向国焘、太雷、维汉（常委）声明"如果你们反对开中央改组会，我直接召集各地代表开会"，同时果派去一个毛子直接赴湖南宣布中央机会主义的错误和立即改组中央。因此常委及一部分上层同志对于和森大起误会，以为和森是"投国际的机"，"想组织左派"，"国际训令来后称好汉"，"摆脱过去共同参加的错误，说漂亮话"，"每日一封信唱高调"……。其实上面那些情形是八七会议之前几日，太雷同志报告出来（在常委）和森才知道的。

事后追论，当时常委诸同志只见到党的上层的危机（上而国际责罚，下而同志非难），而未见到革命挫败时群众异常惶惑和恐慌的大危机。此危机只有斩钉截铁宣布与执行国际新方针才得挽回。此时常委是站在一种伦理观点上去护党，而不是站在政治观点上去护党。常委只知接受国际训令，处罚中央及首领，将于党有危机，而不知不接受国际训

令，不宣布新方针，于党及革命的危机更为重大。此时上层首领的利益与党及革命的利益是难两全的；和森违背指导团体的共同，独自急进的主张承认一切机会主义的错误，改组中央，接受国际训令，这在通常的道德和伦理上讲是可鄙的；常委顾全指导团体的共同，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愿接受国际新方针，这在非阶级的道德和伦理上讲是可钦佩的。然若在我们的政治上讲则是非黑白的位置又是不同的。五次大会前，有人咒骂秋白是国际决议到后称好汉，自然现在这种咒骂又移到了和森。然而事实不是如此的。第一，因为和森"每日一信唱高调"都是向中央常委唱的，并未向下层群众鼓动或宣传过；第二，和森个人的思想，因为在武昌毛泽东家获与由湘逃来之同志及农民谈话（他们甚不满意于中央及湖南领导人，说不是许克祥杀他们，乃是某某杀他们……），因而思想上起了变化，又因病在医院，有时间想这些问题；第三，和森与国际代表之关系是在八七会议及翌日之新中央会议见过二次；第四，和森与八七之前请求派赴湖南参加秋收暴动工作，并得常委之许可，绝无仍留中央"称好汉"之企图；第五，和森始终不主张旧指导人多留于改组之中央，其理由在八七之前的常委会及八七会议中皆正式发表过，因为如此，才能使党内外群众耳目一新，因为如此对于新方针之执行才有充分保障。八七会议，和森之所以反对国际代表提出之名单（是与常委决定的），是因为除加一苏兆征同志及罗亦农同志外，一切皆是旧人，即王荷波、向忠发、顾顺章等工人同志初皆未列，许久以来代表湖南农民革命之激烈倾向的毛泽东、彭公达同志（彭是马日事变后提议号召三十万农民进攻长沙的）亦未在列，而如和森反在名单内有地位；第六，和森主张中央只留秋白，毛泽东应加入，太雷应出外工作而不应留秘书厅，维汉可留中央组织部或秘书厅工作而不必兼常委名义，这些都是斟酌当时实际情形而主张的；第七，和森与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甚至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八七会议时又主张他在中央；第八，和森请求回湘工作，绝不是企图与泽东等组织甚么左派。只因两湖暴动和森是提议之一人，又彼时湖南工作实须要加人。八七之明夜，和森正欲与公达上船回湘，而新中央来一命令仃止和森前去，翌日开会正式决定来北方工作。和森于讨论决定之后，即遵照决定北来，一直到现在没有甚么左派的宣传和组织，便是明证；第九，在八七前后反对那种盛行的"党在组织方面无出路"的悲观空气，是正确的，并不是和森想造左派故如此之乐观。

八七紧急会议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纵然在严重情形之下，不能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改组中央，发展讨论，纵然中央及全党的组织问题，还无很满意的解决，然无论如何总是公然的正式的承认了自己机会主义的错误（不是国际不懂中国情形，政策过左，以致中国革命失败；也不是我们有错误，国际也有错误），公然的正式的接受了国际的新方针；由此会议救出中国共产党于机会主义的破产之中，挽回了全国工农群众惶惑恐慌的大危机，树立了工农革命苏维埃政权的新大旗。

自然八七会议不过开始承认与改正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不是这一次便完全肃清了机会主义，机会主义的遗毒在党内还是很深的。然仅仅是这一开始承认与改正便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八七会议未郑重讨论南昌暴动问题是一缺点。会议之末，和森曾提议讨论此问题，以为

未宣布没收土地掀起江西本省的农民暴动，未完全解除敌人的武装而即出走为失策。然当日已没有时间容许讨论此问题。第二日新中央开会，和森又提议前敌主要负责同志有怀疑新政策之弱点，应注意指导人问题，然是日亦不容许讨论此问题。

南昌暴动之失败不是偶然的，主要的是因前敌主要负责人之主观没有根本改变。平山同志不必论，国焘同志自从主持五人政治局及常委以来，开始表现他政治上弱点，尤其怀疑土地革命，不甚相信群众势力而对于张发奎发生幻想。国焘同志在五次大会前素来的倾向大体都是很好的，在五次大会后的七人政治局中，除开始月余消极一点外，也还没有严重的错误，即有也是旋进旋退的，国焘同志严重的错误，是开始主持常委之时，所以他赴南昌去时对于暴动是没有决心的。

虽有广东两湖之失败，然我们绝对不要忘记八七以后之伟大的效果。北方有好些同志说："假若新方针迟来一月，我们都散了。"这不仅北方为然，全国莫不如此，尤其在两湖，上海及广东。我们仗着新方针，不仅挽回了工农群众的恐慌和悲观，而且兴奋了广大范围内几百几千万的群众继续不断的发展工农革命的高潮，一直向苏维埃政权走。

国际训令初到时，党的上层之间发生一种悲观的空气，以为国际训令这样一来，一切旧指导机关和指导人的信任打得粉碎，因此以为党在组织方面没有出路，亦农同志甚至说："即使在政治方面有出路，组织方面是无出路的。"又以为党没有家长了，一定要各不相下，四分五裂。因为有这些顾虑，以致对于接受新方针，非常犹疑，非常害怕。现在八七以后的事实，可以答复这种顾虑和悲观。

八七以后，只有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四分五裂，不成东西。我们的党适得其反，我们在新方针之下不仅重新团结了党员群众，而且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到新的革命高潮上来，这是值得我们自夸的。

## 十一　问题与结论

我们的党虽然犯了以上种种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然我党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功绩，是非常伟大而不可磨灭的。

五四以前，中国虽然有工人，但还没有形成为一个阶级。广东香港虽然有工会，但还没有阶级的自觉。自有中国共产党产生，才有阶级觉悟的工会之组织，才有阶级觉悟罢工之发展，中国工人才开始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

五四以前，中国工人及苦力虽然也曾多次被小资产阶级政党利用来参加过革命争斗，然完全没有阶级的觉悟和阶级的要求，屡次都是徒被利用，一无所得。自从第三国际命令我们加入国民党以来，我们在广东获得广大的工农组织势力和阶级争斗的发展。一年以后，即有五卅的革命高潮。五卅之后，不及一年，又有北伐的革命高潮之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在C．P领导之下，做了中国革命之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领导者，同时跑上了世界革命的最前线。民国十三年以来，中国革命之旗帜，名义上是国民党孙中山，而实际是工人阶级和C．P。这几年中，名义上虽是做民族革命工作，而实际上发展了最深刻最广大的阶级争斗。工人阶级组织势力发展到五百万以上，农民到几千百万以上。百战不仃的经济和政治争斗的经验，已经使广东几十万工农群众于革命三次挫败之后，还能奋起建立广州及东

江琼崖各县的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的年龄不过八岁，而其领导工人由组织工会，参加民族革命，以至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超过西欧两世纪以上的历史。以这样幼稚的党领导这样伟大的迅速的争斗，错误是必然难免的。

从三月二十以至贺叶失败的机会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受了严重的挫折，这是事实；同时从民国十三年加入国民党以至十六年七月与国民党决裂，在此三年中，积聚和发展了广大的工农革命势力与经验，也是事实。宽恕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后所发生的机会主义错误固属不对，同时因为武汉的叛逆和决裂而认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根本错误则更属不对。

托罗茨基及国际反对派藉口中国革命的失败，攻击第三国际和俄国C．P中央，他们欲把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归于俄国C．P中央，他们以为三月二十即应与国民党决裂，不应帮助北伐和武汉政府……。这些都是反对派藉口攻击的政治作用。事实不是如此的。三月二十事变象我们中央所采取之退让态度，甚至仃止阶级争斗，这是错误的；但若说这个时候我们便可与资产阶级完全决裂也是错误，因为彼时我们的力量还未成熟。我们从三二十事变以至北伐以后的错误，不在不立即与资产阶级决裂，而在不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反而抛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帮助资产阶级领导权之实现。这便是机会主义的错误。这错误不在国际而在中国党中央。就事实说，北伐对于工农势力的发展是异常伟大的。假若我们能运用这种伟大的力量去对付将要叛逆的资产阶级（蒋介石为其代表），结果我们是可由三大政策一直领导革命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失掉的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而获得的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所以北伐政策根本是对的。

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独裁制根本亦是对的。在此原则之下去帮助与改造武汉政府也是对的。假若我们能坚决的在两湖实行土地革命，坚决的实行国际及五次大会的决议，坚决的制胜夏斗寅、许克祥、唐生智的反革命及阴谋，武汉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完全可在我们的势力之下去改组，所以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制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利的。后来两湖的失败绝不是这个原则的责任，而是回避土地革命的西北学说和阿附小资产阶级的退让政策之责任。

有人以为八七以后的暴动政策是国际对付反对派的作用，这种观念是根本不对的。八七以后的暴动是马日事变后湖南工农的需要，夏斗寅及七月十五事变后湖北工农的需要，四月事变后，江苏广东工农即有此需要。

说到组织问题，党内群众的政治讨论，素来是没有的，指导机关内工农成分也是没有的，所以虽然有最革命的工农阶级，和最精华的工农党员群众，他们的趋向和意见从未在党内起作用。质言之，他们在中国革命上起了很伟大的作用，而在领导革命的自己的党内反没有起丝毫作用。这便是过去机会主义之组织方面的来源。所以组织问题，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本是民主集中制。然八年以来，只有从上至下的集中，而没有从下至上的民主。最近三年以来，党的组织象暴发户一样的发展；一九二五年以前是不满五百人的知识分子小团体，一九二五年以后，却发展至五万以上的大群众。

一九二五年以前，党的指导机关没有工人分子参加，是必然难免的；一九二五年以后，党既开始成为群众的，而指导机关仍然没有群众化，且渐渐养成一种轻视工人同志能力和不相信群众的习惯；加以民族革命的高潮发展，从上至下的指导机关，无形中逐渐小

资产阶级化或民族资产阶级化，这些便是机会主义的来源。

从一九二五年以至北伐的革命高潮中，已经锻炼出广大的工农群众的革命势力，同时更锻炼出无数工农群众的领袖；然而我党的组织全未反映这种伟大的进步，指导机关始终未相当吸收这些群众的争斗的领袖进去。另一方面，群众的党内生活全未形成，既无党的讨论，又无选举制度；甚至上级党部不准下级党部自发口号，自发宣言，自定当地争斗之政策，务使下级党部完全依赖上级党部的指导，党员完全是听从号令的兵士。这样的组织状况，形式上是很整齐严肃的，真是铁的组织，铁的纪律一般。可是伏在里面的危机是很大的。党员群众及下级党部始终不能自发自动发展其创发能力，始终只是命令一下动作一下的兵士，而不是很自觉很自动的作战单位和战斗员，因此养成的习惯是：只有上级机关的意见和是非，而没有下级党部及群众的意见和是非。下级党部及群众对于上级机关如果发生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时，上级机关便要认为大逆不道采取高压。由此养成"怕群众"的习惯，党内事情怕群众知道，以为如此，将发生异见，动摇指导机关的威信；因此，指导机关自然也愈怕群众的代表来参加。指导机关与群众的关系不仅不良，不仅隔断，甚至背道而驰，群众完全离开党，党的指导机关完全抛弃群众，在天高皇帝远的深宫之中，做那铁的组织，铁的纪律的酋长时代的工作，愈做愈没有党，愈没有群众，愈没有工作！铁的纪律成了威压党员的刑具，而上级指导人却有超越此铁的组织和铁的纪律之一切自由。最后这一现象在直隶是特别明显的。这便形成了组织上的系统的机会主义。彭述之同志不能不算是这一机会主义的代表。

这一机会主义是完全违反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的。铁的组织和铁的纪律对于无产阶级共产党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样组织和纪律，不能成功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列宁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在组织方面之显明的区别，亦即是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之区别。可是述之及亦农同志在东方大学所发明之组织教育系统，完全与列宁主义相反，表面上是穿凿附会列宁的口号，实际是酋长的宗法的知识阶级的把戏。

我们要铲除政治方面机会主义的系统，同时也要铲除组织方面机会主义的系统。我们现在应改造真正成为列宁主义的铁的组织铁的纪律，真正成为是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这种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不是削弱党员群众及下级党部的自动自觉与创发精神的，乃是增进党员群众及下级党部的自动自觉与创发精神的；不是弛缓党的纪律和组织，乃是强固党的组织和纪律，铲除那种旧军队式的组织毛病，而改造为自觉自动的群众党的组织；铲除那种机械的宗法的纪律，而代之以真正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同时由下而上的党内讨论应尽可能的发展，由下而上的选举制度，应尽可能的采用，工农同志应尽可能参加指导机关，党内事情应尽可能的使党员群众知道。这些都是改造组织的重要任务。但这些施行到甚么程度甚么界限呢？以不妨害集中制和革命行动的需要为界限。超越此界限的极端民主化的要求，也是不能容许的。

现在党的改造是整个的全盘的改造，而不是甚么派别的改造。我们要在国际新方针之下，重新团结党的队伍，强固党的凝结性和统一性。我们所有工农党员群众及好的知识分子党员群众是可完全团结于此新方针之下，来完成中国工农革命的。因为全中国的工农群众莫有不欢迎新方针的，他们的先进分子更不待说。国际新方针初到时，有人以为将有引起党的分裂之危险，其实这危险在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就是在主观上我们也要注意防止这

危险；第一，最少几个为群众所不满的系统的机会主义者，必须在相当时间仃止其指导工作；第二，一切指导机关，尽可能由群众选其相信之人负责；第三，过去一切错误和是非，尽可能交与群众讨论判断，尽可能发展党内讨论；第四，严防机会主义者企图团结一部分党员阻碍党的改组；第五，严厉反对第三党之企图，动摇或分裂党的队伍，更应严厉反对"让小资产阶级分子和腐化分子到第三党去"之说；第六，绝对相信群众来改造党，不应只相信上级机关或已经为群众所不满的中坚分子来改造党；第七，在此改造时期，上级机关绝对不应袒护群众所不满的少数分子，而忽视一个地方或几个地方群众之意见；第八，在此改造时期，不应让少数一二系统的机会主义者有凭藉党的机关，压抑群众及其意见之可能，即使群众意见是错误的，也应其发表之后，再予以纠正，万不能采取国民党中央"仃止"这个"仃止"那个之办法；第九，应努力于全党之改造，而不应组织甚么左派；第十，反对述之一类人利用"制造派别"、"分工学界限"的罪名来阻挠党的改造；第十一，反对抛弃或开除所谓大批"腐化"的下层群众，即使一部分群众有腐化或消极之表现，也应去找出所以使之腐化或消极的来源；第十二，除最少几个为群众所不满的系统的机会主义者之外，一切活动分子皆应尽可能的分配工作，万不应站在一种非政治的考虑之上，排斥或送出大批活动分子于工作或国境之外。

所以在此改造时期，党的机关所要注意的是：不要怕群众，不要怕讨论或批评。党员群众所要注意的是，不要笼统的反对知识分子，不要笼统的反对一切过去的负责工作同志。并不是一切知识分子都是机会主义者，也不是一切旧的负责工作同志，都是系统的机会主义者。凡属一切不压抑群众意见，不妨害党的改造之分子，都应尽可能的利用到工作上来。

党不是要改造成为个狭隘的小团体，乃是要改造成为一伟大的健全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政党。我们并不是要把一切犯过错误的人都送上断头台，我们也不是要把一切机会主义的分子都送上断头台，我们只要指导机关打开门户，由群众选举，由群众监督，相当的能受群众正确的影响，而不一味违反群众的意见与趋向。

另一方面，党的改造不是换几个上级机关便了事，更不是由知识分子换成工人，由旧的分子换成新的分子便算了事。根本是要从小组支部起，实行改造过来；根本是要肃清一切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机会主义遗毒，要改变过去机会主义时期之畸形的党内生活、教育、训练以及一切不正确的工作方法。我们要由此次的改组，获得八年来中国革命之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建立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成功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来完成中国工农革命的任务！

我们的党，现在是开始到了这样改造的伟大时期；我们全体党员同志应共同起来完成这伟大的历史使命。

上面这个报告，是上年九月在直隶省委改组会及其他各处的活动分子会报告出来的。现在才整理付印。身边无任何文件或材料，全是靠着脑中的记忆。小的错误之处自属难免，大体则自信极其客观，极其忠实。惟自一九二五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四月之一年半的时间，和森未在国内参加工作，故语焉不详。全部报告如有错误之处，望有关系同志予以纠正或辩驳，用供发展党内讨论之一助。和森附识。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
# 中 国 问 题 决 议 案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五日）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底当前问题

………………

东方问题。过去的一年同样证实了东方事件发展底列宁主义的估计之绝对正确性，这个估计是由共产国际扩大的执行委员会底前一次常会所作的。东方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曾有巨大的进步，而且有些地方的发展，甚至比所期待的还要迅速些。在东方开始工业化的远景之下，事件更显得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可以举出以下的重要的进展以及东方各民族底解放斗争之成绩：

（一）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之尖锐形式，在摩洛哥和叙利亚已变为直接的武装起义。

叙利亚和摩洛哥的事件，一方面表明，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确乎是在增长着，削弱着帝国主义，并且在巩固着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法国共产党反对在摩洛哥和叙利亚的殖民地战争之坚决斗争，表明无产阶级底先锋队是如何与那为自由而斗争的殖民地的人民相团结一致，且把这个斗争与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的国际斗争相配合起来。

（二）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底广大的群众性，这个运动包括了千百万城市居民和农民。

（三）印度、中国以及局部的埃及土著工商业大资产阶级底某些阶层离开了民族解放运动，而运动的领导权转到革命阶层方面。

（四）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底独立的阶级行动（上海、香港、广州的政治罢工）。在印度迅速的工业化是在增强着，开始起着重大作用的印度无产阶级底社会比重。

中国的运动无疑地有着全世界历史的意义，并且表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底后备军在东方是如何不可度量地巨大。

年青的中国工人运动底意义，在总的民族解放斗争底范围内已经极端增长了。工人运动在中国已经作了许多重要的收获，比如：具有阶级观点的职工会之组织，与共产党员联系起来的国民革命党——国民党底影响之增长，广州革命政府——东方革命民主政府底第一个榜样——之增强，这个政府是依靠于城市和乡村的广大劳动群众，并且进行着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强的斗争。

………………

# 中 国 问 题

（一）中国工人底上海和香港的政治罢工（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月），在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中造成了一个转折点。这些罢工做了在国家独立和组织人民政权的口号之下的雄壮的全民运动底起始点，并且业已组织在阶级的职工会以内的、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在这个运动的时期，已经表现出自己是民主群众运动底领导力量，是争取国家独立和建立人民政权底主导者和主要的战士。同时，在革命民主的口号之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底这一政治运动，特别是它的反对中国资本家的进一步的罢工的经济斗争，巩固了无产阶级底阶级组织，同时并使民族解放运动发生分化，使中国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底某些阶层离开这个运动了。

（二）无产阶级底政治行动给了国内一切革命民主组织，首先对国民党及广州革命政府之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以有力的推动。国民党——其基本核心是与中国共产党员联合起来行动的——自身，乃是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主派等阶层底各阶级利益之共同性底基础上，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及生活中的一切军事封建制度，为争取国家底独立和统一的革命民主政权而斗争的一个革命联盟。

国民党在广州所建立的革命政府，已经与工人、农民及城市民主派底最广大的群众联系起来，并且依靠他们，击败了受帝国主义者所支持的反革命匪帮（而且实行着使广东省底全部政治生活急剧地民主化的工作）。这样，广州政府就成为中国人民为独立而斗争的先锋队，同时成为国内将来的革命民主建设底榜样（共产党和国民党应当多方面地促进广州政府所实行的国内民主化工作之扩展和深入，在各地组织民主的地方机关，实施土地改革，言论、出版、会议等等之民主自由）。

暂时聚集在国民党周围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其个别阶层，在最近一年来已经离开了该党，以致引起了国民党右翼底不大的集团之形式；这个集团公然出面反对国民党与劳动群众的密切联合，主张从国民党内开除共产党员，并且反对广州政府底革命政策。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一月）对这个右派之斥责以及对国民党与共产党员战斗联盟底必要性之确立，遂巩固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活动之革命方面，而给国民党保证了以无产阶级底革命的支持。

（三）中国群众性的民族解放运动之增长，更其加强了军事封建派系——奉、直二系之削弱、分化、瓦解底过程，这些派系乃是外国帝国主义者在国内统治的支柱，并且它们经常受着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支持，而构成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胜利底主要障碍物。

在这个军事封建派系瓦解和分化以及民主组织影响增长底基础之上，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已经走上编制自己的军事力量底道路，这种力量可给予封建军阀以坚决的打击，并且成为中国民族独立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之砥柱。广州在这个关系上，还创造了民主军事力量底组织及其与劳动民众和城市民主派相互关系底较进步的形式。国民军在华北之成立及其反对封建军阀之斗争，乃是民族解放运动底重大成绩，它们与广州军队共同成为建立中国民族革命民主军队之基础。中国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底任务，应该是对于这个组织民主革命底军事力量的事业予以最坚决的维护，而同时又应该在军队本身底内部关系（它的编

制、挑选和改造干部，严正的组织政治工作），以及在其与经常或临时驻扎区域的民众之相互关系上，进行革命化底最坚毅的和坚决的工作。

（四）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民族民主趋向底增长，以及这个运动中的中国无产阶级影响之增强，是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即共产国际和苏联劳动大众方面所得到的那种雄壮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援助有着极密切的联系。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者统治的斗争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这些帝国主义者的斗争，是在密切的相互结合之中发展着。共产国际各个支部的任务，应该是将中国劳动大众所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斗争底全部意义，向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底劳动群众作最广泛的解释，对这个运动予以最有力的援助，并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者用军事干涉或封锁来毁灭这个运动的一切企图。这个斗争应该是在"不许侵犯中国"、承认中国之完全独立、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各帝国主义政府在华的全部军队等口号之下来进行。同时，中国共产党员应当向中国劳动群众说明，只有领导反对世界资本的革命斗争的共产国际，才是劳动群众在其争取民族的或社会的解放斗争中的革命同盟者。必须在群众的面前揭穿第二国际及亚姆斯特丹国际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全部出卖行为的性质，以及它们在假仁假义的面具之下而事实上帮助帝国主义者力图消灭中国人民求独立斗争之意向。

（五）力谋保存自己在中国统治权的各国帝国主义者，都力图利用中国群众性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中的某些间歇，来向中国作新的进攻，其主要目的就是毁灭革命民主之中心和组织。在这种新的危险面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应该发展最广泛的政治工作，并组织群众的行动去支持国民军底斗争，利用帝国主义者营垒中的内部矛盾，而把革命民主组织领导下的最广大的民众阶层（工人、农民、资产阶级）底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去与帝国主义者对立起来。

（六）中国共产党只有在那种场合中，即是它在斗争的全程中，把自己当作中国无产阶级底阶级政党和共产国际的支部，而经常地巩固自己的组织和影响才能完成摆在它面前的领导中国劳动群众在其反对帝国主义者斗争中的历史任务。最近一年来，中国共产党之自决过程，由于在党的领导下而进行的广大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之结果，大大向前推进了；然而，党底组织的定形化尚远未完成。中国共产党员的政治自决，将在反对两种同样有害的偏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即一面要反对右的取消主义，此种偏向是抹煞中国无产阶级底独立的阶级任务，而走向与一般的民主的民族运动底不拘形式的合流；另一方面要反对极端的左的情绪，这一偏向力谋跳过运动的革命民主阶段，直接走向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底任务，忘掉了农民——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底这个基本的和决定的因素。在情况的全部特殊性之下，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底策略问题，颇近于一九〇五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摆在俄国无产阶级面前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革命的教训——如同列宁主义所确定的——之领会以及党底政治的和组织的巩固，定可大大地有助于消灭和防止这里所指出的离开正确的策略路线的两种偏向。

（七）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底基本问题乃是农民问题。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底革命民主倾向之胜利，将以四万万中国农民群众被吸入于与中国工人共同一起和吸收到在他的领导之下的坚决的革命斗争中去的程度是赖。中国农民是在从未听闻过的艰苦条件中生活着。外国资本之潜入国内，曾经破坏了农村中的家长制的关系。极端落后的农业技术，不能使国内

日益增长的人口有依靠土地过活的可能。外国的低廉商品之竞争，摧毁着手工艺业。帝国主义派系间的不断的国内战争，最后使农民群众破产。千百万农民之失掉土地和贫困化；缺乏土地及地租之奴役条件，加上富裕的土地占有者与佃农群众之间的中国人底高利贷盘剥之存在；苛捐杂税及实行的提前数年的预缴办法；土匪之猖獗及正规军方面的劫掠行为；第一等生活必需品的特别税捐，连外国帝国主义者所规定的盐税在内；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关卡林立——这一切都是在破坏着中国农民经济底基础，把他（农民——译者）变为革命力量底巨大的后备军了，这个力量能够而且一定要对农民底一切灾害之罪人——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予以当头棒击的。关于不久以前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起义（前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起义及其它）的记忆，在农民群众中还活现着。许多地区的农村，已经布满了各种各样的革命的农民组织网，这些组织时而发动反对压迫者的武装斗争，但是，总的来说，中国农民还是散漫的，而他的组织事业还很少有推进。国民党内的中国共产党员，其基本任务便是向全国农民群众解释，只有在工人阶级和农民同盟的基础上组织独立的革命民主政权，才能急剧地改进农民底物质的和政治的地位，才能把农民群众吸引到战斗口号之下的积极斗争中去，这些口号把他们所了解的切身的政治和经济的要求与反对军阀及帝国主义者斗争底总的政治任务结合起来。在这里必须记住，在反对军事封建制度底残余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中国农民还将要长久地以一致的力量而行动的。所以，除估计到农民中若干分化之存在，并且力谋与乡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阶层及其组织作最大限度的接近外，仍必须把乡村中现有的一切农民组织联合到某几个总的革命中心中去（参看一九二五年四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农民问题的提纲），这些中心，能够掀起全体农民起来作武装斗争，以反对军阀和反对维持现在农村中半封建制度的官吏、中间人和劣绅 。

（八）在工人运动方面，中国共产党应当力谋为了改善工人的从未听闻的困苦地位而加深经济斗争，并要力谋巩固和发展职工运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职工会，应当与全国一起坚决而经常的参加全面的革命斗争，同时并应当成为工人底真正经济的组织——此种组织能够灵敏底倾听工人底日常经济上的需要，领导他们反对外国及中国资本家之斗争。必须巩固职工会的联系，求得它们公开的存在，把它们在生产的基础上改造过来，组织代表会议，工厂——制造厂委员会。同时党应当在职工会内部组织自己的党团，以便巩固自己在职工会内的影响。

（九）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改良主义在中国无产阶级及民族解放运动中给自己创造支撑点底一切企图，应当予以特别的注意。我们可以预料到，国际改良主义底各种派别——自美国和日本的康比斯主义①为代表的极端右派起，到奥托·鲍威尔所领导的所谓左

① 康比斯（康比斯主义）生于一八五〇年，死于一九二四年，为美国职工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有一短时期他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后来变为社会主义底和苏联底凶恶的敌人。这个极端的反动家认为亚姆斯丹的国际都是过乎“革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极力帮助美国政府，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主张阶级合作，支持资产阶级的政府。——译者注释，1942年6月11日。

派止，——会向中国进攻的。要反对一切这些派别底宣传，这种宣传将在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底口号之下进行，并且将成为美国资本进攻底掩护物，中国共产党应当展开广泛的解释运动，说明整个国际改良主义底叛卖作用，它在东方将企图成为帝国主义在其反对劳动群众底解放运动斗争中的支柱。

（十）中国共产党应当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底群众组织。在阶级的职工会——它团结了成千成百的工人——存在之下，过去一年党的增长，自然是不够的。中国共产党须要尽可能地较迅速地消灭对于群众工作者——工人之加入共产党的那种陈旧的狭隘关门主义的观点。须要取消对于工人入党的一切多余的形式上的障碍。只有在自己扩大和团结底基础上，党才能保证自己在运动中的领导。

# 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 一　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

（一）中国革命是破毁资本主义稳定最有力量重要的原素之一。最近两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受了严重的失败，其结果将影响世界资本主义的恐慌，使之更加剧烈。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的结果，实际上扫除了帝国主义在半个中国的统治。

为中国广大群众所拥护的广东革命军之往后的胜利，将战胜帝国主义，完成中国之独立及革命的统一。这种统一，必能增加反抗帝国主义影响的力量到许多倍。

孙传芳阻挡广东军队前进的失败，使帝国主义列强相信，利用本地军阀做破坏国民革命的工具的传统方法，现已不能完全适合实际了。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之互相竞争，使他们不能联合而实行公开的武力干涉。帝国主义正在找寻适应现在局面的新方法，这种新的政策，就是趋向于承认广东政府。美国帝国主义将为这个政策的发起者。即英、日两国，也以为承认广东政府在政治上是可允许的。然而，这不过是外交手段，其幕后还隐藏着帝国主义者反革命的阴谋毒计。

（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基本势力，即实际上垄断全国一切财政与工业（垄断盐税，抵押关税；铁路、航路、交通、矿山、重工业，——这些多属于外国资本）。倘若帝国主义能够保持这个坚实的基础，帝国主义将在中国获得稳定资本主义的柱石。中国人口之多，使中国成为无尽藏的市场。倘使有投资所必需的政治保障时，中国是投资最有利的场所。巨量的中国原料贮藏，简直没有动过。所以，帝国主义将用拼命的力量，打破那有推倒帝国主义的危险之中国革命。倘若用引起内战的传统方法，或用可能的武力干涉的方法，都不足以消灭革命，则帝国主义将分裂那循着革命道路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

虽然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互有冲突，但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外国的干涉，在中国有特别的方式。在现在情形之下，帝国主义者宁取组织内战和接济反革命军队，以压迫革命的干涉形式。现在，帝国主义正企图联合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等军队，以阻止国民革命军的前进。这种反革命的联合战线，必在帝国主义指导之下形成，且得帝国主义的帮助的，这是很明显的事。中国革命的胜利，给帝国主义者以如此重大的打击，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用尽方法来消灭他。

（三）从中国革命的外面情形的观点上来看，因其有反帝国主义性质，故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利于中国革命之发展及其深入的几个重

要情形：

（甲）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互相竞争，软弱了国际帝国主义的阵势。

（乙）世界资本主义的恐慌。

（丙）西欧无产阶级运动之发达。武装的干涉中国，必遭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反对。

（丁）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之发展，且因中国革命进展的影响而更剧烈。

（戊）苏联无产阶级独裁制之存在。它在地理上又与中国很接近；中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军事、政治等重要中心，在地理上却相离较远。

## 二　中国革命之社会力量及其结合

（四）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非常迅速，参加这个革命运动的各种社会势力之结合方式，也很迅速的（并行的）起变化的过程。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于很特殊的环境中，故其现状，较之十九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和1905年的俄国革命，都不相同。

最显著的特点，是中国受国际帝国主义牵制的半殖民地的地位。另一个特点，表示中国革命异于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的，即中国革命发生于世界革命的时期，而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运动中之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这一个要素，是决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及参加革命的社会力量之结合的。

中国革命中阶级力量的发展，是在非常落后的中国经济背景里。其原因则为工业资本主义低度之发展，农业经济尚用原始技术，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程度奇特的低微，以及许多半封建制度的残留等。这种半封建制度的余迹，正在被革命军的压力所破坏，而引起城乡劳动群众的斗争。

现时中国经济情形的主要特点，就是中国经济的成分，可比杂色的荷包，从财政资本以至宗法祠族制度的经济关系之余迹，都时时存在，其中占优势的，乃是各种形式的商业资本，及城乡的小手工业和小工业。

这就使中国民众之阶级分化不明显，并使国民革命之社会政治力量的组织程度不甚高。

同样，亦有重要意义的，即从1911年革命以来，中央政府机关的崩败，在近几年日益加甚；国内大部分土地都成为中国军阀之军事政治组织的统治。

中国军阀，代表一种社会政治的力量，现在统治了一大部分的中国。中国军阀之特质，就是它虽系武装组织，而同时它利用半封建性的整个国家制度，而成为中国之资本最初积累的分子之一。中国军阀的国家组织之存在，建筑在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国地域的闭塞，中国经济的落后，以及乡村有很多的人口过剩等原因之上。

现时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着重在土地革命之上。中国的乡村经济，就是一幅图画：许多半封建的经济关系之余迹与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原素，互相密切地交缠着。

中国一般经济之非常落后，又细小又分散的土地私有制，很多数量的农民是佃农与半佃农，大小农业经济都用原始技术，多量的农民人口的过剩，同时，农产贸易之发展，以及乡村中阶级分化的进程。如此，愈使乡间情形，更为复杂，形成中国土地革命路上的许

多障碍。

中国乡村间的阶级斗争，因客观环境的关系，其发展有以下的倾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反对国内军阀，反对大地主的残余，反对土豪劣绅，反对商业重利的资本，以及部分的反对富农领袖。

（五）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之连续的阶段，可以各种社会力量的改变结合来证明。在第一个阶段里，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主要推动力之一，他们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队伍中找助手。

第二阶段，革命运动的性质改变了——它的社会基础，亦转变到另一方面的阶级的结合。斗争的方式，发展得更新而更革命。工人阶级在中国斗争场上出现，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原素。

经济罢工发展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于是有世界的历史的重要意义。无产阶级和农民（他们很积极为自己利益而奋斗），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等相结合，这类力量的结合，在政治上的表现，适合国民党和广东政府中所有的结合。现在，革命运动已到了第三阶段之门，正是阶级的新结合之前夜。在这阶段里，发展运动的主动力，将是一个更有革命性的结合，——无产阶级，农人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结合，而离开一大部分大资产阶级。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整个的资产阶级将要离开民族解放斗争的战场，因为除中小资产阶级以外，甚至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在某时期里，将和革命同道。

可是，在这个阶段中，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将日渐落在无产阶级身上。

在此时期，是从民族解放运动过渡至新的革命局面，大资产阶级看见反帝国主义战斗，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超过了它的控制，客观上危害它的阶级利益。

于是它（大资产阶级）企图夺取革命领导权，以达破坏革命之目的。它谋影响革命运动，以资产阶级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想，反对阶级斗争的思想。

（六）反革命力量之形成，与革命的阶级力量之结合，是同时并进的。这个反革命团结之进程，与帝国主义的政策，有密切关系，并受其影响的；犹之中国革命势力之发展，是与世界革命（苏联与西方无产阶级）有密切关系，并受其影响的一样。

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企图联合他们的力量，以压制胜利的革命运动。这个反革命的团结，是受了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帮助而造成的。大工业资产阶级表现日益动摇，倾向与外国资本协调，而承认其统治。帝国主义看见军阀不能作消灭革命运动的有效工具，于是用和平方法，在民族革命势力中，找寻他的同盟者。帝国主义者，企图叫醒民族资产阶级，使之脱离革命战线。并为使民族运动内增加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势力起见，于是那些迄今还站在民族革命斗争之外，或甚至仇视革命的某部分大资产阶级，甚至军阀，开始转变到国民政府方面。这种举动的目的，是从革命的联合（无产阶级、农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手中，夺取革命领导权，以阻碍革命的发展。这些反革命举动的主谋者，便是国际帝国主义。

在这过渡时期，历史上必然的，大资产阶级必定日渐离开革命；当此时际，无产阶级应该很广泛的利用现时在事实上还作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的各种资产阶级。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在策略上利用离开革命的各种资产阶级间的冲

突，犹如利用各帝国主义间的一切冲突一样；但是决不要忘记无产阶级的主要目的，而要在利用敌人的各种冲突之时，使战术上的应付和策略上的步骤，都能一贯的奔赴这些主要目的。

## 三　中国革命的前途

（七）从敌我两方的阶级结合的观点上来看，中国革命的前途非常清楚。虽然中国革命发展之现在阶段，从历史上说，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但是它必然要带着广泛的社会运动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结果，不一定造成使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国的革命的进程，是在资本主义衰落的时代，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斗争之一部分。革命国家的结构，将视其阶级基础而定。这个革命国家，不会是纯粹的资产阶级的民权国家，而将成为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权独裁制的国家。它将成为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之时期中的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

中国共产党决定要用全力去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革命的前途。否则，倘若资产阶级胜过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则中国实际统治权又将落入在外国帝国主义之手；虽然，这个统治或者是另一新方式的。

（八）中国革命往后的发展及革命之前途，第一须看无产阶级的作用。最近两年来的事实证明，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组织斗争的民族革命的战线。只有在无产阶级统率之下，反对外国资本统治的斗争才能胜利。这是决定中国革命的策略的根本原则。

操有中国大部分地域的政权的封建军阀，是代表反动势力，且是帝国主义的经纪人。本地资产阶级，若看作一阶级，则其发展比较少，且幼稚。经济比较强有力的一部分资产阶级（财政资产阶级与买办）在商业上、财政上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非常密切，从未参加各种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工业资产阶级曾和民族革命运动同道，至今它还带着纯粹的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性质。可是在革命初起时，它就要避开或怠工了。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学生、手工业者、小商人等），在中国是革命的群众。他们从前演过重要的作用，此后也将如此。但他们不能独立行动的，他们必须或者依靠资产阶级或者依靠无产阶级。当资产阶级离开革命，或进而反对革命时，则被剥削的中等阶级，便将落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影响之下。这种情形之下，中国革命在现时阶段中的革命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合，并且在这一联合之中，无产阶级是统率的动力。

## 四　国民革命与农民

（九）在现时革命发展的过程阶段里，土地问题开始紧急起来，成为现在局面的中心问题。那个阶级能够毅然攫住这个问题而给以彻底的答复，这个阶级就是革命的领袖。中国现在的环境，只有无产阶级是能够实行彻底的土地政策的唯一的阶级，彻底的土地政策之实行，乃是反帝国主义胜利及革命往前发展的先决条件。

中国军阀的势力，一方面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帮助，另一方面则靠本地地主阶级的奥

援。军阀的统治，建筑在奴隶式的半封建制度之上——军阀官僚的政府机关，地主、劣绅、商业重利资本等的压迫和剥削几万万农民。发生这种制度的原因，因为那些无土地或缺少土地的农民，他们不得不去受地主及重利盘剥商人等的奴隶待遇，及为城市和军阀，供给几百万苦力和士兵。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消灭一切封建社会关系之残余，解放中国民族，国内社会关系之革命的改革，这些事都相互联接着，成为中国革命的整个的责任。

要完全推倒军阀，占人口大部分之农民的经济与政治斗争，必须使之发展成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以为加紧乡村间的阶级斗争，可以削弱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顾虑，是不对的。过去国民军之败，并不是反革命势力强大，乃为不满意的农民暴动所打败。可见现在摆着这个危险。不去勇敢地接近土地问题，以拥护农民群众客观的一切政治与经济要求，这才是革命的大危机。如果因为犹豫，且误给资本家一阶级单独协作，而怕把革命的土地问题放在民族解放运动政纲的主位上，那便是错误的。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共产党必须免去这个错误。

（十）现在情况的特质，就是过渡性，此时无产阶级应当选择它自己的将来：或与大部分资产阶级联合，或与农民强固共同盟。倘使无产阶级不能提出农村政纲就不能把农民拉进革命斗争，而失去它自己在民族解放运动中领袖地位。如此则直接或间接在帝国主义影响之下的资产阶级，必将从新起领导的作用。假使这个可能性，在现在情形之下实现，就是加强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地位——使帝国主义的稳定。

如果不能使民族解放运动和农村革命合而为一，则广东国民政府将来不能保持政权，革命将来不能进展至完全战胜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派。乡村阶级分化的增长，加紧了农民群众与剥削阶级间之争斗。共产党必须十分注意乡间的阶级分化及从此而起的剧烈斗争；共产党应为农民运动的指导者，并提出相当的政治经济口号，以助农民运动之发展。

（十一）中国共产党应当承认“土地国有”为无产阶级的农村政纲之基本要求，但在现时，必须按照中国各地的特殊经济政治情形而分别的应用农村策略。

在农民运动中，关于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应当努力赞助推倒乡间的劣绅土豪的官僚政权，以革命政府之下级机关代替旧的半封建的官僚政权。这种乡间的革命政权，须是能执行革命政府的命令及拥护大多数农民利益的。农民应当参加县政权机关之创造。

在国民党政府管理下的境界内，农村革命的政纲，须有具体的方式。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必须立刻实行下列办法，使农民到革命方面来：

甲、减租至最低限度。

乙、除去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名义的杂税，而代以划一的农业累进税。

丙、对于大多数农民群众所负担的税额，须为之作最高度的整饬和减少。

丁、没收属于反动军阀的寺院地产，及对国民政府作战的买办、地主、劣绅等之土地。

戊、担保佃农永久租借他所耕种的土地，并由农民协会与革命政权的代表决定最高限度的地租。

己、广东政府必须竭力拥护农民的利益，特别保障农民，使不受地主劣绅重利盘剥者的压迫与束缚。

庚、解散民团和其他种种地主的武装队伍。

辛、武装贫农和中农，使乡间一切武装力量，服从革命政府。

壬、政府给与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在内——以最高度的帮助。

癸、组织国家低息借钱的机关，坚决的反对重利盘剥。并帮助这一类的农民组织及其他互助组织。

子、国家帮助合作社及互助机关。

（十二）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使广东政府实行上列的办法，亦即是使农村革命进到更发展的阶段的过渡办法。实行这个极重要的任务，必需建设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委员会。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农民委员会必能获得实行上述各种要求所必需的威信和力量，并能加紧斗争，提出更彻底的要求。农民委员会就是国民政府与国民军在农村的基础。

在仍被反动军阀所管理和统治的地方，共产党的任务，须领导农民作反对封建制度、军阀及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些地方，革命的最正确的工作，是使反动军队解体。共产党要利用一切自然发生的农民组织，如红枪会等，须在其中巩固党的影响。

（十三）农民对革命的态度，大都因革命军的行为与表现而决定的。由革命军表现的好坏，农民判断新政权的性质。所以农民对新政权的态度，决定于革命军自己的行动，决定于革命军对农民与对地主的态度，决定于革命军准备帮助农民与否等等。固然，革命军到处受农民热烈的迎欢，但这个热烈程度，不久时间即冷淡，这也是事实。长期的困难的军事行动之要求，在农民身上增重了新负担。倘使领导农民运动的共产党与其他革命分子，能够应用正确的彻底的农村政策，去补偿农民暂时的新负担，则农民必将继续热烈的帮助革命军。革命军可比农村革命之导旗，须在农民群众中种根基。

## 五　共产党与国民党

（十四）获得影响于农民群众的必要，也能决定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及广东政府的关系。国民革命政府的机关，是接近农民很实际的道路。故共产党必须利用这机关。在新得解放的省份里，必将建设如广东政府的国家机关，共产党及其革命同盟者的任务，是加入新政府的机关，使国民革命的农村政纲有实际的表现。这就是利用国家机关，以没收土地、减税、并给农民委员会以实力，如此，在革命政纲的基础上，逐渐进行改良。

（十五）根据上述的及其他许多同样重要的理由，共产党离开国民党的观念，是错误的。中国革命的整个发展过程，它的性质及其前途，均需要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并加紧在其中的工作。为着加紧共产党在国民党里的活动，以推进革命运动往前发展起见，共产党应当加入广东政府。自从广东政府成立以来，其实权操在国民党右派之手（六部长中五个是右派）。虽然事实上广东政府若没有工人阶级的拥护不能存在，而工农运动，即在广东省，亦尚须战胜种种阻碍。最近的事实证明，共产党应当加入广东政府，以帮助左派反对右派之懦弱而动摇的政策。广东政府辖地之广大的伸张，使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的问题，比任何时候更成为必要。

（十六）中国共产党应使国民党发展成为真正平民的政党——包含无产阶级、农

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经纪人的被压迫者之坚实的革命联盟。因此，共产党必需照以下几点行动：

甲、有系统的坚决的反对国民党右派及戴季陶思想，反对他们想把国民党变成资产阶级的企图。

乙、形成左派，而与之亲密合作，并不企图以共产党分子代替左派之领导工作。

丙、彻底的批评在左派右派间之摇动，在继续革命或和帝国主义妥协之间摇动的中派。

## 六　中国革命的责任及革命政府的性质

（十七）列宁曾说："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时期以前，是总的民权革命运动的一部分，现在，苏维埃革命已在俄国胜利，世界革命时代已经开始，民族革命运动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一部分。"

中国革命之党纲及由此而产生的革命国家的结构，应从这个总意来决定。阶级分化的过程，即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证明了这个总意。广东政府虽然是资产阶级民权性的，但究其根基和客观上，则包含有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等革命联合的民权独裁制之萌芽。小资产阶级民权运动在中国之所以是革命的，因为它是反帝国主义的。广东政府之所以是革命的，第一亦应有此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因为中国的革命及由革命而产生的革命政府，第一均是反帝国主义的，故必须打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之根基。取消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尚不足削弱帝国主义之地位。必须从经济上打击帝国主义势力的基础，这个意思，就是革命政府应当逐渐没收属于外国资本的铁路、租界、工厂、矿山、银行、企业等。如此做法，才能即刻扩充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狭路，而走入到革命独裁的过渡阶段。

因此，以为这个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小资产阶级性的，故中国革命的目前任务，仅限于（一）推翻帝国主义，（二）消灭封建余孽，这是错误的。中国革命若不超出资产阶级政权范围之外，是不能推倒帝国主义的。在现有条件之下，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在无产阶级指挥之下，消灭封建余孽的运动，必须变为领导农村革命。为了这些特点，中国革命的责任：

甲、铁路与水上交通之国有；

乙、没收外国租借地性质的大企业、银行、矿山等；

丙、由革命政府实行彻底的急进的农村改良政策，以实现土地国有。

## 七　共产党与无产阶级

（十八）要在革命中占领导的地位，无产阶级必需坚强其政治的经济的阶级组织。共产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使它能尽这个历史使命。中国无产阶级数量之少及其幼稚，须以有组织的力量及明确的思想补偿之。

共产党的基础，是现在代表几十万产业工人的全国总工会与铁路总工会及海员总工

会。共产党最紧急的任务，是吸收广大的工人群众，以强固这些组织。在二年来之国民革命争斗中，工人阶级开展了很大的力量。在实际争斗里，它已获得革命运动的领导。在这些经验及成绩的基础上，工人阶级的组织，应当按照下列各项，以求更强固发展：

甲、创造群众的产业工会，以产业为基础联合一切工会，强固全国总工会；乙、加紧群众的工作，巩固工会上级指导机关与中国工人群众的关系；职工联合会之中，吸收手工业工人，小企业工人以及文化教育工人等；丙、更加注意工人经济斗争，这种经济斗争，应当变为政治斗争；规划罢工运动的策略，组织互助和罢工基金；帮助和创造协作社等；丁、作反对改良主义的方法之斗争，以加紧工人群众中的教育工作；戊、加紧中国职工运动与世界职工运动的关系，对于远东各国的职工运动，特别须密切联络。

（十九）为吸引工人阶级群众到运动里来，并加强他在革命中的地位起见，中国共产党应当宣传下列的要求之实行：

甲、革命的工农组织的活动完全自由。工会公开。颁布最进步的工会法，承认罢工权。

乙、劳工法。八小时制；每星期休息一天，规定最低工资。

丙、社会法。卫生监督及劳动条件卫生及劳动条件之检查；改良住房；疾病、衰老、残废，失业等的保险；保护女工童工，禁止女工夜作；禁止雇用十四岁以下的儿童做工。

丁、创立检查工厂的机关。

戊、取消罚金及肉刑制度。

已、撤退工厂里各种驻兵及警察等。

庚、救济失业；扩大工会在失业者中的影响；工会中设工人职业介绍所。

（二十）在革命的现在的阶段中，尚有一个很大的后备队，尚未完全利用他们的革命力量，这就是被帝国主义破产的城市手工业工人群众，他们是反对外国资本的。代表无产阶级先锋的共产党，必须组织并吸引这些群众，使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的总潮流。并且共产党应为这些分子获得下列几点：

一、减轻租税；二、组织手工业工会；三、组织劳动协作社。

## 八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责任

（二十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它有领袖，它锻炼出中坚分子，它领导群众。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已经有很广阔的范围及稳固的组织形式。最近半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又大进了一步，扩充了许多党员，且多为工人分子。

共产党的农人分子不多，但共产党在农民中，现在已经有继续不断的日益增长的工作。

放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即是扩大、加紧、改进、并增强党内的教育训练工作。

党做了许多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近来增加了数量，并在好多种工作中，亦很活动。青年是中国革命的大的力量。革命的学生、青年工农，倘使他们在共产党的思想和政策影响之下，很能成为促进革命的一种力量。没有人比青年更深切

感觉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也没有人更激烈的知道必须和这些压迫战斗。这些环境，中国共产党应充分注意，应该促起共产党增加对青年中的工作的。

党的基本工作之一，是争得党的公开存在。

（二十二）应当发展新党员，应特别注意工业区域。对于新党员的工作：或组织短期训练班，关于党纲和策略问题的专门谈话，使他们参加相当的支部，练习日常工作，经过支部而参加党的一切工作。

党的组织，从中央至工厂支部或街市支部，必须坚决的实行党的集体指导。往后还须加紧努力，吸引较好的工人同志，使做党的指挥工作。强固和增加党的中坚分子，还是很重要的工作。对于支部书记、群众机关党团的领导者，及省区委员等中坚分子，要特别注意造就和训练。中央与区委要有经常的特派巡视员，这人可以从各方最好的工作者之中选出来。

为做乡村的工作起见，巡视组织员，也须特别造就。

使党的低级组织，支部及党员大会等，增加活动与独立性。

巩固党团，特别是工会的、农民协会指导机关的及国民党等的，一定要使之加强。对于党团的工作，党须有系统的坚定的指导。

## 九　帝国主义各国共产党的任务

（二十三）在帝国主义国内的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用一切方法以拥护中国革命。拥护中国革命的运动要用下面的方式举行：

甲、反对武力干涉中国的煽动。对无产阶级群众解释外国武力干涉中国的危机。帝国主义在中国鼓动内战和给与军阀以经济与武备的帮助之事实，应该揭破。

乙、要求外国海陆军从中国撤退。

丙、在驻华外国海陆军中宣传。

丁、鼓煽立即承认广州政府为中国真正的国民政府。

这些要求要在各种集会和反对侵略的示威运动中提出，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与无党者，也要拉他们加入这个运动。

（原载《中国问题指南》（一）1937年出版）

# 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五月）

## 一　中国革命之意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认为，最近事变完全是证明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之观点，更明显的证明了列宁对于中国革命的国际作用之预言。

伟大的中国革命将更成为意义重大之动力，成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之全部组织及其最重要的国际的中心。

因此，社会民主党及黄色职工国际之政策，是掩没中国革命意义之政策，是蒙混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意义之政策，是毫无内容的口号，和平主义的半截行径之政策，直接为压迫中国革命的屠杀战争作辩护（陶姆士、麦克唐讷之徒）——是帝国主义者的直接帮凶。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革命之重大的国际意义还要加大，正因为帝国主义要实行压迫中国民众之反革命的强盗战争，帝国主义军队已经集中中国（外国军舰，外国步兵，日本事实上霸占满洲，英美等国事实上占据各重要通商口岸等），他们这种政策与他们向苏联挑衅的政策同时并进的。

因此，社会民主党及黄色职工国际领袖对于中国革命之具体态度，——就是积极在思想上准备大战，用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掩饰其社会帝国主义。

共产国际以为，一切政党及其他组织，凡自命为工人政党、工人组织者，如不坚决反对干涉中国，仅仅鼓吹消极的态度，以麻醉工人阶级之注意力，则客观上（也有主观上的）是帮助帝国主义。这不仅是帮助帝国主义去绞杀中国工农，同时巩固帝国主义制度，而且是帮助帝国主义去准备压迫苏联的战争，并普遍的准备世界大战。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用最积极的手段拥护中国革命，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反抗，以阻止军队军械之输送，最积极的与干涉中国革命者奋斗，是一切支部的义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向无产阶级及劳动广大群众解释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与作用，解释反革命的干涉中国与准备新战争间，特别是准备反苏联的战争间之关联，以及与帝国主义在本国内进攻工人阶级（英国的反工会法，法国的军事法，意大利的法西斯蒂恐怖等）之关系，这是一切支部的义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百折不屈的揭破社会民主党及黄色职工国际之勾当，揭破他们步步和帝国主义勾结，对于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捣乱行径，这个工作也必须同时进行。

## 二　民族革命运动的危机与中国革命的新形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中国革命中事变的进展，证实了共产国际最后（第七次）扩大会议之革命动力的估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尤其认定事变的经过，完全证实了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于资产阶级必然脱离民族革命联合战线，转到反革命方面的诊案。

这个过程的表现，是蒋介石及其他军事领袖的反革命政变，是右派离开国民党后组织南京政府，假借国民党组织，成立他们自己反革命的组织。

蒋介石政变，爆发了中国一种普遍的新政局，产生了主要阶级力量之新离合。蒋介石所掀起的政变，是各阶级重大的联合转变，因此，共产国际的策略也要从这新形势中出发。

企图与蒋介石或国民党右派妥协之任何尝试，必会变成直接投降蒋介石，显然背叛中国革命的利益。

资产阶级与其军事领袖背叛革命之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工农群众运动之发展与中国共产党之胜利，他方面在于帝国主义联合压力之加大。民族资产阶级看见群众运动发展，看见那革命的阶级要求与口号，必然要与帝国主义军阀勾结，不愿革命继续进展——他也真这样做了。这样一来，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民族战线，跑到反革命的营垒去。革命虽有部分的失败，虽受了蒋贼之徒的叛变，但是走进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的联合分裂了，开始转变为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同时加大。

在中国革命的进展中，那已告终结的阶段的特征，在于两个营垒对峙：一方面是外国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与买办阶级——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营垒；另一方面是民族革命的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者、工人的营垒。这个阶段有由两个营垒对峙，变为三营垒鼎立之趋势，划去资产阶级，使之与无产阶级、手工业者、农民之“左派联合”相抗。

目前的局面，正以此三派鼎立为其特征。蒋介石屠杀工农，但仍反对北方军阀。

然而战斗的全般逻辑，仍将变三派为两派，为新式的两派；因为蒋介石、白崇禧等所领导的大资产阶级必然日与封建反动的领袖及外国帝国主义接近，以促成这个过程。

中国革命的危机与社会阶级力量目前的组合，说明并证实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农民革命属之，只有这样，才可说到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只有在反对已经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可完成。彻底的民族自由斗争，不仅与发展工农群众运动或土地革命的要求毫无冲突，而且要直接以下层广大民众奋起推翻帝国主义之革命运动的扩大为前提。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在革命的过去阶段中，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完全是正确的。仅拿北伐战争来说，它遍处扩大了工农群众运动，工会、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以及中国共产党，已可为这个策略在历史上的辩护。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认为，主席团同时指令揭破蒋介石，取得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机关中战略上最重要的地位，以孤国民党右派之势，而集中视线于群众，这样做也是对的。

同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主席团在蒋介石事变后所即刻发表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言内，对于蒋介石叛变所持的态度。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反复提明，蒋介石政变及其表现的剧烈底阶级离合，是将来全盘策略之出发点，资产阶级既背叛了民族革命运动，成了反革命的积极势力，不能再与它统一、妥协或联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社会民主党及黄色职工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内部问题之路线，是直接由他们对于帝国主义在华政策的态度演出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口头上是赞成上海工人的，实际上，把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间划条鸿沟，反对中国工人的先锋——共产党人——，反对民族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因此他们是赞成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联合的胜利的。正统社会民主党与黄色职工国际愈趋于拥护蒋介石之途，联合黄色"工人组织"，希图以反革命的工会代替革命的工会。国际少数主义诬蔑共产党人，不说他们分裂了中国革命运动（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这样说），便说他们拥护中国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不力（这种中伤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发出的），而实际上，它自己不仅成了帝国主义的盟友，而且是它那中国代理人的拜把兄弟——南京那伙工人阶级刽子手的把兄弟。

## 三　中国革命的部分失败与反革命的主要力量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资产阶阶级反革命的政变（上海、南京、广州等处），中国革命的部分失败，相当的加强了反革命的联合。

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若说这个失败便决定了革命的全部命运，这是错误的见解。

这见解之所以不正确，仅举一端便可了解。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大敌，而置帝国主义势力与资产阶级间之关系不顾，且同时看轻了劳动群众伟大的无间的运动。要晓得帝国主义用尽手段向革命进攻，在民族革命战线中，一切动摇分子中间，布满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如果反革命的策源地不得国际帝国主义的保障，蒋介石的全付力量早被胜利的革命军打得粉碎。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一切支部的必要任务，是向工人阶级及农民说明事实的本相，要知帝国主义的军队事实上占据了全中国的工业区域，正是中国反革命的主要力量。

那比较弱小的中国资产阶级，若不直接间接受外国武装干涉者的拥护，必不会成中国革命之大患。外国武装干涉者集中战斗力，封锁海港，困围革命的中心，接济反革命的军队，离间破坏革命的武力，用尽外交上的压迫手腕，在革命政府下资产阶级的阴谋破坏势力，驱策外国和土著资产阶级组织生产上、商业上、金融上种种怠工封锁的政策。

至于帝国主义之狂暴猖獗，以扑杀工人，扑杀共产党，压迫农民运动，孤困苏联，尤须特别提明。

但是革命虽有部分的失败，而另一方面，过渡于更高阶段的发展，更有力的动员群众之发轫，农民运动之扩大，暴动武装队之组织，此项与日俱增的组织武力屡次战胜了叛军，虽然反革命的恐怖猖獗万分，而工人阶级的组织继续保存，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之增大无已，——凡此种种，都是中国革命继长增高之主要征象。

武汉国民政府及左派国民党，就其主要的趋势看来，是城乡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联合之表现。虽然某个军官、某派军官以及国民党“左派”某个政治领袖、某派政治领袖有继续叛变之可能——而且必然不可免——，但是阶级斗争的进展，必将调动群众；此群众运动正是将来胜利之担保。

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取消派意见根本错误，这派意见竟以为中国革命目前的危机是胜负已决的失败，必然造成一种国际的局面。这种显然错误的意见，只会成为破坏无产阶级队伍的工具；在这共产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特别必要的现在，这种破坏组织尤其危险。

## 四　组织工农群众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中国革命中艰巨的困难，尤其是因帝国主义联合势力的武装干涉或他种干涉，以及中国国内动摇的社会成分叛变革命投降敌方所生的困难，造成了目前斗争的条件；为战胜这种困难计，必须广大劳动群众加入斗争始可。只有这些群众参加积极斗争，才能造成一种政权，打退内部的反革命及帝国主义的干涉，消灭封建制度的残余，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造成中国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之先决条件。

要想引导群众加入斗争，只有在乡村实行土地革命，在城市满足工人的政治和经济要求，才有可能。毅然取消缴纳富豪之佃租，重新分配土地，没收大地主、官僚、寺院等等之一切田产，禁止高利契约，取消贫农受重利盘剥之债务，大减赋税，课税摊派于富豪之家等等——这些口号必须在全国，特别在武汉政府统治区域内实现出来；必须拿这些口号推动群众，使之反对叛卖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北方军阀。

农民革命（没收土地和国有土地包括在内），这是中国革命中新阶段之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使千百万农民从下面以“平民式”的直接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共产党站在前线，指导这个运动，在目前最为主要。同时，共产党必须在政府内努力，使政府促进土地革命之爆发扩大。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府在目前发展的阶段中成为实际上工农革命的组织政治中心，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权独裁的机关。另一方面，只有在这种从上面和下面协同实现土地革命的政治之原则上，才能在坚固的革命的基础上，造成真正可靠的武力，改编一切旧有的军队。

在城市中，必须设法提高工人群众的物质生活，改善工人在工厂内、在社会上的法律地位，其钳制工人成为毫无权利的“等级”之一切法律，须一律废止，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承认工人组织之权利等等。

同时必须迅速、大胆、坚决的实施武装工农群众之政策。最先武装那已经有组织的觉悟的部分。此政策务须以全力使之实现。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竭尽力量，直接的、间接的，以及联同国民党左派，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在工人中极力发展党员，在城乡劳动群众中极力为国民党发展党员，必须使国民党以极大的速度成为最广大的组织。——这是目前中国共产党之主要任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促起中国共产党极大注意，一切工农群众组织须有各方面的加强

与扩大之必要，如职工会、罢工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工人自卫团等，以及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乡村工人组织、农民自卫军、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组织、小手工业工人、家庭工业工人组织等等。在这一切组织中，必须宣传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工人阶级之强大的群众组织。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的否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之任务可以和民族革命之任务相互对峙。他以为，象那欧洲极左派和社会民主党提出的这种对峙说法，没有别的作用，只有使无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放弃领导权；名义上是为保护那所谓“无产阶级的”行会精神，其实这种行会精神，在政治上是机会主义的变相，因此，这不过是使无产阶级成为民主派的附属品而已。资产阶级退出革命，转入反革命的营垒以后，无产阶级却逐渐成为整个民族革命运动中可公认的领导者。只有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可完成的中国革命，如不提高工人阶级的作用，不使之成为整个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则必不能继续发展与最后胜利。

## 五　共产党与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要想把它肩上的任务完成，只有保有自己工人阶级先锋的政治面目，和那最急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面目划分清楚才行。

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共产党不许融解于别个政治组织之内，也必须成为独立的力量，它是一特殊阶级的组织，是无产阶级的组织，是全国最彻底最革命的阶级的组织。因此，共产党在宣传自己的政见时，在自己的旗帜下动员群众时，不能为外力所阻，对于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的动摇不定，尤不能放弃批评的权利。恰恰相反，须知只有这种批评，才能推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向左，才可以在革命斗争中，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不过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不可解作是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尤其是与农民断绝关系。从这点出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坚决的反对那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反对那根本上必然弄到退出国民党的态度。目前提出“即刻勿须退出国民党”，与提出“退出国民党”两个口号一般荒唐，因为在目前的瞬间，无产阶级的政党恰要在国民党内，确定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固有的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合作的党。

在目前的情形下，共产党——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在国民党内取得领导作用，则无产阶级便不能在全国取得领导作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如果看轻国民党这个革命运动的特殊组织形式，实际上便是助成右派攫得国民党的旗帜。正因为国民党的旗帜是国内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因子，所以蒋介石引着资产阶级领袖们，千方百计，要打起国民党的旗帜前进。共产党的策略，万不可为蒋介石的机变作保障（退出国民党路线，便不能免这种结果），而要揭破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是民族革命的叛贼，是国民党的叛贼，是中山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叛贼，是投奔帝国主义者的降将。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说民族（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已经“告终”，另一革命即工农阶级革命已经“开始”，这种见解是错误的。在蒋介石政变之后，便是广大的群众也

明瞭了民族革命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才能继续进展。正因为这样，所以不能把国民党的旗帜，不能把民族自由斗争的旗帜，让给民族自由斗争的叛贼。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既要大胆的坚决的扩大群众运动，也必要一般大胆的坚决的努力变国民党为真正的群众组织。使它包纳城乡劳动民众才行。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为完成其自身任务，须使其组织形式能相当适应。赶快改组，尽量接近群众，实为必要；其次，要在工农手工业者中间大征党员，容纳工农兵士手工业者之整个组织入党（工会、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手工业者行会，军队组织，农民游击队如“红枪会”等，惟须肃清其反革命分子，以及工人自卫团等等）；国民党的地方及中央指导机关历行选举等。

只有把定这个坚决的路线：国民党发展为真正广大的，群众的，革命民主的组织，指导机关真正是由选举产生——才能为中国民主革命之巩固与胜利的发展，造下先决条件。

只有把定这个路线，才能为防止国民党左派某个动摇部分之可能的而且必然的退伍（如广州的事实）为防止那某个动摇军官及其他军事领袖之叛变，造成制裁手段。应时常的揭破一切勾结蒋介石或帝国主义之动摇趋向，并在宣传煽动上采用具体办法，或竟用组织上的制裁手段，这是共产党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除维持且扩大自己党组织外，尤须极力影响国民党的行动。要想实现这种任务，必须先完全了解自己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彻底把定自己思想的政治的路线，加强巩固自己的组织，使工人同志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在工农群众中加强党的影响和党的威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在中国共产党中，恰恰对于这点有无数动摇存在；党在批评国民党的领导者，不能常常表现充分的坚决，而且在党内对于发展群众运动表现相当的畏怯，尤其是在农民运动中，关于没收土地，驱逐豪绅地主等问题上，可以看出。这些动摇，在目前阶段中特别有害于革命；在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内同志，并非人人都能充分了解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路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大规模的说明中国共产党同志内上述的错误和动摇，是必要的；不然，则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中，相当的动摇之危险更加高了。

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工人阶级的政党，站在农民的土地革命运动之前端，要最无情的反对遏制此运动高涨之一切企图而奋斗。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确信，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发展极速，已经做下了革命的英勇的模范，必能很快的改正这些错误，须知这些错误是由事变的异常复杂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幼稚中发生的。

## 六　武汉政府，政权问题，军队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看轻武汉政府的意义，因此实际上否认它极伟大的革命作用，这种见解是错误的。武汉政府及国民党左派领袖，就其阶级成分而言，不仅代表工农及手工业者，亦代表一部分中产阶级。所以国民党左派的武汉政府，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但它已经走到工农专政的路上；在阶级斗争中，如果无产阶级获得胜利，赶去了

那些跟着资产阶级跑的人们，战胜了无数叛变之后，则武汉政府便必然发展到这个专政的方向去。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武汉"临时革命政府"的活动，是必要的。那个不主张参加，或对于此问题抱一种不定的怀疑的态度，他形式上很是"激进革命"，但在实际上是重演一九〇五年俄国少数党的错误：俄国少数党那时以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不可能的，宁愿组织"极端左派的在野党"，但是实际上跟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背后，摇尾乞怜。

少数党的态度的特点，正因为它反对参加革命的政府，而参加反革命的混合政府。

参加武汉革命政府与欧洲资产阶级社会党的混合政府，并无丝毫相同之处，因为武汉政府的确用革命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者，反对封建制度，现在更反对本国资产阶级之大部。

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共产党必须积极参加中央及地方政府机关；同时，对于自己最亲密的盟友之不十分坚决，也要加以批评，并确定政府的政策之正确路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促中国党特别注意革命政府与民众间的亲密联合，在目前实在是空前的必要。只有靠着这种亲密的联合——这种联合是特别要国民帮助才能做到的——，只有坚决的走向群众的路线，才能永久加强革命政府的威信和地位，使政府成为革命的组织中心。

为武汉政府划定这条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实现此项任务，不扩大群众运动，没有农民革命，不坚决改善工人阶级地位，不变国民党成为劳动群众的真正的伟大的组织，不继续加强职工会，扩大共产党，不造成武汉政府与群众间之最密切的联络，则胜利的完成革命是不可能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共产党人参加政府，仅仅可用这策略辩护。不是这样，则参加政府将成为领袖结合，政客勾结的戏剧，受了实际生活的冲刷，受下伟大的阶级斗争之进展，必至烟消云散。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桩任务，便要把政府中的活动和群众中的活动联结一起。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在目前的条件下，扩大国民党内民主化，收容最广大的群众，迅速发展各种工农的群众的组织，最合革命的需要。中国发展中的特点，象革命的国民党这样特殊的组织，可以直接决定政府的成分，是绝不可忽略过去的。用国民党收容广大民众，使群众选举国民党的指导机关，经过这些在选举制的基础上建设的组织，成立民族革命的政府——这是劳动群众和革命的国家政权间联合的特殊形式，此形式适合中国革命的目前阶段。因为武汉政府统治下各省状况之不同，则地方政权的组织，在最初时期，必然采取种种色色的形式（在乡村间"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政权，以及国民党委员会政权等等）。共产党人组织地方政权时的主要任务，便是领导广大劳动群众，领导千百万工农群众参加组织，组织成后，参加工作。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在目前提出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是不适宜的；这个口号没有别的意思（在武汉政府统治区域内），只好作为布告苏维埃政权解释。

在中国革命进展目前的阶段中，即刻成立工农兵苏维埃，必要被认为是两个政府，是推翻武汉政府的路线，是越过国民党这个群众的组织及国家的政权，直接把苏维埃政权作

为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但在革命的继续发展，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已经开始，则成立工农兵代表委员会即成必要，这时，成立苏维埃的口号便成了党的中心口号。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更以为，改编军队的问题，编制绝对委身革命的队伍，军队与工农组织间之联络，建立军队中干部，改编佣兵为革命之常备军，在目前特别需要。至于武汉革命的工农编成绝对可靠的队伍，在军队内确立共产党及坚决不拔的国民党左派之影响，肃清军队中反革命分子，组织工团军，尤须特别注意。

## 七　目前中国革命政策之几个策略的根本问题

中国共产党站在极端复杂的任务面前。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的斗争与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之并进，帝国主义大批军队之驻华，实际上中国之分裂为三部，经济状况及政治状况之综错万分，帝国主义之统一战线与此统一战线内之冲突，中国各部革命成熟程度之极端参差，革命之特殊“军事”形式，以及国民党左派内及军队内部之种种矛盾……凡此种种，都使革命在进展中，发生无数非常的困难。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武汉政府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纵横捭阖的策略，根本上是完全可用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反对那借口“国家政权既是非无产阶级的性质，根本上便不能用纵横捭阖的‘布列斯特’策略”的意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这项意见是建筑在疏忽的理论的和政治的错误上面。

在无产阶级革命日形成熟的条件下，如果无产阶级的政党站在革命的反对派，与政府对峙，它照例是反对战争的，是赞成推翻现政府的，是绝不救济现政府的困难的。

在中国目前现有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是赞成武汉政府所进行的战争的；它既参加武汉政府，则它对于武汉政府所行的政策，是负责的；它是要尽量救济武汉政府的困难的。所以，共产党不能“根本上”反对纵横捭阖的策略。负责武汉政府的共产党，如果永远而且在一切条件下，反对妥协的策略，这就是说，共产党要无条件的同时向各方作战，这真是大愚特愚。

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这个问题必须最具体的，拿各种具体条件去解决；这些具体条件不能够事前看到，因为交战各种势力的比例，不能事前精确看到，不能绝对精确估计的原故。

这纵横捭阖策略的可用性，也必须适用于政府的经济政策。政府绝不能无条件的即刻没收一切外国企业。在这里，妥协也是根本上可以应用的。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民族及外国资产阶级在各种企业内（工业、商业、银行业）怠工破坏，产生失业，希图制造经济之紊乱与破产，政府便须没收与国有这些企业。民族革命政府不能姑息革命的敌人任意破坏经济生活；在这种情形下面，政府必须采用严厉手段，改用自己的机关和无产阶级组织的帮助，经营此项企业。

何时应该妥协，何时必须转守为攻，这要就具体条件决定。共产国际特别以为有些同志在蒋介石上海政变时，建议实行暴动的策略，十分谬误。这项策略的究竟，非以暴动进

攻帝国主义及蒋介石作先发制人之计，便须广布阵线，用武装力量和他们斗争。须知暴动的策略乃是暴动既发，便要采取攻势。所以有了相当胜利的希望存在，才可着手暴动。暴动是“玩”不得的。“无论如何都要暴动”的策略，不是列宁主义的策略。假使上海工人发起了广大的武装行动，则必被蒋介石帝国主义联合武力扑灭，中国无产阶级的鲜血，在一个毫无胜利之望的战争中，便会平白洒尽。

在中国目前一般形势看来，共产党须采用如下之军事政治的战略：共产党拥护向北发展之军事计划，而同时无条件的加深武汉政府统治全区内之农民革命，极力破坏蒋介石之后方与军队，以图扑灭此贼；这自然不是说，在适当时机也不该以直接军事行动进攻蒋介石。须知“向着群众”之足以克敌，在内战中亦然。加以政策正确，革命之胜利，是靠得住的。

共产党必须尽力从各方面加强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战线。除以全力扩大农民革命外，尤宜同时保障小资产阶级劳动财产不受侵犯，并助其反抗高利资本等等之斗争。除这样去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的真正革命势力之联合，并以全力团结这些阶级力量在武汉政府管辖区内组成强有力之组织外，在反革命的区域内，共产党也必须站在群众运动的前端。

自党组织到农民协会，建设强大的秘密组织，组织且领导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准备群众行动以及兵士中的工作，这些统是党的最重要的任务。

## 八　共产国际之各国支部与中国革命

从中国革命之一般意义作用出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

一、国际大部份支部未曾十分了解这个意义，在拥护中国革命的工作内，表现积极性之缺乏；

二、参加“反帝国主义”之共产党人同样表现积极性之缺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加速纠正此项错误，因此建议于各支部，种种方案宜在下列各项严厉执行：

甲　报纸上的鼓动和宣传；

乙　职工会内及其他工人群众组织内之工作；

丙　在各国殖民地内及依附其宗主国之各国内的工作；

丁　予备派往中国之军队内的工作。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促各党部注意，必须加十分严重的准备，不仅口头上，要实际上阻止军队军械运往中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令各支部担起这项任务，在帝国主义军队中最积极的活动，并宣传这些军队直接转到中国民众革命军队方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令各支部中央委员会，制造上项之各种具体方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支部以弟兄的敬礼，誓以全力拥护它伟大的革命斗争。

（原载《中国问题指南》（一）1937年出版。）

# 共产国际执委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

（一九二七年七月）

中国工农的斗争，乃是共产国际第一线阵地上的斗争。中国革命，仍继续为共产国际底注意中心。

在注意到下列各点时：

一、中国事件底疾速的展开速度，使该国的政治局面和社会阶级力量之相互关系，不断发生变化；

二、中国革命，因军阀和雇佣部队之叛变，因反革命力量之结合，因最近一时期所受的一连串的局部的失败，而遭受了特殊的困难；

三、最后在注意到最近中国共产党领导所犯的一连串的最严重的错误时，——

共产国际认为必须以如下的决定（为了发挥共产国际执委随时所发出的指示而采取的），诉于全体同志，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一切分部之前：

（一）共产党人正确策略底最重要和最必须的先决条件，乃是对革命局势当前阶段之一切特质加以最严格的冷静的马列主义的估计，对革命所经过的阶段加以正确的规定。只有了解了当前时局之特质，才能正确地规定斗争着的共产党之特殊任务，才能提出合于实际生活的革命的口号，才能确定无产阶级先锋队之正确策略。需要十分明确和十分具体地规定中国革命现时阶段的内容，并且为了这一点，需要批判地认识革命过程底全部进程。

（二）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曾把中国革命的性质规定为资产阶级民主的——在发展的现阶段上——而同时其锋芒又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共产国际执委曾指出，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长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之趋势。七次扩大会议在规定中国各种斗争的社会力量之位置和比重时，同时曾指出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分化之势必加剧，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之势必日益分解，并首先预先预言了大资产阶级之势必退出革命。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这一点出发，曾作了指示，叫准备工农去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武装力量。这是在蒋介石叛变前几个月的事。以后的事件（本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屠杀上海工人达到了其流血的顶点）证实了共产国际底这种预测：各阶级发生了根本的变动，资产阶级叛变革命而投到敌人的阵营里去了；革命遭受了局部的失败，而推移到新的更高的阶段了。

（三）本年五月所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曾又作了详细的决议案。这次全体会议已将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当作既成事实为出发的。这次全体会议，曾规定了蒋介石叛变以后所造成的局势之具体特点，并对中国共产党确定了相适应的处理路

线。这次全会的总指示曾是：面向群众，竭力展开土地革命，武装工人和贫农，扫清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道路，坚决使国民党民主化。这次全体会议曾明确而毫不含糊地描出了独立的共产党方面跟国民党左派在武汉政府内可能进行共同工作的那些必要条件。这次全体会议认为，当前局势之微妙地方，乃是三个阵营（一是封建军阀张作霖的阵营，二是还在与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作斗争但已屠杀工农的蒋介石的阵营，三是武汉的革命的阵营）之存在。共产国际执委在其决定中，曾谓强调军阀与某些军事部队的不可靠，乃是非常重要的，与此相联系，并认为“改组军队、创立绝对可靠的革命部队，与工农组织保持联系，保证军队中的干部人员，将雇佣军队改变为革命的正规军队等等问题，特别尖锐的提出来了”。

共产国际根据这些决定的精神，随时给中国同志作了指示。

（四）最近几个礼拜来，事件更非常迅速的发展起来了。共产国际认为这些事件中主要而特殊的有以下各点：

阶级的矛盾更加而且非常显著的尖锐化了。中国无产阶级之群众运动，已经广泛的展开了。群众的土地农民运动也广泛地展开了。对于该国一切毫无例外的政治集团，都露骨地提出了对于土地革命态度的问题。军阀和军队官佐都公开地投入反革命的阵营，而宣布自己为农民的敌人了。长沙叛变了的将领，大肆屠杀农民，不论武汉国民政府，也不论国民党底上层领导者，对此种叛变都没有予以制止。冯玉祥也叛变革命了，他与蒋介石勾结在一起（徐州会见），要求武汉政府投降。武汉总司令唐生智，也在屠杀工农，残杀共产党员，把他们逐出军队。反革命的军阀，从蒋介石起到唐生智止，正在携手言欢。同时，武汉底统治分子，掩饰反革命军阀底行动，帮助他们，解除工人的武装，搜查无产阶级的组织，制止土地革命，进行反对共产党员的斗争。而国民党底上层领导者，也赶急准备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开除出去。这样武汉已成了反革命的力量了。

事件的发展就是这样的。中国斗争的当前时局的基本特色与特质，就是这样的。不过这种特殊的环境，在关于政权、关于对武汉政府的态度、关于合作、关于以后斗争方针等问题上，却给中国同志们指出了相适应的策略方向。

（五）共产国际依靠着列宁的学说，过去曾经认为而且现在也认为，在一定的阶段上，在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进行革命斗争的范围以内，与它的联盟和联合，是正常的，是完全允许的和必要的。在革命进程的一定阶段上，援助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或其军阀、买办势力之军事行动，也是可允许的，而且甚至必需的，因为这种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对革命事业有益的。

从列宁主义的这个观点看来，（把中国革命）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比，那是应加以驳斥的，而且已经驳斥倒了，在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抛弃了与反革命的自由主义之一切和任何妥协，那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与资产阶级各集团的联盟及对其军事力量予以援助，只有在此举不妨害中国共产党底独立工作的范围以内，只有在自由主义资产阶级还没有出面反对工人和农民，只有在资产阶级还能够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历史任务以前，才能许可的。当北伐解放了群众的革命运动的时候，援助北伐，那是完全正确的。当武汉还在反对蒋介石的南京的时候，援助武汉，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种联盟的策略，自从武汉政府投降革命底敌人的那一刹那起，就根本变成谬误的了。那在革命底前一个阶段上

所适用的，现在已经绝对不适用了。

自然，党的领导底一定的困难，也正是在这里，对于象中国共产党这样年青而无经验的党之领导，尤其如此。加以事件之自发的、不可制止的突飞发展，在时间上缩短了斗争的阶段，使过程迅速的转移，并减少了所采取的某一策略方针还可适用的时期，因之，上述的困难，更形增加了。在紧张的革命局势之环境下，必须要高度迅速地抓紧时机之特点；必须要善于临机应变；必须要迅速地、适时地更换口号；必须要随时改编无产阶级先锋队之队伍；必须要对已经改变了的时局，作强有力的反应；当联盟由革命斗争之因素变成它的桎梏的时候，必须要断然地撕破这种联盟。

（六）如果在革命发展底一定阶段上，中国共产党方面援助武汉政府曾经是需要的，那末现在援助武汉政府的方针，对中国共产党便是自取死亡，要把它投到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的。不顾共产国际的劝告，国民党的上层领导者，在事实上不仅没有援助土地革命，而且放纵了土地革命底敌人。他们批准了解除工人的武装、征剿农民、以及唐生智之流的弹压政策。他们在种种借口之下，把讨伐南京延期，而且实行怠工。武汉政府的革命作用已经完结了，现在它变成了反革命的力量了。武汉急进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可能还敢作出“急进的”、假革命的“英勇姿态”，如宣布讨伐南京之类（如果解除了工人的武装，压迫土地革命，那末，这种讨伐底革命意义，就等于零了）。不过这种装模作样并没有改变事情底社会阶级的本质。武汉已成为反革命之帮凶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底领导核心和中国全体同志所应当十二分明确地考虑到的新的和特殊的东西。

（七）中国共产党的现今的领导机关，近来曾犯了一连串的重大的政治错误。中国共产党应当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展开和领导土地革命，公开的批评和揭穿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底“急进”的领导者之不彻底的和怯懦的立场，警告群众预防军阀方面叛变的可能，武装大量的工人，十二分坚决地推动国民党和武汉政府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但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没有执行这些指示。中央不是领导土地革命，而在许多场合之下，作了制止土地革命底因素。党的个别领导者，提出了显系机会主义的口号：“只有在革命扩大以后（？！），再加深革命”，或如“先占领北平，然后再进行土地革命”，这些口号，曾被党的代表大会所推翻了，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代表大会表现了党的群众的情绪。中国共产党大批党员群众在社会下层人民中间——在农民、工人、城市贫民中间，曾经进行了自我牺牲的真正的革命斗争，这时中国共产党底领导机关所进行的却是逼迫群众后退的路线。共产国际执委的革命指示，却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所拒绝了。而且甚至达到这种地步，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竟然“同意了”解除工人的武装！不顾武汉政府头子们底显然反革命的行为，谭平山毫无勇气公开宣布退出国民政府，而代以毫无原则的和怯懦的“请愿”。共产国际在秘密的指示中，一再最严厉地批评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共产国际曾经警告，如果中国共产党中央不纠正自己的错误，那末，它就要公开的批评它了。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拒绝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执委认为公开号召中国共产党党员起来反对中央的机会主义，乃是自己的革命责任。

（八）共产国际认为，必须马上纠正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底这些错误，并将此事通知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

共产国际认为：

1、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刻不容缓地公开宣布退出武汉政府；

2、在退出武汉政府时，需要发表一个原则性的政治宣言，说明采取这个步骤的理由，是因为武汉政府仇视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要求严办一切迫害工人和农民的分子，从各方面揭穿武汉政府的政策；

3、但不退出国民党，仍留在该党内，即使国民党领导者正在进行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开除出去的运动。与国民党的下层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他们中间提出坚决抗议国民党中央行动的决议案，要求撤换现在的国民党领导机关，并在这一基础上面，筹备召集国民党的代表大会；

4、用一切办法加强在无产阶级群众中间的工作，建立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巩固职工会，准备工人群众去进行坚决的行动，领导无产阶级的日常斗争；

5、展开土地革命，继续用“平民”式的方式，即用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人、农民、城市贫民联盟之革命行动，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斗争；有系统的武装工人和农民；

6、鉴于压迫和惨杀，应建立战斗的不合法的党的机关；

7、采取种种办法，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底机会主义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共产国际认为，关于党的一般政策，特别是关于党的领导之政策问题，获得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共产国际执委号召全体党员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团结党的队伍。共产国际执委号召全体党员与党底领导底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坚决斗争。共产国际执委在满意地指出共产主义青年团底正确立场和党员群众的英勇斗争时，确信中国共产党显露了自己有充分的力量，足以改造自己本身的领导和否认破坏了共产国际底国际纪律的领袖们。必须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长成的党员，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他们因与党的全体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用这种办法可以克服现在党的领导之机会主义。

共产国际执委认为，伟大的中国革命之进程，已把这样广大的工人和农民群众唤醒起来参加政治生活和政治行动了，以致任何力量都不能压服他们的运动了。在正确的领导之下，胜利将是属于中国工人和农民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 共产国际关于
# 中国革命问题的几个指示（节录）

## （一）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在城市中退却并收缩工人争取改善其地位的斗争的总的政策是不正确的。必须在农村中展开斗争，但同时必须利用有利的时机来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用一切方法使工人的斗争具有组织性，以免发生过火行为和冒进现象。特别是必须竭力把城市中的斗争引向反对大资产阶级，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者，使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尽可能地留在反对共同敌人的统一战线范围内。我们认为调解室、仲裁法庭这种制度是适当的，只要在这些机关中可以保证执行正确的工人政策。同时我们认为必须提出警告：发布反对罢工自由、反对工人集会自由等法令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 （二）一九二七年三月

“必须在军队中加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部工作，在没有这种支部而又可能成立支部的地方，必须把它们成立起来；在不可能成立共产党支部的地方，必须靠隐蔽的共产党员加紧进行工作。

必须坚持武装工农，把各地农民委员会变成拥有自卫武装的实际权力机关等方针。

共产党在任何地方都必须以自己本来的面貌出现，不容许随意采取半合法的政策，共产党不能成为群众运动的障碍，共产党不应当掩饰国民党右派的叛变的和反动的政策，必须动员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周围的群众去揭穿国民党右派。

必须使一切忠于革命的工作者注意：目前由于阶级力量的重新部署和帝国主义军队的集中，中国革命正经历着危急的时期；只有在展开群众运动的坚决方针下，革命才可能获得进一步的胜利。否则革命就会迂到极大的危险。因此，现在实施指示比任何时期都更必要。”

## （三）一九二七年五月

“现在国民党对内政策中最主要的就是以‘农村中的全部政权归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为口号，在各省尤其是在广东有系统地扩展土地革命。革命和国民党成功的基础就在于此。在中国建立一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而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大军的基础就在

于此。实际上，没收土地的口号对于被猛烈的土地运动所席卷的省份，如湖南、广东等省，是十分及时的。否则就不可能开展土地革命。①……。

必须立即开始建立由革命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这将是武汉用来在前方或后方解除不可靠的部队的武装的近卫军，这是刻不容缓的工作。

必须在蒋介石的后方及其部队中加强瓦解工作，援助广东省起义的农民，那里的地主统治是特别难以忍受的。”

## （四）一九二七年五月

“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对谭平山的巡视产生顾虑是有某些根据的。不应该脱离工农运动，而应该用一切办法去协助它。否则就会把事业断送。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的呼声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国民党的现存机构必须予以改变。国民党的上层必须加以革新，以土地革命中提拔起来的新领袖来补充它，必须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千百万会员来扩大地方组织。否则，国民党就有脱离实际生活并丧失全部威信的危险。

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个工作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

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不能只是劝告。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必须惩办那些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党人，那末他们是会被人民和革命所抛弃的。”

①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4册
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编
页数=555
SS号=10273506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封面

目　　录

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
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27年5月）
共产国际执委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1927年7月）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几个指示（节录）